中央研究院叢書

# 劍拔弩張的盟友

##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太平洋戰爭中的兩個盟友：中國和美國
兩者之間的關係
既有密切合作，又有尖銳衝突
本書根據大量資料，爲讀者提供一個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視野

齊錫生◎著

（修訂版）

中研院叢書

# 劍拔弩張的盟友

## 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

## 1941-1945

（修訂版）

齊錫生　著
（CH'I, HSI-SHENG）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給 蜜瑞

**MY CJCAP**

# 作者的話

本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學生時代。我初到美國去讀研究院時，正值甘迺迪任職總統。當時在美國中西部所見到的，真可以稱得上是土地豐腴，國泰民安，民間充滿樂觀，學術界思想活潑。在經過了麥卡錫時代的慘痛教訓後，學術界產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蓬勃朝氣和衝勁。各種具革命性的理論和學說相繼湧出，那才是一種貨真價實的百花齊放場面。它既讓年輕學生們有目不暇接的興奮，又有追趕得喘不過氣來的壓力。

我當時主修的學科是國際關係理論，由於所追隨的老師正是新理論的倡導者，因此縱使我本人只不過是一個未出茅廬的後生晚輩，然而在老師的提攜下，居然有幸和當時世界知名學者們在一起討論問題，並提交自己的論文聆聽他們的指正，並被他們採用和予以發表。對於一個剛剛進入研究院的嫩學生而言，這種機會對於我個人此後心智的發展，都有莫大影響。

與此同時，我也首次有機會接觸到大量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文著作。在這種情況下，在我整個研究生生涯裡，國際關係理論是我的正經課，而中國近代史則是我的課外讀物。大約在三、四年內，把當時美國官方出版的對華外交文獻和學術界出版的專著都看了許多。而在這些課外讀物中，最引發我興趣的莫過於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同盟關係。我當時認爲這些英文書籍的內容不但史料新穎，而且分析入微。當時的我，是一個對國民黨政權和蔣介石個人深感失望和滿懷牴觸情緒的年輕學生，在美國能夠讀到的作品，無論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都讓我感到茅塞頓開和激賞不已。我立即得到的印象是，有關這個課題的學術成果已經完全成熟，未來的學者大概不可能超越它們去做出新的建樹。

如果說在閱讀這些英文著作過程中，最初曾經有過任何一丁點讓我感到欠缺的話，那就是它們對中文資料的引用不足。比如說，許多學者在分析中美關係時都經常談到蔣介石的動機，但是又不注明史料的來源。然而由於他們那種言之鑿鑿的架勢，

與當時美國學術界似乎對中美關係歷史已經形成高度「共識」的氣候，又使我自然地相信他們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只是內心總不免被一絲疑問所困擾，那就是「他們是怎麼知道的？」「他們的證據是什麼？」即便如此，我仍然認爲這個學術成果是豐盛正確的。至於自己心中的這個疑問，其動機並非對現有的學術成果不滿，而只是認爲它是一個美中不足，是沒有提供中文資料去闡述它的論點而已。因此，即便當我最初動念要從事一點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研究時，其目標也非常有限，只是想在現有的學術框架下，針對某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去研讀一些中文資料，把一些在英文著作裡沒有交代清楚的事件，以中文史料作爲補充或是旁證而已。出於這種心態，所以在最初選擇研究課題時，都是比較瑣碎，著重歷史敘述，既缺乏整體觀，也不打算向現有的學術定論提出評判或是予以推翻。

意想不到的是，在逐漸深入研讀中文原始資料的過程中，開始發現中文資料所呈現的史實，和英文著作所引述的史實不但時有矛盾，有時甚至截然相反。這就讓我原來打算以中文資料作爲補充英文著作的設想完全落空了。而且愈是擴大對中文資料的研讀範圍，愈是看出中英文在對歷史事件的敘述上經常對不上號。

面對這一意想不到的困境，我最後只好採用一個雖笨拙但是應該可靠的方法，那就是借鏡自然科學家們早已行之有效的實驗方法。簡單的說，科學家的發明或是發現之所以能夠成立，就是因爲他們的實驗可以由別人用重複的方式來檢驗它的可靠性。換言之，如果每次用同樣的元素在同樣的條件下運作，就應該會得到同樣的結果。誠然，歷史學的科學性遠不如自然科學，但是如果用同樣的史料，至少也應該得到相近的結果才對。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使然，而這種現象本身也就值得加以重視了。

基於這份好奇心的驅使，我開始試著重新去走一遍以前學者們已經走過的老路，也就是盡量去閱讀他們在英文學術著作中所引用過的原始資料。即使這些資料多年來已經被學術界廣泛接納，甚至重複引用，幾乎已經成爲具有高度性權威的「定論」時，我也把原文再看一遍，不敢輕易放過。我之所以這樣做的動機，無非是想求得一個安心，指望能夠肯定地知道英文學術著作是在紮實的史料基礎上建構完成，同時也希望借此找出一個理由來說明，爲什麼中英文著作之間的差距會如此之大。

這種嘗試一旦開始，才發現英文資料的閱讀工作量遠遠超過原先的估計。其中一個原因是，學術界大量著作是根據英文史料寫成，它們引用的資料來自各方面。另一個原因是，英文的重要史料在數量上的確比中文豐富。如果一位學者想要在這個領域內取得發言權的話，當然應該充分了解過去學者著書立說的根據是什麼。

本書作者在花了許多年時間閱讀英文原始資料後的體會，大致可以分爲三方面。第一，現有的英文學術著作的確引用了大量而又豐富的史料。許多學者治史態度的勤奮和認真，使得他們能夠把歷史學研究的成績不斷向前推進。這種努力值得欽佩和借鏡。這也說明了爲什麼西方歷史學家能夠占據學術界的陣地，在世界史學界贏得主導地位。第二，某些學術著作對史實的敘述並不完全正確。它們不但經常錯誤地敘述中國史，也錯誤敘述美國史。錯誤的敘述難免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結論，兩者都應該加以修正。第三，有價值的英文原始史料其實遠比目前學術著作所已經引用者更豐富。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史料雖被廣泛引用，但是它們的重要性並未被學者們所體察。另外一部分原因是，當有些史料的內容不符合學者們預設的立場或是結論時，它們就可能被忽視或蓄意掩蓋，乃至被扭曲。

一旦有了這種體會，作者就開始相信，中文和英文對史實的敘述之所以對不上號，與其說是它們一方肯定有錯誤或是偏差，還不如說是它們沒有被學者充分地結合運用。因此，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絕非一門已經「蓋棺論定」的學問，它反而是一塊可以讓學者去耕耘的肥沃土壤。通過查證舊的史料和發掘新的史料，學者們可以有機會去重新思考歷史問題，檢驗學術成果，並進而開闊學術視野。

本書所引用的資料大致分爲兩個部分：中文資料和英文資料。

中文資料部分包括三類：第一類是戰時中國領導人的個人文件。這包括宋子文、孔祥熙、顧維鈞、陳誠、胡適、陳光甫、熊式輝、蔣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翁文灝等人的日記或是回憶錄。其中，近年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當然最爲重要。第二類是政府原始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大量報告，部會間的公文來往，領導人之間的書信、電報、手諭、手稿、備忘錄，駐外機構和人員(使館和武官)的情報、請示等等。另外還有中國、美國及其他盟邦間的外交文電、軍事計畫、戰鬥報告等等。雖然這些資料在原先都是保密的，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來已逐漸解密。第三類是歷年來以中文出版的有關中美同盟關係的學術著作，和政府重要文件彙編。

英文資料部分同樣包括三類。第一類是美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主要領導人的私人文件檔案。這些人包括羅斯福、居里、項貝克、馬歇爾、史迪威、魏德邁、陳納德、竇恩，和波特勒等人。第二類是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大量的無線電通訊，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的書信來往，國務院的內部文件和指令，美國參謀總長會議的會議記錄，英美參謀總長聯席會的會議記錄，英美兩國軍方的來往文電和會談紀要，盟邦重要國際會議的記錄(開羅會議)，作戰計畫草案或是決議案。第三類則包括所有的重要官方文件(國務院)和政府公報，和有關羅斯福、史汀生、馬歇爾、摩根韜、李海、霍普金斯、

赫爾利、拉鐵摩爾、赫爾等領導人的雜記、日記，或訪問記錄。當然，英文中有關美國政府對華外交政策和軍事計畫的學術專著也是非看不可的資料。

依照作者的觀點，當前不少學術著作(尤其是眾多的英文著作中)存在兩個需要改正的缺點。

第一，它們雖然聲稱討論中美同盟關係，但其實著重點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很少討論中國政府的對美政策。即使不得不談到後者時，最多也只是一筆帶過，很少能夠提出細緻的敘述或是深入的分析。更有進者，即使在它們偶爾處理的過程中，它們多半只是提出假設、臆度，和猜測，很少能夠列舉事實來支持它們的說法。這種現象當然無法令人滿意。最淺顯不過的理由是，兩國同盟關係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關係。其中任何一方所持的觀感、認知，和所作出的決定，都能引起對方的反應。而這些反應又會刺激原來一方下一波的反應。這種「反應－反反應－再反應」的行爲模式，是任何想要闡述同盟關係的學者必須掌握的基本方法。因此，假如學者們只以其中一方的目光去研究同盟關係的話，他們就無法讓讀者們真正了解同盟關係中極爲豐富而又錯綜複雜的互動內容。不幸的是，現有的學術著作中很少著力去剖析同盟的「關係」。換言之，它們只講了故事的一半。

第二，正因爲某些研究者選擇只把研究重點放在一方(美國)，因此他們沒有興趣去參考另一方(中國)的資料以充實他們的敘述。最糟糕的情形是有關中國的基本史實都會有錯誤的敘述。但是這也難怪，因爲有的學者根本不懂中文，但是仍然寫出大部頭的中美同盟關係著作。中文資料的完全不被引用，最後不但導致他們的史實敘述缺乏完整性和平衡性，也必然損害到他們分析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有鑑於此，本書最基本的願望，不是在於對目前的學術成果作翻案文章，也不是爲了歷史上的某人某事去作專題性的更正工作，而是在中文和英文兩部分史料的基礎上，全面性地重新梳理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希望能夠建立一個新的史實敘述，特別強調的方法論是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言，一方的行爲不但會引動另一方的反應，即使是一方對事實的誤解或是對另一方動機的誤判，也會引動一連串後繼的誤解和誤判的結果。就像是一盤棋局或是一場拳擊一樣，只有當學者們把雙方的行爲和動機都充分描繪出來時，讀者才能看清楚這個活動的本質。如果關係的一方缺席或是變成隱形人，那麼讀者只會墜入五里霧中。由於本書作者認爲「互動」是中美同盟關係最重要的本質，而本書的目的是要想把這些關係以動態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對於某些熟知中美同盟關係史而又細心的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應該可以發現，本書所引用的一部分歷史事件看起來相當眼熟，因爲它們早已被學者們多次引用過。但是它們

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故事卻和以往的著作有重大不同之處。其原因是本書作者認爲有許多「眾所周知」的史料曾經被多次誤用，因此需要加以重新組織，在本書中作爲一個新的描述的素材或是新的立論依據。更重要的是，本書還發掘了許多以往著作所忽略甚至有意規避的史料。本書作者希望通過這些新史料去填補以往學術著作的局限性。本書最低的願望是把歷史的真相呈現給讀者們，進而向讀者們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去分析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在回歸歷史原貌的工作上做出一份努力。更進一步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果本書能夠把「前事」說得明白清楚，使中美兩國政府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啓示，或是吸取一些教訓，進而把兩國的關係處理得更平穩順利，那就更是本書的意外收穫了。

在本書漫長的研究準備期間，作者曾經得到許多單位的協助。在研究資料方面，中文資料部分曾多次得到地處臺灣新店的國史館同仁們的慷慨協助，不但在提供資料上服務態度專業，而且在照顧訪問學者生活的工作上也是盡心盡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贈送的出版品也給作者很大的方便。此外還使用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資料。其他在美國的中文和英文資料部分給予我協助的有：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庫、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史丹福大學圖書館、胡佛總統圖書館，和馬歇爾將軍圖書館。

在研究經費方面，我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任教時，1980年代曾得到教授研究費的補助。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時，1990年代曾多次得到慷慨的教授研究經費補助和研究假期，使我在海外的研究工作得以持續。2002-2003年度承蒙臺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厚愛，聘請爲該所特聘研究員一年，並提供非常優良的研究環境。2007年秋季又承胡佛總統圖書館邀請，專程到該館閱讀蔣介石日記。對於以上這些學術研究機構及工作人員的善意關懷，專業協助，和經費資助，都使我感激不盡。除此之外，作者沒有接受任何來源的補助，也沒有循由其他途徑取得任何不向一般學者開放的資料。

多年來還有一大群家人、朋友和同行關心我的研究進展，並且給予各種程度的指教和協助，在此只能向他們致誠摯的謝意。在本書定稿之前，承蒙兩位不具名的評審員對稿件作出細心的閱讀和坦誠的批評指正，使作者得以及時改正錯誤和充實內容。最後又承聯經出版公司方清河先生費神在文字上提出許多寶貴建議。他們的精神支援和具體協助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因素。但是還是有三位人士對於本書所做的貢獻，需要在此特別提出。

一位是鄒讜教授。我剛到芝加哥大學念書時，正值他的經典之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出版。多年來，我一直認爲該書所展示的深刻度超過許多其他同期乃至後期的著作。他的治學態度和成就，在日後的年歲裡，也給我提供了一個自我期許的楷模。雖然當時依照學校課程規定，我只選修過鄒先生兩門課，但是在此後數十年中，我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聯繫，也接受過他和鄒夫人盧懿莊博士無盡的關懷和提攜。鄒先生更令我景仰的卻是他的爲人風範。純真、無私、寬厚、謙虛、誠懇，和助人等種種君子的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在他身上流露無遺。因此，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文章上，鄒先生是我一生中有幸認識的一位好老師，他的關照和鼓勵都令我懷念不已。本書寫作的原始動機可以說來自鄒先生的言教和身教。

第二位是美國馬歇爾將軍圖書館的Martha S. Gansz女士。我在去該館研讀資料前與她並不相識，研究工作結束後也未曾保持聯繫。但是我在該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她所顯示的專業素養，盡心盡意的協助，主動的關切和人情的溫暖，使我的閱讀效率增加數倍。如果世上資料管理人員的工作態度和待人接物的素養都能和Gansz女士一樣的話，學術發展的速度將會突飛猛進。她是我能夠想像的最好的資料管理員和研究協助人的楷模。因此，我對她有一股難以自抑的感激，同時體會到自己是何等的幸運。

第三位是我的朋友陳永發教授。他多年來不但一直鼓勵和關心我的研究進度，而且在本書初稿完成後，慷慨地答應爲我審讀。在此後一段長時間裡，永發兄花費了大量寶貴時間和精力，提出各種修改的建議。舉凡在史證、推理、分析和立論等各方面，本書都得到了他無數的珍貴意見。作爲一位同行和朋友，他對本書所提出的坦誠批評和慷慨協助，實在是作者最大的受益。

當然，本書內容仍然存在的謬誤，全部是作者個人的責任。

# 寫作凡例

1. 本書盡量避免引用過去已經出版的學術著作。雖然本書所討論的範圍與史學界許多著作有高度重疊性，但是本書盡量不去引用這些著作，原因並不是本書作者不熟悉這些史學界的成就，而是本書的敘述和立論與它們大不相同。正如在「作者的話」中所陳述的，本書作者當然必須仔細地閱讀這些著作，而且這些著作也正是促使作者撰寫本書的重要推動力。但是由於彼此在敘述、立論和分析等各方面都存在重大歧異，因此爲了避免逐章逐節地去加以說明或是爭辯，作者選擇了專心地向讀者提供自己對這一段歷史的了解。換言之，爲了對讀者的尊重，本書的出發點不是在與別人打筆仗，而是希望能夠依靠資料使歷史回歸原貌，一切信賴讀者去作判斷。

2. 無論中文或是英文的史料，本書所參考者都盡量以原始史料爲準。即使該項史料曾經被其他學者廣泛引用過，本書作者仍然堅持去研讀原件，其目的並不是去做一件吃力不討好的重複工作，也不是向讀者炫耀本書研究工作的深度，而是爲了要經過獨立判讀的過程去了解原始史料的意義，免受他人影響。雖然史料已經被學者廣泛使用(最好的例子是史迪威已出版的日記)，但是不同的學者對於同一件史料的取捨和感受都可以大不相同。因此爲了不落入「人云亦云」的窠臼，對原件進行獨立研讀最能保持歷史真相。

3. 本書引用舊史料的目的並非在重述以往的學術成果，而是希望用之來提供新的觀點和解釋。因此，儘管史料可能似曾相識，但其作用並不相同。同理，本書的注解中也引用了部分已出版的學術著作，其目的也並不是重複它們的觀點，而是標示本書與它們不同之處。此外，本書還引用了大量新史料，也希望用來補充、修正或是重建這一段重要的歷史。這兩種史料大致以兩種形式存在，一是分散在各檔案館的原件(真跡或影印本)，二是有些已經被彙編成書。本書作者在做研究工作時曾經盡量對比原件和出版的彙編版本的準確性。本書所採取的基本措施是，凡是已經

彙編出版成書的史料，如果其內容與原件完全相同時，則本書只引彙編的書，以方便讀者參閱(例如《戰時外交》一書)。但是如果彙編書中的文字與原件有出入時，則只引原件以求真實。換言之，如果讀者發現一件史料已經包括在彙編集中，而本書卻引用原件的話，極可能是作者發現彙編有失誤或是刪除的痕跡。這種情況在中文和英文史料中都存在。

4. 注解盡量標出引用原件的存放地(檔案館)，以方便讀者查詢。

5. 本書注解以中英文分別處理，一般原則是依原件的文字爲標準。這樣不經過翻譯手續，可以幫助讀者找到原文出處，也可以節省印刷篇幅。

6. 無論原件爲中文或是英文，注解均以最簡潔方式標明其主題及其他重要信息，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照引原件標題的全部文字。對於大型檔案的名稱也依同樣原則處理。目的在節省篇幅和避免造成混亂。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
/齊錫生著．--二版．--臺北市：中研院，聯經，2012.03
648面；17×23公分．（中央研究院叢書）
ISBN 978-986-03-1769-5（精裝）
〔2012年3月二版〕

1.中美關係 2.外交史 3.第二次世界大戰

645.2 101002442

# 目次

**作者的話** ····· i
**寫作凡例** ····· vii

**前言：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 1
壹、中國外交處境 ····· 1
貳、國內情況 ····· 2
叁、蔣介石作爲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 6

**第一章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 ····· 9
壹、日本攻擊珍珠港消息傳到中國時 ····· 9
　一、蔣介石個人的反應 ····· 9
　二、中國在宣戰前的考量 ····· 11
　三、中國無法說服蘇聯參戰 ····· 14
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 ····· 15
叁、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 ····· 17
　一、中國對盟邦歧視的不滿 ····· 18
　二、中國擔心被邊緣化 ····· 20
　三、一個粉飾工作的失敗：熊式輝代表團的尷尬 ····· 23
　四、中國對於遭受排擠反感的原因 ····· 27
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 ····· 30

一、對英國強盜行徑的憤怒……31
二、緬甸與東南亞……34
三、中國對英國動機的疑懼……37
伍、中國決心親美……38
一、美國軍援……38
二、馬格魯德將軍的角色……41
三、美國財政援助……44
陸、小結……47

**第二章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49**
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49
一、蔣介石提出邀請的動機……49
二、對人選品質的要求……50
三、對職務的界定……53
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穆將軍的遴選過程……53
一、莊穆將軍之入選……54
二、莊穆的對華方針……54
三、莊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終止……56
叁、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57
一、美國把職務範圍逐漸擴大化和複雜化的過程……57
二、中美兩國所強調的重點大相徑庭……61
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64
一、史迪威的入選……64
二、史迪威的專業素養……66
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68
一、史迪威對其使命最初的觀感……68
二、中國人對史迪威任命的樂觀反應……71
陸、史迪威赴華履新……72

柒、小結……74

**第三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1-4月——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77**
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77
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78
　一、中國的計畫……78
　二、英國的計畫……80
叁、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81
　一、中國主動採取的行動……81
　二、英國的反應……82
　三、開戰初期中國對空中運輸路線的探索和美國的反應……82
　四、中國加緊準備在緬甸作戰……84
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85
伍、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86
　一、蔣介石視察緬甸前線……86
　二、史迪威開始工作……86
　三、英國的防務安排……88
　四、仰光淪陷及其影響……89
　五、史迪威拿到指揮權……90
　六、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開始分歧……91
　七、英國因素再度抬頭……93
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96
　一、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摩擦與妥協……96
　二、戰局日益險峻……98

**第四章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慘敗及其影響……105**
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106
　一、史迪威拋棄中國軍隊脫離戰場……106

二、美國人指控羅卓英臨陣潛逃……109
三、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話……110
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113
一、美國人的觀點……114
二、戰爭進行中的主要分歧……116
三、中國觀點的逐漸形成……121
叁、中國憤怒的升級……127
一、史迪威的第一份報告……127
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128
三、蔣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129
四、6月15日的重要會談……130
五、蔣介石企圖改變與史迪威關係的失敗——6月24日的會談……131
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136
一、史迪威的期望……136
二、中國人的期望……137
三、文化和個性的衝突……138
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141
一、史迪威對中國實況的認知……141
二、緬甸戰敗對蔣介石的當下和長遠影響……147
三、蔣介石面臨的政治風險……152

**第五章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157
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157
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158
一、蔣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會談……159
二、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軍火的期望……160
三、中國在1942年中期對軍火要求的新動機……161
叁、美國飛機的移防……165

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168
一、6月29日的會談……169
二、蔣介石三項要求的意圖……172
三、史迪威對三項要求的看法……176
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178
一、對於危機起因互相矛盾的記載……179
二、史迪威不請自來的聲明……180
三、中國人的反應……183
四、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後的補救……184

**第六章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193
壹、居里訪華的背景……193
一、緣起……193
二、宋子文反對居里使命……194
三、蔣介石的態度……195
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196
一、雙方集中火力相互攻擊……196
二、居里意圖改善中英關係心願的落空……196
叁、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198
一、飛機移防和三項要求……198
二、史迪威的多重職務……199
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202
一、居里提出指控……202
二、宋子文的回應……203
三、史迪威的反應……204
四、電報事件對居里態度的影響……205
伍、居里改變策略……206
一、居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206

二、蔣介石的回應……207
三、一個過渡性的安排……208
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209
柒、居里訪問的結束……212
一、居里的成就……212
二、居里訪華時的所見所聞……214
三、居里向蔣介石透露的訊息……217
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221
一、最初的反應……221
二、西方人就是不同……222
三、父子關係的比喻……224
四、蔣介石的綜合印象……225

**第七章　計畫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1943年6月**……227
壹、早期作戰計畫……229
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231
一、蔣介石開始行動……231
二、盟邦好整以暇的反應……232
三、史迪威的反應和努力……233
四、英美同意在1943年3月開戰，以及蔣介石的反應……235
叁、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239
一、英國興趣降低的先兆……239
二、美國輕聲細氣的勸告和英國暴跳如雷的回應……244
三、1942年底——史迪威心情與態度開始劇烈改變……246
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247
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250
一、美國開始壓迫中國接受縮水的作戰計畫……251
二、玄機初顯——緬甸戰爭與太平洋地區戰爭緊密關係的開端……252

三、同盟國訂出新的開戰時間表：1943年11月 ……254
四、蔣介石的反應和期望 ……258
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 ……260
一、陳納德－史迪威在華盛頓的辯論 ……261
二、羅斯福找蔣夫人進行秘密交易 ……266
三、三叉戟會議經過和成果 ……269
柒、小結 ……279

**第八章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287**
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 ……287
一、1943年7-8月：接踵而來的好消息 ……287
二、1943年8月底的魁北克會議 ……289
三、作戰計畫推進的跡象 ……292
貳、宋子文的失勢 ……294
一、宋子文試圖撤換史迪威的努力 ……295
二、第一回合：宋子文加緊在華盛頓的努力 ……298
三、第二回合：宋子文在印度的活動 ……301
四、第三回合：宋子文在重慶發動攻勢 ……302
五、宋氏姐妹神秘的角色 ……304
六、宋子文付出代價：被打入冷宮 ……306
七、美國的備用方案 ……308
八、1943年10月事件的正面影響 ……310
叁、在開羅討價還價 ……313
一、中國在開羅會議前的準備工作 ……313
二、緬甸是蔣介石的主要目標 ……318
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 ……324
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最初反對德黑蘭決定 ……325
二、史迪威和羅斯福在開羅會談 ……326

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331
一、史迪威建議縮小緬甸戰爭範圍……331
二、羅斯福開始變調……334
三、蔣介石的困境……336
四、蔣介石的動機和盤算……338
陸、美國開始翻臉……341
一、第一波攻擊……341
二、後續的攻擊行為……345
三、事關美國自身的利益……346

**第九章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響……351**
壹、戰爭終於展開……351
一、同盟國的作戰目標……352
二、日本的作戰計畫……352
三、盟邦要求中國伸出援手……354
四、史迪威對緬甸戰爭的個人動機……357
五、美國的官方說詞……357
六、美國壓力升級和中國入緬作戰……361
七、緬甸戰爭和中國本土作戰之間的緊密關聯……364
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364
一、向中國運送補給品……367
二、戰爭時機的考慮……371
叁、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375
一、太平洋戰場的日趨重要……376
二、太平洋戰略的明朗化……379
三、緬甸和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挺進的關聯……381
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388
一、中國承諾的內容……389

二、史迪威和中國遠征軍的貢獻……390
三、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後遺症……390
四、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相輔和相悖之處……392

**第十章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397**
壹、念頭的起源……397
一、羅斯福的官方理由……397
二、華萊士的報告……399
三、史迪威和英國人關係的日益惡化……399
四、史迪威令馬歇爾陷於困境……400
五、史迪威的窘境……402
六、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漠視……402
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406
一、史迪威轉敗為勝的奇謀……407
二、馬歇爾的催化功效……408
三、馬歇爾替總統擬就的電文稿……411
四、羅斯福的要求……411
叁、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413
一、蔣介石的感情反應……414
二、蔣介石提出的條件……417
三、赫爾利作為斡旋人……418
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421
一、史迪威休假期間的閒情逸致……421
二、華盛頓加緊壓力……423
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423
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427
一、蔣介石幕僚的建議……428
二、蔣介石扮演的角色……430

柒、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432
一、蔣介石接見赫爾利與史迪威……432
二、幾項初步共識……434
捌、談判遇上波折……435
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435
二、9月15日的交鋒……437
三、史迪威加大賭注……443
玖、攤牌前夕的狀況……444

**第十一章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447**
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447
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449
叁、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451
肆、蔣介石的反應……454
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457
一、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24日的會談……457
二、蔣介石9月25日的備忘錄……459
三、孔祥熙9月28日的報告……461
四、霍普金斯的介入……462
五、中國其他領袖的介入……465
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發動攻勢……468
一、史迪威對中國的直接懲罰……469
二、史迪威利用中國共產黨作為討價還價的工具……470
三、史迪威向馬歇爾求助……471
柒、史迪威9月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473
捌、羅斯福再度介入……474
一、白宮的補救措施……475
二、馬歇爾挽救史迪威的最後努力……477

三、羅斯福在10月5日提出妥協方案……478
玖、最後的掙扎……480
一、蔣介石斷然拒絕……481
二、史迪威最後的努力……483
三、赫爾利介入危機的過程和深度……484
四、羅斯福對史迪威的支持逐漸消失……488
五、羅斯福最後的決定……490
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493

**第十二章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495
壹、魏德邁爲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496
一、魏德邁的背景……496
二、魏德邁在東南亞戰區的工作經歷……497
三、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500
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及馬歇爾的關係……510
一、中國人眼中的魏德邁……510
二、魏德邁與馬歇爾的新關係……522
三、居間改善蔣介石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525
叁、魏德邁改革的內容……526
一、改造中國軍事體制……527
二、中國軍隊應該有多少？哪些部隊應該接受整改？……528
肆、魏德邁的成績單……531
一、指揮權及相關事務……531
二、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533
三、一個新而務實的互惠關係……534
伍、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國戰區……535

**第十三章　結論**……539

第一部　贏得戰爭
壹、同盟國的凝聚力……539
貳、中美同盟的特性……540
　一、同盟關係對於兩個國家不同的意義……540
　二、兩國之間不同的心態與運作方式……542
　三、同盟關係的成果……545
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
壹、政策目標……547
　一、美國的目標……547
　二、中國的目標……548
貳、觀感與假設……549
　一、美國軍部的基本方針——小幅投資，大幅收成……549
　二、尋找一個合理策略的理論基礎：史迪威的利益交換原則（*quid pro quo*）……549
叁、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及蔣介石的認知與假設……553
　一、中國是否無意繼續抗日？……554
　二、蔣介石個人品質是中國軍事改革最大的阻力？……556
　三、中國政府與外國專家間的合作態度問題……563
　四、造成中美衝突的其他原因……571
肆、中國的政治軍事現實與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577
　一、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577
　二、蘭伽訓練基地的優異成果……581
　三、雲南省遠征軍的改革努力……582
　四、在中國其他地區的軍事改革工作……583
第三部　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的總結
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586
貳、政策運作的困難……588
叁、個人因素的重要性……593

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596

**參考書目**……601
**人名事件地名對照表**……611

# 前言
# 珍珠港事變前中國之縮影

## 壹、中國外交處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國已經單獨對日作戰四年五個月了。此期間，儘管中國曾經不斷要求西方列強給與外交、經濟及武器上的援助，但西方列強都不理不睬或冷峻拒絕。英國和法國因爲擔心日本對它們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進行報復，甚至多次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所提的和平條件。到了1940年夏季，它們更進一步切斷中國經過緬甸和越南通往國際的通道。

美國的態度也只是稍微好一點而已。雖然美國人民對日軍在華暴行不時發出抱怨，但是美國商人繼續把戰略物資賣給日本賺取暴利，間接支援了日本的對華侵略。美國政府也保持其一貫的曖昧態度。一方面，它不時發表一些譴責日本的聲明，但無意爲中國而與日本直接作戰；另一方面，它提供中國少量的貸款和軍援，但數量卻不足以真正提高中國的作戰能力。1941年美日關係明顯惡化，其原因與其說是爲了替中國打抱不平，不如說是因爲世界局勢惡化，而日本對東南亞的威脅日益增加。總的來說，從1937到1941年，即便中國一再把自己形容成西方反侵略戰線中的一分子，美國卻始終沒有對中國提供具有實質意義的援助。

諷刺的是，當時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反而是世界上兩大極權國家：德國和蘇聯[1]。在數量上，它們之中任何一國的軍事或經濟援助都遠遠超過西方民主國家的總和。然而它們對中國的態度不久即因歐戰爆發而改變。德國逐漸親近日本，並最終成立軸心國同盟，不論中國如何苦苦哀求，希特勒終於完全停止它對中國的軍事供應。

---

1 馬振犢，〈抗戰爆發前德國軍火輸華評述〉，《民國檔案》45(1996年6月)；李嘉谷，〈評蘇聯著作中有關蘇聯援華抗日軍火物資的統計〉，《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5月)。

而蘇聯不願意陷入兩面作戰的最壞局面，也必須小心處理它與德國和日本的緊張關係，更何況它與中共還維持秘密的黨組織關係。因此，蘇聯雖然仍不斷向國民政府提供武器，但其數量和質量都無法滿足中方要求，而其在蒙古和新疆的活動有時也影響到軍援補給線的順暢。

簡而言之，在這段長時間裡，中國遭受西方主要列強的漠視，相當孤立，對日抗戰只能靠自己努力。

## 貳、國內情況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情況也在急劇惡化之中。政治方面：1937年以前，國民政府號稱是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它的政令雖然還不能貫徹到每一個角落，至少可以有效地控制長江下游五到六個富裕的省份(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或湖南)，並且有希望逐漸擴展版圖。在這幾個省份中，國民政府可以任免官員，試行新縣制，徵兵徵糧，並從事大規模建軍工作。

但從1937年抗戰爆發到1941年年底珍珠港事變發生時，中央政府早已被日軍趕出其原有根據地。即使表面上控制的領土也不及原來版圖的一半，而且多半是最貧窮落後的省份。國家統一名存實亡，因爲剩下的土地被割裂爲許多個半獨立的地方系統，各自有其根深柢固的權力結構、領袖和複雜的人際關係。而在這些地方系統之下，還有更多的小系統，對大系統而言也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權。

在華北，閻錫山實際控制山西，境內幾乎沒有中央政府派駐的官員，但是閻錫山的主要幹部卻在名義上全部加入了國民黨。閻錫山不但是山西王，也周旋於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南京政府和日本占領軍之間。再往西走，越過蔣中正嫡系胡宗南控制的陝西中部和南部，則是廣大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青海、寧夏，及陝西和綏遠之一部，它們被一大群回族領袖、漢族軍人和共產黨控制，相互之間連年征戰，它們有的傾向重慶，有的與日本秘密往來，不少地區甚至不掛中華民國國旗而只掛自己的旗幟。更往西行，新疆的盛世才早已是蘇聯的附庸。同樣的，西藏與英國的關係遠比與重慶更親密。事實上，中央政府官員若要進入這兩個地區，都必須事先經過特別安排，甚至低聲下氣地請求批准。

在華南，廣西一直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控制之下，而其勢力也進入了湖北、安徽兩省。西南的雲南和中央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龍雲不但控制省政府，也擁有自己的軍隊。龍雲和汪精衛的關係一直令蔣中正惴惴不安。事實上，汪精衛

是在他的協助之下才能從漢口順利逃到河內，再轉赴南京成爲日本傀儡；同時龍雲也始終反對中央軍爲防止日本自越南進攻中國後方而進駐雲南。至於離四川更遠的廣東，其未被日軍占領的部分則在粵籍軍人掌控之下，他們表面上遵奉國民政府之命，實際上各行其是。

最後是戰時陪都所在地的四川省，它仍然是許多地方軍人的競技場。1937年以前，四川即以省內內戰頻繁爲全國之冠而惡名昭彰，不少地方軍人爲了支應戰費和中飽私囊，提前徵稅已經徵到1950年代了，所謂的「天府之國」早已元氣大傷。國民政府因爲抗戰而進入四川，但也無法改變其地方(縣)權力的結構。事實上，國民政府剛剛進入四川之際，它的權威就遭到省籍軍人挑戰。雖然當時省長王瓚緒也是四川人，而且他的任命本身已經是中央爲了羈縻地方勢力而作出的讓步；但由於他接受了中央的任命，仍然引起其他本省軍人的不滿。蔣介石被迫派另一高官(賀國光)前往成都安撫，才暫時平息反對聲浪。四川的政爭也波及鄰省西康，當時割據西康的四川軍人劉文輝，堅決反對中央勢力進入其轄區。

因此到了1941年，中央政府對任何一個省份的控制，都無法像1937年以前對長江下游那樣有效了。此時的中央政府經常無權任免省主席，即便偶爾在極少數省份可以任免省主席，廣大的城鄉仍然在地方勢力掌控之中。

換言之，這些地方的政府功能，如徵兵徵稅、公安法制，仍然依照中央政府未來到之前的形形色色本地陋規辦事。在這些地方，中央和省政府政令的推行不是依靠制度的權威，而是依賴上級和下級之間的談判、要挾、恐嚇，乃至利益分贓來處理。儘管重慶的領袖們大聲疾呼推行政策，但中央政令一旦出了重慶市區，便難發生作用。難怪到了1940年底，蔣介石已經感嘆內政問題對國家生存的威脅遠超過外敵日本。他特別提到的三個困難是——徵兵、徵糧納稅，和共產黨。它們都已經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之外了。

在經濟上，沿海省份的淪陷，意味著中國自19世紀末以來辛苦建設起來的一些單薄工業化成果，全部化爲泡影。日本迅速占領沿海各省，破壞或掠奪中國的現代工業設施，只有極少部分落後設備被匆促撤往後方，它們經由水路、陸路，甚至以人力獸力拖負的方式搬運，其過程雖可歌可泣，卻混亂不堪，成績有限。在經過日本空軍和陸軍四年處心積慮的摧殘，中國又後繼無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時，中國的生產力恐怕已經退步到1890年代的水平，甚或更爲落後。簡言之，中國只能從傳統的農業經濟中，拼命擠榨出一些剩餘物資，來和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敵人作戰。最鮮明的對比是，中國當時沒有能力製造一部軍用機動車輛，而日本不但可以製造大

量的大砲、坦克和飛機，甚至可以製造八萬噸級的航空母艦，其科技力量與世界任何強國比較都不相上下。

更糟糕的是，中國的農業經濟，和政治情況一樣地支離破碎。在國民政府匆忙撤離沿海各省時，它把大批的中下層行政幹部留在淪陷區，其結果是，後方各省的各級政府仍然由本地的權勢分子所掌控。明顯的例子是，儘管法幣應該是全國通行的貨幣，但事實上，僞政府幣、日本精心印刷的假法幣、民國以前的各種地方錢幣，在許多地方都通行無阻。市場既然如此割裂，難怪囤積居奇、走私、與敵僞通商、販賣鴉片或其他違禁品，都能在地方軍人的保護傘之下公然從事。也正是這樣一個落後的經濟，居然能夠支撐中國的抗戰到珍珠港事變之日。

軍事方面，問題同樣嚴重。從1927年到1928年，南方的北伐軍(蔣介石嫡系隊伍及部分兩廣部隊)運用民族主義高潮，強勢壓倒其他地區的軍閥，逼其輸誠以保全他們在各自原有地盤的統治權。因此，1928年中國達成的所謂「統一」局面，其實是經由討價還價而獲得的。在此後十年的「南京時代」中，蔣介石大大增強了他的軍事實力。他建立了一個小而精的現代化軍隊，進口了大批西方新式武器、兵工廠設備、工業器材，爲中國的國防工業建立了一定的基礎。在此過程中，他還在世界市場上物色到一批西方軍事專家，重金禮聘來華。到了1937年，這支中央軍不論在訓練、裝備或是紀律方面，都已經成爲中國百年來最優秀的勁旅。雖然這支軍隊在數量上並不能與地方軍隊的總數相比，但它比任何個別的地方軍隊都要強大和善戰。也就是這支軍隊，使得蔣介石在中國的內政外交上贏得主導權，並使他敢在七七事變時決定對日作戰。他的抗日決定在當時只贏得少數地方軍人誠心的支持，大多數地方軍人都寧可持騎牆觀望態度。

然而在戰爭開始後僅僅六到八個月之內，中央軍與地方軍隊的實力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蔣介石決定同時在華北、華東地區(特別是淞滬地區)正面迎敵的結果，是讓他的王牌軍隊遭受嚴重創傷，致中央軍和地方軍的比率又回到1928年以前的情況，國民政府的軍隊不再擁有數量的優勢。有些地方軍由於沒有參加對日作戰，所以武器裝備可能比中央軍更精良。但蔣介石既無實權命令這些部隊參戰，也無實權把它們精良的武器轉發給戰鬥力強的部隊。在不少地區(如山西、內蒙和西北)，地方政權陽奉陰違，如果重慶政府堅決要求它們抗日，它們不但不會奉令作戰，反而可能倒向日本或僞政權。正因如此，在全國進行對日抗戰的同時，也有不少地區正在進行小型內戰。設若不是蔣介石堅決把抗戰進行到底，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權會和日本達成局部和平共存的協議，乃至明目張膽地成立地區性傀儡政權。

毫無疑問，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時，中國軍隊的實質和七七事變前相比已經完全不同。它在編制上已膨脹到四、五百萬兵員之眾，一方面，盡忠職守的軍官找不到足夠的壯丁入伍，而另一方面貪污腐化的軍官卻大量吃空缺，致使軍隊的實際人數遠低於編制規定。儘管國民政府有全國性的徵兵法規，但實施則因地而異。地方負責執行的官員，其行爲常常被其他因素所左右，比如缺乏戶口調查資料，向權貴家庭示惠或收賄，或者是延續本地歷來的陋規而置法令於不顧。其後果是全國各地的徵兵制度充滿腐敗不公。

一般言之，壯丁在徵集之後，他們悲慘的命運才真正開始。在漫長的路途上徒步跋涉，又經常以繩索捆綁，必須忍受鞭打、飢餓，和其他種種非人待遇。難怪到達營地時只有少數壯丁仍然健康良好，相當一部分半途逃亡，或是死於異鄉。由於大多數省份控制在地方軍人手中，地方軍人首先要照顧自身的需要，不可能一次達成指標。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一年兩徵甚至三徵，或是向地方官員談條件做交易以取得壯丁。而這樣做更是增加了地方官員貪污枉法的機會，和人民痛苦的程度。

與此同時，國軍的戰鬥力也大幅衰退。軍隊普遍急需整編訓練、補充員額，和更新裝備。連綿不斷的作戰和接踵而至的挫敗，使政府無暇進行有次序的整軍。因此，蔣介石在1937-41年間幾度試圖施行整軍計畫，最後都不了了之。再加上蔣介石所最器重的德國和蘇聯軍事專家又相繼撤離，更使得士兵和下級軍官的訓練及參謀作業受到重大打擊。

武器的補給當然更爲困難。在珍珠港事變之前，中國曾經兩次試圖從國外大量進口武器，第一次是1938-39年，中國要求蘇聯裝備20個陸軍師，第二次是1940年宋子文專程赴美，試圖說服英國繼續維持緬甸交通，以保證西方武器可以經過仰光進入中國。但是兩次努力成果都有限。其結果是，1941年中國軍隊的裝備和戰鬥力已經比1937年大爲減退，不但缺乏先進武器如飛機、大砲、戰車等，甚至缺乏步槍、機槍和彈藥。

相對於地方軍隊，國民政府的中央軍漸趨劣勢。多次戰敗不但大幅削弱其士兵的戰鬥力，而且嚴重打擊將領的心理狀態和行事作風。在南京時代，中央軍的將領完全是專業軍人，以全副精力投注於訓練和作戰，少有行政職務的羈絆，也無需操心壯丁、武器或補給等後勤事務，因爲這些需求完全由南京政府負責安排。

但是他們一旦撤退到內陸省份後，情形立即改觀。他們必須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下尋求生存。有時需要圈地求生，或從地方官員手中奪取糧食和稅金。無形之中，他們的心態逐漸由野戰部隊變成占領部隊，生存成爲最迫切目的。事實上，他們變

成外來統治者。更有進者，由於1939-1940年國外武器來源逐漸切斷，一旦在作戰中喪失武器便無法補充。於是他們的心態便變得愈來愈保守，保存實力成爲首要考慮。

中央軍隊在和地方政府、地方市場以及廣大群眾發生直接接觸以後，將領們也愈來愈無法抵抗民間社會生活的引誘，也難以抗拒貪污腐化和貪生怕死的作風。除了一小部分將領仍能保持戰前的紀律和高昂鬥志，或是因爲作戰需要而經常調動防地之外(如第5、6、10軍)，在一般情形下，只要一支部隊長期在一個固定地點駐紮，就會出現風紀敗壞情況，而且時間愈久，腐化和頹廢的程度愈高(如湯恩伯在河南省)。這一個腐蝕過程最後感染了蔣介石大部分的軍隊。

## 叁、蔣介石作為中國領袖的真相與幻象

基於以上所述，蔣介石號稱是中國最高領袖，而其領導的政府號稱是中國唯一的政府，都是建立在相當脆弱的事實基礎上的。當時世界各國(除日本以外)之所以無視於這個事實，而寧願和蔣介石的政府打交道，其原因不外有二：第一，他的抗日決心表現得最堅強。第二，在國民政府旗幟下五花八門的軍隊之中，蔣介石嫡系軍隊的凝聚力最堅固。不論是珍珠港事變之前或之後，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之中，幾乎無一人倒向日本。相比之下，許多地方軍人選擇依附國民政府，但他們的忠誠度和抗日決心卻有所不同，有些人甚至認爲倒向日本或僞政權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複雜的環境中，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雖然只是全中國軍隊的十分之一左右，卻已經足夠支持他自稱是全國領袖的說法，也能說服列強接受他爲中國的合法代表來和中國打交道。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和美國一夜之間突然發現彼此已經成爲同盟國。猶記得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曾大膽預言中國的抵抗不出三個月必將瓦解。當時大多數的西方觀察家也不指望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作爲中國的敵人，日本歷來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更了解中國在各方面的弱點。但是它的錯誤是見樹不見林，過分低估中國能夠不惜一切犧牲抵抗外侮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情緒。相反地，當太平洋戰爭危機日益增高時，中國未來的西方盟友卻又只見林而不見樹，過分高估了中國的作戰能力，對中國眾多弱點不夠了解，甚或誤解，以致對中國產生出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蔣介石一生事業中，最具諷刺意味的恐怕是，他過於成功地扮演了中國最高領袖的角色，使許多當代的外國人誤以爲真，因而忽略了他權力基礎的薄弱性。所

以當他無法兌現他的各種承諾時，外國人便當然認爲他是缺乏兌現的意願。換言之，許多外國人不了解蔣介石是沒有足夠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去實現諾言，因而把責任歸諸他的人格缺點，比如缺乏智慧、誠意、遠見、愛國心，甚至普通常識。外國人不免會問，若非如此，蔣介石何以能對明明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建議置之不顧？以此觀之，蔣介石成功地掩飾了自己權力不足的真相，再加上外國人又喜歡先入爲主的用西方政治制度化觀念來分析中國事務，兩者結合，引致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而這種結合不但無謂地增加了中美盟友間的摩擦，也導致了不少後世學者的誤判。本書的目的是希望經由以上的觀點，幫助我們更深入的體會，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軍事合作關係變得如此錯綜複雜的原因所在。

# 第一章
# 太平洋戰爭爆發及中國的反應

## 壹、日本攻擊珍珠港消息傳到中國時

長期以來，討論戰時中美同盟關係的著作，對美日開戰初期的情形大都著墨不多。原因是，許多作者都認爲真正重要的軍事合作關係要到稍晚才開始。其實這個看法並不正確，因爲同盟關係在最初幾周裡已爲此後的發展定了調，並且隨著時間轉移變得積重難返。因此，對開戰最初期的了解，將大有助於我們掌握後期關係的性質和所遭遇困難的複雜性。

本章的重點是討論太平洋戰爭初期的五個問題。一、蔣介石本人對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反應，和中國政府對參加同盟國的考量；二、中國對建立同盟關係的努力和盟邦的回應；三、中國對盟邦歧視待遇的不滿；四、中英交惡的導因和它對中美關係的影響；五、中美早期關係的兩大要素：軍事援助和經濟援助。透過這些討論，本章希望能夠讓讀者在此後的各章中，把中美軍事合作關係的複雜性了解得更爲透徹。

### 一、蔣介石個人的反應

蔣介石聽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他的態度如何？

在一般情況下，這個問題本無太多歷史意義。但由於西方著作多年來流傳著一種說法，因此本章仍須對此問題略加著墨。半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都認爲，珍珠港事件發生必然使蔣介石大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一旦某些美國政府官員也接受了這個看法，他們便能更容易地把此後發生

的許多歷史事件，作出言之成理的解釋，也同時在心理上建立了一種對中國政府反感和懷疑的先入爲主印象。

美國人關心其他國家和人民如何對待他們的災難，這本是極爲自然的現象。因爲他們可以從這些國家的反應中分辨出敵人和朋友。在美國新結交的盟邦之中，蘇聯領袖史達林(Joseph V. Stalin)個人當時的態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坦然承認，珍珠港事件讓他舒了一口氣，甚至感到欣慰[1]。

有趣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似乎並不在意史達林或邱吉爾的反應，反而對中國的態度異常關注。早在日本尚未發動攻擊之前，他已經主動地向胡適大使提出警告，萬一美日戰爭爆發時，他希望中國領袖及人民群眾能夠自我克制，避免公然慶祝[2]。

但是本書作者在仔細閱讀過中國公私各方面資料之後，並不能找到任何跡象足以支持羅斯福的擔憂。這些資料顯示的是，中國領袖們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日之間會突然爆發戰爭。相反地，他們真正不斷期盼的是蘇聯和日本之間能夠發生大戰。事實上，中國領袖們並不曾仔細推想過，美日戰爭對中國前途到底會有何種影響。因此，羅斯福的這種顧慮，與其說是基於對中國的了解，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偏見。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幾個月中，蔣介石其實已經逐漸理解到，美國法律和政治局勢對羅斯福的外交政策限制重重，因此他並沒有想說服羅斯福對日作戰的念頭。相反地，他甚至建議羅斯福應該盡量避免和日本發生武裝衝突。即使在珍珠港事變前不久，當美日關係已經緊繃時，蔣介石在1941年10月31日依然告訴馬格魯德將軍(John Magruder, 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說：「予之抗戰政策，希望英美運用政治、經濟壓力以制裁日本，並無英美對日作戰之願望。余迄今仍堅持此項主張，並得民眾之擁護。實際言之，中美在戰時之合作，含有臨時性質。其比較重要者，則爲兩國在戰後二、三十年之長期合作。余願美國助我發展中國海、空兩軍並建築海軍根據地。蓋兩國在防禦上之合作，足以保證太平洋之安全。」[3]

換言之，在蔣介石心目中，他此時之所謂「戰勝」日本的定義，並不是妄想在軍事上「擊潰」日本，而是使日本在華侵略行動因無法進展而被迫終止。事實上，「擊潰」日本此時尚未成爲蔣介石的作戰目標。因此，中國當時最務實的願望是：在中日

1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7), vol. 3, p. 606.

2 胡適致蔣介石電，1941年12月8日。《蔣總統事略稿》，1941年12月8日。

3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0月31日。《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此後簡稱《戰時外交》)(一)，頁474-478。

戰爭結束後，能夠獲得美國對戰後中國重建工作的支持。

12月1日，當蔣介石得知日本預備和美國重啓談判時，他的判斷是日本根本沒有膽量向美國開啓戰端。既然如此，他認爲美國在重要談判中大可以採取堅定態度。一直到12月7日，蔣介石仍舊以爲美日之間至少在當前可以避免一戰[4]。

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凌晨6時偷襲珍珠港，重慶得到消息是第二天清晨1時[5]。蔣介石當時正在郊外的黃山官邸過夜。等到凌晨4時，董顯光才來電話報告開戰消息。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他起床後一如往常地進行晨禱，隨即返回重慶市區，迎接一個嶄新的局勢[6]。

按照蔣介石的敘述，他對珍珠港事變的第一個反應是後悔，覺得自己早先不應該過度敦促美國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以致日本喪失談判耐心而決心展開攻擊。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從日本攻擊西方國家的速度之快和執行之徹底等跡象得到一個新的體會。他推測日本必定是早有預謀，而且經過長期準備，絕不會因爲美國在談判桌上犧牲中國利益而改變其主意[7]。

對於羅斯福經由胡適傳來的警告，蔣介石則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記中作出反應。根據他的記載，他既感到不快而且大爲不解，何以像羅斯福如此傑出的政治家，還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對華人的優越感，居然以爲中國人對美國的被突襲會幸災樂禍。在蔣介石看來，也正是出於這種白人優越感，才會使英美兩國對於日本的攻擊都疏於防範，以致一敗塗地[8]。

事實上，羅斯福傳遞給蔣介石的口信，的確相當符合當時一般美國人的看法。他們認定中國不想靠自己的努力，而只想搭美國的便車去戰勝日本。這條思路爲某些美國人提供了一個既能觀察又能解釋中國行爲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又進而影響到他們所制訂的對華政策，和與中國政府交往的態度及策略。對於持這種心態的美國領袖而言，他們在同盟關係一開始時，就已經把自己帶上一條閉門造車的道路。這個現象在本書後面許多地方將會再加以討論。

## 二、中國在宣戰前的考量

12月8日，中國領袖們馬上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是它究竟應該只對日本單獨宣戰，

4　蔣介石日記(Hoover Institution)，1941年12月1、7日。
5　王世杰日記，1941年12月8日。
6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8日。
7　同上，1941年12月8-13日。
8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4日。

還是對所有軸心國家(日本、德國、義大利)同時宣戰。對中國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選擇，因爲領袖們的意見頗爲分歧。有人強烈主張立即向三國宣戰，也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小心觀察西方國家的動向，再作決定。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

其實早在1940年底，蔣介石對國際局勢變化的各種可能性和中國的應對之策，就已經在心中演練了許多次。在他看來，中國最壞的出路是與日本媾和，因此完全無需予以考慮。除此之外，即使在西方與軸心國之間發生戰事時，中國也無必要倉促作出選邊決定。相反地，中國應該先觀察局勢的變化再作定奪。具體言之，假如西方國家很快就喪失了南亞及東南亞等地區的話，那麼中國就應該置身戰事之外。因爲如果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通道被切斷，中國就無法從西方陣營獲得有意義的援助。更何況，中國如果加入西方陣營，可能還會開罪蘇聯。而當時蘇聯仍然是中國政府心目中最有價值的盟邦，蔣介石也最希望日蘇之間能夠開戰。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中國貿然去參加西方陣營的話，它只會增加蘇聯和日本聯手欺壓中國的風險。而這正是中國最應該避免的局面。反之，如果西方國家在開戰之初能夠在南亞和東南亞站穩腳步，那麼中國與西方國家結盟就可以獲得實質援助。因此蔣介石提醒自己，在蘇聯表態之前，中國務必置身西方與軸心國的戰爭之外。等到情況明朗之後，中國再決定是否加入西方同盟[9]。由此可見，蔣介石對於國際局勢曾經作過相當理性的思考。

但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卻似乎完全忘記了自己先前所作過的分析。可能是珍珠港事件過於戲劇化，以致打亂了他的盤算；也可能是日本對南亞和東南亞的攻勢凌厲和進展神速，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使他沒有時間從容思考。蔣介石和所有其他人一樣，在震驚之餘，只能在巨大壓力下立刻採取行動。其結果是，蔣介石排除了部屬們的建議，改而主張立即對所有軸心國宣戰。唯一沒改變的是，他依舊最關心蘇聯是否會對日本宣戰，因爲在他看來，此時只有蘇聯參戰才能真正傷害到日本，也最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10]。

蔣介石態度的大轉彎，無疑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嚴重影響。因爲與此同時，羅斯福總統正在華盛頓向宋子文保證，他已經接到蘇聯的承諾，一旦後者軍隊開抵預定位置時，便會立即對日宣戰。副國務卿威爾斯(Benjamin Sumner Welles)緊接著也告訴宋子文，總統希望中國能夠立即對軸心國宣戰，因爲蘇聯正在整頓軍隊以便馬上

9 蔣介石日記，1940年10月31日。

10 Chiang Kai-shek(hereafter CKS) cable to Soong, December 8, 1941, in T.V.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5.

對日作戰[11]。後來的發展顯示，美國領袖們向中國政府所傳達的此項信息，應該是虛構多於事實。

雖然中國人無法知道美國人對宋子文所說的話是否屬實，但是蔣介石還是在當天下午便通知英國、美國和蘇聯大使，申明中國決定同時向三個軸心國宣戰，並催促它們的政府也立即採取同樣行動。他同時還要求各國領袖莊嚴宣誓，絕不與敵人單獨媾和[12]。次日，蔣介石又召集中國領袖會商，決定即刻發布向軸心國宣戰的文告[13]。該文告隨後在當晚7時向國外發出。中國政府的這些動作都表明，它此時對於美國傳達的信息已經照單全收，認爲蘇聯的參戰必將在短期內實現。

事實上，在中日兩國四年多「戰而不宣」的日子裡，中國領袖一直希望能夠爭取到的盟邦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爲他們認爲，只有蘇日開戰才能即刻威脅到中國境內的日軍。因此自從1937年以來，蔣介石幾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滿懷興奮地預言蘇日戰爭即將爆發。所以等到美日戰爭果真爆發時，中國領袖們其實並不感到特別興奮。縱使如此，他們依然決定把國家命運和西方國家捆綁在一起。

蔣介石在12月9日的日記中，爲自己的行爲動機提供了一些饒有趣味的信息。他寫道：「本日決定對倭、對德意同時宣戰，其用意乃在放棄其無關緊要與(無關)侵略暴行之德意，而獲得利害密切之英俄也。且得對俄、對英、對美皆有發言之地位。此種大事必須在大者遠者著想，決不可留有餘地後步，或爲投機取巧纖微之心也。且此次世界戰局必爲一整個之總解決，斷不容分別各個之媾和，否則雖成亦敗矣。」[14]

這段話至少透露了兩個關於蔣介石當時心情的信息。一是對於中國而言，英俄兩國至少和美國同樣重要。二是蔣介石此時已經在努力防止任何同盟國去和日本單獨媾和。我們同時應該記得，當時美國由於珍珠港損失慘重，全國已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傾向，唯恐日本會從阿拉斯加經陸路進攻美國本土。正因爲它感到自顧不暇，所以特別急著想把中國拉進同盟國陣營。日本陸軍當時的最大戰場在亞洲，尤其是中國；日本陸軍當時有51個師(170萬士兵)，其中28個師在中國東部戰場，13個師在中國東北和朝

11 Entries of December 9, 10, 1941, *Morgenthau Diary (China)*, 2 vols.(United States 8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4), p. 533. See also: English transcript of meeting between CKS and Currie, August 4, 1942, pp. 3-4, in Lauchlin B. Currie Personal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Box 4.

12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1年12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42。蔣介石於1941年12月8日對美國、英國及蘇聯大使的談話記錄，見T.V. Soong Personal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Box 37.14.

13 王世杰日記，1941年12月9日。

14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9日。

鮮半島[15]。有鑒於此，任何以爲中國領袖在1941年12月想搭美國順風車、妄圖不戰而獲得勝利的想法，都是誤判當時的世界大局，也不熟悉中國官方的思路所致。以當時情況而言，美國政府想拉攏中國成爲盟邦的緊迫感，絕不會亞於中國政府想參加盟邦的意願。

## 三、中國無法說服蘇聯參戰

即便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後，由於蔣介石依然熱切希望蘇聯能夠盡快參戰，所以他在12月8日趕緊致電史達林正式要求蘇聯參戰，同時召見蘇聯大使和崔可夫將軍(Chuikov, Vassily I.)，當面強調這個要求[16]。然而史達林卻回電(12月12日)婉拒蔣介石的請求。史達林解釋蘇聯此時最急迫的任務乃是攻擊德軍，但是他也作出承諾，如果日本單方破壞蘇日中立協定的話，蘇聯必定會對日作戰。因此他懇請中國此時不要對蘇聯施加壓力[17]。

但蔣介石仍然擔心，如果蘇聯堅持一定要等到打敗德國後才肯和日本開戰的話，那它可能永遠不會向日本進攻[18]。爲此他再度致電史達林，指出蘇聯如不採取行動必將導致嚴重後果。蔣介石指出，在珍珠港事變後，英美兩國軍隊都已被迫採取守勢，只有蘇聯軍隊有能力在太平洋地區採取攻勢。而且也只有蘇聯才能扭轉大局，和鞏固蘇聯本身在遠東的安全[19]。但是到了1942年1月中旬，蔣介石終於承認蘇聯不會攻擊日本，而且中國也無法改變蘇聯的意志[20]。在此後數年中，儘管蔣介石仍然不斷預測蘇日戰爭即將爆發，但蘇聯一直要等到1945年8月才對日宣戰。

以上這段史實的敘述，指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根據史學界後來的了解，蘇聯當時正處在風雨飄搖的局面，根本無力對日作戰。蘇聯政府本身當然非常清楚自身的弱點，但是它一定要蒙蔽所有其他國家，包括日本和中國在內。至於美國政府可能也完全了解這一實況，但仍然選擇把錯誤的信息傳遞給中國。而蔣介石以中國的利益爲出發點，卻一廂情願地指望蘇聯對日宣戰。這是蔣介石在對國際事務認知上的一個嚴重

15 Norman Polmar & Thomas B. Allen, *Wor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 428-435.

16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45-48。

17 Stalin message to CKS, December 12, 1941,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arshall Foundation Archives(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MFA). 史達林致蔣介石電，1941年12月12日，《戰時外交》(三)，頁57。

18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2日。

19 蔣介石致史達林電，1941年12月17日，《戰時外交》(三)，頁68-69。

20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7日。

盲點，並且產生了嚴重的政策後果。一旦美國政府看出這個盲點並決定加以利用時，蔣介石自然就掉入圈套之中。

## 貳、蔣介石早期對於建立同盟關係的樂觀和努力

珍珠港事變立即的後果，是讓蔣介石有了信心，認爲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國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脅警告，證明果然是正確的。因此他也認爲，在新的同盟架構內，中國當然也應該獲得更多的發言權才對。就他看來，西方海軍的慘重損失，正充分暴露出它們因爲忽視中國的警告而自食惡果。因此他益發堅持，盟國應該加緊建立在遠東的防務部署[21]。至於中國能夠對同盟國作出的貢獻，他表示可以包括兩大項：1. 加強盟邦組織聯繫；2. 提供中國軍隊參戰。

根據蔣介石的看法，同盟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盟邦機制，協調共同作戰。但他馬上就發現，盟邦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它們的防務計畫告知中國。爲了改變這一個現象，蔣介石提議同盟國應該推舉美國爲首，組織一個五國軍事合作機構（美國、英國、蘇聯、中國、荷蘭）[22]。12月10日，當中國政府接到情報，日本不久將同時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泰國和婆羅洲時，蔣介石趕緊把情報轉送給英美兩國，並主動提議中國軍隊開赴這些地區去和英軍並肩作戰[23]。

12月11日，蔣介石再度警告英國，日本隨時可能攻擊香港和新加坡，並建議中英兩國應盡速擬訂聯合防務計畫。然而蔣介石不久即發現，原來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經安排了共同防務，但對中國卻秘而不宣[24]。這個發現使得蔣介石首次在日記中表露了他對盟邦的不滿。他寫道：「是其對我各種輕蔑之行爲，視中國爲無足輕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經過事實，更無足爲嘆也。國際間本是利害爲主，決無爲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爲怪或爲愧，則癡矣。」[25] 這些話對於同盟國的前景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好的兆頭。

除了建議盟邦應該互派軍事代表之外（12月15日），蔣介石還提議盟邦應盡早簽訂

---

21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0日。

22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45-48。

23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mmary of messages from the American Mission in China, dated December 10, 1941, submitted by General Magruder. Xerox File 2559, MFA.

24　蔣介石與英國大使卡爾（Archibald Clark Kerr）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53-56。

25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1日。

一個同盟條約，以處理相互間複雜的政治及軍事關係[26]。但美國和其他盟邦對此建議毫無興趣。

其次，中國主動表示願意出兵協同作戰一事也得不到盟邦的反應。珍珠港事件發生之日(12月8日)，中國已經提出願意出兵協助防守香港、緬甸和越南等地[27]。不過由於蔣介石對英國不信任，所以他從一開始就表明立場，主張中英兩國的軍隊必須分開使用，以劃分明確職責。蔣介石甚至表示，願意接受英國指定中國軍隊的責任區。當英國大使受到感動而爲英國在珍珠港事變前拒絕中國協防一事道歉時，蔣介石則寬宏大量地加以安慰：「請勿客氣，貴國事即我國事，我等皆在同一陣營中。」[28]爲了表示中國參戰的誠意，蔣介石當即派遣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空軍的一隊飛機(18架)赴緬甸作戰，並接受英國指揮[29]。後來當這一隊飛機受到重創後，他接著又派第二隊(18架)飛機前往，而這18架飛機是陳納德僅有的最後一隊飛機[30]。就這樣，蔣介石幾乎把陳納德手下所有的空軍，悉數送到緬甸前線支援英軍防務[31]。

但是中國提供陸軍參戰的建議，卻遭到英國堅拒。因此12月17日蔣介石已開始抱怨，英國似乎無意防守緬甸[32]。

爲了加緊盟邦合作的步調，蔣介石決定特意邀請英美軍事領袖到重慶會商。英國由駐印軍司令衛佛爾(Archibald P. Wavell)上將，而美國則由勃蘭德(George H. Brett)空軍少將代表出席。不幸的是，會議從一開始就氣氛緊張。衛佛爾的言行很快就讓中國政府相信，他出席會議的目的只不過是要求中國把更多的陳納德空軍飛機送往緬甸作戰而已。對於中國政府表示願意提供兩個軍的陸軍去協防緬北一事，衛佛爾一口加以拒絕[33]。

更令中國人氣憤不已的是衛佛爾毫不掩飾的自大態度。因爲他竟然要求中國把當時存放在緬甸境內倉庫中的美國租借法案物資，無條件悉數提供給英國使用。他的狂

---

26 同上，1941年12月15、17、20、21日。

27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8日。

28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及英國大使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61-65。

29 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戴尼斯致蔣介石函，及蔣介石與馬格魯德及英國大使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61-65。

30 《革命文獻拓影》(國史館)，第25冊，頁33。

31 英國大使卡爾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107。

32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7日。

33 有關馬格魯德對衛佛爾行為的批評，見Memorandum for Chief of Staff probably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Chief of staff's Office, sometime in early January 1942. No author and no date indicated.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妄連當時在場的馬格魯德將軍也看不下去，不得不提醒衛佛爾說，每一項英國的要求都必須事先徵得中國同意。但是衛佛爾依然只向美國提出申請，全然不理會中國是否同意。蔣介石對此舉的憤怒，連馬格魯德在一旁都看得清清楚楚[34]。

其實美國代表並不能完全體察中國人憤怒的程度，更無法想像這種憤怒不久之後將會破壞到中美關係。關於英國人的行爲，蔣介石在12月23日的日記中寫道：「英人之貪詐自私，毫無協同作戰之誠意，對我國之輕視侮蔑尤其可痛。余不得已，乃正色厲聲向之責問，彼等方轉變態度，勉強決議休會。從此更可知英人之陰狠奸猾，不禁爲亞洲前途危也。」[35] 兩日之後，他又在日記中發洩對英國人的憤恨：「英人之盜行與自私，實駕於德倭而上之，其蔑視中國，賤視有色人種更甚。」[36]

蔣介石對英國人的反感也波及美國代表。蔣介石最難以理解的是勃蘭德將軍對衛佛爾的阿諛奉承。用蔣介石自己的比喻說，勃蘭德在衛佛爾面前，服貼得就像是雞見了狼一樣[37]。

總之，重慶軍事會議的結果與蔣介石的初衷大相徑庭。他本來興沖沖地想促進盟邦合作，結果被澆了一盆冷水。這不但讓他相信西方盟邦對中國戰區根本缺乏興趣，而英國軍人的倨傲更是令人難以忍受。會議除了讓蔣介石先嚐到了同盟國軍人給予他無盡的屈辱之外，更讓他擔心將來還會給中國帶來更多的災難。在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的總評語是：「受盡英美代表對我之輕侮。」[38] 在本書後面各章中，我們將會發現，這不久就成爲蔣介石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對自己感情狀態的主要表述，而且也成了此後中美同盟關係的主調。

## 叁、同盟關係的第一株毒草：對中國的排斥

在同盟國領袖之中，蔣介石對羅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國對中國的歧視和排擠而受到干擾。

---

34 Memorandum for Chief of Staff probably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Chief of staff's Office, sometime in early January 1942. No author and no date indicated.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35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23日。

36 同上，1941年12月25日。

37 同上，1941年12月22日。

38 同上，1941年12月27日。

## 一、中國對盟邦歧視的不滿

其實，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蔣介石已對西方國家把中國摒除於防務計畫之外的做法感到不滿。歐洲戰爭爆發以後，中國領袖便逐漸把對日抗戰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開始對全球性軍事合作提出各種主張。他們同時也認爲，中國當然有權參與制定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大戰略。但是當蔣介石天真地向英法兩國提議加緊合作卻被對方冷然拒絕時，他就感到極端羞辱[39]。中國最早以官方文件形式表露出這種情緒是在1941年4月。當時蔣介石得知英、美、荷蘭等國剛在菲律賓舉行過會商，而中國並未被邀請出席。他隨即指示宋子文去探聽會議內容，並向美國表達中國對於未被邀請參加一事感到失望[40]。

稍後，當美國首度向中國表示它願意派遣一個軍事代表團來華時，蔣介石的反應是，與其派美國軍事代表團來華，不如邀請中國參加西方國家即將在新加坡舉行的防務會議。他甚至建議美國的軍事代表團大可採用小規模而秘密的方式，以低姿態在中國進行活動，借此幫助美國避免和日本之間無謂的摩擦。但他卻希望中國能夠接到邀請去參加國際軍事合作活動，爭取獲得實質上的效果[41]。

事實上，中國對於受到西方國家排擠而產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就已經被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看出，而拉氏正是羅斯福總統推薦給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在1941年8月2日寫信給白宮助理居里(Lauchlin B. Currie)時指出，當時很多中國人早已開始擔憂，他們的國家不會得到西方國家平等和公正的對待。而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僞政權所極力渲染的主題之一，因爲他們強調西方國家只不過把中國當作傀儡來耍弄，絕不會以朋友之道對待中國。因此，中國將來在和平談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爾賽和會時同樣的悲慘命運，難逃被出賣犧牲的下場。拉氏提出警告，如果西方不立即停止歧視行爲的話，中國人民對西方在歷史上虧待中國的記憶，必將會被重新喚起[42]。

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appeal)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爲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entitlement)。中國如果

39 「無限之羞恥」，蔣介石日記，1940年10月31日。
40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1年4月14日，《戰時外交》(一)，頁129。
4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1年7月27日，《戰時外交》(一)，頁461-462。
42 Lattimore cable to Currie from Chungking, August 2, 1941,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膽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種族歧視」的標誌立刻變得無所遁形。

馬格魯德將軍是在珍珠港事件後，第一個看出中國人這種情緒升高的美國軍人。他警告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 1941年12月12日)，蔣介石正在懷疑盟國對他進行蓄意欺騙[43]。蔣介石本人此時確實被西方人士所表現出來的種族優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劇。在他看來，西方在戰爭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敗，正是因爲它們太不把日本人(亞洲人)放在眼裡了。他也感歎，儘管美國過去曾經多次反對日本的「南進」或「北進」政策，但卻從不曾反對過日本的「西進」(侵略中國)政策[44]。

等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約定在華盛頓召開代號爲ARCADIA的會商時(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盟邦排除中國的跡象就變得明目張膽了。因爲在這個會議裡，英美兩國不但制訂了有關全球作戰的大方針，而且成立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機構，一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CCS)，二是軍火分配局(Munition Assignments Board, MAD)。這兩個機構都將對中國的戰局產生重大影響，卻都不允許中國派代表參加，也不向中國政府通報會議討論的事項。尤有甚者，這個會議還逕自宣布成立中緬印戰區(China-Burma-India Theater, CBI)及中國戰區(China Theater)，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國商量[45]。

儘管蔣介石內心對此感到強烈不滿，但是爲了維護同盟國的團結形象，他還是對英美的決定加以隱忍，甚至接受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稱呼[46]。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這些感受似乎完全沒有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許多年後，當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家提到此時中國的態度時，居然還是以爲蔣介石是要等到1942年4月19日，才首度動念爭取加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47]。這樣的歷史認知，完全忽視了蔣介石在此數月之前早已不斷表達過的強烈不滿情緒。而這種認知上的誤差，也是使中美同盟關係產生不斷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蔣介石已經爲英美的歧視而憤恨不已。另一方面，英美領袖們(特別是軍方領袖們)對蔣介石的存在卻漫不經心，視若無睹，或是表現出

43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mmary of messages from the American Mission China, dated December 10, 1941, submitted by General Magruder. Xerox File 2559, MFA.

44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4日。

45 英美兩國政府最初對中緬印戰區的範圍和職掌，所持觀點既模糊又互相矛盾，詳情可參閱：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62.

46 CKS cable to Soong, December 20, 1941,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5.

4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58.

來的傲慢變本加厲。難怪在此後的歲月裡，同盟關係會摩擦不斷持續惡化了。

## 二、中國擔心被邊緣化

### (一)全球戰略的優先次序問題是：亞洲抑或歐洲優先？

同盟體制建立之後，首要課題便是擬訂全球戰略。由於當時世界有兩大戰場，分別在歐洲和亞洲，因此選擇的可能性不外有三：先歐後亞、先亞後歐，或歐亞並重。其實蔣介石在一年多之前就已經對這個課題進行了一番純理論的探討。早在1940年10月1日，當他估算美國參加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時，他同時也開始思考美國究竟應該採取何種全球性戰略：是先打敗日本然後再打擊德國，或是先打敗德國然後再解決日本？以中國國家利益爲出發點，他認爲美國應該先解決日本，除去在太平洋方面的顧慮，然後全力在歐洲作戰[48]。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國領袖和民間輿論一致鼓吹先亞後歐的戰略。蔣介石不但是這個戰略思想最積極的推動者，也提出了幾個頗具說服力的理由：一、日本已是當前對美國本土(Alaska, 阿拉斯加)安全威脅最大的敵人，美國只有在除去這個威脅之後，才能充分發揮它作爲「世界民主國家軍火庫」的功能，支援盟國在歐洲作戰。二、德國的優勢在陸軍，而日本的優勢在海軍。美國的海軍勢力明顯超過日本，然而陸軍則未必超過德國。因此美國應該先發揮自己優勢的海軍，摧毀日本較弱的海軍，再來對付德國陸軍。三、鑒於日本已經大量搜刮了東南亞的戰略資源，充實其後備作戰能力，如果不趕緊將之消滅，那麼日本便可能在兩年之內變成另外一個類似德國一般強大的敵國。反之，如果先擊敗日本，使之不能變成第二個德國，那麼同盟國便能集中精力去打敗德國[49]。

當然，純從中國自身角度來看，由於它已經承受了四年戰爭的折磨，因此急需解決的是其生存問題[50]。先亞後歐的戰略，則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之一。何況作爲中國的領袖，蔣介石責無旁貸地應該以中國國家利益爲優先考慮。不過蔣介石也了解到，英美領袖想要採取的是先打敗德國的戰略。他知道英國人(特別是邱吉爾)早已不斷把這個戰略觀念灌進美國人耳朵裡，使美國人無法招架[51]。因此，雖然蔣介石得到過羅斯福總統的口頭保證，美國將採取歐亞並重的戰略，但他了解這種保證並無意

48 蔣介石日記，1940年10月1日。
49 蔣介石致居里轉交羅斯福電，1942年7月30日，《戰時外交》(一)，頁673-676。
50 王世杰日記，1942年1月21日。
51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0日。

義，因爲英美在ARCADIA會議上，已經默認了歐洲優先的戰略，並同時貶低了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在此後6-7個月中，儘管英美討論有關全球戰略時對中國保持秘密，但是蔣介石還是有所揣測，他認爲英美之間對於全球戰略必然已經達成秘密協議，不僅忽略中國的利益，甚至可能把中國當作犧牲品。觀諸此時羅斯福對中國政府說的是一套，而和英國政府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則蔣介石的疑懼還真是頗有道理。

## (二)中國在世界局勢中的份量

除了全球戰略之外，同盟國對中國本身的態度也讓蔣介石感到憂慮。歸根結柢，中國之所以單獨抗日四年多，其最大原因就是中國拒絕在「日中合作」的幌子下淪爲日本附庸。如果盟國不能給中國更合理的待遇，那麼無論同盟國官方宣傳如何動聽，民主國家之爲盟邦和日本之爲敵國，其間的區別也就非常模糊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蔣介石愈來愈不滿意盟國。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印度、緬甸及中南半島等地人民的民族主義，本質上並無基本差別，但是中國人畢竟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國家，因此，儘管他們的國家既缺乏統一又缺乏組織能力和辦事效率，但他們仍然渴望得到盟邦平等的對待。

如所周知，中國加入同盟國最早得到的好處，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作爲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簽字國之一(1942年1月)，中國一躍而成爲世界四強之一。無論用何種尺度來衡量，這個事實都是中國自1840年代以來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學者卻把這一事實，解釋成是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恩賜。原因是只有羅斯福堅持承認中國的四強地位，而英國和蘇聯兩國都對之視若無睹，覺得他是多此一舉。

有趣的是，蔣介石當時也頗爲同意這種看法，並且經常提醒自己，中國的新國際地位遠遠超過了它真實的國力。比如說，在1942年1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我國簽字於四國宣言，羅斯福對(宋)子文特別表示稱，『歡迎中國爲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惶而已。」[52] 兩天以後，他又寫道：「反侵略戰線各國簽訂共同宣言，我國始列爲世界四強之一，甚恐名不副實，故更戒慎不勝也。」[53] 在往後的日子裡，蔣介石在私人記錄中經常同樣提到，中國的國力並不足以與列強並列。他如此坦白承認中國的弱點，也說明了爲什麼他後來一直對美國總統感激不已。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即使他與美國軍方不斷發生摩擦，但依然保持對羅斯福的好感[54]。蔣介石這種對

52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日。

53　同上，1942年1月4日。

54　既有趣而又奇怪的是，史迪威再三抱怨蔣介石對美國人的幫助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感

美國政府不同部門的不同感情，一直是他處理中美關係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了解戰時中美關係歷史的關鍵所在。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羅斯福的態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發自內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義」（借用馬歇爾的話）？是他純粹想要幫助中國，或是出自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精準盤算？我們甚至可以問：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假如西方國家沒有把中國列爲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個主要盟國的話，那麼它們將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產生何種印象？

其實，此時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稱不與西方合作，而在東南亞也有相當一部分當地人士熱烈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這些發展都讓中國成爲整個亞洲地區唯一旗幟鮮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國家。當然，更現實的考慮是中國已經拖住了超過50萬以上的日軍。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羅斯福是否在實行恩賜，而是西方國家在它們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還能夠冒險地把中國排拒在主要盟國之外？

退一步說，排除一切溫情主義，而從一個純粹外交權謀問題來考量，一個擁有強國地位的中國，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如果同盟國結構僅限於三角關係（即英、美、蘇聯），那麼美國就必須擔心英蘇在某些情況下聯手對付美國的可能性（如後來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反之，如果中國成爲第四個成員，而中國的外交又表明了一定會唯美國馬首是瞻（如後來在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的話，就會加強美國本身在同盟中的外交份量。換言之，美國等於在口袋裡裝有兩票。總結的說，讓中國成爲四強之一，也可以視爲美國同盟策略的高招。既可暗地牽制英蘇兩國，還可以無休止地向中國示惠，同時收取實質回報。

我們可以完全相信，羅斯福總統在戰爭初期，的確是出自誠心誠意地想以平等精神對待中國這個盟友。證據之一是，開戰還不滿兩周，他就有意邀請3-4位中國將領出席盟邦最高軍事會議[55]。羅斯福發出邀請函的時機顯示，他當時的動機可能是要邀請中國代表和英美代表共同出席最高軍事會議。但不幸的是，他很可能忽略了事先和自己軍部領袖們進行溝通。不久之後，他因爲得不到馬歇爾將軍和軍部的支持，只好悶聲不響地放棄這項努力。

此一事件也揭示出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同時也說明爲什麼在以後的歲月裡，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總是看起來搖擺不定。原因就是每當美國總統能夠把個人注意力放在對華事務上時，美國政府就會以較細膩的手法處理

（續）

謝。事實正好相反。蔣介石在致羅斯福的許多電報中，充滿感謝的字眼。

55 《蔣總統事略稿》（1958），1941年12月22日。

中國人的尊嚴和民族感情問題，對中國人所表現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行爲也顯得比較寬容，而軍部領袖則對中國人的感受無動於衷。每當總統無法顧及中國事務時，軍部領袖的行爲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和總統的態度互相矛盾甚至形成對立。換句話說，當美國總統的善意好不容易才得到蔣介石和中國領袖的感激時，美國軍部卻毫不珍惜地予以踐踏。這樣就造成了戰時歷史上一個頗爲諷刺的現象，那就是，美國政府無疑用了極大的努力去塑造中國爲世界強國的形象，但它同時又最無情地暴露了這個形象的空洞和虛假。這種互相矛盾的做法，不免讓中美關係充滿了又苦又甜的感覺，但經常是「苦」遠遠大過於「甜」。

至於羅斯福本人，一旦他察覺無法兌現給中國以平等待遇的承諾時，馬上想採取另外一種迂迴方式來平撫中國。他在1942年1月邀請中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常駐美國就是一個例子[56]。羅斯福邀請函所表達的誠意和重視的口氣，很容易就感動了中國領袖，使他們相信美國政府會重視中國軍事代表，就連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蔣介石趕緊委派代表赴美[57]。然而羅斯福的真正意圖，一部分固然是爲了消除蔣介石對被排擠在英美高層會議之外的不滿情緒，另一部分也是想讓中國存有一絲幻想，以爲它可以繞開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這個單位，另闢蹊徑，直通美國白宮和美國軍部，向兩者表達中國的軍事主張和對援助物資的要求。因此，蔣介石把羅斯福的邀請當作認真大事，幾天之內就任命親信智囊熊式輝爲代表團團長[58]。

## 三、一個粉飾工作的失敗：熊式輝代表團的尷尬

### (一)中國的目的

1942年1月29日，蔣介石對羅斯福邀請函作出回應：他聲稱中國軍事代表應該有權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所有國際會議，包括軍火分配局根據租借法案提供中國物資的決定[59]。3月中旬，蔣介石除了要求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必須把中國當成平等的會員以外，還主張把它改名爲中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60]。顯而易見的是，蔣介石希望他派出的軍事代表團，能夠把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大門撬開，讓中國取得貨真價實

56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9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號檔案夾。

57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0、12、22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號檔案夾。

58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25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國史館)，第21冊，#15073。

59　Soong Memo to FDR, January 29,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4.

60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14、16日。

的平等地位[61]。

## (二)熊式輝艱辛的遭遇

幾乎從一開始，熊式輝的處境就陷入一個無止境的噩夢。登上橫渡大西洋的美國軍用飛機時，機組人員要求中國代表團成員坐到機艙後方，因爲較好的前艙位子是專爲白人所保留。他們在美國南方邁阿密市著陸後，又被塞進火車裡一個狹小的包間，因爲大包廂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達華盛頓之後，他們的屈辱也還沒有結束。當他們去一家猶太人經營的理髮店理髮時，店主拒絕爲他們服務，理由是他們是有色人種[62]。因此，熊式輝在還沒有展開工作之前，就已經被這一連串的侮辱弄得極爲不快。從最寬容的角度來說，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發生，顯示軍部一路上負責接待任務人員的無能。從最糟糕的角度來解釋，它們卻可能非常正確地反映了軍部領袖們完全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的心態，因此下級軍官才膽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爲。

嚴格地說，熊式輝的苦難其實是到了華盛頓之後才真正開始。因爲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 JCS)早在1942年3月16日就已經作出內部決定，美國必須打消中國代表團想參加同盟國會議的念頭[63]。因此，一旦熊式輝完成了他對美國政府各部會的禮貌性拜會，以及聽取它們漫長的例行性簡報之後，很快就被打入政治冷宮，完全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64]。

熊式輝經過了一個月的努力卻完全打不開華盛頓的局面，感到異常沮喪，最後連蔣介石也失去耐心，因此後者不但向熊式輝再三道歉，而且還請求羅斯福總統親自出面干預。1942年4月19日，蔣介石在寫給宋子文的信中又提到他感受來自國內的壓力。因爲不少政府官員們已經在抱怨，美國的對華態度和對英蘇兩國並非同等待遇，而是把中國當成附庸國。蔣介石指示宋子文坦白告訴羅斯福，中國必須在盟邦中維持其獨立平等的形象。因此，熊式輝的代表團團員必須有權參與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和軍火分配局[65]。

在另外一封直接致羅斯福的電文中(1942年4月19日)，蔣介石更明白指出，盟邦關係中最令人無法容忍的就是白種人的種族優越感。他特別引用甘地曾經警告過他的話，甘

61 蔣介石致史汀生(陸軍部長)、諾克斯(海軍部長)，及馬歇爾(參謀總長)電，1942年3月16日，《戰時外交》(三)，頁125。

62 熊式輝，《海桑集》(鉛印本)，第5a冊，頁14-16，18。

63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March 16, 1942. Xerox File 1537, Folder 1, MFA.

64 熊式輝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50。

65 CKS telegram to Soong, April 19, 1942.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5.

地認爲白種人從來不以平等態度對待印度人，並反問蔣介石，中國有什麼理由相信，西方國家會讓中國進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蔣介石不由得擔心，如果在戰爭仍在進行時期，西方國家就已經這般虧待中國，那麼戰後和平會議到來的時候，它們就更不知道會如何虧待中國了[66]。中美同盟關係成立還不到半年，種族歧視問題就已經如此表面化，誠非同盟國之福。它意味著蔣介石原先所採取的隱忍手法毫無效果，逼得他不得不提出正式抗議。而這個感情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也將使此後雙方合作的道路充滿荊棘。

數日後，當宋子文轉達蔣介石的要求時(1942年4月21日)，他發現羅斯福本人的態度倒是相當友善。羅斯福首先同意中國參加軍火分配局的要求，接著又對中國加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事表示歡迎，但聲明他需要先和英國溝通[67]。羅斯福總統的說法是，軍火分配局的功能是把「美國」生產的軍火分配給各個盟邦，因此只需美國答應即可。但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則是一個跨國的協同組織，因此需要諮詢英國政府。中國政府也覺得這個說法合情合理。

但是熊式輝於4月24日拜訪馬歇爾時，馬歇爾對中國的要求一口拒絕。根據馬歇爾的說法，只有「英美兩國」製造軍火，因此只有它們才可以參加軍火分配局的工作[68]。至於中國要求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事，馬歇爾則乾脆拒絕討論[69]。到了5月3日，熊式輝不得不承認，他已經竭盡了一切力量，既然無法獲得美方的善意回應，剩下來的途徑便只有求助於第三者，如拉鐵摩爾、居里、胡適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終均無功而返[70]。

宋子文和熊式輝在4月下旬所遭遇的挫折使他們相信，羅斯福對中國要求平等待遇的態度遠比軍部要緩和得多。即使戰爭才剛剛開始不久，中國政府已經察覺到美國政府有兩套對待中國的作風：白宮的作風以羅斯福、霍普金斯和居里爲代表；陸軍部的作風以史汀生(Henry Stimson)、馬歇爾(以及後來的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爲代表。而多年來主持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院，則正在急速地被擠壓退居二線，但是它的思路(以項貝克Stanley K. Hornbeck為代表)則大致與白宮相近。這個事實也說明了爲什麼宋子文不久之後寧可和白宮打交道，也不願意和軍部打交道的理由。

一旦熊式輝認爲自己在華盛頓無事可做之後，便建議蔣介石盡快把他調回國。蔣

66 CKS telegram to T.V. Soong, April 19, 1942. Verifax File 2377, Item 2522. MFA.

67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4月21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號檔案夾。熊式輝，《海桑集》，第5a冊，頁18。

68 熊式輝，《海桑集》，第5a冊，頁20-21。

69 熊式輝致蔣介石電，1942年4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138。

70 熊式輝，《海桑集》，第5a冊，頁21-22。

介石本人對盟國冷落熊式輝一事也大感不滿，甚至曾經一度考慮召回駐英大使顧維鈞以示抗議。但是由於幕僚們一致認爲這種做法太過極端，所以最終還是沒有付諸實行[71]。

不久之後，熊式輝的困境在華盛頓政治圈裡變成眾所周知的事件。比如說，國務院的項貝克(Hornbeck)爲此憂心忡忡(1942年5月上旬)，並且向聯合情報委員會(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提出警告，認爲陸軍必須重視此舉在政治心理上可能產生的惡果。但是這類意見並未引起軍方任何反應。熊式輝在美國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現得最爲突出，因爲到了此時，羅斯福連他的名字都忘記了。1942年12月6日，蔣夫人從美國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其中有一段話提到熊式輝說，「羅總統憶及有一熊姓中國軍人在美，託其(羅斯福夫人)一詢有無接見必要。妹告爲熊式輝，對日本問題頗有研究。」[72] 這和1942年初羅斯福急不及待地要把熊式輝代表團請到美國作爲對比，實在由不得人不感歎。

## (三)熊式輝使命的後果

熊式輝代表團在當時沒有受到美國軍部重視的這一歷史事件，後來在學術界討論戰時中美關係的論著中，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美國軍方和學者們對於這個現象所提出的解釋大致是：熊式輝不諳英語，因此無法在美國打開局面；戰略問題並非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決定，而是由羅斯福和邱吉爾共同決定，因此熊式輝即使參加了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也不可能發生任何作用。至於就美國軍部而言，則它寧願信賴史迪威在重慶和中國政府打交道，也不願意通過熊式輝在華府進行接觸[73]。

部分美國軍部人士似乎擔心，上列理由還不足以證明熊式輝應該受到冷落，因此感到需要更進一步地矮化和醜化中國代表團，根據美方本身派遣其駐華軍事代表團組成的經驗(見本書頁242)，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把熊式輝描述成一位在中國政壇上無足輕重的小人物，而代表團其他成員也只是一些庸才而已。更有甚者，團員中還有成員被形容爲政治成分不可靠，其根據是他們曾經在日本念過書，所以理所當然是「親日派」。這些說詞的含義甚爲明顯：既然中國政府派出來一些沒有份量的人作駐美代表，那麼美國對他們不予重視也就理所當然了[74]。

---

71 王世杰日記，1942年5月13日。

72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12月6日。

73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George W. Shepherd and Mr. Alger Hiss, November 16, 1942, in Stanley K.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Box 80.

7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16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號檔案夾。

不幸的是，軍部的這些說法若不是軟弱無力的遁詞，就只能顯示其在華武官處的情報工作嚴重失誤。凡是略爲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都應該知道，熊式輝自從日本完成軍事教育(陸軍大學)歸國後，從1920年代開始，便成爲蔣介石左右的重要謀士。太平洋戰爭剛爆發，他就被蔣介石內定爲出席盟邦在華盛頓軍事會議的中方代表[75]。事實上，蔣介石對於代表團的組成給予高度重視，挑選了當時最優秀的軍事人員，無論在專業素養或英語表達能力等方面，均爲一時之選(如王賡、蔡文治)。原因是他對代表團在美的言行寄予極高的期望，爲了維護國家體面，他務求中國代表團團員能和其他盟國在華盛頓的代表們平起平坐，表現出色。

就熊式輝個人而言，他的痛苦經歷很快就讓他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應該盡快把代表團自華盛頓撤回[76]。熊式輝在美國所遭受到的奚落和屈辱，也成爲他回國後對美國政府一直保持高度反感情緒的根源。而在此後幾年中，他的態度也對中美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比如說，他在蔣介石與史迪威鬥爭過程中，堅決支持蔣介石的強硬態度(見第11章)。

熊式輝在美國所遭受的待遇，很快也讓蔣介石體會到，他想要和盟邦精誠合作的願望，只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他開始體會到，西方國家絕對不會因爲有了同盟關係，就改變它們傳統上對中國的輕侮心態。1942年5月23日，蔣介石命令熊式輝通知美國，如果美國再不改善與中國的軍事合作關係的話，則中國無法對遠東軍事失敗擔負任何責任，因爲中國已經竭盡其力而無愧於心了[77]。

## 四、中國對於遭受排擠反感的原因

既然中國國力軟弱乃是不爭的事實，那麼蔣介石爲何還要堅持參與盟國最高軍事會議而自取其辱呢？

通常被提出來最簡單的解釋就是，蔣介石必定是被他個人的虛榮心所驅使；其次就是他缺乏政治現實感，過分膨脹了自己的重要性。既然中國軍事無能，它早就應該滿足於聽從同盟國的使喚才對。但是蔣介石偏偏不識相又不死心，妄想在同盟國中把自己裝扮成爲平等伙伴。依據這個說法，蔣介石的過錯是不自量力，而英美兩國完全有理由把中國排斥在同盟國最高會議之外。這個看法在美國軍方甚爲普遍。

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還有其他因素也應該被列入考慮。首先應該提到的是，

75　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4-5。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4日。
76　蔣介石致熊式輝電，1942年7月10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2冊，#15237。
77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黨史會)，第5卷，頁88，90。

重慶國民政府亟需在盟邦中取得種族平等待遇的證明，以對抗汪僞政權的宣傳攻勢。汪精衛歷來所大事渲染的就是，唯有日本才會通過日華親善提攜的方式，以真正的平等精神對待中國。蔣介石需要盟邦通過實際行動來證明這是謊言。在這一場本就充滿種族色彩的全球大戰之中(**黃種人和白種人之爭**)，蔣介石能夠向日本提出的最有力的反駁和爭取中國民心的方法，就是白種人真正把中國黃種人當成是平等的盟友。不僅當前已經如此，而且將來依然會如此。當然同樣重要的是，蔣介石也需要運用盟邦的平等待遇，來提高他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聲望，向地方實力派軍人和反對抗戰者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只有他才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他個人也最有資格作爲國家領袖。相反地，蔣介石最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就是被別人譏笑爲白種人的小嘍囉。

不過，最重要的解釋還是，蔣介石是一位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者。因此任何時候，只要外國人作出帶著種族主義色彩的歧視行爲時，都會激發他強烈的反響。中國軍力誠然薄弱，經濟誠然落後，政府在多方面也確實表現無能，但是他畢竟仍然領導中國對日本進行了四年多的抗爭。日本軍方在估計了中國一切可以量化的國家作戰力因素(**包括它的資源和辦事效率**)之後，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抵抗最多只能支撐幾個月，然後必定瓦解。以日本軍方在中國長期而勤奮的情報工作來說，他們的量化估計可說是全部正確，唯一的嚴重失誤卻是一個無可量化的感情因素，那就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所以三月亡華最終成爲有具高度諷刺性的豪言壯語。不幸的是，美國軍方人士在處理中美同盟關係時，也似乎表現出類似日本軍方的傾向。

珍珠港事件把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理由是它終於讓中國有機會重新界定它和西方的關係。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宋美齡就成爲把這個新的民族主義浪潮介紹給西方人民最直言無隱的發言人。1942年4月，她向美國人民說道：「我無意細述我們歷年來所受的怨氣，但是我們也必須牢記在心，西方國家在歷史上對我國的殘忍無恥的掠奪和迫害，和許多它們到現在爲止都無法放棄的妄想。它們還在以爲，贏得我們的內心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對準我們的肋骨猛踢一腳。這種愚蠢的想法，一定不可以再繼續下去了，這是爲了我們的利益，也是爲了你們的利益。」[78]

的確，並非所有美國人都對中國人的感情視若無睹。4月底，美國大使高斯(Clarence E. Gauss)就曾經提醒美國國務卿說，中國普遍不滿西方人對待華人所表現

78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 Emergent", in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169, no. 5(May 1942). Advance press proofs released April 24,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9.

出來的種族歧視和差別待遇[79]。但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或許更能表達一群有思想深度的美國人的態度。他在評論宋美齡的文章時寫道：「在討論中國人是否被外國人平等待遇的文章中，這是一篇非常強而有力的文章。我認爲我們不妨廣泛地把它介紹給美國的大眾。因爲不管美國人知道與否，中國人總是相信他們過去一直被我們侮辱，而他們對此必須一吐爲快。」[80] 可惜的是，無論是高斯還是費正清，他們的意見都沒有產生預期的效果。國務院早已被美國總統摒除在制訂對華同盟政策的大門之外，費正清更是人微言輕，對改變軍部的心態絲毫不能發生作用。

幾乎從同盟關係建立開始，蔣介石就懷疑英美兩國進行密謀，想把中國蒙在鼓裡。英美領袖愈是背著中國進行秘密商談，蔣介石就愈是懷疑他們在暗中損害中國利益。不然的話，他們爲什麼總要躲開中國行事呢[81]？蔣介石的立場其實相當直截了當，那就是：中國需要有權參加盟邦的組織，理由是它們的決定將深切影響中國的國家利益[82]。然而在當時的合作架構和安排下，蔣介石對英美決策的了解，甚至比不上日本和德國對西方的了解。理由並不難了解，因爲日本和德國至少還可以通過間諜刺探到一些消息，但中國卻主動認爲不可以對盟邦採取此種行爲(見本書第6章)。蔣介石正是因爲擔心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可能作出有害於中國的決定，所以希望能夠直接和羅斯福溝通，轉而希望羅斯福能夠阻止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作出不利於中國的決議，或至少命令它不得忽視中國的意見。

一般英文的論著雖然都坦白地記載了美國政府對某些中國官員(特別是宋子文)的不滿，指責這些中國官員故意繞過聯邦政府的部會，而直接跟羅斯福打交道，是一種不尊重美國政治體制的行爲；但他們同時卻迴避了另外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英國人從來不需要擔心美國政府會對他們有差別待遇(更不必說種族歧視了)，因爲英國在華盛頓不僅有大批正式官員，全程參與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和軍火分配局的日常工作，而且還有爲數兩三千人的非正式人員，組成龐大的遊說集團，其活動經費可能超過一千萬美元。他們可以穿梭於美國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因此可以緊盯住聯邦各部會

79 Report from Ambassador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25,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80 John K. Fairbank, "Article by Madame Chia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9,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81 《蔣總統事略稿》(國史館)，1942年1月20日。

82 Unsigned memo, probably from T.V. Soong, to President Roosevelt, undated but probably shortly after April 19, 1942. Verifax File 2377, Item 2522. MFA.

的每一個行政作爲[83]。更何況在首相邱吉爾和羅斯福總統之間，不但保持信件來往，還頻繁聚會，這就更能保護英國利益。反觀中國則缺乏同樣能力。中國人所以需要走捷徑去和羅斯福接觸，正是因爲他們沒有足夠的國力，可以維持一個龐大的駐美機構。熊式輝代表團的例子也已經充分說明，即使中國人已經置身華盛頓城內，也無法享有和英國人同等的機會，所以才被迫另闢蹊徑。當然，中國人的這些行爲也產生了嚴重的反效果：他們愈是求助於白宮和總統，也就愈是得罪美國軍部。

## 肆、中英摩擦不斷升級

正常情況下，兩個盟邦之間的事務本應該經由雙方協商來解決，間或也會牽涉到其他盟邦。然而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中英之間卻是協商無門。基本的原因是：在所有盟邦中，英國是中國人民心目中形象最惡劣的國家。一般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敵視並不亞於他們對日本人的敵視。不少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中國人或許更加仇視英國人，因爲他們從19世紀中葉以來就有不斷侵略中國的劣跡。現在只不過是因爲命運播弄，使這兩個國家同時參加一個軍事陣營。如果因此就以爲它們會變成推心置腹的盟友，那就未免過於天真。

珍珠港事件發生才不過一周，蔣介石就已經在日記中寫下他對英國駐重慶大使和武官的深惡痛絕之情。他指責他們貪婪無厭，心胸狹小，行事危害盟邦共同利益[84]。1941年耶誕前夕，他當著英國大使的面，「痛斥」英國對華的傳統政策。此時，他對英國人的反感可說已經接近爆炸點[85]。蔣介石列舉英國在華的卑劣行爲之後，形容英國對待中國如陌路人，對其死活毫不關心。因此，他要求英國即刻改變其心態[86]。事實上，1942年1月初，蔣介石對英國的抱怨，已經強烈到要打算「以牙還牙」去對付英國的程度[87]。在這種情況下，中英同盟剛開始就已經接近死亡了。

中國對英國如此厭惡的原因何在？

從同盟關係一開始，中英關係惡化的原因大致有三：1. 一連串偶發事件使中國相信，一個號稱爲「盟友」的英國，和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者」與「搜刮者」的英

83 宋美齡自華盛頓致蔣介石電，1942年12月無日期。《革命文獻拓影》，第37冊，頁65-66。

84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5日。

85 同上，1941年12月24日。

86 蔣介石與英國大使卡爾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198-203。

87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1月11日。

國，兩者之間並無實質差別。2. 中英兩國在緬甸和東南亞防務上存在嚴重分歧。3. 中國堅信英國一直處心積慮，想要離間中美兩國間的友好關係。

## 一、對英國強盜行徑的憤怒

1941年12月19日，緬甸仰光的英國官員沒收了一艘滿載美國援華物資的船隻（Tulsa, 托爾賽號輪船）。這次事件在英文著作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理，有的一筆帶過，有的一字不提。總的來說，它們把它看成是一個小誤會、小插曲，並不影響同盟大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學家在討論該事件時，宣稱蔣介石在1941年12月26日已經以友善態度解決了該事件[88]。

這種說法不但完全違反史實，而且也表現出美國軍方自己的一種心態，認爲它只不過是小事一樁，如果中國人太過認真追究，就是不識大體。這種心態讓他們忽略了這個事件對中國領袖們造成的嚴重心理打擊，和在政治上產生的長遠後果。因爲Tulsa事件迫使中國領袖們不得不深刻檢討，中國和英國關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他們能夠指望從英國方面得到何種盟邦待遇？彼此合作的基礎何在？因此，這個事件值得我們重新予以探討，以便深入了解此時中英關係的實際狀況。

準確地說，Tulsa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一連串類似事件中的第一個案例[89]。這些船隻上所載運的貨品，都是當時中國長期以來最盼望得到的美援軍火[90]。它們也是同盟關係建立以後，中國陸軍從美國方面收到的第一批實質性援助。因此無論在象徵意義還是實質意義上，對中國都非常重要。

英國第一次沒收船隻的行爲發生在1941年12月18-19日之間，但是由於仰光和重慶間的通訊不通暢，因此中國政府直到12月25日才收到初步報告[91]。這個時間差非常重要，因爲在12月24日，當英國大使向中國解釋英國急需物資，並請求中國允許英國使用儲存在緬甸的美援物資時，蔣介石當即爽快答應了英方請求，並且慷慨表示，英國的戰爭就是中國的戰爭，不要有彼此之分。蔣介石隨即指示何應欽盡快把物資轉移給英國人使用。在當時，英國大使應該已經得知Tulsa沒收的事件，但是蔣介石並不知情。然而不到48小時之後，蔣介石卻接到來自仰光的報告，原來英國早在徵求中國同意之

88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57-60.

89 美國租借法案援華物資被英國截留日期為：Tulsa號，1941年12月18日；Day Star號，12月23日；Louise Lykes號，12月26日。

9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年12月23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15；俞飛鵬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日，同書，頁218-219。

91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25日。蔣介石在此日接到來自緬甸的報告。

前數天，就已經自行侵占了該批物資[92]。

不用說，蔣介石爲自己的受騙而大爲震怒。他嚴厲指責英國的行爲有如強盜，爲君子所不齒。他提出警告稱，假如英國不立即停止此類海盜行爲的話，必將產生嚴重後果，甚至導致兩國斷絕邦交。與此同時，蔣介石又指令駐仰光的中國官員，著手準備向美國政府退還一切在緬甸庫藏的美國援華物資，然後關閉辦公處啓程回國。他還聲稱，中國今後將不再與英國從事任何軍事合作項目[93]。當另一艘船隻又被扣留的消息傳到重慶時(1942年1月1日)，蔣介石更爲憤怒，並立即致電羅斯福抗議[94]。雖然羅斯福的回電(1月3日)坦承英國行爲明顯違反美國政策，但並沒有承諾採取任何行動來改善情況[95]。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英國的強盜行爲和自私自利的做法，已經超過了德國和日本對中國所做出的最壞行爲。更令他無法忍受的是，他們對有色人種的居高臨下態度[96]。幾天以後，同樣嚴厲的言辭出現在他給宋子文的電文中[97]。在一份給英國大使的備忘錄中，蔣介石毫不留情地指斥英國的沒收行爲是出於蓄謀，充分表現出無需尊重中國。蔣介石甚至形容此類行爲只能出自敵國，而非友邦[98]。蔣介石提出的解決之道非常簡單：英國必須把所有扣留的物資退還給中國，並保證今後永不再犯；在此之後中國願意依照蔣介石原先(24日)的承諾，撥出其中一部分供英國使用[99]。但是即使這麼做了，蔣介石還是發洩得意猶未盡，並再度召見英國大使(1月4日)，當面予以譴責。最後連蔣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政府從未如此嚴厲地訓斥過一位外國使節[100]。

對於渴望得到軍火接濟的中國而言，英國的行爲無疑是一大警訊。它的含義是，只要英國以緬甸防守需要作爲藉口，它就有權截留任何借道緬甸運往中國的美國軍火

9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57-58.

93 以上敘述的資料來源包括：蔣介石與英國大使卡爾的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198-203；何應欽與馬格魯德及戴尼斯會談紀要，1941年，12月25日，頁204-207；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6日，同書，頁208-213。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25日。

94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日。

95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3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31。

96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25日。

97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1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20。

98 蔣介石致英國大使備忘錄，1942年1月1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21-222。

99 蔣介石致俞飛鵬(仰光)電，1941年12月26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16。

100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4日。

物資。這樣的行爲讓中國不得不懷疑，英國到底是不是中國的盟友。當然，英國在緬甸的行爲，被它在重慶的軍官弄得更糟糕。因爲當英國扣留船隻的消息傳到重慶時，衛佛爾恰巧在和中國軍官開會。不少與會人都聽到他大言不慚地說：「我但願能夠多偷些唐人(中國佬Chinaman)的襪子。」[101] 這種言詞不啻是把鹽往中國的傷口上撒。

不同於上述美國軍方的輕描淡寫的是，中國資料顯示，這些事件對於中國和蔣介石產生了兩個至關嚴重的後果：一是關係英國，一是關係美國。

就英國而言，蔣介石在同盟國成立還不到一個月時，就已經聲稱要和英國斷交，這的確是一件大不尋常的事。更嚴重的是，蔣介石已經把英國的行爲與敵國歸爲一類，把英國看成和日本是一丘之貉。蔣介石的這種說法，如果當時被英美人士得知，或許會被認爲是過於偏激。但從中國觀點來看，就比較容易了解。我們必須記得，中國已經花了極大的努力去維持它通往西方的道路，目的就是想要取得少量的外援以維持繼續抗戰。日本作爲一個敵國，當然一直在設法阻止這些物資(多半是美國製造的)通向中國，冀能徹底摧毀中國的抵抗意志。而中國在參加同盟國時，本來樂觀地指望供應國(美國)可以更慷慨支援中國。但想不到事與願違，英國已經在實質上打擊到中國繼續抗戰的能力。英國經由控制仰光港，擅自沒收美國援華物資，等於完全扼殺了中國得到外援的命脈。無論英國使用的外交辭令如何婉轉，這個殘酷的事實都無法改變。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的言詞其實相當接近事實，因爲英國當前對中國所造成的危害遠遠大過日本。

對美國人而言，英國的沒收行爲也應該提醒他們，今後必須小心謹慎地處理同盟國之間的關係。縱使美國並沒有參與或是默許英國的這些行爲，但它還是免不了被扯進爭端。夾在兩個盟友中間，美國縱有保持中立的願望，但是在處理具體事務時，卻難免一再受到中國政府的質疑。的確，馬格魯德將軍和羅斯福總統都曾明確肯定中國對於這些物資的所有權。然而，美國政府所使用的語言軟弱無力，語氣輕描淡寫。在事後既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收回被截留的物資，也沒有向中國承諾提供新物資作爲補償，或至少保證此類事故以後絕對不再發生。相反地，羅斯福只是勸中國政府息事寧人，寬容英國人繼續享用已經截收到手的物資。雖然這種處理方式對美國人來講已經是增添了許多額外麻煩，但在中國人心中則增加了疑懼，他們認爲美國今後在處理同盟關係時，將不會保持公正和平衡。

Tulsa事件的長遠影響是它讓蔣介石得到了一個清楚的教訓，那就是從今以後應該如何與英國打交道。這些事故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爲什麼蔣介石在以後和英國人就

101 同上，1941年12月25日。

兩次緬甸戰爭進行交涉時，會採取那麼強硬而刻板的立場。他和英國人不愉快的經驗，在不久後發生的第一次緬甸戰爭中又進一步證實他判斷的正確。而在第二次緬甸戰爭漫長的談判過程中，他對英國人的不信任因而自然變成了主要障礙，讓他堅持英國必須先履行它所承諾有關投入海陸空軍兵力的一切細節之後，中國才肯把軍隊開入戰場。蔣介石的經驗也解釋了，爲什麼他堅持要美國承諾在第二次緬甸戰爭開戰時，援華物資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一萬噸)。他所恐懼的就是英國的衛佛爾將軍有一個秘密計謀，等到戰爭一開始就出其不意地把大部分的援華物資奪爲己用。Tulsa事件還讓蔣介石擔心，英國甚至可能會以緬甸戰爭爲藉口，把儲存在印度的龐大美國援華物資也據爲己有。

最後，Tulsa事件還給蔣介石留下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那就是英國根深柢固的種族優越感。他堅信英國人從來就沒有把中國人當作平等人種看待，即使他們身在中國領土上時，也對中國人毫不尊重(「唐人、中國佬」)。這個印象深植在蔣介石腦海中，隨著以後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又不斷浮現出來[102]。

## 二、緬甸與東南亞

抗戰開始後不久，經由越南和緬甸兩條通道運到中國的軍火，已經成爲維持抗戰的最後外援來源。但是在1940年夏季，英法兩國先後屈服在日本壓力之下，關閉了這兩條交通管道，使得中國大受打擊。雖然英國在三個月後重新開啓了緬甸通道，但中國的憂慮並未解除，反而促使它加倍努力地去保證通道的通暢。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在珍珠港事變前，曾經數度自動提出要和英國共同防衛緬甸，但都遭到拒絕。原因是英國信心十足，以爲它和日本可以長期和平相處，無需中國人來惹是生非[103]。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自然更擔心會失去緬甸通道。1941年底，蔣介石親自向衛佛爾提出，中國願意派遣兩個軍(6個師)的兵力入緬甸作戰，衛佛爾當即拒絕，並表示他最多只願意考慮接受三個團的協防[104]。意似是對中國示惠。12月27日宋子文會見羅斯福和邱吉爾時，又乘機表達了中國對新加坡防務的關切。然而邱吉爾依然堅持，新加坡的防務至少在今後6-8個月之內不會發生任何問題[105]，毋庸中國操心。

面對盟邦這種冷漠反應，中國只好另尋出路：包括考慮另建一條新通道，或是由

102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3月19日。
103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6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08-213。
104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2年1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15-119。
105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年12月27日，《戰時外交》(三)，頁96-97。

中國獨力承擔緬甸防務，而不指望得到英國合作。

根據中國政府內部研究，從中國通往印度最好的途徑是假道西藏，其優點是路程短，施工容易，並且遠離日軍威脅。但是西藏領袖在得知這個構想後立即表示反對。這個發展也隨即引起中國政府的懷疑，認爲西藏領袖的反對或許是出於英國人的挑撥所致。因爲英國人一直在西藏進行大規模秘密活動，意圖維持他們的特殊地位[106]。儘管如此，重慶政府因爲不願意在抵禦外侮的戰爭中進行內鬥，所以很快就放棄了此一構想。

與此同時，中國對於加強緬甸防務的努力也開始轉變方向。由於中國自己曾有過被西方殖民主義欺凌的經驗，所以蔣介石非常懷疑東南亞人民會支持他們殖民地政權主子的戰爭。他認爲，盟邦必須竭盡一切努力去贏取殖民地人民的信任。

儘管蔣介石本人對英國的不滿正在與日俱增，他還是採取了一個溫和立場，敦促英國至少向殖民地人民提出承諾，以將來的民族解放來換取當前的軍事合作，共同抵抗日本。早在1942年1月4日，蔣介石就已經告訴羅斯福和邱吉爾，亞洲的戰爭必須把民族感情和人民心理當成重要因素[107]，因爲殖民地地區的戰爭異於其他地區的戰爭。根據他的分析，在歐洲戰爭中，軍事因素最爲重要，因爲各地區人民都把反法西斯的軍隊看成是他們的救星。在非洲戰爭中，軍事因素同樣最重要，因爲非洲人口稀少而且民族解放意識尚未成熟。但是東南亞情形則大不相同。因爲在該地區，民族主義和社會條件都將深深地影響到未來戰局的發展，尤其是在殖民地人民目睹他們往日的白人主子(英國、法國和荷蘭人)，在戰爭一開始就被有色人種(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之後。假如戰爭延續下去，這些因素會對當地人民產生根本性的影響。基於這些考慮，蔣介石敦勸羅斯福在戰爭情況允許下，盡量把大西洋公約的原則和精神推廣到世界各地，以便對日本的宣傳展開迎頭痛擊[108]。

不出蔣介石所料，邱吉爾的豪言壯語並不能挽救新加坡和緬甸的危機。然而當蔣介石表示願意接受衛佛爾的設限，只派遣三個陸軍團赴緬甸時，英國政府卻仍然拒絕接受。中國政府終於開始相信，英國根本就沒有意願讓任何中國軍隊進入緬甸[109]。中國的失望最後導致宋美齡在元月底忍不住向馬格魯德將軍抱怨說：「萬一緬甸一朝失

106 彭學沛呈蔣介石報告，1942年1月16日；吳忠信呈蔣介石報告，1942年1月25日；吳忠信呈蔣介石報告，1942年5月8日。見《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34-237，252。

107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4日。

108 CKS cable to FDR, January 10,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3.

109 王世杰日記，1942年1月24日。

守，讓歷史記錄一定要明確顯示，中國曾主動提出協助，而英國拒絕接受。」[110]

由於蔣介石深知中國無法捨棄緬甸的陸上通道，而緬甸的安全又與印度休戚相關，所以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兩個英屬殖民地之間的共同利益和困難。因此，1942年1月底，當他初次接到情報指稱許多印度人公然表示同情日本時，他立即呼籲印度領袖務必支持盟邦[111]。當泰國倒向日本並向西方宣戰時，他更擔心盟邦將會被亞洲人拋棄[112]。假如這個趨勢不能趕快加以抑止的話，西方國家在南亞和東南亞的地位將會受到嚴重挑戰。面對這種情況，蔣介石的對策是親自訪問印度，希望能夠推進英印共同抗日的合作關係，說服印度民族主義領袖不要堅持立即取得完全獨立的目標，暫以英國授予自治領的地位爲交換條件，共同抵抗日本[113]。

儘管英國無法公然拒絕蔣介石訪問印度，但對蔣介石的用心毫不領情。因此，當蔣介石表示要到甘地被軟禁的住處，親自登門拜訪以示尊敬時，他的要求立即遭到英方拒絕[114]。邱吉爾不但明白反對蔣介石親赴甘地寓所的計畫，並且認爲這樣做只會增加甘地的聲望[115]。英國人認爲蔣介石此時真正應該做的，是去說服印度領袖向英國輸誠效忠[116]。其他一切問題均應免談。

蔣介石後來同意更換在另一個地點和甘地見面(2月18日)，隨後又在印度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並與許多英國官員和印度領袖交換意見。但是他對促進印度人民參加同盟國的努力毫無進展，他想說服英國人承諾在戰後給印度人獨立的努力，也同樣遭到失敗。當然，英國政府希望蔣介石能夠贏得甘地和尼赫魯的同意，即刻接受英國指揮，共同合作抵抗日本，也不可能如願以償[117]。

蔣介石在戰時對印度的訪問，不但是中印外交史上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同時也能夠對蔣介石的世界觀提供若干啓示。假如有人認爲蔣介石出訪印度的動機，無非是想借此機會自抬身價，塑造自己成爲世界舞臺領袖形象的話，那絕對是一個誤判。因爲當時中國最擔心的是緬甸的安全，而印度和緬甸又休戚相關，因此必須穩定其內部情勢。更何況當時中國國內輿論普遍同情印度的反英運動，這種來自民間的情緒也對蔣介石產

110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2年1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15-119。
111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3、30日，2月4日。
112 同上，1942年1月25日。
113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0日。王世杰日記，1942年2月11日。
114 英國大使卡爾致蔣夫人函，1942年2月11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1冊，頁78-81。
115 邱吉爾致蔣介石函，1942年2月12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1冊，頁102。
116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29日。
117 同上，1942年2月8-22日。

生了巨大的壓力[118]。蔣介石的訪問印度之行，可說是當時中國官方和民間輿論，反英親印兩股潮流的匯合所致。

蔣介石在訪問印度途中還順道訪問了緬甸，而他訪印的失敗也加深了他對英國人統治緬甸無能的疑懼。在逗留緬甸途中，他親眼看到了當地政府的腐敗和士兵與民眾的喪失鬥志[119]。他沿途的所見所聞不但使他怵目驚心，而且使他相信，中國把軍隊送往這樣一個地區作戰必須慎重將事，因爲失敗的機率實在太大[120]。總而言之，正當太平洋戰爭中三個重要同盟國應該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精誠合作的時候，其中兩國(中國和英國)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嚴重裂痕，而這又使第三國(美國)備感爲難。英國人直接向中國人表現出來的趾高氣揚、自私自大和種族優越感，他們對印度人民獨立要求的悍然拒絕，以及他們在緬甸所表現出的極端混亂、無能和喪失鬥志的景象，都讓蔣介石感到無比寒心，並且相信英國是一個既無能力又無信義的盟友。

## 三、中國對英國動機的疑懼

同盟國成立後幾周內的發展，加深了蔣介石的疑懼。他認爲英國圖謀把中國摒除於盟國最高會議之外，其目的是要拉近(甚至獨占)它自己和美國的關係，並離間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不久之後，他告訴居里(1942年7月)說，他向來相信英國人處心積慮地排擠中國，因爲他們只想把中國當作等同英國的自治領來對待。蔣介石的這些疑慮，最能夠解釋爲什麼他一再經過各種管道，去表明中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個最重要的基本立場，那就是，中國可以毫無保留地接受美國在同盟國中的領導地位，但絕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英美共同領導。換言之，中國可以接受由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來主導同盟國的軍事行動，但絕不接受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來共同處理，因爲後者的存在和做法明顯歧視中國[121]。從這個觀點來說，ARCADIA會議的決定只能增加蔣介石的不安和疑懼而已。

由於英美兩國之間的聯繫不斷，邱吉爾與羅斯福又屢次進行秘密會商和簽訂秘密協定，但蔣介石此時仍然相信美國對中國的善意，所以他理所當然地相信，中國之所以被排擠的根本原因是英國人在搞陰謀詭計。不過，中國對英國的戒心也間接增加了中美關係的困難度，因爲中國難免過於依賴美國，總希望後者能夠以持平態度處理盟

118 《蔣廷黻回憶錄》，頁223-224。
119 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27日。
120 蔣介石日記，1942年2月27日。
121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36。

邦間的關係。結果是，美國人不但要分頭處理他們與英國及中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還要協調中英之間的關係。由於中英雙方的文武官員都無法和對方進行友善的交流，因此不得不把美國人夾在中間。儘管後者心中或許並不願意，但是也只好扮演中英兩國之間的信差、中介和調人的角色。

## 伍、中國決心親美

由於蘇聯未能及早參戰和中英關係急劇惡化，使得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唯一的出路是加強和美國的關係。具體而言，中國所指望於美國的目標不外是：更多的軍援和更多的經援。

### 一、美國軍援

#### (一)珍珠港之前中國對軍火的尋求

不少歷史著作在討論美國武器援華的題目時，經常突出兩位美國將領(陳納德與史迪威)之間的爭端。但這只是一個極爲片面的處理方式，因爲中國對美國武器的濃厚興趣，早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已經醞釀成型，而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爭論，則要遲至1943年4-5月才發生(詳情見本書第七章)。早在1938年，蔣介石就已經認定中國軍隊在陸地作戰失敗主要原因，是中國空軍力量尚不及日本空軍的百分之一，因此不能有效地進行陸空聯合作戰。在中國向蘇聯提出的援華軍火清單裡，戰鬥機是首要項目。同樣地，宋子文在1940年赴美，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購買美國的新式飛機。依照蔣介石當時估計，中國若能從美國買到300架最新的驅逐機和50-100架轟炸機的話，中國對日抗戰的能力將大爲改善[122]。

蔣介石痛苦地意識到，中國陸軍之所以陷於癱瘓狀態，最重要原因就是日軍享有絕對制空權，能夠不分晝夜地肆意轟炸掃射中國陣地，使得國軍完全無招架之力。在當年所有重大戰役中，中國地面部隊幾乎從來沒有得到過有效的空中支援。因此蔣介石在其空軍建設構想中，最高的目標無非就是，幫助地面部隊略微改善一點它們作戰的條件而已。

再者，由於中國政府提不出辦法，去保護各地人民免於遭受日軍無情的轟炸，也使得人民的鬥志大受影響。因此，中國急需建立空軍的另外一個理由是提高人民士

122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0年7月10日，《戰時外交》(一)，頁410。

氣、穩定社會秩序和保護市場的生產力。早在1938年初，中國已經準備使用蘇聯貸款中的大部分購買飛機[123]。但是1940年10月，日本開始對中國大小城市有系統地施行瘋狂濫炸企圖瓦解中國的戰志後，中國立即發現蘇聯向中國提供的飛機根本不是日本對手。由於飛機性能太差，即使中國能夠得獲得更多同類型的蘇聯飛機，結果也只不過是讓更多的中國飛行員去送死而已[124]。

歸根結柢，對中國來說，真正的解決之道只能依靠美國，因爲美國飛機是世界上性能最佳的，包括速度快，火力足，爬高力強，和靈活性高。對於此時的蔣介石而言，中國迫切的需要是建立一支小規模的空軍，使抗戰得以支撐下去，而不致處於完全挨打的慘狀。因此，1941年7月，當美國政府表示願意派送一個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中國時，蔣介石立刻回覆，希望代表團能夠包括一位高階層的空軍軍官，其任務是幫助中國建立空軍[125]。10月27日，蔣介石和代表團長馬格魯德將軍首次會面時，他又重申同樣的願望，希望美國能夠派遣多名空軍軍官，來幫助中國建立一個新空軍[126]。蔣介石同時表示，他願意完全授權美國人負責組建工作，並敦促馬格魯德把它視爲代表團的首要任務[127]。

以上這段歷史回顧很清楚地說明，蔣介石對建立空軍的強烈要求，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已經提出，因爲一個具有規模的空軍，至少可以讓中國陸軍有機會在地面戰爭中與日軍一較長短。順便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看過蔣介石私人文稿的人都會知道，他對戰爭在歐洲和亞洲應該如何打，常喜長篇大論地作具體分析和推測，而且語詞明確。但通觀蔣介石在整個八年抗戰中的日記，卻完全沒有任何跡象可以推論出，蔣介石曾經一度指望中國空軍或美國駐華空軍可以單獨打敗日本。同理，當中國向蘇聯購買大批飛機時，在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人懷疑，中國政府是想以蘇聯空軍打敗日本的怪談。如果以上這個觀點正確的話，那麼後來史迪威和美國軍部對蔣介石心理狀態的分析，完全是一種自作聰明的想法。一旦美國軍方對中國事務先入爲主的分析架構，是認爲蔣介石的中國政府缺乏對日作戰的意願，那麼他們要求美國飛機(不管其數目是多麼少得可憐)的唯一動機，就是想不勞而獲取得戰爭的勝利。這種分析和判斷既簡單直接，又幼稚可笑，而且不值一辯。但不幸的是，後來的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同樣沒有依據史料作出獨立的判斷。

---

123 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27日，5月1日，7月15日。
124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0年10月7日，《戰時外交》(一)，頁413。
125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1年7月31日，《戰時外交》(一)，頁462。
126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0月27日，《戰時外交》(一)，頁467-473。
127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0月31日，《戰時外交》(一)，頁474-478。

我們還應該記得的是，中國對空軍的渴求誠然是它對美國武器要求中一個重要部分，但仍只是一部分而已。1941年初，中國已經擬訂了一套計畫，要購買足夠的武器在一年內裝備30個步兵師，其中包括一萬挺輕機槍、480門山砲、120門反戰車砲、480門高射砲、360門105公分砲，以及96門其他口徑的火砲[128]。這些並不是中國軍事領袖們憑空杜撰出來的數字。我們應該記得，在1928-1938年間，蔣介石曾經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和工業家來華裝備訓練30師精銳部隊。1937-38年他又轉向蘇聯要求協助裝備20個師。因此，1941年中國提交給美國的軍購計畫，只不過是同樣思路的延伸而已。唯一的差別是中國此時希望由美國來扮演這個重要的角色。至於談到飛機的具體數字，即使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500架飛機的這個數字基本上沒有改變。

## (二)珍珠港事變後中美關係的變化

珍珠港事變既沒有改變中國對外國軍火供應的渴求，也沒有改變它要求的數量，但是卻徹底改變了中美關係的本質。在此之前，中國只能「懇求」美國以市場價格把武器出售給中國。事變之後，它則認爲自己有權從美國獲得一個公平的援助數量，因爲美國自己已經承諾了作爲世界鬥爭的兵工廠。因此，當美國宣布派遣軍官團來華時，中國領袖們最初的假設是，美國當然會增加它對華的武器供應。

然而在幾周之內中國就發現，美國並不準備在武器援助的事務上把中國與其他盟友一視同仁。在審核軍火需求時，中國的意見經常受到忽視。開會時中國代表只是被准許出席來聆聽別人已經作出的決定，既不能追問美方決定的理由，也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更糟糕的是，即使對於已經作出的決定，美國也經常擅自片面取消，事先既不商量，事後也不作解釋[129]。這種行事作風的結果是，到了1942年4月，租借法案已經執行了一整年，中國仍然沒有得到它戰前就已經提出的軍火要求。而且在1942年頭四個月中，平均每個月只有三艘船運載軍火前往中國[130]。即使在此同盟關係尚在初步發展階段，美國白宮官員已經看出軍部對於援助中國缺乏熱誠。比如說，1942年3月14日，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向總統提交了一份備忘錄，標題是「需要立即重視的軍事問題」，其中第二段把重點放在中國：「我們必須保持與中國的補給線，並繼續將物資運入中國。我相信我們必須定期地催促陸軍部去採取行動。」[131] 從霍普金斯的說法

128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1年1月16日。

129 Unsigned memo, probably from T.V. Soong, to President Roosevelt, undated but probably shortly after April 19, 1942, in Verifax File 2377, Item 2522. MFA.

130 Ibid.

131 Hopkins paper to the President, March 14, 1942. Robert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518.

可以看出，他已經在擔心軍部對中國的消極態度了。

然而也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裡，美國軍部更有興趣的工作是去累積一大堆對中國的抱怨，以作爲無法增加援助中國的理由。這些抱怨的內容後來大多數都被歷史著作詳細的引用而廣爲流傳。最具代表性的美國軍部抱怨是，中國人對武器種類的要求完全不切實際。比如，中國要求重型戰車和大砲，但卻沒有堅實的公路或橋樑可以承載它們。至於中國要求的步槍和機關槍，它們的口徑又和美國製造的型號不能符合。純從事實而論，美國的這些抱怨都有憑有據，但軍部之所以提出這許多抱怨，其用意並不是急於幫助中國解決問題而責備心切，反而是急於想找到更多藉口來拒絕中國的要求。因爲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軍部官員們似乎忘記了，日本軍隊早已在中國戰場上部署了數百輛戰車、數千門重砲，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輜重車輛[132]。日軍能用來攻擊中國軍隊的武器，而中國軍隊卻不能用來防衛國土，這就不免令人感到納悶。再說到中美軍隊使用的步槍和機關槍彈藥口徑不符合，軍部的託詞更是匪夷所思。因爲它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略微修改工作母機(車床)的尺碼，把少數的母機投入兵工廠的生產線，就可以製造出足夠的彈藥來供應中國軍隊。以美國在科技上展示出來的驚人智慧和創新能力來說，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雕蟲小技，很容易就能克服。它們之所以被軍部振振有辭地大事渲染，再加上對中國人不遺餘力地的冷嘲熱諷，其真相只能說是，軍部本來就無意向中國提供這些援助，所以不得不費盡苦心去找些似是而非的說詞，來保護自己和撻伐對方。同樣地，美國軍方批評蔣介石迷信空軍而忽視陸軍，也只是暴露了他們自己對中國近代軍事史的無知。如果這個批評在常人的耳朵中聽起來似乎有理的話，其實正是因爲軍部對華援助的數量如此之少，致使少數的幾架新式飛機，反而變成是在中國破舊不堪的武器裝備中最引人注目的標誌。諸如此類問題都值得學者們重新去思考求證，幫助我們把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恢復歷史原貌。

## 二、馬格魯德將軍的角色

一個造成中國爭取美國軍火援助工作嚴重困難的因素，很難想像竟是美國派遣來華協助的馬格魯德將軍。他是中日戰爭開戰以來美國派駐中國的最高官階軍人，因此他向軍部上司提供的消息當然具有影響力，而他對軍部提交有關對中國政治軍事情況

132 在1937年前，德國軍事顧問已經擬訂計畫，幫助中國建立機械化部隊，能夠適合在華南和華北不同地形上作戰。而在1944年第二次緬甸戰爭中，史迪威自己也引進了大批機械化美國武器在緬甸使用。應該記得的是，緬甸叢山峻嶺，道路橋樑的建設遠比中國落後，在雨季時，更是一片沼澤。這些事實都顯示美國軍部的說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的判斷，也能影響美國對華態度。

如前所言，即使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馬格魯德已經從蔣介石口中得知後者對於建立空軍的迫切心情，以及他打算邀請美國軍人全權主持中國空軍建軍事宜的想法。換言之，馬格魯德心中早已清楚，不管哪一位美國軍官被任命去主持這項任務，對於那個人的事業前程都將是一大突破。因此，珍珠港戰事甫一爆發，馬格魯德就急不可待地採取行動爲自己的事業鋪路，而他採用的方式也真是直截了當。

1941年12月31日，馬格魯德突然要求蔣介石承認他是(中美)聯合空軍總指揮官的身分。蔣介石聽後大爲震怒，除了當場拒絕之外，還明白表示，一切駐華聯軍必須接受中國戰區指揮。馬格魯德一開始還想找理由申辯，但蔣介石絕不留情面。當馬格魯德作出讓步，建議蔣介石把此事送交美國軍部裁決時，蔣介石仍然拒絕，而且嚴正聲明，不管華盛頓如何表態，中國絕對不會接受馬格魯德的任命，因爲只有他(蔣介石)才是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至此，馬格魯德才完全死心，並向蔣介石道歉[133]。馬格魯德本人並沒有留下記錄敘述或是解釋此事，而且也不至於向軍部報告此事。但是一位美國將官級軍官以這種手段推銷自己，實屬奇特。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馬格魯德原先的盤算大概是以爲看到一個晉身的好機會，於是利用珍珠港事變後的混亂局面，打算出蔣介石之不意，先把中國政府的委任狀拿到手，然後再爭取軍部默認。他以爲如此大功便可以告成。但是他顯然錯估了蔣介石的反應。

這個事件的後遺症不久就浮露出來，並且造成長遠後患。因爲馬格魯德在顏面盡失的五天之內，便開始不遺餘力地批評蔣介石本人和中國的抗戰大局，而他的判斷又輾轉影響了美國其他的軍事領袖對中國戰場的看法。馬格魯德在1942年1月5日向軍部呈交的報告中，沒有提供任何事實憑據，便大膽預測蔣介石政府可能會和日本安排停戰，讓美國人單獨對付日本。他更進一步警告，中國政府打算囤積美援物資，「以準備戰後的軍事行動」。他認爲如果美國想要讓中國採取攻勢的話，那無異是在作「白日夢」，因爲中國人最擅長的就是自欺欺人。最後，馬格魯德指責蔣介石把他的士兵和武器都看成是「固定資產」，其目的在囤積資本，以便將來和自己的同胞作戰，爭取在政治和經濟上實現獨霸的局面[134]。

值得注意的是，馬格魯德此時才剛到中國上任兩個月，只跟少數中國領袖有過初

133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31日。又見：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20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國史館)，第21冊，#15072。

134 Magruder to War Department, January 5, 1942, FRUS, 1941, vol. IV, pp. 769-771; Magruder to War Department, Februar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13-16.

步接觸，尚沒有到任何戰區進行實地考察。以這種背景，他的結論真可謂大膽而又全面。當然，如果他能夠提出具體的事實作證明，或是指明消息來源來支持他的論點的話，也會是一件大有價值的報告。可惜的是，他並沒有這麼作。無論用什麼尺度來衡量，他的報告都只是個人的印象、直覺和假設而已。當然，更可怕的解釋可能是他在憑空杜撰，發洩心頭之憤，利用自己特殊身分公報私仇。特別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這個報告的時機，因爲當時中國正在再三懇求英國，允許中國軍隊開赴緬甸戰場和英軍共同防衛緬甸，並且也再三請求馬格魯德從中協助達成此目的。當然，同樣糟糕的是馬格魯德個人的品德，也是一些當時駐華美軍同仁的針砭對象。根據其中一位的形容，馬格魯德本人在珍珠港事變後並沒有作出任何相應措施，只是想盡快撤出中國，而且他的「代表團幾乎完全癱瘓，他提出的報告也顯得驚慌失措」[135]。基於這些原因，馬格魯德報告的可信度必須大大地打折扣了。

然而，馬格魯德的報告仍然產生了一定影響力。這不僅因爲他是美國軍事代表團的團長，也因爲軍部本身沒有人能夠評估中國戰區的潛力和中國領袖們的意圖。軍部領袖們也許從來沒有想到過，馬格魯德報告的內容，會和他幾天前才被中國人撕破臉皮這件事之間有著微妙關聯。

在此值得順便一提的是：馬格魯德將軍在他美國同事中的聲名之惡劣，遠非當時中國領袖們所能了解[136]。不少熟知他的美國軍官對他的人格和職業素養都持有非議。史迪威每次在日記中提到馬格魯德時一律是冷嘲熱諷[137]。羅斯福的特使居里在與蔣介石談話時(1942年7-8月間)也不例外[138]。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新敗之時(1942年5月)，馬格魯德決定用他的美國海軍醫生的診斷書作爲藉口，在未向長官(史迪威)報備和得到批准之前，便悄然從中國戰區溜走[139]。馬格魯德從重慶開溜和史迪威本人從緬甸戰場不告而別，兩者之間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以也沒有遭受軍法處置。他後來雖然一度被任命爲師長，但隨即因爲不勝任而被免職(1944年9月)[140]。然而不幸的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後的幾個月中，這麼樣的一個人卻成爲美國軍部在中國戰場的耳目，而他呈送的報

135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1.

136 竇恩對馬格魯德1920年代在北京的駐華武官生活的形容充滿嘲弄。見：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1.

137 Joseph W. Stilwell's type-written Diaries(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JWS t-w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March 6, 21, and May 22, 1942.

138 見本書第6章。

139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40.

140 Cable from War Department to AMMISCA, September 9, 1944, in Joseph W.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Box 17, Folder 218.

告，也必然對軍部在處理中國軍事援助的要求上產生一定的影響。

## 三、美國財政援助

美國軍部對華軍援的意願低落。相形之下，財政部倒是積極找尋各種援華途徑。

中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所面臨的財政困難，可以從它1942年度的國家預算中看出一些端倪，因爲它預估的赤字是收入的兩倍[141]。重慶政府的解決之道是請求美國給予5億美元借款[142]。但當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Henry Morgenthau, Jr.)問及借款用途時，中國卻承認它其實並無具體運用方案，而且還表示沒有必要過早去決定款項的用途。因爲依照中國政府的思路，這種借款的性質應該和戰場上的後備隊相似，如何去使用後備隊必須取決於不斷變化的戰局。爲了戰爭，一個國家會先建立一支軍隊，加以裝備和訓練，然後再決定如何使用之。同樣的，中國希望保證它在帳戶裡有足夠資金，可供隨時提取運用[143]。

中國官方的邏輯顯然和摩根韜財長的想法大相徑庭，摩根韜希望遵循銀行界的嚴謹作業程序，如果連中國自己都不知道借款的用途，那麼還有什麼理由向美國國會提出撥款請求呢？因此，摩根韜提出一個他認爲更有創意的方案，那就是：運用美國借款直接向中國士兵發餉。在他看來，這個方案的優點是，它既可以具體改善士兵生活，提高他們的戰鬥力，又容易得到國會通過。理由很簡單：中國軍隊既然能夠拖住日本軍隊，那就等於是給美國軍隊有更充分時間去準備對日作戰[144]。宋子文對於摩根韜的這份巧思大爲激賞，並興沖沖地告訴蔣介石說，摩根韜的方案在中國借款工作遭遇了這麼多的困難之後，似乎提供了一個務實的解決之途。它可以讓政府長期地得到英美兩國承擔中國的戰費[145]。

摩根韜完全沒有把這個方案告知美國國務院，甚至連國務卿也都沒有機會去了解它的政治含義[146]。實際上，國務院一旦得知之後非常反對這個方案，而且在得知的當

141 王世杰日記，1941年12月27日。

142 蔣介石對經濟部俞鴻鈞次長的訓示，1942年1月4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1冊，#15066。

14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9日，《戰時外交》(一)，頁328-329。

144 有關摩根韜在1942年1月12日和宋子文會談的記錄，見：*Morgenthau Diary (China)*, pp. 570-577.

145 Soong letter to CKS, January 12, 1942.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14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on talk between Mr. V.F. Coe of Treasury Department and Mr. Stanley K. Hornbeck of State Department, January 14,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2.

天(1月13日)就派項貝克(Hornbeck)向摩根韜表達了它的看法[147]。但是，摩根韜很快便得到了羅斯福的承諾，美國願意支付一百萬中國士兵的薪餉。假如以每人每月10美元計算，每月總支出應爲一千萬美元。羅斯福對這個方案大爲讚賞，並且以爲這個方案可以納入他的另外一個宏偉計畫之中，那就是發行一種國際貨幣，稱之爲「民主幣」(Demos)。

事實上，當羅斯福聽到國務院的反對聲音時，他的態度可說是相當倨傲而不耐。根據摩根韜轉述，羅斯福說：「國務院根本不知所云。假如我跟蔣介石達成一個協議，向他要求一百萬個士兵，放在莊穆(Hugh A. Drum)將軍指揮之下。我可能想進攻上海，也可能想去支援菲律賓，我可能想做任何事情。無論如何，我想把一百萬士兵交給莊穆將軍指揮，而且願意支付他們的費用。我可以用總司令的身分從我自己的租借法案帳戶裡撥款。」當時羅斯福興猶未盡地繼續說道：「只要我想以美國三軍總司令的身分得到一百萬有攻擊能力的軍隊的話，我就有能力得到他們，而且付他們錢，不管是中國人或是其他任何國家的人。」「那些說我無法得到這些軍隊的人，簡直荒唐可笑。」[148]

這些接二連三的發展讓宋子文大感振奮，因爲他估計這個方案可以讓中國每個月立即得到約兩千萬美元的援助[149]。因此他不但極力敦促蔣介石接受方案，並且建議蔣介石提高價碼到每個月三千萬美元，以支付三百萬中國士兵的薪餉[150]。

但是蔣介石的反應卻是絕對相反。他的政治本能告訴他，摩根韜的方案充滿危機，倘若接受的話，其立即後果就是把中國軍隊與中國政府、社會和經濟撕裂開來，甚或造成它們之間關係的對立，其結果只會加速中國政府、經濟和貨幣的總崩潰。蔣介石認爲，中國軍隊絕對不可以和本國的經濟分開來。中國經濟落後乃是軍事軟弱無能的根本原因。假如中國想要加強軍隊，就必須先加強經濟和提升貨幣的信用。他對美國經濟援助的一個重要堅持，就是美國必須充分信任中國，不可以對借款用途提出種種限制。若非如此，美國借款就與一般商業借貸無所差別了[151]。

---

147 Transcript of meeting at Treasury on January 13, 1942, in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p. 587-592.

148 Transcripts of meeting at Treasury Department January 13, 1942, in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 593.

149 Soong's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Morgenthau, January 12, 1942, in T.V.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26. 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3日，《戰時外交》(一)，頁320-321。

15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4日，《戰時外交》(一)，頁331。

15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15日，《戰時外交》(一)，頁332。

其實，蔣介石在私下對摩根韜方案可說是萬分憤怒，指責它是一個「卑劣」的行爲，「侮辱中國已極」。同樣讓他氣憤莫名的是，沒想到宋子文居然會幼稚到接受摩根韜方案，完全不顧中國的國格和尊嚴[152]。

蔣介石這種強烈反應，至少有兩種因素可加以解釋。一種是他的民族主義情操受到了嚴重傷害。正如他對美國把中國排擠在同盟國會議之外一樣，他認爲摩根韜方案無異是讓美國成爲付帳的老闆，而使中國軍隊淪爲拿工資的夥計(雇傭兵)。有趣的是，蔣介石這個理解其實相當正確，因爲這正是摩根韜內心的想法。摩根韜在私下的說法是，美國每個月只預先支付一個月薪餉給中國，假如中國兵打仗就可以領到錢，不打仗就領不到錢。他認爲宋子文完全聽懂了他的話[153]。蔣介石雖然並不清楚這些內情，但是他卻認爲摩根韜方案肯定不是一個隨興所發的異想，而是一個處心積慮的設計。在他眼裡，摩根韜若不是過分天真，就是萬分陰險。無論如何，摩根韜絕對是在侮辱中國，而且行爲與一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毫無差異。

另一種解釋則比較著重實際考量。假如中國士兵每個月都直接從美國政府手中領餉的話，那麼蔣介石和盟邦間討價還價的空間就會大大削弱。任何時候盟邦對蔣介石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就可以用拒絕付款的手段來迫使蔣介石屈服，而盟邦的要求可以包羅萬象，沒有任何限制。相對而言，中國政府爲了得到盟邦這麼少的款項，從此以後要對西方低聲下氣，這遠比日本人對中國的苛求更加屈辱，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是在政治軍事上自掘墳墓。

事情的發展不但使宋子文垂頭喪氣，而且他還不得不故作強硬地通知摩根韜，中國對借款的立場是：「不提供抵押品、不付利息、沒有還款期限。」[154] 因此，5億元借款在中美同盟初期，就暴露了兩國對借款問題上的邏輯迥然不同。美國人堅持必須先擬訂詳盡的計畫和明確責任歸屬才能談借款，摩根韜要求中美財政往來完全符合商業借款規矩，即借款的目的、數量、利率、還債日期、抵押品等一一列清，不可或缺。但是中國則強調互相尊重和信任。他們要求美國表現出對中國的同情心、尊重中國的信譽，並且不以處理商務的方式來處理同盟關係。換言之，中國要求美國的是一個信用貸款(類似line of credit)，不但貸款的數目要大，而且每次取錢的上限也要寬鬆。即使中國還沒有擬出用錢的具體計畫，它仍然希望美國爲了激勵中國的民心士氣，能夠向

152 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15日。

153 Record of Morgenthau's conversation with Soong, on January 12, 1942, in *Morgenthau Diary (China)*, p. 576.

15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2月2日，《戰時外交》(一)，頁334。Also: Soong's conversation with Henry Morgenthau, January 12,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26.

中國提供信用貸款。不管在財政上的意義如何，中國所指望的是，美國隔不了多久就能提供一筆貸款給中國。這麼做的目的是證明美國對中國的支持及信任，而這種信任又只有來自外國才能讓中國人民感到鼓勵。依照中國政府這條思路，美國經援的政治功能和心理效應，至少和它的錢幣價值同等重要，甚或超過之。

至於5億美元借款本身，羅斯福最終決定打破僵局向國會提出申請，並且很快得到通過，於1942年2月12日成爲法律[155]。也正是這個快馬加鞭的借款通過方式，不但使中國領袖們的士氣大受鼓舞，同時也使他們獲得一個啓示，那就是此後對白宮和聯邦政府其他部會，必須採用不同的對付策略。而在借款事項上，以後要盡量繞過摩根韜這位精打細算的銀行家，而直接訴求於總統個人的善意與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事情辦成[156]。以後每當中國政府在和美國軍部打交道碰壁時，也自然採取同樣策略。這種處理方式就不免引發出許多新的爭端，使中美同盟關係益加複雜化。

## 陸、小結

從本章以上討論可以看出，一般史學界認爲太平洋戰爭馬上拉近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軍事合作關係，這個觀點並不完全正確。戰爭一開始就讓許多新衝突變得尖銳化，讓中國對西方國家的反感程度超過了珍珠港事件之前。可惜的是，不少現有的著作很詳細地交代了戰爭後期盟邦關係的緊張，卻忽略了開戰初期所種下的衝突種子。而事實上，盟邦在初期的感受大大地影響了它們以後的互動關係。

國務院資深的中國事務專家項貝克早就關注到中國在這方面的感受。他曾正確地指出，中國人對美國政府及美國人民的好感，遠遠超過對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及其人民。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中國人對獲得外國武器和物資援助感到絕望的話，他們也沒有理由和日本一直對抗到底。到時候，他們也只能放棄抗戰，並和日本簽訂他們能夠得到的最優惠的和平條款[157]。項貝克在列舉了一大堆導致中國對盟邦不滿的現象之後指出，蔣介石心底並沒有和日本談和的打算，也不想拋棄同盟國。不過，即使在落後的中國，也沒有一個人的權力強大到可以凌駕一切。因爲在中國還是有不少人願意對日本的壓力屈服，而他們同時也能夠看得出來，西方國家的所謂援助是有名無實，根本無

155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2月12日，《戰時外交》（一），頁336。

156 王世杰日記，1942年2月5日。

157 Comments written by Hornbeck, April 16,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0.

濟於事[158]。這就更增加蔣介石政府的困境。只是項貝克對美國軍部及財政部對華政策的嚴厲批評，對於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並無影響力。因爲國務院本身也早已被隔離在美國戰時高階層決策程序之外。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得知，中國不僅對盟邦援華物資的不足感到失望，更重要的是對盟邦的態度感到屈辱。打從太平洋開戰以來，中國人承受西方盟友的輕視、不關心、明目張膽的排擠和習慣性的倨傲等等，已經大大地傷害到他們對同盟國的態度。而西方國家這些態度和作風完全沒有必要，它們不但不能幫助西方國家得到實質利益，反而造成盟邦關係嚴重的裂痕。

然而此時，美國總統和軍部的態度又是如何呢？

羅斯福固然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可以看出問題之所在，但是他無法經常關注中國事務或是制訂長程的政策，因爲需要他關注的事務實在太多。他也可能缺乏足夠的政治決心和充沛的體力，去和軍部領袖們糾纏美國的對華政策。羅斯福本人是海軍出身，這也可能使他不願意過分干預陸軍馬歇爾的工作，結果他只能間歇性地過問中國事務，這使得他的對華政策顯得雜亂無章，搖擺不定，時好時壞，缺乏一致性、連貫性和持久性。

至於軍部領袖，他們無疑對中美關係的緊張要負一定的責任。但他們缺乏像項貝克那樣的敏銳觀察和政治智慧，不能真正了解他們自己行爲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習慣性地從純軍事專業角度去看問題，並且希望以最小的物資投入去維持中國繼續作戰的局面。一旦他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縱使作戰不力，但也不至於停止抗戰或是投降，那他們基本上就感到安心了。更何況，就連軍部本身駐華的最高代表馬格魯德將軍也已經作出了判斷，那就是即使美國把更多武器運送到中國，中國也早已秘密決定不再努力作戰，運送更多的武器到中國，只是幫助蔣介石統治集團偷偷地囤積軍火，以準備未來的內戰而已。對美國而言，這顯然是純屬浪費之舉。

正當此時，中美兩國有了一個新的機會去檢討當前形勢，並作出選擇：到底它們是想努力加強軍事合作，或是照老路走下去並忍受無休無止的煩惱和摩擦？這個機會就是，中國政府提出邀請美國派遣一位高級軍官出任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設若兩國政府都能謹慎處理這項任命工作的話，它可能給中美關係帶來新氣象，打造一個更平穩而理性的合作基礎。

158 Ibid.

# 第二章
# 派一位美國將軍到中國戰場

## 壹、蔣介石邀請美國派軍官擔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

珍珠港事變不久，蔣介石就決定邀請美國選送一名高階級軍官，到中國戰區統帥部內，以聯軍參謀長身分，協調各同盟國派駐在中國戰區的軍隊。如所周知，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將軍最後獲得此項任命。一般英文著作對於遴選過程多半匆匆帶過，因爲它們認爲中美同盟關係，要等到史迪威就職以後才真正開始。但是事實上，遴選過程相當曲折，也有其長遠的重要性。因此，本章所要討論的重點是：蔣介石提出邀請的動機是什麼？他心目中理想人選的條件是什麼？他準備如何運用這位美國軍官的才能？美國政府的反應和它決定人選的過程及考量又是什麼？以上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會影響到史迪威在華工作的成功機率，和此後幾年內中美軍事合作發展的道路。

### 一、蔣介石提出邀請的動機

蔣介石邀請的動機其實相當單純。由於他預期各同盟國軍隊將在中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活動，因此希望有一位美國軍官出任聯軍在華作戰指揮系統中的參謀長。在他初期表達這項意願的同時，他也已經內定熊式輝作爲中方的副參謀長[1]。等到羅斯福和邱吉爾成立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並成立中緬印戰區和中國戰區時，同盟國之間的協調需要就更爲明顯。這兩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事情，促使蔣介石很快地向羅斯福提出邀請(1942年1月4日)，選派一名美國高級軍官擔任他的聯軍參謀長一職。這個看似單純的舉動，在後來卻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複雜後果。

1 熊式輝，《海桑集》，第5a冊，頁4-5。

首先是中國戰區的成立，是由英美兩國提議而由中國政府同意。由於事出倉促，同盟各國都沒有給予周全考慮，而且戰區的地位和含義也沒有經過嚴格界定。中國戰區應該是一個獨立戰區，而蔣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國戰區的設立，可能也正因爲他想藉此避免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干預。當然，假如羅斯福和邱吉爾可以讓中國代表以平等地位參加聯席會議的話，則中國戰區應該最終被納入同盟國全球指揮系統之內才對。但是這一個曖昧不明的關係，在此後數年中一直成爲盟邦間摩擦的導因。其次是戰區統帥的身分問題。因爲即使在蔣介石接受了中國戰區的設置後，他仍可以指派另外一個中國軍人出任中國戰區總司令官，但是這個想法在中國政府內部從未被討論過。其結果是，在英美兩國所控制的範圍內，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最高政治領袖，而另派軍人主管各戰區事務。但是在中國戰區內，蔣介石既是最高政治領袖，又是最高軍事領袖。這個安排對於熟悉蔣介石個性和中國政軍情勢的人們而言，絲毫不奇怪。但是它最明顯的不良後果，是讓蔣介石在後來與本戰區聯軍參謀長（史迪威）之間喪失了一個緩衝區。由於蔣介石自兼戰區總司令，因此他無法避免和聯軍參謀長之間的短兵相接，進而衝突不斷。這些問題都是當初不曾預料到的。

## 二、對人選品質的要求

蔣介石在向美方致送邀請函時，特別希望被任命的軍官具有良好的人品及判斷力，對工作有熱誠和高度投入。同時宋子文也向軍部次長麥克洛（John J. McCloy）指出，蔣介石並不指望這個軍官必須具備有關遠東的專長。恰恰相反，他認爲一個美國軍人，如果太熟悉中國在軍閥時期的軍隊的話，反而會不利於工作展開，因爲他可能會把當前中國軍隊和軍閥時期軍隊混爲一談。正如蔣介石在致宋子文電報中所說：「至參謀長人選，不必熟悉東方舊情者，只要其有品學與熱心者可也。」[2]

蔣介石最後所說的這幾句話，後來被西方史學界一再引用，目的在證明，蔣介石從中美同盟關係一開始就存心不良，打算利用這個軍官的誠實可欺，以便向美國政府掩藏中國政治和軍事領域內，眾多不可告人的弱點和劣跡[3]。這個說法的含義是：假如蔣介石在結盟之初，就如此處心積慮地想欺騙美國盟友的話，那麼這個同盟關係早

2 Soong memo to Mr. John J.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January 6, 1942, in Verifax File 2817, Item 2625, Marshall Foundation Archives（MFA）.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99。

3 For Michael Schaller's analysis, see: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pp. 93-94. For a similar view, see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p. 311.

已注定失敗命運。史學界一旦接受這個先入之見，接下來的工作就是把許多孤立事件串聯起來，放進這個分析框架之內，用以證明蔣介石在後來歲月中，對盟邦是如何缺乏誠意。

可惜的是，大多數作者多年來一直停留在對蔣介石思維的臆度上，而沒有花工夫去搜集證據來支持這個說法。恰恰相反，現有的資料似乎更能夠提出幾種含義相反而又言之成理的解釋。

首先，如果不要求這位軍官必須具有中國或遠東知識背景的話，那麼馬上就可以在美國陸軍中大幅擴大遴選的範圍。依照蔣介石最初想法，聯軍參謀長的首要條件是職業素養和人品。而軍部對於這個說法的最初回應也是視爲理所當然。後來等到美國政府逐漸把新任務加到這個軍官身上而釀成衝突時，蔣介石原先所提的簡單條件，才慢慢地被解讀成爲似乎暗藏玄機，甚至包藏禍心。其實這未必是蔣介石的本意，但卻肯定是他人自以爲得意的「後見之明」。不少作者似乎忘記了一個重點，那就是兩國政府是在處理兩個性質不同的職位，蔣介石原先邀請的對象只是協助他（蔣介石）處理軍事的參謀長，而美國軍部後來想要任命的卻是美國政府在華利益的代理人（美其名稱為參謀長）。所以兩者選人標準根本不同。更何況，蔣介石的邀請在時間上要比軍部的決定早好幾周。

其次，在蔣介石個人經驗中，那些在1920-1930年代曾經獲得他最高度欽佩的蘇聯和德國軍事顧問，沒有一位在到任之前對中國事務具有深度了解。他們所以能夠對中國軍事現代化作出貢獻，主要原因正是他們具有蔣介石當年最重視的其他優點——判斷力、人品、熱誠和全心全意的投入。或許這些品質正是他從這些外國顧問身上得來的啓示，然後據以期望美國政府能夠派遣同類型的軍官來華服務。蔣介石對德國顧問非常器重，寧可觸怒希特勒(Adolf Hitler)政府，也要千方百計挽留他們在華服務。相形之下，到那時爲止，唯一被蔣介石器重的美國軍人則是陳納德。而陳納德在到達中國之前，對於中國事務可說是茫無所知。因此我們很容易了解，爲什麼蔣介石希望軍部在物色人選時，能夠把求才的網子撒大一點，從而找到和這些外國顧問同等優秀的軍官，而無需拘泥於他們有無所謂東方知識這一點上。

第三，蔣介石可能和其他許多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內心極度厭惡外國人中所謂的「中國通」。當年西方國家人民或許難以想像的是，有許多中國領袖，甚至包括所謂「親美人士」在內，都非常不滿某些「中國通」對中國人的態度。儘管這些態度正是租界內的中國人，用打躬作揖和奉承阿諛所培養出來的，但這些中國領袖，對西方人表現出來的種族優越感，和他們自以爲對中國事務那股「心知肚明」的神氣，感到

無法忍受。這些西方人住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下的租界，被一群專門侍候「洋大人」的本地人(僕人、阿媽、車夫、跑腿、買辦)捧著，常常不自覺地養成一種態度和習慣，又把這些習慣用在和廣大中國人民交往之上。某些中國人急於討好外國人，輕易恭維外國人是中國通，其含義是這些外國人絕頂聰明，對中國事務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而某些外國人心安理得地接受中國通的稱號，其含義則是中國重要的事務並無深奧複雜之處，個中道理盡在他們掌握之中，而其他社會現象都只不過是淺薄的中國人的庸人自擾，不值得浪費外國人寶貴精力去了解。這種現象，只能使廣大中國人民剛被喚起的民族意識變得更加尖銳起來。更糟糕的是還有另外一小群外國軍人，他們的行爲更粗暴，素養更低劣，氣焰更高張，被中國人稱爲「洋軍油子」或是「洋營混子」[4]。

尤爲不幸的是，正在這個當口，蔣介石和馬格魯德不愉快的相處，可能又重新挑起他的警惕。因爲馬格魯德正符合中國人心目中典型的「中國通」。雖然他從來沒有把中文學好，他卻曾經在1920年代在北京擔任過美國駐華武官[5]。馬格魯德急於抓權的事件，正好發生在蔣介石向美國軍部邀請派送一位高級軍官來華任職的前夕。蔣介石在向羅斯福提出邀請時，心中或許有一個沒有說出口的動機，那就是不要由馬格魯德或是與他類似的軍官來擔任這一職務，他想要的是一位和馬格魯德背景截然不同的「職業軍人」[6]，既不熱衷政治，也不渴望權力。當蔣介石訓令宋子文向軍部提出人選條件時，他心中很可能已經把馬格魯德當成負面人選了。

第四，蔣介石和許多其他中國領袖一樣，不但擔心美國的假專家跑到中國來冒充真專家，也擔心那些不對口的真專家會帶來災害。在這方面，蔣介石的失望情緒很可能受到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影響。拉鐵摩爾的「中國事務專家」身分是經過羅斯福總統親自鑑定的，但蔣介石不久就發現此人名不副實。拉鐵摩爾的名望完全建立在他對中國歷史上邊疆民族的研究上，而他對華盛頓政壇則是門外漢，毫無影響力。拉鐵摩爾提供了一個生動的案例，那就是，中國本來是請美國總統找一位熟知中國事務的人作顧問，結果卻得到了一位自承不諳當代中國事務的人。假如連白宮都能把事情弄得這麼糟，那麼蔣介石實在沒有理由相信軍部派出的「中國專家」會好到哪兒去。因此，蔣介石的真正意圖，大概只是採取一些防範於未然的措施，讓軍部不要拘泥於

4 陳光甫對於這些現象的感受特別深刻，還在私下用英文寫了一篇短文，對於在華的英美人士作了一番心理分析。見："My Reflections on Chinese attitude toward Britain", February 1, 1945, 8 pages. K.P. Chen Personal Papers, Group B, Box 8, in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

5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1.

6 JWS t-w diaries, January 22, 1942.

所謂的「專家」，再送一個冒牌貨來作他的聯軍參謀長。

## 三、對職務的界定

綜上所言，中國資料顯示，蔣介石最初的意向只不過是要一位美國軍官作他個人的聯軍參謀長。其意義和以前的蘇聯或德國顧問相似，唯一差別是中美兩國已經結成盟邦，因此在安排上給予正式職位而已。事實上，蔣介石要求美國同時選送兩位軍官來華，一位是陸軍軍官，作聯軍參謀長；另一位是陸軍航空隊軍官，前來主持中國的空軍事務[7]。對蔣介石而言，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大概是，參謀長的任務主要是依照從前德國法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模式，在重慶軍事總部主持行政工作和擬訂戰略計畫；而空軍軍官則是有正式軍籍，地位超過陳納德，可能獲得美國政府授權幫助中國建立空軍並指揮實際作戰。

雖然美國的答覆(1942年1月15日)只是針對聯軍參謀長一職作出回應，但它引進了一個新的課題，那就是指揮權。美國人所以提出這個要求，表面的理由是，在不久的將來，中、英、美三國都將有相當數量的軍隊在緬甸戰區作戰，因此需要一位軍官擔任總指揮[8]。但即便在此時，美國心目中的這位軍官，其主要任務仍然是聯軍參謀長，指揮權問題只不過是附帶提到而已。

## 貳、美國最初的反應：莊穆將軍的遴選過程

美國軍部很快就屬意莊穆(Hugh A. Drum)將軍，以其爲首要人選。遺憾的是，在討論中美軍事同盟關係史的著作中，極少有人對莊穆將軍的候選過程給予重視[9]。最明顯的理由是，既然莊穆將軍的候選在短期內就以失敗告終，因此無需多費筆墨。

但是這些著作或許沒有體會到的是，雖然莊穆將軍的候選人身分只維持了短暫時間，但他卻爲美國決策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去釐清一些基本問題。比如說：美

7 Letter from Soong to Mr. John J.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January 6, 1942. Verifax File 2817, Item 2625, MFA.

8 Memo from John J.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to Soong, January 15, 1942.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Also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56.

9 For a factual account,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63-70. For other approaches of treating General Drum's candidacy, compare Theodore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Barbara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chapter 10; and Schaller's work.

國是否願意作出承諾以支持這位軍官完成其在中國戰區的任務？基於這些考慮，儘管莊穆的候選人身分前後僅僅維持了幾天而已，本章仍將提供相當篇幅加以討論，目的在幫助讀者對以後的盟邦關係發展得到一個更好的了解，並填補以往史學界留下的空白。

## 一、莊穆將軍之入選

美國(陸)軍部史汀生(Henry Stimson)部長最初屬意莊穆將軍的理由，是因爲他是當時美軍最有作戰經驗而又表現傑出的軍官[10]。莊穆軍人生涯中一個顯著特色是，他並不具備中國或亞洲背景。他的入圍間接證明了，軍部最早物色人選時，也只重視候選人的專業條件，而不拘泥他是否具備中國背景。在這一點上，軍部領袖和蔣介石的看法可說高度吻合。再者，在此時期，史汀生部長打算賦予莊穆將軍的職務也相當單純。它們包括：協助美國軍部與中國戰區之間的溝通，代表美國參加在中國舉行的盟邦會議，並在戰區統帥蔣介石的指揮之下，協調在中國戰區組建盟邦軍隊[11]。

## 二、莊穆的對華方針

莊穆將軍獲知他的可能任務之後(1942年1月2日)，即刻把全副精力投入對新職的了解上。他多日努力後的成果是向史汀生部長呈交了一份長達9頁的報告[12]。這個報告的重點有二：1. 中國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2. 中國戰區需要多少美國援助才能有效地扮演這個角色？這兩個焦點可謂非常貼切。

### (一)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

莊穆認爲，中國的繼續抗日是同盟國贏得戰爭的必要先決條件，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也必須包括足夠的物資和行動，來維持中國的武裝力量。這些努力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中國的陸軍和空軍，以便對日本進行猛烈攻擊。

但是莊穆報告也毫不掩飾地批評了美軍當前對華態度的鬆軟無力。他的調查結果

---

10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of China*, pp. 63-64. For a different version, see Tuchman, p. 308, and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11.

11 Henry Stimson, Secretary of War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no date indicated but definitely early January 1942,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12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the Chief of Staff, January 5, 1942, Subject: Mission to China. From H. A. Drum, Lt. General, U.S. Army. Xerox File 2559, MFA. Also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64-70.

使他相信，美國現行的目標既模糊不清又搖擺不定。部分目標似乎沒有經過慎重考慮，也不能保證其是否能夠實現。假如說莊穆的這些評語已經像一盆冷水潑在史汀生和馬歇爾頭上的話(因為他們正是軍部對華政策的制訂人和執行者)，那麼莊穆接下來所說的話就更令他們難堪了。因爲他認爲，美國應該先理清自己的思路，擬訂出一些具體方案，爭取獲得英國和中國的合作，並且訂出明確的進度表來逐步推行這些方案。否則美國根本就不應該虛耗精力，派送一個代表團去中國。

莊穆對軍部作爲的具體批評更是淋漓盡致，毫不留情。

首先，他指出同盟國建立「中國戰區」毫無實質意義，只不過新瓶裝舊酒，旨在羈縻蔣介石而已。除非中國戰區能夠拿出真正的武力作戰，否則該戰區對贏得戰爭並無幫助。他同時表示，除非他本人能夠獲得充分授權，否則他到中國去也無法產生實際效果。因此莊穆建議大幅增加中國戰區和西南太平洋戰區及印度的合作，並向蔣介石提出保證，美國將會把美國軍隊及基地放在印度，盡一切努力向中國提供武器及空軍支援。

其次，莊穆認爲，在馬格魯德代表團之外，再派遣一個新的(或是擴大的)美國軍事代表團前往中國，並不能產生任何實質效應。他坦白指出，此時此地，唯有實際行動才能收到決定性效果。如果美國無法告知中國，它到底有什麼具體計畫要實現的話，就不應該去變動現狀。用他的話說：「不管現在或是將來，假如中國人懷疑我的派赴中國根本缺乏實質意義，那對美國將是一個重大損失。」

第三，他認爲美國軍部所提各種指望中國軍隊參加對日本決戰的方案都毫無意義。他特別指出，中國軍隊抵抗日本的先決條件，是美國承諾會向中國提供先進武器和空軍支援，同時盟邦也必須盡力保障緬甸通路的安全。

### (二)美國對華援助

那麼莊穆到底認爲美國對華的援助究竟應該達到何種程度？

莊穆的答案是：美國應該首先徵得英國和中國的同意，使中緬印戰區的各項盟邦計畫得以順利推行[13]。更重要的是，他認爲美國應該在印度的加爾各答(Calcutta)駐軍並建立基地，準備從事戰鬥，從印度向緬甸推進，最後進入中國。這些美國軍隊應該包括陸軍和空軍，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補給與維持中國戰區。

---

13 "Annex No. 1" to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the Chief of Staff, Stimson and Marshall, January 8, 1942, from H. A. Drum, Lt. General, U.S. Army. Subject: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Conception of the U.S. Effort to assist China. In Xerox File 2559, MFA.

由於莊穆認爲仰光港對於中國的抗戰至關重要，因此他極力主張美國必須在加爾各答地區集中大批物資及兵力向緬甸推進，目的就是爲了保護仰光港和經由緬甸陸上通往中國的運輸線路，使補給品通暢無阻地進入中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報告中，並不認爲使用中國軍隊防守緬甸一事可行。大概在他看來，裝備落後的中國軍隊根本無法完成此項任務。無怪乎他會認爲，軍部派他到中國去「組織中國軍隊從事抗日」的任務(而這正是史汀生和馬歇爾所偏愛的錦囊妙計，見後文馬歇爾與史迪威談話)，在當前情況下根本無法兌現，更何況美國軍部本身在這方面尚不曾作過任何籌備工作。

毫不意外地，莊穆這些看法讓他作出以下的嚴峻結論：「我堅決相信，如果在以上所討論的各項步驟尚未被採納前，美國政府就貿然派遣我去中國，這不但不能達到任何效果，反而會造成傷害。中國人會把它看成是虛應故事的善意姿態。因此，我去中國的派遣令應該暫時擱置，先把我們的計畫研究成熟，並取得各方同意，然後再議。」[14]這些話對軍部領袖無異是一記悶棍。

## 三、莊穆提名程序的突然終止

莊穆的提名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就爲美國政府提供了一個稀有的機會，可以檢討對華政策的一些關鍵性課題，不幸的是這個機會被忽視掉了。主要原因是莊穆的觀點給馬歇爾和史汀生兩人帶來了極大頭痛。對馬歇爾而言，莊穆的觀點和他自己的想法完全相左，馬歇爾在1月8-9日的會談中明確表示，他打算派送一個高規格的軍事代表團赴華，並想讓一個美國軍官去指揮所有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但他不準備讓美國作出任何明確承諾，將向中國戰區派送大量物資或人員，當然更不會爲了中國而去保衛緬甸路。對莊穆建議美國應該先爭取和英國及中國簽訂正式協議一事，馬歇爾更是表現得極不耐煩。他一心只想先派遣一些美國軍官到中國去，隨後無論發生何種情況，都由這些美國軍官去隨機應變，既無需事先規劃，更不要先自綁手腳。一旦馬歇爾發覺他和莊穆之間的會談不會得到任何結果時，他很快失去應有禮貌，隨即硬梆梆地拿出殺手鐧說，軍人應該永遠服從國家的命令，國家叫他們去哪裡，他們就必須去那裡。當莊穆對這種說法表示保留時，馬歇爾立刻宣布他反對莊穆的任命[15]。史汀生

14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and Chief of Staff, Subject: Mission to China, submitted by H. A. Drum, Lt. General, U.S. Army. January 5, 1942.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15 Ed Cray,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 and Statesman*, pp. 280-281; also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67-69.

跟著同意馬歇爾的判斷，認爲莊穆缺乏一個忠誠軍官應有的品質，那就是無條件地接受國家對他的命令[16]。

就這樣，莊穆拒絕接受軍部當時的主流思想，軍部領袖也因此立即中斷了他的提名程序。但是莊穆提名過程有它深刻的歷史意義。雖然它是一個不了了之的提名過程，但是它把當時美國軍部的思路和措施生動地描繪出來。特別是莊穆的報告和晉見馬歇爾對話的記錄，更能幫助我們預先摸出許多後來發生的歷史事件的脈絡。儘管莊穆提出的話題在此後三年不曾再被其他美國軍人提出(也說不定是不敢提出來以免惹火燒身)，但是事後的發展證明，他當時相當正確地預見了中美軍事關係中潛伏的重重矛盾，以及這些矛盾的深層根源所在。

## 叁、中美對派華軍官職稱內涵的談判

### 一、美國把職務範圍逐漸擴大化和複雜化的過程

#### (一)指揮權

就在軍部著手物色新人選的同時，它也開始擴大了中國原本對這個軍官職務的界定。當馬歇爾諮詢史迪威對這個職務成功率的把握時，史迪威的答覆是，只要他能得到指揮權，他就有把握把工作做好[17]。軍部次長麥克洛(John J. McCloy)即刻致函給宋子文(1月16日)轉達軍部新的立場，認爲在緬甸戰場，由於中英美三國軍隊將共同在一起作戰，因此最理想的安排是由一位美國軍官同時指揮這三個國家的軍隊[18]。宋子文爲了慎重起見，在1月18日特別把信件譯本和原文全文轉呈給蔣介石，讓後者可以完全了解美國的意圖[19]。

次日，宋子文又把史汀生部長本人寫的一件備忘錄轉呈給蔣介石。依照史汀生的說法，美國軍官的權力應該是在蔣介石的授權下，指揮所有託付給他的中美兩國軍隊[20]。針對史汀生的備忘錄，宋子文自己也致信蔣介石作出解釋，他說把指揮權交給

16 Henry Stimson's Diaries, January 13, 1942, as quoted in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p. 529-530.

1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 diary entries of January 16, 22, 1942, pp. 33-34. Also in JWS t-w diaries, same days.

18 Letter from McCloy to Soong, January 15, 1942. Verifax File 2819, Item 2625, MFA.

19 英文的 "executive power" 被直譯為「行政實權」。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104。

2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110。

美國軍官，純粹是爲了避免中英兩國在緬甸戰爭中產生摩擦，同時也是爲了防止英國要求直接指揮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此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授給美國軍官一事只適用於緬甸，而不適用於其他國家，如越南或泰國[21]。

蔣介石對美國這個節外生枝的要求的立即反應是異常不快。不過他不願意在同盟締結之初就正面提出反對，更何況他也急於參加緬甸保衛戰。他的對策是隱忍不發，只針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不愉快防範於未然。因此聲明，這位美國軍官在行使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的職務時，可以有權「聯繫」緬甸的中英美各國軍隊，但他必須是隸屬於中國戰區指揮系統的一分子[22]。換言之，蔣介石採用「聯繫」一詞，來沖淡「指揮」的意思。他同時還說明，這個美國軍官之所以能夠獲得這項權力，完全是因爲他是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因此當然必須服從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採取的立場並不難理解。美國政府的信件並沒有指明中國軍隊需要美國指揮官來領導，也沒有聲稱美國軍官一定會比中國軍官更善於指揮中國軍隊。相反地，美國政府只是用了一個巧妙的藉口來處理一個敏感的問題。美國的說法是：鑒於大批的中英美軍隊可能會在緬甸這麼一個狹小戰區內作戰，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但是鑒於中英兩國之間互相憎恨，它們任何一方都無法接受對方軍官作爲它們部隊的指揮官。因此折中辦法就是讓美國軍官擔任指揮官。在本書所參考的中文資料中，找不到任何線索可以顯示，當時蔣介石或其他任何中國領袖曾經想過，這位美國軍官只是指揮中國軍隊而不能指揮英國軍隊。中國當時的假設是，緬甸會成爲一個真正的國際戰場，由三個盟邦通力合作，各自貢獻數量大致相當的兵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把軍隊交由美國軍官指揮以增強合作，也顯得合情合理。中國人也許還作了更進一步假設，那就是，如果美國政府不打算派送相當數量的美國兵力到緬甸戰場的話，他們也絕對不敢如此大模大樣地要求指揮中國軍隊。

儘管如此，蔣介石依然採取了更周密的防範措施，以避免發生意外。比如說，他明確表示，這個美國指揮官的指揮權必須處於他聯軍參謀長的位置之下，而聯軍參謀長又必須處於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下，而統帥又正是蔣介石本人。有了這些層層布置，蔣介石大致以爲不會出任何差錯。

在中國當時的政治軍事常規下，蔣介石儘管可能讓別人在名義上有權，但事實上他一直擁有關於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蔣介石個人的政治生涯充分說明，在他的心目中，他已經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他個人的權力建立了層層的保護。蔣介石沒有料想

---

21 同上，頁109-111。

22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21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1月21日。

到，緬甸根本沒有出現三國合作的局面，美國人完全沒有出兵的意願，而英國人不僅拒絕把指揮權交給美國人，甚至還想和美國人爭取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簡而言之，在指揮權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國領袖的思路可謂背道而馳。美國領袖充滿信心地以爲中國軍隊急需美國人的軍事領導，也會敞懷歡迎美國人領導，因爲美國軍官絕對比中國軍官更具專業水平和領導才能。有趣的是，美國領袖們似乎毫未察覺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或是蔣介石的個人自尊心有多強烈，更完全沒有體會到這個安排會如何讓蔣介石在部屬或是政敵面前顏面盡失。蔣介石早先拒絕摩根韜(羅斯福)所提以美金支付中國士兵薪餉一事，似乎並未引起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產生更深一層的了解，或許反而讓他們更堅決地想用盡其他方法，來取得對中國軍隊的控制權。附帶提一句，美國對中國指揮權的要求，和它在其他戰區處理盟邦軍事合作關係的做法大不相同。在處理英美聯合軍事行動時，兩國之間的基本約定是由出兵較多的國家行使指揮權，但必須獲得另外一個國家的同意。但是對中國而言，美國人並沒有出兵，卻不遺餘力地想抓指揮權。如果美國人指望他們這種差別待遇不會引起中國反感的話，那也未免太會打如意算盤，並把中國領袖們當成是麻木不仁了。

### (二)不斷膨脹的職務內容

在挑選史迪威的過程中，指揮權問題剛提出還不到三天，美國軍方又陸續擴大派華將領的職權。首先，史汀生通知宋子文(1月19日)，美國政府準備同時任命史迪威爲美國陸軍自己的駐華代表，並行使以下的權力：1. 主導與美國對華租借法案有關的一切事務；2. 指揮所有駐華美軍，並且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指揮中國託付的軍隊。假如這些軍隊赴緬甸作戰的話，則它們的作戰計畫需要衛佛爾批准，但它們的戰鬥行動仍只受美國軍官指揮；3. 代表美國參加所有在中國境內舉行的國際軍事會議；4. 維持並管理經由緬甸到雲南路線運送到中國或已經在中國境內的租借法案物資[23]。

很顯然地，史汀生的新安排大有問題。蔣介石當初邀請的只是一位作爲「他個人」聯軍參謀長的美國軍官。現在美國人卻要這個軍官同時兼作「美國軍隊的」駐華代表，並給予許多新權力和責任。這樣做的結果是這位美國軍官在中國戰區的職責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內在衝突。聯軍參謀長是由蔣介石任命，並需絕對服從他個人的命令，任務是去協調中國戰區內盟邦之間的合作，而接受美國政府指派代表的使命則是要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史汀生這種安排明顯違反了常理，有思路錯亂的問題，難怪蔣介石感到緊張，並立即要求澄清。

---

2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109-111。

蔣介石在1942年1月22日致宋子文電文中，首先對美國提名史迪威擔任聯軍參謀長一事表示歡迎，但馬上表達看法：這個美國「代表」必須接受聯軍參謀長的指揮，而聯軍參謀長又必須接受中國戰區聯軍最高統帥的指揮。蔣介石表示，只要雙方都遵守這個基本原則，則其他事務就容易處理了[24]。

史汀生在給宋子文的覆電中(1942年1月23日)中寫道：

> 軍部完全同意：美國駐華的首席代表應該是高階軍官，他的高級副手之一應該是陸軍航空隊的將級軍官。後者的任務之一是指揮美國駐華空軍，協助中國組織訓練中國空軍，並在中國戰區總司令部主持空軍作戰事務。假如這位美國指揮官要想有效地執行他的聯軍參謀長一職的話，他不但必須善於組織他的部下，並且他自己不致因為工作需要而長期離開重慶。特別是，他還應該有另一位將官階級的軍官作為他的主要副手。通過這兩位副手的協助，他便可以對在緬甸或其他地區的軍隊行使「行政權」，但是他本人並不需要牽涉進這些事務，以致妨礙到他履行對委員長的密切而特殊的責任[25]。

史汀生接著說，「依我方看來，以上所建議的這些安排，似乎與委員長所表達的意見完全相符合。但是我方仍然希望在這些方案實施之前，得到貴方的首肯。」[26]

史汀生好像是說，即便這位美國軍官會對在緬甸或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有行政權，但是他本人還是會隨侍蔣介石左右，而不會被這些事務所羈絆，以致妨害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合作，因爲實際行政權還將會交由他的高級副手去行使。正因爲史汀生似乎只是在用英文簡潔描述蔣介石最心儀的「法根豪森模式」，所以蔣介石對史汀生的說法並未產生過多的疑竇。

不過史汀生的信其實還是玩了一個文字遊戲，那就是以輕描淡寫的筆觸，讓他自己從原先所持的立場開始抽身退縮。1月15日軍部次長麥克洛請宋子文轉呈蔣介石的備忘錄中，還提到未來緬甸戰爭中會有中英美三國軍隊參加，而現在史汀生只談到「結合中美的共同努力」，和「協調在緬甸的英軍」。所以如此，是因爲英國人只同意，

---

24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1月22日，《戰時外交》(三)，頁114。

25 Letter from Stimson to Soong, January 23,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26 Stimson letter to Soong, January 23, 1942. Verifax File 2820, MFA.

承認這位美國軍官爲中國戰區與他們西南太平洋戰區之間的主要「協調人」（聯絡官）[27]。既然美國政府原來談的「美國軍隊」，現在已經改頭換面地變成「美國的努力」，而原來以爲這位美國軍官和英國軍隊的關係是一個上級指揮部隊的領導關係，也變形成爲「聯絡」的關係，結果則是原來美國政府向中國推銷的安排中，三分之二的實質內容都在不聲不響中消失不見了。以當時中國領袖們對美國人的信任程度而言，他們如果沒有看出這些字裡行間的玄機，並不奇怪。

同一天（1月23日），宋子文致函史汀生表示同意其來信內容，並稱：「謹代表我的政府向閣下表示，您信件中所作的建議與委員長的意見完全相符。我相信有關派遣美國司令官和他的助手們赴華的具體計畫，可以開始進行。我認爲這位美國軍官作爲委員長聯軍參謀長，……但毫無疑問當然應該接受委員長的指揮。」[28]

在此信中，宋子文加倍小心地再三重複一個重點，那就是：史迪威必須接受蔣介石的指揮。

一旦把這一個重點反覆說清楚之後，宋子文也告知史汀生，關於如何安排緬甸戰區的英軍指揮權一事，中方認爲應該由英美雙方去直接解決，這和美國人在該地指揮中國軍隊是兩件不同的事。同一天，宋子文也向蔣介石保證，這個美國軍官既統率中國戰區的全部美軍，也是中國戰區所有聯軍的參謀長，並需服從最高統帥[29]。

美國軍部對蔣介石1942年1月21日信件的正式覆文，是由軍部次長麥克洛（McCloy）於1942年1月23日交送宋子文。此信內容和史汀生同一天給宋子文的信相同[30]。經過這一道官方手續，麥克洛再度確認了史汀生說過的話，即這位美國將領大部分時間不應該用在操心緬甸事務，而是應該留在重慶和蔣介石密切合作。但是在本書隨後幾章中將會顯示，史迪威抵達中國以後，實際情況的演變將完全偏離此項承諾。

## 二、中美兩國所強調的重點大相徑庭

在中美雙方就聯軍參謀長職權磋商的過程中，兩國之間來往信件中所表達的重點大相徑庭。中方再三強調這位美國軍官必須接受委員長的命令，美方則對此項堅持從不正面予以辯駁，但也避免用完全相同的字眼去重述中方的意見。這個差別應該如何解釋？

---

27 Ibid.

28 Soong letter to Stimson, January 23, 1942. Verifax File 2820, MFA.

29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114-15。

30 Message from John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to Soong, January 23, 1942. Xerox File 2559, MFA.

一個合理的說法是，美國人當時完全同意中方在這一問題上所表述的立場，因此認爲無需多費筆墨去逐字逐句地重複，於是轉而把注意力放在他們對該職務新加上去的職權上。在這個意義上，中美雙方此時的觀點可以說是一致。換句話說，不管哪一方當時都沒有能力預見幾個月後引爆出來的大麻煩。但是等到大麻煩一旦爆發之後，美國軍方立即對雙方來往信件的文字進行細緻過濾，期能找到新證據去支持他們的論點，甚至指責宋子文涉嫌對蔣介石故意隱瞞他自己對軍部所作過的承諾，不過此一指控並無事實根據。

另外一個解釋是，美國軍部參謀人員粗心大意，根本沒有注意到中方一再強調的，戰區最高統帥和他的聯軍參謀長之間應有的關係。而軍部領袖又把全副精力放在他們在原有的職務基礎上另外附加上去的許多新職權，以致也沒有把相關問題考慮透徹。我們應該還記得，蔣介石曾經告訴馬格魯德說，他希望和美國締結一個正式的協定，把有關盟邦間的關係考慮清楚後以文字界定。但是美國政府對這個建議毫無興趣，置之不理。依此類推，美國軍部可能又是以同樣漫不經心的態度，不願意花費精神去規定盟邦間軍事合作的細節。

在這方面，美國財政部和軍部在處理對華事務上，明顯有不同作風。總的來說，當雙方關係牽涉到美國政府的金錢資源時，財政部堅持必須把最嚴謹的條文寫入正式協定，並由雙方簽字始能生效。但當牽涉到中國的軍隊時，軍部就只願意達成最模糊的諒解，而且堅決反對把它們形成文字。在同樣一個美國聯邦政府中，兩個部級單位會出現如此截然不同的作業程序，其實並不表示美國政府犯了精神分裂病症，而是它的行事作風非常一致。說白了，當資源是由美國提供時（貸款），他們堅持嚴格的掌控，絲毫不容含混。當資源是由中國提供時（軍隊），他們希望爭取到最寬鬆的授權，讓美國可以自由運用，不會遭到條文的拘束。

第三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美國領袖自始就沒有把中國的要求當一回事，只是希望暫時蒙混過去，以期盡快把一個美國高級軍官安置到中國戰區的指揮系統裡，讓他伺機擴張美國的影響力。如果這種情形屬實的話，那麼美國就不願意過早透露它對蔣介石邀請的不同意見，以免打草驚蛇，進而阻擋美國想在中國戰區擴展影響力的機會。反之，如果美國暫時對蔣介石的立場保持緘默，就可以使情況繼續向前推進，使同盟關係得以馬上建立，以後再爭取機會取消或改變與蔣介石約定的安排。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拒絕簽訂任何協議就是一個老謀深算的行爲，以免將來綁住了自己的手腳。

當然還有最後一個解釋，那就是美國軍方領袖們對自己信心十足，認爲能夠隨意操控中國政府，以致他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粗枝大葉式的安排會產生紕漏。儘管中

國人已經再三說明了他們的立場，但是美國軍方就是聽而不聞。相反地，他們認定中國人會毫無怨言地順應他們的指示行事。

以上提出的解釋中究竟哪一個最接近史實，或許要等到研究者能對美國檔案作更深入的研究之後，才能獲得確切答案。不容置疑的卻是，如果美國政府想要避免可能發生的職位重疊或權力衝突的話，它最簡便的處理方式就是同時任命兩位高級軍官：一位是回應蔣介石的邀請擔任他的聯軍參謀長，另一位是擔任美國自己派駐中國戰區的常任軍事代表。設若美國當時採取此項措施，那麼這兩位軍官之間的權責就會非常分明。這種做法對美國而言，唯一的代價是要多選派一位將官級軍官而已。當然，假如美國政府果真選擇這種安排的話，它完全有權選擇自己最屬意的軍官作爲代表，無論該員是不是「中國通」，它都可以不必顧慮蔣介石的意見。

不幸的是，軍部從來沒有考慮這個方案。而它採取的卻是一個最不合理而又最可能出差錯的方案。更進一步說，如果軍部真正只想派送一位「美國代表」赴華的話，它大可以婉拒蔣介石對聯軍參謀長的邀請。證諸軍部以後毫不含糊地拒絕了中國一大堆要求的實例，它只要決定這麼做，便有足夠的能力找出各種理由去拒絕蔣介石，同時也不必擔心是否會得罪蔣介石。令人不解的是，儘管蔣介石屢次聲明聯軍參謀長必須接受他的命令，而軍部居然沒有能力預見到以後會發生的麻煩。歸根結柢，軍部採用了一個最糊塗的安排，迫使這位美國軍官不斷地在面臨選擇效忠對象時，落入左右爲難的困境，同時還導致同盟關係惡化。只能說這種組織安排是一個敗筆。

至於中國人方面，一旦他們認爲美國人已經完全同意，讓這位美國軍官擔任蔣介石的聯軍參謀長並且接受其命令時，宋子文便在1月30日致史汀生函中，肯定這位軍官作爲「美國陸軍駐華代表」等其他的職權[31]。道理非常簡單：因爲從中國的立場來看，宋子文致史汀生電文的目的，只不過是表示「知道」美國政府已準備把何種工作交給它的駐華代表去做。這本來就是美國政府內部事務，屬於其權力範圍內，無需尋求中國許可。但是美國既然把這個行動通知中國，它的出發點應屬禮貌上的「通知」而已。就中國人而言，他們真正關心的是，這位美國軍官必須是不折不扣的蔣介石聯軍參謀長，即使他具有美國軍事代表的身分，也仍然是聯軍參謀長的下屬，而聯軍參謀長本人又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下屬。換句話說，不管史迪威有何種職務或權力，只要他在中國戰區服務，他就是蔣介石的部下。這一點才是中國人強調的重點。至於他的美國政府身分，只需由美國政府單方決定。中國政府最多只能在禮貌上表示「認

31 Soong letter to Henry Stimson, Secretary of War, January 30, 1942,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知」，既無權「批准」，也不宜協商。

宋子文1月30日的電文，使史迪威得以帶著雙重身分來到中國戰區[32]。然而就在史迪威抵達中國之初，事情的發展就已顯示，中美雙方政府都過於低估了它們的安排所能帶來的災害。誠然，中國政府至少要擔負部分責任，那就是它沒有及時發現美國方案的根本的缺點，以爲美國人真會尊重蔣介石有權命令他的聯軍參謀長。爲此，中國最後還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 肆、史迪威獲得新任命

### 一、史迪威的入選

其實早在1942年1月1日，馬歇爾就已經首度試探史迪威赴遠東工作的意願。但是由於史汀生部長當時對史迪威印象不佳，因此挑選了莊穆[33]。等到莊穆任命觸礁後，軍部又曾經考慮過另外三位將領，但均無結果。馬歇爾於是說服史汀生部長再給史迪威一次機會。史汀生在1月14日面談時，對史廸威印象大爲改善，並且告訴史迪威說，中國會接受一位美國軍人去指揮中國軍隊。當史汀生問起史迪威對這份工作的意願時，史迪威的答覆是：「我會接受政府的派遣，去任何的地方。」不用說，史汀生對這個回答完全滿意[34]。

從軍人角度來看，史迪威毫無疑問給了一個完全正確的回答，特別重要的是這個回答恰得其時。因爲就在一天之前，莊穆表示了不願意貿然去中國，以致讓史汀生大感「失望」。這個事件令人不免聯想到一個相關而又有趣的問題，那就是：史迪威的回答到底是發自肺腑的真心話，還是他在得知莊穆所犯的技術錯誤後故意作出的精心設計？真相如何，恐怕見仁見智了。

無論如何，莊穆花費了十多天的潛心研究和深思熟慮(包括會議、討論、研究和寫報告)所形成的結論，卻被自己不識時務的立場徹底摧毀了他膺選新職的機會。相對之下，史迪威只花了30分鐘和史汀生聊天，就得到後者熱心支持。正如史汀生事後對這次會面的生動描述一樣，在半小時之內，史迪威向他報告了有關中國軍隊能夠英勇作戰的親身經歷，內容遠比他以前接到過的任何報告都要樂觀，令他振奮不已。更讓

32 Letter from the Adjutant General, War Department to General Stilwell, February 6,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56.

3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27-32. JWS t-w diaries, January 16, 1942.

34 Stilwell's Black Book, no. 1, entry of January 14,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史汀生感到鼓舞的是，史迪威向他保證，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美國而是在中國。史迪威還說，史汀生對華政策成功與否的最關鍵因素，是蔣介石是否願意把中國軍隊指揮權交給美國人行使；若蔣介石能夠做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遠景就非常樂觀。這番話讓史汀生確信，他已經找到了一位得力的人選[35]。由於史汀生對華政策的基調歷來是「少付出，多回收」的投資作風，因此史迪威就變成了讓史汀生政策得以實現的最佳人選。由於在美國陸軍中只有史迪威擁有豐富的中國經驗，因此如果他能夠獲得中國軍隊指揮權的話，那他就能夠有效地調動中國資源，來完成美國所設定的目標。

相比之下，莊穆將軍不但針對美國對華政策提出了一連串讓人心煩的批判，而且還要求美國政府承諾提供資源去推展他的工作。難怪軍部領袖更樂意聽到史迪威的解決方案。再說，史迪威的行爲也符合理想的陸軍軍官的標準，那就是態度積極，服從命令，並且絕不向上級提一大堆令人頭痛的問題。從實質上來說，史廸威並不關切美國政府是否有一套有系統的政策，也不在意美國政府是否準備向中國提供明確的援助承諾，因爲對他來說，如果美國政府提不出援助的話，他仍舊可以到中國去督促中國人自己做出努力。正因爲史迪威不向自己的政府提出要求，因此他在中國的工作對美國而言是低代價和低支出的。與此同時，他對中國士兵的英勇和刻苦耐勞品質的稱讚，又勾引起史汀生無限遐想，認爲史迪威唯一的要求只是中國政府給與他指揮權來帶領這些士兵，讓他們從一群散兵游勇或是烏合之眾轉變成善戰之士。而這個要求對美國而言可謂惠而不費。難怪史汀生會以爲他終於找到一個對他和軍部都是最得力的助手了。這也說明爲什麼在史迪威後來和中國人發生許多衝突時，史汀生仍然堅決支持史迪威。事實上，只要史汀生和馬歇爾的對華方針一日不變，史迪威就是他們最可靠的執行人。其他任何一位美國軍官，大概都會對自己的政府提出更多要求。

1942年1月16日，馬歇爾召見史迪威長談。他明確告知史廸威，今後在中國的任務是協調各方，理順關係，維持緬甸路的通暢，「團結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權，讓中國人努力幹事。金錢不成問題」。史迪威聽後，躊躇滿志，認爲自己只要能夠掌握中國兵權，就可以做出一番大事業[36]。但是依照後來歷史演變所顯示(見本書下文)，馬歇爾在這幾句提綱挈領的話中，只有前半段他希望史迪威能夠在中國達成的任務是認真的，而後半段關於美國的部分(「金錢不成問題」)則只是空頭支票，因爲金錢和武器將成爲中

35 Henry Stimson's Diaries, January 14, 1942, as quoted in Stimson and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 530.

3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33-34. Also see: JWS t-w diaries, January 16, 1943.

美同盟關係中最大的問題。

至於蔣介石最關注的職務——聯軍參謀長——史迪威的態度則是漫不經心。在他看來，只要能夠獲得兵權，他也不介意付出必要的代價，那就是屈就蔣介石任命爲聯軍參謀長[37]。爲了獎賞史迪威的合作態度，馬歇爾決定推薦晉升他爲陸軍中將[38]。

## 二、史迪威的專業素養

還有兩個因素，對於史迪威將軍(1883年生)在中國的工作非常重要。一個是他對中國人民和語言的了解，另一個是他和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深厚的公誼私情。

關於第一個因素，史迪威在1942年之前曾經三度派駐中國，前後約十年之久。根據史迪威夫人的說法，史迪威在這些年裡，對中國人的心理獲得了深刻了解。也就是這個中國經驗，使他被譽爲美國陸軍中最了解中國的專家[39]。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史迪威先前在中國及後來在美國班寧堡的步兵學校(Fort Benning, Georgia)與馬歇爾數度共事，兩家配偶與子女也建立密切友情[40]。就是因爲這層關係，在1942-1944的三年中，每當中國和美國政府之間因史迪威而發生矛盾時，雙方官員都會把這個關係當成是重要考慮因素。

珍珠港事變發生當日，史迪威少將的職務是第三軍團指揮官，總部設在加州蒙特利(Monterey)城。事變發生後的第一個月，美國盛傳日本人可能會從西海岸打進美國本土，史迪威最操勞的工作就是防止這個謠言成爲事實[41]。在此期間，他也曾經短暫地被考慮爲帶領美軍赴北非作戰的指揮官，但因爲這項任務一直未能定案，因此他的任命也從未落實[42]。後來美國軍方想給中國人一個印象，宣稱史迪威是爲了幫助中國人，才放棄到北非出任戰地指揮官的機會，這是言過其實，只不過想藉此增加中國人對史迪威的感恩之情罷了。

仔細檢視史迪威1942年到中國之前的軍人生涯，有以下幾個引人注意之處。

首先，他毫無疑問是美國陸軍軍官中最了解中國當代軍事事務的人。當然，美國海軍和陸戰隊也各自有它們的中國專家，對中國事務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在中日開戰之前，史迪威已經嶄露了他的能力。他能和中國士兵打成一片，所以搜集了大

3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33.
38 JWS t-w diaries, January 16, 1942.
3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ix, 35.
40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70.
4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15-22.
42 Tuchman, pp. 296-316.

量的第一手有關地方軍隊(山西)的情報。中日開戰後，他又到各地訪問，和中國指揮官談話，與德國及蘇聯顧問保持接觸，建立和日本人互通消息的渠道，還對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活動(平型關)予以關注，並給予頗爲正面的評價。他對戰爭作了大量筆記，製作地圖，還針對日本在華的部隊情況寫成若干報告。總的來說，他所做的是一位典型的駐外武官的份內工作，而他向華盛頓軍部提出的情報，也漸漸使他被視爲美國陸軍裡最了解中國軍情的權威[43]。

然而史迪威在盛名之下也有他的弱點。軍部的上司便曾經數度申斥他的報告寫得糟糕，認爲他的某些活動缺乏周詳考慮，他的金錢花費太過浪費。軍部給他最大的侮辱，莫過於把一份美國海軍陸戰隊卡爾遜(Evans F. Carlson)上尉寫的報告交給他，並建議他用來作爲今後寫報告的範本，以提高寫作水平。更有甚者，軍部後來還指令他，在未得到軍部上司確切批示之前，不得離開任所或展開新活動[44]。軍部的指示語氣明顯是在訓斥。還有一個原因讓史迪威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工作期間的日子過得不愉快，那就是他和同事間的關係極差。史迪威經常對這些同事的動機疑神疑鬼，又鄙視他們的工作成績[45]，認爲他們全都是庸才。因此史迪威幾乎永遠採用尖酸刻薄的語調形容他的同僚。他的私人文檔在這個年代所留下的記錄，對他後來在戰時和中國同僚間發生的摩擦，等於作了一個伏筆。

第二，比起中國政府以前(1920-30年代)的外國顧問們，史迪威缺乏顯赫資歷，官階也不夠高。他在1942年以前從無實戰經歷，他所指揮過的部隊最大不超過一個美國陸軍軍團，而且還不是第一線作戰部隊。而蔣介石與許多中國將領，他們已經先後和日本人、共產黨及各類軍閥交過手，也閱歷過優秀的外國軍事專家。所以，史迪威是否具有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並非只憑美國人隨便吹噓就算數，還必須經過中國人親自驗證才能過關。

第三，從中國角度著眼，史迪威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戰區獲得這麼崇高的職位，關鍵在他是美國人，如此而已。中國人還記得，1942年以前蘇聯即使提供中國大量軍援，也從來沒有要求中國政府交出指揮權。但是美國人的作風恰巧相反；他們還沒有運送物資援助，就急不及待地先要求兵權。美國一旦決定了這種工作方針，就讓自己承擔

43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6, Career File, A-13, G-2 Reports.

44 Cables from Colonel E. R. W. McCabe,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to Colonel Stilwell, June 15, July 8, and August 20, 1938. All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6, Career File, A-13, 1938, G-2 Reports.

45 Stilwell hand-written notes on March 3, 1938,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Career File, A-13, 1938, G-2 Reports.

了推銷史迪威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極力稱讚他是中國真正需要的領導人才。美國人在索取中國兵權的過程中，隱隱約約地透露了一個信息，那就是由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肯定會比由中國軍官指揮更爲有效。但是當史迪威無法在短期內清楚證明這一點時，美國人不願意檢討自己原來的設想是否考慮欠周，就只好反過來挑剔中國人的冥頑不靈了(比如：蔣介石的不合作態度)。

第四，蔣介石向美國讓出指揮權一事，完全違反他本人過去的一貫做法。雖然這種讓步透露了他對美國的善意和信賴，但是也爲自己增添了許多壓力。因爲他必須向國內的政軍伙伴、部屬、甚至政敵們提供一個有力的說詞，爲什麼中國軍隊需要由外國人來指揮。特別是在一個全力動員民族主義去抵抗日本的大環境之下，中國政府在指揮權問題上所必須面對的風險和指責，只能讓它感到進退兩難。

## 伍、史迪威對中國的態度

### 一、史迪威對其使命最初的觀感

史迪威在得知蔣介石已同意他的任命後，立即在華盛頓展開一連串與有關人士的會商，爲新職務作出準備。他首先拜訪史汀生，史汀生給了他一個「像父輩一樣的談話」，樂觀預測他的任務將讓他大展鴻圖，並且答應盡個人一切努力來幫史迪威達成任務[46]。史迪威接著和馬歇爾會談，表示除指揮權之外，還需要掌控租借法案物資的全權，並要求承諾裝備30個中國師，在緬甸通路萬一淪陷而必須對華進行空中補給時，也要求對陳納德空軍可以全權指揮。馬歇爾籠統答應盡量支持史迪威，但是特別指出美國將不會派遣地面部隊赴華作戰。在史汀生和馬歇爾之外，史迪威還想得到羅斯福的指示，並於2月9日安排晉見。但是他只得到20分鐘會面時間，而羅斯福所說盡是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史迪威繼之拜會羅斯福顧問霍普金斯(Harry L. Hopkins)，霍普金斯基本重彈美國陸軍領袖的老調，那就是他肯定史迪威會得到指揮權：「其實，即便蔣介石把全中國的軍隊都交給你(史迪威)指揮，也不會令我驚訝。」[47]

從這些會談內容可以看出，馬歇爾和羅斯福交給史迪威的任務，和原來蔣介石所設想者，可謂相去甚遠。才不過幾天前，美國向中國拋出誘餌，表示要派遣軍隊赴中國或緬甸作戰，而此時卻被馬歇爾靜悄悄地收回去了。相反地，他們對史迪威派赴中

4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36-37.

47 JWS t-w diaries, February 9, 1942. Also: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79-80.

國的指示是，盡其所能而爲，但是美國政府並未承諾給他完成任務所必須的資源。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開始籌劃他的新使命。

首先，他給自己下定最重要的任務是抓指揮權。其實，最早動腦筋想拿到中國在緬甸軍隊指揮權的是史汀生部長。他在沒有和中國政府進行任何磋商的情況下，就一廂情願地以爲中國必定會順從他的想法。事實上，美國政府一旦開始考慮派送一位高級軍官赴華時，幾乎所有的領袖們(包括總統、霍普金斯、摩根韜、史汀生和馬歇爾)都不約而同地認爲，中國人必定會心甘情願地把政府軍指揮權雙手奉交給這位美國軍官。史迪威最初還將信將疑，但他很快就把兵權當成是他中國使命中的核心部分[48]。與此同時，他也接受馬歇爾的看法，認爲只要中國能夠更有效地運用本國資源，就幾乎可以完全滿足抗戰的需要[49]。換句話說，中國並不需要大量美援。

這種對指揮權的一往情深和全神貫注，使得史迪威幾乎沒有動機去深思與他職責攸關的其他事務。爭取指揮權變成美國軍方在華工作的最高優先。其他一切任務均將以此爲依歸，而且可以從緩計議。至於所謂的「聯軍參謀長」一職，則早被置諸腦後了[50]。

根據史迪威的信念，只要中國人能夠服從他的命令，他就有辦法解除緬甸的困境[51]。正如史汀生和馬歇爾一樣，史迪威也從來沒有反問過自己，爲什麼中國人會急於把軍隊交給美國人指揮？他應該如何指揮？指揮後果又將如何？

美國軍部高層的共同信念，反映了當時美國政府官員對中美同盟關係的一個普遍心態，即中國有大量的人(勞)力，而美國有優越的現代科技和領導才能。儘管兩國之間存在著種族、文化、歷史，乃至個人心理上的種種差異，但是彼此還是可以成爲好伙伴。事實上，美國領袖們對指揮權的全神貫注，居然使他們忘記告知前後兩位候選人，蔣介石最初只是邀請一位美國軍人擔任聯軍參謀長而已。等到後來終於把這個事實告訴他們時，也不過只是附帶提起而已[52]。令人納悶的是，何以這麼多聰明才智過人的美國軍政領袖們，會如此牢牢地盯住一個信念不放，而沒有想過，中國人可能會打心底痛恨這個主意，而且中國的政治軍事現實也無助於這個主意的實現。或許最可能的解釋就是，這種集體性的盲目只能來自美國人的種族心態，和他們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經

4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33.

49 *Ibid.*, p. 76.

50 See Stilwell's Black Book, no. 1, through out.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5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37-38.

5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70-71. 在1942年1月23日之前，莊穆將軍都不知道蔣介石已經同意任命一位美國軍官為他的參謀長。

驗，進而把中國人併入同類，只是現在把他們稱爲盟邦而已。美國領袖們以這樣輕率任意的心態對待中美同盟關係，也就注定將會招致無窮無盡的挫折。

其次，史迪威對中國事務的看法與莊穆將軍也截然相反。他甚至刻薄地批評後者只懂得裝腔作勢，而其本質卻是冥頑不靈[53]。早在1942年1月初，史迪威就已經幸災樂禍地預言，莊穆將軍對新工作必將難以勝任，原因是他需要依賴翻譯來慢悠悠地處理事務，又會瞻前顧後和過分講究自己的身分和體面[54]。等到史迪威讀到莊穆的書面報告時，他更忍不住冷嘲熱諷[55]。事實上，史迪威留下來的個人文檔充分顯示，他對莊穆的爲人和作爲候選人的資格，沒有說過一句厚道的話。

至於史迪威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則是微妙而又古怪。他在馬歇爾第一次鼓動他赴華任職時，在日記中如此回應：「想派我去中國？不用了，謝謝。在那些中國人的記憶中，我只不過是一個被他們踢來踢去的卑微上校而已。他們眼中看到的我，是一個在泥濘中行軍，和苦力們混在一起，還搭乘士兵車的人而已。」[56]雖然史迪威沒有具體敘述他被別人（中國人）「踢來踢去」的原因和感覺到底如何，但是有一個具體例子或許可以幫助我們臆度他對國民政府的憤恨。1937年12月中旬，史迪威想赴上海前線訪問，向中國軍政部提出申請，但遭到拒絕。這可能讓他感到不受尊敬。更糟糕的是，他因此而受到華盛頓軍部責怪，認爲他工作不力。等到1938年3月3日，史迪威終於得

53 史迪威這種尖酸的批評被不少作者照單全收，例如Theodore White和 Barbara Tuchman.

5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8. 應該提出的是，史迪威在所有與中國官員的交往中都使用翻譯員。唯一的例外是他有一次在與一位中國官員交談時沒有用翻譯員，因而在他的日記中認為是一項特別的成就。但是他並沒有說明該次交談的題目和時間長度。史迪威的個人檔案中有許多資料顯示他的中文程度可能並不高明（見：Stilwell's Black Book, no. 1, entry of December 20, 1941,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根據這些資料，本書作者個人的判斷是，他或許可以和士兵們就日常生活的小題目作簡短的交談，但是無法與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進行有知識深度的討論。Stilwell's Black Book, no. 2 包含更多的資料顯示他中文程度的局限性。他把許多想要用的中文字（例如簡短的演講稿）旁邊都注上拼音（the Wade-Giles system），同時還用英文寫上它們的定義。再者，中文部分也不是史迪威自己寫的，而是由別人代筆。在某些只靠發音學習中文但是閱讀中國文字能力有限的外國人中，這種做法相當普遍。若非如此，他們就不至於使用這種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中國和印度任職時，仍然跟他的隨從（John Liu）上中文課。在其他的語言環境中，他的中文程度大概算是能夠勉強湊合而已，但是在1920和1930年代的中國，任何和史迪威程度相仿的白人都當然地被捧為「中國通」，能講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這種交叉互動的心理狀態非常耐人尋味。它到底代表中國人的阿諛奉承？還是他們的不吝讚譽的大度？它代表白人的天真？還是他們的躊躇自滿？

5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37.

56 Stilwell Black Book, no. 1, entry of January 1,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到中國政府批准訪問前線時，淞滬會戰早已結束[57]。有了這些對國民政府的舊怨，還可能包括一些目前我們尚不知道的其他原因，史迪威再度來中國時的心態可能相當不平衡。此時他不再是一個卑微的上校，而是一位美國三星中將，並且還是中國最強大盟友的最高軍事代表。面對著同樣那一批中國將領，史迪威心中的反感自然而然地會對他以後所推行的軍事改革發生重大影響。

在純粹個人層次上，史迪威對兩位他此後必須經常打交道的中國領袖，也懷有極爲負面的看法。這兩個人分別是宋子文和蔣介石。史迪威在和宋子文初次見面時，便認定宋子文「陰險狡猾」[58]。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對蔣介石的態度，因爲他從1942年2月已經開始用「花生米」(peanut)的綽號來表示對蔣介石的鄙視。從此以後，史迪威還發明了一連串的綽號，用以發洩他對蔣介石的敵意[59]。史迪威此時對蔣介石還表達了一個令人納悶的評價：「他基本上是一個農民，身上帶著他那個階級所有的劣根性。」[60]就憑史迪威把蔣介石看成是典型的「農民」一事，就可以想像他這個獨樹一幟的觀點，讓他對中國事務的判斷會如何的離譜。而他對他必須合作的中國伙伴們如此隨意的侮辱，又不難預測到他日後新工作爲何難以展開。

## 二、中國人對史迪威任命的樂觀反應

與史迪威態度恰恰相反的是，中國領袖們熱烈歡迎史迪威的任職。宋子文在呈給蔣介石的報告中，附了一份他自己對史迪威充滿讚美的評價。他保證史迪威對中國感情真摯，爲人忠厚，具軍人性格，與馬格魯德之類喜歡玩弄政治把戲者完全不同[61]。在宋子文心目中，「此人係美陸軍中公認的最優秀將才」。蔣介石接到這些讚美之後，立即致電美國政府，對史迪威任命表示歡迎[62]。

同樣重要的是，宋子文也忠實地傳達了馬歇爾對史迪威的高度評價。宋子文也一股腦地接受了馬歇爾並不誠實的說詞，即史迪威認爲中國的情況緊急，需要他的才

57 Stilwell's message to the U.S. War Department, December 13, 1937,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6, Career File A-13, 1938, G-2 Reports.

58 Tuchman, p. 314.

59 See his diary entry of February 8, 1942, in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40.

60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3.

61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21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32。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1月24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9冊，第001檔案夾。

62 宋子文呈蔣介石電，1942年1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111。Also: Tuchman, pp. 313-314.

能，所以毅然放棄了本來已經內定的北非遠征軍司令職務，接受到中國的任命[63]。宋子文在報告中提到馬歇爾和史迪威的特殊友誼，這當然更讓蔣介石有理由熱誠歡迎史迪威來華。鑒於中國對美外交和美國對華外交愈來愈有受個人因素影響的趨勢，因此選出一個適當的代表，已經變成是促進中美同盟關係成功的先決條件。難怪，宋子文信心十足地預言，史迪威肯定會對中國作出重大貢獻[64]。與此同時，居里也另有一電給蔣夫人，表示史迪威會是美國軍方一個優秀的代表[65]。

所有以上事實都顯示，中國領袖們最初對史迪威任命的消息，一致而且毫無保留地表示了友善和熱誠，因爲美國政府給了他們各種理由去相信史迪威是最佳人選。在此，也可以附帶提一句的是，即使史迪威當時已有「中國通」的號稱，但是卻被宋子文和蔣介石看成是一個優點而不是一個缺點。在兩人來往電文中，看不出任何跡象表示他們對此事有些微保留或不安。就在前不久，他們還曾經向美方表達過，希望未來的聯軍參謀長不必是「中國通」。可是在熱烈歡迎史迪威的樂觀氣氛籠罩之下，他們顯然已經忘記了自己所說過的話，而且也將會爲此付出代價。

## 陸、史迪威赴華履新

史迪威在1942年3月6日向蔣介石報到時，他在口頭上敘述他在中國的職務包括以下幾項：

1. 奉命指揮在中國、緬甸及印度之美國軍隊；
2. 奉命監督及管理一切美國對中國國防之援助；
3. 代表美國政府出席軍事會議；
4. 倘衛佛爾將軍仍爲西南太平洋戰區之總司令，奉命擔任 鈞座與衛佛爾將軍間之聯絡員；
5. 管理、維持並改進滇緬公路，並敦促英方不斷改進在緬甸境內之該路。
6. 此外，奉命指揮在印度境內之美國空軍，無論其活動範圍在印緬境內或印緬境外。

6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3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567。

6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3月5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9冊，第001檔案夾。

65 Currie letter to Mme. CKS, February 14,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史迪威一字未提中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那就是聯軍參謀長一職。對此，蔣介石當即警覺並要求史氏予以澄清。此時，史迪威才補充承認他也是蔣介石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並直接聽命於蔣介石。但是蔣介石仍不放心，再度要求史氏進一步澄清他的身分和職權[66]。直等到蔣介石充分肯定他果真從美國政府那裡得到他所要求的人選以後，才放心正式宣布(3月6日)史迪威爲他的聯軍參謀長[67]。

但是，史迪威怎麼可能會忘記說出他被中國人請到中國戰區的最主要原因呢？

對於這個疑問，最簡單無辜的答案可能是：史迪威有一長串的職務需要逐一列舉，一不小心就忘記了包括聯軍參謀長這一個職務。另外一個可能是，史迪威的這個省略並非疏忽而根本是故意，因爲他很正確地反映了美國官方的想法和他本人的心態。如果美國真的從來就沒有把蔣介石邀請當一回事的話，那麼他就寧願讓這個職務不聲不響地消失掉。只有在蔣介石再三追問之下，他才不得不承認這個職務確實存在。

對蔣介石來說，除了聯軍參謀長一事讓他擔心了一陣子之外，他和史迪威的首度會晤，其實還讓他聽到了不少令他振奮的消息。首先，羅斯福向他保證，當前的戰爭是一場世界大戰，因此美國不會以德國爲優先而忽略日本，同時美國也會向中國提供足夠援助來進行抗戰[68]。

其次，史迪威告訴蔣介石，他已經向馬歇爾提出軍援器材清單。其中包括加強空軍、裝備30個陸軍師的一切必需武器，另外還會派遣運輸、通訊、醫藥、砲兵、裝甲兵等各方面專家來和中國軍隊合作。史迪威宣稱馬歇爾在原則上已經批准了這些建議，一旦物資有著落，將立即向中國運送[69]。這樣的信息當然讓蔣介石非常高興，因爲這些援助正是他長期以來希望美國人能夠提供的。

但會談也產生了幾個不愉快的問題。一個是他告知蔣介石，美國無法實現派遣三個陸軍師到中國的承諾[70]。另一個是史迪威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國，馬上交出在緬甸中國軍

66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559-566。

67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3月8日。

68　雖然羅斯福顯然沒有說實話，但是蔣介石仍然信以為真，並且在此後幾個月裡，對於美國秘密決定的歐洲優先戰略一直被蒙在鼓裡。

69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559-566。但是史迪威沒有告訴蔣介石的是，他的請求只有小部分得到軍部的承諾。比如說，他想要提高中國軍隊戰鬥力的長程計畫肯定沒有得到軍部批准。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75.

70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559-566。史迪威的部下包括他早先在中國服務時期的舊識，和第三軍團(the U.S. Army's Third Corps)的軍官。他們包括Frank Dorn, Franklin Sibert, William Gruber, Freddie McCabe, Benjamin

隊的指揮權。儘管這個舉動讓蔣介石大感不快，但是後者還是耐住性子，沒有馬上對史迪威的狂妄和無禮表露不滿[71]。即便如此，蔣介石還是決定把史迪威盡快派赴緬甸前線。爲此，他花了兩整天時間(3月9-10日)幫助史迪威了解中國在緬甸的部隊，和他使用這些部隊時應該注意的事項[72]。

## 柒、小結

本章以上陳述顯示，有關史迪威接受任命的過程遠比一般著作所敘述的要複雜。尤爲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遴選過程中，放棄了第一候選人而任命其候補者。這個遴選過程更深層的含義是，美國在政策上作了一個根本性的選擇，並在此後數年中以此作爲對華軍事合作關係的主軸。在作這個選擇時，軍部摒棄了一個檢討若干重要問題的最佳機會。這些問題包括：美國對華政策的基調、中國在同盟關係中的角色和戰略價值、需要多少美援才能充分發揮中國戰區的潛能，以及美國應該如何設法在戰時及戰後影響中國戰區的發展等等。

莊穆將軍最基本的論點是，美國政府必須知道自己想要在中國戰區達到什麼目的，和必須支付什麼代價來達到這些目的。只有這麼做，美國才能發揮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中國戰區的發展。反之，如果美國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又無決心進行足夠的投資，那麼它根本就沒有必要派送一個高階軍事代表團赴華。莊穆將軍把自己弄成軍部領袖們的眼中釘，就是因爲他對這個任命太過認真。他不停地主張派美軍去西南太平洋戰區作戰，以及保證維持仰光港的開放。而這些正好是軍部領袖們所不願意面對的選擇。在內心深處，他們並不認爲中國的重要性值得美國花這麼大的力氣去做這些事。

跟莊穆相比，史迪威只堅持要得到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而不要求美國送更多的物資去援助中國。馬歇爾和史汀生兩人也跟莊穆相反，他們對實質政策問題都寧可不去操心，而只希望把中國局勢掌握在美國手中並設法使之激活。但是他們既沒有明確的方向感，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美國的承諾才能使之成爲現實。他們的困境是，一方面需要回應蔣介石對於聯軍參謀長的邀請，另一方面又想把握機會在中國戰區插進一隻腳，然後依照美國的意願去運用中國本身的資源。爲了達成這個目的，他們最終決定，

(續)

Ferris, Frank Roberts, Willard Wyman, Haydon Boatner, Dick Young, John Paton Davies和Thomas Hearn。見：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9.

71 Liang Chin-ts'un(梁敬錞), *General Stilwell in China, 1942-1944*, p. 3.

7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3月9、10日。

最好的方法是趕快派送一個軍官去中國，然後由他去見機行事，見招拆招。

史迪威之能夠成爲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對中國的了解，但可以肯定的是因爲他和馬歇爾關係深厚。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他在短暫和史汀生面談過程中，既未提出政策層次上的明確主張，也未要求對華提供大量軍援，而這正是馬歇爾和史汀生最能聽得入耳的話。史迪威不但表現出軍人氣概，不問前途艱巨，直接表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的立場更讓軍部領袖們感到安心，因爲史迪威絕不會替他們在大政策上製造頭痛，還可以幫助軍部在中國問題上找到一條出路。簡言之，史迪威似乎是可以幫助他們從此以後不再爲中國事務煩惱操心的最佳人選。至於史迪威的「中國背景」，一直要等到他接受任命以後，才漸漸被軍部領袖們當作優點來強調。在此後兩年半中，他在中國的閱歷自然使他的見解和建議受到軍部重視，也逐漸成爲他不可被取代的最佳保障。早先蔣介石對「中國通」表達過的保留態度，後來隨著他和史迪威關係的日益惡化，便逐漸被美國軍方領袖們和史學界當成是蔣介石早已包藏禍心的鐵證。

史迪威所以接受這個新職務的重要動機之一，是他自信對中國非常了解，而且只要能得到中國軍隊指揮權，就可以做出一番大事業。和馬歇爾一樣，史迪威也認爲中國並不缺乏資源或人力，但是絕對缺乏具有才幹的領袖去作出明智合理的決定，和把本國資源發揮出最大的效益。而這正是史迪威本人和其他美國人認爲是美國優勢之所在。一旦有了這種信念，美國人就當仁不讓地認爲中國人應該聽從史迪威的指揮了。但當頑強的中國政軍現實阻擾史迪威施展他的「才華」和抱負時，他很快就下斷論，困難的根源不是出自中國大環境或是體制上的缺陷，更不可能是出自史迪威本身的認識錯誤，而一定是出自中國領袖們的缺點，尤其是蔣介石的惡意破壞或愚昧無知。史迪威後來在中國不斷遭遇的挫折，對他而言，都充分證明了他最心愛的解釋，那就是陰謀論。

對馬歇爾和史汀生而言，史迪威的積極進取精神只能讓他們既欣慰又感激，但是也讓他們感到對史迪威虧欠甚多。因此儘管史迪威已經和中國人鬧得不可開交，他們仍竭盡所能地保護史迪威的職位。原因一部分固然是他們不想再傷腦筋，物色一位能夠像史迪威一樣忠心耿耿執行政策的繼任人，另一部分則是因爲他們覺得虧欠史迪威太多感情債，因此必須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到底。在這方面，從史汀生寫給美國總統的一封信中，略可看出端倪。當他提到史迪威時(1943年5月)，寫道：

> 我當時覺得，而且現在更已經證明，史迪威是我們最好的軍官之一。就他在中國的職務而言，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夠做得比他更好。我們

> 本來就已經明明知道交給他的任務是本次戰爭中最困難的，而事後事實證明比我們原來想像要更困難。但是，他在承受各種打擊之後從無怨言……過去幾天和他的接觸使我相信，他是我認識的唯一可以擔當他目前大任的人[73]。

當然，史汀生筆下「大任」的準確意義，是盡量不要美國政府向中國提供人力或物質支援。至於馬歇爾，他給史迪威的電文經常是讚不絕口。儘管史迪威和中國領袖們之間的關係，在不久之後即已惡化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美國軍部領袖們對史迪威的支持依然堅定不移，在實質上幾乎變成了盲目的忠誠。我們以上對史迪威、馬歇爾，和史汀生之間這種心理因素的體會，將大有助於我們對1942-44年中美同盟關係史的了解。

華盛頓城內美國政府的決策大環境也值得我們關注。在珍珠港事件後不久，國務院的勢力雖然就大幅滑落，但是，在對英國和歐洲事務上，美國的政策至少還是由最高政治層次決定，因爲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保持經常會商。可是對華政策卻非如此。羅斯福面對莊穆將軍任命時，完全信賴史汀生的推薦，也沒約見莊穆本人。他很可能完全不知道莊穆提出的政策主張內容，也沒機會去表達他自己的主張。這些事務在軍部內部都被當成技術層次的問題來處理，而不是當作政策層次的問題來處理。史迪威的任命過程也不例外。在整個過程中，代表美國政府作出決策(或不作決策)的，首推馬歇爾，其次是史汀生。即便等到羅斯福在史迪威赴華前親自接見時，也幾乎沒有指示政策。

這種政府運作模式在以後的日子裡將會更趨明顯。總統個人對歐洲事務非常關心，但只是偶爾過問中國事務。這就使馬歇爾無可避免地成爲對華同盟政策的主導者。當史迪威帶著他多重身分去中國時，軍部制訂美國對華同盟政策的權限範圍隨之擴張。隨著時間推進，這種運作方式就變成戰時中美同盟關係中最重要的特徵。

---

73 Message from Henry Stimson, Secretary of War, to President FDR, May 3, 1943. Verifax File 2826, Item 2625, MFA.

# 第三章

#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1-4月

## ——同盟國軍事合作的困難

### 壹、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同盟關係中的重要性

中美戰時同盟的確充滿了歷史嘲弄。由於中美兩國的國力極端懸殊，因而使人們容易以爲，美國對戰時及戰後中國的政軍發展，一定會產生引導性作用。美國擁有中國急切需要的三個要素：武器、金錢和軍隊。以這三種資源作後盾，美國完全可以制訂出一套明智政策，在中國達成其政治和軍事目的。然而事實恰恰相反，美國遭遇到的卻是無盡的挫折。而前後兩次緬甸戰爭(1942、1944)正是這個現象最好的寫照。

基於幾個理由，這兩次緬甸戰爭對我們了解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有重大意義。

第一，在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這兩次戰爭是中美之間規模最大的軍事合作行動。對於史迪威個人來說，他自認爲在中國戰區的主要任務，就是籌劃緬甸戰爭並直接指揮作戰。儘管他的職稱是蔣介石的聯軍參謀長，但是他對中國境內戰事和戰略計畫之制訂都很少參與。他在中國戰區任職總共32個月，但實際在重慶停留的日子不超過8個月(或總日數的25%)。即使在這短短8個月中，他還是把時間分割成若干小塊，支離破碎地使用，以致間或在重慶逗留兩三天就匆匆離去。史汀生部長原先向中國承諾，史迪威的主要責任是留守重慶以便與蔣介石密切合作。但是史迪威的實際行爲完全違背了此項承諾。這個現象並非迫於情勢而然，也並非出於蔣介石的安排，而是史迪威的自作主張。

第二，第一次緬甸戰爭在中美雙方政府中，都產生了長遠的非軍事性後果。史迪威對緬甸戰略價值的信念，和他自認爲從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中所吸取的教訓，不久就成爲他向華盛頓進言的基礎，其重點是美國應該如何對付中國才能產生效果。他和馬歇爾的親密關係給了他特殊方便，讓他對美國對華政策擁有遠非其他美國官員(軍職或文職)所能企望的影響力。同樣，第一次緬甸戰爭在蔣介石心目中，也留下了不

可磨滅的傷痕。這不僅是因爲中國爲戰敗付出了慘痛代價，也因爲蔣介石同樣自以爲吸取了教訓，學會了以後應該如何對待英國人和美國人(尤其是史迪威)。這些教訓也嚴重影響了他在第二次緬甸戰爭籌備時期的立場和作爲。

因此，當我們回顧緬甸戰爭時，不僅應該著眼於中美雙方作戰思路和執行上的差別，同時還應該關注導致雙方關係惡化的一些更深層原因。不幸的是，雖然英文著作(尤其是美國陸軍的官方戰史)已經大量討論過這兩次戰爭，但仍然有許多重要的英文史料未被採用過，或未被充分重視，以致它們的深層意義尚待發掘。更重要的是，這些著作很少考慮中國觀點，不但使得其引用的史實不能全面涵蓋，而且衍生出來的分析和推論也出現嚴重偏差。

本書爲了補充現有史學著作的不足，參考了大量中文資料，希望通過對比中英文兩種資料的方法，能夠幫助讀者體會：即使是針對同一件史實，兩個盟邦也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結論。我們希望這種史料對比的方式，能夠讓讀者隨時檢查，史學界過去對緬甸戰爭和中美軍事合作的論述是否合理。經由這種方式，許多以前已經被學者們廣爲引用的舊資料，也可以顯示出新的重要性。這種做法可以幫助讀者，去比較中美兩國領袖不同的假設和推理，提供一個兩國互動(inter active)的模式，從而加深我們對它們動機和行爲的了解，並對兩國關係得到一個比較完整而又全面的認識[1]。因此，不但新資料可以提供新信息，即使是舊資料，在新的分析框架下也可以得到新的解讀，從而增加我們對歷史複雜性的了解。不但是當中英文史料吻合時，可以幫助我們對史實感到踏實，即使在雙方史料互相矛盾時，也可以幫助我們體會，當事人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所產生的互動的複雜性。

## 貳、珍珠港事變前有關緬甸防務的計畫

### 一、中國的計畫

中國對緬甸戰場的看法，在珍珠港事變前早已成形。簡而言之，中國一直希望能經由緬甸，把所需要的西方武器和器材源源不斷地運進內地，以維持繼續抗日。1940年夏，英國人在日本壓力下意圖關閉緬甸路，中國立即派遣宋子文赴華盛頓展開對英外交猛烈攻勢。先是企圖阻止英國關閉緬甸路，失敗之後，又企圖說服英國盡早重開緬甸路。即便在英國重開緬甸路(1940年10月)之後，中國依然發動另一波外交攻勢，

1 在英文著作方面，對第一次緬甸戰爭學術論著的基調影響最大的來源是美國陸軍的歷史學家。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18-148.

要求和英國簽訂協議共同防守緬甸。不久，中國政府更建議(1940年11月9日)雙方擬訂一個全面性的政治、軍事、經濟和交通等領域的合作計畫。再沒多久(1940年12月9日)，中國又照會英國，表示在情況需要時，願意派遣16萬士兵赴緬甸作戰[2]。這一連串舉動全由中國主動提出。然而，英國對中國的提議並無興趣。它最多只願意在日英兩國萬一開戰後考慮進行合作。但是如果日本只攻擊雲南省，而不攻擊英國東南亞殖民地的話，則英國仍舊打算維持中立[3]。

英國的拒絕並未打消中國的努力。因爲中國在1941年2月末又派遣了一個軍事代表團，由商震將軍帶領，到緬甸、印度、馬來亞等地實地了解英國防務。5月，中國代表團和英國駐新加坡司令官達成初步協議，英軍和華軍將分工合作，分段保護緬甸到雲南的公路[4]。不過，當中國提議派遣大軍到緬甸東南部，修築碉堡並預防日軍從陸上進攻仰光時，英國卻斷然拒絕。在英國人看來，中方的估計完全錯誤，因爲日本根本不可能經由這條困難重重的路線進攻緬甸。他們同時也不希望華軍過早進入緬甸，以免激怒日本而造成反效果。

1941年3月11日，美國租借法案成立，緬甸通道對中國的重要性更形增加，因爲中國指望今後大量美國軍援物資，可以經由仰光港運進中國本土[5]。同年5月17日到6月6日之間，美國軍部派了一個空軍小組到中國實地評估需求。8月，美國又派了一位名叫安斯丹(Daniel G. Arnstein)的財政部官員去視察緬甸路的運作情況，他針對中國政府駐緬單位處理美援物資的工作，提出了許多改善意見[6]。所有這些事例都表示，中美雙方政府在1941年下半年，對緬甸路和仰光港的重要性有了新認識[7]。總而言之，

---

2 蔣介石告知英國大使，中國若要運送10個陸軍師(160,000人)進入緬甸，以汽車運送需要50天，步行需要85天，因此建議英國政府必須在事先作出適當準備。蔣介石與英國大使卡爾會談記錄，1940年12月9日，《戰時外交》(二)，頁229-230。

3 《蔣總統事略稿》，1941年2月10日，3月25日，4月15日。蔣介石與馬格魯特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0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6冊，頁53-62。

4 商震呈蔣介石報告(300,000字)，1941年5月20日，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作戰經過》，第三冊(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1)，頁202-205。又見：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黨德信等編，《遠征印緬抗戰》，頁6-10。

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26, 44-45.

6 Robert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289.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27, 45.

7 根據美國軍事代表團(AMMISCA)資料(1942年5月20日)顯示，美國租借法案經過緬甸進入中國的物資情況如下：1941年度：5月份，7,552噸；6月份，4,917噸；7月份，5,452噸；8月份，8,099噸；9月份，9,146噸；10月份，9,803噸；11月份，14,561噸；12月份，

中國人對緬甸的心態和戰略評估，與一般西方史學著作所形容者有極大的出入。有些西方著作認爲中國人不願意積極從事緬甸戰爭，但是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就不需要外國人說服他們到緬甸作戰的重要性，而且他們早在美國參戰之前，就已經急不及待地想參與保衛緬甸的作戰，其決心程度既超過英國，更超過美國許多。

## 二、英國的計畫

相對的，英國對緬甸戰略價值的評估，卻僅著重在它對印度防務的價值[8]。就他們而言，中國對緬甸路的依賴正是激怒日本的主要原因。尤有進者，他們對中國人以爲日本的攻勢可能來自泰國陸路的說法，更是嗤之以鼻。他們所持的理由是，緬甸－泰國邊境的茂密原始林，正是阻止日軍進攻的天然屏障，而日本從泰國對緬甸進行空襲的可能性反倒會更大[9]。

爲了進一步爭取英國接受軍事合作，中國政府邀請英國軍官到重慶（1941年7-8月）舉行爲期四周的商談，爲萬一英國日本間發生戰爭預作準備。由於日本占領法屬中南半島南部之後（7月28日），日英戰爭的機會隨之增加，所以中英雙方的會談也包括香港防務。可是當中國提議派兵在鄰近地區進行干擾性的游擊戰，以減少日本對香港的威脅時，英國人馬上拒絕。至於緬甸，英國人堅決認爲日本的進攻路線，最可能是沿泰國鐵路和公路線先把軍隊運送到泰北，然後轉而向西，侵入緬甸中北部地區。由於這一條交通線路途遙遠，而且穿越叢林地區，因此英國軍方非常有信心地認爲，日本最多只能調派一兩個師團作爲攻擊之用，英軍單獨應付這個小規模攻擊將綽綽有餘。因此英國願意考慮接受的中國援助，最多也只是一小支陸軍部隊和陳納德的空軍而已[10]。

總結地說，中國在1940-1941年間作出各種促進中英軍事合作的建議，全數遭到英國拒絕。直到珍珠港事變前夕，英國始終滿懷自信，認爲僅靠自己的力量就足以保衛

（續）

7,145噸。1942年度：1月份，9,920噸；2月份，6,487噸；3月份，20,343噸；4月份，7,439噸。這些器材包括：陸軍和空軍的武器、原料、兵工廠機件、機動車輛油料，和紡織品。見：Memo, 1st Lt. William S. Brewster for Lt. Col. Lucien C. Strong, 20 May 42, as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49, table 3.

8 Robert Woollcombe, *The Campaigns of Wavell, 1939-1943*(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59), p. 160.

9 蔣介石與英國使館陸軍參贊戴尼斯會談記錄，1941年3月18日，戰時外交（二），頁145-146。See also: Maurice Collins, *Last and First in Burma(1941-1948)*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n.d.), pp. 19-20.

10 中英聯合軍事行動會談記錄，1941年7月24日至8月6日，《戰時外交》（二），頁165-171。又見：蔣介石致何應欽函，1941年8月4日，秦孝儀編，《作戰經過》，第三冊，頁206。

南亞和東南亞殖民地的廣大利益，並判斷日本絕對無法動用大量部隊進攻緬甸。英國人的戰略算盤可謂既如意又苛刻。也就是說，當日本只是攻打雲南時，英國斷然拒絕承諾協助中國保衛雲南。但是如果日本不攻打雲南而只攻打英軍時，卻願意接受中國協助英軍防守緬甸和香港。不過即使中國接受了這般不對等條件時，英國仍然拒絕簽署同意書[11]。與此同時，美國軍方對於緬甸的防守工作，基本上還沒有開始思考。

## 叁、珍珠港事變後盟軍在緬甸的合作

### 一、中國主動採取的行動

珍珠港事變剛發生，中國即向英國重提共同保衛緬甸的舊事。英國主力艦卻敵號(Repulse)和威爾斯親王號(Prince of Wales)被擊沉的當天(12月10日)，蔣介石向馬格魯德將軍抱怨說，他迄今仍未收到英國有關保衛越南、緬甸和新加坡的任何計畫。他同時向馬格魯德和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戴尼斯(Lancelot E. Dennys)將軍提出呼籲，要求中英兩國盡快擬訂共同作戰計畫[12]。

有趣的是，蔣介石對英國提供協助的想法立即遭到蘇聯反對。1941年12月14日，史達林致電蔣介石，強烈敦促中國不要派遣軍隊進入緬甸和泰國作戰，理由是中國可能被英美出賣。但是蔣介石拒絕了蘇聯的建議，因爲他完全清楚緬甸是中國和西方聯繫的唯一命脈。一旦緬甸失守，中國就只能全盤依賴蘇聯，而蔣介石擔心這可能正是史達林的真實意圖[13]。

從這個事件看來，蔣介石對於國際事務的分析，也自有其敏銳的聯想力，並能堅持中國國家利益之所在。

因此蔣介石不但立刻表示願意提供中國軍隊(**兩個團兵力**)赴緬，並將之置於英國將軍指揮之下[14]，同時還派遣陳納德的一個空軍中隊前往緬甸協助空防[15]。儘管英國稍早曾

11　商震與戴尼斯會談記錄，1941年10月1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40冊，頁66-67。

12　蔣介石與馬格魯特會談記錄，1941年12月10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6冊，頁53-62。

13　蔣介石日記，1941年12月14日。

14　林蔚，「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1942年9月30日)，第1冊。存國史館檔案#0726.20/2127.01-01。

15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6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08-213。Frank S. Losonsky & Terry M. Losonsky, *Flying Tiger: A Crew Chief's Story*(Atglen: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1966), pp. 71-72; David J. Innes, *Beaufighters over Burma*(United Kingdom: Blandford Press, 1985), p. 15.

經拒絕過中國的建議，不願把英國在新加坡的空軍和中國的美國空軍志願隊混合使用，但一旦緬甸情況危急時，蔣介石還是不計舊嫌，當即把美國空軍志願隊派赴緬甸支援英軍作戰。

## 二、英國的反應

與此同時，日本也在著手準備對緬甸發動陸上攻勢。日軍最初的計畫是占領仰光港，具體目的是要切斷中國通路。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個敵國的看法可謂一致。中方願意出一切力量保衛緬甸路，以保證抗戰得以繼續。日方則要占據緬甸路，迫使中方放棄抗戰。日方後來因爲收到中國軍隊或將進入緬甸的情報，因此爲了將其擊潰，計畫要加派軍隊進攻緬甸中部及曼德勒(Mandalay)。日軍最初計畫是只使用第15軍，並不準備使用數個師團力量[16]。日軍於1941年12月9日把第15軍運到泰國登陸。面對這個局勢，蔣介石又多次重複他早先的建議，派遣兩國中國軍(八萬五千到十萬士兵)赴緬支援英軍，但是建議仍然遭到英國拒絕。原因是衛佛爾將軍依然充滿自信，認爲日本除非先改善泰國境內交通通訊系統，否則緬泰邊境的險峻地形，將使日本無法發動強大攻勢[17]。

除了過於自信以外，衛佛爾可能還擔憂，中國軍隊一旦進入緬甸之後，大量的中國移民就會尾隨而至。也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使得衛佛爾嚴格限制中國軍隊的活動範圍，只准在薩爾溫江東部及北部一個狹小地區內進行活動[18]。有趣的是，當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對英國遲遲不願接受中國軍隊表示不解時，項貝克給他的答案是，英國老大不情願接受「黃種人」的幫助，因爲這樣將使他們在亞洲的聲望大受打擊[19]。

## 三、開戰初期中國對空中運輸路線的探索和美國的反應

由於英國斷然拒絕合作，中國領袖不得不爲緬甸路的淪陷及早作出應變方案。其結果是，中國率先提出建立一條空中通道的觀念。這個觀念稍後演變成飛越駝峰的工作。1942年1月30日宋子文告知羅斯福稱，中國境內戰爭物資儲存量，已經達到1937年中日開戰以來的最低點，因此亟需一條新的「生命線」來維持對日作戰及民心士氣。

---

16 《大本營陸軍部》(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1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54。

17 蔣介石與衛佛爾(British General Wavell)及勃蘭特(American General George H. Brett)會談記錄，1941年12月22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6冊，頁133-138。

18 Currie memo to FDR, January 30,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19 Ballantine's "Memorandum for the files" in State Department, January 21,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宋子文提出的解決途徑是建立一條空中通道，起自印度的薩迪亞(Sadiya, 鐵路終點站)，以昆明(雲南)或敘府(Suifu, 四川省水陸交通樞紐)爲航行目標，其間距離各爲550及700公里。在提出計畫之前，宋子文已經委託美國民間航空公司作了可行性評估[20]。

幾天之內羅斯福就作出了回應。他在1942年2月9日致電蔣介石稱，假如仰光港安全發生危機時，美國可以保證建立一條從印度到中國的空中通道[21]。在同一時間，中國也和英國駐孟加拉(Bengal)總督取得聯繫，把最初的運送目標訂爲每日500-1,000噸[22]。由於史迪威此時已經在著手準備赴中國戰區就職的工作，於是有關空運的籌劃工作，包括機場、飛機、地勤人員、油料等等，也一併交由他負責[23]。

在中國採取了上述措施之後，美國軍方也開始關注緬甸局勢的發展。美國軍方首先徵詢中國，假如仰光不幸失守時，中英兩國軍隊是否還能固守緬北。中國的答覆是(1942年1月28日)，假如英國立刻允許中國部隊進入緬甸，與英國軍隊建立共同防務的話，緬北應該可以固守[24]。不久之後，馬格魯德將軍在給史迪威和馬歇爾的報告(2月3日)中，首次把緬甸放在一個較宏觀的格局中作分析。他指出，緬甸是同盟國唯一可以用空軍力量攔腰打擊日本南進政策的基地，也是盟軍將來唯一可以用來進攻日本在東南亞據點的基地。如果失去緬甸，則印度洋將淪爲日本內海，而印度東部也將暴露在日本海空軍進襲的威脅之下。因此他認爲，縱然美國對中國軍隊的戰鬥力不可存太高指望，但是如果中國廣大土地落入敵手的話，那將會是同盟國一大災難，因爲盟邦將會失去一個可以進攻日本的根據地[25]。

以上的歷史回顧說明，美國軍方對於保衛緬甸的思考，不但發展得比較遲，而且其動機也不僅是以中國的利益爲考慮，實在是以美國自己的利益爲出發點。事實上，保護陸上通道和把軍用物資運進中國一事，在美國人心目中所占的份量並不高，原因是他們本來就沒有打算將大量物資運進中國。即便如此，中國以外局勢的發展卻增加了美國對緬甸的關懷。主要原因是西方國家殖民地接二連三淪陷。在3月中旬之前，香港、新加坡、雅加達、馬尼拉都相繼失守，日本在遠東地區進展如此神速，德國如

20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V. Soong, January 30, 1942, in Xerox File 2559, MFA.

21 As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77-78.

22 中國政府與英國孟加拉省省長的通信，1942年2月20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5冊，頁240-242。

2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78.

24 CKS memo, January 28,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7.14.

25 Magruder's radiogram report from Chungking to Secretary of War and Chief Staff, February 3, 1942. Verifax File 708, Item 1840, MFA.

果也能占領中東地區的話，那麼軸心國軍隊的大會師就將變成指日可待了，那將是同盟國必須盡全力去阻止的發展。

正是這種擔心使得英國對緬甸的態度變得逐漸積極。但是當2月20日邱吉爾企圖運用澳大利亞軍隊防衛仰光時，他卻遭到澳洲政府的拒絕[26]。不久之後，仰光和爪哇的淪陷(3月8-9日)更顯示，日本下一個攻擊目標很可能將是印度。這一切發展使美國軍方不得不開始緊張。即使他們並不想增加援華的武器和物資數量，但他們至少還希望中國能夠繼續作戰。再說，不論仰光是否可以保得住，只有中國軍隊可以阻擋日軍不致全面占據緬甸。這樣就可以間接防止日軍進攻印度，打破日本、德國陸軍會師的美夢。

正是因爲美國陸軍的首要目的是阻止日軍占領緬甸，而不是幫助中國找到新途徑把軍援送到中國，所以它對空中通道的構想並不積極。在宋子文提出建議過了三個多星期之後，羅斯福才偶然想起來要追詢該項計畫的進展程度如何。2月25日羅斯福主動問馬歇爾：「有關緬甸路可能被切斷的事，我想知道從印度北部通往中國的空中運輸計畫具體狀況如何？……顯而易見，我們必須盡快成立空中運輸大隊，以保證到中國的交通線通暢無阻。」[27]

但是總統的緊迫感並沒有打動軍部負責人。2月26日馬歇爾回覆羅斯福一封長函，明白指出，他並不打算運用資源去開展這項任務，理由是它會妨礙到其他戰區更急迫的需要。雖然馬歇爾承認中國戰區只需要很少量飛機和地勤人員就可以滿足要求，但他拒絕挪用其他戰區的分配數量，因爲他認爲這些戰區在美國全球戰略部署上所占據的地位，都比中國更重要[28]。換言之，從2月到5月的將近四個月中，美國軍部都沒有抓緊機會認真地去爲空運工作預作準備，以致到緬甸戰敗時(5月)才慌忙行事。

## 四、中國加緊準備在緬甸作戰

隨著來自日本的威脅日益增高，英國終於願意讓中國把進入緬甸戰場的軍力從兩個團增加到一個師。蔣介石對此感到非常憂慮，因爲他認爲以這種零碎無序的方式把中國軍隊投入緬甸戰場，將會產生非常危險的後果。有鑒於此，在蔣介石接受英國限制的同時，也聲明中國軍隊必須有自己明確的防守區，以求權責分明[29]。3月初當英國

26 Tuchman, pp. 326-327.

27 FDR memo to Marshall, February 25, 1942, in Xerox File 1173, MFA.

28 FDR memo to Marshall, February 25, 1942, and Marshall's response, February 26, 1942, in Xerox File 1173, MFA.

29 CKS cable to Currie, January 18, February 2,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Also:

要求中國加派更多軍隊時，蔣介石決定必須親赴緬甸現場去了解情況[30]。到此時，中國已經陸續派遣了三個師的兵力進入緬甸，而英國人卻突然改變態度，急迫要求更多的中國軍隊投入戰鬥。

## 肆、戰爭的初期：1942年1-2月

就在中英兩國對共同作戰尚未達成共識之際，日本的攻勢已經在1942年1月展開。日軍的作戰計畫在1941年底逐漸成熟。它的打算是以主力沿毛淡棉－庇古公路，進攻仰光港(Rangoon)和緬甸中部。占領仰光港之後，再向北進攻仁安羌附近油田，伺機進攻曼德勒附近要地。作戰主力初期以第15軍(33和55師團)爲主。如有必要，在第二期準備添加第25軍(18、56兩個師團)，一共四個師團[31]。戰爭目的是切斷中國通道，消滅英軍並趁機鼓動緬甸人民獨立。

日軍大舉侵入當然令英國人大吃一驚。特別因爲日本進攻路線，並沒有如英國人所預期來自泰國北部，反而是如中國人所警告的，來自緬甸東南方的泰國邊境。英軍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皇放棄了原有工事(1月22日)，退至仰光近郊。然而即使在這段日子裡，英國依然拒絕了蔣介石向緬甸派送兩個軍的提議[32]。儘管如此，蔣介石還是秘密命令(1月16日)兩個軍的兵力向雲南保山集結，並限令在1月22日以前完成準備工作，以應付英國人可能隨時改變主意。至於已經抵達緬甸境內的中國軍隊，蔣介石則命令它們接受英國將領的指揮[33]。

日軍占領毛淡棉(Moulmein, 1942年1月30日，緬甸第三大城市，十萬人口)後，又在沿海地區陸續擊退各據點的英軍，把戰線推向仰光。新加坡的易手(2月15日)讓日本能夠調派更多軍隊支援緬甸前線。相形之下，原先蔣介石已經預定要參加緬甸作戰的部隊，此時卻仍然被迫徘徊在中國境內，等待英國允許開動的信號。照理說，中方最

(續)

"Anti-British sentiment expressed in cables from Madame Chiang Kai-shek",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3. All during the year of 1942 and the first Burma campaign.

30 Mme. CKS cable to Currie, March 2,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31 《大本營陸軍部》(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1冊，頁305-312，466-472。

32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2年1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15-119。See also: General Wavell to Prime Minister, January 26, 1942, in Public Record Office, PREW, 3, 154/1.

33 林蔚，「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1942年9月30日，第1冊。

有效的部署方式應該是集結在中緬邊境的一個地方，等待開動命令一到，就可以立即全數開入緬境。然而由於該地是山區，交通和補給的困難度遠遠超過中國軍方後勤單位的應付能力。所以中國只好讓部隊沿著中國通往緬甸的公路延綿紮營，深入國境之內。不幸的是，當英國的允許終於到來時，這種縱深部署方式就不免延長了它們行軍進入緬甸的時間[34]。

## 伍、戰爭全面展開：1942年3月

### 一、蔣介石視察緬甸前線

在緬甸戰局日趨險峻的情況下，蔣介石抵達臘戌(Lashio)前線視察(3月3日)。他內心對中國軍隊所面對的政治風險相當明瞭，因爲中國軍隊既不可開罪英國殖民政府，又必須爭取緬甸人民的支持。儘管中國民眾在感情上普遍同情緬甸人民對民族獨立的訴求，但中國軍隊在戰場上又需要和英國人合作。因此蔣介石一再訓示中國將領們要對緬甸殖民政府表示尊重，切不可在語言上冒犯英國人；同時對當地人的文化和風俗習慣必須尊重，但又切不可給當地人民任何幻覺，以爲中國軍隊可以幫助他們從英國統治下解放出來。尤其重要的是，蔣介石鼓勵將領們務必奮勇作戰，「不計一切犧牲」，以維護中國軍隊的榮譽，和爭取外國人的信任與尊重[35]。

對這最後的一點，蔣介石此後將會在不同場合中重複強調。在本書以下的各章中我們將會看到，無論是蔣介石本人與外國人的交往過程中，或是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時，蔣介石特別在意的是，中國人千萬不可以在西方盟邦面前丟臉，招惹外國人輕視。同樣，如果外國人主動侮辱他個人(如衛佛爾所為)、部屬(如熊式輝所忍受)或是中國政府(如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排擠)時，他也會作出激烈的反應。這是蔣介石一根特別敏感的神經，也是人們想要了解他的外交政策時不可忽視的因素。事實上，如果推廣地說，同樣這個心理因素，也時常在中國其他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操的領袖(如毛澤東)的行爲上表現出來。

### 二、史迪威開始工作

史迪威抵華之日，正值仰光失守前夕(1942年3月8日)。因此，蔣介石對他的歡迎

34 盛兆，〈滇緬抗日雜憶〉，黨德信等編，《遠征印緬抗戰》，頁165。

35 蔣介石在臘戌對中國遠征軍將領的訓話，1942年3月3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2-42。

自然不在話下。特別是因爲他知道，史迪威對緬甸重要性的看法與他基本相同[36]。

兩人在初次針對緬甸戰局作全面性檢討時(3月9日)，蔣介石就向史迪威詳細地解釋，他爲何對英國態度感到憂慮。他在對英軍作戰不力表示失望之後，隨即敦促史迪威務必盡力保護中國軍隊免遭英人計算。他抱怨說中國曾經要求英國把曼德勒(Mandalay)防務全部交付給中國軍隊負責，但被英國拒絕。他更抱怨英軍向中國人隱瞞了它們的撤退行動，致令中國軍隊措手不及而遭到無謂損失。蔣介石一再重複的重點是，中國願意承擔保衛曼德勒的全部責任，但是絕不允許中國軍隊被分割成小股力量，並和英軍部隊混合使用。理由是他無法信賴英國人。蔣介石甚至明言，假如英國人堅持兩國軍隊混合使用的話，則他寧可將全部中國部隊撤出緬甸。由於蔣介石同時也堅信指揮權應該統一，因此他主張英國也應該交出軍隊，全部置於史迪威統領之下[37]。

從他們接觸一開始，蔣介石就不斷向史迪威表明，中國參加緬甸作戰的最終目的是收復仰光。但是鑒於日本擁有海空軍絕對優勢，因此如果沒有大量英美軍隊參戰的話，那麼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國軍隊集結在曼德勒周邊，誘敵深入予以擊潰，然後反攻[38]。顯然，蔣介石認爲這個做法可以讓中國軍隊獲得戰術優勢，迫使日本軍隊拉長補給線，和擴大需要防衛的土地。反之，中英聯軍的補給線可以縮短，而且力量容易集中。還有一點應該記得的是，英國人在和中國當局所作過的一切有關緬甸戰爭的討論中，從來沒有期望、同意或是准許中國軍隊南下防守仰光港。他們作出最大的「讓步」是准許中國軍隊在緬北活動。原因正是英國軍方原本認爲緬北才是日軍侵入緬甸的必戰地區，而緬南或許可以逃過一劫。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中國當局無論在心理上或是在擬訂作戰計畫上所作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以在緬北作戰爲目標，而對於緬南的作戰並不熟悉。

雖然蔣介石對參加緬甸戰爭的意願非常強烈，但是他在緬甸前線親自目睹的兩個現象，又令他感到焦慮不已。一個是緬甸本身動蕩不安的局勢，另一個是英國人作戰的動機及防衛的能力。

就緬甸局勢而言，最使他焦慮的是當地人民把對英國殖民者的憎恨，轉換成對日本的公然同情與支持。即使當地英國高層官員也向蔣介石承認，至少有五千餘名緬甸僧人已經成爲日本間諜[39]。

---

36 JWS t-w diaries, March 3, 6, 1942.

37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9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46-53。See also: JWS t-w Diaries, March 9-10, 1942.

38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568-572。

39 Maung Maung, *Burma and General Ne Win*(Bombay, India: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9), pp. 95-98.

就英國人而言，蔣介石對衛佛爾的反感已經變得無法隱忍。在蔣介石眼中，衛佛爾對日本一無所知，對世界局勢又缺乏常識。更有甚者，他認爲衛佛爾自私、自大、缺乏主見、喜歡耍弄小聰明、占他人便宜[40]。蔣介石的感覺是，英國人儘管自己在緬甸的兵力薄弱，卻還想盡辦法想要掌控中國軍隊。他在印度聽到英國官員在印度腐敗無能的消息，也讓他感覺，假如日本一旦發動攻勢，印度也必將淪陷[41]。

的確，當時不少中國領袖有鑒於諸如此類的現象，認爲蔣介石把中國軍隊送進緬甸戰場並非明智之舉。比如說，深受蔣介石尊敬的軍事智囊徐永昌將軍就採取這種看法，覺得中國應該對緬甸戰事保持低姿態[42]。但是蔣介石本人卻對緬甸戰事抱持積極態度，相信史迪威一定會保護中國軍隊不受英國人愚弄。正因蔣介石相信他可以信賴史迪威，所以他才不厭其詳地向史迪威解釋，跟英國人打交道必須小心，千萬不可落入圈套。而史迪威也滿口允諾，一定會謹慎從事。

然而史迪威在私下對這些漫長的會談卻有不同反應。對他而言，唯一重要的發展是從蔣介石手中拿到中國入緬甸軍隊的指揮權，並且立即把這個好消息向華盛頓報告[43]。至於蔣介石還講了其他一大堆他自以爲重要的話，在史迪威聽來都只是耳邊風，沒有留下深刻印象。事實上，他在日記中寫道，蔣介石還給了他「許多胡說八道的戰術」[44]。這種心理上的差距自然容易造成摩擦。

## 三、英國的防務安排

正如中國人所擔心的，英國在緬甸防務能力遠遠不足。1941年12月，緬甸境內全部兵力只有18,000人和39架飛機，而防守面積卻和法國相等[45]。1942年1-2月間，中國人雖然看到英國在緬甸南部急速潰敗，但是卻感到無能爲力，原因是中國軍隊此時仍然逗留雲南省境內無法開動。當2月15日英國終於准許中國軍隊大批進入緬甸時，中國人當時還誤以爲英國人的作戰計畫是用自己的兵力固守仰光，然後用中國軍隊防衛緬北。因此中國政府只是爲了應急，才匆匆地把第200師單獨抽出全速送往緬南增援英

40 蔣介石，《困勉記》，1942年3月2日。

41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3月6日。

42 同上，1942年3月1、4日。

43 JWS t-w Diaries, March 9, 1942. As he wrote, "Wiring to Wash. to give me command in B! Not only Ch. but Br. too--Bitter feeing at limies."

44 JWS t-w Diaries, March 9-10, 1942.

45 William J. Slim, *Defeat into Victory*(New York: McKay, 1961), p. 9; Robert Woollcombe, *The Campaigns of Wavell, 1939-1943*(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959), p. 161.

軍。不料，英國人卻背著中國人從仰光偷偷撤走，讓中國人立即感到完全被欺騙[46]。

珍珠港事變前，英國拒絕和中國探討軍事合作，原因是它不願意爲了中國而開罪日本。這種做法雖然令中國失望，但至少還是可以理解。然而等到日本已經進攻緬甸南部之後，英國還是繼續拒絕中國援助，那就讓中國人難以理解了。對中國人而言，防守仰光是他們願意進軍緬甸的最大理由。但是中國人看到的卻是他們以最精銳的部隊（第200師）急速增援仰光，而英國人卻選擇不戰而逃。這兩件事同時發生，使中國人不禁懷疑，英國人是否早已作了放棄仰光的決定，卻故意把中國軍隊引誘南下，來掩護其撤退工作而已。

## 四、仰光淪陷及其影響

仰光淪陷對中國是沉重打擊，因爲中國立即喪失大批囤積在該地的軍用物資，也斷絕了此後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途徑[47]。在心理上，它也對中國人造成了重大傷害。在此之後，中國人對任何英國人提出的建議，第一個反應就是懷疑其動機，認爲它們不過是英國人的故技重施，以犧牲中國人性命去解救困境中的英國人而已[48]。

仰光淪陷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對緬甸的全盤戰略考量。在此之前，中國的目標是確保仰光在同盟國手中。但是現在中國更迫切的擔憂是日本可能從緬甸或越南進攻雲南。因此蔣介石特別囑咐史迪威要有心理準備，一旦日本攻擊果然成爲事實，中國必須自緬甸撤回所有軍隊，以保衛雲南及長江上游地區。誠然，中國非常希望能夠把日本從緬甸趕出去，但是這已經不是中國軍隊單方面可以達成的任務，因爲它們是步兵，既無強大砲兵又無空中支援。因此，蔣介石坦白告訴史迪威，除非中國軍隊能夠得到西方盟邦大力協助，否則他們不可能獨力收復仰光[49]。但是英美兩國卻三緘其口，絕不作出增援承諾。

如果純粹從理性觀點來看，蔣介石此時或許應該斷然把中國軍隊撤回中國境內。但是他卻採取了觀望態度。事實上，他不但讓部隊繼續留在緬甸戰場，甚至把史迪威

---

46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8日。

47　英國銷毀的戰略物資包括：10,000公噸的器材，1,800,000公升的油料。其中相當大的部分是英國早先非法截留的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物資。除此之外，還有大約19,000噸在緬甸的美國租借法案援華物資落入日本之手。Clayton R. Newell, *Burma, 1942*（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94）, p. 12.

48　林蔚，「緬甸戰役作戰經過及失敗原因與各部優劣評判報告書」，1942年9月30日，第1冊。

49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568-572。

送到前線去建立一個新指揮系統。他這樣做或許是想拖一段時間，看看風色再作決定。也或許是向盟邦表示同心協力，而不想過早地脫離戰場[50]。事後發展證明，蔣介石這個決定產生了致命性後果。因爲中國軍隊繼續留在緬甸，非但沒有達成任何軍事目的，反倒造成和兩個盟邦間的新衝突。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蔣介石的猶豫不決，頗像一個賭徒，在對手明明贏了賭局之後，還拼命往桌上扔錢，希冀奇蹟發生。

至於日軍，在占領仰光港後，第15軍55師團隨即沿公路向北繼續攻擊。

## 五、史迪威拿到指揮權

3月初，同盟國在緬甸戰場的地面部隊兵力非常不對稱：英國有兩個師，中國兵力約爲英國的四倍，而美國則根本沒有正規部隊參戰。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當然關心中國軍隊的安全。爲此，他不斷向史迪威說明，中國無法承受第5軍和第6軍挫敗的後果，因爲它們是中國由德國協助在南京建軍十年(1928-1937)以來，碩果僅存的機械化部隊[51]。幾經磋商之後，蔣介石和史迪威終於達成三項協議：1. 史迪威指揮中國在緬甸的軍隊；2. 中國軍隊負責防衛曼德勒；3. 英國軍隊防衛曼德勒以南的其他地區。其中第三條是由蔣介石特別提出，其目的是向英國人保證，中國絕不會利用軍隊來對緬甸進行領土擴張野心[52]。在赴緬之前，史迪威向蔣介石保證，「我將遵行你給我的每一個指示。」[53]

事實上，他們之間的共識只是一個假象，因爲兩個人對於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的目的持有根本不同的理解。儘管史迪威應該清楚中國人對英國人強烈的不信任感[54]，但是他並沒有耐心(或能力)去理解中英關係中這些複雜的政治、外交、種族、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儘管史迪威本人也厭憎英國人的行爲，但是他也不重視蔣介石的感受。相反地，他寧願從純技術層次去看待緬甸戰事。史迪威把話說得既簡單又乾脆：作戰就是爲了取勝，而且還應該用盡一切資源去贏得勝利。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史迪威用的可不是美國的資源，而是中國的資源。他豪邁的語句是建築在慷他人之慨的基礎

50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14日。

51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568-572。

52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3月10日。

53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572-574。

54 JWS t-w diaries, March 12, 1942. "Sad story of Burma campaign. No plan, no recon. or security, no int. B. civil gov't still red tape. Took 1/2 the 320,000 gals for Ch. army & gave it to civ. firms... Vigorous patrolling by japs. None by limies... They conceal plans from him [Merrell] & delib. gave him misinformation."

上。在史迪威和蔣介石無數次會商中，他從來沒有思考過，萬一緬甸戰局逆轉，他應該如何執行一個有秩序的撤退，因此他也沒有擬訂任何具體的應對方案。在史迪威心目中，「作戰」和「進攻」是同義字，「撤退」乃是失敗主義者的想法，而且一旦有了這個想法，最終必將帶來失敗的結局。儘管史迪威在緬甸面臨的是一個他完全不熟悉的人文地理環境，儘管他完全無法控制英軍動向，但是史迪威依然魯莽直前，下定決心不讓這些「枝節問題」阻礙他追求戰爭的勝利。

蔣介石當然也想在緬甸贏得勝利，但在仰光淪陷之後，他實在沒有非在緬甸作戰不可的理由[55]。更何況，英國和美國並沒有對收復仰光宣示任何決心或是作出任何承諾。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願意繼續留在緬甸作戰的前提是，作戰代價必須可以承受。但是他沒有理由讓他最好的部隊冒著失敗的風險去作戰。所以他希望史迪威能夠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保障中國軍隊免遭重大犧牲。史迪威使用的是中國的政治軍事資本，蔣介石當然想告訴他如何處理這種局面，慎防英國人詭計，而且在大事不妙時盡快從戰場上全身而退。由於蔣介石最擔心的是英國軍隊會從戰場上不聲不響地開溜，所以他再度建議中英兩國部隊都應該交由史迪威一人統籌指揮[56]。不用說，蔣介石的建議毫不發生作用，因爲一方面英國人堅決反對，另一方面史迪威本人和美國軍部也沒有盡力去爭取。

## 六、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開始分歧

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合作關係剛開始不久便發生分歧，而且關係急速惡化。緬甸戰局演變之快出人意表，以致史迪威甫到前線即飛返重慶(3月17日)，試圖說服蔣介石放棄他們之間不久前才達成的中英兩國分工協議。史迪威最新的想法是不用中國軍隊保衛曼德勒和緬甸北部，而是盡速將之送往緬甸南部增援第200師。該師當時所在的平滿納(Pyinmana)本來就是應由英軍負責防守的據點，陣地過於偏南，暴露在敵人正面，因此蔣介石立即加以反對，並和史迪威進行激辯。根據史迪威記載(3月18日的日記)：「我們幹了一場硬仗，他(蔣介石)每提出一個論點，我就把它打倒。然後緊盯住他不放。」[57]

對於蔣介石而言，這次會談的重要性在於，它是第一次讓他對史迪威的軍事判斷力發生懷疑[58]。蔣介石所以拒絕接受史迪威的新建議，有兩點理由：第一，中英之間

55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14日。

56　Memo from Brigadier General John Magruder, 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U.S.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to Stilwell, March 13,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33.

5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62.  Also: JWS t-w diaries, March 18, 1942.

58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18日。

對各自的作戰責任區早已有明確協議；第二，在運用中國軍隊從事支援英軍任務之前，蔣介石要求英國人提出具體行動，證明他們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去填補自己戰線上被日軍打破的缺口。蔣介石所持的堅決立場，除了這是他一貫的看法以外，可能也受到重要軍事幕僚商震將軍的影響。商震此時剛從緬甸前線回到中國(3月18日)，帶回來的消息令人沮喪，內容盡是有關英軍士氣低落、緬甸人拒絕支持英國人，和英國人仍然在企圖掌控中國軍隊等訊息[59]。不過，蔣介石次日召見史迪威會談時(3月19日)，還是作了一個讓步，允許史迪威把第22師送到南方增援第200師，但是堅持不得超越平滿納線。另外他還允許史迪威增援普羅姆(Prome)城的英國防軍。蔣介石仍然主張第96師駐防曼德勒，而且再三叮囑第5軍和第6軍絕對不能失敗。但是史迪威拒絕承諾，他說：「我叫他(蔣介石)另外派一個可以作出那樣保證的人去緬甸，因爲我可不能作那樣的保證。在戰爭中，我們只能盡力而爲，然後承擔一切後果。」根據史迪威的記載，蔣介石的反應是，他已經對史迪威的建議作出了相當程度讓步，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史迪威回應蔣介石說，一旦戰鬥開始，他就必須有自由裁量權。蔣介石也同意此一立場[60]。史迪威隨即建議，以三項原則界定其指揮權限：1. 部隊部署完全遵照蔣介石計畫；2. 面對敵人行動時，史迪威有權對前線中國軍隊的部署作出適當調整；3. 一旦戰鬥開始，史迪威指揮權不可受到干預[61]。蔣介石接受此三項原則後，兩人未再繼續爭辯。

史迪威對這兩次會談結果顯然感到相當滿意。正如他後來所寫：「中國人能夠接受我的身分，這簡直就是奇蹟。因爲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外國人得到指揮中國正規軍的權力。」[62] 但是蔣介石對這兩次會談卻給了不同評價。他一方面憂慮英軍沒有決心防守普羅姆，也沒有誠意和盟邦合作，另一方面又擔心史迪威可能被英國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在此同時，蔣介石自認他在盡一切努力，防止英國人不要導致緬甸戰局崩潰[63]。事實上，他想讓史迪威警告英國人，如果他們放棄普羅姆的話，則中國軍隊將從緬甸全面撤退[64]。簡言之，蔣介石雖然有意願履行中國防守緬甸的責任，但也要求英美兩個盟邦提出保證，同樣盡一切努力合作收復仰光。

史迪威對緬甸的看法和蔣介石明顯不同。依他的觀點，不管英美兩個盟邦是否打

5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3月18。
6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62.
61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576-580。
6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62.
63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19、20日。
64 JWS t-w diaries, March 20, 1942.

算採取積極行動，中國軍隊既然已經在緬甸戰場上，就應該盡全力向南推進以謀收復仰光。即使沒有盟邦援助，它們也應該如此做。換言之，蔣介石的立場是堅持履行中國政府原先的承諾和作戰部署，防守緬甸中部和北部。但是史迪威要嘛沒有能力或是意願去督促英國履行其作戰任務，但是卻主張中國軍隊應立即放棄其在緬甸中部和北部戰場的作戰部署，改以急行軍方式趕赴緬甸南部新戰場展開攻擊，甚至在必要時全面取代英國軍隊。

面對史迪威這種態度，蔣介石的對策就是向史迪威下達更多的作戰指示，而這種做法又只能讓雙方關係益形惡化；他們之間很快產生了一個惡性循環。蔣介石愈是擔心史迪威在和英國人打交道時會被自己的缺乏經驗和天真所誤，他就愈覺得需要告訴史迪威應該怎麼做，而這也就愈讓史迪威對蔣介石的瑣碎嘮叨感到憤怒不已。

史迪威回到緬甸前線後（3月21日），馬上把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約定作出最刻板的解釋。既然蔣介石同意史迪威可以在戰場上行使自由裁量權，無需事先請示，那麼史迪威爲了能夠從這個約定中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他最有效的對付方法就是不再向蔣介石通報任何情況。但是他這個新作風卻馬上驚動了蔣介石，而蔣夫人也立即寫信婉轉地提醒史迪威，所有有關戰略的事務，他都應該事先和蔣介石商量才對[65]。不用說，蔣介石對於史迪威趁機獨行專斷的作風已經感到異常不耐。

在此同時，緬甸戰局的發展也與史迪威的期望大有出入。日軍在1942年3月23-24日開始攻擊同古（Toungoo），中國的第200師堅守陣地並指望第22師可以給予支援。不過當時情況相當混亂：一方面，第5軍軍長杜聿明將軍非常支持所轄第22師南下，這讓史迪威感到安心。另一方面，蔣介石也以樂觀語氣鼓勵史迪威依照自己的判斷給日軍打擊。事實上，他在還沒有阻遏日軍攻勢之前就已經開始遐想到如何乘勝追擊潰退的日軍了[66]。但是史迪威卻仍舊擔心蔣介石會隨時改變主意或下令取消攻擊。

## 七、英國因素再度抬頭

無論如何，事實證明英國人完全不理睬史迪威的想法。在日本空軍轟炸（3月21-22日）馬格威（Magwe）造成嚴重損失之後，英國空軍中隊馬上撤離（3月23日）該地，致使中國軍隊立即失去空中支援[67]。這個突發事件讓史迪威感到同盟國已經喪失有效抵抗

65 Mayling Soong Chiang letter to Stilwell, March 27,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6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66-67.

6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66.

日軍的機會[68]。不久之後，史迪威又接到消息，英國在仁安羌(Yenangyaung)守軍發生暴動，英國已經破壞油田，鐵路也因爲工人逃跑而停止運作[69]。3月27日晨，史迪威又聽到了英軍已經開始撤離普羅姆的消息[70]。3月28日史迪威更吃驚地發現，英國在緬甸的飛機原來早已飛返印度，而他的總部對此事居然一無所悉[71]。因此在3月底以前，緬甸制空權已完全落入日軍之手。史迪威不知道的是，日本陸軍第56師團此時已經由新加坡運到仰光港，參加了3月底的同古戰役。與此同時，第15軍的第33師團也參加北進，在3月29-30日擊敗英軍於舒坦(Sittaung)附近，給予後者沉重打擊(損失30輛戰車、20門火砲、200輛汽車)[72]。

3月這些驚人事件發生時，史迪威仍有時間趕緊檢討中國軍隊在緬甸到底還能有何作爲，也仍有時間重新部署中國軍隊，甚或把它們調離戰場。從中國立場來看，一旦英國軍隊放棄了他們的防線，中國軍隊就沒有理由再作無謂犧牲，而應盡早脫離戰場。然而史迪威反對這麼做，即使看得出來戰局(包括英國人的和日本人的因素)並非他個人能力所能扭轉，他還是痛恨「撤退」這個想法。

史迪威此時突然認定，由於蔣介石曾拒絕他把軍隊集結在平滿納的建議，因此是導致當前危機的禍首。原因是蔣介石曾經宣稱，假如英國人不能堅守普羅姆戰線，他就要把中國軍隊自緬甸完全撤離[73]。史迪威認定，蔣介石最大過錯就是沒有及時把第22師從曼德勒調派到緬甸南部。但是史迪威並沒有說明，爲什麼英國人已經拒絕保證堅守普羅姆，而中國軍隊仍應向南部平滿納方向去集結。史迪威僅僅以爲尚有阻擋日軍前進的一絲希望，指望中國軍隊或許還能創造奇蹟，以寡擊眾，收復仰光。這其實是一個極不切實際的想法，因爲史迪威根本不知道他面對的敵人到底有多少兵力。一直等到中國士兵付出慘重代價之後，史迪威才得知原來日軍數量要比同盟國早先估計的大得多，而且來自四面八方。如果中國軍隊果真聽從史迪威主張大規模向緬甸南部集結的話，則他們很可能被日軍包圍，遭到殲滅。

史迪威批評第22師動作緩慢，花費四天才抵達目的地，這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且多次被史學著作引用來支持史迪威戰略的正確性。但是史迪威避而不談的是，該師是步兵師，行動靠英國人控制的鐵路系統，而該系統已經瓦解。也正是在此關鍵時

68 Stilwell letter to Stimson, March 23, 1942. Tuchman, p. 351.
69 JWS diary entry March 26, 194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67-68.
70 JWS t-w diaries, March 27, 1942.
71 Ibid., March 28, 1942.
72 《大本營陸軍部》(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1冊，頁793-803。
73 JWS t-w diaries, March 26, 1942.

刻，英國人單獨決定脫離戰場，在3月27日放棄普羅姆，從而使得中國軍隊的西側立即暴露在日軍威脅之下[74]。這個發展正是蔣介石在經歷多次英國人背信行爲之後所最擔心的，而且也曾一再警告史迪威，務必設法避免。不幸的是，史迪威要嘛根本不重視蔣介石的警告，要嘛對英國人行爲毫無克制的能力，因此悲劇依然發生。

1942年3月29日，第200師在苦戰12天後從同古(Toungoo)撤退[75]，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我的天啊！我真是受够了。」[76]在他的心目中，戰局逆轉的過錯可說是再清楚不過。他寫道：

> 由於愚蠢、恐懼和守成的心態之累，我們失去了一個好機會把日本人在棠吉的圖且(Touches)擊潰。問題的根源是蔣介石干預。假如他當時讓我把軍隊集結在平滿納，我們就可以做好攻擊的準備。假如當我命令第22師南下增援時，他不橫加阻擾的話，我們就會有足夠的兵力在日軍剛剛抵達圖且時切斷它的後路。假如他沒有背著我，私下直接命令杜聿明和林蔚的話，他們就可能會服從我的命令。但是他就是無法克制自己……他寫了無數的手令，叫部下做這做那。而他的根據，無非是些殘缺不全的情報，和他自己荒唐的戰術觀點。他自以為懂得心理學。事實上，他以為他自己什麼都懂。其實他的決定總是搖擺不定，情況一改變，他的主意就改變……他堅持要防守曼德勒，但是他卻不了解，防守曼德勒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圖且把日軍打敗[77]。

3月30日史迪威審視局勢，他能夠看到的選擇大致是：不採取任何行動，看情況變化再作定奪；乾脆辭職不幹；脫離戰場；另起爐灶，要求獲得一支自己的軍隊[78]。

有趣的是，蔣介石對局勢的看法完全不同。雖然他對緬甸戰局非常擔憂，但是他真正痛恨的對象卻是自私自大的英國。他對英國軍隊的作戰準備不足和它們不斷的撤退和棄守，感到「噁心」。他也對史迪威不了解敵人的心理大感失望。但是他還是盡量壓抑自己的怒氣，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反應過度，因爲中國軍隊終究還沒有遭受重大

7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69.
75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滇緬路之作戰》，第26章第3節，圖表5，第4部分。
7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70.
77 Diary entry of April 1, 194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3-74.
78 JWS t-w diaries, March 30, 1942.

損傷[79]。然而，史迪威卻沒有耐心克制自己的脾氣，並且決定要和蔣介石進行一場針鋒相對的談判。

## 陸、1942年4月：戰局大變

### 一、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摩擦與妥協

史迪威在4月1日從緬甸前線飛返重慶，帶著滿肚子怒火去見蔣介石。他如此回憶道：「中午12點去見蔣介石，對他毫不假辭色，這使他不免大吃一驚。我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不幹了。我打算另外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我不會用空軍第十大隊支援他那些指揮官。下午1點鐘我才離開。讓他們留下來自己去發愁吧。」[80]又說：「那是一場坦率的對話，炸彈四處開花……商震深感震驚，蔣介石夫婦憂心忡忡。」[81]史迪威抱怨中國將領不服從指揮，而且指名要求撤換第5軍軍長杜聿明將軍，蔣介石當即答應對史迪威的指控進行調查。然而最讓蔣介石驚訝的是史迪威表示他想辭職。因爲按照蔣介石想法，史迪威既然是一個軍人，就應該懂得中美兩國軍隊的重大差異，也應該注意兩國人民思想上的差別。蔣介石固然不滿意史迪威耍脾氣和要求過分，但是他尤其擔心的是史迪威受英國人愚弄。史迪威聲稱要「建立一支獨立的軍隊」純屬虛聲恫嚇，或是不知天高地厚，而蔣介石心中卻清楚美國政府根本無意派遣軍隊赴緬作戰。如果美國果真派遣軍隊，那就是中國求之不得的大喜訊。然而，儘管蔣介石此時認爲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的犧牲已經不再有意義，但是他還是想維持和史迪威之間的關係，目的是顧到同盟國整體利益和中美雙邊關係和諧[82]。顯然，在蔣介石心目中，和盟邦維持團結形象已經漸漸成爲影響中國軍事決定上的重要政治目標。到了1944年，他將會爲這個決定而悔恨不已(見第11章)。

面對史迪威抱怨，蔣介石的具體回應是，他採納蔣夫人建議，決定親赴緬甸前線，並當著中國將領們的面去提高史迪威的權威。他也同時決定派羅卓英將軍爲史迪威的副手，協助史迪威貫徹命令。最後，他還把國軍的人事任免及處分權授給史迪威。在這個新安排之下，史迪威並不直接下命令給中國將領們，而是經由羅卓英把命令轉達

79 蔣介石日記，1942年3月28、30、31日。
80 JWS t-w diaries, April 1, 1942.
81 Diary entry of April 1, 194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3-74.
82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1日。

給這些將領們[83]。不過，蔣介石此時私下也開始擔心，如果中國軍隊在戰爭中遭遇重大傷亡時，恐怕將無法得到補充。他還擔心，如果中國在緬甸遭受失敗，其國際地位將遭受重大打擊[84]。

儘管如此，但是爲了平息史迪威的怒火，同時也是爲了維護中美合作關係，蔣介石與夫人還是決定親赴緬甸前線(4月5-9日)[85]，並親口告訴中國將領們必須服從史迪威的命令。史迪威在得到蔣介石這些讓步之後，也在日記中承認：「說句公平話，要中國人把兩個軍的兵力，託付給一個完全不認識而且又缺乏信心的外國佬在一個重要地區運用，這本身也的確是一件相當過分的事。」他還承認：「多年來蔣介石一直習慣於發號施令，旁邊又圍著一群馴服的小人。以致讓他誤以爲自己永遠正確。不過，他倒的確是果斷而有決心，而且堅持作戰。」[86]

蔣介石把羅卓英擺在史迪威和其他中國將領之間的做法，其用心並不爲美國軍方體會，但卻有特殊的中國文化意義，同時也間接顯示了蔣介石和他部下的特殊關係。由於時間和環境因素的限制，蔣介石無法要求他部下立即改變對史迪威這個外國人的態度，因此他能夠做的就是讓羅卓英成爲協調人，因爲羅卓英在國軍中的資歷足以得到杜聿明和其他將領們的尊重，而這種道理對美國人來說卻不能理解，又看來毫不相干。

出於同樣理由，史迪威不斷要求把杜聿明撤職一事，從美國的體制而言似乎言之成理，但從中國政治現實來看則是不切實際。這倒不是因爲蔣介石無權撤除杜聿明的職務，而是因爲他知道第5軍內部的團結基礎，相當一部分繫於杜聿明和他部下之間的個人關係。杜聿明一旦被撤職，那麼第5軍下屬各單位彼此的信任和忠誠度就可能嚴重受損。

在緬甸，蔣介石能夠幫助史迪威消除其不滿的上策，就是減少史迪威與中國將領們之間的直接接觸。讓蔣介石感到兩難的是，一方面他不能爲了將就一位外國將領而捨棄他最忠實的部屬，另一方面他也了解這位外國將領對中國有非凡的重要性。因此他對史迪威的感覺必須小心處理，讓後者覺得中國對他的確夠委曲求全的了。一般來說，美國人尊重制度，而中國人卻既擁有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又看重私人關係。因此，蔣介石的解決方式就是用羅卓英作爲指揮系統中的新潤滑劑，盡量化解美國軍人和中

83　同上。
84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4日。
85　同上，1942年4月10日。
86　Entry of April 1, 194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73-74.

國軍人之間的矛盾。然而從蔣介石這番細心安排中，也可以看出中國政軍環境中的另外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假如蔣介石在和自己忠實部下打交道時，都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地進行處理的話，那麼他和那些目無政府的地方實力派軍人打交道時，其困難程度就更不難想像了[87]。

## 二、戰局日益險峻

史迪威在1942年4月5日陪同蔣介石夫婦回到緬甸時，中國軍隊的戰線已開始向緬北後撤，但基本上仍舊保持完整，沒有產生大規模混亂。史迪威當即重新部署兵力，希望把日軍誘入一個口袋後加以重創。假如他的構想能夠實現的話，那麼中國軍隊就還有機會順利退守曼德勒，重建一條更靠北面的防線。諷刺的是，這正是蔣介石當初建議卻被史迪威排斥的方案[88]。虛耗一個多月之後，史迪威又回到了原點。

如果當初保衛曼德勒方案曾有過實行的機會的話，那個機會此時已經消失。原因是，史迪威當時選擇了向南冒險推進，隨後又被迫向北撤退。這就給了日軍足夠時間，兵分三路沿伊洛瓦底江河谷北上。日軍目的是在5月中旬雨季來臨前，清除臘戍到更的宛河(Chindwin)之間的中英軍隊。更有進者，日本還秘密地從仰光港口運進了大批士兵和裝甲車支援作戰。其間又利用了英國人撤退時來不急燒毀而遺留在仰光港的大批軍事器材[89]。這些器材當然包括當初從Tulsa等船隻上劫走的中國軍火部分。蔣介石也是在此時方才得知，原來英國人在曼德勒根本沒有修築工事，但是又不准許中國軍隊進城修建自己的工事[90]。這一連串的信息都使蔣介石對英國人的怨憤逐日上升。

4月7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當著史迪威的面向全場中國將領們宣布，史迪威將以他的聯軍參謀長身分，全權指揮在緬甸的中國部隊，並擁有全權和英國協商一切有關同盟國合作事宜[91]。蔣介石的宣布顯然讓史迪威非常高興。他寫道：「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新紀錄。他(蔣介石)已經接受我的說法，那就是：我們必須就地作戰，並保護石油和糧食。我們此時必須進行決戰。羅(卓英)、杜(聿明)現在也完全支持作戰……英國人答應在我們到來之前一定守住他們的陣地。一旦我們完成準備，我們就會進攻……即使在一個月之前，這件事看起來完全不可能，我也不相信它會變成事

87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4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587-590。

8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75.

89 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頁884-901。

90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5日。

91 蔣介石對中國遠征軍將領的訓話記錄，1942年4月7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152-155。

實。然而，杜聿明和羅卓英現在卻說，他們在打敗日本鬼子之前絕不回中國。他們可能是胡扯，但他們至少已經作出承諾。」[92]

不過蔣介石在緬甸的實地視察也讓他產生新懷疑，到底中國是否值得繼續留在緬甸作戰。原因是他到處所見都是當地政府機構全面瓦解，通訊交通徹底癱瘓，人民極度惶恐不安，士兵戰鬥意願低落，市區一片混亂和失控，而民間反英和親日情緒卻既旺盛又普遍。蔣介石還親眼看到，曼德勒城在日本飛機轟炸兩天後(4月7日)依然在燃燒中，受難者屍體在烈日下曝曬街頭，而警察卻早已逃之夭夭。蔣介石又得知英國人在退卻時居然沒有破壞公路，以致日軍得以全速推進[93]。更讓他不滿的是，英國人宣布只願意向中國軍隊提供一天的糧食，而不願意作長期承諾[94]。

緬甸戰場險峻局勢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在時間還允許的條件下，開始設想把軍隊撤離緬甸。但是史迪威卻向蔣介石提出保證，一旦英國軍隊崩潰，中國軍隊依然可以通過棠吉(Taungyi)進入安全地帶。而蔣介石似乎也接受了這個說法[95]。因此在經過幾度掙扎之後，蔣介石還是決定讓軍隊繼續留在緬甸作戰。爲此，蔣介石在日記裡寫道：「對於我軍進退之策，考慮再三，最後只有盡力補救，與敵在緬甸周旋到底之一法。否則雖保全一部分兵力，然於國際地位與國軍聲威，甚不利也。」[96]由此可見，雖然蔣介石此時對於緬甸戰爭的軍事價值已經產生懷疑，但是依然信任史迪威可以作出妥善處理，而且想以打好戰爭來維持國際形象的政治考量也開始發生作用。事實上，他訓令部下將領們務必要和日軍打硬仗，要把保衛曼德勒(緬甸首都)看成和南京(中國首都)有同樣重要的象徵意義[97]。因爲這是中國軍隊首次有機會保衛一個外國重要城市，而他要求他們務必努力作戰，以維護中國的國家榮譽[98]。由此可見，蔣介石在緬甸戰爭中的動機是要打一個好仗，而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榮譽又是他的重要考慮。這與史迪威和美國軍方後來對他動機的猜疑，認爲他一味只想避免戰爭保持實力的說法，有著重大差異。換言之，假如史迪威當時正確地解讀了蔣介石動機的話，那麼在處理兩人間的合作關係上，將可能會有大不相同的選擇。再進一步說，如果後來學者在敘述緬甸

92　JWS t-w diaries, April 7, 1942.

93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8、9日。Also: "Anti-British sentiment expressed in cables from Madame Chiang Kai-shek",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3.

94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3月10日。

95　JWS t-w diaries, April 7, 1942.

96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11日。

97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黨德信等編，《遠征印緬抗戰》，頁13-14。

98　同上。

戰爭時，把這些史料列入考慮的話，那麼他們對蔣介石對緬甸戰爭的態度，和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批評，都會不得不作出相應的修正。

就在蔣介石決定繼續在緬甸作戰的同時，他還是忍不住給史迪威更多的訓令，叮囑他應該如何與日本人作戰[99]。毫不意外地，這只能使史迪威火冒三丈。不過有趣的是，蔣介石此時給史迪威和中國將領們的訓示，並不是要他們保存實力，反而是催促他們更積極主動地去進攻敵人，並決心防守自己的陣地等等[100]。然而對史迪威而言，他一心一意只想把蔣介石排除在戰場之外，所以蔣介石訓令內容究竟是進取或是保守，對他都無關緊要。

既然最讓蔣介石擔心的是英國人的動向，因此他不免三番五次地敦促史迪威一定要取得英國人承諾，保證他們一定會守住自己的陣地。由於蔣介石認爲英國對緬甸的態度取決於它對印度的態度，因此當他聽到英國和印度民族運動領袖們之間的談判破裂時，他立即認爲英國人可能寧可讓印度陷入日本人手中，也不願意對印度人承諾將來賦予他們自由和獨立，來換取他們當前對同盟國的全力支持。根據蔣介石判斷，英國人或許早已盤算過，一個獨立的印度將永遠拿不回來，而一個淪陷的印度還可以在戰後從日本人手中收復[101]。這個判斷不禁使蔣介石對英國是否真有意願防守緬甸產生極大懷疑[102]。

既然蔣介石對英國動向如此疑懼，因此他自然更爲史迪威的行爲操心。在他看來，史迪威只知專注戰場眼前形勢，而對緬甸大局缺乏宏觀性掌握，因此不懂得對英國人保持高度警惕性。而在蔣介石心目中，英國人詭計多端，損人利己，卑鄙下流[103]。的確，緬甸局勢發展也著實讓蔣介石有足夠理由去擔心。比如說，4月中旬蔣介石得知，英國部隊一面在進行大撤退，另一面卻向中國軍隊謊稱他們正在堅守陣地。結果是，中國軍隊被誤導而堅守了它們自己的陣地，因此遭到完全不必要的重大傷亡。蔣介石爲此憤怒不已，認爲英國人「完全欺騙也。英人可說無禮無恥極矣。」[104]由於英國的這些行爲，所以蔣介石再度嚴令羅卓英(4月20日)，絕對不准把軍以下單位(即師、團)和英軍

99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8、9、11、20日。
100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8日。
101 同上，1942年4月12日。
102 同上。
103 同上，1942年4月26日。
104 同上，1942年4月15日。又見：蔣介石與史迪威及亞歷山大將軍會談記錄，1942年3月27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117-120。

混合使用。蔣介石堅持同盟國軍隊作戰時權責必須分明，以免受人欺弄[105]。

事實上，史迪威對英國人的動向也有他自己的憂慮。4月13日，當他看到英軍在馬格威(Magwe)地區防務徹底崩潰時，已經料到英軍戰線將全面不保。他在給他妻子的信中(4月16日)寫道：「我想我們不久將會挨一場痛揍……中國軍隊一直表現良好，但是如果它們沒有好的武器，我們就無法指望它們創造更好的戰果。」[106]從邏輯上來說，既然史迪威在4月中旬已經看出英軍全面崩潰將無可避免，那麼他最急迫的任務理應是向蔣介石據實以報，同時緊急著手籌劃如何安全撤退中國部隊。然而讓人不解的是，他不但把對英軍的判斷向蔣介石徹底保密，而且在兩周後戰場失敗終於發生時，他的反應依然慌張失措。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向羅斯福及邱吉爾提出建議(4月17日)，爲了挽救緬甸局勢，盟邦必須增加對中國的援助[107]。當然，他的呼籲並沒有得到後者任何回應。

整個4月份，日軍進展非常順利。它基本上兵分四路：1. 第56師團從東瓜東進撣部高原，向臘戌方面攻擊中國軍隊。2. 第55師團攻占同古後，向雅美前進，4月19日占領板間。3. 第18師團於4月11日在仰光港登陸完畢，於16日向板間急進，參加第55師團攻擊。4. 第33師團在4月20日占領馬格威和仁安羌兩地[108]。因此，到了4月下旬，緬甸局勢已經急劇惡化。同盟國(大部分是中國的)陣地遭到日軍不斷轟炸，而史迪威又無能力爲它們提供任何空軍支援。由於缺乏空中偵查能力，因此史迪威完全沒有察覺到大批日軍正在從四面八方對盟軍進行包圍。等到日軍開始攻擊英軍西側的仁安羌(油田)時，史迪威依然命令中國軍隊以急行軍方式支援英軍。雖然這個英勇行動是同盟國團結的好榜樣，但是它也給日軍製造機會把中國軍隊在雷列姆(Loilem)防線打破一個大缺口，並且殲滅了中國第55師。在此之後，同盟國防線就再也無法恢復完整。到了這個地步，同盟國部隊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如何求生。到了4月20日，戰局變得益發不可收拾。史迪威也得到許多令他震驚而又無法證實的壞消息。但是他心中已經有數，全盤崩潰之日即將來臨。史迪威寫道：「英國人會不會開溜？當然會。結局已經日益明顯。」[109]

就在此時，重慶政府也不斷收到壞消息。4月29日蔣介石獲知，英國人剛剛在前一天把大量軍用物資付之一炬。令他特別痛心的是英軍的這批物資一直對中國人保密，目

105 蔣介石致羅卓英函，1942年4月20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0冊，頁35。

10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78. Also: JWS t-w diaries, April 14, 1942.

107 蔣介石致羅斯福及邱吉爾電，1942年4月17日，《戰時外交》(三)，頁130-131。

108 《大本營陸軍部》(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1冊，頁793-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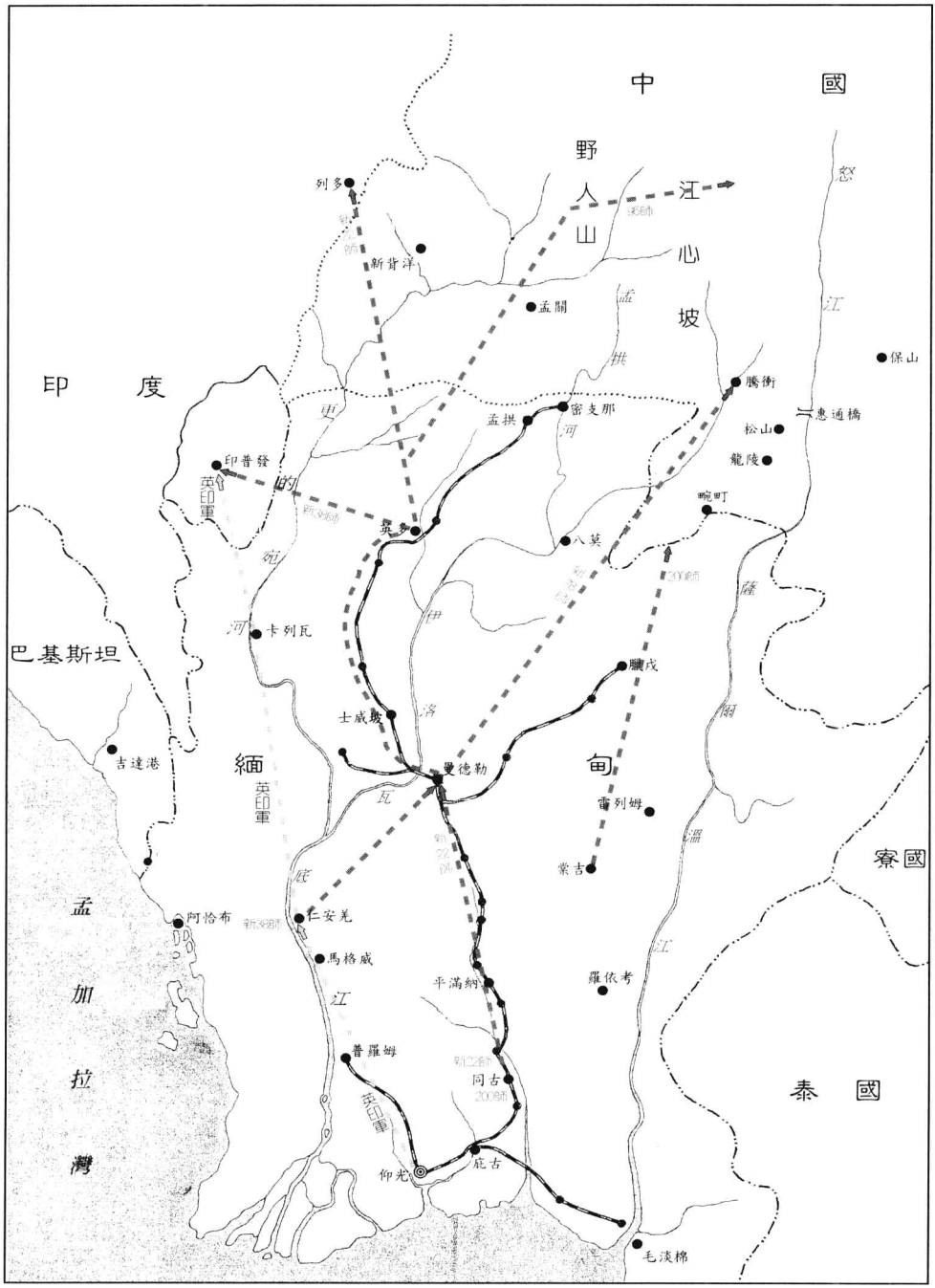
109 JWS t-w diaries, April 18-20,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April 20, 1942, p. 82. 它們所引用史迪威的文字不盡相同，顯然經過彙編者的處理。

的就是不要和中國軍隊分享共用，最後寧可燒毀。在蔣介石眼裡，當前情況已經十分明顯：英國的撤退表示它已經決定全盤放棄緬甸。正如蔣介石怒氣沖天地寫道：「平生軍事之經歷，未有如此次英軍之愚而弱也。可痛極矣。」儘管遭遇這些挫折，4月29日當臘戌失守時，中國第5軍仍然保持大致完整，剛剛渡過伊洛瓦底江(Irrawaddy)抵達北岸，並在著手建築新工事。而中國的機械化部隊也還未遭受重大損失。雖然蔣介石還沒有收到有關第6軍和第200師準確位置的戰報，但是他仍然相信它們也尚未遭遇重大損失[110]。雖然實際情況比他想像要糟糕許多，但是從客觀而言應該仍然有路可退。

種種跡象顯示，假如史迪威在4月底能夠採取果斷決定的話，中國軍隊仍然有機會在被日軍從兩邊包抄切斷後路之前，沿鐵路向北安全撤退到曼德勒和密支那。再從這個地區沿公路返回中國。但是史迪威猶豫不決，根本的原因是他在內心中還沒打定主意，到底是命令中國軍隊返回中國還是去印度？由於這種拖延，公路不久就被大量的難民堵塞，導致中國士兵在退卻途中因爲日軍飛機輪番炸射而傷亡慘重。就在史迪威本人穿過曼德勒和士威坡(Shwebbo)往北走的途中，他得知日軍已經占領臘戌，因此切斷了中國軍隊經由緬甸路回國的正常途徑[111]。

110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29-30日。

11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80.




第一次緬甸戰爭戰敗時盟軍撤退路線

深色代表中國軍隊，淺色代表英印軍隊

## 第四章

# 第一次緬甸戰爭：1942年5-6月

## ——慘敗及其影響

以往許多著作在討論中美同盟關係期間前後兩次緬甸戰爭時，都會以較大篇幅引用史迪威對蔣介石的各項批評，把它們視爲可靠史料，藉此證明蔣介石缺乏鬥志，不肯給史迪威充分授權和誠意合作。而蔣介石本人則既缺乏現代戰略戰術觀念，又只有低劣的統御才能，對緬甸的防衛和收復只作表面姿態，內心其實從不熱衷。相對而言，史迪威不但軍事判斷正確，而且鬥志高昂，展示高度毅力要克服重重困難去保衛緬甸。更有進者，史迪威所做的一切努力，目的都是爲了要幫助中國，而中國領袖和將領們卻不爭氣，只知推諉、規避和膽怯無能，還要處處阻擾史迪威的努力。

不幸的是，這種分析把兩件不同性質的事情混爲一談：一是史迪威與蔣介石個人之間的摩擦，另一是中美兩國對這兩次戰爭的必要性、時機及規模的不同看法。由於以往研究只注意美國單方面史料和邏輯推論，及美國人對中國人動機與意向的臆度，因此它的學術成果並不令人滿意。如果我們進一步推敲的話，就會發現，即使是被史學界廣泛使用過的美方資料，也未必支持他們的推論，更何況還有大量美方資料未被發掘使用。考其原因，或是由於研究工作的疏鬆，或是由於史料不能支持他們的立論，因而遭受摒棄（比如，支持史迪威的論述很少採用陳納德的史料）。同樣重要的是，研究者不參考中方資料，就絕對讓他們分析的可信度和公允性大大打了折扣。

正如第三章所討論的，中國領袖防守緬甸的意願，遠比英國和美國表示得要更早，也更積極。而且中國政府早在1941年就曾力求英國，允許中國軍隊在未來緬甸戰爭中負擔重要責任。而正是由於中國領袖們在第一次緬甸戰爭中感到被盟邦欺騙，再加上對史迪威領導才能產生重大懷疑，才使得他們後來對第二次緬甸戰爭計畫會要求各項細節務必詳盡，甚至決不讓步妥協。

因此，如果忽略中國政府對兩次緬甸戰爭態度之間的關聯性的話，就很容易產生一種誤解，以爲中國政府在1942-43年間所提出的各種質疑和保留，都是無事生非或是

存心攪局，其目的無非是逃避作戰責任。但是如果了解中國人自認爲從第一次緬甸戰爭所吸取到的經驗和教訓的話，就容易理解他們爲什麼發誓，絕不在第二次緬甸戰爭中重蹈覆轍的心情了。中國人的觀點應該受到重視，因爲它們可以幫助我們更全面地了解中美軍事合作關係。

儘管蔣介石最初對史迪威充滿善意，但是到了1942年中期，緬甸的失敗已經徹底摧毀他對史迪威軍事才能的信任和品格的尊重。兩人關係所以陷於無可挽救的惡化，是因爲他們對第一次戰爭失敗原因的分析和提出的對策彼此南轅北轍。歷來西方史學界對於史迪威的立場，都給予充分闡述和高度肯定，但對蔣介石立場卻沒有給予同等重視。特別是有些著作幾乎完全不提蔣介石對第一次戰爭的想法和感受，這實在是一大缺失。

本章的目的，就是把中美雙方的觀點同時納入考慮，以期對這段歷史作出更持平的處理。對這一段歷史，中國領袖們無論當時或事後數十年來都保持高度緘默，但是描述他們私下感受的資料卻相當豐富，並且和學術界所提供的論述大不相同。這從蔣介石日記的描述、他與親信們的談話和書信來往，以及他和幾位美國訪客（居里Lauchlin B. Currie、納爾遜Donald M. Nelson、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的長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這幾類資料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讓我們更能了解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感受，和他對美國政府以及對羅斯福總統本人的態度。這些資料顯示，中美兩國政府對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史實並無太多爭議，但是兩國對戰爭失敗原因的分析卻是大相徑庭。本章的重點是運用雙方資料，把中美政府和領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凸顯出來，從而把同盟關係以動態方式加以描述。

## 壹、同盟國戰線總崩潰：1942年5月

### 一、史迪威拋棄中國軍隊脫離戰場

蔣介石最早對緬甸前線情況感到大事不妙是在5月6日那天。當時他在毫無預警情況下，突然接到杜聿明將軍報告稱，史迪威已經下令中國軍隊向印度撤退。這個消息讓蔣介石大吃一驚，並趕緊設法更改行軍命令。但是對許多部隊來說，向中國北撤的時機已經錯過[1]。蔣介石事後對居里抱怨說，他在戰敗前曾經明確指示史迪威，中國軍

1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6日。蔣介石不斷設法與中國軍隊保持聯繫，命令後者留在緬甸繼續作戰，而不要向印度撤退，見：《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

隊必須撤回本國[2]。讓蔣介石感到特別氣憤的是，史迪威儘管有辦法在任何時候直接與蔣介石保持電報通訊，但他事先既未請求批准，事後又未提出報告[3]。事實上，史迪威在5月2日還曾接到到過蔣介石電報，命令他抓緊時機率領第5軍向密支那方向退卻[4]。5月3日，史迪威又先後接到蔣介石三通電報[5]。換言之，雖然史迪威一直和蔣介石保持聯繫，但他決定把他打算向印度方向撤退的意圖，對蔣介石絕對保密[6]。

史迪威爲什麼要向蔣介石保密？最明顯的解釋是他在等候美國軍部指示。在4月30日或更早時間，史迪威已經了解緬甸戰局正面臨「立即的瓦解和崩潰」[7]。因此，他發電「請求軍部指示應該去哪裡——印度還是中國？」[8]這一通電報證實，即便此時，只要他願意，他仍然有機會帶領部隊返回中國。它同時也顯示，他在故意誤導美國軍部，因爲蔣介石已經明令他只可以回到中國，所以他並無「選擇」餘地可言，更不能要求美國軍部越俎代庖，取代中國政府作出任何決定。但他卻選擇對軍部秘而不宣。當軍部拒絕提出明確答覆時(**大概因為馬歇爾完全明白軍部無權決定此事**)[9]，史迪威就自作主張地向印度方向撤退。

在第一次緬甸戰爭的最後幾天中，史迪威這一連串行爲馬上突出了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那就是，雖然史迪威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來自中國政府的信託和授權，但是他卻只向美國軍部提供及時戰報和請求指示，同時故意切斷自己跟中國戰區統帥之間的一切聯繫，期使後者完全喪失發言權。

有趣的是，美國軍方並沒有對這個反常行爲表示不安。即使馬歇爾本人也沒有對史迪威的行爲提出糾正，他最多只是避免被史迪威捲進一場是非而已。反倒是國務院的項貝克立刻察覺史迪威的行爲乖張，並問說：「爲什麼他要問美國而不問蔣介石呢？」項貝克指出，「從政治觀點出發，史迪威要離開緬甸的話，除非蔣介石委員長命令他去

2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5日，《戰時外交》(一)，頁643-650。

3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5月7日。JWS t-w diaries, April 29-30, 1942. Also: *The Stilwell Papers,* p. 85.

4 JWS t-w diaries, May 3, 1942.

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87. 蔣介石致史迪威及羅卓英電，1942年5月7日及以後數日，見：《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1冊，#15148及以後數件。

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39.

7 JWS t-w diaries, April 30, 1942.

8 Ibid. Also: Hornbeck memo to Well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May 5, 1942.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9 As Stilwell recorded on May 4, "Radios from Marshall. Indefinite."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87.

印度，（否則）他就應該去中國。不然，他至少也應該先去重慶和蔣介石委員長會商，徵求同意後再從重慶去印度。」[10] 當然，項貝克和國務院此時都已失去了發言權。

西方史學界對於史迪威逃往印度的責任歷來都不願深究，他們所持的說法是：由於當時戰場情況危急和中國軍隊指揮系統已經全面失控，所以史迪威無法進行有秩序的退卻[11]。這種說法只不過是把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束之高閣，全盤套用史迪威自己的說詞，爲其解脫責任而已。如果研究者認真閱讀以上的美方材料，他們就會看到，史迪威在4月30日以前（甚至更早）就已經知道應該著手規劃總撤退，但是浪費了多日寶貴時間，目的就是爲了等待美國軍部指示，而軍部又偏偏拒絕下達指示。在這段時間裡，儘管他明知蔣介石的決定是要把軍隊撤回本國，他卻把自己的意圖向中國政府隱瞞。難怪看在中國人眼裡，史迪威的行爲不但是明目張膽地違反軍紀，而且是完全無視中國主權，把自己的意願凌駕於中國政府之上。令人不解的是，史迪威在教訓中國將領們時，一再強調自己是一位鐵面無私注重軍紀的長官，但是一旦涉及自己的行爲時又表現出言行不一致。當然，他這麼做的唯一可能解釋是，他相信他本人和美國軍部擁有更高的權威，來替中國人作決定，甚至包括違抗他的統帥的命令。而根據日軍作戰記錄顯示，緬北主要城市只有臘戍一地是在4月29日失守，其他地方都是在5月上、中旬失陷[12]。因此從時間上看，只要史迪威盡力爲之，他應該來得及安排大部分部隊向中國國境作有次序的撤退，但他卻完全無所作爲。

5月6日，史迪威終於向蔣介石透露他的行蹤，但卻又選擇了一個最輕描淡寫的方式。他避免直接向蔣介石提出報告，而是寫了一張便條叫馬格魯德將軍轉交蔣夫人（不是蔣介石），聲明自己已經啓程前往印度。史迪威以這種轉彎抹角的方式通知蔣介石，他的用意就是不讓蔣介石有任何機會命令他改變行程。不難想像，他這個做法使蔣介石怒不可遏。正如蔣介石在馬格魯德電文上親筆的眉批所言，「史蒂華（史迪威）脫離我

10 Hornbeck memo to Welles,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May 5, 1942.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1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38-139.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p. 95-105.

12 日軍在緬北的軍事進展：1. 第56師團在1942年4月29日上午占領臘戍。2. 第18師團在5月1日占領曼德勒。3. 第56師團在5月2日占領中緬邊境的南坎，3日占領八莫，7日占領密支那，攻克中國境內的芒市、龍陵，10日晚占領騰越。4. 第33師團在5月1日至馬尼哇，12日占領更的宛河畔的瓜里哇。5月4日占領印緬邊境的阿恰布機場。5. 第55師團在5月13日占領伊洛瓦底江畔之卡薩。又：日軍雖然在5月18日宣布戰爭勝利，但是戰鬥在6月仍在進行。見：《大本營陸軍部》（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2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124-128。

軍，擅赴印度，只來此電作爲通報，不知軍紀何在？」[13] 5月9日，蔣介石更是把滿腔怒火傾注在日記裡：

> 史迪華擅自令我華軍赴印度，而彼且離開隊伍，先行赴印。並無一電請示。此種軍人，殊非預想所及。然此乃余考察無能與信人太過之罪，而於人何咎[14]？

明確地說，蔣介石對史迪威態度的轉捩點，並不在於中國軍隊在緬甸戰場作戰的過程，或是遭受挫敗的結局。真正的導火線是史迪威對蔣介石有關撤退路線的指令充耳不聞，並且擅自拋棄部隊所致。當撤退後來導致數以千計的中國官兵死亡時，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厭惡終於變成無可扭轉。

## 二、美國人指控羅卓英臨陣潛逃

蔣介石的心情還來不及從史迪威擅離戰場的打擊中平復過來，緊接著又遭受新一輪打擊（5月10日）。這就是美國軍方指控羅卓英將軍——這位史迪威指揮部最高階的中國軍官——拋棄部隊隻身逃往保山。蔣介石聞訊後立即請求美國軍部協助調查真相[15]。不久之後，事實證明羅卓英不但沒有潛逃，而且他謹遵蔣介石命令試圖前往密支那，而史迪威卻因違反命令走了方向相反的路線，並因此和羅卓英失去聯絡[16]。到了5月16日，羅卓英送來報告顯示，他仍舊掌控在緬甸境內的部隊[17]。而史迪威早已離開戰場多時了。

美國軍方指控羅卓英臨陣脫逃一事，是中美軍事領袖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因素。許多歷史著作都引用這個事件，來支持史迪威對中國軍人的嚴厲批評，但他們顯然沒有小心地去考證史料，更沒有參考羅卓英本人的報告[18]，以致以訛傳訛。根據蔣介石情報，第一個向華盛頓檢舉羅卓英臨陣脫逃的消息正是來自史迪威本人，但是當蔣介石在重慶

---

13　格魯德致蔣夫人備忘錄，1942年5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591-592。

14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9日。

15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5月10日；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14日，《戰時外交》（三），頁592-593。

16　JWS t-w diaries, April 27-May 5, 1942. See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5-87.

17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5月16日；蔣介石致宋子文及熊式輝信件，1942年6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593-594，603-604。

1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4-88.

當面詢問史迪威時，史迪威卻矢口否認他與此事有任何關聯[19]。當然到了這個時候，即便是美國人也已經得知，羅卓英留在戰場的時間遠遠超過史迪威。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爲什麼美國軍方(史迪威)如此急切而輕率地指責羅卓英臨陣潛逃？在中美雙方的檔案中都找不到答案。但是一個可能的動機是史迪威需要把自己的潛逃打扮成合情合理，或是迫不得已。因爲既然中方最高將領已經率先潛逃，導致指揮系統瓦解，那麼史迪威也就別無選擇，只好離開職守了。只是這個託詞不久就被事實所拆穿。

打從緬甸戰爭一開始，蔣介石的盤算就不僅是達成軍事目標而已。他同時也想證明，中國是一個有價值的盟邦(值得成為四強之一)。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失敗，對於蔣介石而言已經是一碗難以下嚥的苦藥。但是更讓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美國軍官居然在此時還要散布謠言，指控中國軍人臨陣脫逃。而在事實證明指控失實時，卻沒有一位美國官員出面承認錯誤或表示遺憾。這項指控對於中國來說，是對國家榮譽的重大打擊，但是幾乎很少美國人對美國造成的傷害表示過在意。這個事件也不免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嘲諷。史迪威作爲戰地司令官，理直氣壯地違反上級命令私自出逃，倒反過來同樣理直氣壯地指控副司令官(羅卓英)臨陣潛逃。這種雙重標準已經足以令人啞然。等到事實證明指控錯誤時，又把責任推脫得一乾二淨。難怪蔣介石爲之怨憤不已。

## 三、史迪威跋涉赴印度的神話

史迪威長途跋涉步行到達印度一事，早已被傳記家們當成一項壯舉來津津樂道[20]。但是事實更爲複雜。

根據史迪威本人陳述，一旦他認爲無法指揮戰事時，他的第一個念頭就是主動脫離中國軍隊，帶領自己屬下的美國人及早遠離是非之地。史迪威的這股心思在他5月3日的手記中已經露出端倪。他寫道:「明顯地，我們現在已經無可作爲了。史比爾(Spear)正在帶著他的人員離開。杜聿明已經隨心所欲。羅卓英管不住他了。Lin Hsiang(林蔚?)無所事事。(在這種情形下)又何必讓美國人留在水深火熱之中呢？我準備把他們帶到夢拱(Mogaung)去。」[21]雖然不過幾個星期前，史迪威才全力從蔣介石手中爭取到對這些軍隊的指揮權，但是他此時的心情是棄之如敝屣，要趕快帶著美國人脫離戰場。

當史迪威擬定撤退計畫時，他頭腦保持高度清醒，打定主意要刻意避開主要道

19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5日；蔣介石與威爾基會談記錄，1942年10月5日，《戰時外交》(一)，頁643-650，760-775。

20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p. 95-240.

21 JWS t-w diaries, May 3, 1942.

路。依據他正確的判斷，公路和鐵路一定早已阻塞不通，所以他選擇了一條常人少用的僻徑(因為他得到一位熟悉當地情況的森林工作者的指引)，這讓他安然躲開了有如潮湧般的難民群和潰退的中國士兵。由於史迪威擔心自己的糧食可能短缺，所以他一定要努力去避開其他飢餓的中國軍隊[22]。因此，史迪威此時最大的關心，不是在混亂中去找回他的部下，和他們重建指揮關係，而是避之唯恐不及，躲開他們愈遠愈好。史迪威自己的話大概最能說明，爲什麼像他這麼一位統御十萬大軍的司令官，竟然可以和自己手下所有各階層的指揮系統完全失去聯繫，使他部下的官兵找不到他，而最後卻和一群非戰鬥人員共同逃脫。史迪威在5月5日寫了一段話，生動形容他是如何努力甩開其他中國指揮官們。他寫道：「我們在天黑後開始出發，一直走到晚上11點鐘。最後在Banmauk以外14公里處紮營。——我相信我們終於衝到人潮的前端了。杜聿明的人員和他們兩噸半卡車還落在後面。謝天謝地。」[23] 他在5月6日的日記再次寫道：「我們脫離了難民們走的大路，我們趕在中國人群的前面。如果我們繼續努力，我們一定可以脫險。」[24] 史迪威選擇的最佳方法是「趕在中國人的前面」，不被他們連累，以便自己的小隊伍安全撤往印度。

但是史迪威的記述不免啓人疑竇：戰場上的混亂到底是因爲中國軍隊失去紀律，以致使指揮官無法行使控制權；還是因爲總司令失蹤，並且蓄意避免與部隊建立接觸所導致？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即使在史迪威失蹤之後，許多部隊指揮官們還是有方法和重慶保持聯絡，請示重慶政府應該怎麼做，並且接到重慶的回覆[25]。而史迪威卻早已決定扔掉發報機，主動切斷與任何外界(包括重慶和中國遠征軍各單位)聯絡的可能性。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日軍一直要等到5月18日才宣布緬甸戰事結束[26]。這個事實表示，在史迪威脫離戰場後的兩周中，中國軍隊還在繼續戰鬥。而也是在5月18日那一天，史迪威安全抵達印度。他安全抵達的時間，比他的任何中國部屬都要早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27]。

史迪威的長途跋涉不久變成一個傳奇故事[28]。具體地說，他帶領著大約100名同行

22 Tuchman, p. 376.

23 JWS t-w diaries, April 27-May 5, 1942. 有關蔣介石和林蔚、杜聿明及其他將領的聯繫，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7、14日。

24 JWS t-w diaries, May 6,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8-89.

2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41.

26 曾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頁644-655。

27 Tuchman, p. 382.

28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者(26個美國人、13個英國人、16個中國人和一群緬甸護士)，越過原始叢林，涉水登山，最後抵達印度的印普哈(Imphal)(5月20日)，立即被當成是英雄，受到熱烈歡迎[29]。

無庸置疑，史迪威在脫險過程中的確承受了某種程度的顛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很少有一個59歲的美國陸軍中將會遭遇到同樣的曲折經驗。然而總的來說，這次脫險並不是艱辛到值得大事渲染的地步。史迪威自己提供的細節最值得參考。根據史迪威所述，他和同伴從來不缺乏糧食，也沒有遭遇到過一個日本兵，更沒有一個人遭受敵人砲火驚嚇，更不必說負傷了。正好相反，他們沿途能夠在村莊裡留宿，安穩入睡，有水洗澡，可以喝茶，不時還可以在河中游泳，有悠閒心情去欣賞沿途風景，甚至不時受到村莊領導人的豐盛款待。一路上，無論他們乘車、步行，或是乘竹筏，每人都可以攜帶行李(有時甚至大件行李)，而且不需要自己背負，因爲在不同路段有吉普車、挑夫、竹筏，或是騾馬代勞[30]。5月14日，史迪威一行與遠道聞訊前來迎接的英國官員相遇。英國方面帶來食物、醫師、馬匹和各式物品[31]。此後幾天他們不斷接受土著歡宴，大家盡情大吃大喝[32]。美國陸軍的官方歷史家更發揮想像力，把史迪威等人的行程描述得具有浪漫文學情調[33]。

5月18日，史迪威一行總共走了140哩路程之後，抵達終點。除了少數幾天趕路之外，他們平均每天走不到10哩[34]。總的來說，史迪威等人略感吃力的行軍時間，不過是最初10天(5月5-13日)急於擺脫中國軍隊的日子而已，後面5天就毫無艱苦可言了。由於他們從來沒有遭遇過敵人的攻擊，因此史迪威整個行程的辛苦程度，大概相當於一個喜愛健身的人，作一趟安排得當而又略感吃力的戶外運動而已。行程結束時，他們的傷病記錄是：四個人住進醫院，六個人腳痛或腹瀉，另外有幾個人皮膚起水泡，腿部發炎，或有疑似黃疸病，當然有不少人體重減輕了幾磅[35]。對於這個百來人的小團隊而言，史迪威把他們帶出險境，安然無恙地重獲安全，其領導才能可謂無懈可擊。但是對於遺留在戰場的十萬中國大軍而言，就完全是另外一碼事了。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本人倒是比他的神話製造者顯得更務實。他說：「我們的確有一個頗不尋常的

2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5-86.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42. 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lwell*, especially Part IV, pp. 259-268.

30 JWS t-w diaries, May 6-13,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8-93.

31 JWS t-w diaries, May 14, 1942.

32 Ibid., May 18, 1942.

3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42. Also: JWS t-w diaries, May 8, 1942.

34 JWS t-w diaries, May 5-18, 1942. Also: *The Stilwell Papers*, pp. 88-93.

35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242.

旅程。然而就像以往一樣，慢慢地會被誇張得不得了，最後都讓人認不出來了。」[36]後來的發展果然被他言中。

假如史迪威在途中曾經一度擔心世人會要他負緬甸戰敗責任的話，他在5月20日那天就完全安心了。因爲在這一天，他接到了馬歇爾歡迎他脫險歸來的熱情電報。幾天之後（5月26日）他又接到史汀生同樣語氣的電報。很明顯的，軍部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見本章貳-三），知道他並未把緬甸失敗歸罪於史迪威，大大鬆了一口氣，所以選擇在史迪威安抵印度的時候致電祝賀。軍部這幾通電文大大增加了史迪威對自己的信心，即：緬甸戰爭失敗完全是別人的過錯，在華盛頓頂頭上司的眼中，他竟然還是成績輝煌[37]。

史迪威的經歷不禁讓人想起稍早前，另外一位美國將軍出奔的遭遇。1942年初，美國在菲律賓的防務顯然無法抵抗日軍進攻，此時麥克阿瑟將軍仍舊在盡一切努力加強島上防務，並且拒絕離開。即使美國總統在2月22日以後三番兩次命令他撤離菲律賓，他仍然逗留了長達17天之久，最後才不得不服從命令，乘坐快艇離開菲律賓前往澳洲（1942年3月18日）。然而在離開之前，他仍然委派魏萊特（Jonathan M. Wainright）將軍代行統帥職務，而後者也繼續對強大的敵軍進行抵抗，直至一個半月後，在5月6日戰敗投降，淪爲日軍俘虜。碰巧的是，這一天正是史迪威急急忙忙丟下自己部隊的日子[38]。跟隨史迪威入緬作戰的美國軍官們也仿效主帥的例子，逃得一乾二淨。相對的，面對著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魏萊特將軍堅決拒絕拋棄自己的部下離去，以致他和大批美國軍官以及菲律賓士兵們同時成爲戰俘，歷盡千辛萬苦，直到日本戰敗才得到遲來的安慰。這個對比難免令人產生無盡的感歎。

## 貳、中美雙方對緬甸戰爭最初評估的差異

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何以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變得如此惡劣？答案在於他們兩人對第一次緬甸戰爭的評估截然不同。史迪威與蔣介石幾乎同時開始各自思考戰爭何以失敗，以及誰應該負責任的問題。史迪威在極短時間內（大約一周時間）就形成

3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3.

37 Message from Secretary of War, Stimson through GCM to JWS, May 26, 1942, in Xerox File 355, Item 5750. MFA.

38 Norman Polmar and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 pp. 15-16, 871.

了明確看法，而且從此沒有作過修正。他表達的用語斬釘截鐵，而這些話後來被史學界廣泛引用，成爲共識。相對而言，蔣介石卻經過相當長時間（大約一個半月左右）醞釀才逐漸形成他的看法，原因是他前後所得到的消息內容來自各方，零零碎碎，而又形形色色，因此初步得出的結論幾經充實和修正，最後形成定論。他的這種醞釀過程值得特別關注。

我們研究第一次緬甸戰爭時需要注意一個現象，那就是不少著作在討論史迪威和蔣介石的衝突時，多半把重點放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兩人對許多具體戰術問題上意見和作風相左。這些討論大量引用了史迪威個人檔案資料，因此頗爲忠實地反映了史迪威的看法。但是我們也必須注意的是，蔣介石對史迪威態度的決定性改變，是在接到關於中國軍隊退卻過程中遭受損失的報告之後才發生的。因此，第一次緬甸戰爭歷史應該分成兩個階段來探討。第一個階段是從開戰到戰場失敗，第二個階段是戰場失敗之後發生的慘劇。一旦採納這個新的劃分方法，我們對於第一次緬甸戰爭的評價就可能比較有全面性。再者，史迪威提供的史料雖然廣受引用，但是引用未必得法，所以仍然值得我們重新檢討它們的歷史價值，甚至它們能提供的新啓示。而中方歷史資料則更是幫助我們得到一個歷史全面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本章的目的。

## 一、美國人的觀點

史迪威剛逃離戰場沒幾天（5月10日），就已經迫不及待地作出關於第一次緬甸戰役的結論了。後來他又命令部屬起草了一份較長的正式文件，這使他更細緻地整理自己的思路，提供了一個更詳盡的作戰日誌，但是他的結論和基調完全沒有改變[39]。這個文件最大的目的是把戰敗責任歸諸他人身上：

> 假如有人問到緬甸淪陷的原因的話，這些原因可說是列舉不完的。從一開始，就發生了一連串的違背承諾和不願意支持作戰的事件。相關的因素包括以下各點：1. 日軍裝備和訓練的優勢；2. 日軍享有制空權；3. 蔣介石委員長遙控，衛佛爾漠不關心；4. 中國軍隊和英國軍隊缺乏進攻精神；5. 英國人的無能。亞歷山大將軍不懂指揮，他的參謀能力差，大部分軍官缺乏軍事訓練和能力；6. 鐵路系統的部分癱瘓造成中國部隊無法及時抵達陣地；7. 中國人無能。最糟糕的例子是第6

39 Stilwell's diary entry of 10 May, 1942, as quoted in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48.

軍第55師，在遭遇日軍兩個營兵力攻擊時，即告瓦解[40]。

這個官方文件忠實地反映了史迪威早在5月初就已形成的觀點。它同時絕口不提史迪威及其他美國軍官的行爲，也避免討論美國政府本身的政策是否也導致戰敗結局。簡言之，史迪威認爲戰爭失敗完全出於他人過錯，與他無關。更有進者，史迪威的分析，爲他往後在中國服務期間對美國政府的進言定了一個調子，而這個調子在此後數十年中，又影響了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家和其他史學著作的看法[41]。其影響力可謂既深刻又長遠。

不幸的是，只需要把這個官方文件粗讀一遍，就可以發現，它對史迪威脫離戰場的敘述部分，不僅與史迪威本人在其他場合的記載相互矛盾，而且也與其他美國和中國的歷史資料不相符合。

首先，文件指稱史迪威逃往印度的決定，是因爲他依賴羅卓英的無線電發報機與蔣介石保持聯絡(pp. 34-35)。可是在5、6兩個整月內，羅卓英和中國軍隊在緬甸的其他兩位最高階軍官(林蔚、杜聿明)，都和蔣介石保持通訊。假如史迪威真需要用他們的發報機，才能和重慶保持通訊的話，那就更無法解釋，史迪威何以決定離開這些高階指揮官，而讓自己跟一群非戰鬥人員混在一起了。這種做法哪像是一位統御十萬大軍的總司令？無論是從身分還是職責上，都說不通。鑒於他手下大部分的中國軍師單位，都能維持和重慶聯繫並執行蔣介石總部下達的命令，所以史迪威只要留在其中任何一個中國的軍師部，而不要擅自脫隊，就可以和重慶保持聯絡。然而更重要的是，該文件的指稱並不誠實，因爲史迪威不但有他自己的無線電發報機，而且有他自己的密碼本，可以直接和重慶聯繫(包括馬格魯德將軍在內)，根本無需羅卓英從中傳遞[42]。

其次，文件宣稱(p. 36)史迪威之所以去印度，是因爲羅卓英轉達了蔣介石的意旨。

---

40 "The Campaign In Burma: From March 10th to June 1st, 1942", 52 pages. See: pp. 43-52, particularly p. 49.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1, Folder 9.

41 史迪威的說詞經過幾度修改，而且不同版本有不同的標題。例如版本一："The Campaign In Burma: March 10 to June 1, 1942" (49 pages),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1, Folder 9. 版本二："The Campaign In Burma: From March 10th to June 1st, 1942" (52 pages, and marked "Final" on the front page),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1, Folder 9. 版本三，內容與版本二相同，但是只有48頁，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1, File 33. 這些版本均是史迪威官方授權的版本，封面均印有 "Headquarters American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and India"官方印鑑。

42 史迪威在拋棄發報機之前，能夠和華盛頓軍部通信(5月4日)，和重慶馬格魯德通信(5月7日)，和其他單位通信。

這一點就更與事實相違了。到目前爲止，本書作者從中方資料找不出一絲證據，可以顯示蔣介石曾經動過這個念頭，或是跟任何人表示過，他想把戰敗的中國軍隊送到印度去。恰恰相反，對於蔣介石而言，他最大的夢魘就是讓戰敗的中國軍隊落入英國人之手，承受英人欺侮。因此這一點純屬杜撰。

但是，史迪威在華盛頓的上司們，並沒有興致去關注這些看似枝節問題。相反地，他們給與史迪威完全而毫無保留的支持。即使在戰場局勢已經對中國不利時，馬歇爾在4月18日還是寫信轉達史汀生部長對史迪威最高的讚美，稱許他在最艱苦條件下發揮了智慧、韌性和戰鬥精神[43]。4月29日戰線已經全面崩潰，而史迪威本人也正在盤算退路時，馬歇爾又再度稱讚他旺盛的戰鬥精神和能力，以及領導才華，甚至稱讚他是美國陸軍的楷模[44]。

無論是戰爭進行當中或是戰爭結束以後，美國軍部對緬甸戰爭從來都沒有作出過和史迪威相左的評估，或是質疑過史迪威對他自己在緬甸行爲的分析有任何欠缺之處。其實，軍部的這種態度並不難理解。史迪威帶著少得可憐的美國資源去到中國，僅憑個人堅韌的意志力和熾熱的企圖心，就抓到十萬中國軍隊的指揮權，這個成就大概是華盛頓的軍事領袖前此從來未曾夢想到的。有誰可以用這麼少的代價換取到這麼大的收成？既然他們面對史迪威有這種虧欠心理，因此他們唯一可以作的補償，就是把各種美譽堆集在史迪威身上。只要史迪威稱心滿意，是否恰當就不必管了。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報答他的爲國辛勞。從美國人觀點來看，任何批評史迪威在緬甸戰敗的言論都是吹毛求疵。

幾十年以來，史學界基本上接受了史迪威對緬甸戰敗責任的分析，而且視之爲定論，無需再花工夫去檢查其正確性。這個現象令人感到遺憾。其實史迪威的角色應該放在一個更廣大的視野裡去檢驗，才能讓我們對第一次緬甸戰爭本身，和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之所以在戰敗後惡化的原因，得到更深切的了解。因此，本章對於戰爭的幾個重要方面，將會努力提供新的史實和觀點。

## 二、戰爭進行中的主要分歧

西方史學界處理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傳統做法是接受史迪威的思路，把緬甸戰爭失敗的主要責任分別歸於中方和英方。在中國方面，他們認爲蔣介石對史迪威指揮權橫加干涉，越過史迪威向部下亂發命令，是導致失敗的最大原因。其次，將領們的無能，不遵守史迪威的命令，貪生怕死，也是同樣重要的原因。

---

43 Marshall cable to JWS, April 18, 1942. Verifax File 2384, Item 2523, MFA.

44 Marshall cable to JWS, April 29, 1942. Verifax File 2382, Item 2523, MFA.

但是這種處理方式，只闡述美國片面的觀點，而對中國方面的看法未予考慮，這的確是一個缺陷。爲了補正這個缺陷，本節將使用一些篇幅討論中方對緬甸戰爭的兩個重要看法：1. 如何和英國人打交道？2. 如何在緬甸打仗？

## (一)如何跟英國人打交道？

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討論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邀請美國人來指揮中國軍隊。相反地，這從來就是美國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然後以軟硬兼施手法強加於中國政府。中國之所以勉強接受美方要求，唯一理由是它以爲這位美國軍官可以促進同盟國之間的合作，而且確保中國軍隊不受英國人欺弄。換言之，從中國政府看來，既然美國人膽敢提出要求，那就等於承諾了要竭盡所能地保護中國軍隊。假如史迪威沒有把握讓英國人履行承諾的話，就應該誠實告訴蔣介石他無法滿足中國的期望。或者他可以把英國人不合作的事件據實向蔣介石報告，然後由蔣介石決定，是否要就這些問題與羅斯福和邱吉爾直接交涉。如果史迪威採取了此種措施，而蔣介石仍然要史迪威行使指揮權的話，那就是蔣介石自己的選擇了。否則，一旦出現不良結果，中國人要不是懷疑史迪威(美國人)違反了原先約定，就是認爲他根本不在乎英國人如何欺弄中國人。

史迪威的想法卻大不一樣。他認爲他所以獲得指揮權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缺乏將才，因此只有他出眾的才華才有資格指揮中國軍隊。事實上，早在1942年3-4月間，史迪威也已經看出英國人的無能和不合作。但是儘管他同樣感到氣憤，他卻只對英國人作了一些軟弱無力的抱怨，同時還替英國人掩飾其無能無信的實情。這種做法當然就大大地違反了中國人原來的期望了。

造成史迪威這種行爲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部分原因是他對英國人缺乏約束力。也可能是他認爲他可以逼迫中國軍隊去承擔更多的作戰任務，以填補英國人的不足。也可能是擔心萬一中國得知英國人不履行原有協議的真相時，就會收回已經交出的兵權，而使史迪威無法在緬甸戰場一展宏圖。不管原因爲何，中國人對他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因爲如果史迪威對付英國人的效率，並不比中國人自己處理來得高明的話，那麼中國人憑什麼還要把指揮權交出呢？

在特定意義上來說，當初美國政府急於拿到中國軍隊指揮權，就是把自己陷入中英關係的泥淖中去。美國政府認爲，美國將領的指揮統御能力當然超過中國將領，因此理應行使指揮權。中國政府從來不會苟同這種看法。但是爲了促進中英軍隊共同作戰的效能，即便百般不願，也只能將就。一旦美國軍部看出中國弱點時，順勢也強調他們有能力協調戰場上中英軍隊，把自己變成是不可或缺的角色。美國政府以爲取得

中國軍隊指揮權是撿到便宜，卻沒想到，它們同時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同盟國在亞洲的軍事合作，就是建立在這麼一個奇特的三角關係上。當美國無法控制英國的行爲，向中國兌現協調中英關係時，早先促成中國政府交出指揮權的一大誘因就立即消失，反而使中美同盟關係加深矛盾。這種現象不但第一次緬甸戰爭時已經如此，第二次緬甸戰爭時依然如此。這是太平洋戰時軍事合作的本質，註定同盟關係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 (二)緬甸戰爭應該如何打？

如前文所述，蔣介石鑒於英國政府提出的限制，他的戰略構想是由中國軍隊在緬甸北部的曼德勒設立防線，目的在拉長日軍補給線，引誘它們進入預設的圈套而加以殲滅，然後大軍乘勝南下，以便收復仰光。相對的，史迪威則是想要臨時放棄這個構想，倉促地把中國軍隊的前線盡量主動伸展到緬甸最南部，發揮積極進取精神，迎頭打擊敵軍，並收復仰光。換言之，在日軍已占盡優勢的地盤上，與之幹一場硬仗。

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戰略爭論，過去雖然受到許多著作的重視，其實未必具有太多實質意義。理由是兩者都沒有付諸實現，也可能都行不通。這兩個人的作戰計畫並不應該孤立地來討論，而應該考慮到另外兩個可以嚴重影響緬甸戰局的因素，那就是英國和日本兩個國家。

首先說到英國。防守緬甸的英國軍隊兵力單薄，士氣低落，領導無能，武器雖可能不如日軍先進，但肯定遠比中國軍隊精良。一如史迪威設想，任何以線爲原則的防守，英國軍隊都必須守得住自己的陣地。換言之，史迪威作戰計畫的成敗率，相當一部分操在英國人手中。後來英國軍隊果然輕易放棄陣地。在此情況下，史迪威計畫能否實行就必須另有備案，那就是一旦英軍防線被突破時，就必須有更多的中國軍隊前來填補缺口。然而中國在緬境的軍隊數量本來有限，又無法從中國國內及時調來更多援軍。其中一部分原因固然是中國境內已經沒有太多可用之兵，而另一部分原因則是雲南和緬甸之間運輸系統落後，即便有軍隊可以調遣，也無法及時運往緬甸前線。在這種情形下，一旦緬南地區戰局失利，中國遠征軍就一定會變成孤軍深入，遭受日軍包圍殲滅。

事實證明，這正是那些從戰場上逃得不夠快的英軍的命運。如果史迪威的作戰構想被採用，則中國遠征軍勢必落入覆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戰爭中，日軍從來不從正面攻打英軍，而是採取迂迴包抄，從側面或後方攻打，使得英軍陷於混亂，一敗再敗。而中國軍隊如果孤軍深入緬南的話，也將成爲日軍最好的靶子。

相比之下，蔣介石的計畫顯得保守，他選擇遠離仰光的緬北地區誘敵深入，進行

決戰。這本來就是中英兩國間的協定，也是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最初的協定。根據這個計畫，中國軍隊防守區(緬甸北部)面積較小，補給線短，而且接近中國大後方。如果戰事順利，或許可以逼迫日軍向南撤退。即使戰事失利，中國軍隊也比較容易退回本國，不致遭受重大傷亡。

毫無疑問，史迪威計畫比蔣介石的更具進攻精神。如果成功，將會產生戲劇化振奮人心的效果。但是必須牢記，單單是表現出旺盛的攻擊精神，並不代表它是一個更可取的計畫。進取可以淪爲「冒進」，保守也可以變成「穩紮穩打」，兩者之間沒有孰優孰劣的絕對區分。更何況外在因素完全可以打破預期的效果，而英軍的作戰能力，絕對是一個無法令人安心的外在因素。

其次說到日本。日本因素和英國因素同樣重要，而且更不容易隨著同盟國的意願而轉移。日軍在3月初占領仰光港之後，便極力發揮它的後勤補給優勢。積極籌備攻擊緬甸中北部。日本南方軍從東南亞收到航空作戰器材，第五飛行集團開始實施對英國的航空殲滅戰。日軍第18、56師團從馬來開赴緬甸作戰，爪哇日軍也開赴緬甸作戰。日本同時派遣大型船團運送補給品進入緬甸[45]。4月初，日本在緬甸的兵力已經有四個師團(18、33、55、56)，兵力共有95,000人，另有250架飛機[46]。由於東南亞戰事已經結束，所以日本還將陸續派遣更多部隊和器材到緬甸前線。日軍配備精良，訓練有素，有絕對的制空權，在海上有一條安全的補給線可以直達仰光。緬甸對於英國而言並非防衛印度所必爭，但是對於日本而言，則是切斷中國抗日所有對外聯繫的必攻之地。

如果要簡單地比較在緬甸作戰的中英兩國軍隊的話，那麼英國是火力高，但鬥志低；中國是火力低，但鬥志高。無論最後是採用史迪威還是蔣介石的作戰計畫，這些事實都是他們兩人所無法改變的。我們當然應該對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作戰計畫的分歧有所了解，因爲這樣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他們在文化上、個人心理及性向上，乃至政治盤算上的差別。但是如果研究者爲了急於論斷他們計畫的孰優孰劣而爭論不休的話，那就沒有太大意義了。

我們雖然無法知道蔣介石和史迪威的計畫，到底何者更合理或更有實現可能，但是可以確定一點，那就是日本在緬甸已有的兵力，加上它從東南亞派往緬甸增援兵力，不但可能打破史迪威進取性的計畫，也可能把史迪威送到緬甸南部的有限中國軍

45　《陸海軍年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43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1942年3月份大事記。

46　《大本營陸軍部》(3)，《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1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769。

隊團團圍住，予以全殲。換言之，史迪威或蔣介石的作戰計畫孰優孰劣，並不取決於其是否具備所謂的旺盛的攻擊精神而定。史學家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除了自尋滿足之外，對於了解大局並無裨益。我們必須記住的是，緬甸戰爭是一場同盟國陸空軍協同作戰的例子。雙方指揮官在戰前都充分了解陸軍和空軍的重要性。從陸軍而言，緬甸境內日軍數量幾乎和中國遠征軍相等，但是他們的戰鬥力絕不相等。自從七七事變以來，中日軍隊經過各種大小戰役，事實證明，中國軍隊如果能夠以兩倍或是三倍兵力阻擋日軍，就是可嘉的成績。承認這個現實絕不是灰色主義，也不是史迪威可以希冀以其神奇指揮技術就能隨意改變的。如果他曾經以爲中國士兵在他倉促上陣的精神感召和巧妙指揮之下，就可以和日軍士兵打成平手的話，那真是過於自我膨脹。當然，如果英國軍人也能勇敢配合作戰，而同盟國的空軍又可以發揮壓倒性優勢的話，情勢或有改觀可能。不幸的是，這兩者在戰場上消失得最快。失去英軍的地面配合，而美國陸軍又不見蹤影，使得中國軍隊正面和兩側同時受到敵人的強攻和包抄。失去英國空軍的支援，而美國飛機也不見蹤影，使得中國部隊日夜遭受日本飛機的轟炸掃射，抬不起頭來，戰場上主動權完全喪失。此時史迪威多遲疑不決一日，就會切斷遠征軍更多的退路，而他的失蹤則更是造成軍隊恐慌失控的主要禍首。不幸的是，這正是他在4月底導致的結局。

再進一步說，過分關注蔣介石和史迪威緬甸作戰計畫的差異，還可能產生另外一個誤區，那就是忽略了中國人如何看待蔣介石和史迪威關係惡化的真正原因之所在。簡單地說，從中國的觀點看，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對於緬甸作戰看法的分歧本屬正常現象，緬甸的軍事失敗也可以接受。在中國看來，雙方在戰爭進行過程中的吵吵鬧鬧，雖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但也不足爲奇，更不足以導致雙方決裂。因爲它們最多只不過是在同盟國關係中，雙方都必須準備付出而且是能夠承受的一些代價而已。

真正導致中國把對史迪威的憤怒和憎恨，提升到強烈的感情層次的關鍵理由，其實發生在戰敗之後。有趣的是，儘管史迪威平時呈報給美國軍部的文電數量極大，有時甚至一日多起。但他對那些被他拋棄在戰場上的中國官兵的命運，卻噤若寒蟬。換言之，史迪威在戰爭仍在進行時，針對中國軍隊的各種缺點大肆抨擊，而且長篇累牘；但是對戰爭結束後所發生的慘劇，則幾乎一字不提。他的私人檔案也呈現同樣的鮮明對比。最合理的解釋是，他根本不知道失敗後發生的事情，也寧可不去觸及這個令他難堪的題目。所以，無論美國軍方歷史家或是後來的研究者，只要他們依賴史迪威文檔作爲最權威的參考資料來進行研究，就不了解史迪威在中國防線崩潰之後所造成的傷害，和中國人開始痛恨他是具有特定時間性因素的。這也說明西方史學界對這個問題

集體沉默的原因所在。難怪這許多著作所最樂意著墨的，是史迪威在戰爭仍在進行時對蔣介石的諸多指責，並藉此證明失敗後慘劇的責任，均是由蔣介石及中國將領單方面造成，純屬自食惡果。

## 三、中國觀點的逐漸形成

然則中國人到底如何看待緬甸戰爭？他們又得到何種結論？

可惜的是，過去許多流行多年的著作，甚至不知道有一個中國觀點存在。難怪中美戰時關係這一個領域，基本上已變成美國對華政策和美國人如何看中國人的研究，而很少涉及有關中國人看待美國人或是雙方互動因果的探討。事實上，中美戰時關係遠比表相複雜得多，而且蔣介石對緬甸戰敗的態度，不但與史迪威截然相反，而且是經過長時間醞釀才逐漸形成的[47]。

如前文所述，雖然蔣介石堅信自己的作戰計畫遠比史迪威的計畫正確，但是他並沒有因爲史迪威反對他的計畫而大動肝火。還記得前文已經提到，史迪威在得到蔣介石承諾不再干預他對中國軍隊的指揮之後，4月1日開始就突然停止對蔣介石提供緬甸前線戰報。史迪威在4月的日記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色，那就是他很少提到蔣介石的名字，這和在此前後不停抱怨蔣介石的作風大不相同[48]。換言之，目前中美雙方資料顯示，1942年3月史迪威還非常不滿蔣介石的干預，認爲是妨礙他行使指揮權；但在整個4月份裡，蔣介石的干預程度顯著降低，甚或停止，直到戰爭失敗爲止。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蔣介石連史迪威最後的撤退計畫都一無所知，必須依賴間接管道才得知。總之，緬甸戰局由平穩轉爲惡化，再轉爲失控乃至總崩潰的整個過程，均是在史迪威行使指揮權的情況下發生的，並不是因爲他和蔣介石在戰術上的爭論惡化的結果。

而蔣介石一旦無法控制史迪威的作戰計畫和戰地指揮之後，他只好安慰自己，史迪威對於中國軍隊的安全，必定已經作出妥善安排，無需他過分憂慮。值得注意的是，4月16日，當緬甸前線情況依然相當穩定時，史迪威送呈了一份報告書給蔣介石，建議中國派送十萬官兵前往印度，接受美國人的整裝和訓練，以便日後作爲光復緬甸之用[49]。此時，蔣介石在心理上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接受緬甸敗局在所難免，可是他對中國官兵在戰場上的命運並不感到特別憂慮，因爲他對史迪威依然滿懷信心，相信他必定會作出妥善安排。這種信心也說明他爲什麼當即批准了有關十萬官兵的訓練計畫，並由史迪威

47　有關Tuchman對戰敗後的討論，見：Tuchman, pp. 386-396.

48　JWS t-w diaries, April 5-26, 1942.

49　Tuchman, pp. 366-367.

主持[50]。

由於蔣介石只是作了原則性決定，所以還沒有談到挑選部隊和運送赴印度的具體細節。但是他顯然並沒有打算，讓正在緬甸從事戰鬥的中國軍隊轉去印度接受訓練，因爲這些中國軍隊在緬甸還需要執行作戰任務，而且也不可能隨意脫離戰場，更何況日軍也不會輕易放走它們。因此最合理的解釋是，蔣介石準備組建另外一支軍隊，以空運方式從中國送到印度。這其實也和中國政府想要訓練裝備30個師的想法相符合。在此同時，宋子文在5月4日會晤霍普金斯時，也依舊繼續稱讚史迪威的眼光正確，因爲他能夠看出中國士兵的作戰潛能而予以信任。宋子文除了通知霍普金斯說，蔣介石已經批准把一支中國軍隊送到印度接受訓練之外，同時指出中國唯一條件是，這些軍隊將來不得被英國人用來保衛印度[51]。總而言之，中國人此時所持的態度是，他們依然信任史迪威有能力處理緬甸戰局，也依然願意委以重任由他負責訓練中國派赴印度的新軍。用不著說，這支軍隊的挑選權當然在中國政府手中，而並未交由史迪威獨斷專行。另外還有一項有力的證據，說明蔣介石計畫派赴印度的部隊並不是緬甸戰場的作戰士兵。那就是他在5月初下令緬甸戰場中國士兵全數返回國境之內。

然而就在中國政府對史迪威表示信賴的同時(5月初)，美國軍部其實已經從史迪威那裡，直接得知緬甸戰局難以收拾的壞消息，因而急於想知道蔣介石在此戰敗關鍵時刻，對史迪威的態度有否改變。(宋子文向蔣介石轉達軍部詢問：「緬戰後，鈞座對史梯威感想如何？」)蔣介石此時顯然還不知道軍部已經掌握在手的緬甸戰況，所以他的答覆仍然是：「中對參謀長始終信任與感慰。」[52] 由於此時馬歇爾並不知道，史迪威尚未把戰場情況據實向蔣介石報告，因此他理所當然地以爲蔣介石必定已經知道緬甸戰場大事不妙，所以才會憂心地打聽是否會對中國產生負面效應。爲解開心中疑團，馬歇爾遂又聯絡熊式輝將軍，希望熊式輝能從中方得到一個更誠實的答案。我們應該記得，馬歇爾向來不重視熊式輝的存在，也從來不願和他聯絡。而此時他居然主動找上熊式輝，那就表示對此事高度關懷。當熊式輝基於對緬甸實況同樣的無知，而當場向馬歇爾保證史迪威和蔣介石合作關係融洽時，馬歇爾甚至還建議熊式輝不要貿然回覆，最好先去摸清楚蔣介石內心真實感覺後再說[53]。

與此同時，白宮也同樣擔心，並由居里在5月5日發電報探聽蔣介石口風。蔣介石

5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36。

51 "Memorandum on meeting between Mr. Hopkins and Dr. Soong on May 4, 1942, at 5:45 pm."

52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590-591。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5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591。

53 熊式輝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4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1冊，#31030741.

仍然不知大禍已經臨頭，所以在5月6日的回覆依然持同樣態度：「委員長對於史迪威完全信任，後者也深得中國將領們的愛戴。緬甸戰局無法扭轉。因爲儘管英國軍隊只有一萬人，但是指揮權在英國人手中，而非在史迪威手中。委員長在視察緬甸前線後，曾發一長電給總統，而且已經預言今日發生之事。英國參謀作業之無能和疏忽，加上當地情況讓史迪威一直無法展開其工作。」[54] 蔣夫人在5月6日另外致電居里：「蔣介石對史迪威非常重視，其他的中國將領也持同樣看法。緬甸戰爭失敗的責任在於英國人。他們在戰前既無準備，戰爭期間又不能有效作戰。」[55]

這些來往電文和個人之間的接觸，描繪了一個令人感歎不已的情況，那就是，美國政府的發電報人已經充分知道，緬甸戰場上的大慘劇正在演出，他們假定蔣介石必然也掌握同樣的信息，而且可能怒火萬丈。因此他們急於探知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不滿到底達到何種程度。馬歇爾和居里這種不尋常舉動的唯一解釋是，他們簡直不敢相信，中國人在他們國家的軍隊被史迪威如此糟蹋之後，居然還能繼續表達對他的信任和善意。他們也不敢相信，中國人會如此之大度或是如此之麻木不仁。但是當美國領袖們一再試探，而又從中國收到幾通異口同聲讚揚史迪威的電報之後，他們終於集體舒了一口氣。他們誤以爲，蔣介石在面對緬甸悲劇時，選擇了克制自己，勉強吞下滿腔苦水。

當然，根據中方檔案顯示，事情最合邏輯的解釋是，當蔣介石在答覆美國政府時，他根本沒有意識到緬甸悲劇的嚴重程度，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史迪威對蔣介石隱瞞軍情，不露半點口風。更有趣的是，蔣介石此時並沒有把一切責任放在史迪威肩膀上，反而急於責怪他自己。例如，他指出是由於自己的錯誤判斷和心理，才允許史迪威把中國軍隊送到緬甸南部去貪圖速勝。出於這樣的自我批評，所以蔣介石才發誓，他從今以後絕不可只是爲了保持和盟邦友好的關係，而放棄自己的判斷。他也責怪自己沒有充分關注日本的動機和行爲。他坦白承認自己的估計錯誤，竟然以爲日本無法派送大軍入緬，或者日本會在占領緬甸南部後停止進攻。最後，他還責怪自己沒有對戰場變化作出及時反應，在英軍防線突然崩潰之際，盡快找出應變方針。他認爲自己的錯誤是，太武斷地相信日軍沒有足夠的決心深入緬甸北部[56]。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又加上了一個新因素。那就是他誇獎日軍指揮官的果斷，和利用出其不意的能力，發動佯攻，行動迅

54 CKS cable to Currie, May 6,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55 "Anti-British sentiment expressed in cables from Madame Chiang Kai-shek", in Currie Papers, Box 3. Also: CKS cable to Currie, May 6,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又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29日。

56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30日。

速，「佯攻，欺弄，行動敏捷，靜如處女，動如脫兔，正奇兩用。我軍愚弱拙鈍。敵軍有膽有識，有戰術及決心。其能力遠超英軍。」等等[57]。最後，他還毫不含糊地指責中國將領愚蠢，反應粗劣。簡言之，史迪威對於中國軍隊在戰爭進行期間的缺點的指責，並沒有激怒蔣介石，甚至得到了他的共鳴。必須記得的是，以上這些因素(包括蔣介石硬往自己肩膀扛上的自責)都是在4月份產生了決定性的後果，而這正是史迪威成功地把蔣介石排諸緬戰局外，由他一人掌控中國遠征軍的時節。

當然，蔣介石並非認爲史迪威對戰敗沒有責任。儘管蔣介石認爲史迪威的戰術判斷是造成戰敗的因素之一，但他著重的還是自責，因爲他認爲自己是最高統帥，而史迪威只是部下。因此他只能怪自己接受了史迪威錯誤的作戰計畫。在蔣介石看來，史迪威是因爲戰場上節節失利，才方寸大亂。前者是「因」，後者是「果」。換言之，蔣介石把信賴史迪威看成是自己的錯誤，他挑出史迪威的缺點，但是把知人不明的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

以上這個過程的重點是，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敵意，並非來自戰事仍在進行當中的爭吵，也非來自對戰爭失敗的指責，而是來自戰鬥停止之後，史迪威不能妥善處理戰場崩潰的局面。這一個轉捩點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過去不少著作一味把焦點放在他們的作戰計畫或是指揮作風上的不同，其實是被史迪威的觀點所局限，也實在有避重就輕的意味。

事實上，即使在戰敗之初，中國政府仍感覺樂觀，以爲國軍在後退過程中仍可避免重大傷亡[58]。等到5月中旬，當實情開始零碎地傳到重慶時，蔣介石才開始意識到，原來緬甸戰場正在演變成爲一個大災難，而史迪威應該負擔的責任也相對增加。5月14日，蔣介石接到杜聿明報告，得知第5軍正在野人山區作戰，力圖找一條返回中國之路，蔣介石開始認爲史迪威是一個沒有勇氣、沒有判斷力，又沒有責任心的軍人。但是蔣介石仍然責怪自己犯了知人不明的大錯，誤信了史迪威。他同時也把戰敗的責任部分歸罪於兩個盟邦未能履行諾言[59]。諷刺的是，即使到了5月18日，蔣介石還在懷抱一絲希望，以爲能說服史迪威把中國軍隊帶回中國本土[60]。殊不知史迪威此時已安然抵達印度了。

因此，真正讓蔣介石怒不可遏的是，他此時相信緬甸戰場的悲劇，導因於史迪威

57 同上，1942年5月31日。
58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5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592。
59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14-15日。
60 蔣介石與馬格魯德會談記錄，1942年5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142-147。

毫不負責任的處理方式。根據中國資料顯示，緬甸戰爭的傷亡至少是3萬名戰鬥力最強的中國士兵，或許數字遠高於此[61]。對於某些部隊而言，退卻的行動一直持續到7月底才結束。也就是在這三個月的潰敗中，它們的損失超過先前兩個月戰鬥時期的兩倍，國軍號稱精銳擁有的現代化裝備幾乎損失殆盡。最後，第5軍第200師和第96師及第6軍的殘餘，都歷盡千辛萬苦之後回到中國。同時，第5軍第22師和第6軍第38師全部，以及第6軍第28師部分則抵達印度。無可置疑，日本的進攻部隊只花了極小的代價，就把一大批中國軍、英軍、印度軍和緬甸軍打得落花流水[62]。日軍這個輝煌戰果當然應該歸功於它的戰略正確，領導有方，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作戰英勇等因素。但是中國軍隊在緊要關頭失去統帥，也是造成日軍在1942年5-7月可以遂心宰割，並奠定輝煌戰果的重要原因。

要想了解蔣介石爲什麼對史迪威未經允許擅自逃向印度一事，如此難抑憤怒，我們必須先回顧當時的背景。一方面，中英關係已經高度緊張。另一方面，蔣介石又不得不依賴史迪威來保護中國的利益，以免受到英國傷害。由於史迪威完全明瞭蔣介石對英國人的不信任，因此他更應該知道擅自把中國軍隊送進印度，其結果只能把蔣介石推進一個極爲難堪的局面。它不但讓蔣介石不敢對英國在緬甸戰場的劣跡暢意批評，它還迫使蔣介石不得不低聲下氣懇求英國人高抬貴手，收容戰敗的中國軍隊並提供食物。蔣介石最擔心的是，英國人可能對從緬甸撤退的中國士兵予以侮辱，勒令他們繳械。

此時發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是火上加油，增加了蔣介石對史迪威、英國人和美國人的反感。比如說，美國飛機5月9日飛密支那撤出了四千餘人，但大部分都是英國人，中國需要撤退的人員並沒有得到同等待遇[63]。這類事情已司空見慣，因爲英國不斷拼命找交通工具，讓更多的自己人員和物資撤出緬甸。對這種現象就連史迪威也大爲不滿。他4月30日的日記寫道：「亞歷山大將軍現在聲稱，他需要運送三萬六千人出境。這些人以前都躲到哪裡去了？」[64]邱吉爾更是在中國傷口撒了一把鹽。中國士兵才剛剛承受了大量傷亡和冒著極大危險，把幾千英軍從仁安羌救出，但是5月10邱吉爾演說時，只是極力稱讚美國和蘇聯對戰爭的貢獻，而對中國則絕口不提。

---

61 蔣介石與威爾基會談記錄，1942年10月5日，《戰時外交》（一），頁760-775。又見：張家德，〈保衛滇緬路〉，《中國抗日遠征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第一冊，頁522。

6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48.

63 Personal note by Hornbeck, May 12,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64 JWS t-w diaries, April 30, 1942.

蔣介石在日記中指責英國：「邱吉爾十日演說對戰局仍重俄國，間帶美國，而對於我國隻字未提。緬甸初敗，我軍被欺受詐，爲其犧牲，而且仍在緬境被圍，未脫險境。彼不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緬之貢獻，於情於理，均無此種惡劣之態度，可憎已極。古人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吾人更覺英獪之不可共事也。」[65] 鴉片戰爭前中國人看不起英吉利人，所以國名英吉利三個字一律加上犬字旁，蔣介石此時發明「英獪」這個字眼，足見其內心對英國是憤怒和鄙視之極了。

不久之後，蔣夫人電告居里，大量中國士兵在緬甸死於飢餓，而中國軍民士氣已經掉到1937以來的谷底。她警告說，重慶已有「反動分子」從事反戰宣傳，而且頗有進展。她也告訴居里，蔣介石自從1937年以來這是首次感到悲觀，並認爲當前情形萬分危急[66]。漸漸地，蔣介石開始把美國和英國視爲一丘之貉。他開始相信，這兩個盟邦都只顧自己的利益，對於同盟國的共同利益並不關切。而且他還擔心緬甸戰敗後，它們對中國的態度可能更趨惡劣[67]。只要閱讀過蔣介石日記的人們大概都會知道，他的這些感觸和恐懼，並非要等到緬甸失敗後才領悟出來的後見之明，而是他歷來蘊藏在心底的擔憂。有了這種了解，也能幫助我們更正確地去評估，蔣介石原先決定入緬作戰的動機和指望達到的成果。但是蔣介石最大的怒氣則是直接指向史迪威。蔣介石感覺他受了史迪威的欺騙，而且也認爲史迪威是導致盟邦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蔣介石覺得他對史迪威可謂仁至義盡：不但向史迪威授予指揮權，表達了充分的善意，還冒著生命危險，偕同妻子前赴緬甸前線，目的就是要親自向中國將領們宣達命令，要他們務必服從史迪威。

因此，蔣介石認爲史迪威應該投桃報李，以忠誠與善意作爲對中國的回報才對。史迪威的行爲令蔣介石相信，他必須改變前此對美國軍人所持的友好態度。用他的話說，「因之中國一切未能獨立自強以前，不惟與外人（外國人）不足以共事，而且使之越遠越好。否則不僅毫無利益，而且以我優秀之點被其透視之後，反被其侮蔑，甚至爲其唾棄。今而後知所謂同盟與互助皆爲虛妄之言。美國亦不能外此例乎。幸而今日我中國尚有一片土地與相當兵力以圖自存，而未爲帝國主義者完全犧牲耳。」[68] 可以看得出來，蔣介石正在慢慢地把美國和英國視爲一樣的貨色，同樣用帝國主義的姿態來對待中國[69]。

---

65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12-13日。

66 Mme. CKS cable to Currie, May 23,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67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20日。

68 同上，1942年5月31日。

69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日。

## 叁、中國憤怒的升級

### 一、史迪威的第一份報告

在分析戰敗責任時，史迪威從頭開始就顯得充滿攻擊性。他剛抵達印度就急不及待地指控別人的過錯。正如他在5月27日日記中所寫的：「明天或者後天，我將會回去（重慶）向委員長作報告，我已經準備好了，會塞滿他的耳朵。他會聽到他從來沒有聽過的東西，而我也會很好奇，他將如何反應。」[70]

6月4日，蔣介石終於有機會親耳聽到史迪威的報告[71]。由於史迪威是中國軍方第一個回到重慶的高級指揮官（其他的指揮官仍陷於戰爭或撤退中），而大部分中國軍隊的命運還處於模糊狀態中，因此蔣介石只能聽取史迪威的一面之詞。而史迪威本人也下決心要說個痛快淋漓。史迪威在讚揚了中國士兵的勇敢和下級軍官的優良素質之後，集中火力嚴厲批評高級軍官懦弱、做生意、粗心大意、領導無方和因循苟且。他抱怨中國指揮官躲在後方，不了解前線實情，也抱怨英國在緬甸的武裝部隊可能有7萬人之多，卻只將其中一小部分投入戰場。諷刺的是，當蔣介石要史迪威針對緬甸失敗指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時，他的答案卻是同盟國缺乏空軍，因此地面部隊閉著眼睛和敵人作戰將近兩個月之久[72]。

對於這次會談，史迪威給後世留下了一個色彩豐富的記錄。照他所說，他的報告無所保留，淋漓盡致，而且指名道姓[73]。在6月7日致妻子的信中，史迪威補充說：「我們在6月3日終於抵達重慶，第二天我就向大孩子（蔣介石）作了報告。我告訴他全部實況，其過程就像是用腳去踢一個老太婆的肚皮一樣。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人敢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因此這個工作更需要由我來做。」[74]但是讓史迪威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夫婦態度非常和善，並且邀請他到黃山去共度周末。他寫道：「受到蔣介石夫婦非常親切的歡迎。」[75]

因此，即使在緬甸戰爭失敗，和史迪威已經嚴厲責備中國將領和軍隊之後，蔣介石仍然以和緩而禮貌的態度對待史迪威。考其原因，是由於到此爲止，蔣介石只聽到

---

7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3.

71 JWS t-w diaries, May 28-June 4, 1942.

72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0冊，頁134-140。

73 JWS t-w diaries, June 4,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8.

7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9.

75 *Ibid.*, pp. 98-99.

史迪威單方面對緬甸狀況的敘述，而且相信它的真實性。事實上，當史迪威交給蔣夫人一份文件，列舉他對中國軍隊的批評和建議改革事項時，蔣夫人說，這些正和德國軍事顧問以前所說內容相同[76]。鑒於蔣介石對德國顧問的器重，蔣夫人的說法顯然是在稱讚史迪威意見的價值。簡言之，即便在此時，蔣介石夫婦對史迪威的意見仍然是信賴和器重的。

## 二、蔣介石最初的反應

對於史迪威針對中國將領行爲不檢所作的指控，蔣介石私下反應也是饒有趣味。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史迪威的報告有如「晴天霹靂」「萬不及料之事」。事實上，對一位外國軍官能夠以如此勇氣把缺點揭發出來，使得中國將來得以改正，他內心頗爲感激。他也相信，如果史迪威的報告屬實的話，那就證明了他的效忠和誠實毫無疑問[77]。中方資料顯示，在緬甸戰爭失敗後的第一次會議中，蔣介石毫無敵意。而史迪威本人的印象也肯定了這個觀察。

然而就在會談一天之後，蔣介石的情緒突然起了變化。顯然，他有了足夠時間去思考史迪威談話內容，因而表示(6月5日)實在無法相信史迪威居然能夠如此厚顏無恥，力圖把全部過錯加在中國將領身上，而自己的處事做人毫無瑕疵。正如蔣介石在日記中憤怒地指出：「我軍在緬北如此重大犧牲，其責任在於彼之指揮無方，而彼毫不自承其過，反詆毀我國高級將領之不力。甚至(造)謠羅卓英之潛逃。其實彼於失敗之初，手足無措，只管向印度逃命，而置軍隊於不顧。以致第五軍至今尚流離播遷而無法收容，彼則毫不知恥也。」[78]

6月4日首度會面之後，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怒氣與日俱增。他很快就懷疑整個駐華美軍官員，都和史迪威一樣不道德及對中國不友善。比如說，蔣介石在6月6日寫道：「美國軍事代表團大部分皆自私自大之流。觀乎史蒂華，不知自反，而專事毀人利己之行，更令人對國際之嫌惡矣。」[79]到了6月11日，蔣介石更是懷疑史迪威和美國其他軍人，企圖造成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印象惡劣，並以此作爲藉口減少美援數量。然而儘管有了這些懷疑，蔣介石依舊提醒自己應該保持分寸，謹言慎行，以求日後能夠改變美國的對華態度[80]。

---

76 JWS t-w diaries, June 4,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8.

77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4日。

78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5日。

79 同上，1942年6月6日。

80 同上，1942年6月11日。

此時蔣介石的內心感情，或許是悔恨多於憤怒。悔恨的是他自己的失算導致中國遭遇的重大損失。6月7日的日記就充分表露了這種心情。他寫道：「自太平洋大戰發動之後，本爲五年來犧牲奮鬥所得惟一之良機，乃爲援緬挫敗而全局皆壞，其勢幾乎不可挽回，此余不能審慎機勢，把握現實，而爲空虛之情感義務以及好大喜功、客氣所誤也。及茲悔悟澈戒，或有救乎。」[81] 其中責怪自己不能「審慎機勢」，不能「把握現實」，和被「空虛之情感義務以及好大喜功、客氣所誤」等話，都是蔣介石對當初參戰，和隨後處理中美關係及史迪威關係的動機和心理狀態所作的反思。對我們了解蔣介石的對美外交政策非常有參考價值。當然蔣介石自我批評的這些缺點都屬於政略性質，和史迪威在戰場上的失敗性質完全不同。

然而6月初，無論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不滿程度有多深，他還是被一個同情心因素所影響。原因是6月4日首度重晤史迪威時，史迪威比他們上次會晤時瘦了二十多磅，並且正在嚴重腹瀉。不久之後，史迪威又被診斷爲患有黃疸病，並被迫臥床2-3周。因此一直要等到6月15日才再度見面。雖然史迪威的黃疸病可能是在2月間，不小心被美國軍醫施用的藥物感染所致，但是蔣介石卻以爲他的病因，是在緬甸森林長途跋涉中過分辛勞有關[82]。因此，史迪威的病情，讓蔣介石無法狠下心來跟史迪威清算緬甸失敗的細帳。

## 三、蔣介石心情的大起大落

6月上旬，蔣介石的內心都在兩個極端之間不斷掙扎。一方面，他對史迪威在緬甸毫不負責的行爲感到無比憤怒，想把史迪威逕予革職。另一方面，他既受自己文化和道德背景的羈絆，又想盡量和美國維持和諧的盟友關係，只好三思。結果是，他的心情七上八下。每次聽到有關中國軍隊傷亡的數字或是士兵遭受苦難的消息，就火冒三丈，甚至想到用「以怨抱怨」的方式報復美國。但是到了6月10日，他又警惕自己，假如他對史迪威和其他美國軍方人員「以怨報怨」的話，就難免傷到中國的國家利益[83]。因此蔣介石在6月15日告訴宋子文，鑒於美國一向對中國誠意幫助，因此不宜在此時向美國政府透露他個人對史迪威的看法。事實上，蔣介石認爲，「除非萬不得已」，中國不應該對史迪威作出任何負面評論[84]。當然，蔣介石這種做法的後

81　同上，1942年6月7日。
82　JWS t-w diaries, June 4-21, 1942.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98-101.
83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0日。
84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15日。

果並不能平息自己的怒火，卻增長了史迪威的氣焰，降低了美國政府對事態嚴重性的估計，反而擴大了中美同盟關係的裂痕（見下一章）。

一如既往，蔣介石對美國的態度也深受中英關係影響。6月15日，英國外相艾登在莫斯科發表演說，只講世界的未來有賴於英、美、蘇三國合作，隻字不提中國。這使蔣介石氣憤不已。它除了重新勾起蔣介石對英國的舊恨之外[85]，也讓他更不願意採取任何行動去妨害中美關係。這也可以說明何以蔣介石會同意（6月15日）讓史迪威把第5軍第22師留在印度，並繼續擔任其指揮官，但他同時也堅持，杜聿明留任第5軍軍長。史迪威對此當然是激烈反對，並主張中國軍隊必須徹底改造。當蔣夫人提醒他，蔣介石必須考慮「某些因素」時，史迪威的記錄寫道：「我告訴她，我當然懂得這個道理。但是有了美國站在背後支持他，這隻愚蠢的**小頑驢**（蔣介石）還是無法抓住他這一輩子最大的機遇。」[86]

明顯可以看出，他們6月4日的會面之後，彼此之間對對方的觀感起了巨大變化。會面之前，蔣介石只是想從史迪威處得知實況，而史迪威則把自己的所見一股腦地發洩出來。此後10天，蔣介石開始從中方消息管道聽到了更多的實況，因而對史迪威愈來愈不滿意。至於史迪威，他自以爲已經很有耐心地等了10天，爲的就是讓蔣介石同意他所提出的，有關中國軍隊人事改革的建議，但最後他卻未能達成目的。史迪威對他和蔣介石的會面是這樣形容的：「他無知與愚昧的自鳴得意簡直驚人。他蠢到麻木不仁的地步。」[87]

## 四、6月15日的重要會談

6月15日，蔣介石又和史迪威見面，他在會談中首次試圖要史迪威把注意力，從緬甸轉移到如何組織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辦公室這件事上來。從中國的觀點看，史迪威是爲了聯軍參謀長一職才被邀請到中國的，但是到了之後既沒有設立辦公室，也沒有委派正規工作人員，這個現象實在極爲反常。假如史迪威早先沒做的理由是被緬甸戰事所羈絆的話，那麼這個理由此時已經不存在了。蔣介石的意圖很明顯：就是讓史迪威回歸到他正常的工作崗位上去。這樣做既可以沖淡他對實際戰鬥的熱衷，又可以防止他成爲未來同盟關係中的麻煩製造者。當然這樣做，還可以讓蔣介石獲得一位得力的參謀長。更何況，這也正是史汀生部長先前向中國政府所作的承諾。但是史迪威根本沒有興

85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5日。
8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99.
87 JWS t-w diaries, June 15, 1942.

趣討論這個問題，而他對蔣介石的建議也提不出任何具體回應。正因爲他們的思考出發點完全相反，所以關於聯軍參謀長這個職務的談話毫無結果[88]。

史迪威引以爲自豪的「直話直說」作風，加上一口拒絕蔣介石企圖把他的精力放回到中國戰區本身的軍事問題上的要求，使得蔣介石在6月16日對史迪威的憤怒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並且使他心中萌生了一個極端激烈的念頭。到了這個關頭，蔣介石已經認定，史迪威企圖以對中國將領作不實的指控來轉移視線，並掩飾自己的劣跡。因此蔣介石認爲史迪威應該被送回美國接受軍法審判，讓美國政府能夠徹底了解，史迪威嚴重違反軍紀的行爲。蔣介石寫道：「史蒂華推諉責任，掩埋罪過，故不得不毀壞他人名譽，侮蔑我國將領，此應提議開軍法審判，使美國政府能知史之不法與無禮也。」[89]蔣介石完全相信，只要全部事實能夠公諸於世，美國軍法一定會懲罰史迪威，並且還給中國將領們一個清白。他甚至一度考慮把中國參加緬甸戰鬥的將領們送到美國，和史迪威在同一個軍事法庭中接受審判。雖然蔣介石不久就放棄了這個念頭，但是從他前後在這個問題上所留下的手跡可以清楚看到，他不但數易其稿，而且有的段落，一改再改。他對史迪威的憤怒和對自己情緒的極力克制，都在文字中表露無遺[90]。

## 五、蔣介石企圖改變與史迪威關係的失敗——6月24日的會談

6月24日蔣介石再度接見史迪威。在會談中，蔣介石詳細說明他打算要史迪威回到中國戰區履行其正規職務。在此應該指出的是，在會談之前，蔣介石剛和羅卓英見過面；羅卓英從緬甸戰場經過印度抵達重慶後第一次晉見蔣介石，也是第一次向他口頭報告戰事的經過。蔣介石聽後立即指示羅卓英呈上一份書面報告，詳細說明戰敗前最後幾天在戰場上發生的事情[91]。由蔣介石和史迪威當天談話的內容可以想見，蔣介石正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找出一個既可以防止史迪威在將來可能造成傷害，又可以維護中美兩國友善關係的辦法來。他的解決方案就是要求史迪威履行史汀生部長原先的承諾，而那也正是蔣介石原本想要史迪威做的事。在性質上，既非報復，也非懲罰。基本上，蔣介石是想不露痕跡地把史迪威活動的性質和範圍，從緬甸前線回歸到一個

88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595-601。

89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16日。

90　蔣介石致宋子文及熊式輝電報全文（1942年6月18日）在《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58-64。蔣介石考慮軍法審判的部分在印刷版中刪去，見：《戰時外交》（三），頁603-604。蔣介石親筆信的原件（6月19日）在美國Columbia University, 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s, Volume 2.

91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4日。

名副其實的聯軍參謀長在中國戰區內本來就應該做的事務上。

然而史迪威對此毫無反應。他反而再三表示，他唯一的興趣是在領導中國遠征軍，而且再度要求撤換其將領。當蔣介石試圖推開這些要求時，史迪威立即又把話題拉回到第5軍在印度的裝備和訓練等事項。這種做法迫使蔣介石不得不再次聲明，這些事情應該按照常規處理才對。蔣介石要表達的意思是，這已經不是史迪威份內該管之事了。

在擋開了史迪威有關緬甸的一連串要求之後，蔣介石終於拿出自己的計畫，說明他今後希望史迪威如何執行職務。

首先，無論是以聯軍參謀長的名義對中國軍隊進行指揮，還是指揮駐華美國軍隊，蔣介石都希望史迪威能夠遵守正常作業程序來執行任務。爲了使工作得以推展，蔣介石催促史迪威盡快設立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辦公室。

其次，蔣介石要史迪威擬出中國戰區的通盤作戰計畫，明確列出陸軍、空軍的需要，以及收復緬甸、越南和泰國的各種具體構想[92]。蔣介石提醒史迪威說，緬甸的指揮責任只是在危機情況下的臨時安排。言下之意是，緬甸戰事只是史迪威在中國戰區諸多責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絕非它的全部。如今緬甸既然已經失陷，那麼史迪威就正好順理成章地把全部精力重新擺回到整個中國戰區來，而這也正是聯軍參謀長所應該做的事。

其三，蔣介石要求史迪威重新評估，中國在喪失緬甸路後對美國軍援的需求量。根據何應欽將軍報告，僅僅是中國的兵工廠每個月就需要1,500噸進口原料來維持開工[93]。假如它們想要增產或是改良產品的話，需要量就會相應增加。蔣介石也重申他自己的立場，維持現狀的最低需要是在第一線有500架飛機和每個月有5,000噸的援助物資。不過蔣介石也作了讓步，假如美國達到這些目標的確有困難的話，史迪威至少應該設法在初期得到200-300架飛機以及數量略減的物資。但是重點在馬上開始朝這些目標進行努力[94]。

第四，蔣介石要史迪威擬出改造和訓練中國全部軍隊的方案，而不僅限於下一波派往緬甸戰區作戰的遠征軍而已。

爲了有效地達成以上各項長期以來被忽略的事務，蔣介石希望史迪威從今以後經

92 蔣介石希望得到具體計畫書，包括：緬甸及其他地區的作戰何時進行，應該採取何種戰略戰術收復失地，什麼時候應該採取什麼行動，訓練和裝備應該如何處理，等等。

93 何應欽呈蔣介石報告，1942年7月18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10號檔案夾。

94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6月24日。

常留在重慶，成爲他可以倚仗的左右手。蔣介石告訴史迪威說：「將軍以參謀長之地位，可隨時向軍令部、軍政部等機關調詢各種資料，例如中國現有軍隊之數量、軍訓情形、目前可以取得或製造之軍備等。蓋將軍欲求整頓中國軍事，此等資料實所必需。余可令軍令部、軍政部次長每星期向將軍作一、二次報告，俾將軍得熟悉中國軍事之真相。」[95]

然而，會議記錄明白顯示，蔣介石的話對於史迪威完全沒有發生作用。雖然蔣介石不厭其煩地解釋，他爲什麼要史迪威針對中國的各種各樣的軍事問題，提出細緻而又全面的改革方案，但是史迪威的回答簡單而乾脆：「我在今天或是明天就可以把方案提出來。」當蔣介石建議史迪威去熟悉中國各部隊的複雜背景時，史迪威的答覆是：「本人可赴各該部索取資料，較爲便利。」聽在蔣介石耳裡，史迪威要嘛是漫不經心，要嘛是認爲中國的事務並沒有高度複雜性，解決方案其實都已經在他腦海裡，只要給他權力付諸實行即可。雖然史迪威在會議時並沒有急於爭辯，但是他的反應肯定是完全負面的。如他私下所寫：「委員長以爲只要他委派我作爲他的聯軍參謀長，我就會無條件地接受他的命令。他就是有那麼蠢。他就是不能了解，我的另外一個身分是美國在國際會議中的代表，另外一個身分是美國部隊的司令官，還有一個身分是租借法案的監護人。」[96]一旦兩人在心理上和認知上產生了如此重大差距，他們之間合作的基礎就變得越來越脆弱了。

不久之後，當居里在訪問中國（1942年7月）並企圖化解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時，史迪威親口向他證實，自己反對蔣介石的安排。當居里天真地試著安排史迪威與何應欽會面，以促進雙方合作關係時，中方立刻接受居里建議，並主動邀請美軍人員參加中方的軍事會議。但讓居里萬萬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對他的干預大爲不滿，因爲這樣會妨礙到他想超越中國政府，而只想直接跟蔣介石打交道的盤算[97]。史迪威自己的話最能生動表達他對居里的氣憤。他寫道：「居里剛來過，看起來像個鬼。他還替我安排了一個跟何應欽的約會，真是個多管閒事的小女人。王八蛋！我們4點半鐘赴會，真是可怕。花了兩個多小時，安排我向這個龜兒子作報告——而這

95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06-607。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cript of June 24, 1942 meeting, as used by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56-157.

9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180.

97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 9,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正是我一直想避免的事。」[98]

6月24日的會議充分地暴露出來，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對於中國戰區要做的事應該孰先孰後，彼此意見完全南轅北轍。如果我們只把眼光放在他們對事務爭辯上的話，要評判誰對誰錯可能並不容易。但是要想知道他們之中到底誰具有法定權威來作決定，可就易如反掌了。蔣介石是戰區統帥，史迪威是他的幕僚。蔣介石還是中國的國家元首，史迪威是他從美國請來幫忙的軍官。但是這個簡單的道理對於史迪威來說並沒有說服力，而他在7月初也馬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見第5章）。再從性質上看，蔣介石的想法肯定比較全面。他認爲即使在美援沒有到來之前，中國仍可著手籌劃軍隊訓練、人事調動和其他的行政改革，因爲它們並不需要等到美國武器裝備抵達後才能開始。但是史迪威只想把全部心思放在緬甸一地，因爲他相信收復緬甸是重建中國軍隊的必要前提。在此項任務完成之前，一切有關中國境內的軍事改革計畫工作均屬不切實際。史迪威是個渴望指揮作戰的人，對於蔣介石想交付給他的參謀工作不但缺乏耐心，甚至可能缺乏能力。何況他唯一能夠重掌兵權的機會就是一定要到緬甸去打仗，而不是坐在重慶的辦公室裡批公文。

從官方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在蔣介石花了很長時間耐心解說了全局性的問題之後，史迪威的回應簡單而粗暴：軍事補給品才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換言之，史迪威的立場是，如果不能從緬甸把補給品運進中國的話，其他一切均屬空談。由於史迪威相信自己的判斷力，所以寧願自己決定他在中國戰區的工作性質，然後指望蔣介石全心順從配合。因此，假如蔣介石最初的指望是把史迪威留在身邊，以防止他再到戰場上去糟蹋中國軍隊，並藉此避免中美關係發生摩擦的話，那他就徹底失敗了。最終的結局是，6月24日這個重要的會談沒有達成任何共識，只是讓雙方更加深對彼此的不滿而已[99]。

完全有可能的是，蔣介石在會談中冗長的自說自話過程中，只讓史迪威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蔣介石蓄意把史迪威的注意力從緬甸支開，關鍵是蔣介石根本不想讓中國軍隊再作戰，而且想阻擾史迪威改革中國遠征軍的雄心。鑒於史迪威歷來都自認爲對中國士兵們充滿同情心，所以他改革中國軍隊的途徑是先拿將領們開刀。他認爲一旦懲罰和撤除了不合作的將領之後，部隊和士兵就自然都會聽從他的命令[100]。假如在史迪威眼中，蔣介石的企圖是阻擾他誠心誠意地幫助中國的話，那麼他也相信他有自己

98 JWS t-w diaries, August 6, 1942.

99 JWS t-w diaries, June 24, 1942.

100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04-608。

的辦法，去對付這群不成材不合作的中國人。秘訣就是要美國向中國施加壓力。

總的來說，6月24日的會談，只是提供蔣介石和史迪威兩人一個機會去發現，原來他們對解決中國軍事問題所持的立場，竟然會相差得如此之遠。它同時也加強了他們各自的決心，解決爭端時要堅守自己的立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雖然6月15日和24日的兩次會議均未達成共識，但是它們卻讓雙方都感受到更大的壓力，認爲務必在下一輪較量中爭到上風，出一口怨氣。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趨勢此時也開始抬頭，那就是史迪威逐漸把自己和中國軍事改革看成是一體。史迪威自認爲是改革的推動者，如果蔣介石順從史迪威的主張，他就是支持改革。如果蔣介石有自己的想法，那他就是阻擾改革。在此後史迪威在中國服務的年歲裡，他一直信守這個簡單的二分法，同時也成功地影響了軍部的上司們。他們沒有想到另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蔣介石既熱心軍隊改革，又無法與史迪威共事（見第12章）。

此時還有另外一件事，也影響到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態度。那就是羅卓英在6月26日遵照蔣介石囑咐，就中國軍隊如何在緬甸戰敗的經過，呈交了一份詳細報告書[101]。羅卓英逐日詳記4月24日到5月26日的戰鬥細節。雖然其中小心謹慎無一字點名批評史迪威，然而提供的事實，卻與史迪威簡略且具攻擊性質的記載大不相同。特別重要的是，羅卓英提供了許多細節，說明數以千計中國士兵，如何在最高指揮官（史迪威）失蹤之後，跟隨中國長官甚至單兵各自求生，如何必須穿越原始森林和崇山峻嶺，沒有食物和醫療設備，最後大批人死於意外、疾病和飢餓[102]。在此過程中，有師長（200師戴安瀾）、副師長（96師胡義賓）及多位團長陣亡。其中特別是穿過人跡不至的緬北野人山，縱深四百里，高度八千尺，裡面盡是毒蛇猛獸，虐蚊瘴氣，在彈盡糧絕情況下，後有日軍追趕，第96師和200師官兵只能以回復到野蠻人生活的方式，才能爭取到一線生存希望，但是他們卻沒有降敵叛變的事例，最後少數幸運者終於在不成人形狀況下陸續返抵雲南。這種慘痛歷程和前述史迪威安逸輕鬆的旅程，實在無可比擬。

雖然羅卓英的報告堅定了蔣介石的信念，認爲史迪威是戰敗之後發生慘劇的禍首，但是他仍然克制自己（6月27日），避免對史迪威疾言厲色。因爲蔣介石此時還存著一線希望，等待史迪威會爲自己的行爲後悔並加以改進[103]。因此蔣介石一再責怪自己

101 羅卓英報告，中文手抄本，1942年6月25日，18頁，在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3-3. 又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26日。英譯本（13 pages）見：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Also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ile #21.

102 羅卓英報告（21頁），1942年6月25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0冊，頁144-157。

103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7日。

當初未能下決心抵制美國建議，終至未能堅持自己對緬甸防務最早的方案[104]。本書的下一章將會討論到，6月底發生了另外一些事情，終於把他們原來暫時敷貼在大傷口上面的一層薄紗布給撕開了，雙方都抑壓不住對對方的憤怒，而最終爆發成爲正面衝突了。

## 肆、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不同的期望

### 一、史迪威的期望

一般來說，西方不少著作所採取的立場是，一方面嘉許史迪威對緬甸戰爭所作的努力，認爲他成功地迫使一個既不甘願又無能力的中國政府參加了作戰，但是另一方面又認爲他無需爲戰爭的失敗承擔責任，因爲他也是受害者，過失全在他人。本書參考過的中英文資料，對這兩個結論都無法支持。本書的前三章已經說明，中國政府早在美國參戰之前，就已經表示強烈意願想出兵保衛緬甸，並且一再懇求英國予以合作。更有進者，中國在緬甸戰爭中的表現，也直接否定了某些美國軍人(馬格魯德)的說法，認爲一旦太平洋戰爭開始，蔣介石就會停止打仗，並且把作戰的負擔一概推到西方盟邦身上。事實上，雖然美國政府並無意願動用自己的軍隊在亞洲打仗，它卻急切希望用中國軍隊打這場仗，而且還要依照美國的指導去打。至於英國人，則既無意積極抵抗日軍，也無意讓中國軍隊在緬甸土地上作戰。等到他們慌手慌腳改變主意的時候，作戰時機已經喪失。

史迪威個人對於指揮權的理解，是緬甸戰爭中一個關鍵問題。史迪威設法從蔣介石手中取得全部指揮權，其背景是自己生長在美國體制下的經驗，也和他想要改造中國軍隊的急切願望密切相關。但是權力一旦到手，史迪威的使用方法，卻大大地超過了一個美國軍官在美國體制下可以行使指揮權的限度。史迪威真正想要的並非把美國體制搬到中國來，而是想完全自作主張和獨行獨斷。他希望對中國士兵和將領們行使絕對權力，包括任免權和隨意處分權，而且不受中國軍政部或蔣介石的干預。當他剛到中國，接受蔣介石任命他爲聯軍參謀長並賦予指揮實權時，史迪威這種心態就已經表現出來。因爲他在接到委任後並不高興，反而異常生氣，理由是他認爲，中國政府應該送給他一顆刻有「總司令」字樣的官章[105]。顯然，史迪威心中想得到的安排，既不是美國式的，也不是中國式的，或許更接近於英國指揮官在緬甸和印度殖民地所擁

104 同上，1942年6月30日。

105 See: JWS t-w diaries, April 4, 1942. See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19, 1942.

有的權力，或是美國軍官對菲律賓部隊享有的權力。這種做法只是讓史迪威和美國軍方，洩露了一個他們對待中國人的特殊心態，而這個心態保證會挑起中國人強烈的反彈，並進而讓他們開始懷疑美國人對華的動機。史迪威毫不掩飾地急於想從蔣介石手中抓到軍權的動作，只能讓蔣介石在自己的部屬面前喪失顏面，從而衍生出許多嚴重的政治後果。

## 二、中國人的期望

如前所述，中國當初同意任命史迪威爲中國在緬甸部隊指揮官的真正原因，完全是出於外交考量，即向美國政府表示好感，並且依賴美國促進中國和英國軍隊之間的合作關係。蔣介石充分了解中英兩國都無法接受對方軍官來指揮自己的軍隊，而他們在緬甸戰場上又必須協同作戰。因此合理的妥協就是讓一個美國軍官作中國軍隊的指揮官，以便換取英國人參戰，並打消英國企圖奪取中國軍隊指揮權的妄想[106]。當然更理想的安排是羅斯福能夠得到邱吉爾的允許，把英國在緬甸的軍隊一併交給史迪威指揮。不過，蔣介石的這項努力並沒有成功[107]。儘管史迪威最後只是得到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蔣介石還是沒有產生憂慮。因爲他3月初會晤史迪威時，親耳聽到史迪威的保證：「我們是他(蔣介石)的部下，也會照他的話去做。」[108]

在史迪威成爲美國軍部候選人之前，蔣介石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因此對他並無先入爲主的偏見。在挑選過程中，蔣介石也未嘗關心史迪威的指揮能力，因爲蔣介石向來相信自己的軍事領導才能。再說，他多年來習慣於和戰地部隊指揮官保持直接聯絡，因此他只是要求和期望這位美國軍官，根據以往中國的觀念作一個盡職的參謀長而已。由於多年來他已經有何應欽作他的參謀長，所以一個外國軍官只需按照這個模式作「聯軍參謀長」即可。在蔣介石心目中，史迪威的指揮權只是美國強加於中國的要求，而中國又不知如何拒絕才好。然而他也不想失去對史迪威的控制。因此，在史迪威赴緬甸前線前夕，特意告訴史迪威：「將軍明日以余之參謀長資格赴緬，故應確知余之意見及對現局之觀點。願將緬甸現狀，余所知者，坦白爲將軍言之，深信此必有助於將軍之執行職責。」隨後，他以一個典型的中國方式，把自己對緬甸的所知的一切，全部向史迪威交代，並要史迪威一定要按照其命令行事[109]。

---

106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5日，《戰時外交》(一)，頁643-650。

107 CKS cable to Soong, March 10,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3. 蔣介石與亞歷山大將軍(General Alexander)會談記錄，1942年3月27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117-120。

108 JWS t-w diaries, March 6, 1942.

109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568-572。

如果以「後見之明」來看歷史，中美兩國間從一開始就有不同的利益和期望。美國領袖們認定一個美國軍官要到中國去指揮中國軍隊，不管他的職稱是聯軍參謀長還是其他名義均無關重要。當中國領袖們(蔣介石及宋子文)第一次聽到美國的想法時，缺乏足夠的警惕心，因爲美國軍部誤導他們，以爲將會有大量的中、英、美三國軍隊在緬甸一起混合作戰。

很快地，戰場上的變化就超出中國的預期。首先是美國承諾派遣到亞洲作戰的軍隊根本沒有出現。接下來英國人拒絕接受史迪威的指揮。最後是剩下中國一個國家被迫接受美國指揮官。在1942年1月裡，中國人再也沒有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發展。再說，中國人誠然指望史迪威能夠盡心盡意地把他的(對英)外交工作做好，同時也指望他只是在形式上和儀式上扮演他的軍事角色就可以了。然而事情的演變卻正好相反。因爲史迪威對他的外交任務既不在意，也不在行，而對他的軍事職務卻萬分執著。在他和英國人交往過程中，史迪威總是讓中國人覺得，他或者是缺乏決心督促英國人履行義務，或者是不惜犧牲中國利益去遷就英國人。一般說來，英國對中國遠征軍表現得異常冷漠，提供的食物不足，交通工具也差。說到底，他們就是漠不關心[110]。這一切看在中國人眼裡，當然會感到非常反感。邱吉爾可能最能夠代表英國人的態度。在邱吉爾戰後回憶錄中，他也提到第一次緬甸戰爭，但他幾乎沒有一字提到中國的參與。在他認爲，仰光一旦失守，就表示緬甸戰爭已經毫無意義[111]。諷刺的是，仰光失守後的作戰(1942年3-5月份)，才正是史迪威不顧一切把中國軍隊投入戰鬥的時候。從這個角度看來，史迪威對於英國人意圖的無知和對戰局的誤判，實在到了驚人的地步。

## 三、文化和個性的衝突

如果史學研究者能夠多作些努力，去弄清蔣介石的文化背景、職業經驗、政治盤算和領導作風的話，或許會有助於理解，爲什麼在短短數月之內，他和史迪威之間的關係會惡化到如此地步。作爲一個美國軍人，史迪威當然對美國的軍事訓練方法和先進的科技感到驕傲與自信。他對自己的資歷也信心十足，同時也相信，只有美國政府才能找出最合理而又有效的方法，去幫助(和指導)中國。既然他是美國陸軍中最具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那麼理所當然，應該由他擁有全權來做好他的工作。

然而，蔣介石和第5軍第6軍的將領們，卻是成長在20世紀初期中國新一代的民族主義者。他們敢於抵抗日本人的膽量，大大地超過了他們在戰場上和日軍一爭高下的

110 Report by Boatner. H. L. Boatner Personal Papers, B-1/F-2, pp. 1, 22. MFA.

111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pp. 151-171.

戰鬥實力。他們可能像以前聽取德國和蘇聯軍事顧問的意見一樣，會樂意聽取史迪威的意見。但是如果想要他們馴服地依照史迪威的命令行事的話，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在中日戰爭艱苦地打了四年多之後，假如還有外國人夢想變成「中國的戈登」（Chinese Gordon, 英國軍人Charles George Gordon帶領華人官兵幫助清廷平定太平軍之亂），那也的確是和中國當時的民情完全脫節。這種外國人給中國人的印象，不是弄錯時代，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只能叫人無法忍受。

因此，當史迪威開始全神貫注地行使他的指揮職權時，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最初是感到啼笑皆非，不能了解這位美國軍官何以能如此缺乏文化素養，敢在別人的國度裡指手畫腳。他們繼而大爲不滿，不能了解何以他能如此狂妄粗暴，對周邊的一切事物譏諷嘲弄，乃至惡言相向。當史迪威抱怨指揮權受到干預，並且鍥而不捨地提出新要求時，中國人也開始作出一些小讓步，希望能讓他感到心滿意足。但是這種互動方式，只能使雙方都不滿意。蔣介石覺得作出的每一個小讓步，都是在史迪威的脅迫之下作出的，絕非心甘情願。儘管如此，他至少還存著一絲希望史迪威會適可而止，就此打住。不幸的是，這些小讓步同時卻使得史迪威相信，只要美國政府願意不斷施加壓力，他就能夠從蔣介石手中擠榨出更多的讓步。這種心理互動的模式，讓他們兩人之間衝突不斷，在戰爭的後幾年中，也逼得雙方各走極端。

美國軍方批評中國將領不服從史迪威命令，這本來就不切實際。因爲這些將領們在其軍旅生涯中，從來沒有被教育過如何去服從外國人。即使他們誠心誠意地想要那麼做，也不知道應該如何做才能符合史迪威的標準。更何況，他們必須經過一段漫長過程的感染薰陶，才能逐漸熟悉如何把美國式的體制、行事規則和道德規範，放在中國環境中落實，不僅有效而且能恰如其分。他們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體制的經驗，正好是以後無數衝突的深層原因。

史迪威的問題是，他似乎對這些文化和體制上的差異毫無敏感度。當他把他的願景推銷給美國領袖時，他從沒有說明他打算怎樣和中國軍官們打交道。他早年在中國曾和幾個北方省份地方部隊士兵廝混在一起，而且相處融洽。憑著這些極其短暫而有限的經驗，史迪威以爲只要他能避開貪腐無能軍官們的干擾，而直接跟士兵們打成一片的話，他就有辦法超越中國北方、南方、地方和中央軍隊之間的重大隔閡，而把他們團結成爲一股新的軍事力量。形象地說，史迪威其實只不過是看到中國軍界的幾棵樹，就自以爲他已經看清楚了整座森林。蔣介石完全看出史迪威的思路過於簡單，因爲他自己就必須運用不同手段去和不同背景的部隊打交道，以加強他對它們的掌控。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對各種部隊間的差別則有更深刻認識，因此才會細緻地研發出許多不同的「統戰」策

略，因時因地制宜，作出有彈性而富於想像力的調適，據以削弱國民黨的統治。

然而，史迪威對於中國事務既沒有足夠的智慧，也沒有足夠的耐心，去尋求務實的方案。有趣的是，史迪威理應累積了多年在中國服務的實際經驗，又曾經親身觀察過中國地方部隊的運作。但是，他居然以爲，美國軍官只要在官職上變成了中國將領的上司之後，中國將領們就可以心領神會地依照美國規矩辦事。史迪威自詡爲了解中國人，但是對中國軍隊的行爲卻不斷表示震驚、疑惑、憤慨，甚或暴跳如雷，史迪威這種反應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換句話說，不管是好是壞，中國軍隊自從19世紀末期以來就衍生出許多特有的文化形態、人事關係和行事作風等等。這些現象以現代的軍事眼光來看，也的確是缺點重重，而且也是許多有強烈改革意識的中國軍人急於想要糾正的對象。但是在沒有經過文化轉型和耐心說服的工作之前，史迪威以爲他可以光是靠著職務的頭銜、官印、委任狀在文字上所規定的權力，再加上他個人自恃擁有的魅力和精神感召，就可以讓中國軍人心悅誠服地，按照美國制度化的標準和法則行事，這種想法實在大大地違反了中國的政治軍事現實。

同樣有趣的是，以史迪威的中國背景，他應該對於中國軍隊服從和執行命令的能力有心理準備才對。別的美國軍官或許可以不知情，但是史迪威無法用這個理由推卸責任。或許唯一可以替他開脫的說詞，是他在接受任命時，日本對緬甸的威脅已經非常嚴重，以致他根本沒有時間去作相應的準備工作。其實，假如他果真「早就知道戰爭是沒有希望」的話(他在日記寫道)，那麼他大可以不必積極去爭取指揮權。他只需明白告訴蔣介石說，他只想把聯軍參謀長的職務做好，緬甸的戰事由蔣介石自己去操心即可。事實上，不論是美國或是中國政府，都不會強迫史迪威去做他做不到的事，而蔣介石還特別指示史迪威應該及早安排撤退計畫，以便戰局一旦逆轉便可立即付諸實行。但是史迪威卻選擇了先把兵權抓到手，然後打一場在戰術上是災難性的仗。他的戰術名言是，只要敵人在前面，就沒有選擇不打的餘地。他對蔣介石所說過的另外一句名言是，「我們必須從當前的立足點開始打起」[112]。他很可能不願意在一生軍旅事業中首次進入戰場就因爲撤退而喪失顏面，所以硬著頭皮也必須去打。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卻毫不遲疑地損耗了大量中國最好的軍隊。

史迪威在處理人際關係上的粗魯作風，雖然被不少著作所津津樂道，但卻是他和中國人共事的致命傷。史迪威帶著一小群美國軍官到前線，又馬上將他們安插到許多遠征軍將領的頭上，這種做法當然對美國軍官的戰鬥和組織能力是一大挑戰。這個中國軍隊從來沒有接受過外國人的直接指揮，但是他們卻充滿了反帝國主義(和排外)的

112 JWS t-w diaries, April 7, 1942.

情緒，史迪威突然把美國軍官擺在他們的頭上，如果想要使過程順利，就必須證明自己是一位明智的領袖，既具有文化敏感度，也具有政治智慧。不幸的是，史迪威並不具備這些條件。

事實上，史迪威只是經常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因爲他缺乏耐心和能力，不能在中國遠征軍內建立一個合適的指揮系統，所以反而在盟邦間製造了許多不必要的衝突。史迪威總是尖銳地抱怨蔣介石從一開始就不願意授給他充分的指揮權，但是卻閉口不談他在得到指揮權之後的誤用或濫用的事例。根據史迪威的副手波特勒(Haydon L. Boatner)將軍報導，史迪威在緬甸的總部是一團混亂，毫無秩序，甚至違反理性的組織原則[113]。比如說，由於缺乏事先準備，他不得不用低階的美國軍官去直接指揮高階的中國將領，而且經常不循正常途徑，又頤指氣使，因此造成無謂的混亂和反感[114]。波特勒在戰後寫下了自己對戰爭的回憶和敘述，坦承美軍官員眾多缺失，和史迪威的自我脫罪指責他人形成尖銳對比。史迪威一直以爲只要蔣介石下達命令，那麼所有的將領們就會服從他。而史迪威認爲有好幾位將領(如孫立人)是他心中的模範。他卻不知道，連這些將領也不滿意他的作爲，而向中國上級長官們控告史迪威無視中國法規，任意變更中國軍隊的編制，指責其行爲是「毀辱國體，損害主權」[115]。而中國政府在接到類似的指控後，雖然感到非常同情，但也感到被動，並且勸告他們務必隱忍，不可去驚動美國。美國人的恣意批評，和中國人的忍氣吞聲以和爲貴，的確形成了鮮明的文化對比。

## 伍、緬甸戰役對中國的影響

### 一、史迪威對中國實況的認知

抗戰期間中國軍隊一律號稱政府軍隊或是「國軍」，其實它們是建立在不同程度個人忠誠基礎上的混合體。蔣介石和其部屬之間的關係，既非封建時代領主和臣屬的關係，也非西方現代法治國家法定領導人和其行政下屬的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毋寧說是一群因素的組合，其中包括對政治主張(三民主義)的信仰、民族主義的情緒、制度上長官與部下的隸屬關係、傳統道德觀念的約束、親屬關係和個人恩惠的存在、形

113 H. L. Boatner Personal Papers, B-1/F-2, pp. 35-45. MFA.

114 Ibid., pp. 28-29, 69. MFA.

115 孫立人、廖耀湘等師長呈交杜聿明報告，1942年9月12日。《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十四—遠征入緬》，#31038405。

式上的客套，乃至利害上的討價還價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因素在不同的程度上混在一起後，決定部屬對領袖的效忠程度，也決定領袖有多大能耐可以維持紀律和要求服從。即便在蔣介石的中央軍系統之內，蔣介石和不同的部屬之間的關係也取決於不同的因素。一個明顯的標識是蔣介石對部屬所使用的個人稱呼各有不同。他對某些人稱「兄」，對某些人道「弟」，對某些人稱「同志」，又對某些人只用職位(軍長、師長)名稱。這中間的差別都各有奧妙，並非隨意而爲。

至於蔣介石和地方軍隊將領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地方將領和他們自己下屬的關係，就更複雜了。在後者的情況下，對政治共同的信仰或是制度上的從屬感，經常非常薄弱或根本不存在。反而是其他的因素更重要，比如親戚關係、鄉土感情和個人恩惠，或者是利害的盤算。這些因素決定部隊的向心力，也幫助維繫國家統一的虛象。但是在極端個別的情形下，維持軍隊最低限度服從的唯一法寶就是脅迫，甚至動用武力解決。

中國的軍事現實明顯和美國的制度化大不相同，也遠遠沒有達到美國人所指望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標準。然而在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人並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們無法挑精揀肥，先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符合美國模式的現代化國家，然後才與之結盟。他們只能接受現實中的中國，然後試圖適應並幫助改進。不管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如果不能充分了解這些現實的話，就註定沒有辦法在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下發生作用。簡單地說，中國根本就不是和英國或者蘇聯一樣的盟邦。如果想要有效地幫助中國改進其眾多制度上、人事上和運作上的缺點的話，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對中國進行了解，然後才能對症下藥，提出改革方案，而不是呆板地把在美國行之有效的方法當成楷模，然後生吞活剝地移植到中國政治和軍事土壤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也絕對不是菲律賓。

史迪威既然在中國有過多次服務的經歷，照理說應該比別人更熟悉這些現實情況。只有在務實基礎上先去了解中國是何種性質的盟邦，和它有何種程度的能耐之後，美國政府才能拿出適當的軍事改革方案，使中國軍隊在觀念和行爲上逐漸接近美國的期望。美國政府並不需要一位智慧超群的軍官才能看得出中國軍隊的嚴重缺點，也沒有必要在這些表相問題上去喋喋不休或發洩情緒[116]。重要的是，美國軍方必須願意運用政治智慧，先去了解這些缺點的性質和來源，然後找出合宜有效的解決辦

116 事實上，如果對蔣介石有關軍事問題的講演和論著作一檢查，即可發現他是對中國軍隊各種缺點最嚴苛的批評者之一。這也包括他的嫡系部隊。這一點並不意外，因為他的蘇聯和德國軍事顧問曾經多次提出同樣的批評。

法。美國政府同時也需要讓中國人產生足夠的動機，主動配合接受這些改革辦法，爲他們自己的利益去解決問題。假如美國政府不作這些努力，那麼無論他們如何大聲叫嚷，肯定還是不會得到預期的成果，最多只是讓他們能夠陶醉在自己的優越感之中而已。

然而史迪威對於中國軍事政治中的這些複雜微妙但又惹人煩厭的現實，要嘛全然無知，要嘛粗暴處理。因此，他就把蔣介石交給他的指揮權的性質，當成是和美國體制下的授權一樣的簡單和單純。這也就難怪，他接下來就把中國的將領們當成是他美國下屬一樣來使喚了。

史迪威的這個假設產生的結果，是他採用連蔣介石本人都不敢採用的方式去對待中國將領們，結果只能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因爲他無形中鼓勵屬下美軍軍官有樣學樣，因爲在這些中下級軍官眼中，史迪威當然最「知道怎樣對付中國人」。難怪史迪威從得到指揮權開始到緬甸戰敗爲止的短短兩個月中，他在中國軍隊高級領導層之間所引起的爭論，大大超過了此前四年國軍抗戰中的任何一個時期。對於一位在美國陸軍中享有「中國通」盛譽的軍官而言，史迪威的文化短視和其行爲的粗暴程度著實令人吃驚。儘管他的出發點是爲了改善中國軍隊的缺點和提高戰鬥力，但是他的工作方式卻是既不得當又不得其時。即使是在太平年代，要想根本地改變一個國家也是一件艱巨的工作。而在戰時，這個工作就更要艱巨得多了。然而由於史迪威徹底缺乏政治素養，所以使得他在剛到中國幾周之內就使情況急劇惡化。真讓人忍不住想套用一句英文俗話：一頭（美國）牛衝進了（中國）瓷器店（a bull in a china shop）。這就不禁使人懷疑，當初美國政府選擇史迪威擔任這個職務是否明智了。

以史迪威早先在中國的服務經驗，他應該有充分機會去體會中國政軍關係的高度複雜性。毛澤東的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並不是他給共產黨黨內同志們私相傳授的奪權秘方，而是對20世紀中國政軍實況的一個生動描述，對中國所有的政治團體一律適用。到了1942年時，蔣介石的領導地位是建立在一個已經大爲削弱的軍事力量基礎上。當他告訴史迪威說，第5軍和第6軍是他剩下的最好部隊時，他並不是在向史迪威危言聳聽，而只是在向他「交底」而已。因此，當他把指揮權交付史迪威時，其代表的意義就不僅是一個單純的軍事部署行動而已，而是對美國盟友的深切善意，和對美國軍事領導能力的高度信任。因爲，蔣介石等於是把政治「老本」都交出去了。

即便如此，他還是忍不住再三叮囑史迪威務必要小心使用這兩個軍，因爲中國再也承受不起讓它們失敗的後果了。他沒有說出口但又希望史迪威能夠心領神會的是，這兩個軍和其他一小部分忠貞部隊不僅是中國可以和日本作戰的本錢，也是保障他的政府能夠繼續存在所剩餘的最後政治資本。但是蔣介石哪裡知道，史迪威根本聽不進

蔣介石要他小心使用部隊的那些嘮叨話。原因是史迪威缺乏一雙敏銳的政治耳朵，去領悟蔣介石的弦外之音，而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的個性隔閡，又讓他無法向史迪威袒露他在國內政治軍事環境中的脆弱地位。

史迪威對中國政軍情勢的誤讀誤判，導致他認爲一定可以把許多在美國行之卓有成效的制度法規，照章搬到中國來使用。他自己的軍事教育背景讓他相信，戰爭本來就是冒險的活動。假如每個人都只打有把握贏的仗，那麼戰爭根本無法打下去。固然有不少著作似乎頗爲欣賞史迪威這種積極進取的勇武豪邁精神，認爲它必然優於蔣介石的保守作風，但是人們對這個問題還是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毛澤東就是一位標榜「打不贏就走」的軍事家，他這個論點對於共產黨軍隊的壯大有不可估量的貢獻。相反地，蔣介石本人在1937年淞滬會戰承受慘敗，就正是因爲他失之過於「勇武」，堅持部下必須不計一切犧牲而堅守陣地過久的緣故。從這個角度來看，蔣介石與史迪威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時所產生的爭論，絕不是黑白分明。這個爭論並不證明蔣介石懦弱、投機和保守，也不能證明史迪威勇敢或是盡心盡力地達成任務。然而對於史迪威來說，蔣介石再三囑咐他要小心，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蔣介石根本沒有作戰的意願。

從分析眼光來看，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主要差別其實有兩點：第一點是戰爭使用的是誰的資源和誰要承擔後果。第二點是誰更能看到戰場成敗以外的大格局和它可能導致的長遠政治後果。另外還有一個可能相關因素，那就是史迪威個人的心理狀態。以下幾節將對於這些因素分別予以討論。

## (一)資源的考量

作戰所使用的資源是一個極端重要的考慮因素。在這方面，史迪威在第一次緬甸戰爭中的處境頗不尋常，理由是他在運用別的國家的軍隊來實現自己的計畫。這種情況在本質上，和一個證券經紀人使用別人的儲蓄資金在股票市場從事交易活動頗爲相似。這位經紀人的職業道德可能毫無瑕疵，也可能絕對盡忠職守地行使他的最佳判斷力，去爲客戶的投資爭取最大利潤回報。因此，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經紀人可能不負責任，或者他沒有勤奮工作。問題的癥結在於經紀人是在使用別人的資源去進行投資。

按常理說，一個有理性而且感情平穩的人，在使用自己資源去投資之前，一定會先考慮投資萬一不幸失敗的後果，因爲失敗的後果可能不堪設想，諸如倒閉、破產、飢餓、離婚、無法負擔子女教育費，甚至無法償還購屋貸款而不得不掃地出門等等。但是經紀人拿客戶的金錢去投資，卻不會有同樣的擔憂，至少不會有同樣程度的擔

憂。即使投資萬一失敗，經紀人的自尊心和職業聲望可能連帶受到衝擊，但是他並不需要承擔上列最壞的實質後果。他要作的只不過是另外找新的資金來源去繼續原來的工作，或者是換一家證券公司從頭開始而已。須知在這個世界上，投資經紀人所以能夠存在，本來就是因爲有許多擁有資源者不懂或是不願自己煩心去從事投資活動，而寧願把資源信託給經紀人操作。

史迪威的情況和股票市場的經紀人有高度相同之處，也有重要不同之處。相同之處是史迪威想用中國政府的資源——軍隊——在戰場上一搏，而中國政府本來也就急於出兵去打緬甸戰爭。重要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政府並不想找經紀人代勞，而是打算自己在戰場上搏鬥。但是由於美國政府和史迪威的逼迫和誤導，以爲美國也承諾提供相當資本(軍隊)進行共同投資和承擔共同風險，所以最後才心不甘情不願地交出兵權。這就更扭曲了資源擁有者(客戶)和被信託者(經紀人)之間的關係了。更糟糕的是，在這個實例中，經紀人還自以爲他是在對客戶施捨了一個恩惠，因此喧賓奪主，頤指氣使。絕對糟糕的是，史迪威這個特別的經紀人剛剛賭輸了一筆投資，就希望從客戶手中挖出第二筆資金，以便繼續下注。在緬甸局勢步向大災難之時(1942年4月29日)，史迪威已經急不及待地想把更多的中國部隊放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寫道：「天哪！假如我們可以把那十萬個中國兵送去印度，我們手裡就有本錢了。」[117] 換句話說，緬甸戰爭如果是由中國政府自己主打的話，它一定會像資源擁有者那樣小心翼翼地處理戰事，務求不致動搖國本。然而戰爭一旦交由史迪威主宰，儘管後者信誓旦旦說維護中國利益，但是他的心態和投資經紀人並無不同，那就是以別人的資產作自己的賭注。如果賭贏了，可以自誇豐功偉業。如果賭輸了，可以把爛攤子丟還給中國人自己去收拾。不幸的是，後者果然成爲事實。中美之間的這種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同盟國關係史上，其性質可謂絕無僅有，也是我們要想深入了解中美關係必須牢記的一個要素。

## (二)戰場以外的風險

無論史迪威如何信誓旦旦聲稱自己是誠心誠意爲增進中國的國家利益而奮鬥，但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是他並非中國人，也無需一輩子生活在中國爲自己的行動承擔長遠後果。他接受的是美國式軍事教育，而美國政治權威和合法性並不是依靠槍桿子打出來的。美國部隊打了敗仗，在國家理性化的資源分配體系下，部隊的番號和建制會予以保持，人員會得到足額補充，獲得新武器，經過整訓然後重上戰場。如果一個普通美國軍官以爲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那也不足爲怪。但是史迪威並非一位普通美

11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April 29, 1942, p. 85.

國軍官，他萬萬不可如此幼稚。他應該非常清楚，在20世紀的中國，一支軍隊的失敗馬上影響部隊的生存，其領袖的政治生命，甚至影響到一個政府的存亡。理由是，政治圈中其他的角逐者絕不會容許一個戰敗的領袖重新裝備軍隊。1920和1930年代蔣介石曾經屢次被指責用這個方法去消滅異己，其實他只是根據當時政治生活運行的基本法則行事而已，就是當蔣介石本人碰到兵敗時也逃不過同樣的命運。回過頭來再看緬甸的例子，蔣介石把他剩下的血本全部投進戰場。按照他的盤算，如果股票市場興旺(戰事順利)，就留在裡面繼續玩。萬一看出有血本無歸的危險時，就應該立即從市場(戰場)上抽身，這才是最合乎道理的做法。

以上討論的目的，並不是淡化中國自身在結構上存在的諸多嚴重缺點，而是在指出這些缺點絕非僅憑個人意志就可以輕易加以改變。面對這個局面，史迪威更是難以在短期內有所突破，其原因是由於他對自己的工作定義說得非常明確：他的第一身分是美國政府的代表，最高職責是保護美國國家利益。以他這樣的身分和心態，不論史迪威如何在口頭上宣稱他一定會盡量地保護中國的部隊，都未必能夠得到中國人的充分信任，更何況他連這個姿態都沒有做到。

更不幸的是，他給中國人的印象完全不像是會保護中國軍隊的，反而讓人認爲美國軍人對中國軍官傲慢無禮，使用中國士兵又膽大妄爲，根本近乎糟蹋。到底這個印象是出自中國人的度量狹小，抑是史迪威的罪有應得，歷史學家如果想要得到答案，必須先研究更多的新史料才能去剖析史迪威的心理狀態。但是無論如何，有一個基本事實無法改變，那就是，中國人對史迪威的態度，從1942年2-3月間的極端熱情，到同年6月的極端厭憎，前後只費了不到三個月光景。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兩個盟邦之間的合作前景已經大受傷害，需要極大努力和智慧才有修復可能。

### (三)心理因素

還有一個微妙的心理因素，或許可以幫助解釋史迪威在緬甸戰爭中的作爲，那就是他本人的自尊心和私心，對他的視野和判斷力所產生的影響。

說到史迪威的自尊心，如前所述，他自己的記載顯示，他來到中國時心態並不平衡。他帶著強烈的指望要讓中國人看清楚，他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也不再是從前那個任人推來擠去的美國陸軍上校而已。因此他不會再忍受中國官員們的等閒視之了。正好相反，他此時是風風光光地首度登上中國的政軍大舞臺，肩膀上掛著三顆將星。因此必須挺直腰桿，維持形象，讓中國人明白他到底是何方神聖。由於緬甸是他在既漫長而又不顯赫的軍人生涯中的第一次實戰機會，因此不難想像，他可能會急

於想打一個漂亮的大勝仗，以此一舉成名。作爲一位59歲的老將軍，他的軍旅生涯不會再給他更多的機會去統率這麼大規模的軍隊了。對他而言，最無法容忍的結局是，帶著十萬大軍浩浩蕩蕩進入緬甸，不久之後卻又灰頭土臉地帶著他們鎩羽而還。因此，只要有一線希望能夠實現他的計畫，他也一定要堅持到底，即使要置中國軍隊於極大的風險也在所不惜。

## 二、緬甸戰敗對蔣介石的當下和長遠影響

像前文所說，蔣介石自我批評的重點是，他不該爲了維持盟邦間和諧的虛象，而對美國壓力作出實質讓步。他從第一次緬甸戰爭得到的教訓是，中國今後必須自力更生，而不應屈從盟邦[118]。這一個教訓對今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將有深刻影響。我們在本書第六、七、八章中將會看到，從1942年到1944年，中美兩國政府在有關第二次緬甸戰爭的談判過程中，之所以遭遇重重挫折，都和蔣介石誓言絕不重蹈第一次緬甸戰爭的覆轍有關，他都根據這一個重要教訓採取談判立場。

那麼，到底蔣介石自認爲從第一次緬甸戰爭中所得到的重要教訓是什麼？簡言之，大約有以下幾點：

第一、蔣介石不斷接到有關英國背信事例的報告，而使他對英國的猜疑與日俱增。這種疑懼可以解釋爲什麼蔣介石堅持，今後凡是和英國人進行任何交涉時，他一定要英國人提出滴水不漏的保證會依照約定行事。

第二、地面戰爭「必須」要有空軍支援，否則一定會招致潰敗。讀者們應該還記得，這一點也是史迪威在緬甸戰敗後初次和蔣介石會面時所最強調的一點，但是等到中國戰區有此需要時，他又似乎忘卻了自己早先的判斷。

第三、由於日軍在仰光登陸所產生的嚴重後果，使中國人相信今後任何收復緬甸的計畫必須包括占領仰光港，並有效阻止日本經由海上運輸線以物資和人員補給和支援在緬甸境內作戰的日軍[119]。

第四、中國一方面必須極力爭取同盟國承諾及早展開第二次緬甸戰爭，但是另一方面又並不想委派史迪威再度擔任中國軍隊的指揮官。在此後兩年中(1942-44)，蔣介

118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30日。

119 根據英國向中國政府提供的情報，日本送了40條船的軍火及人員經過仰光港進入緬甸戰場。英國人的原意可能是證明他們的軍隊因此無法守住陣地。但是在1942-44年間，中國人用同樣的數字，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英國海軍必須控制孟加拉海灣，以阻止日軍通過仰光港的增援。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政府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立場的堅持，其實來自英國提供的情報。

石在認真地和英美談判未來緬甸戰爭進行的方式、規模、時機等問題時，也多次設法使史迪威離開中國。在中國政府看來，第二次緬甸戰爭和史迪威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課題，前者屬於戰略，後者屬於人事，必須分開處理。不幸的是，美國軍部的官方歷史家和後來某些著作卻把這兩件事混爲一談。其原因正由於他們在研究中美關係時過分依賴史迪威的文檔，因此不自覺地以史迪威的眼光觀察中國行爲和揣測中國心理。正由於史迪威對緬甸戰爭表現出最大的熱心，因此容易導致人們得到一個錯誤結論，那就是只要中國政府不支持史迪威，那就證明它也不支持緬甸戰爭，而史迪威本人對於中國政府和他之間關係不和的叫嚷，也自然加深了美國人這種印象。這個結論保證讓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走入歧途。

中美兩個盟邦在第一次緬甸戰爭中首度進行軍事合作就以悲劇收場，它清楚地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政策的意向和執行結果之間，往往會出現重大差距。它也說明「人爲因素」能夠讓最單純的動機走樣。史迪威原來是被美國派送去「幫助」中國的，然而在兩三個月之內，他的行爲卻成爲中美外交史上傷害雙方關係最嚴重的決定性因素。1942年6月中旬，蔣介石在給宋子文和熊式輝的電文中，總結他對史迪威的印象。他寫道：「中國戰區至今並未有何組織與籌備進行，對於維持中國戰區至少限度與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著手。空運建立與補充，以及空運按月之數量，陸空作戰與反攻時期之整個方案，彼等皆視爲無足輕重，一若中國戰區之成敗存亡皆無關其痛癢，此爲中最近所觀察之真相。」[120]

不難想像，如果美國人當時有機會聽到蔣介石用如此嚴厲的話指控史迪威，他們一定會大吃一驚。但是人們不禁也需要問，爲什麼史迪威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讓中國的態度出現這麼巨大變化。在現有史學作品中，不少學者們花了不少篇幅來證明這是蔣介石的過失，所列舉的理由包括他的心胸狹窄、對自己和中國的真正利益茫然無知、思想偏執、教育程度低、腦袋裡盡裝著一些荒誕不經的戰術觀念、低劣的判斷能力和另外一大堆其他的缺點。然而史學界還缺乏一本深入研究蔣介石個性的著作可用來檢驗這些觀點的正確性。上述蔣介石經常被指責的缺點，只不過是研究者從史迪威眼中觀察到的蔣介石，以及參考史迪威遺留檔案所拼湊而成的蔣介石。但是這個蔣介石形象的描述忽略了他前後和許多外國軍事顧問(包括德國、蘇聯、法國、日本)成功合作的紀錄。因此，如果要想對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作出一個公允評價的話，中國當事人的想法不可以被忽略，中方的歷史材料更不可不看。

然而儘管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怒火日益高漲，他仍然不想傷害美國人的感情，總是

120 蔣介石致宋子文及熊式輝電，1942年6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603-604。

避免經由官方途徑提出抗議。爲此，蔣介石在6月15日致宋子文的電報說：「對史個人感想，此時不宜表示，以美國政府對我國十分誠意援助，非萬不得已，更不宜對其所派人員有何表示也。」[121] 而蔣介石在6月17日日記中再度提醒自己：「對美員史蒂華(史迪威)事，以忍辱忍詬慎持之，切勿使氣暴怒。」[122]

事實上，蔣介石的隱忍只是使他失去可以不露聲色地開革史迪威的機會。因爲早在6月初馬歇爾就已經察覺到蔣介石對史迪威態度日趨冷淡。爲此馬歇爾向熊式輝表示，如果蔣介石的確認爲史迪威不適任的話，美國願意將彼召回。到了6月中旬，當熊式輝仍然沒有收到蔣介石對馬歇爾的明確答覆時，他又催促蔣介石盡快表態[123]。6月19日，史汀生部長也告訴宋子文，雖然蔣介石表示對史迪威印象甚佳，但他似乎對史迪威並沒有信心，如果事情確實如此的話，那麼請蔣介石坦白提出將史迪威撤職的要求，無需擔心這樣做會讓美國難堪。宋子文也借此敦促蔣介石對美國人實話實說。宋子文更進一步建議，即使蔣介石暫時仍然打算保留史迪威的位置，他今後也應該以對待部屬之禮去對待史迪威，而不是把他當成一個美國的貴賓[124]。

面對熊式輝的詢問和宋子文的敦請，蔣介石的回應非常有趣。一方面，他像是崩潰了的堤壩似地盡情宣洩他對史迪威的滿腔怒氣。另一方面，他卻告誡二人千萬不要向馬歇爾透露他的感情，並且期望馬歇爾可以從自己的管道獲知事實真相，然後主動加以處理[125]。總之，只要蔣介石當時能夠坦白直言，美國政府或許已經同意撤換史迪威。但是蔣介石就是無法讓自己開口，以致機會稍縱即逝。蔣介石保持緘默，史迪威和美國軍部便同時相信，中國要嘛實在離不開史迪威的幫助，要嘛不敢爲史迪威而開罪美國政府。後來蔣介石雖然多次暗示撤換史迪威的心意，但是美國軍部都視若無睹，反而支持史迪威抗爭到底。

事實上此時蔣介石急切希望把史迪威趕出中國，但是他的如意算盤卻是美國人能夠接受他的暗示，識相地主動召回史迪威，那麼所有相關人的面子都能保持住。但是他就是沒有辦法正面提出撤換史迪威的要求，因爲他對羅斯福和美國政府確實是心存感激，也沒有辦法克服自己在文化上和心理上的障礙，坦然要求美國人召回史迪威，因爲他認爲這會讓一個忠實的盟邦感到難堪。當然，蔣介石也清楚史迪威有馬歇爾

12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6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601-602。
122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17日。
123 熊式輝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4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31030741、31030748。
12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17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9冊，第001號檔案夾。
12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18日。

和史汀生的支持，因此盡可能不要去冒犯這兩個重要人物。蔣介石或許樂觀地認爲，既然緬甸的噩夢已經成爲過去，他可以用不露痕跡的手法把史迪威留在重慶自己身邊，讓他把精力擺在聯軍參謀長的職務上，防止史迪威惹出新的禍害。最後，蔣介石還可能認爲，只要他能讓史迪威關注中國戰區的需要的話，後者至少還能幫助中國爭取更多的美援物資。

上述想法都可能解釋，蔣介石爲什麼覺得要他主動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是那麼困難的一件事。同樣這件事也能幫助說明，蔣介石這種自以爲是的「中國式」的處人方式，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會暴露出多大的局限性。他在處理史迪威問題上的這種「欲言又止」、優柔寡斷的作風，最後使他自己陷於噩夢不絕的處境。因此，縱使蔣介石和史迪威關係上的蜜月期很快就宣告結束，他們之間的惡劣關係和相互折磨還是再拖延了29個月，一直到1944年10月才在一場狂風暴雨式的衝突下宣告終結。而在此漫長時間裡，不但他們個人間的摩擦不斷升級，中美關係也隨之遭殃。史迪威對蔣介石的粗暴侮辱變本加厲，而蔣介石也採取各種手段對史迪威設防。但是如果不能了解蔣介石的想法和看法的話，那麼他的行爲就很容易被當時的美國人以及後來的學者們所誤解，以爲蔣介石錯在他對美國缺乏合作的誠意，根本無意從事第二次緬甸戰爭。當然，真實的情形比這個解釋要複雜得多。

蔣介石起初對史迪威的信賴，和史迪威對蔣介石所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的茫無所知或是視若無睹，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比，也是這個歷史悲劇的根源。他們兩人在認知上和心理上存在著一條巨大鴻溝。蔣介石認爲他對史迪威的信任已經將中國置於軍事險境，也使他個人付出極大的政治代價。但史迪威和美國軍部則肯定有不同的看法。最糟糕的是，當蔣介石發覺史迪威把緬甸戰場的失敗轉變成爲一場不折不扣的大浩劫時，他雖然對史迪威百般忍讓，但後者卻毫不領情，反而把蔣介石的隱忍當成是中國人承認錯誤的有力證據。因爲若非如此的話，何以蔣介石會三緘其口呢？而史迪威的這種窮追猛打的做法，當然更讓蔣介石倍感氣憤。

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失敗，也變成兩個盟邦在未來幾年中許多衝突和對立的根源，而這些衝突和對立卻多半是可以避免的。只有在我們了解第一次緬甸戰爭如何在蔣介石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療癒的傷痕時，我們才能對他後來應付美國人（和英國人）的方法得到一個新的認識。

毫不奇怪地，蔣介石從緬甸戰爭得到他自認爲是最寶貴的國際關係的教訓。正如他在6月18日寫給宋子文及熊式輝的電文中所稱：「故此次緬戰失敗以後，心理上對國際前途發生另一感想，但此非對戰爭最後之勝敗問題，而實爲弱國參加國際戰爭，

不僅利未見而害先入而已，即將來戰後是否能獲得我所犧牲者相當之代價，實成問題。然而此時我國尚有一塊立足之乾淨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於外國以寄人籬下，且亦有自立之道耳。吾人之哲學，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故不願暴露人短；而西人之品性，因其爲己關係而不能不損毀他人之信譽，甚至有礙於大局與其國家之宗旨，而亦不恤。」[126]

自珍珠港事變以後到1942年6月底短短半年之間，蔣介石對史迪威和中美同盟關係的看法已經產生了許多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可以歸納如下：

第一、他對史迪威的領導才能和個人品德已經完全喪失信心[127]。因此恨不得早日將之驅逐出境。

第二、他對整個美國軍方(包括在中國和在華盛頓的美軍)已經產生負面印象。他認爲美國軍方對中國的戰事漠不關心，對中國的國家尊嚴毫不放在眼裡。最新的一個例子剛剛在6月底才發生。當蔣介石得知美國空軍的白賴德(Lewis H. Brereton)將軍已經飛抵重慶時，他當即禮貌地邀請後者前來一敘。但是萬萬沒想到的是，他竟然遭到白賴德將軍的拒絕，理由是史迪威事先沒有表示允許他和蔣介石會面[128]。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竟然邀請不到一位進入他轄區訪問的下級軍官時，這就顯示中美雙方軍事人員關係是何等緊張了。當然蔣介石把事件歸罪於史迪威身上。

第三、蔣介石認爲中國所以被排擠在同盟國軍事會議之外，是出於英美兩國惡意的同謀。爲此他氣憤不已。中國最近一次提出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要求，在6月13日遭到拒絕。僅僅一個月前，中國以爲它剛才在緬甸戰場上已經充分證明了它對同盟國的通力合作，並且承受了重大犧牲。英美的拒絕只能讓中國人感到寒心，相信必須採取某些斷然措施，才能迫使美國人拿出行動來證明他們對中國利益的真心誠意關懷。

第四、他開始懷疑美國政府和英國政府一樣，完全能夠以帝國主義和趾高氣揚的姿態對付中國，而不關心中國戰區的事務。令他特別反感的是，他曾經向英美兩國建議把它們原先已經寫入「大西洋公約」中的反殖民主義原則，同樣寫進一個對等的「太平洋公約」中，以求滿足亞洲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渴望，並爭取後者支持同盟國戰爭。但是他的建議遭到英美領袖的斷然拒絕。在蔣介石看來，這個拒絕明顯表示，英美兩

126 蔣介石致宋子文及熊式輝電，1942年6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603-604。

127 有趣的是，史迪威對此似乎毫不察覺。他在1942年7月3日和蔣夫人談話中，依然信心十足地宣稱，只要他發覺中國人對他失去信心，他馬上就會離開中國。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3, 1942.

128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5-166。

國儘管唱著高調把自己的戰爭形容成爲正義之戰，但是打從心底就未曾準備把亞洲人看成是平等民族。

第五、緬甸戰敗給了蔣介石一個機會去評估中國參加同盟國以來的利害得失。他的結論是中國從盟邦得到的實際援助數量和原始構想相差太遠，令中國人非常失望。與此同時，蔣介石認爲同盟國準備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計畫誠然令人興奮，但是英美領袖把這個計畫當成是減少對華援助的藉口卻又令他極度反感。何況對華援助數量本來已經少得可憐，完全不能和歐洲戰場拿到的巨額資助相比，而緬甸的戰敗只會使得情況更形惡化，改善的可能性則遙遙無期[129]。這個發展更堅定了他的決心，在下一次的緬甸戰爭中，中國只能在有高度勝算的條件下參加作戰，絕不可屈從他人擺布，重蹈失敗覆轍，遭受盟邦再度的冷落、忽視，和凌辱。

因此，當蔣介石在6月底審視這些前景時，他覺得自己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來扭轉這個逆境。

## 三、蔣介石面臨的政治風險

緬甸戰敗除了讓蔣介石承受個人感情創痛之外，它至少還在三方面對蔣介石在國內地位做出了沉重打擊：首先，緬甸戰敗使中國原先的後院立即變成前線：雲南、貴州、廣西三省都暴露在越南、泰國和緬甸的日軍威脅之下。這個新局面馬上開罪了盤踞在這些地方的實力派軍人。他們的地盤本來都遠離戰火，現在卻要面對被日軍侵入的危險。他們的不滿隨即加劇了他們和重慶政府之間的摩擦。

其次，蔣介石的親美外交政策，也讓他在自己部屬與國內其他軍事集團的關係上陷入一個尷尬的境地。5月中旬蔣夫人寫信告訴羅斯福私人代表居里：「這些人質疑的是，委員長爲什麼把他屬下最精銳的部隊送出去白白犧牲。這些盟國打從心裡就不把中國當成真正的盟友看待，爲何爲了做出一個支持同盟國的空洞姿態而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130]

---

129 根據美國負責空中運輸的司令官(commanding general of the Air Freight Service)估計，1942年6月份總共只有128噸美國物資運進中國。7月份的目標是216噸，8-10月份是每月400噸。見：Currie's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June 11,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See also: Memorandum for General Stilwell, from General Bissell, June 29,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21, p. 4.

130 Mme. CKS letter to Currie, May 18,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 26,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廖耀湘將軍和顧維鈞在印度的談話，1943年3月10日，《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247。

第三、蔣介石的部屬只不過對蔣介石的決定在內心中產生疑問而已，但是他的國內政敵們，看到一個軍力大爲削弱的蔣介石，就不免幸災樂禍地抓住機會，要伸張他們地區的獨立性了。就像蔣介石在5月21日私下向宋子文透露的那樣，緬甸戰爭失敗後，不但軍民士氣大受打擊，而且國內封建勢力的活動更爲明目張膽。據蔣介石估計，此時國內情勢較抗戰開始以來任何時期更爲危險[131]。

當然，蔣介石筆下的「封建勢力」只不過是隱晦的代用詞而已，真正所指就是勢力強大的地方實力派將領。這些人之中本來有不少人就和「中央」關係相當疏遠，並非抗日戰線中的可靠成分。緬甸挫敗後，已經有人急不及待地想利用蔣介石政治軍事上的弱勢來擴張他們的自主權。其實緬甸戰敗剛剛發生，蔣介石就接到情報稱山西閻錫山正暗地裡和日本人接觸，談判局部休戰事宜。這使得蔣介石大爲震怒，痛責閻錫山爲無恥[132]。雲南是另外一個自主慾望強烈的省份，歷來被蔣介石視爲是抗戰的憂患。緬甸戰爭仍在進行時，雲南省龍雲的動向已經引起蔣介石極度不安。他在3月間寫道：「滇龍之狡狹鄙陋，夜郎自大，時時希望敵強我敗，其用心誠不堪復問矣。」[133]緬甸戰爭甫露敗跡，蔣介石就懷疑龍雲可能在和汪精衛政權進行勾結[134]。龍雲對此一點也不擔心，反而明目張膽要求中央軍撤出昆明省城，並擅自任命親信爲該省警備司令[135]。這種情形若繼續發展，將會對全中國的政治軍事局面造成極大震撼。須知雲南是日本人最可能進攻的下一個目標，龍雲的行動更會鼓勵其他地區實力派趕緊抓住抬頭的良機[136]。因此蔣介石不得不忍氣吞聲提醒自己：「滇龍跋扈威脅，當善處之。」[137]5月底，中央軍把企圖入侵雲南西部的日軍打退，雲南的危機才暫時平息[138]。蔣介石當時在日記中所寫的一段話，或許最能正確地表達他對內政的憂慮和對應方針。他寫道：「對內政無十分把握時，應極端忍耐，不可輕舉，與其對內爆裂以致敵寇趁機深入，爲世上貽笑，則不如待敵來攻，以觀其變。即使有叛降敵寇之人，則非中央之咎也。況敵寇已入滇境，若非不得已時，滇亦未必顯然叛降，是國家對外之聲威，仍可保持無損也。但滇之跋扈亦云極矣。」[139]

13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5月21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4450.01-047，#15181。
132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16日。
133 同上，1942年3月7日。
134 同上，1942年5月9-11日。
135 同上，1942年5月16日。
136 同上，1942年5月18日。
137 同上，1942年5月16日。
138 同上，1942年5月31日。
139 同上，1942年7月15日。

不必說，蔣介石內心十分清楚，有些省份的實力派軍人（四川、廣西、貴州，甚至西北）一直關注他政治軍事行情的漲落，並據以決定他們自己下一步的相應行動。蔣介石日記再三強調，在緬甸戰敗後他對國內局勢最大的擔憂是地方軍人會開始獨行獨斷，甚或和日本人或僞政權勾結以尋求自保。在他接到各種有關地方軍人的指責、抗命和公然挑釁消息之後，他總是一再提醒自己，務必要忍辱遷就，甚至「忍詬含羞」，以維持國家統一[140]。

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和史迪威對於蔣介石因爲緬甸戰敗而面對的國內政治和軍事威脅，似乎完全沒有察覺，也完全不加關心。在美國軍方資料中對這個問題幾乎沒有認真討論過。他們似乎沒有體會到，蔣介石的忠貞部屬們曾經對參加緬甸戰爭提出過疑懼，而其他政治軍事領袖中也有人提出過警告，認爲中國不應該過度迷信美國人的領導才能。但是蔣介石力排眾議，依然決定把個人名望投注在史迪威在緬甸的戰績上。不過，縱使蔣介石把最珍貴的資產託付給一個從無實戰經驗的美國軍官手裡，美國軍方領袖也似乎並不領情。美國軍方不了解蔣介石所以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覺得和羅斯福之間有一層特殊關係，而且認爲美國人民是中國最可靠的朋友。相反地，美國軍方或許持另外一種看法，那就是史迪威是美國對中國最大的恩賜，因爲終於有一位美國軍官可以去教導無能的中國人如何對日作戰了。

當然蔣介石更沒有把上述中國內政的困難和憂慮告訴美國，因爲他和史迪威之間根本沒有建立這種推心置腹的基礎。更何況，既然美國軍方已經有了自己分析中國問題的思維方式和理論架構，萬一他真的對史迪威和盤托出自己的弱點，說不定史迪威會立即以爲抓到了新證據，證明蔣介石故技重施，誇張或是捏造中國內部的危機，藉以要挾美國政府。事實上，後來史學界果然衍生出來一種立意新穎的說法，那就是蔣介石最擅長的把戲就是把自己的弱點巧妙地轉換成自己的談判王牌。因此每當他向美國政府略微透露中國國內政軍情況不穩時，某些美國人當即的反應不是把他的話去當真正視，而是把它當成是蔣介石又在故技重施，以中國崩潰的危機來脅迫盟邦增加援助。在研究中美戰時同盟關係的著作中，這就難免變成一個有趣的研究方法論的問題，而它的關鍵就是如何證明這個說法的可靠性。遺憾的是，到目前爲止，史學界雖然不時重彈此調，但是依然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來支持此種論點的正確性，或是反駁相反的論點。換句話說，有關這個說法的學術嚴謹性，半個世紀以來並未向前跨越一步。

歸根結柢，蔣介石在第一次努力嘗試成爲一位勇於擔負責任的同盟國伙伴時，他得到的結果卻是讓自己變成一個憤憤不平的民族主義者和一個兵力大爲削弱的國家

140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9日至7月18日。

領袖，同時對國際政治前景充滿悲觀。雖然同盟關係締結才僅僅六個月，但是在蔣介石心目中，它已經撕開了西方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虧待中國的記憶傷疤。在這層意義上，中美同盟關係的確有一個極不平穩的開端，並且正朝著一條風雨飄搖的道路上走去。

# 第五章
# 中美關係危機迭起：1942年6-7月

## 壹、中國不斷高漲的怨憤

1942年6-7月間，中美同盟關係開始出現公開裂痕，其導因出自多起重要爭端，它們包括蔣介石提出了所謂的「三項要求」，和中美政府對史迪威多重職權的爭執。在過去數十年中，史學著作對這些爭端給予高度重視，並且運用大量篇幅加以討論。然而一如本書以前所持觀點，有關這些課題的研究成果都仍需進一步精確化，甚或予以推翻。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不少論著的敘述、分析和結論，乃至它們引伸出來的歷史教訓，多半建築在極片面的史料基礎上，因此它們必須重新接受檢驗。

比如說，大部分僅是參考英文資料的著作都認爲，中美關係發生困難的第一個警訊是所謂的「三項要求」(Three Demands)，因爲「三項要求」所代表的是蔣介石的外交突襲、最後通牒和危言聳聽。在他們筆下，「三項要求」被形容成一個典型例子，說明蔣介石如何使用陰謀詭計，誤導美國人認爲中國即將崩潰，甚或會和日本暗中單獨媾和。就這樣，蔣介石試圖把他自己的政治軍事弱勢，巧妙地轉換成心理戰上的強勢，借此敲詐美國。這種看法當然影響了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的態度，也向他們提供了一個新角度，去理解中國後來的行爲。

這個觀察其實是頗爲不幸的錯誤。如果真想要了解「三項要求」的話，就必須避免以先入爲主之見，而把它們當成是由中方單獨設計出來的孤立事件。應該記得的是，早在6月裡，史迪威和蔣介石在個人感情方面已經發生了劇烈衝突，而「三項要求」其實應該被視爲這些因果循環中的一個環節才更爲恰當。換句話說，「三項要求」絕非突如其來，而是怨憤累積的後果。美國政府需要認識的是，第一次緬甸戰爭對中國領袖們所造成的實質上和心理上的打擊，遠比美方最初的估計要沉重得多。中國在緬甸戰場的重大犧牲，導致中國領袖們認爲，中國爲了同盟國的共同利益已經付出慘

痛代價，因此他們也應該得到相對應的認可和援助才對。

然而，中國在同盟關係經歷六個月後，卻陷身於比珍珠港事變前更爲險惡的環境裡：緬甸路被切斷，美援幾乎停止，雲南面臨被入侵危險。更有甚者，美國政府爲了擴大國內宣傳效果，不惜犧牲中國利益，獨斷獨行地執行了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對日本本土的轟炸(請參照本書第七章柒節)。儘管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曾再三懇請美國推延轟炸計畫，以便讓中國軍隊有足夠時間去準備地面防守。但是美國政府完全不予理睬。不幸的是，結果不出中國所料，杜立特飛機降落的浙江和鄰近省份的人民，遭到日軍懲罰性攻擊，付出沉重代價。而中國領袖還得以啞子吃黃連的心情去慶賀杜立特的成就。當所有這些壓抑已久的怨憤在6月底匯集在一起時，蔣介石自然想尋找一個機會，把中美關係作一些根本性的調整，從而把它重新拉回自己原先指望的正路上來。

一旦我們理解了中國人這種心理狀態，那麼「三項要求」事件和針對史迪威的多項職權的爭吵，就不再是由蔣介石單方精心炮製的晴天霹靂，企圖突襲美國。它們毋寧是針對盟邦赤裸裸地粗暴對待中國，使蔣介石把他內心憤怒作出的一種自然表現。一旦這幾個爭端在中美間出現，雙方政府都急於運用強硬語氣，去表達他們對許多實質問題的立場。他們也不免被自己的情緒所左右，同樣想抓住機會把自己的積怨一股腦宣洩出來。這兩起事件之所以值得重新思考，原因是現有史料不僅能夠填補以往史實敘述的不足，更能夠對史學界流行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質疑。

本章要討論的重點是：在蔣介石心目中，「三項要求」的本質到底是什麼？中國政府又希望經由「三項要求」去達到何種目的？美國政府如何看待和解釋中國的行爲？他們的根據又是什麼？「三項要求」的嚴重性果真稱得上是一個「危機」或是中國的「最後通牒」嗎[1]？抑是一個被蓄意誇大的錯誤報告？最後，「三項要求」是如何挑起中美兩國對史迪威職權的爭議？這個爭議又如何影響它們之間的利害關係？

## 貳、中國對美國軍火和飛機供應指望的落空

蔣介石最初邀請一位美國軍官赴華擔任聯軍參謀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想要經由此人獲得更多美國軍火供應，和派遣更多美國部隊到中國戰區作戰。因此，如果史迪威想要擴張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影響力的話，他的最上策莫過於採取具體行動，向中國人證明他的確有能力幫助中國滿足這些需求。

---

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72.

緬甸戰敗加強了蔣介石的一個信念，那就是，儘管中國參戰部隊已經是中國最精良的部隊，但是它們落後的武器是戰敗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史迪威對於這個評價最初也甚爲贊同。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道：「中國部隊的表現真是相當不錯。但是他們如果缺乏幾件好使的工具，你沒辦法指望他們做得出出色的成績。」[2]顯而易見地，假如中國在將來還想從事積極戰鬥的話，它必須找到根本解決方法。

## 一、蔣介石和史迪威6月15日的會談

6月15日，蔣介石和史迪威舉行會商檢討中國軍事需求。當蔣介石聽到史迪威報告稱，飛越駝峰的援助物資在6月份已經降到125噸，而且即使7月份也不會超過250噸時，不禁大吃一驚[3]。這個數字和早先宋子文以爲已經和羅斯福達成協議的每月12,000噸，簡直是天壤之別[4]。這個低劣成績的根本原因，是英美兩國沒有認真地在印度境內建立足夠的地面設施。更糟糕的是，美國原先承諾100架運輸機中只有50架投入駝峰服役，而且工作效率極低。因此依照畢賽爾（Clayton L. Bissell, 時任美國在中緬印派遣司令部空軍武官）將軍推算，即使運輸機的承載量再增加40%至50%，美國軍援物資也只能滿足美國駐華空軍自身的需要，而不能給中國地面部隊任何補助[5]。

更糟糕的消息是，這個情形短期內沒有改善指望。原因是，儘管歐洲戰場橫渡海峽的作戰計畫還要等兩年後才會實施，但是它對同盟國全球的運輸機已經開始行使優先徵用權利[6]。這種情形最具體的表現是，美國援華軍用物資數額在緬甸戰敗之前和之後的驚人差距。在1942年頭四個月裡，它們分別爲：9,920噸（1月）、6,487噸（2月）、20,343噸（3月）、7,439噸（4月）。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後，美國空軍運輸大隊運送到中國的物資是5月80噸，6月106噸[7]。一個簡單而又令人震驚的對比是：一個普通美國陸軍步兵師，每個月需要7,500噸補給品才能維持正常運作[8]。換句話說，到了1942年仲夏之際，整個中國戰區接受的美國軍援數量，比一個美國陸軍步兵營的配給量還要少。

就在這個當頭，史迪威又告訴蔣介石另外一個壞消息。那就是美國空軍第10大隊

2 Letter to wife, April 16, 194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78.

3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6月15日。

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77-78, 163.

5 Memo to Stilwell from Brigadier General, Clayton L. Bissell, June 29,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ile 21.

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63.

7 仰光港的淪陷是導致1942年4月份以後美援急劇減少的根本原因。*Ibid.*, pp. 49, 167.

8 *History of the China-Burma-Indian Theater*, Section 2, Part XI, "Lend Lease to China", p. 14.

總共只能撥出150架飛機供中國戰區使用。當蔣介石重申中國希望能夠得到500架第一線飛機和每個月5,000噸物資時，史迪威表示這些數字無法達到。他最初採用的藉口是中國缺乏飛機場供它們使用；但是蔣介石當即聲明，只要美國答應把飛機送來中國，他一定保證飛機場如期建好[9]。史迪威當然知道蔣介石的承諾絕非誑語，因爲不久前中國才剛剛創造了一項紀錄，那就是在99天內在成都建成了一個大型機場，而且這個機場被美國軍方認爲是當時世界供重轟炸機起落最好的機場之一[10]。

會談結束後，蔣介石急忙向美國政府提出同樣數字的請求（500架飛機，5,000噸軍備），並希望以上目標能夠在六個月之內實現。與此同時，蔣介石則擱置了原先答應讓史迪威統御十萬大軍在印度接受訓練的承諾[11]。不必說，蔣介石的用意是開始把中美雙方的承諾串聯起來：如果美國政府兌現它早已作出的承諾的話，則中國政府也會兌現它剛剛才作出的承諾。不用說，這個決定對史迪威而言是一個沉重打擊，因爲史迪威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能夠帶領一支新軍重回緬甸作戰，而這個眼見即將實現的希望卻被中方延期了。這個發展對史迪威的心情肯定會激起劇烈的反應。

## 二、中國長期以來對美國軍火的期望

必須記得的是，蔣介石6月中旬所提的要求並非隨興而發的異想，而是他從太平洋開戰以來就不斷爭取美國軍火援助的延續動作。早在宋子文1940年赴美時，他主要目標之一就是盡量多買美國武器。他當時的購貨單已經包括了1,000架飛機，但是表示如果美國有困難的話，也願意接受500架（350驅逐機、150轟炸機）[12]。所以這些數字的本身可謂了無新意，更非漫天要價。

1940年底，由於幾個新因素同時出現，使得中國對戰鬥機的要求急劇提升。一是蘇聯承諾的飛機遲遲沒有運到。但即便它們及時運到，其性能也無法和日本飛機相比，而只能導致更多的中國飛行員傷亡而已。二是日本已經開始對中國內地許多城市施行大規模戰略性濫炸，企圖徹底摧毀中國人的戰鬥意志[13]。而中國政府毫無反擊能力。三是即使緬甸路在1940年10月重新開通，蔣介石仍然擔心日本會隨時把它炸毀。因此，他想要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趕緊大量進口外國武器，其中仍然包括500架

9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6月15日。

10 Memo to Stilwell from Brig. Gen. Clayton L. Bissell, June 29,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ile 21.

11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15日。

12 Soong cables to CKS, May 29, June 13, 1940,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9-5.

13 CKS cable to Soong, October 7, 1940,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9-2.

裝備齊全的飛機[14]。

到1941年5月，日本的轟炸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忍程度。它們不但對內地城市造成重大破壞，而且把許多中國的地面部隊，從它們自1937年以來就固守的陣地中轟走。日本對中國日益增加的壓力，也得利於西伯利亞(Siberia)地區日蘇對峙局勢的緩和。它讓日本人得以把屯駐在西伯利亞前線和中國東北地區的陸空軍，大幅南調到中國本土作戰。這些發展無可避免地造成了對中國民心士氣的嚴重打擊，讓他們看不出有任何指望能夠保護自身，或是向日本的暴行進行報復。中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國飛機能夠盡快抵達中國。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蔣介石在1941年7月1日再度試圖說服羅斯福給予協助。蔣介石指出，中國軍火要求的數量非常有限，不致對英國在歐戰中的需求造成任何短缺後果，但卻對中國戰區有重大意義。

以上這個簡略歷史回顧所說明的重點是，中國對500架飛機的計畫遠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就已經形成。它既不代表中國領袖心存幻想，以爲僅靠500架飛機就可以戰勝日本，也不代表他們有任何計謀想把戰爭的重擔轉移到美國身上，因爲美國當時根本就還不是盟邦。說白一點，中國無非是想得到更多武器，幫助自己更有效抵抗日本侵略而已。順便可以一提的是，中國的計畫也得到了當時美國派遣到中國的空軍代表團(以克萊格Henry B. Clagett將軍為團長)的支持，而這個代表團的任務正是評估中國的軍事需要[15]。

史迪威在初次面見蔣介石時(1942年3月6日)，他其實已經主動提供消息說，美國空軍阿諾德將軍(Henry A. Arnold)在原則上批准了史迪威提出的350架驅逐機和150架轟炸機要求，而且如果中國能夠把飛機場和其他支援設施造好的話，這些飛機將可在夏天抵達中國[16]。因此，當這些飛機沒有如期抵達時，宋子文立刻向羅斯福提出抱怨[17]。

## 三、中國在1942年中期對軍火要求的新動機

1942年夏季的一些新發展，迫使蔣介石再把注意力轉移到空軍問題上來。

第一，宋子文在不斷要求獲得美國飛機的交涉過程中，偶然從阿諾德將軍處得知，原來主動權操縱在史迪威手中，因爲「史迪威和畢賽爾將軍必須先呈報關於飛機

14 CKS cable to Hu Shih, October 21, 1940,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9-2. See also: CKS cable to Soong, October 6, 1940,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9-2.

15 CKS cable to Soong for transmission to FDR, July 1, 1941,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3.

16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3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559-566。

17 Soong memo to FDR, undated but probably in April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7.14.

的詳細報告」，然後軍部才能列入考慮。宋子文向重慶政府報告稱：「安諾德(阿諾德)將軍還說道，只要史迪威在任何時間作了決定，他就可以命令白賴德(Brereton)將軍將其手中掌握的飛機送到中國前線。」阿諾德將軍這些話，讓宋子文馬上催促蔣介石直接向史迪威提出中國對飛機的需求[18]。

第二，毛邦初將軍在5月24日呈蔣介石報告中一再強調，當時美國飛機產量已高達每月5,000-6,000架之多。然而在前此整整一年時間裡，撥給中國的只有290架，而其中還有很多從未運抵國門。毛邦初警告稱，如果中國不即刻採取積極行動，他擔心中國以後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得到飛機，因爲如果它們的配額一旦被其他國家爭取到手之後，便很難改變[19]。毛邦初對美國飛機製造業報告的正確性，不久之後(6月份)又被一位正在中國訪問的美國財政部官員所證實[20]。這就更增加了中國政府對提出飛機要求的緊迫性。

第三，宋子文在6月2日向蔣介石抱怨，美國政府在處理中國軍火購買清單時，最多只從其中挑選少數幾個美國民眾關注的項目予以實施，其目的並非在幫助中國，而是在安撫美國人民群眾。整體而言，美國運送的物資數量既少，性質也不符合中國需要。因此，宋子文建議蔣介石應該直接尋求史迪威的幫助。他特別指出，就在一天以前，羅斯福才剛剛告訴宋子文說，史迪威是被派去幫助中國的，因此蔣介石無需客套，可以直接命令史迪威。因爲史迪威既然是蔣介石的直接部屬，他當然應該聽命於蔣介石。宋子文更具體地建議蔣介石應該召集史迪威、陳納德、周至柔和毛邦初等人，共同起草一份中國全盤軍需的草案，然後指示史迪威將草案送交美國軍部。與此同時，宋子文也打算把同樣的清單遞交給美國政府[21]。宋子文顯然認爲，這種雙管齊下的做法更能奏效，而史迪威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

宋子文提出建議的時機還受到另外一個事件的影響。那就是在1942年6月，羅斯福剛讀到史迪威呈交的一份報告，其中宣稱中印之間的空中運輸(駝峰Hump Operations)正在順利進行。當羅斯福向宋子文表示對駝峰工作滿意時(6月17日)，宋子文當即坦白指出其報告的錯誤，因爲過去幾個月來實際運輸量僅有500噸而已。宋子文所提數字之低著實讓羅斯福大吃一驚，並立即命令軍部展開調查。正如宋子文事

18 Soong cable from Washington to Mme. CKS in Chungking, May 11,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1.

19 毛邦初致蔣介石電，1942年5月24日，《戰時外交》(一)，頁498-500。

20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6月2日。

21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2日，《戰時外交》(一)，頁504。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16日，《戰時外交》(三)，頁162。

後告訴蔣介石的，即便是美國人也會向他們總統提供虛假報告[22]。正由於中國人認爲美國總統被史迪威和軍部官員所蒙蔽，因此他們認爲突破這種困境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由蔣介石直接和美國總統商量。

毛邦初警告說中國對美國飛機的需求正被其他盟邦排擠出局，史迪威早先對空軍在緬甸戰役中的重要性的評價[23]，阿諾德將軍告訴中國人史迪威在軍部對分配物資有一言九鼎的影響力，以及羅斯福總統口頭鼓勵蔣介石直接向史迪威下命令去說明中國的需要，綜合這些事件[24]，讓蔣介石愈加相信，既然中國已經在緬甸戰場對同盟國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貢獻，那麼現在應該輪到同盟國來顯示它們對中國的支持了[25]。

當然，最能影響中國人情緒和影響他們對空軍力量看法的因素，莫過於他們此時戰爭物資的極度缺乏。就拿中國空軍來說，畢賽爾將軍在作過獨立調查後說道，「整個中國空軍的力量，不超過50架驅逐機和50架轟炸機。（它們）老化、破舊、缺乏零件，完全不適宜和日本飛機進行空戰。」中國全國各地庫存炸彈零星雜亂，種類多達29種，分別產自美國、蘇聯、義大利，和中國土造，光是在飛機上載卸炸彈的裝置和手續就必須因彈而異。更何況整個中國空軍1,000磅的重型炸彈總共只有四枚，其他絕大多數都是200磅以下的小炸彈[26]。

至於美國在華空軍的情況也同樣嚴重短缺。居里1942年7月經過實地調查後向總統報告說：「在我訪問中國的此時此刻，我們整個在華空軍只有45架驅逐機和7架中型轟炸機……用這麼少的力量能夠達到這麼出色的成績，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同樣的例子。它不但保衛了遼闊疆土，削減了敵人勢力，而且在轟炸任務中得到成功。」然而爲了要維持作戰，陳納德和他的隊友們不得不採取「拆東補西」的方法來生存。換句話說，他們被迫從現有的飛機上拆下零件再拼湊裝配到另外的飛機上，以維持這個微小空軍還能夠作戰。居里繼續說：「這個戰區應該有一個更強大和裝備更好的空軍。而到目前爲止，這樣一個空軍居然還沒有出現。僅僅是這個事實，就足夠讓人感覺到，在同盟國所設定的優先次序中，諸如保衛自由中國，支持中國地面部

22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17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檔案夾。

23　蔣介石及蔣夫人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0冊，頁134-140。

24　Soong cable to Mme. CKS, June 26,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1.

25　Soong cable to CKS, June 16,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9-6.

26　Memorandum to General Stilwell, from Brigadier General Clayton L. Bissell, June 29,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21.

隊作戰，從中國出發直接轟炸日本目標等任務，都被同盟國壓到了所有優先順序的最底層。」而在1942年夏季，配備保衛中國陪都重慶的全部空防力量只有9架驅逐機和9個飛行員，他們全天候地守候在飛機旁邊待命升空迎擊敵機[27]。比起世人稱道的英倫保衛戰，這個中國空軍的實力只能說是一個悲劇，因此中國人民所受的災難也更加慘烈。

我們還可以改換另外一種方式來了解中國的困境，那就是把美國送到中國的飛機數量和它送到別國的作一比較。1941年9月到1942年6月之間，中國得到的分配總數是392架飛機，其中266架是戰鬥機，其餘只是教練機。而且如同前文所言，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飛機還被扣留在印度沒有運往中國。相比之下，其他盟邦接受的美國飛機數是：英國接到2,203架飛機，蘇聯1,202架，加拿大1,027架，(英領)埃及857架，而且幾乎全部是戰鬥機。當然除了美援飛機之外，這些國家原本就有自己的空軍，擁有工業基礎和軍事科技可以製造本國的飛機。最後，美國空軍作戰部隊還把自己大量的戰鬥飛機進駐在這些同盟國家境內[28]。因此，盟邦本國空軍、美援飛機，和美國空軍進駐該國飛機，加起來的總數就更爲龐大了。依照一項估算，同盟國(美、英、蘇)1942年6月間維持在第一線的作戰飛機約爲10,000架[29]。而此時同盟國在空軍作戰史上也樹立了一個嶄新的里程碑，那就是首度一次出動1,000架飛機去攻擊一個德國城市[30]。鑒於中國空軍小得可憐，蔣介石急於想要獲得多幾架飛機，不意卻被指責是故意挑起中美外交上一場大風暴。

有趣的是，在美國聯邦政府各部門裡，只有國務院遠東事務部門的某些官員，會爲美國陸軍物資援助中國的無能和無心感到不安[31]。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項貝克似乎更能夠設身處地爲中國著想。他在1942年4月寫道：

> 中國目前不能從事攻擊行動，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它之所以絕對正確，理由是中國根本缺乏足以進攻的武器。中國人一直向我們要求這

27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by Currie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p. 14-15,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28 Report from Hornbeck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3,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a.

29 John Ellis, *Word War II – A Statistical Survey –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tants*(NY: Facts On File, 1993), p. 231.

30 1942年5月30-31日，英國空軍出動1,047架轟炸機攻擊德國的科隆市(Cologne)。6月25日又以1,000架飛機攻擊布勒門市(Bremen)。從此之後此種大規模空中攻擊經常發生。見：Polmar &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 p. 21.

31 Hornbeck letter to Sumner Welles, April 17,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2.

> 些武器，而我們也給過他們充分理由去指望他們能夠得到這些武器。但是這些武器卻沒有到達他們手中。為此，他們只能不斷地承受敵人的懲罰，而又無法還擊。這當然使他們變得沮喪……到目前為止，美國和英國能夠給中國的支援，大部分是金錢、紅十字會救濟品，一些專業的，有關軍事和經濟問題上的技術建議。誠然它們的品質也還不錯，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幫助了中國繼續抗戰。但它們終究不能幫助中國人採取攻勢，也不能保證他們肯定可以繼續對日本作戰。如果要肯定中國進行作戰，並且幫助他們能夠對日本主動進攻的話，或者至少幫助他們保衛中國的領土，等待美國軍隊最後可以從中國土地反攻日本的話，那麼我們送到中國的物資，就不能僅限於藥品而已。我們必須送飛機、大砲、機關槍、彈藥等等戰爭軍火。如果我們以任何其他的方法去找藉口，或是提供其他任何代用品，我們都只是在欺騙自己。我們同時也讓所有的同盟國都承擔了一個不必要的風險，那就是讓中國人從同盟國的陣營中消失。而這些同盟國之所以要團結一致，其目的也正是為了進行全面反攻，以贏得戰爭的勝利[32]。

但是項貝克的話，可謂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因爲軍部領袖們牢牢地控制住對中國軍援大權，而他們的優先順序，和美國職業外交家及政治領袖們所建議的又大不相同。

## 叁、美國飛機的移防

1942年6月26日，史迪威通知蔣介石說，原先配備給中國戰區但是駐紮在印度的重型轟炸機剛剛被調去埃及，而其他運輸機也被調走，以便運送人員和器材到其他地區[33]。更有進者，有一群A-29輕轟炸機，本來已經在從美國飛往中國途中，也被調往埃及。這一切行動所意味的是，中國的空防力量將大幅削弱，而從印度運到中國的補給品也會相應削減。這些發展使得中國人積怨爆炸點的來臨，要比各方所估計的都快得多。

---

32 Memo by Hornbeck, April 20,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2.

3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57-158, 169.

事實上，不久以前，美國才作過一個類似企圖，想要減少中國空軍已經少得可憐的力量。那就是在4月中旬，畢賽爾通知中國政府說，美國軍部打算把一部分預定要撥給中國的驅逐機改撥給英國，以保衛印度東北部和英國東方艦隊，並防止日本進攻。中國人當即提出強烈抗議[34]，及時阻止了這件事。

然而這一次美國政府大概學乖了，因此採取先斬後奏的做法，使得中國政府措手不及，無法改變結果。然而當史迪威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時(6月25日)，連他自己都承認美國犯了嚴重錯誤。他在日記中寫道：「乓！白賴德(Brereton)帶著所有他需要的重轟炸機和所有的運輸機去了埃及。乓！那些A-29飛機會留在北非的卡東(Khartum)交給英國人使用。我現在還能跟委員長說什麼？我們的承諾一件也沒有兌現，然後(我們)還假裝著若無其事地告訴他：老傢伙！你繼續努力幹吧。」[35]但是第二天當史迪威把壞消息面告蔣介石時，他卻沒有作出任何努力去緩和這個打擊，而只是把事件簡單地通知蔣介石。當史迪威作報告時，蔣介石和妻子都一言未發，然後他們的情緒就炸開了。

由於調走的飛機屬於史迪威統御範圍之內，而其使命又是支援中國戰區和緬甸戰場，因此蔣介石認爲這個調動行動必須事先徵得他本人的同意才可付諸實施。史迪威只好承認，蔣介石的解釋完全正確。史迪威同時也心虛地表示，希望這次調動只是暫時性行爲，而且他已經提出要求，讓這些飛機盡快回歸中國建制。

但是蔣介石拒絕接受史迪威的糊弄，進而抱怨這起事件充分證明同盟國根本不關心中國戰區的利益。在談話中，他一度追問：「同盟國到底要不要中國戰區？我只要一個字的答案：『是』或是『否』。中國爲了同盟國，已經做了它應該做的。中國不可能再做更多了。同盟國對中國，做了它們應該做的嗎？」[36]蔣介石後來在日記中承認，他雖然在會談中盡量抑止住自己的怒氣，卻很高興他的妻子不假辭色地指斥了史迪威[37]。蔣夫人的怒火，一方面是針對英國人陰謀奪走中國應該擁有的美國軍事援助品，另一方面也是針對史迪威沒有盡到全力去保護中國的利益[38]。而蔣介石本人的憤怒情緒，則絕對和他不久前終於讀到了羅卓英將軍對緬甸戰敗的報告有密切關聯[39]。因爲後

34 Mme. CKS cable to Currie, April 19,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7.

3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25, 1942. See also: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69.

36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on June 26, 1942, prepared by Brigadier General Clayton L. Bissell.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37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6日。

38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6-170。

39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6日。

者終於讓他了解，史迪威的擅自逃離戰場對中國軍隊造成了多大的傷害。

他們的會談無可避免地涉及史迪威在這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蔣介石提到軍部曾經有人透露：軍部一直在等候史迪威提出要求派遣更多運輸機以增加飛越駝峰的運輸量，而史迪威卻不曾採取任何行動。史迪威當然極力否認自己有任何過失，轉而抱怨說軍部只是想把他當成替罪羔羊[40]。

蔣介石在6月26日會談中所用的語氣，和兩天前他對史迪威和顏悅色的會談截然不同，這種直率可能大大地刺傷了史迪威的自尊心。從會談記錄可以看出：一開頭，史迪威本想以避重就輕的手法，盡量淡化這次移防的重要性，他甚至避免提到移防飛機的確切數量，冀圖蒙混過關。但是當蔣介石明白指出，史迪威在此次事件中無法推卸個人責任，繼之又提到宋子文來電指責史迪威在爭取美國軍援時沒有盡心盡力時，史迪威的姿態才開始軟化。毫無疑問地，此次會談讓史迪威的自尊受到嚴重創傷，不僅是因爲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一個中國人的訓斥，也因爲這個訓斥是在中美兩國與會官員們眾目睽睽之下發生的[41]。

蔣介石認爲，要嘛史迪威對他(蔣介石)的權威視若無睹，要嘛他沒有盡忠職守保障中國的利益。事實上，蔣介石懷疑這次事件可能是史迪威和其他美國軍方領袖們互相勾結所造成，根本沒有得到美國總統批准，或甚至沒有讓美國總統知情[42]。爲了解開這個疑團，蔣介石決定直接發電給羅斯福，詢問後者對此事是否知情。

經過一天時間平息心情之後，蔣介石才提醒自己(6月27日)，今後不應對史迪威聲色俱厲地說話。他認爲批評的目的應該是改變史迪威的態度，而不是去刺傷他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相信飛機移防最核心的原因，是美國無條件屈從英國人對於同盟國戰略和外交主張。爲此，他特別提醒自己千萬要警惕，不可讓中美雙邊關係受到傷害。蔣介石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必須運用自己的力量，爭取美國給與中國足夠的支援去收復緬甸，這樣才能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換句話說，蔣介石此時的信念是，中國爲了自己的國家利益必須極力爭取重新開啓緬甸戰爭。因爲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從美國被英國人牽著鼻子走的困境中解脫出來。更具體地說，中國指望美國的軍援內容應該包括：(1)500架第一線作戰飛機；(2)5,000噸空運物資；(3)五萬名美國士兵參

40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6-170。See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26, 1942.

41　JWS t-w diaries, June 26, 1942.

42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6-170。又見：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6月27日，《戰時外交》(三)，頁170。

加第二次緬甸作戰[43]。蔣介石在6月28日的日記中清楚地寫道，「以全力促成英美收復緬甸爲唯一策略。」[44]

## 肆、三項要求：一個經過加工處理的「危機」

當史迪威在6月26日會議後向馬歇爾報告他和蔣介石會談的情況時，他附加了一個警告：「依我的看法，這個事件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史迪威對會議內容的報告基本翔實，但是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他聲稱蔣夫人用了一些具有特殊含義的字眼說，「此地的親日活動明顯增加，因此問題是美國到底要不要中國(與日本)講和。」[45]相反地，中方逐字逐句的會談記錄卻寫道：「夫人：每次英國軍事失利，輒奪我軍備或強取撥歸我用之器材，苟此風不戢，實不知中國繼續抗戰有何裨益。」[46]這兩個記載的含義有著天壤之別。其二是史迪威給軍部的報告和他自己私下的想法也顯然有相當大的差別。因爲即使在受到蔣介石嚴詞申斥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仍然承認：「我真不能怪他；飛機移防一事，看起來就是(美國的)背信之舉。」[47]但是他在給軍部上司的報告中，卻沒有這麼坦誠[48]。

在中國方面，蔣介石對於美國援助的可靠性變得更加擔憂。因爲他收到了宋子文的報告，說軍火分配委員會正在考慮在7月以後把中國的分配量降低到每個月400噸以下。更有進者，軍部同時打算全面停止對中國的武器分配工作，其所持的理由是許多已經分配給中國的物資，仍然堆積在印度倉庫裡無法運出，因此無需再繼續從事分配工作。在宋子文提出強烈抗議之後(包括聲言中國準備關閉所有駐美辦事處和召回工作人員)，軍部雖然立即收回成命，但是蔣介石仍把軍部的動作看成是一個極爲令人擔憂的預兆。因爲軍部顯然想利用中國已經在印度堆放了45,000噸租借法案物資作爲藉口，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不要再堅持把每個月3,500噸的分配額，繼續堆積在現有的儲存

43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7日。

44 同上，1942年6月28日。

45 JWS cable to George C. Marshall(hereafter as GCM) and Secretary of War, June 26, 1942, in Xerox File 354, Item 5750. MFA.

46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6-170。

47 JWS t-w diaries, June 26, 1942.

48 "Wired W.D. the diversion wasn't worth while, considering ground lost." JWS t-w diaries, June 27, 1942.

量之上[49]。但是中國人的立場正好相反，因爲印度堆積量之大並非出於中國人的過失，而恰恰證明美國沒有盡心盡意幫助中國。宋子文的回應並未就此打住，他反而更進一步向美國新聞記者訴苦，抱怨中國爭取英美援助的困難性。不用說，宋子文的行爲讓軍部大爲光火。不久之後，當宋子文得知羅斯福準備派居里到中國向蔣介石解釋運輸的困難時，他甚至試圖阻止居里的訪華計畫，他的理由是美國需要向中國提供的不是一些空洞的安慰話，而是實質的援助措施[50]。

以上這些發展，無疑都促使蔣介石下決心要把中國對美國的需求再說清楚一遍。

## 一、6月29日的會談

6月29日蔣介石再次會見史迪威時，史迪威首先急於要說明的事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回信(6月27日)。該信內容聲稱羅斯福在事先已經知道飛機移防之事。如果史迪威的本意是以爲羅斯福的回信終於可以讓蔣介石閉嘴，或是至少平息他錯怪史迪威的怒火的話，那他就要失望了。因爲蔣介石一旦發現原來羅斯福在此次事件中並非無辜，卻居然是同謀，這只能使他變得更加憤怒。理由是，該信終於讓他認清楚了羅斯福的真面目，那就是羅斯福同樣能夠爲了英國而犧牲中國的利益。羅斯福回信所產生的效果只是堅定了蔣介石的決心，要盡一切努力防止中國在同盟國中的地位繼續滑落。

會談進行一半時，蔣介石遞給史迪威一個措辭簡單平實的訓令，中文原件寫道：「史迪威參謀長：維持中國戰場最低限度之要務如左：一、美國陸軍三個師八月至九月間運到印度協同中國軍隊恢復緬甸交通線。二、自八月起中國戰區之空軍組織必須經常有五百架飛機在前線作戰，並繼續不斷之補充。三、自八月起必須每月維持五千噸重量之空中運輸量。蔣中正。」[51]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指示史迪威把這三個要求向美國報告。「望將此需要編入作戰計畫中，同時可囑格魯勃將軍(克羅柏William R. Gruber, 美軍代表團副團長)攜之赴美，爲討論之基礎。」他也要史迪威讓美國政府明白，假如這三個要求不能實現的話，那麼「中國戰區將無法維持」[52]。與此同時，蔣夫人採

49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67-168.

50 For Soong's illustrations, see: Soong cable from DC to CKS, June 26, 1942, Wartime Diplomacy, vol. 3, pp. 165-166. Also: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67-168 for Soong's negotiations with U.S. officials on this issue.

51 蔣介石手書，1942年6月29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卷，頁46-47。

52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9日，《戰時外交》(三)，頁171-174。《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29日。蔣介石的手書原件，見《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46-47。For a text in English of the Three Demands, see: CKS memorandum to JWS, June 28, 1942, see: Memo from CKS to JWS, June 28, 1942, in Photoprint File, 75, Item 317. MFA.

納宋子文建議，召集了一個會議，由史迪威、陳納德、毛邦初、周至柔和畢賽爾參加，共同商討軍援細節[53]。會議的結論是：500架飛機應該分成兩部分，中國空軍應該維持200架飛機（150架驅逐機、50架轟炸機），而美國空軍應該維持300架飛機（200架驅逐機、100架轟炸機）[54]。這些微小的數量，就概括了當時蔣介石對整個中國戰區內中國和美國空軍的最大要求。

有趣的是，史迪威接下來的行動是對三項要求誤讀了它的內容，誤判了它的意圖，對美國軍部上司作了不實的報告，然後建議他們作出錯誤的對策。

史迪威向美國總統提交了一份報告，談及蔣介石對飛機移防事件的態度。他寫道：「蔣介石認爲同盟國對中國戰區缺乏興趣，因此他想要提出一個問題，即：『同盟國到底想不想維持中國戰區？』他只要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或否。蔣夫人隨即補充說，此地親日活動日益明顯。問題是美國是不是想要中國和日本講和。蔣介石與蔣夫人兩人對此次事件都感到不滿，而且在他們問及同盟國到底是否有興趣維持中國戰區時，完全不假辭色。」史迪威還更進一步告訴他的上司們說，由於他認爲蔣介石提出的問題事關重大，因此他擬特別派遣一名對此事完全知情的高級軍官專程回到美國，向長官們親自解釋此事的複雜性。爲此，他決定派遣克羅柏（William R. Gruber格魯勃）將軍飛返華盛頓作報告[55]。

就實質而言，三項要求的內容了無新意。它們只是重申中國早在許多場合和美國政府談論過多次的軍援物資清單而已[56]。就在6月24日那一天，史迪威自己也忍不住用500架飛機和每月5,000噸物資作爲「餌」，企圖說服蔣介石同意讓他（史迪威）重新掌控中國在印度的軍隊。事實上，史迪威還更往前走了一步，因爲他寫道：「我把砲兵訓練計畫也拋出來了，它果然勾起了蔣介石的遐想。」[57]

史迪威的「餌」構想得相當周到，因爲他知道中國陸軍急迫需要砲兵。正如宋子文早先告訴羅斯福的（4月17日），美國在1940-1941年度送到中國的所有軍械只不過是141門輕榴彈砲和6,500枚砲彈而已。換言之，每一門砲有50枚砲彈，最多可以連續發射兩小時。後來美國又多分配了232門輕榴彈砲給中國，但是隨即收回106門。雖然美

53 周至柔呈蔣介石報告，1942年7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176-188。

54 驅逐機的型號是P-47、P-51、P-39，而轟炸機的型號是B-25。有關1942年7月1日會議的文件，見：《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61冊，第005號檔案夾。

55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598.

56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9日，《戰時外交》（三），頁171-174。

5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24, 1942. Also: Tuchman, p. 395.

國答應在以後補發，但是從來沒對中國就此事提出任何解釋[58]。

史迪威的話顯示，任何時候他爲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重掌遠征軍的指揮權)，都會毫不遲疑地用一些數字來吊中國人的胃口。中國領袖們之所以感到沮喪，並不是因爲美國援助的數量太小，而是因爲它們很少能夠兌現。當飛機移防事件發生時，他們當即把它看成是一個嶄新而又更危險的警訊。因爲此次事件的含義是，美國不但可以不把已經答應了的物資運到中國，甚至可以把已經分配給中國的武器系統隨時任意撤走。這個情況的嚴重性使中國領袖們相信，在有關軍援和合作等事宜上，他們必須從美國方面取得更明確而牢固的承諾才能安心。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類似「最小的要求」("minimum demands")或是「最低需要」("lowest requirements")等字眼，在中美兩國政府的對話及來往文件中早已被雙方習慣性地多次使用。它們原本的意思就是指中國爲了繼續抗戰所必須的最低程度的美國物資數量。因此，純就文字而言，蔣介石的話並沒有表現出更激烈的含意。但是蔣介石在當衆打擊史迪威自尊心幾天後，他所重複的同樣要求，卻在史迪威轉報給華盛頓的過程中突然得到新的詮釋，那就是因爲史迪威給它們加上了一個醒目的新標識，稱之爲「三項要求」(Three Demands)，而且把它們形容成是「委員長給總統的最後通牒」。用史迪威的話說，「他(蔣介石)企圖讓我們害怕。我想他們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依照史迪威的想法，「中國只有一個朋友，那就是美國，而且是一個極爲慷慨的朋友。中國人不但不體諒這類意外的事件(指飛機移防)有時會不可避免地發生，反而責怪我們爲他們做得不夠多。他們對我們又嚇唬又指責，最後不但無需承擔後果，反而讓我們的總統和參謀長向他們道歉。」[59]

史迪威的新姿態是對蔣介石的三項要求的實質內容嗤之以鼻，認爲「完全沒有可能性。但是他們就是這麼蠢。他們以爲我們會答應這些要求。他們還說，要不然，『他們只好另作安排。』」史迪威爲了要讓華盛頓的長官們相信，他指控中國人以和日本單獨媾和爲威脅的說法有根據，他還附帶提到所謂「俄國佬謠言」，內容暗示日本人和中國人正在會商一個協議，讓蔣介石回南京，讓汪精衛在華北另組政府，而日本人會保有廣東、杭州和上海等地[60]。姑不論這個謠言的內容如何荒唐可笑，重要的是，一旦史迪威選擇了把來路不明的市井謠言當成是嚴肅的軍事情報，而去詮釋蔣介石的動機時，他顯然已經下定決心，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務必激起美國領袖們的怒火，並阻止

58 Soong letter to FDR, April 17, 1942,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7.14.

5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1, 1942. See also: Tuchman, p. 401.

6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July 10, 1942, p. 107. See also: Tuchman, p. 401.

蔣介石的要求不得實現了。當美國的駐華軍事代表如此誤報(或是謊報)軍情時，他在華盛頓的決策者也必然陷入圈套，而中美軍事合作的道路也只能變得更爲崎嶇險惡了。

## 二、蔣介石三項要求的意圖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到底中國人怎麼看待三項要求？他們是否曾經把它當成最後通牒？中方資料提示了幾個原因，說明爲什麼它並非最後通牒。

首先，從6月29日會談氣氛中看不出蔣介石和妻子對美國表露敵意。正好相反，會議的過程客氣而務實，而且大部分時間花在討論各類工作的細節上。即使在蔣氏夫婦表露感情時，他們所抱怨的也只是美國人對英國太過遷就，而不是對中國人太過刻薄。蔣介石表示他無法理解的是，爲什麼英國人不能從他們自己數以千計的飛機中，調出一小部分去應付地中海的緊急狀況，而必須從中國的區區幾十架飛機之中抽走部分或全部。更何況，這種做法對埃及的戰局並無幫助。即便當時與會的克羅柏將軍也毫不掩飾地附和中國主人，承認他也想不通理由何在。蔣夫人表示無法理解的是，英國人一貫想利用別人替他們火中取栗。從中國領袖們的言談裡，不難察覺他們對於受到歧視待遇的憤怒和無奈。但是會談的氣氛肯定並沒有提供任何跡象，讓人相信會議會演變到走向提交最後通牒的結局[61]。

其次，會談是在克羅柏將軍預定返美述職前一天舉行的。當史迪威問道：「這三項要求是否代表委員長向總統提出的最低方案？」史迪威和中方資料之間產生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分歧點。根據史迪威的說法，蔣介石的反應是他要史迪威以三項要求爲基礎，在重慶制定計畫，同時並要克羅柏將軍在回到華盛頓以後「以這個計畫作爲他行動的依據」[62]。但是根據中方對會議的詳細記錄，蔣介石的答覆是：「望將此需要編入作戰計畫中，同時可囑克羅柏將軍攜之赴美，爲討論之基礎。」[63]顯然，蔣介石在會談前準備三項要求文件時，已經得知克羅柏將軍將於次日離渝返美述職。因此他想乘此機會請克羅柏將軍順便作一個信差。從中方資料看到的事實是：蔣介石所準備的文件是爲幫助中美雙方政府進一步商談所用，並且可以趁克羅柏將軍已經安排好的回美行程之便，達到快速傳遞信息的目的。蔣介石的這個心理狀態或許也可以說明，爲

61 相反地，塔克曼卻把它形容成是一場爆炸性的會面("a spectacular explosion")。不幸的是，她沒有提出證據去支持這個說法。See: Tuchman, p. 399.

62 Notes on Conference, June 29,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63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9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39-44。又見：《戰時外交》(三)，頁171-174。

什麼他在會談之前或之後都沒有再深入地討論文件的內容。對他而言，一旦把文件交到美國人手中，他就達到了他原本的目的，完成了一個程序。換言之，文件本身並無特殊性。

不幸的是，華盛頓領袖們卻從史迪威之處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印象。他們以爲克羅柏之所以去華盛頓，是因爲史迪威認爲事態嚴重，因此不得不緊急安排像克羅柏這麼一位高階軍官，專程趕回美國送呈蔣介石類似炸彈的最後通牒。這樣一個錯誤的印象，當然就會讓蔣介石的外交文件增加了許多弦外之音[64]，也會讓美國政府官員的心弦爲之震動。當然，史迪威所報導的這些印象，其事實根據都相當薄弱，因爲它們在中方文獻中都找不到佐證。再說，把三項要求作爲「進一步討論的基礎」（**中方說法**），和當成是「最後通牒」（**史迪威說法**）之間實有天壤之別。但是美國政府所聽到的，只是史迪威向長官們所作的報告而已。

然而，它到底是不是一個包含威脅意圖的最後通牒？蔣介石到底有沒有威脅美國，如果不獲接受即準備和日本單獨媾和？

這些問題的答案顯然需要從中國領袖們的話語中去尋找。6月29日的會談中，蔣介石坦言，此時此刻他並不希望美國政府再作更多承諾，而是希望它要做出實際援助的行動。他說：「深感目前爲行動而非議論之時期。」蔣夫人也說，假如同盟國連這些最低的需要都在長期以來無法完成的話，那麼它們將會使中國戰區無法存在。雖然這些詞語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但是史迪威選擇的解釋方式，並不是最顯而易見或是最合邏輯的。因爲它們大可以被看成是表達失望，甚或是絕望無助的情緒性字眼，可能想表達的意思是，如果同盟國繼續忽視中國的話，中國戰區將面臨崩盤的危險[65]。而蔣介石親筆手書文件的原文是「維持中國戰場最低限度之要務如左」（**見上文**），要把這幾個中文字形容成是恐嚇和威脅，實在需要發揮高度想像力或是蓄意曲解。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和宋子文兩個人的電文來往，可以成爲一個重要的佐證來源，因爲他們兩人歷來都會保持一個習慣，那就是，當他們在與美國人通信時，他們兩人都會盡量保持信件內容和遣詞用字的一致性，以避免他們不致在美國人面前各說各話或是說錯話。因此，如果去檢查他們彼此間的來往電文的話，就可以找出一些線索，看看他們此時到底有沒有說些不準備告人的「私話」。

然而，在那段日子裡他們彼此之間來往的電文中，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們在策劃送給美國政府一份最後通牒。特別是6月29日之後他們關於這個問題的通信，更有

64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598. See JWS t-w diaries, May 28-June 27, 1942.

65 Notes on Conference, June 29,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助於說明事情真相。因爲在正常情形下，每當蔣介石打算對美國採取重要行動之前，他一定會把事件的背景向宋子文詳細介紹，並對應該如何說、如何做、以及達成何種效果等等細節，向宋子文作出具體指示。但是蔣介石在向史迪威提出三項要求前，並無任何跡象顯示他們曾密集商議對美國政府採取極端措施（最後通牒），而在提出三項要求之後，蔣介石也只是把文件的英文譯本抄送給宋子文，並附上一份短短幾句話的中文信，通知宋子文，他已經請克羅柏將軍去作「具體進行之交涉」。蔣介石這個寥寥數語的電文，對於他和史迪威的會談細節一字未提，也沒有指示宋子文趕緊向美國政府作配合性工作。電文的簡短格式和漫不經心的語氣，沒有提供任何跡象讓人看出蔣介石正在爲宋子文作心理準備，或是叮囑他著手戰略部署，準備迎接中美關係上即將到來的一場巨大風暴。

回過頭來看宋子文的行爲，則更是有趣。這位平常以消息靈通及行動積極著稱而且引以爲自豪的人，這一次卻要等到7月7日才回覆蔣介石的來信，告訴後者他會關注有關三項要求這件事，但這已經比美國政府收到史迪威的警告信晚了八天[66]。對於宋子文這種看似背離常規的慢悠悠的步調，或許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也一樣把蔣介石的短電看成是例行公事，只是中國對所希望得到的物資清單再作一次覆述而已。他根本還沒有體察到，史迪威已經用一個嚴重危機的說法，震撼了美國政府。

如果以上的證據和推理能夠成立的話，接下來的重要問題就是：史迪威爲什麼要這麼做？

史迪威所以把蔣介石這次提出的要求當成空前危機去驚動華盛頓，最說得過去的理由是，他內心誠實地以爲蔣介石想以和日本單獨媾和去威脅美國。但是這個解釋實在是匪夷所思之至。到1942年爲止，中國已經熬過了五年單獨對日抗戰的艱苦，並且曾在過去民族存亡面臨最黑暗的情形下，多次拒絕了西方國家建議中國和日本談和的努力。到了此時，當中國已經有強大的西方國家作爲盟邦，而史迪威居然還認爲中國領袖們會蠢到認真地考慮和日本談和，或是可以拿出一副令人相信的要挾姿態，那真是不知所云，也是對他本人心智的成熟程度，提供了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展示。如果竟然有一部分美國軍官，會一本正經地相信這種說法，那也只能說，這是他們先入爲主的觀念的表現罷了。歸根結柢，這個事件提供了一個典型的案例，由先入爲主的觀念開始，從而引導出分析，再引申出結論，全部是走了錯誤的方向。

即便如此，如果美國政府關心的焦點不是中國會不會和日本講和，而是中國會不會崩盤的話，那麼後者的可能性完全可能存在。如同上一章所言，即使在前此數周，

66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7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73。

蔣介石在與宋子文來往的密電，以及蔣夫人致居里並無威脅之意的通信中，他們都提到對國內「反動」和「封建」分子趁機惹事生非的可能性，並表示憂心忡忡。本書前文提到，蔣介石在緬甸戰敗後的日記中，也表示他感受到地方實力派軍人日益明顯的威脅和抗命行爲。因此蔣介石夫婦說的話，應該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而不是史迪威自作聰明地以爲聽到弦外之音，然後把它誇張成爲一個恐嚇和危機。

還應該進一步指出的是，6月29日的會談總共持續了45分鐘。蔣介石一旦提出三項要求的文件後，史迪威基本上就陷入沉默。在過去幾天，因爲轟炸機移防危機出現，蔣介石夫婦在數次會談中，針對盟邦的虧待肯定用了一些憤怒字眼。但是只要史迪威具有基本外交素養的話，就可以當場化解僵局，或至少平息蔣介石被激怒的情緒。然而，史迪威在會談後半段時間基本上選擇了緘默，既不要求蔣介石澄清他的意圖也不努力緩和後者情緒。只是在自己回家後對蔣介石的動機作出最壞的解釋，那就是蔣介石威脅要單獨和日本議和。

以上的敘述表明，史學界多年來對所謂「三項要求」危機所提出的研究成果，都可能有嚴重偏差，應該進行重新評估。本章提供的史料說明，它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在兩個不同層次上的一連串錯綜複雜行爲激起的反應。在一個層次上，它表現出中國對於自己在世界鬥爭中日益衰落的地位，和自己在珍珠港事變以來所受到的同盟國不公待遇，感到憤慨已極。在另外一個層次上，它反映了在1942年5-6月間，蔣介石和史迪威兩者個人關係的惡化程度。在3-4月間，或許蔣介石不會提出類似「三項要求」的文件，也或許史迪威的反應不致如此衝動。但是等到6月底，蔣介石對史迪威在緬甸戰場的表現已經完全厭惡，而他想把史迪威的注意力轉移到聯軍參謀長職務的努力又以失敗告終，他剩下來的唯一希望是，史迪威至少能夠有效地管理租借法案物資。

然而，飛機移防的消息（6月26日）使蔣介石這個低微希望遭到沉重打擊，更重新點燃了他的另外一團怒火，那就是他懷疑史迪威既不願意爲中國爭取更多的援助，又不願意替中國保護已經得到的援助。這個事件很可能讓蔣介石相信，他以爲史迪威能夠幫助中國爭取到更多租借法案物資的希望，最終大概只是一場空想。雖然「三項要求」只不過是重述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的要求而已，但是它在6月29日被重新提出來，則是顯示出中國更強的決心。至少在這個事件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中，蔣介石在處理中美關係時還是基於一個假設，那就是，儘管史迪威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因素，只要他願意幫助中國提出具體的要求，軍部至少還是會照顧中國的需要。至於總統，儘管他對於史迪威或是軍部所採取的若干不利於中國的決定可能並不了解，然而他肯定對中國友好。這也說明爲什麼蔣介石會堅信飛機移防的動作，必定是在美國總統不知情的

情況下作出的。它更說明爲什麼蔣介石會以爲羅斯福只要知道實情之後，一定會還給中國一個公道。

但是羅斯福一旦承認他事先已經知道移防一事（我們並不知道羅斯福是否說實話，或是為了支撐軍部的體面而說謊），這對於蔣介石而言，著實嚴重打擊了他對羅斯福的信任[67]。這件事讓蔣介石相信，他必須盡快要求美國具體說明，到底對中國的承諾打算如何兌現。他顯然沒有時間或是意願去提出新要求，因此他只能問美國是否有意願兌現舊承諾。即便如此，蔣介石依然明白表示，三項要求只是作爲進一步商談的基礎。而史迪威不管出於何種考慮，並沒有如實地報告他的長官。

在這個意義上，「三項要求」變成了一個原本不應該發生的危機，但是它的實質內容，也暴露了蔣介石高度不耐的心情和強烈的願望。那就是，他要求美國人必須以行動來證明他們對中國的誠意。作爲最後一個可以顯露蔣介石當時意願的佐證，我們應該注意的一個事實是，他6月29日的日記沒有隻字提到他在白天與史迪威的會談[68]。依照蔣介石一貫的作風，每當他在和美國人打交道而遭遇到困難時，他都會把想法和感受盡情地在日記中傾訴或是宣洩。換言之，假如蔣介石果真在白天把一份他自己心目中的「最後通牒」交給了美國的話，他當天或是事後幾天的日記至少應該有所記述才對，然而他卻一字未寫。這個現象值得學者們加以思考。

## 三、史迪威對三項要求的看法

同樣令人費解的是，爲什麼史迪威會選擇把三項要求看成是一個危機，或者決定把它「加工」處理而變成一個危機。史迪威顯然可以選擇幾種不同的處理方式：1. 他可以如同以往一樣，每當中國人提出類似的美援要求時，都把它當成例行公事處理；2. 他也可以把蔣介石這次的話當成是氣憤之語，運用一般性的安撫手段而使之感情平復；3. 或者他還可以把它解釋爲中國人的一個新計謀，內容充滿了威脅和要挾[69]。史迪威很快地選擇了最後的解釋。

史迪威在給史汀生部長的長信裡，用了一大段文字去介紹蔣介石三項要求的背景。但是他卻沒有透露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在過去兩周裡他個人遭受了蔣介石疾言厲色的指責。他也避免討論到底蔣介石的要求是否真能在實質上爲中國的抗戰作出貢獻。相反地，他的重點是向史汀生提供一個對蔣介石行爲動機的心理分析。根據這個

67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27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128-129。
68 蔣介石日記，1942年6月29日。
69 JWS t-w diaries, June 29, 1942.

分析，蔣介石要求美國軍援的意圖並不是想借此增加對日抗戰的戰鬥力，而是想鞏固他在國內的地位，增加自己幫派的力量去壓倒其他競爭者。史迪威警告史汀生說：和蔣介石講道理只是浪費時間，因爲蔣介石虛榮、頑固、不學無術，對歷史一知半解，信息來源閉塞，「沒有朋友，只有奴才。後者毫無例外地，在他面前就會坐立不安。」既不知戰略，又不諳戰術，對於軍隊的訓練、組織和指揮一竅不通，只知迷信新式武器（飛機、坦克）。因此除非華盛頓給予史迪威充分授權，去強迫蔣介石進行軍事改革，否則，蔣介石必定會把他得到的美國軍火窩藏起來，最後用來攻擊共產黨和其他國內團體[70]。然而史迪威有什麼理由把三項要求解釋成一個新危機呢？

第一次緬甸戰役失敗之後，史迪威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再帶領一支新的中國軍隊去收復緬甸。這也說明爲什麼他對蔣介石要他多承擔一些聯軍參謀長份內的責任絲毫不感興趣。到6月下旬，史迪威已經感到極端不耐煩，因爲他急於想要把十萬中國軍隊送往印度受訓並且交由他指揮的計畫，似乎遙遙無期。

史迪威幾天前才在眾目睽睽之下受到蔣介石的厲聲指責，作爲一個在中國人面前刻意維護自己優越感和權威形象的美國將軍而言，那無疑是一個極端痛苦難吞的屈辱。如果他能夠把蔣介石的三項要求形容成最後通牒，同時又能說服華盛頓予以斷然拒絕的話，那麼他就能夠讓蔣介石知道，到底誰背後的勢力更大。假如他能夠激怒華盛頓作出強烈反應的話，那麼他就可以在和蔣介石的鬥爭中占據上風，甚或可以增加他獲得另一支中國遠征軍指揮權的機率。在這個意義上，三項要求的內容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兩個仇人之間的權力較勁和自尊心搏鬥中所能發揮的戰術功能。它的不斷升級最後終於失控。雙方心裡或許都有一些沒有說出口的「潛臺詞」。蔣介石在試圖讓史迪威回歸到聯軍參謀長職位的努力失敗之後，他真正想說的或許是：「好吧！既然你堅持要作美國駐華最高軍事長官的話，那麼就請兌現美國向中國早就作出的三項承諾吧。」在這種情形下，史迪威最好的取勝方法，就是把中國人的「舊要求」形容成是漫天要價毫不務實的「新要挾」，並建議華盛頓予以斷然拒絕。

如果本章所重建的史實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史迪威在解釋「三項要求」時就作了誤判，而對這個誤判的來源可以有兩種不同解釋。一是他誠實地誤解了當時中方領袖們所說的話。這種可能性完全存在。因爲史迪威也是一位感情強烈的人，在會議進行時，百忙中可能聽錯了話。這是誠實的錯誤，只是它結果還是造成了中美關係上一個軒然大波，但是這只能說是一個不幸。另一個解釋是，他下了決心要小事化大，把話

70 Stilwell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War, June 27,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ile 21.

放進蔣介石的口裡，進而企圖製造一個外交風暴，並激起美國政府的憤怒，而對蔣介石進行反制。這個可能性在正常情況下聽起來似乎不合常情，但是出自史迪威則並非不可想像。我們將在第七章(伍-三節)中遭遇一個類似的場合，史迪威執意要把某些話放進蔣介石的口中。即使蔣介石拒絕上鉤，史迪威依然緊逼不捨。而這種解釋對於中美同盟關係的含義就太可怕了。

關於這一點，或許還應該參考克羅柏將軍對事件的報導，因爲他在6月29日的會談中是主要的目擊者和參與人。他在呈交給馬歇爾的詳細報告中，忠實地重複了蔣介石當時採用的用字眼，那就是「維持中國戰區的最低需要」。他既沒有採用“Three Demands”這個英文名詞，也沒有提到蔣介石說過威脅或要挾之語。事實上，他把蔣委員長的要求形容成是「方案」(Program)。更值得注意的是，克羅柏將軍自己的判斷是，「蔣介石大概不至於改變自己的政策，轉而和日本人打交道。然而，除非(當前的)基本情況得以改善，要不然我們必須面對中國在六個月到一年時間內可能崩潰的危險。」(見報告頁1)換言之，在克羅柏的眼裡，蔣介石並不是在虛聲恫嚇，而是在對中國的前途作一個務實而黯淡的估計，那就是，如果它無法得到美國更多援助的話，那麼災難將難以避免。克羅柏幾乎完全接受蔣介石對英國在第一次緬甸毫無誠心作戰的抱怨，而且認爲英國人最急切的願望就是將美國援華物資奪爲己有，使中國抗戰陷於絕境。依據克羅柏對馬歇爾的建議，如果美國想要根本改善中國情況，那麼它就應該接受蔣介石的方案。克羅柏也認爲，美國將會發現它很容易就能滿足中國大部分的需求，包括接受中國要求盡早開啓第二次緬甸戰役和收復仰光港，補充中國空軍，增加駝峰運輸數量，盡快派送三個美國師到中國戰區去[71]。就這樣，史迪威把蔣介石提到的中國可能崩潰一事當成是寡廉鮮恥的要挾，而他的副手克羅柏將軍根據他自己獨立的判斷，卻認爲中國的確極有可能會崩潰。這兩位美國將軍對事件的敘述和判斷形成了鮮明對照。

## 伍、一個新危機：史迪威名目繁多的職權

正當美國領袖仍在煩惱如何應付三項要求時，史迪威又捲入了另外一場爭端。這次事件的起源是他主動向中方提供了一份文件，申明自己的各項職權，而此時他已經到中國戰區任職達半年之久，居然還會爲他的職權定義產生糾紛，也由此可見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是如何的疏鬆模糊了。中美雙方的記錄對這次事件爆發的來龍去脈有不同

71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bject: The Situation in the China Theater”, July 28, 1942, from Brigadier General William R. Gruber. 7 pages, Verifax File 4390. MFA.

陳述。它們之間的這種差別再次顯示，當事人在認知上的差異如何影響到他們的判斷，以致在政策上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

## 一、對於危機起因互相矛盾的記載

美方史料主要來自史迪威本人。根據他的解釋，有關職權問題的爭論和三項要求有直接關聯，具體起源是他和蔣夫人7月1日針對如何處理三項要求所作的談話。當蔣夫人談到關於500架飛機要求時，她請求史迪威寫信給美國政府，支持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但被史迪威當場拒絕。史迪威所持的理由是，三項要求是蔣介石直接向美國總統提出的，因此超越史迪威職權範圍之外。說完了這番話之後，史迪威隨即又作了另外一個動作。用他自己話來形容：「借著這個機會，我解釋了自己的身分是：(1)委員長的聯軍參謀長；(2)在中印緬戰區美國軍隊的司令官，責任超越中國領土之外；(3)代表美國參加軍事會議，維護美國政策；(4)代表總統管理租借法案事務；(5)身爲美國軍人，宣誓保衛美國利益。」[72] 史迪威在給蔣夫人的說明裡雖然把聯軍參謀長一職列爲首位，但是毫無疑問的是，他把重點放在與美國有關的其他三個職權上。

中國人面對史迪威把他的美國職權凌駕於中國職權之上的舉動，顯然大感吃驚，於是立即採取對策。7月2日，當史迪威要求中國軍政部提供一份全國師長的名單時，軍政部一反以往凡事禮遇史迪威的慣例，加以拒絕。該部進而要求史迪威說明，他究竟是以何種身分向該部要求這份名單。按照軍政部的推論，如果史迪威是以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身分作出要求的話，則該部當然應該提供名單。但是假如他以美國駐華代表身分提出要求的話，則他根本無權得到該項名單。史迪威碰了這個軟釘子之後的次日要求和蔣夫人會面(7月3日)。到時他卻被告知需要等候蔣夫人的私人秘書到達現場，俾能記錄下他所講的每一個字。根據史迪威形容，蔣夫人顯然「非常憤怒」。中方採取的立場非常簡單：假如史迪威堅持以美國代表身分在中國從事活動的話，那麼中方就只好依照對待外國軍官應有的禮儀予以接待。不用說，史迪威對中方的做法也十分惱火，因此才決定另外提交一份正式的備忘錄，把自己的職權說得一清二楚。以上就是史迪威對於職權爭論緣起的說明[73]。顯而易見地，按照史迪威的說法，他提出備忘錄的主要目的是澄清中方的一些誤解。總的來說，史迪威的敘述所想產生的印象是，職權問題的爭論是三項要求的衍生物，其肇因是蔣介石先作了不當的要求，因此逼迫史迪威不得不加以澄清。換言之，史迪威並非主動出擊，而只是被動地回應。

---

7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1, 1942.

73 *Ibid.*, July 2, 3, 1942. Also in JWS t-w diaries, July 3, 1942.

但是中方對事件來龍去脈卻有另外一番全然不相同的描述，而且中方的重點也正是史迪威想要規避的地方。在中國人眼中，這起事件所表現的正是史迪威蓄意採取主動性攻擊去侮辱中國人，而又企圖把它加以掩飾以圖逃離華盛頓耳目。

原來在1942年7月初，蔣介石曾經下令把兩架美國租借法案下撥給中國運輸公司(China Transport Company)的運輸機，交付給航空委員會使用。蔣介石以爲，他既然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當然有權作此項指示。他完全沒有料到的是，該公司美籍職員拒絕接受命令[74]。中國方面立即猜想，公司職員如此膽大妄爲，必定是遵從史迪威的指示辦事，而史迪威的用意是提醒中國人，只有他才有權力支配租借法案物資[75]。等到中國人的感情被蹂躪得够了時，史迪威才裝模作樣地送一份備忘錄給蔣介石，小題大作地聲稱他是以總統代表的身分，允許蔣介石以最有效方式去使用這兩架運輸機[76]。這次事件，加上史迪威隨即提出的澄清職權的聲明(見下節)，都顯示出，史迪威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惡化正在加速升級，而且他也急於想讓中國人知道，他的權勢到底有多大。在中國人看來，如果在兩架飛機的小事上，史迪威都要用居高臨下的氣勢凌辱蔣介石的話，那麼將來如果美軍進入中國戰區作戰的話，他們就更不可能尊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權威了。

## 二、史迪威不請自來的聲明

史迪威向來相信，美國政府手中對付中國的王牌，就是對租借法案物資進行嚴格控制。因此對他而言，這兩架運輸機事件絕不可輕易放過。正好相反，他想運用這個機會提醒蔣介石看清楚，他到底在跟誰打交道。所以，史迪威隨即給了蔣介石一封備忘錄，上面寫道：

> 本人所奉指令，對於本人地位之規定頗見複雜。
>
> 1. 本人為出席中國任何軍事會議之美國代表。換言之，本人應將傳達與本人之美國政策陳述而保持之。故在任何上述軍事會議中，本人

74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609-610。

75 有關史迪威本人對於處理兩架飛機的說詞，請參考：Stilwell's message to Marshall on July 19, 1942 in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bject: Status of General Stilwell, submitted by Maj. General Thos. T. Handy,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July 23, 1942, in Xerox File 286, Item 5737. MFA.

76 Subject: "Reference the two transport planes desired by the Generalissimo", July 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適用。

2. 本人執掌指揮駐在中國、緬甸及印度之美國軍隊，故職責範圍實超出中國戰區之外……
3. 本人負責監督及管理租借器材，並決定移轉其所有權之時間與地點……本人此種行動，即以總統代表資格執行之，而法律規定，總統在租借器材未經交貨以前，隨時可以撤回之。
4. 本人為　委座聯合參謀團之參謀長……
5. 惟本人基本地位為美國陸軍之軍官，曾宣誓保持美國之利益[77]。

史迪威以上的聲明對他自己的想法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線索。自從緬甸戰敗回到重慶之後，最令史迪威感到不快的就是，「中國人正在試圖把我變成一個中國軍官，無條件地接受蔣介石一切的命令。」[78]因此他急於要找機會聲明他對此並不認同。7月1日史迪威向蔣夫人口頭報告他職權的內涵時，他還把中國人最關心的職位(**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列在第一位。但在一天後的書面聲明中，這個職位卻被降爲第四位。換句話說，史迪威心目中，他有四個職位，頭三個是美國的，第四個才是中國戰區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這個中國職位，他也沒有義務爲中國戰區爭取援助物資。

史迪威對職位和職務自我表述的結果是，他完全否定了蔣介石邀請一位美國軍官來華服務的初衷。如前文所論，中國政府以爲他們和史汀生部長約定，是讓一位美國軍官擔任聯軍參謀長，不過如果美國政府同時要此人作爲美國軍事代表的話，中方也願意尊重美方安排。但是爲了保險起見，中國政府還一而再地申明，這位美國軍事代表必須接受聯軍參謀長的命令，而後者又必須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命令。然而史迪威現在聲稱的立場卻是，在他的四個職位中，什麼時候應該採用那一個職位，完全依照他個人的意願決定。

史迪威在稍後與居里接觸時提出了一份「證據」，旨在證明，即使中國政府本身，在美國派遣史迪威赴華之前也已經同意了有關他職權的定義。史迪威在8月1日交給居里的所謂「證據」，是一份文件中的「摘錄」，原件的題目是「信件——宋子文致軍部部長，1942年1月30日」。該信件聲稱，宋子文曾經寫過以下的文字：

77 Stilwell Memorandum for CKS, July 2,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78 JWS t-w diaries, Junly 1, 1942.

> 我希望肯定我們之間的諒解，美國陸軍代表的任務大致如下：控制及監督所有美國對中國的防衛援助事項；在委員長之下，指揮美國在華軍隊和已經託付給他的中國軍隊；作為委員長的聯軍參謀長，並在所有在中國舉行的國際軍事會議中，代表美國參加[79]。

只要就宋子文致史汀生部長的原信(1942年1月30日，本書早先已經引用過)[80]和史迪威此時所提供的「摘錄」略加比較，即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嚴重差別。原因是，史迪威給居里的備忘錄裡所引用的「摘錄」，來自軍部職員對原件的大意摘錄(paraphrase)，其文字選擇和文字順序均與宋子文原文有相當出入。對我們當前所討論的題目而言，最重要的差別是，宋子文原文中沒有把「作爲委員長的聯軍參謀長」寫成是單獨的一句話，而是這樣寫的：「3. 以美國政府代表和委員長聯軍參謀長身分出席在中國舉行的任何國際軍事會議。」換言之，這位軍官在參加國際軍事會議時，具有雙重身分，他既是美國代表，又是蔣介石的聯軍參謀長。

至於這位美國軍官作爲蔣介石聯軍參謀長的廣泛職責，宋子文和史汀生在1942年1月23日的信件互換中已經達成共識。這一點至關重要。稍後由於美國政府增加了新想法，想要任命同一個人也作美國陸軍駐華代表，爲此宋子文在1月30日寫了另外一封信，試圖了解此人新加上的美國任務的性質。由於中國政府認爲有關聯軍參謀長的職務，早已經由中美雙方以口頭和書面方式充分商量過，因此，他們對於此人新任務的後續發展只需要表示知道即可。這個道理非常簡單，那就是原先的職務(聯軍參謀長)必須經由中美兩國同意始能生效，而且雙方政府也確實已經換文同意了。但是新加上去的任務本來就是美國政府單方面就可以決定。美國政府想要這位軍官去爲美國做什麼，並不需要中國同意，而中國也無權予以同意或是否決。換句話說，1月30日的信並不是撤銷或是取代1月23日中美雙方協議，而是添加一些新的內容，內容純屬美國內部事務，因此中國政府不需批准或進行商議，只需在禮貌上表示知情即可。再換句話說，1月30日的信不應該單獨去研讀，而應該和此前中美兩國政府的換文一併研讀才對。否則就會產生嚴重偏差。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爲什麼史迪威不引用宋子文致史汀生信件的原文？因爲在史

79 Memo from Stilwell to Currie, August 1, 1942, Chungking China,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80 Soong letter to Henry Stimson, Secretary of War, January 30, 1942. In Verifax File 5039, Item 4516. MFA.

迪威檔案中可以找到該原件[81]。假如史迪威仔細看過宋子文致史汀生原信的話，或者假如他也去研讀宋子文、史汀生部長和軍部次長麥克洛(McCloy)在1月23日的幾度交換信函的話，他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美兩國政府針對他在中國戰區的兩套不同責任的規定：一套是有關聯軍參謀長的職務，必須中美兩國雙方協定同意。另一套是有關美國派駐在中國的軍事代表，美國可以自行決定後照會中國，不需要中國從中置喙。

## 三、中國人的反應

無庸置疑地，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衝突，使得蔣介石對史迪威和美國軍方同時感到憤怒。他萬萬想不到，只是調動區區兩架運輸機，竟然遭受粗暴拒絕。更令他震驚的是史迪威不請自來的界定自己職權的備忘錄[82]。爲此，他在日記中嚴厲批評史迪威既愚蠢且不誠實，完全沒有品德。他也不滿意美國缺乏援助中國的誠意，只想做些表面工作，敷衍中國[83]。

像往常一樣，蔣介石把自己對史迪威的憤怒一股腦在信裡向宋子文宣洩。不難想像，蔣介石堅持史迪威在中國戰區內，其聯軍參謀長職位應比他所有其他職位更爲重要，因爲這是宋子文和史汀生已經決定的事[84]。史迪威宣稱他沒有任何義務替中國爭取美國援助，簡直叫蔣介石感到匪夷所思。因爲一旦蔣介石認可史迪威這個立場的話，則史迪威就可以爲所欲爲。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其結果「是中國對租借物之授予形同乞憐求施而後可」[85]。這也說明了爲什麼蔣介石對史迪威所寫備忘錄的最後結論是，美國沒有送給他一位聯軍參謀長，而是送給他一位「太上參謀長」。用蔣介石的話來說，「換言之，彼爲總統代表，予必向彼求乞始可取得美國租借法案器材，中國戰區之統帥必經常作求乞之姿態。倘史將軍確係反映美國軍政部之態度，則美國派來者非爲予之參謀長，而爲可以指揮予之太上參謀長矣，其地位何異於印度總督。」[86]

從根本上說，史迪威的備忘錄否決了蔣介石在緬甸戰敗後所作的一切努力，而他努力的目的是想盡量減少中美關係中幾個不和諧的因素。它們包括：他對史迪威個人的極度不滿，他對羅斯福的充滿感激之情，他想保持美國的善意，和他想得到更多租

81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56; also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82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4-5日。
83 同上，1942年7月2日。
84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609-610。
85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609-610。
86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1-655。

借法案物資運到中國來。但是，一旦史迪威用自我界定職權的方式使得衝突表面化時，蔣介石就只好硬著頭皮去面對它們。當然，史迪威所採取行動的動機也是值得推敲的。兩架運輸機在中美同盟關係大格局中，本應該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任何一位感情成熟而又有行政經驗的領袖，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把誤解化於無形。但是史迪威卻決定大張旗鼓地以公文方式處理，繼之又試圖以一勞永逸的方式提出對自己職權的界定，指望對方可以從此閉嘴順從。他這種做法當然有他個人的考量。但是有一個現象已經相當明朗化。那就是，連這麼一件小事都需要鬧得兩人針鋒相對進而驚動雙方政府，那麼中美兩國之間合作的前途就註定是暗淡的了。

## 四、原始安排的漏洞和事後的補救

這個事件顯示，蔣介石和史迪威對後者在華的職權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它也再一次暴露，由於美國軍部原先粗糙安排而衍生出的矛盾和職權的混淆，實在難以化解。史迪威作爲美國代表，他基本上應該具備一個軍事外交家的素養，他可以在同盟國軍事會議上闡釋美國對戰略和戰術的立場、協調盟邦間的分歧和擴展同盟國合作的領域。史迪威作爲蔣介石的聯軍參謀長，他必須發揮軍事專業特長，全心全意執行長官的指示，包括關注中國軍隊的活動，以及指揮中國軍隊。但是指揮中國軍隊並非史迪威理所應得的權力，而是中國政府給予的信託和優遇[87]。

### (一)指揮權

指揮權是中美兩國從建立同盟關係一開始就共同努力解決的重要問題。當指揮權在實際轉移過程中遭遇原本意想不到的困難時，美國政府很快就採取了一個立場，那就是，這些困難並非源自美方原來設想的粗心大意，或是無法兌現美國的承諾。正好相反，困難一定源自中國方面缺乏執行的誠意或是中國政府的無能和無信。讓他們感到沮喪和出乎意料的是，中國人太不溫順聽話了。他們尤其懷疑宋子文可能對蔣介石隱瞞了重要消息。然而中方資料迄今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持美方這個臆度。

既然蔣介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唯一理由是爲了達到外交目的，那麼他自然而然指望史迪威只是在名義上而不是在實質上行使指揮權。蔣介石這種錯估很快讓他付出了高昂代價。因爲史迪威絕不是一個以虛名爲滿足的人。他想要的是貨真價實的指揮權，而且還不容蔣介石插手干涉。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發覺他們不得不把兵權

87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609-610。

從蔣介石手中一點一滴地擠出來，也很快認爲蔣介石是背信的一方。但是從蔣介石的角度來看，他最初只是對美國軍隊沒有如預期地參加緬甸戰爭感到失望，繼而被史迪威的魯莽抓權行爲所激怒。到了1942年6月底，蔣介石在心中實在找不出幾樣從美國得來的實惠，可以讓他覺得他當初把最精良部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是一件明智之舉。這也說明爲什麼蔣介石在緬甸新敗之初，就急不及待地想讓史迪威回到他聯軍參謀長的崗位上去。

### (二)聯軍參謀長的責任

如果想要了解中國政府對聯軍參謀長職權如何界定的話，最好的方法是回顧當初蔣介石對史迪威仍然充滿好感時，中國政府所持的看法究竟如何。即使是在他們3月6日的會談中，史迪威對自己職務模糊不清的形容，已經令蔣介石感到高度不安。因此他隨即指示軍令部長徐永昌對此職務準備一份詳盡的說明。徐永昌的報告寫道：

> 中國戰區參謀長承最高統帥之命辦理聯合作戰事宜，其主要職權如次：
>
> 1. 釐定聯合參謀部工作實施計畫；
> 2. 隨時向統帥呈報敵情及聯合作戰部隊之配置、裝備、軍紀、補給等一般事項；
> 3. 隨時判斷本戰區暨全盤情況之演變，以備諮詢；
> 4. 在統帥企圖決定後，應即提出實施方案，製成計畫命令，呈由統帥核署後，下達之；
> 5. 檢查下達各部隊之命令，是否適時到達與執行；
> 6. 構成並維持與所屬聯合作戰部隊、友軍，以及有關機關之聯絡；
> 7. 每一會戰結局，對參戰部隊實行命令之程度，及其所得之戰果如何，負考核釐定功過之責；
> 8. 其他瑣細事務，得自行依照統帥之企圖而處理之[88]。

88 「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自重慶呈蔣委員長擬呈中國戰區參謀長主要職權八項規章」，1942年3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575-576。又見：《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34。《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6月24日；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6月26日。

蔣介石6月24日和史迪威談話要點，其實就是根據這個文件而來的。這個文件本身，又是從蔣介石以往使用德國和蘇聯軍事顧問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因此，如果有學者以爲蔣介石在玩弄陰謀詭計，企圖用重慶辦公室裡的「文山會海」把史迪威壓垮的話，那實在是一個對歷史的誤讀。正好相反，任何人假如熟悉1938年以前蔣介石如何與法根豪森將軍合作無間的實例，就會看出來，這正是法根豪森的工作方式，和他所以能夠贏得蔣介石衷心尊敬的真實寫照。

基本上，這個文件顯示的是，中國人認爲史迪威的主要工作內容應該是聯軍參謀長的行政管理責任，而不是在戰場上帶著士兵去衝鋒陷陣。而偏偏最能令史迪威傾心的卻正是後者。在這一點上，或許也反映出法根豪森和史迪威兩人在文化背景和個人心態上的差異。法根豪森不了解中國事務，因此唯恭唯謹地遵守威瑪(Weimar)時期德國職業軍人的本分。而史迪威自許是中國通，可能在不知不覺之中感染了「中國的戈登」的情結，夢想自己帶領中國的千軍萬馬，在戰場上一顯威風的豪情壯志。

史迪威6月初回到重慶後，蔣介石終於有機會讓史迪威重新恢復正常工作。然而到了6月底(24日)蔣介石卻再度感到沮喪，原因是史迪威處理中國軍事問題的做法顯得零碎無章，顯示他興味索然，所以蔣介石才敦促史迪威擬呈詳盡而整體的計畫。蔣介石明白表示他不滿意史迪威心中只有緬甸，希望他能夠對中國戰區其他一大堆軍事問題也能加以關心[89]。

作爲中國的領袖，蔣介石或許最感到無奈的事就是，他原先指望因爲參加同盟國而能得到的好處一直未能實現。中國原來指望，一旦有了美國這個盟邦，就會得到大量軍事援助，而且緬甸路萬一受阻，美國更會出兵協同作戰，來確保中國對外交通的順暢。但是他看到的卻是，美國駐華最高將軍似乎對大戰局缺乏興致，提不出整體性的解決方案，遂不免失去耐心，並且要求美方盡快作出具體行動了。

## (三)分歧的重點

情況馬上就明白顯示，蔣介石與史迪威兩人對事務有大不相同的優先順序。蔣介石要史迪威盡快參與中國的決策體系，熟悉各部隊的背景和需要，提出軍事改革的具體方案，擬訂今後幾年的作戰計畫，然後去爭取最多的美援物資以實現這些目標。爲了達成這些目標，蔣介石希望史迪威在蔣介石總部中能夠成爲一個全職的籌

89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6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04-608。史迪威很少和何應欽會商，幾乎從來不和徐永昌會商，而此二人是主管中國政府軍事最重要的部長。

劃者。作爲一位美國軍官，史迪威不但可以向中國提供許多寶貴意見，還可以幫助中國爭取大量物資援助。這是一位外國顧問爲中國軍事所能作的最理想的貢獻，要比德國顧問模式更有效，相當接近蘇聯顧問模式。

然而史迪威早已下定決心不讓自己被融入這個模式裡去，他寧願盡量把行政和計畫工作往後推延。他這麼做，要嘛是認爲這些工作此時並不切實際，要嘛是認爲中國可以派自己的人完成這些工作。有一點倒可確定，他認爲這些工作不值得浪費他的寶貴時間和精力[90]。史迪威真正想要做的，是趕緊掌控一支中國新軍，把它送到緬甸去打仗。因爲只有在緬甸他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重掌指揮權，用這支軍隊打開緬甸路，把物資運進中國。只有等到這項工作完成時，他才願意把精力擺回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其他事務上去。由於收復緬甸的工作需要一支裝備精良而且領導有方的中國軍隊，所以史迪威最關注的還只是遠征軍內部的整頓，包括任免一批高級將領及嚴格訓練下級軍官和士兵。按照史迪威的構想，美國政府對在印度受訓的中國軍隊肯定會提出援助，但是對在中國戰區的廣大軍隊，就未必願意以同樣程度的慷慨施以援手。

就個性而論，史迪威屬於行動派，他渴望戰鬥，不願把生命浪費在辦公室裡，更不喜歡空洞的計畫工作。他喜歡自己作大牌主角，因此寧願在戰場上跟中國士兵打成一片，或是跟日本人惡鬥到底，也不願被他認爲是低能的中國軍事官僚機構綁在重慶，動彈不得。但是由於美國政府沒有意願派遣自己的軍隊到亞洲大陸作戰，所以唯一能讓他夢想成真的方法，就是運用他鍥而不捨和糾纏不休的個人意志力，把中國兵權從蔣介石手中挖出來。

在他們互動過程中，蔣介石關心的是中國戰區的全面，史迪威關心的則是緬甸一隅的戰事。在他看來，只有在緬甸勝利之後，才能夠爲將來改善中國的整個戰局提供有利條件。因此每當蔣介石喋喋不休地談到整體計畫時，史迪威總是加以打斷，然後不客氣地指出，租借法案物資才是最重要的問題。換句話說，在史迪威看來，如果不能經由緬甸把物資送進中國的話，那麼其他一切計畫均屬空談。

在6-7月間中美關係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參與者個人的心理狀態和感情肯定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史迪威說明自己職位的備忘錄，是在他遭受蔣介石責罵之後的幾天內提出的。依照史迪威的脾氣，一旦遭受蔣介石的疾言厲色對待後，他要消除心頭之恨，早已迫不及待要還以顏色了。史迪威認爲他最有力的還擊手法就是給蔣介石上一堂課，讓他搞清楚史迪威到底是何等人物，並且讓蔣介石永遠謹守自己的分寸，不要再去冒犯這位美國軍事代表。他們兩個人這一回合鬥爭，也呈現一個此後還會多次

90　Stilwell memo to CKS, July 7,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出現的互動模式。在史迪威心目中，蔣介石不學無術，喜歡裝模作樣，表面假裝威嚴不可侵犯，其實內心空虛軟弱，因爲他在政治和軍事上只有依賴美國才得以生存。因此美國對付蔣介石最有效的方法不應該是去和他講道理，而是應該施加壓力，強迫其就範。當然，假如史迪威以爲他的備忘錄真能達到讓蔣介石從此閉起嘴巴的目的的話，他馬上就會發現自己的估計其實是一大錯誤。因爲蔣介石也是一個性情剛烈的人，史迪威的做法只能讓蔣介石更加憤怒。即便如此，史迪威在1943-44年間對自己分析的正確性始終深信不疑，以後還經常依據這個想法去對付蔣介石，終不免在1944年9月造成大禍。

其實若以正常外交尺度來衡量，6月29日的事件不過是小事一樁。即使中國人在會議中果真講了一些激動的話，但是並沒有引起與會雙方的言辭正面衝突。假如史迪威當時內心的出發點是想促進盟邦合作關係的話，他大可以用平靜而常規的外交手法來化解問題。但是史迪威卻是下定決心要把它描繪成一個重大的危機，激化雙方關係。

同樣地，兩個盟邦間的關係絕不應該被類似兩架飛機的財產權這種小事來破壞。但也正是因這兩架飛機所引起的爭執，給了史迪威一個等待已久的機會，讓他能夠意氣飛揚地向蔣介石示威，緊接著又用最斬釘截鐵的話語，把他對於自己身分地位的觀點說得淋漓盡致。假如史迪威原意是要借此迫使蔣介石就範的話，那麼他的備忘錄似乎應該是把他的想法灌進蔣介石那「冥頑不靈」腦袋瓜的最有效手段。因爲他的備忘錄除了正題之外，還附帶了一個威嚇的暗示，目的是讓蔣介石害怕中美同盟關係很可能因此而破裂[91]。然而，當一位美國軍官決定採取嚴厲措辭去告知一位盟邦最高統帥，說他沒有權力把兩架飛機從戰區內一個單位調配到另外一個單位去使用時，史迪威備忘錄給蔣介石的下馬威，卻只能激起對方最強烈的反感。

無論在調動兩架飛機的事件上誰對誰錯，這個事件之所以引起中國人憤怒的原因，是史迪威選擇這個機會給自己的職權下定義，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他和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史迪威由於多重身分模糊不清而引起的問題，本來是美國可以避免的。方法之一是假如美國政府當初(1942年初)的思考能夠比較周全的話，它就可以完全避免問題的出現。方法之二是美國政府稍後也仍然可以經由外交途徑心平氣和地加以補救，重新作一些人事上的部署。最糟糕的發展就是聽任史迪威自作主張，用趾高氣揚的姿態給自己的職務下定義，挑起一次完全沒有必要的攤牌，然後指望讓盟邦領袖忍氣吞聲地接受他的裁決。

不出意料，史迪威的備忘錄馬上引發一場大風暴。蔣介石即刻決定終止和史迪威

91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1-655。

之間的一切來往。他既拒絕和史迪威會面，也不回覆他的信件。與此同時，蔣介石也開始準備反駁史迪威的自我定義，並由宋子文在7月5日向美國政府遞交一封長電要求澄清[92]。根據宋子文的建議，中國政府隨即要求兩國就若干未解決的根本問題進行磋商[93]。當羅斯福本人得知事態嚴重性之後，馬上決定派遣居里二度訪華，期能彌補傷害。

### (四)史迪威的反應

有趣的是，在史迪威被中方拒絕來往的最初期，他似乎並沒有察覺到情況的嚴重性，也沒有在日記裡表露煩惱擔憂的心情。他只是抱怨蔣介石對他先後提交的幾份備忘錄遲遲沒有回應[94]。語氣似乎是責怪蔣介石的怠惰，而沒有感到大事不妙。而在心理上，史迪威似乎認爲他已經在兩人的鬥爭中占了上風。依他的分析，「三項要求沒有打響。總統的答覆非常心平氣和而又有尊嚴。說不定美國會因此而改變(對付蔣介石的)態度。果能如此，那麼我就可以強迫蔣介石制定軍隊的改編和訓練的計畫了。」[95]史迪威非但沒有察覺到中國人正在考慮把他趕出中國去，他同時還誤判了居里的訪華使命，以爲居里的訪華必定是出自中國的敦請，並由宋子文急切推動安排而成。他沒有想到的是，居里訪華的原動力來自白宮，目的是挽救史迪威的職位和修補中美關係，而且它遭遇到宋子文強烈的反對[96]。

一直要到7月中旬，史迪威才終於意識到，原來幾星期以來中國人是一直蓄意對他不理不睬[97]。即便如此，他依然相信自己在和蔣介石的衝突中居於優勢地位。因此，當史迪威委託商震將軍遞交一封有關收復緬甸的備忘錄給蔣介石時(7月19日)，他仍然認爲這是他對蔣介石施捨一個大恩惠。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個(緬甸)計畫是要給花生米(蔣介石)一個(從三項要求事件走出的)下臺階，給他一個機會去證明他願意合作。他可以接受一個讓軍部完全無法忽視的出路，順便也給我一個機會增加我的影響力。(軍部可以對蔣介石說)『很好！你必須採取這些行動並徵得史迪威的同意，然後我們才會參加這個計畫。』我(史迪威)的方案可以避免所有這些紛爭，而去解決主要的問題，那就

92 CKS memo to Soong, July 5,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9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189。
94 Stilwell's diary entry of July 8 in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9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8, 1942. Not included in JWS t-w diaries.
96 *Ibid.*, diary entry of July 5, 1942.
9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diary entry of July 16, 1942.

是緬甸。」[98] 史迪威此時面臨被革職的危機，而他的自我感覺竟然可以如此良好，其間的差異委實驚人。但是同樣的情景在此後兩年中還將發生多次，他的政治遲鈍由此可見。

就在史迪威寫下這些樂觀字眼的同時，居里正在趕赴重慶途中，其任務是去修補史迪威僅僅花了不到四個月工夫就嚴重摧殘掉的同盟關係。居里訪華給中美同盟關係帶來了一個模式，在此後數年中還被多次採用。那就是：在一段時間裡，美國總統會相當疏忽中國事務，讓軍部得到高度自主空間，依照後者本身的意願和作風去處理中美軍事合作關係，而史迪威的行爲和作風又照例能獲得馬歇爾無保留地支持。但是等到史迪威把關係糟蹋到產生危機的地步時，白宮才會猛然警覺，而總統也才會手忙腳亂地進行個人干預以防止關係徹底破裂。總統干預的形式是，有時靠自己努力，有時派特使到中國。等到關係回歸平穩時，下一個階段又重新開始。這樣周而復始，又經過忽視、危機處理和總統干預等過程。由於這個過程並不解決實質問題，只是暫時掩蓋爭端，所以雙方的怨憤繼續在累積中。這種模式一直要等到史迪威離開中國戰區才告終結。

1942年6-7月間的發展也建立了另外一個模式，後來分別在1943年10月和1944年9-10月再次發生。我們應該還記得，史迪威在1942年6月初就曾經頗爲自豪地宣稱，他既不曾爭取中國戰區的職位，也不稀罕繼續留任。任何時候只要中國政府表示不歡迎時，他就會辭職走路。但是本書後面的幾章中將會提到，史迪威這些豪言壯語和他的實際行爲大不相符。簡言之，在每次知道自己已經不受歡迎時，不但沒有主動提出辭職，而是企圖矇混過關，或是乾脆承認錯誤，並且向中方道歉，期能保留職位。甚至當他的上司給他機會離開中國到其他地區任職時，他也是一口拒絕。然而一旦撤職風險消失以後，他又馬上故態復萌。

最後還有一個有關中國政府內部處理史迪威事件的分歧點，大約也在此時產生。具體而言，宋子文與蔣介石兩人針對如何處置史迪威問題時，他們的態度和做法愈來愈相逕庭，兩人之間的差別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愈來愈大，最終導致兩人關係的重大摩擦。

宋子文得知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已經產生嚴重衝突的最早時間是6月18日，當時蔣介石表示要把史迪威送回美國接受軍法審判。但是宋子文的反應並不激烈，考其原因可能是緬甸戰爭牽涉的問題過於複雜，軍事又非宋氏之所長，更何況蔣介石一再告誡宋子文，他對史迪威的不滿，「此意切不可爲外人略露一點。」[99]

---

98 *Ibid.*, entry of July 19, 1942.

99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6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603-604。

然而6月底和7月初發生的事情，卻改變了宋子文的立場和作風。最明顯的原因當然是，宋子文對這些問題的來龍去脈掌握得非常清楚，甚至曾親身參與，因此反應強烈。這個跡象從他們之間的兩封來往電報可以看出。史迪威備忘錄提出之後，宋子文在1942年7月6日向蔣介石作出的回應是：「史迪威態度殊屬離奇，閱其原函，強詞奪理，謬解職權，非神經錯亂，不能狂妄至此。文日內即進謁當局，諒能加以糾正。但文欲知者，重新明確規定參謀長職權後，鈞座是否仍擬留其在華供職，抑或乘機更換，另選他員，即請確示，以便相機進行。」這封電報提出了三個立場：1. 宋子文原先對史迪威稱讚有加的態度（1942年1-2月），已經因爲蔣介石的抱怨而完全改變。他的反應激烈，語氣絕不含糊。2. 宋子文立即自動採取措施向美方抗議，並要求糾正史迪威的錯誤言行。3. 宋子文促請蔣介石決定是否要正式請求美國更換史迪威。

但是蔣介石給他的回電（7月9日）則說：「關於史蒂華用舍之態度，我方暫不表示爲宜，先看美政府對史之來函如何處理，最好能由其自動召回也。此人或在緬甸戰敗後，言行無常，似有神經病狀態，望其在華盡職，恐非所能，但此不宜與美政府以明言，以有關其整個軍人名譽也。」這封電報也有幾個重點：1. 蔣介石完全同意宋子文對史迪威個人負面的判斷；2. 他更進一步表示對於史迪威將來的工作毫無信心；3. 他不願把這個心思向美方言明，理由是擔心會傷害美國軍人的感情和名譽；4. 最重要的是，他既想史迪威早日離開中國，又不願向美方提出要求，而是希望美方在得知實際情況後，能夠識趣地把史迪威「自動召回」[100]。

這兩份電報，一部分當然顯示他們兩人由於身分不同，因此對國家利益的考慮也不相同。但是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他們兩人個性的極端差異。宋子文想做就做，不怕得罪對方（包括任何人在內）；蔣介石明明想做卻又希望爲對方保留顏面，讓對方識趣求去，務求不傷和氣（特別是不要傷了羅斯福的和氣）。這種個性的差異，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他們兩人在策略和執行上的分歧。同樣重要地，他們兩人在處理史迪威事務上的巨大差異，也給中美同盟關係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那就是他們兩人除了個性不同之外，是否還有文化和心理上的差異？宋子文的美式教育背景和蔣介石的理學背景，是否也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20世紀中國許多其他的重大內政外交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可能爲中國近代史的研究開拓新的領域。把文化學、心理學和行爲學結合在一起，去爲歷史現象作出更全面的詮釋。

100 兩電均在：《戰時外交》（三），頁610-611。

# 第六章
# 居里的和解之旅：1942年7-8月

## 壹、居里訪華的背景

### 一、緣起

居里第二度以總統特使身分訪華有兩個導因，一個是遠因，另一個是近因。

遠因跟宋子文不斷努力想安排羅斯福總統助理霍普金斯訪華有關。霍氏本人不但多次表示有強烈的訪華意願，也一再向宋子文保證他必能獲得羅斯福批准[1]。而宋子文極力想促成此事的原因，是他相信霍氏身爲羅斯福最親信幕僚，絕對有能力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產生積極影響。

近因則是因爲霍普金斯屢次因故無法成行，而中美關係又在6月底的一周內遭遇兩大危機衝擊，羅斯福當即決定改派遣居里赴華。因此居里的任務是去解決同盟關係中的重大爭端，它們不但包括三項要求和有關史迪威的職權之爭，而且還包括美國全球戰略對歐洲和亞洲的影響。

爲了沖淡蔣介石因霍普金斯不能成行而產生的失望，羅斯福向蔣介石保證(7月4日)說，居里早已成爲美國各項有關中國事務上的一位重要參與者。因此，除非羅斯福和蔣介石能夠直接會面，否則居里的訪華是兩國間最有效的接觸方式。羅斯福進一步表示，希望居里訪華能夠消除兩國間的「誤解」。羅斯福特別挑明中國最抱怨的事，那就是種族歧視。他向蔣介石保證，美國絕對沒有歧視中國的意圖，也沒有把中國看

---

1 "Memorandum on Meeting between Dr. Soong and Mr. Hopkins on April 23, 1942" and "Memorandum on Meeting between Mr. Hopkins and Dr. Soong, on May 4,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Robert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514. CKS cable to FDR, May 27,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1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4月25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1冊，#15120。

成是次等盟邦[2]。

## 二、宋子文反對居里使命

但是在羅斯福這種輕聲柔氣姿態的背後，可能還有另外一項考慮，那就是減少宋子文對居里訪華的阻擾。事實上，在6月裡中美兩國間爭論爆發時，宋氏一直在熱心安排霍普金斯訪華之事。當他一旦得知霍普金斯無法成行時，宋子文轉而向蔣介石建議，中美兩國間解決所有懸案的時機已經到來，而最有效的解決方法，是由宋子文在華盛頓直接與總統談判，而不是經由一位美國使者到重慶去進行現場調解。依照宋子文看法，美國對華政策只不過是「點綴政策」而已，而羅斯福在此時派居里赴華的真正企圖只是「安撫」中國，並非誠心尋求有效的解決辦法[3]。有鑒於此，宋子文建議蔣介石拒絕居里訪華。

然而宋氏致蔣介石的電報卻抵達得太晚。因爲在此之前，居里已經從蔣氏夫婦手中拿到了一封邀請函件[4]。結果是，蔣介石不得不要求宋子文也寫一份邀請函給居里，以免造成中美關係上的尷尬[5]。然而宋子文不但拒絕讓步，甚至以辭職爲威脅。最後蔣介石只好低聲下氣地向宋子文賠不是，並保證他夫婦今後絕對不會背著宋子文跟居里直接打交道[6]。不必說，蔣介石對宋子文的頑強態度當然感到極度不快[7]。這也成爲他們日後反目的一個伏筆。

不難想像，居里很快就得知宋子文從作中作梗，因此也刻意報復，在蔣介石面前說盡宋子文的壞話。對於居里來說，宋子文對他使命的反對可能讓他感到極大的痛苦和屈辱。原因是，居里在此之前已經耗費了幾周的努力，不但爭取到羅斯福對他訪華之行的支持，而且還雄心勃勃地想插手改善中英關係，並爲此主動聯絡邱吉爾，請教後者應該如何著手[8]。假如宋子文的意圖得逞而導致訪問流產的話，居里的自尊心和他在聯邦政府中的聲譽，都將會遭受重大打擊，因此必須盡一切努力予以避免。就這樣，

2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4日，《戰時外交》（一），頁627-628。

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30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1號檔案夾。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6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165-166。

4 Currie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une 26,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5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6月29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15281。

6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兩件，1942年7月3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15291、15292。又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日。

7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4日。

8 For Currie's contacts with FDR and Churchill in this respect, see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In particular, see Currie's letter to Churchill, June 25, 1942.

在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爭端，除了造成了中美關係的大衝突之外，還增加了一些小衝突點，那就是，兩國領袖的親密助手，也因爲訪問的而引發了一場個人恩怨。

## 三、蔣介石的態度

儘管有以上這些麻煩，居里在7月21日到8月7日之間對中國的訪問，仍然是戰時中美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僅因爲這是羅斯福第二次派遣居里去執行他偏好的個人外交，也因爲他授權居里和中國領袖們商談的問題，既具實質性而內容又廣泛，包括中國的內政和外交等敏感議題[9]。居里在重慶一共停留了16天，與蔣介石舉行了14次會談，許多會談長達4-6小時，現場經常只有蔣夫人及一位速記員[10]。蔣介石在此時間內，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居里身上。以致他承認，一直等到居里離開後他才有機會喘一口氣[11]。

會談這麼多次，使得居里對蔣介石直接接觸和認識的機會，超過當時任何美國官員或是盟邦官員，包括史迪威在內。兩人所觸及的問題，不但涉及同盟國的全球戰略和中美關係，也包括中英、中蘇關係。同時也包括諸多中國內政問題，譬如政權不民主、政府無能、官吏貪污，和國共摩擦等等。毫無疑問地，由於蔣介石非常重視居里所具有的總統特使身分，所以他對許多問題都願意披肝瀝膽，作深入探討。蔣介石不僅拋棄過去和外國人來往時的矜持和不自在，以心胸開放態度和居里進行交談，並且談話表現有熱誠，思路清晰，言無不盡。

可惜的是，居里訪華事件在一般歷史著作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12]。史學界歷來的假設是他的訪華沒有留下足夠歷史資料[13]，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爲蔣介石與居里各自留下了一套詳盡的中英文談話記錄。在居里回到美國以後，他又向美國總統呈遞了一份詳盡報告，包括他和蔣介石討論的所有議題，以及在訪問過程中的所見所聞[14]。除此之外，他還多次爲羅斯福、馬歇爾，以及其他聯邦政府官員們寫了備忘錄，作了談話，或報告了他對中國的觀感。這些資料的總數，足可以提供一個紮實的史料基礎，讓研究者了解訪問的經過，以及其對此後中美關係發展所產生的實際後果，或是可能產生卻未

9 "Tentative Draft of Instruction to Lauchlin Currie for Mission to China", July 1942, bearing the hand-written note of "OK. FDR"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10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155-176。

11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7日。

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77-183.

13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11-112.

14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August 24,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能產生的後果。

## 貳、會談初期的攻防戰

### 一、雙方集中火力相互攻擊

儘管居里訪華目的是消除誤解，但是他在和蔣介石會談一開始時，氣氛就變得非常緊張，雙方都急於把自己的立場攤到枱面上來。蔣介石一開始就強烈抱怨盟邦，把中國排擠在太平洋軍事會議和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大門之外，也抱怨中國得到的租借法案物資少得可憐。居里反擊說，美國對於中國運用美援物資所表現的低效能也感到失望。他坦白指出，許多美國人不相信中國對戰爭會作出重要貢獻，而是在囤積軍火用以自保，或用來對付共產黨。

對於居里的指控，蔣介石的回應是，他並不在意美國援助中國軍火的實際數量，但是希望美國對待盟邦能夠一視同仁，平等相待。至於囤積軍火的指控，他當場邀請居里親自去作實地調查，看看是否能夠證實美國的說詞。依照蔣介石的解釋，中國政府在西北地區駐防軍隊的重大任務，是防止日本進攻。反之，只有共產黨才希望把政府軍趕走，讓共產黨軍隊可以進入真空地帶[15]。有趣的是，居里沒有回應蔣介石的邀請去調查囤積軍火的事，也沒有表示願意到西北地區去實地了解國共對峙情況。而蔣介石關於防止日本進攻的話也沒有說得透徹。因爲一如本書前文所提及的，中國政府在廣大西北地區所面臨的危險，除了日軍直接進攻和中共政權的存在之外，還有許多地方政權和軍隊互相攻擊或是和日本政府暗中勾結，如果沒有政府軍隊的駐防和震懾的話，則情況很可能變得無法掌控。但是這些話，他對居里都沒有明白說出。這或許可以視爲他的缺失。

### 二、居里意圖改善中英關係心願的落空

由於羅斯福總統高度憂慮中英關係惡化，因此中英關係是居里與蔣介石會談時最早觸及的課題。其實在居里離開美國之前，他已經與羅斯福總統討論過中國對英國強烈憎恨一事。羅斯福賦予居里的使命就是要設法改善中英關係，促進同盟國在亞洲作戰的合作[16]。

---

15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1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148-151。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6-661。

16 "Tentative Draft of Instructions to Lauchlin Currie" July 1942 and approved by FDR, in Currie

然而在居里剛到重慶的頭幾天之內，這個願望就遭到徹底粉碎，而且此後再也沒有機會被列入議程。在7月21日，當居里首度指出美國對於最近中國拒絕接受英國軍火援助一事感到失望時，蔣介石立即毫不掩飾他對英國人的嫌惡，並說：「蓋吾人深知英人輕於承諾，其目的在求宣傳，至如何實踐其諾言，彼等非所計也。中國迄今實未得英方任何協助，反之，我方之助英者已彰然在人耳目矣。倘中國而有國會，需予報告所得英方協助之經過，予將瞠目結舌無所措詞矣。」[17]

蔣介石之所以斷然拒絕英國試圖要和中國簽訂同盟條約的提議，其原因非常簡單。因爲在他看來，英國人的目的並非爲了加強中英軍事合作關係，而是在使用陰謀詭計，騙取中國政府承認英國在印度和緬甸的殖民主地位(進而挑撥中國和印度的感情)，並且借此套住中國，在戰後不得不承認英國在東南亞的地位。基於這種考慮，蔣介石明白表示，除非美國也成爲簽字國，否則中國不擬與英國單獨簽訂任何同盟條約[18]。

當居里試圖把英美將中國排除於同盟國會議之外一事加以合理化，同時否認它有任何種族歧視含意義時[19]，蔣介石也斷然拒絕接受居里的解釋。他雖然並沒有明白指控英美在相互勾結，但卻把責任完全歸諸於英國，直指它才是阻礙中國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主謀，並且還指責英國依然把中國視爲如同它的自治領的優越心理。

蔣介石對於種族歧視的抱怨，自然也推及戰時物資分配問題上。他指出，假如在戰爭進行中，中國就已經遭受如此嚴重不公平待遇的話，那麼戰後它將更不能指望會得到西方公平的待遇了。因爲到了那時節，所有的和平條款勢將由英美兩國定奪。然而，儘管蔣介石心中對盟邦有如此強烈不滿，他依舊宣稱對羅斯福的承諾充滿信心，而且也樂意接受美國領導，因爲他認爲美國向來是一個有強烈公平心的國家。但是他絕對拒絕經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來實行英美兩國對全球戰爭的共同領導[20]。聽到蔣介石這樣尖銳的言辭，居里很快就放棄了試圖插足中英關係的遐想。

一旦他們結束了這些暖場性質的唇槍舌劍後，蔣介石和居里終於把注意力拉回到中美關係的正題上來。

(續)

Personal Papers, Box 5.

17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1日，《戰時外交》(一)，頁629-634。

18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2日。

19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43。See: Hornbeck's mem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9, 1942,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80.

20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43。

## 叁、中美關係衝突的重點

### 一、飛機移防和三項要求

引爆6-7月份外交危機的直接導因——飛機移防事件——其實很快就獲得解決。羅斯福在7月4日曾以函件向蔣介石保證，此次事件只不過是一個應急措施，目的在保護同盟國的全球利益[21]。和先前美國陸軍對付蔣介石的粗暴態度兩相對照之下，羅斯福的外交言辭顯得婉轉而又彬彬有禮。事實上，他爲了打動蔣介石心理，更提出了一種說法，那就是，如果換了蔣介石面對同樣情形的話，後者也必然會採取同樣的因應措施。羅斯福的說法無疑讓蔣介石聽得入耳。因此蔣介石在7月22日表示，他能夠理解爲什麼埃及的戰況需要美國飛機援助，但是他也說明他之所以不滿的原因，是因爲美國政府在事先連在禮貌上都沒有徵詢他的意見。當居里不再爲軍部找託詞時，這個事件也就不了了之。

更出人意表的是，所謂的三項要求也沒有引起任何爭論。即便在居里抵達重慶之前，蔣介石已經決定不再向美國要求新的援助項目，因爲他認爲美國本來就不熱心幫助中國，因此無需自討沒趣[22]。在7月22日會談時，蔣介石提醒居里，他對史迪威作出要求的原因，是根據羅斯福對宋子文的談話，建議蔣介石應該指示史迪威，以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身分向美國請求武器援助。蔣介石指出，美國並沒有義務向中國提供任何物資，中國也爲收到美國物資援助而心存感激。蔣介石說：「美國對華之供應，無論其數量多少，皆得吾人之銘感，深知此實爲中美精誠互助之表現也。然而吾人所要求者，乃在待遇之平等，而物資之多寡皆在其次，此應請美國特別了解也。」[23]

蔣介石還向居里說明他的要求內容到底是什麼，以及史迪威如何扭曲他的用意。依照蔣介石的說法，他在提出要求時曾經告訴過史迪威說，如果這些最低要求不能實現的話，那麼同盟國的行動就已經充分說明，它們不重視中國戰區的重要性，因此他就無法擔當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職務，而必須請盟邦另謀其他解決之道。然而史迪威卻扭曲了他的話語說，假如他的要求不能實現的話，那麼中國就要另謀出路，隱然語含威脅。

蔣介石表示，他無意責怪史迪威沒有盡到責任，也不擬計較美國援助飛機或其他

---

21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4日，《戰時外交》（一），頁627-628。

22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12、21日。

23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43。

物資的數量。至於有關兩架飛機的爭執，本身更是小事一樁。然而，「予所注意者，惟史將軍對予之感情與態度耳。物質上之估量在任何情況中，皆非予所重視。」在這個時節蔣夫人也插嘴說，「委員長以爲彼所重視者，並非飛機之數量，而爲態度與精神。試舉例明之，苟有人也，竭力助汝，即令不成，汝亦感其盛意。苟其協助，出以傲慢之態度，則非彼所願見也。」[24]難怪在蔣氏夫婦眼中，史迪威表露出來的是最壞的結合，因爲他既無心幫忙中國去爭取物資，而且還堅持要對中國趾高氣揚。

有關三項要求的討論很快就轉移到盟邦收復緬甸的計畫上去了。當居里提到史迪威已經擬好一套反攻緬甸計畫時，蔣介石當場宣稱中國願意派遣21個師兵力參加戰鬥，前提是中國必須在三個月內得到500架飛機，和每個月5,000噸物資，以保證戰鬥的成功[25]。居里在看到蔣介石如此乾脆地作出承諾時，他的如意算盤是先把中國的承諾捆綁住，因此他提議中國大可以單獨先行著手緬甸作戰的準備工作，但是讓美國從長計議它打算承擔何種義務。但是蔣介石立即予以反駁說，假如美國真正認爲收復緬甸有足夠的重要性的話，那它在事先作如此小量的承諾就不致有任何困難了[26]。就蔣介石而言，美國之所以不願意給中國如此微少的援助，它本身就說明了美國認爲中國戰區的價值無足輕重[27]。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並沒有重提他以前要三個美國陸軍師開赴中國戰區的要求，他只是要求絕對地保證中國軍隊一定會得到最低限度的空軍支援[28]。

## 二、史迪威的多重職務

對於居里而言，最困難的工作是釐清史迪威在中國的多重身分。事實上，三項要求和租借法案物資分配的爭論，也都離不開史迪威身分的明確界定。因此，從他們第三次會談開始(7月25日)，至少有五次會談都以史迪威身分問題爲討論焦點。然而在他們沒有進入主題之前，蔣介石與居里都各自接到了內容不同的消息，以致影響到他們的談判策略。

影響蔣介石策略的消息是一封來自宋子文的電報(7月23日)[29]，其中重述了羅斯福

24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1-655。

25　同上。又見：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9日。

26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7月26日。

27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6-661。

28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日，8月6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67，714-719。又見：蔣介石致居里備忘錄，1942年8月6日，《戰時外交》(一)，頁712-714。

29　由於蔣介石早先曾經透過宋子文向羅斯福表達他對於史迪威的不滿，因此他認為宋子文在7月23日回電中所提到的羅斯福態度就是後者對蔣介石的直接回應。

的個人口信稱，史迪威作爲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自當接受蔣介石命令。由於史迪威同時又是美國駐重慶的租借法案代表，因此又必須接受美國政府命令。羅斯福進一步指出，假如蔣介石實在不滿意這一安排，那麼美國可以把這些權力分別交付給兩個人行使。更有進者，假如蔣介石堅信史迪威不適任的話，那麼羅斯福也可以予以更換。然而羅斯福緊接著又表示，他依然希望蔣介石能夠讓史迪威留任，理由是：史迪威熟悉中國事務，對中國人民友好，而且美國政府不容易找到更合適的人選去取代他。最後羅斯福還表示，在有關租借法案事務上，宋氏可以代表蔣介石，而霍普金斯可以代表羅斯福，由雙方就近在華盛頓解決問題，這樣就能讓史迪威專心執行聯軍參謀長職務[30]。

對於蔣介石而言，在他與居里就史迪威問題進入嚴肅談判的前夕，宋子文電報讓他感到安心，那就是，萬一他和居里的談判陷入僵局時，羅斯福將會同意撤換史迪威。當然，假如蔣介石願意讓史迪威繼續留任的話，那麼羅斯福就可以選擇或是保持史迪威的雙重身分，或是把他的職務分由兩個人擔任。基本上，羅斯福似乎已經表示尊重蔣介石有權依照自己的意願和史迪威打交道。但是蔣介石也因此產生了一個新的關切，那就是如何不要讓羅斯福陷於難堪境地。到了7月25日，蔣介石在處理有關史迪威事項上，已經形成了幾個腹案以便跟居里進行談判。因此雖然他體會美國不願意召回史迪威的心意，但他還是決定把他對史迪威的不滿向居里全盤托出，他的這種做法，顯然是希冀美國政府在充分了解情況後會自動召回史迪威，這樣也就可以解脫他無法逕行開革史迪威的心理魔障。在和居里對話中，蔣介石表達對史迪威感到特別憤怒的一點，是史迪威所聲稱的立場，即：他可以自由裁量是否要服從蔣介石的命令，以及是否要將租借法案物資交給中國。在蔣介石的眼中，史迪威的行爲不但是對中國的侮辱，也是一個殖民地主子心態的表露，因爲他真正的願望是變成中國戰區的太上皇[31]。

相對而言，影響居里策略的因素則是他和史迪威的直接接觸，因爲居里在剛到重慶的頭幾天，就已經先和史迪威舉行了數度會談，親耳聽到了史迪威對蔣介石的各種批評。他還從史迪威手中拿到一份三頁紙的文件，詳細闡述史迪威對中國狀況的立場和判斷，以及美國政府應該如何對付蔣介石[32]。在私人關係層次上，這兩位美國人立

3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23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153-154。

31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5日。

32 Memorandum for Currie, from Stilwell, undated but obviously when Stilwell first met Currie,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8, Folder 61. Possibly written on July 22, as Stilwell recorded, "Pecked away at memos for Currie." See: JWS t-w diaries, July 22, 1942.

即發覺彼此脾胃相投，特別是他們共同厭惡宋子文[33]。經過這些初步接觸之後，史迪威在日記中對於他對居里所產生的影響感到放心。他寫道：「他(居里)沒有想到情況會有這麼糟糕。(我)幫助他熟悉了有關(中國人的)陰謀和欺騙。」他隨後又寫道：「爲居里寫了一些文件，然後交給了他。這真是讓他眼界大開。他開始談到帶著絲絨手套的鐵拳(用來對付蔣介石)。」[34]顯然到了這個時候，史迪威已經信心十足地認爲，他不但已經抓住了居里的注意力，而且把自己正確的觀念和精闢的分析，放進這位對中國事務茫然無知的美國同胞的腦袋瓜裡，而且成功地說服了居里，應該採取強硬態度去對付中國領袖們。在史迪威此時心目中，他相信美國總統終於派送了一位稱職的人物來到中國作爲他的後盾[35]。

果不其然，當居里在7月25日和蔣介石會談時，他立刻發動攻勢，指責蔣介石從7月初就忽視史迪威的存在。事實上，居里和史迪威兩人此時也還同時收到了一份從軍部傳來的電報，內容是把一封羅斯福總統即將發送給蔣介石的電文抄本預先通知他們。在這封電報中，總統措辭強硬地全盤支持史迪威早先對自己職權的界定(詳情見本章第肆節)。這個發展使居里的立場變得更爲強硬，也可以解釋爲什麼他突然採取強勢進攻。他基本上把史迪威的論點向蔣介石重述了一遍，希望借此讓蔣介石從此閉嘴[36]。

但令居里意想不到的是，蔣介石不但坦承自己的確已經停止了一切和史迪威之間的來往，而且他還將繼續這樣做，直到史迪威職權定義澄清爲止。依照蔣介石的說法，假如史迪威是羅斯福在中國的軍事代表的話，那他就應該受到中國政府以接待外國貴賓的方式對待。但是假如史迪威是蔣介石屬下的聯軍參謀長的話，則他應該像一個部下一樣聽從上級的命令。由於史迪威似乎認爲他有權隨時隨地轉換身分，因此蔣介石聲明他將拒絕和史迪威有任何接觸，因爲他不知道應該如何對待史迪威才算正確。

當會談觸及到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的表現時，蔣介石的憤怒就變成不可遏制。居里成爲是第一個親耳聽到蔣介石對史迪威在緬甸戰場的行爲指控的美國人，特別是史迪威在決定撤退路線時故意違反軍令，蔣介石毫不含糊地指出，這是公然反抗上級命令的罪行。讓居里再也沒有想到的是，蔣介石對史迪威在緬甸行爲的指控資料會是如

3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21, 1942. Also JWS t-w diaries, July 21, 1942.

3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23, 24, 1942. JWS t-w diaries, July 23-24, 1942.

35 但是史迪威對於居里個人的評估則並不恭維。他把居里的心智狀態形容成是一個小學五年級小男生的程度，坐沒坐相，身軀不停地扭來扭去，說話沒有重點，又喜閃爍其詞，讓人難以捉摸。這些都讓史迪威感到不安。見：JWS t-w diaries, July 27, 1942.

36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5日，《戰時外交》(一)，頁643-650。

此淋漓盡致，而蔣氏夫婦憤怒的程度會是如此強烈。從中方詳盡(逐字逐句)的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出，當居里默不作聲地傾聽蔣介石指控的細節時，他的姿態明顯在改變。他原本打算要極力推崇史迪威「過去」輝煌的服務成績，但是聽了蔣介石怒氣沖天的指控之後，立即發現此路不通，所以他被迫逐漸退縮，改而強調史迪威在「未來」可能發揮的功效。居里企圖說服蔣介石的謀略是指出，既然中國軍隊在未來仍將進入緬甸作戰，而蔣介石又仍將拒絕把部隊交給英國人指揮，那麼繼續保留史迪威職務將會是符合中國的利益。他所提的理由是：史迪威既重視中國戰區的戰略價值，又對中國軍隊的訓練和指揮高度關心，而這些因素在「將來」都可能發生重大作用[37]。

## 肆、一個節外生枝的干擾：宋子文涉嫌扣留羅斯福電報

### 一、居里提出指控

正當居里致力於化解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怨憤時，另外一個事件卻爲中美關係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危機。在7月25日的會談中，居里突然提出指控稱，宋子文私自扣留了一份羅斯福發給蔣介石的電報，而這份電報的內容，正是表明美國總統完全支持史迪威本人早先對其職務所作出的闡述。如同本章前一節所言，史迪威和居里都早已經讀到馬歇爾提前發來的總統電報抄本，然而不久之後卻發現蔣介石竟然沒有收到原件[38]。居里借著這個機會，盡情把宋子文在跟美國政府打交道時所犯的許多所謂的「錯誤」一一加以揭露。

不用說，居里的指控大大超出蔣介石所能想像者，因此他命令宋子文立即提出解釋(7月25日)[39]。在此期間，蔣介石也重新思考了居里所轉述的羅斯福電文的內容，隨即又補發了一份電報給宋子文(7月26日)。原因是蔣介石開始懷疑，羅斯福電報的用意很可能是試探蔣介石對於史迪威職權定義的底線和決心。在這第二份電報中，蔣介石指令宋子文送給羅斯福一個明確的口頭警告，那就是，如果蔣介石果然收到了羅斯福的電報，而其內容又和居里所形容者完全相符合的話，那麼他唯一的選擇就是撤銷中國戰區[40]。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假如在1942年夏天，中美關係上果然曾經一度有一

37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5日，《戰時外交》(一)，頁643-650。

38 同上。

39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5日，《戰時外交》(三)，頁614。

40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614。又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7月26日，第5卷，頁155-176。

個名副其實的外交危機的話，那應該就是這一個事件了，因爲蔣介石用這個行動送給了羅斯福一個嚴肅而明確的「最後通牒」。和它比較起來，三項要求事件可謂小巫見大巫。因爲蔣介石聲稱要採取的行動，將會徹底打亂亞洲戰線上的同盟關係，同時也會讓居里和蔣介石之間不再剩下可談之事。奇怪的是，這件事在史學著作裡似乎很少受到注意。

## 二、宋子文的回應

這個「失蹤的電報」的謎團很快就被宋子文揭開。根據宋氏在次日回電中報告，羅斯福的確在7月16日給過他一份電報，並囑其轉交蔣介石[41]。但是當宋子文看完電報後，認爲其內容極不妥當，因此趕忙警告羅斯福說，電報可能會引起嚴重後果。羅斯福隨即接受宋氏建議取消了電報，並囑咐宋氏另外送一份電報給蔣介石，其內容就是前文所述宋子文在7月23日發給蔣介石的電報[42]。在宋子文看來，既然羅斯福已經撤回原來電報，那麼他自己在7月23日給蔣介石的電報，當然就應該成爲今後談判的新基礎[43]。

這個曲折過程顯示出馬歇爾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因爲軍部就是羅斯福原先電報的起草人。電稿完成之後，馬歇爾信心十足地認爲總統必定會全盤採用，因此他就逕行把電稿抄本在7月13日先行發送給了史迪威[44]。

這起事件說明，軍部犯了一個極其幼稚的錯誤。那就是在還沒有肯定電稿是否確實已經被總統接納作爲最後定稿之前，就貿然地誤導了史迪威和居里，以致他們兩人去對宋子文大興問罪之師[45]。它同時也說明，這起事件並非一個孤立的事件。本書在未來將會多次提到，羅斯福或是由於萬事纏身以致注意力無法集中，或是掉以輕心，所以習慣性地依賴美國軍方替他起草和中國政府來往的外交文件，這樣就使軍部領袖們變相地成爲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制定人，或至少是具有高度影響力的人士。具體的例子會在後面有關章節中作更詳盡的討論。專就此次事件而言，用不著說，馬歇

41 FDR cable to CKS, July 14, 1942, with letter of transmittal to Soong from John L. McCrea, Captain, U.S. Navy, Naval Aide to the President, July 15, 1942.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6-1.

4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7月26日。

4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7月27日，《戰時外交》（三），頁615。

44 Marshall's very long message to JWS, including the text of both FDR and CKS messages to acquaint JWS of the exchanges, July 13, 1942. Verifax File 2379, Item 2523. MFA.

45 Marshall's Memorandum to the War Department on the Status of General Stilwell, July 24, 1942, in Xerox File 1507, MFA.

爾對於這個意外挫折感到非常不快，因爲它不但表示他的電稿被美國總統捨棄不用，而且自己竟然需要等了一周的時間，才得知他的長官已經否決了他的建議。

## 三、史迪威的反應

當史迪威最初看到羅斯福支持他的電報稿本時，他的心情大受鼓舞。當他不久得到的消息是，羅斯福交給了宋子文這一封電報，而宋子文竟敢私自予以扣留時，這個發展更使史迪威感到無比振奮。正如同他在日記中所寫下的：「那個混蛋的蠢才(宋子文)，難道他不知道他會被逮到嗎？他應該被叫過來，臭罵一頓，然後被踢出去。想一想，一個像他這樣身分的官員，居然敢扣留法蘭克(羅斯福)給花生米這麼重要的信件。怪不得我的處境像是在狗窩裡一樣。花生米說不定一直還在沾沾自喜地以爲，他的信件讓(美國人)不知如何作答呢。」讓史迪威感到特別欣慰的是，「羅斯福的回答是有尊嚴的，強而有力，毫無保留地，明明白白地支持我。」[46] 可以理解的，史迪威馬上催促居里一定要抓住這個把柄，對中國人大張韃伐。他並且信心十足地預言，「然後，就可以還我清白了。」[47]

但是史迪威的愜意爲時甚短，因爲他很快就從馬歇爾那裡得知(7月26日)，原來那封電報根本就沒有送出去。史迪威聽後的反應是，「除非我們強硬起來，否則，我們就會垮掉。」[48] 史迪威馬上警告馬歇爾說，如果美國政府把關於租借法案的權力從他手中拿掉的話，那他將會失去一個影響中國局勢最有效的途徑。因此他強烈要求美國絕對不能讓步[49]。

這次羅斯福「失蹤」了的電報事件，當然更增加蔣介石和宋子文對史迪威的憤怒，特別是當他們發現羅斯福的電報原來是由軍部起草的[50]。這個消息益發讓他們相信史迪威肯定參加了起草過程，更何況電報稿的文字並不是想澄清史迪威職權的模糊性，而是在訓斥蔣介石。他們對史迪威和軍部惱火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軍部稍後再度推翻了羅斯福和宋子文在7月23日的協議。

---

46 Stilwell also drew considerable satisfaction from the following words in FDR's letter to CKS, "It is therefore clearly not - repeat not - practicable for all of General Stilwell's duties to be subject to orders from you."

4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25, 1942. See: JWS t-w diaries, July 25, 1942.

4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26, 1942. See: JWS t-w diaries, July 26, 1942.

49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bject: Status of General Stilwell, submitted by Maj. General Thos. T. Handy,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July 28, 1942. In Xerox File 286, Item 5737. MFA.

50 宋子文給羅斯福提供了一個下臺階，他說總統繁忙的工作一定讓他沒有時間仔細審閱電稿，因此沒有看出其中文字的不當之處。

至於說到電報事件本身，它或許在中美關係中根本不值得讓居里和史迪威如此去小題大作。一個外交家，特別是具有宋子文這般全權代表身分的人，本來就不應該只是領袖們之間的信差而已，而應該享有相當程度的自主裁量權，以便去判斷他如何能夠增進兩國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即便宋子文運用自己的判斷力，認爲羅斯福的電報有害於中美關係，因而拒絕轉交，也是在他權責範圍之內的行爲。這個事件反而說明了居里和史迪威兩人都犯了急躁錯誤。究其原因，只是因爲出於他們對宋子文的不滿，所以沒有花時間去了解他們自己的政府到底做了什麼事。

他們兩人如此草率而激烈的反應，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導因於美國官員之中一直有一群人，懷疑宋子文曾經爲了私人原因，對蔣介石隱瞞重要事實。可惜的是，他們從來提不出有力證據來確定宋氏的劣跡，也從來沒有提出合理的動機，去說明爲什麼宋氏需要這麼做。歸根結柢，這整個事件顯示，美國官員出於先入爲主的錯誤認知，沒有經過論證就任意揣測，在以爲抓到了宋子文犯罪鐵證時，乃喜不自禁貿然作出指控，最後反而造成自己的難堪。

就這個事件的本質而言，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類似實例，在此值得一提。那就是，赫爾利大使在1944年9月份處理史迪威指揮權危機時，採取了和宋子文完全同樣的行爲。當赫爾利在該月24日讀了蔣介石請他轉交給羅斯福的一件「備忘錄」(aide-memoir)時，他發現文字對美國總統極爲侮辱，因此當場聲明拒絕轉交，並請中方重新修改。中方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經過一天的修改，最後在達到赫爾利認爲符合外交禮儀標準後才發出[51]。值得注意的是，宋子文再度置身此事，只是這次是由他潤色電報，以求能被赫爾利接受。

## 四、電報事件對居里態度的影響

對居里而言，他不但沒有一舉擊中宋子文要害，反而被軍部的粗心大意弄成一個笑柄。他對此當然感到無比懊惱。他原先在和蔣介石討論史迪威問題時所採取的盛氣凌人的氣勢，以及他毫不遲疑地對宋子文的肆意批評，都是由於他的消息錯誤所致。宋子文對於羅斯福失蹤了的電報所提出的解釋，肯定讓居里感到洩氣無比，同時也影響他此後處理史迪威問題時所採取的姿態和策略。

這整個事件爲居里的行爲帶來了某些微妙的改變。首先，他自動向蔣介石提供(7月29日)內幕消息稱，羅斯福早先的電報確實是由軍部起草，而且羅斯福本人也沒有

5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 452. CKS's aide-memoir was sent out to FDR on September 25, 1944.

細讀就簽了字[52]。居里進一步解釋，由於羅斯福是一個大忙人，因此在他答應宋子文去解決史迪威雙重身分的矛盾時，中國切不可以指望，美國總統會記得兩國政府以前達成的各項協議中的細節。爲此居里預言，一旦羅斯福了解中美兩國政府間曾經達成過有關史迪威的協議時，他又會翻悔他和宋子文的協議。因此，居里勸告蔣介石，不要把宋子文的報告當成是羅斯福最終的立場[53]。

居里爲什麼要向蔣介石作出這樣的坦白？可能的解釋是：他或許想爲總統的三反四覆的行爲作出辯解，他或許想借此發洩對軍部的怨氣，也或許他是好意地提醒蔣介石，千萬不要對前景過於樂觀。無論如何，一個很明顯的跡象是，居里在史迪威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已經逐漸軟化。但是居里避而不談的是向中國承認錯誤或是道歉，而他的這種作風，也真實地反映了美國政府官員對待中國的一貫態度。

## 伍、居里改變策略

### 一、居里探索新的解決方案

在尚未離開美國之前，居里從總統處得到的訓令中，有關史迪威的部分包括兩點：「一是、支持史迪威在印度訓練中國士兵的主張，讓中國人知道我們的態度是，在處理與軍事有關的事務上，史迪威是兩國的溝通、談判，和處理需求(美援)的唯一管道。二是、強調史迪威本人(的重要性)，和他(史迪威)與美國陸軍及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之間關係的重要性。並且讓中國人了解，總統極不願意干涉純粹屬於軍事領域內的事務。」[54]毫無疑問地，到此時爲止，居里一直都是在盡力貫徹這個訓令。

然而在目睹蔣介石對史迪威怨憤的強度之後，居里決定改變策略，以圖挽救史迪威在中國的職位。出於這層考慮，居里在7月26日會談中，他只作了一個短暫而微弱無力的嘗試去支持史迪威，但很快就改變了談判方向。從此之後，他不再強調史迪威能夠在中國作出的「正面貢獻」，而是開始警告蔣介石，如果把史迪威召回後可能導致的「惡果」。居里警告蔣介石說，如果把史迪威召回美國，肯定會得罪馬歇爾，也會延誤下一次緬甸戰爭的時機。他甚至擔心史迪威回到美國後，可能會對中美關係造成

52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67。

53 同上。

54 "Tentative Draft of Instructions to Lauchlin Currie for Mission to China", July 1942 and approved by FDR,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更大的殺傷力。他進一步提出，美國很可能物色不到合適人選來取代史迪威[55]。此後的幾天，居里一方面向蔣介石保證，只要蔣介石的確認爲無法忍受史迪威的個性時，美國當然會撤換史迪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不斷地強調撤換史迪威可能造成的風險，指望借此打消蔣介石的念頭[56]。

## 二、蔣介石的回應

蔣介石的反應與他歷來的態度一致，也就是：他並不反對史迪威同時身負雙重任務，但是史迪威必須把這兩個任務劃分清楚。蔣介石指出，就像他以前和蘇聯甚至德國軍官的關係一樣，他們既是他們本國的軍事代表人員，又身兼蔣介石的軍事顧問[57]。正如蔣氏夫婦再三強調的，最重要的是史迪威必須改變他的態度。

依照蔣介石的說法，當史迪威和蔣介石會面時，他唯一的身分只能是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當史迪威選擇以其美國代表身分和中國政府交往時，則他將受到中方對等單位的接待[58]（比如：外交部或是軍政部），而不能同時享有聯軍參謀長所專有的待遇。令蔣介石特別感到不滿的是，史迪威始終堅持只用「美國陸軍中將」的名義簽署一切呈送蔣介石的文件，好像他不是蔣介石的軍事部屬一般。但是在蔣介石看來，史迪威以一個美國軍方代表的身分，竟然想過問中國軍隊的人事問題，這簡直荒唐透頂，因爲這些都並非一個美國代表有權過問的事[59]。

看在蔣介石眼裡，史迪威這種以美國代表身分置喙中國事務的行爲，反映出來的是一個處心積慮的意圖，而不是一個漫不經心的疏忽。因爲即使是在居里親口向史迪威提示這種行爲有違常規之後，史迪威依然我行我素，拒絕改變[60]。然而當居里一再

---

55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155-176。

56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7月29、30日。

57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30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72。

58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67。

59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30日，《戰時外交》（一），頁667-672。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總統圖書館中有大量的史迪威私人檔案。在眾多的文件中，難得看到史迪威的信紙上印有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的頭銜。正好相反，他簽字的文件都是出自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India"，而他的簽名總是標明他的美國軍職和官階。本書作者能夠找到的唯一例外，是一份他在1943年9月26日致送給蔣介石的備忘錄，他採用的職位是 "Joint Chief of Staff for the Generalissimo"，但是信紙依然是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 United States Army Forces, China, Burma, India". 見：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 Box 5, Folder 18.

60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by Currie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 10, in

追問蔣介石，是否果真想要史迪威離開中國時，蔣介石卻不能痛快地給予答案。他只是一再強調：他最關心的根本問題不是對「人」而是對「事」。他需要美國政府做的是對史迪威的工作給予詳盡界定，以避免將來在兩國之間再次產生誤解和衝突。因此他客氣地表示，他寧願讓美國政府自行作出對史迪威去留的選擇[61]。一旦蔣介石透露他自己並不急於解決這個問題時[62]，政治嗅覺高度敏感的居里馬上抓住機會，在7月30日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那就是，蔣介石可以先讓史迪威到印度去逗留一段時間，讓他全心全意去籌備下一次的緬甸戰爭。居里則承諾在自己回國後，會努力安排召回史迪威。蔣介石隨即接受了居里的建議。

## 三、一個過渡性的安排

很清楚地，居里提出把史迪威送去印度的建議只不過是一個權宜之計，以避免蔣介石和他兩人之間持續的摩擦，同時也讓中美雙方政府有時間去找出一個妥善辦法，好讓史迪威可以有體面地離開中國戰區。居里本人也信守承諾，在回到華盛頓之後，立即展開積極動作推動史迪威召回的事宜。然而軍部的想法卻正好相反。因爲既然居里和蔣介石的協議已經解決了當前的棘手難題，那就無需做其他後續動作了。因此當居里向馬歇爾建議撤換史迪威時，馬歇爾毫不客氣地予以拒絕。至於史迪威本人，他當然歡迎居里的安排，因爲這不但讓他可以避免被困於重慶辦公室裡，從事乏味的參謀工作，又讓他可以遠遠地脫離蔣介石視線，回到印度緬甸去施展自己的抱負。套一句中國話說，這可說是縱虎歸山。此中許多細節將在本書第七至第十章中作更詳盡深入的分析。

就蔣介石而言，他固然對史迪威深惡痛絕，但是他此時尚不想爲此而和美國人正面衝突。蔣介石之所以同意讓史迪威去印度，是因爲這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安排，而又能保住史迪威體面的做法。他希望這種做法可以使外人不致以爲史迪威是被踢出中國的，而且史迪威自己也不致在事後對中國懷恨在心[63]。事實上，蔣介石甚至感到頗爲自得，認爲他用了極小的讓步，換得了巨大的外交實惠。

諷刺的是，蔣介石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倉促地決定讓史迪威離開重慶，根本就摧毀了他從1942年6月以來，想改變他和史迪威工作關係的一切努力。如果史迪威

（續）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61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67。

62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30日，《戰時外交》（一），頁667-672。

63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30日。

在緬甸的行爲本來就是他們間衝突的根源的話，那麼再度把史迪威送去印度，只能讓那個根源重新萌芽。在不久之後，蔣介石對於自己的失策肯定要自食其果。

7月29日，羅斯福終於對史迪威的身分和責任，代表美國政府作出了最權威的解釋，那就是維持原來史汀生和宋子文所協議的雙重身分。羅斯福同時表達個人願望，希望蔣介石能夠接受此種安排，因爲美國實在找不到另外一個可以分擔史迪威職權的適當人選。特別重要的是，羅斯福在引用了宋子文－史汀生1942年1月30日協議的原文之後，接著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說：「因此，從以上的資料可以推論，在所有與防衛有關的事務上，以及史迪威以美國代表出席任何軍事會議時，史迪威都只是對美國政府負責。在其他所有與指揮及參謀業務有關的事務上，他向最高統帥委員長負責。鑒於這個安排自從史迪威將軍抵華後一直有效，因此我希望它能夠繼續讓委員長滿意。」[64]由於羅斯福電報所用的文字全部重新改寫過，清除了以前軍部稿件中一切粗暴語句，因此沒有再引起任何麻煩，因爲蔣介石本來就不曾反對過史迪威的雙重身分。

在蔣介石與居里達成諒解之後，事情順利進展。在8月3日舉行的第九次會談時，蔣介石終於同意史迪威出席參加，這也是史迪威幾周以來第一次被准許在蔣介石面前出現，並向他報告緬甸戰爭計畫的具體內容[65]。

## 陸、居里使史迪威職權問題變得複雜化

因史迪威的多重職位而引起的摩擦和混淆，並沒有因爲羅斯福的電報而得到消弭。反之，居里在不久之後用他自己的行爲再度顯示出，問題的根源是美國政府毫無必要地把這些職位弄得過分複雜所致。客觀來說，居里其實是美國政府官員中最有能力把這些多重職權釐清的人，因爲他不但有機會聆聽到這些職位在實際運作中所產生的困難，而且也和中國政府進行過充分交流。他個人又作了大量努力去調和這些職位之間的矛盾，並且還建議羅斯福保持原有的安排。然而就在他離開重慶之前，他自己卻增加了問題的複雜性。在8月4日，居里送給何應欽將軍一個文件，目的在「澄清」史迪威的多重身分。依照居里的說法，史迪威的聯軍參謀長職權，只適用於當中國戰區的事務在中國「境外」發生時才有效。至於那些發生在中國「境內」的事務，則應該

64 FDR cable to Currie, July 29,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See also: Marshall memorandum to the War Department, Subject: Status of General Stilwell, July 29, 1942, in Verifax File 2378, Item 2523. MFA.

65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3日。

歸中國本國的參謀長掌管，而史迪威此時的身分應該只是中國參謀長的顧問而已。

用不著說，居里的說法讓何應欽大惑不解，而且也與史迪威自己歷來所持的立場相左。因此，何應欽急忙致電(8月11日)美國軍部次長麥克洛(McCloy)，請求予以澄清[66]。

當馬歇爾看到此電時，他當即指示麥克洛致電宋子文(8月18日)，改正對於史迪威聯軍參謀長一職的「誤解」。他寫道：

> 根據我方的理解，史迪威是委員長聯合參謀會的參謀長，而此會在盟邦軍隊在中國戰區中任何地點作戰時均有效。作為參謀長，他的責任是負責計畫、組織、訓練，及實地作戰等事務。他遵照委員長指示擬訂計畫，並且在得到委員長批准後，下達給有關單位付諸執行。
>
> 應該了解的是，在6月24日的會議中，當委員長和史迪威將軍討論聯合參謀會事務時，委員長曾經說明過，他的一切命令都將經由史迪威將軍作為聯軍參謀長的管道下達。委員長還進一步指出，聯合參謀會在接到命令後，將著手擬訂計畫，而計畫之執行將由中國政府的參謀長交給中國軍隊，由史迪威將軍的工作人員交給其他一切部隊。在這個問題上，委員長和史迪威將軍的觀點顯然是一致的。
>
> 本人誠懇希望以上文字充分澄清了誤解[67]。

以上引用的話表明，美國軍部在討論史迪威的聯軍參謀長的地位和職權時，基本上是試圖給予最寬鬆的解釋。

這次事件也凸顯出一件事實，那就是，想要給史迪威職權下一個嚴謹的定義是如何困難的事。而當不同的最高領導插足進來提供定義時(他們包括蔣介石、史迪威、馬歇爾、史汀生、麥克洛、宋子文、羅斯福、居里，乃至何應欽等等)，他們都只不過是把事情弄得更加混亂而已。

一如本書前文所述，蔣介石最初的簡單要求，無非是邀請一位美國軍官作他的聯軍參謀長而已。但是美國軍方人士居然提出這麼複雜模糊的安排作爲回應。他們要嘛沒有把自己行爲的後果想透徹，要嘛他們大而化之不以爲意。他們提出了這麼複雜的

66 Message from Chines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John J. McCloy, Under Secretary of War, August 11, 1942, in Verifax File 4391, Item 5627, MFA.

67 Letter by John J. McClo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to Soong, August 18, 1942, in Verifax File 4319, Item 430. MFA. Also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6-1.

安排，把多項可能互相矛盾的職務和責任一股腦壓在一位軍官的肩膀上，而他們唯一的理由卻是，在整個人才濟濟的美國陸軍中，找不到兩位合格的軍官，來分別擔任這兩個性質迥異的職務。這種說法實在令人匪夷所思。當然，他們在當初可能就已經非常樂觀地估計過，不管美國的定義本身是如何地漏洞百出，中國領袖們都肯定會俯首順從。果真如此的話，那麼美國這種行爲也就變得容易了解了。

打從那時起，不少著作或是淡化美國原始設計的粗糙，或是對後來發生的困難輕描淡寫。相對而言，他們倒是把許多精力放在批評宋子文沒有忠實而詳盡地向蔣介石報告，美國對史迪威身分的定義。然而，根據本書前文所述，這個批評到目前爲止仍然找不到事實根據。也有著作批評蔣介石沒有盡一切努力去配合美國人的安排。在如此處理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歷史的過程中，它們很方便地就忘記了，蔣介石對於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立場，自始至終維持一致。那就是，他要求一位美國軍官擔任他的聯軍參謀長。至於美國駐華軍事代表一職，那應該是美國政府自己有權決定的事。美國駐華軍事代表的職權，既不能取代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也不能凌駕於後者之上。相反地，他已經再三說明，聯軍參謀長必須有絕對的優先地位。

居里二度訪華的結果顯示，當更多的美國和中國官員們，參加到史迪威多重身分和權力的詮釋時，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見解。他們不僅對文字上的解釋有所不同，而且對於應該在何種情況下適用何種身分，也有不同意見。問題之所以變得如此複雜，部分原因是美國當初堅持拒絕蔣介石的建議，由兩國簽訂一個正式的中美同盟關係協議。如果當時經過了這一道手續的話，或許就可以及早釐清史迪威的權責，就像英國和美國軍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訂立的許多協定一樣。就像一部機器一樣，一個合理的設計，只需要按照正規使用，就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是如果設計錯誤的話，無論事後如何修修補補，都會使故障層出不窮。後來事情演變的結果反而是，中美兩國對於史迪威權責所持的不同立場，不再是從理性角度可以解決的事，而變得要靠兩國國力強弱的差距來決定。中美兩個盟邦間國力懸殊，不免讓美國更有膽量去伸張自己的看法。同時我們可以了解到，蔣介石對史迪威權責的反對意見，也並不是出於存心搗亂，而是前後一致。但他也爲此而對同盟關係產生了無盡的反感。歸根結柢，中美兩國都爲了這個錯誤的設計，而付出了完全不必要的慘痛代價。

在此後兩年中，蔣介石與史迪威在工作關係上始終維持高度緊張。由於兩人關係取決於中美之間國力的差距，又和史迪威與蔣介石兩人不同的個性緊密相扣，因此遲早會導致爆炸性的後果，這本屬意料之中的事。如果居里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謂的「成就」的話，他只是把史迪威暫時從衝突的焦點上移開，卻並沒有化解衝突的根源。

## 柒、居里訪問的結束

居里在重慶逗留了16天之後，在8月7日向蔣介石告別。他此行的成就是什麼？他自己所獲得的觀感如何？他對蔣介石又產生了何種影響？

### 一、居里的成就

#### (一)一般性的交換意見

居里是第一位得到羅斯福授予全權的美國官員，可以和蔣介石談論與中美關係有關聯的一切話題。事實上居里也充分掌握機會，和蔣介石進行坦白而深入的交談。這些接觸使得居里比當時其他任何美國官員更有機會，把美國政府對於許多問題的立場透徹地表達出來，也同時讓蔣介石聽到了其他中國人或是美國人從來沒有對他說過的話。在這個意義上，居里的成果可謂相當可觀。史迪威雖然經常自誇，他告訴蔣介石的都是未經修飾的實情或是逆耳忠言，但是史迪威和蔣介石談話內容非常狹窄，幾乎完全限於軍事領域之內。更不幸的是，正因爲史迪威與蔣介石的關係日益惡化，而史迪威的習慣又總是語帶譏諷、嘲弄、誇大和感情用事，因此他的意見並不能得到蔣介石的信賴和尊重。

居里卻不一樣。他的談話範圍不但比史迪威要寬闊很多，而且他能夠抓住蔣介石的注意力。即使在把殘酷的事實告訴蔣介石時，居里依然能夠保持適度的細緻和禮貌，因此他們之間的會談從來沒有流於互相指責。在這個過程中，居里表現出史迪威所嚴重缺乏的政治穩健，和個人應對的成熟和技巧。事實上，居里的表現也反映出，爲什麼史迪威在中國執行任務時，會表現得如此令人吃驚的失體和失態。從中美兩國領袖交換訊息的需要而言，居里的表現實屬可圈可點。他不但把美國人針對蔣介石和中國政府的許多尖銳批評，通盤而直率地向蔣介石陳述無遺，他還從中國帶了一大堆有價值的消息和觀感回到美國，對美國決策者應該極具價值，可以增進他們對中國事務的了解。居里帶回美國的消息和觀感，最終並沒有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其原因並非居里的過失，而是美國總統和軍部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態度，因此對於居里的報告多半聽不入耳。

至於居里是否能夠完成他訪華的具體任務，他在處理三項要求和史迪威的多重身分兩件事上，其成就則大爲有限。

## (二)有關三項要求的談判

就三項要求而言，如前所言，中國人本來就沒有把它當成危機看待，所以心態本屬平和。美國雖然最初把它當成大事來處理，但是居里打從頭開始就沒壓迫蔣介石放棄這些要求，所以也沒有把它當成是史迪威口中所形容的嚴重危機來處理。相反地，他只是希望把它淡化，當成盟邦之間正常討價還價的事件來處理。這樣也讓蔣介石能夠用同樣態度來應對。經過數度談判，到居里訪問結束之時，蔣介石雖仍然強調中國需要每個月5,000噸的接濟，但他對飛機的要求在文字上已經有所鬆動。他不再堅持500架的數字，僅要求及時和實質的空軍支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兩個要求都沒有再提出時間表。同樣重要的是，蔣介石沒有重提要美國派遣地面部隊到中國戰區作戰的要求，而只是表明他的看法，認爲派遣美軍到印度將大有助於緬甸戰爭的推動和實施[68]。對500架飛機和5,000噸物資的要求，都變成中國政府的「目標」和期望，至於何時能夠實現，則是交由美國決定[69]。中方這些態度上的鬆動，居里當然可以當成是他自己的成就，但是事情的本質只不過又回到了6月底以前的原點而已。

至於美國對中國租借法案要求的官方答覆，則是遲至9月14日才發出的。羅斯福通知蔣介石，美國只能在運輸環境和生產能力條件所允許的範圍內，承諾盡快達成目標。但是目前美國只能夠承諾繼續努力建立它在中國和印度的空軍力量，並以「現有的速度」向中國持續運送物資[70]。10月10日，羅斯福再度向蔣介石提出更具體的承諾：1. 美國空軍第10大隊將繼續支援中國戰區，並將飛機數量增加到265架；2. 美國將繼續把飛機撥交給中國空軍，但數量暫時未能確定；3. 美國將增加駝峰的飛機數，從現在的64架運輸機起算，以後每月增加6架，一直到總數達到100架爲止；4. 美國不能派遣地面部隊到中國戰區，但是可以盡最大努力，協助在印度蘭伽基地的練兵計畫[71]。

這次事件的發展過程顯示，危機的爆發和化解都和史迪威個人有密切關聯。三項要求之所以變成外交危機，本就是史迪威一手所造成。一旦史迪威被排除在談判局外，兩國政府尋求解決方案時，就不必操心誰贏誰輸的面子問題。這使得務實精神重新抬頭。羅斯福不能更快滿足蔣介石的要求，不論是出於不願意，或是沒有辦法，當然都會使蔣介石感到失望。但是美國明顯加快武器和飛機的援助步伐，也平撫了蔣氏

68 CKS's "Aide-Memoir" to Currie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6, 1942, in Xerox File 1150. MFA.

69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to FDR, August 24, 1942, p. 21,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70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9月16日，《戰時外交》(一)，頁722。

71 FDR cable to CKS, October 10, 1942, in Verifax File 60. MFA.

內心的憤恨。換言之，雙方的立場終於回到史迪威製造外交危機之前的狀態。而且兩國都沒有感受到任何壓力，不需危機處理。

### (三)有關史迪威職權的談判

關於史迪威職權的釐清，居里訪華的結果可謂得失參半。他至少成功地讓史迪威和蔣介石恢復了可以相互見面和對話的共事關係，同時又讓蔣介石允許史迪威去印度，化解掉高度緊張的中美關係。然而，他最多也只能借著把史迪威從蔣介石視線中移開的方法，求取短暫的局勢緩和。另一方面，他因爲自己忍不住對史迪威的職權發表意見，也把事情弄得更加複雜。總的來說，有關史迪威職權之爭，導因出自史迪威盛氣凌人的自我界定，其間經過居里的協調，最後以羅斯福語氣和緩的解釋而終結。雖然職權的實質內容維持不變，但是羅斯福的介入使它不再是一個爭端。這個結局使得中美雙方在7月份所承受的外交衝擊，成爲一場精力的虛耗，了無意義。

### (四)其他事務

除此之外，居里的具體成就更爲有限。雖然羅斯福當初指望居里可以消除蔣介石對盟邦種族歧視的懷疑，但居里所做的努力歸於全盤失敗，絲毫沒有改變蔣介石的觀感。事實上，他可能反而給蔣介石更充足的理由去相信，美國和英國同樣能夠以帝國主義的心態對待中國。

講到中英關係，雖然居里主動努力設法緩和這兩個盟邦之間的關係[72]，其結果卻是恰好相反。居里剛剛離開重慶不久(1942年9月)，邱吉爾就已經致函蔣介石，對中國同情印度的獨立運動和對英國的批評表示極端憤怒，並冷冷地警告蔣介石，不要插足英國和印度的關係。他也排斥蔣介石的建議，拒絕邀請羅斯福出面調解印度事務[73]。居里原本想長期性地在中英關係上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在回到美國後卻被羅斯福潑了一盆冷水，因爲羅斯福要他在這個問題上先和國務院諮商[74]。總統一旦這樣說，居里就失去了主導權。因此他想促進中英同盟關係的雄心，最終化爲泡影。

## 二、居里訪華時的所見所聞

同樣重要的是，居里訪華所見所聞，大大改變了他本人原先對同盟關係中許多事

72 Currie's memo to FDR, June 19,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73 王世杰日記，1942年9月7日。

74 FDR memo to Currie, September 26,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務的看法。居里訪華的初衷本是單方向的，那就是說服蔣介石接受美國的對華政策，尊重美國政府對援華物資分配的決定，和接受美國政府對史迪威多重職權的定義。但是在深入了解中國和亞洲戰區之後，他很快就改變了自己早先對某些事務的預設立場。

## (一)中國對於飛機的需要

居里最叫人意想不到的改變，是成爲陳納德空軍戰績的仰慕者，並且熱心支持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的空軍。與此同時，他也嚴厲地批評了駝峰運輸工作的無效能。他在7月間發現美國空中運輸部門(Ferry Command)只有9架(而不是原定的75架)飛機，而中國航空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也只有12(而不是原定的28架)飛機，來擔負印度和昆明之間的空運任務時，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特別把矛頭指向奈登(Earl L. Naiden, 美國駐印度之第10空軍大隊司令官)將軍，指責他無能至極，是罪魁禍首，以豪華旅館作爲住所和辦公地點，經常曠職，完全缺乏責任感。對照起附近的中國民航公司辦事處，他的辦公室根本毫無效率可言。依照居里得到的訊息顯示，假如奈登將軍能夠加強紀律和士氣，即便不增加現有的工作人員和裝備，駝峰工作都可能馬上達到每月4,800噸的運輸量。用居里的話說，「委員長關於每個月把5,000噸的物資運往中國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

居里向羅斯福報告，「(空運)的低能成績，可以怪罪於各種因素，其中最主要的，莫過於沒有受到華盛頓的支持。」更是一語中的。怪不得居里的總體建議是，「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可以讓我們拒絕委員長對於500架飛機和每個月5,000噸空運物資的要求。」[75] 顯然，居里在這個問題上的訊息和建議迥異於史迪威和馬歇爾。可是軍部在總統面前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居里，所以軍部可以對他的報告完全置若罔聞。

## (二)對史迪威的新認識

居里的第二個重要改變是他對史迪威的觀感。居里在訪華之前，下定決心要盡全力支持史迪威在華的地位，而這也是總統賦予他此行最重要的使命。但是經過和史迪威多次接觸，以及與蔣介石、美國駐華大使和若干美國軍人談話後，他最後告訴羅斯福的卻是：

---

75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p. 16-18, 41,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 史迪威對委員長毫無尊敬和重視之心。他認為委員長的觀念、戰略和戰術的看法都是錯誤百出。他的這種態度當然影響了他和委員長之間的關係。依我的看法，史迪威的態度，使得他無法在中國有效地執行任務。

居里在中國親身體會到史迪威的為人處事之後，他對美國總統最重要的建議是：

> 我堅決相信，史迪威將軍不能有效地執行作為我國在中國的首席軍事代表的職務。他們在個性、態度和對職務的觀念上的衝突過於深刻，使得他們無法發展出一個和諧的工作關係。因此我建議將他（史迪威）召回。

居里雖然小心翼翼地避免對史迪威的缺點作出坦率指責，但他還是藉由對一個有能力的美國軍事代表的描繪，間接提出了批評。他寫道：

> 他的繼任人應該是對中國人有感情，對委員長尊敬和重視，並且能滿足於做好能力所及的事。他必須接受現實，了解他的職務並不是去指揮部隊，而是在一方面盡一個顧問的責任去幫助中國人，另一方面做好中英兩國都能接受的聯絡員[76]。

居里應該知道，假如美國總統接受了他的建議，不單軍部領袖會對此項重大人事改變感到不快，而且會從根本上推翻了他們歷來奉行的對華政策，並把美國的對華關係推向早先莊穆將軍和國務院領袖所倡導的途徑上去。為此，毫不意外的，居里個人心意的改變並沒有給美國的政策帶來同樣的改變。

居里空等了幾周，始終看不到總統要把史迪威調離中國的跡象，於是決定直接向馬歇爾進言。9月14日，居里致函馬歇爾寫道：「冒著不厭其煩而饒舌的風險，我還是要誠懇地請求您考慮更換領導人。我可以肯定現在的安排無法達成任務。您曾經告訴我，除非蔣介石真心對史迪威感到滿意，否則您會把他調走。然而在我把您的意思說

76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to the President, August 24, 1942, pp. 9, 37,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得清清楚楚，並且自作主張地警告蔣介石，召回史迪威可能產生的心理上的傷害之後，蔣介石依然把他對於史迪威的不滿和反感說得淋漓盡致。」居里決定把話說得比對美國總統更爲坦白，因此他說，史迪威的問題是史迪威自己一手造成的，因爲「依我冒昧的猜測，他的心理狀態根本不容許他和蔣介石建立一個有效而健康的共事關係。」[77]

然而馬歇爾和史汀生兩人依舊相信他們對史迪威虧欠得太多。正如馬歇爾大約在此時對史迪威所說的一樣，「部長和我都理解你的處境有多麼困難，而你得到的支持又是多麼少。」[78]只要總統不直接加壓力，馬歇爾最樂於採取的對策就是把事情拖下去。

## 三、居里向蔣介石透露的訊息

如同前文提及，蔣介石從一開始就對居里的訪問寄予最大關注。而居里也向蔣介石提供了許多後者從其他管道無法獲得的訊息。因此，我們對於居里訪華的評估，不但要包括他具體想完成的使命，也必須包括他在無意中傳遞給中國人的許多訊息。

### (一)居里在不經意中洩露的訊息

居里對蔣介石最不尋常的貢獻，是洩露了不少有關美國政府內部運作的各式各樣訊息。居里提供這些訊息，顯然不是出自他的老謀深算或意有所指，而是在不經意中自然流露出來的。但是它們對於蔣介石卻產生了重大的心理影響，並且也改變了他對某些當事人的態度。比如說，居里透露白宮對於美國駐華的高斯大使毫無信心，認爲他不能忠實傳達總統對中國的立場[79]。他又透露，阿諾德將軍其實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爲了掩飾自己處理中國空軍計畫的失誤，曾不惜向總統隱瞞實情[80]。

更具殺傷力的是，居里透露了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in China, AMMISCA)成立的緣由。在此之前，中國政府曾經對這個代表團寄予極高的期望，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去與它配合，把它看成是促進中美軍事合作最重要的管道。但是居里卻告訴蔣介石說，這個代表團所以成立，並不是因爲美國政府想要成立一個有效的機構來推展對華政策，而是因爲幾個手腕靈活而善於自我吹噓的陸軍軍官，想借中國名目來替自己前途鋪路而已。他們鑽營的結果，是組成了以馬格魯德將軍爲首

77 Currie message to Marshall, September 14,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78 Marshall cable to Stilwell, September 1,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5, Folder 176.

79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8月5日。

80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43。

的代表團。在它四十多名團員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資歷欠佳的退伍軍人。根據居里判斷，正是因爲這個代表團成立的背景來路不明，所以它才得不到美國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居里更提到，除了該團之外，還有一批買空賣空和虛張聲勢的美國人，經過多方面活動，獲得中國政府聘請他們爲公路建築、財經事務等不同行業的顧問專家，到中國來招搖撞騙[81]。

毫無疑問，居里揭露的事實既讓他的中國聽眾感到興味盎然，又讓他們感到寒心不已，原來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國朋友和以導師自居的人當中，竟然有一部分是騙子、假貨或是庸才。當中國人得知美國政府把這批素質低下的人推銷給中國，還希望中國人感激不盡，並且以信賴和崇敬的心情禮遇他們，中國人民族自尊心受到的損傷之大可想而知。

另外還有一個讓中國人萬分震驚的訊息，就是美國政府早已著手探討，把中國東北地區交付國際共管的可行性[82]。蔣介石聽到這個訊息後的反應是，有「如晴天霹靂」。他同時還感嘆道，國際之間的確沒有正義。讀者應該記得，此時還是1942年8月，美國和中國的同盟關係才剛滿八個月，而美國也尚無全球戰略考量的壓力，因此並不需要以出賣中國領土主權，去換取蘇聯參加亞洲戰場的承諾(**事實上蘇聯本身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而它竟然已經暗中計畫作出嚴重傷害中國利益的舉動。這就使得史學界對於美國後來在雅爾達密約中所扮演的角色(**出讓東北主權**)，和所提出的遁詞(**換取蘇聯打擊日本**)，不得不重新進行評估。

概括言之，居里的談話讓蔣介石大開眼界，也使他更了解美國如何用了許多不公平而又不誠實的手段對待中國。正如蔣介石自己承認的，他既是高興能夠聽到這些訊息，又爲它們冷酷的內容感到心冷[83]。

## (二)居里對宋子文更多的批評

居里也向蔣介石提供了更多關於美國政府對宋子文不滿的訊息。依據居里的說法，宋氏和軍部關係之所以惡化，原因是他逞勇好鬥、處事粗糙、心胸狹窄等個性，常爲了一些細微末節，逞一時之快與人爭論不休。當然宋子文最招致軍部怨憤的原因，還是他向美國總統直接告狀的習慣。在居里看來，宋子文的作風只能產生反效果，讓中國更難獲得租借法案物資。居里雖然表面上只是建議蔣介石勸告宋子文改正行事

81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革命文獻拓影》，第34冊，頁17-27。
82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3日。
83 同上。

作風，實際目的卻是想說服蔣介石，送一個更有能力的人去取代胡適大使，而他心中理想人選則是孔祥熙。因爲一旦孔氏成爲大使之後，宋子文在美國的地位就會變成是多餘的了[84]。

誠然，居里對宋子文的批評，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相當中肯。但是宋子文和軍部關係惡劣的深層原因，並非來自他的個性。如果宋子文無需爭吵就能達成他的一部分目的（多半是中國對於美國軍援相當有限的要求而已），那麼以他的聰明才智，應該會懂得和軍部維持良好關係才對。但是如果軍部早已作出決定，只求爲了維持中國戰志，而對中國戰場作最低限度物質投資的話，那麼無論宋子文如何謙卑溫順也將於事無補。事實上，每當宋子文作出特別「令人厭惡」的行爲時，也正是他被推進一個兩難困局的時候。擺在他面前的選擇是：要嘛接受軍部的全盤擺布，要嘛作出積極回應甚至進行反擊。宋子文選擇的是通過堅持、挑釁和令軍部領導人厭惡等手段，去爭取一線成功的希望，以增加美國對中國的援助。正因爲宋子文所面對的，是軍部領袖們既不同情又不關心的態度，所以宋子文才會不斷遭受挫折和排斥。在一般情形下，如果他是一個毅力略微薄弱的人，應該老早就承認失敗而退縮了。但是宋子文有不認輸的性格，雖然只爭取到中國需要的援助中的一小部分，但他始終保持高昂的戰鬥意志，全力在華府衝刺，這就讓他的行爲更顯得「令人厭惡」了。

反過來說，當美國軍部以自己的本位主義立場和利益爲出發點時，它最嘉許的中國官員想必非胡適大使莫屬。因爲胡大使永遠尊重任何美國處理援華事務機構的裁決，溫順體貼，從不爭辯。換句話說，軍部最樂意打交道的中國官員，是一位「守本分」、「講分寸」、「識大體」而從不作「非分要求」的人，一切聽從提供援助方（美國）的安排和吩咐。即使中國的要求遭到拒絕，也決不請求說明原因或是進行申訴。最後，即使在軍部不能兌現或是半途撤銷已經承諾過中國的援助時，他也從不批評或是抱怨。

宋子文肯定不是這種類型的人。剛好相反，他很懂得討好、哄弄、求情，乃至製造場景、大聲抱怨，喧嚷他的失望，以戲劇化的表演去喊冤，和直接找美國總統訴苦。最後，也是從軍部立場而言最不可饒恕的罪狀，就是去向新聞記者們通風報信。而宋子文這一切作爲的目的，無非是想從軍部龐大的軍火倉庫中，擠出一丁點物資去援助中國而已。當然宋子文在爭取中國所需援助的累次失敗中，很快領悟到，他唯一有效的出路就是走「曲綫」途徑。這條曲綫，或是經由白宮的私人關係，或是利用同盟國軍事會議的公開場合，或是訴諸美國民意的公共媒體。當然，造成宋子文處境困難的

84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8月5日。

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軍隊戰鬥力低劣無能，因此沒有實力後盾。可是他面臨的更大阻礙，則是美國軍部根本無意給予中國更多的援助，而且這是軍部自身政策性的決定，不會隨著個別的軍火要求案而出現改變。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如果宋子文對居里的批評言聽計從，全盤改變了自己的作風，其後果可能並不是說服軍部，爲獎勵他的優良品行而增加對中國的援助，反而是把給中國的援助減到更少。事實上，即使是居里本人，雖然按照他自己的方法經過多方努力，也無法改變軍部的既定立場。總而言之，根據各方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宋子文的個性的確有許多瑕疵，甚至有嚴重弱點，也絕對有需要改進之處。但是他在華盛頓的行事作風，也和當地的大環境以及中美同盟關係的本質分不開。說得更明白一點，假如軍部打定主意不想增加對華援助的話，宋子文的出路也只有去爭吵，去找美國總統。從這個角度來看，居里的分析顯然混淆了中美同盟中一個重要的因果關係。

### (三)居里對宋子文批評的後果

居里對宋子文的批評造成蔣介石高度不安。甚至在居里離華之前，蔣介石內心已經作出決定，要把宋子文及早從美國召回，以免造成更多傷害[85]。就在這段時間裡，宋子文本人又作出一個舉動，大大地增加了蔣介石的憂慮。原因是蔣介石得知宋子文運用不正規手法，取得了美國政府內部機密文件。蔣介石在大感震驚之餘，立即警告宋子文停止這種做法，因爲它不但可能傷害中美關係，也可能傷害中國的「國格」，因此「切戒子文勿私偵友邦內情」[86]。蔣介石的這種反應也饒有趣味。一方面，它可以解釋成他顧全大局，不因小利而危害同盟關係的情義。另一方面，它也顯示出他對國際事務特有的天真，以爲美國在華官員必定也遵守同樣的行爲準則，以盟友之道對待中國。或許未來的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就是探討在戰時，美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對美外交政策的內情，到底知道多少？和經由何種管道獲得此類內情？不難想像，美國情報人員既然能夠破解日本政府內部通訊的絕密密碼，那麼破解中國官員在重慶和華盛頓之間的電報密碼，相對而言應該是一個較爲簡單的技術工作。如果美國政府果然能夠竊聽這些機密的話，那麼學者們對中美戰時同盟關係史的解讀和詮釋，必將需要大幅改寫。即使這種可能並不存在，但是如果蔣介石能夠得知，史迪威居然在1944年主謀對他進行刺殺計畫的話(見本書第8章)，那麼他對宋子文的指責就可能轉爲嘉許了。

---

85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1日。

86 同上，1942年7月31日。

居里離華不久，蔣介石就把他和居里會談的經過詳細向宋子文說明，連居里對宋子文作風的批評也坦誠以告。蔣介石提醒宋氏說，租借法案物資是美國的財產，因此美國人有全權裁決如何運用。他特別叮囑宋氏不要和美國人喋喋不休地爭取援助，而應集中精力爭取前線500架飛機和每個月5,000噸物資，以維持中國戰爭的兩項最低需要。蔣介石指示宋子文轉告美國，希望這兩個目標可以在3-6個月內達成，同時也轉告美國，在這些目標沒有完成之前，中國將無法發動對日反攻[87]。

不難想像，宋子文回信向蔣介石保證，居里的批評言過其實。依照宋子文解釋，他和軍部維持了一個務實的工作關係，做法和其他盟邦官員大致相同，與美國軍方既有爭論也有合作[88]。然而，居里的批評似乎在蔣介石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因爲幾個月後，蔣介石終於停止了宋氏在華盛頓的那一段充滿爭議的外交生涯。

居里對宋子文所表露的敵意，也讓他自己在仕途上付出代價。事情的原委是，居里回到華盛頓之後，開始積極爭取美國駐華大使一職。很難說清楚的是，到底是出於居里自己的鑽營，還是出於羅斯福的示意。無論如何，他的意圖一度曾經得到羅斯福的首肯，因而以爲任命發布在望。然而到了11月中旬，指望落空了。羅斯福改變主意，原因可能是中國方面不同意，而宋子文可能從中作梗。其後居里仍然企圖讓羅斯福相信他(居里)具有出任駐華大使的最佳條件，甚至建議羅斯福利用蔣夫人即將訪問白宮的機會，當面徵詢她的意見[89]。然而，居里始終未能如願以償[90]。

## 捌、蔣介石對居里的觀感

### 一、最初的反應

在16天的密集接觸中，蔣介石對居里的印象經過幾度變化。居里一開始的高壓姿態肯定引起蔣介石不滿。正如他日記在7月25日寫道：

> 近日與居里談話，更覺西人皆輕視我中華民族，無不心存欺侮。如其可以進一步壓迫，乃必壓迫之。美國所謂以道義與平等為號，實則其

87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8月8日。又見：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2年8月12日，《戰時外交》(一)，頁721。

88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8月14日。

89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Currie, November 13,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90 Ibid.

> 心理與方法無異於英國之所為。不過其人民精神與自由思想，或較英國為進步耳[91]。

7月27日，他又寫道：

> 帝國主義者無論其為何國，其對被壓迫之國家皆無誠意可言，非利用即高壓，無平等可言。皆抱可欺則欺，可侵則侵之心，吾人若一以克己復禮謙恭自持之道待之，則適中其計謀矣[92]。

蔣介石用這一類字眼來思考美國，顯然他對居里行爲不快的程度，已經強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他這裡所說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明指英國，也暗指美國。爲此，蔣介石決定在今後和居里交往過程中，應該採取強硬立場。6月下旬以來，史迪威和居里兩個人前後的行爲，已經讓蔣介石用「帝國主義」一詞描述美國的頻率逐漸增加，而對評判美國的顧忌相對逐漸減少。

## 二、西方人就是不同

經過和居里接觸，蔣介石對於羅斯福派遣居里訪華的動機，也產生全新的認識。雖然美國官方對此行的說法，是表達羅斯福個人對中國戰區的關切，但蔣介石卻相信居里真正的意圖，是探測如何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到了7月底，蔣介石已經感到相當肯定，居里訪華的目的是測試蔣介石的決斷力，並且一旦發覺有機可乘時，就會施加無情壓力。雖然蔣介石後來也看出居里的態度有所改善，但是他對居里的用心始終保持高度警惕[93]。

上述這些印象，導致了蔣介石作出如下結論：

> 近日對外交經驗所得，無論其為友為敵，凡我應得之權利與地位，只可進取與堅強，而不可有絲毫之退讓。以我退一步，必彼進一步。不僅不以我為知禮見情，而反視我為怯弱可欺也[94]。

---

91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25日。
92 同上，1942年7月27日。
93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31日。
94 同上，1942年8月1日。

蔣介石對盟邦間關係作出如此晦暗的評價之後，又進一步形成一個結論：他在和西方人交往時，切不可採用和中國人交往同等的方式。他相信，中國傳統的溫良恭儉讓等美德，只適用於和中國人交往。而中國人和西方人來往，則必須先學會據理力爭。蔣介石和居里的接觸，是他此生第一次和美國人密集交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他得到的對付西方人的所謂「心得」，卻是刻意強調，兩個民族間之所以會有嚴重的文化和心理上的差異，應歸因於他們不同的道德教育和童年教養。

總的來說，蔣介石和居里接觸後的觀感似乎負面多於正面。蔣介石固然也因此而增加了對史迪威和軍部的不滿，但似乎卻沒有在同時增加他對羅斯福的反感。他得到的印象是，許多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的態度，都不免輕視和居高臨下。而軍部也根本沒有把中國軍隊或是中國戰區放在眼裡[95]。這種感受只能更加激起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情緒，讓他更相信中國不會從美國人手裡得到公平待遇。這也說明了爲什麼蔣介石在和居里道別時再度強調說，租借法案的物資是美國人的資產，應該由美國人完全自由支配。蔣介石所以對居里說這些話，是因爲他相信中國對美國要求援助，只會引起美國人的嫌惡和侮辱而已。也正是因爲這個理由，讓蔣介石認爲，宋子文想以強求手段獲得更多美援，結果可能恰好相反，徒然招惹美國人的輕蔑和不耐[96]。

這個現象也讓我們可以重新認識，美國援助在中國領袖心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以及其對中美同盟關係的影響。照常理判斷，中國當然需要美國援助，否則抗戰將難以維持。可是對於那些不信任中國政府抗日戰志的部分美國人而言，無論中國政府如何誓言自己抗日的決心，他們老早就認定它是只想從美國騙取金錢與武器，而絕不會用它去認真作戰。另一方面，中國領袖們面對美國不願意慷慨援助的冷酷事實時，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又讓他們不能忍受中國必須以乞求方式獲得美國援助的羞辱。在這兩個考慮之間，中國領袖始終無法找到平衡點，因此他們的表面行爲總是不斷地向美國政府要求援助，而內心深處卻是深以這個行爲爲恥。從蔣介石對宋子文的多次指示和對居里公開表態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矛盾心理。他和宋美齡之間許多私人信件，也對彼此表達同一想法，一致認爲，中國切不可低聲下氣地請求美國援助，因爲中國的國格和蔣介石個人的尊嚴必須予以維護[97]。或許是正因爲這些複雜感情因素，讓中國政府對美援的要求，看來是失之缺乏彈性或是過於理直氣壯，而另一方面，美國軍部的執意不願援助，又更使中國的要求看起來似乎是不近情理和不識時務。

---

95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8日。

96　同上，1942年8月6日。

97　蔣介石宋美齡書信1942-43年份，《革命文獻拓影》，第37冊，頁70-103。

把這種複雜心情表現得最清楚的，或許是宋美齡在1942年11月下旬抵達美國後不久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她這樣寫道：

> 自抵美後，綜合各方報告，及妹個人觀察，詳細分析，對於歐美對我無眞正誠意之印象，更覺加強。基本觀念為忌我自強，故對我之援助，除必要者，均以表面敷衍。美軍日臻強盛，則賴我之心理必日趨薄弱……尤其令人感覺矛盾者，即美國人種混雜，但對種族血統歧視觀念甚深……妹將來與美國當局作談話時，惟有取十二分誠意，在平等互惠原則下，曉諭中美之利益，此雖為妹在美時深願完成者，但我在彼等心目中，只為伸手索物者。此兄定已諒察。無論如何，妹抵美宗旨以代表社稷及兄，當盡力為之，惟決不肯失國家及兄之尊嚴……[98]

假如中國領袖中有所謂「親美派」存在的話，宋美齡必然名列榜首。但是從以上所引話中可以清楚看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和對中國請求援助的鄙夷，是深深刺痛她心靈的兩件大事。她的話充分反映了蔣氏夫婦的心態。

## 三、父子關係的比喻

在實質事務之外，居里還作了一件令人無法理解，而又嚴重刺傷中國人自尊的事情。那就是，在居里剛抵重慶時(7月22日)，他已經急不及待地告訴蔣介石，一般美國人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孩童，而美國是一個父親。在這種關係下，如果中國在還不能證明自己已經長大成人之前，就希望父親能夠拋棄帶有呵護和優越感的態度，而把他當作成年人一般對待，那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99]。等到居里訪華行程結束前夕，他似乎想肯定自己確曾給中國人留下一些可供反覆回味而又受惠無窮的名言，於是再度引用父子關係比喻來闡述中美兩國間的關係。居里認爲中國急迫地追求盟邦平等待遇的努力，其實時間尚未成熟，他反過來勸導中國，一定要努力表現出自己的能力，然後去向父親(美國)證明，孩子現在已經可以值得平等待遇了[100]。

學者們盡可以花精力去辯論居里說此話的動機，但是不可以規避這番話的內涵。

---

98 宋美齡致蔣介石電，1942年12月無日期，《革命文獻拓影》，第37冊，頁65-66。
99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2日，《革命文獻拓影》，第34冊，頁28-37。
100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8月6日，《革命文獻拓影》，第34冊，頁140-145。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純是居里個人的奇談怪論，無庸深究。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它是一位總統特使所能夠說出的最愚蠢的話。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衷心把中國當成朋友，而作出的最確切的肺腑之言。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居里正確地敘述了當時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觀感，也間接地說明了當時美國官方流行的態度的確其來有自。從羅斯福、摩根韜認爲用金錢可以買中國士兵去打仗，到所有政府領袖們一致認爲，中國人必定接受盟邦把他們排除在同盟國高層會議之外，而又樂意且溫順地接受美國人指揮中國軍隊，最後到史迪威對中國官員們的頤指氣使和嘲諷怒罵，都可以從居里的這個敘述中找到文化和心理的根源所在。

正確的答案究竟是什麼，我們無法在此確言。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事實是，這些話傳達給中國人的印象是，美國人種族上的優越感、文化上的倨傲感、個人層次上的冷漠無情，和政治軍事領域中的狂妄無禮。當時的場景是，美國總統一位年輕的助理，正在給一位年長的中國國家元首訓話。回顧羅斯福總統交付給居里訪華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向蔣介石保證，同盟國對中國絕對沒有種族歧視的心態，但是居里這些語言對蔣介石的殺傷力，實在難以估計。居里的話也說明了，爲什麼他的訪問本來是一個號稱友好的表示，最終卻不免讓蔣介石感到氣憤難平。

## 四、蔣介石的綜合印象

蔣介石在居里離華之後(8月7日)，對居里的訪問作了一個總結。依照他的感受，他認爲居里初抵重慶時，態度傲慢，語帶威脅，以爲在對中國施惠，而他自己(蔣介石)則堅守立場，毫不讓步。等到居里態度開始軟化之後，蔣介石也相應地緩和了自己的態度。但是蔣介石依然不忘對羅斯福總統表示感謝，認爲後者幫助中國得到四強的地位，必須被中國人銘記在心。蔣介石也坦白告訴居里，如果美國不是同盟國領袖的話，中國就不會參加同盟國組織。他並且說，四強的地位不但沒有讓中國沾沾自喜，反而不時提醒中國自己是一個弱國[101]。因此，總的來說，在此後歲月裡，蔣介石對於羅斯福個人所表達的善意的感激之情，已經變成維繫兩國戰時同盟關係最有效的黏著劑了。

至於蔣介石對居里訪華的總評價，他自認爲他得到的教訓是，國際關係的基礎是權勢和利益，而不是道德或正義。令他深感痛苦的是，美國一方面以爲是對中國施惠，另一方面卻又對中國表示鄙夷。這個印象讓蔣介石相信，中國唯一能夠得到尊重和平等的希望，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增強國力。總而言之，蔣介石對居里訪華兩周的形容是，

101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7日。

充滿緊張和全神貫注。因此居里的離華，使他大大地鬆了一口氣[102]。

居里訪華對於開闊蔣介石對國際事務和中美同盟關係的視野，至少產生了兩個啓示。一個啓示是國際關係離不開權勢和利益。作爲一個國家領袖，蔣介石其實早就領悟了這個道理，只是在此之前，他只把它應用在其他國家身上，而不包括美國。經過和居里接觸之後，蔣介石似乎開始把這個道理也應用到美國政府中的某些部門，但是依然不包括羅斯福總統本人。在此後兩年中，蔣介石在面對盟邦關於緬甸戰爭的籌劃準備過程中(**見本書第七、八章**)，一直沒有忘記這個道理，對美國軍方採取了強硬的立場。雖然因此而遭受美國軍方嚴厲指責，並導致中美關係數度陷於緊張，但是他還是盡量地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另一個啓示是國力是外交的後盾。在此後兩年中，他也屢次強調這一點，並爲之痛心疾首，但卻始終未能找到一條有效途徑，幫助他達成提升國力的目標。這也暴露了蔣介石在政治智慧和組織能力上重大的弱點。

至於居里訪華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雖然相當有限，但是它卻給予讀者們一些重要的思考空間，能夠增長我們對美國對華外交政策運作的了解。首先，它開創了一個行爲模式。大體而言，羅斯福總統在對華關係上，從珍珠港事件以來，一直默許軍方扮演主導地位。等到1942年6-7月間危機陡然爆發後，才在慌亂中收回部分控制權。其次，羅斯福處理危機的方式是派遣總統特使，首要目的是盡快緩和當前緊張局勢，進而希望達成實質協議。但是由於他賦予特使的任務，似乎只限於總統和特使之間的商議，並未徵求其他聯邦部門的參與和支持，因此特使的身分其實是個人代表而已，這對於政策的全面性和延續性，都難以達成預期的效果。第三，總統特使的個人聲望和政治實力非常重要，可以決定任務的成敗。設若此次總統特使是由霍普金斯擔任的話，那麼他和蔣介石達成的協議，最後被總統採納的成功率將會很高，而軍部的反對聲音也可能會很小。但是居里在白宮權力結構中仍只是一位後進，雖然其才華逐漸受到總統賞識，但是尚非舉足輕重的人物，難怪他雖然以恭謙態度對馬歇爾提出建議，但後者完全不加理睬，而聯邦政府其他部門，對於他的報告內容也沒有給予重視。儘管他對中國政府和領袖的認識自有其見地，但終究人微言輕，不能發生作用。這的確讓美國政府喪失了一個可以及早認真檢討對華政策的機會，因爲危機感一旦消失之後，羅斯福又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具迫切感的事物上去，軍部又重新掌握中美同盟關係的主軸。這麼看來，宋子文對霍普金斯和居里兩人政治份量的估計可謂相當精準，但是他終究也無法改變複雜的美國政情。

---

102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7日。

# 第七章

# 計畫第二次緬甸戰爭：1942年6月-1943年6月

在整個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史上，收復緬甸的工作給雙方領袖，在技術和政治兩個層面上帶來了最嚴峻考驗。史迪威的思路非常明確：中國的戰略價值，在於它能協助同盟國軍隊向日本派駐亞洲大陸的占領軍進行總反攻，並在戰爭最後階段向日本本土進行總反攻。要達成這個任務，僅是依靠美國在華空軍力量顯然不足；中國必須加強其陸軍力量，而方法則是補足士兵空缺，加強訓練，提供現代化裝備，和指派具有卓越領導才能的指揮官。中國要想要實現這些目標，就必須接受充足的美國軍事援助，而這些援助又必須經過緬甸才能運抵中國國境。因此，收復緬甸就成爲同盟國從亞洲大陸實行總反攻的先決條件，同時它也能決定中國戰區本身的重要性是否存在。史迪威根據這個理路，計畫和執行收復緬甸，認爲這是他在中國服務時期最大的成就，美國軍部和後世美國學者也都接受了他這個自我評價。

史迪威不但自認爲是第二次緬甸戰爭的原始策劃人，也是戰爭最積極的推動者[1]。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從來就不想積極地在緬甸使用中國部隊作戰。因此他必須幫助中國政府去認識其國家利益之所在，並且督促它努力推行作戰計畫[2]。史迪威對這項工作的認識，在一封以「糞堆」爲題寫給妻子的信中，說得最爲透徹。他寫道：

> 這是我做過的最令人心煩的工作。我需要去啟發和影響一個頑固、無知、充滿偏見和自大的獨裁者。而除了我之外，從來沒有人敢跟他講

1 Tuchman, p. 408. See also: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81-82, 177-178.

2 Tuchman, p. 394.

> 過老實話，而他即使是聽了，也不能相信我說的是真的。人們指望我光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改變這個國家苟且偷安的心理，而且靠許願和說好話的方法去讓情勢看起來欣欣向榮。這可真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我現在只好採取各種方法去試著做，等到我試完了之後，我就會告訴他們。到那時，他們就非得採取行動不可了[3]。

上文所引及其他類似的話，在史學著作中曾被廣泛引用過，目的就在證明史迪威如何具有遠見，能夠看出緬甸戰爭對於中國戰區的生存和戰略價值有極大重要性。這些著作同時也批評蔣介石剛愎自用、固執拒諫，並處心積慮阻擾史迪威重開緬甸戰局的各種努力。也有著作猜測蔣介石所以最後接受史迪威的計畫，並且答應派兵開赴緬甸戰場，只不過是順水人情，因爲他始終認爲來自英國的反對將使戰爭永遠無法展開[4]。另有一個頗爲流行的看法是：美國人的壓力最終迫使蔣介石勉強同意參加戰爭。在他們看來，儘管中國許多將領是貪腐無能之輩，但是史迪威最終還是有效地領導中國士兵們打敗日本。緬甸戰爭有力地證明史迪威是一位才華出眾的美國將領，他排除蔣介石多方阻擾，終於把一支原本紀律散漫鬥志低落的部隊，脫胎換骨地變成一支優秀的作戰部隊。這樣，美國軍方在太平洋開戰初期所持的構想，即：美國人提供將才指揮，中國人提供兵源作戰的模式，得到了最好的成果。

不幸的是，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既不考慮中國觀點，也不研讀中方資料，它們一切的論點都可以在史迪威的文檔中找到根據，無需他求。再者，對於許多與緬甸戰爭的準備工作和實際執行有關的問題，只要其內容不符合這些著作者先入之見時，便寧可不予正視。然而對於本書讀者而言，真正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先下結論(或是先決定史迪威和蔣介石二人的功過)，然後去搜求支持該結論的史料，而是去提出一些必須正視的問題，然後由史料來解答。本書的目的是提出相關問題，它們應該包括：蔣介石真的對第二次緬甸戰爭毫無興趣嗎？美國真是一直支持第二次緬甸戰爭，而且盡其所能提供作戰所需人力物力資源嗎？哪些因素影響了中國政府決策？我們應該如何去衡量此次緬甸戰爭的戰略及戰術的含義？戰爭是否達到原定的目標，使更多的軍用物資運往中國？更有進者，鑒於中國當時正遭受日軍規模空前浩大的攻勢(一號作戰)，緬甸戰爭使得中國兵力分散而付出沉重的軍事和政治代價，此舉是否值得？史迪威全神貫注在緬甸，從而忽略中國其他問題，這種做法是否合理？

---

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July 10, 1942, p. 108. Tuchman, p. 394.

4 Tuchman, p. 409.

如果我們想要全面地探討第二次緬甸戰爭在太平洋戰爭中的重要性，以及中美兩國政府決策的本質，那麼以上所提出的問題都無法規避。與前此各章相同，以下三章將重新檢視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歷史，其目的並非想提出一個所謂的「中國觀點」，去杯葛長期存在的「美國觀點」，而是提供一個更爲持平的「學術觀點」。針對這一段中美關係重要時期的歷史，學術界形成了所謂的「美國觀點」，那已經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如果因此而推出一個「中國觀點」與之針鋒相對，則只能產生走上同樣偏頗道路的危險。因此，本書不但大量介紹新的中方資料，同時也小心檢視過去研究者所引用的英文資料是否恰當和充分，務使我們對歷史的了解能夠回歸學術本位。

## 壹、早期作戰計畫

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場失敗，固然嚴重破壞了史迪威和蔣介石兩人間的合作關係，但是並沒有改變蔣介石的基本信念，那就是，中國必須發動一場新的緬甸戰爭，以便重建它與西方盟邦的聯繫。事實上，蔣介石在第一次緬甸戰爭尚未結束時，就已經著手籌劃下一個緬甸戰爭了。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同意派遣十萬名士兵到印度受訓。早在5月中旬，宋子文就已經開始敦促蔣介石，盡快擬定收復緬甸仰光的計畫，並希望能在1942年底前付諸實行。宋子文更進一步建議，蔣介石應主動催促羅斯福及邱吉爾兩位領袖，責成史迪威與衛佛爾盡早提出第二次緬甸戰爭的作戰方案[5]。換句話說，當史迪威仍然在穿越緬甸郊野，企圖向印度方向逃生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思考如何收復緬甸了[6]。

當然史迪威也想要有第二次緬甸戰爭。事實上，第一次戰爭的失敗，可能已在他心中產生要打第二次戰爭的強烈個人願望[7]。1942年7月10日，史迪威擬好計畫書，並在7月19日呈交蔣介石[8]。史迪威的計畫包括三個要點：1. 它指望美國軍部能夠提出承諾，開戰後六個月裡，每個月運送三萬噸物資進入仰光，以穩住局面，俾使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的物資得以源源不絕且益加充裕；2. 爲達成此目的，英國必須提供充足的海軍力量控制孟加拉灣，由仰光登陸攻入緬甸南部，而在印度的英軍也同時從西部向

5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5月15日。

6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4日。

7　Tuchman, pp. 366-367.

8　Stilwell's "Plan for re-taking Burma", July 10,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21. 又見：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9日，《戰時外交》（一），頁662-667。

曼德勒進攻；3. 中國提供20個師的兵力從緬甸東部向曼德勒進攻。計畫也要求英美兩國提供強大空中支援[9]。簡言之，史迪威的作戰設想是東、西、南三路同時進攻，海陸空軍協同作戰，收復仰光，切斷日軍後援。計畫要求英國在收復仰光之前占領安達曼群島。

如第五章所述，史迪威自己對他提出緬甸作戰計畫動機的剖析，聽來頗爲有趣。由於三項要求事件剛剛使中美關係陷入僵局，因此史迪威認爲作戰計畫提出的時機是給蔣介石一個下臺階，補救後者在三項要求中所犯的錯誤，提供他改善與美國軍部關係的好藉口[10]。事實上，史迪威這個解說是他自己想像力過於豐富所致，因爲他完全忽略當時中國收復仰光的急迫心情，也不了解蔣介石對三項要求的態度，所以只是史迪威他自己的一廂情願和自說自話而已。史迪威所以脫離現實如此之遠，或許是由於蔣介石對他的冷落已延續將近一個月之久。從這一段時間以及後來居里和蔣介石多次會談中不難看出，中國政府其實極希望重啓緬甸戰局，只是不歡迎史迪威重掌中國遠征軍的指揮權罷了。

還有一點應該要記得的是，史迪威所擬計畫，要遲至7月26日才第一次成爲居里和蔣介石之間的討論題目，當時史迪威尚未獲准在蔣介石面前出現。蔣介石在沒有聽到史迪威本人一詞一字之前，即明白表示中國準備參加戰鬥，並提供21個師參戰，希望三個月內得到500架飛機及每月5,000噸物資的援助[11]。蔣介石如此迅速提供具體參戰兵力的承諾，表示他早已對未來的戰爭進行過深度思考。中方資料顯示，中國政府熱烈接受居里傳來的史迪威作戰計畫，是因爲計畫內容與他們的思路相同。因此他們儘管對史迪威本人極度厭憎，卻高興聽到居里終於把緬甸戰爭列入中美兩國談判的話題，因爲這正是他們數月來所希望能夠實現的計畫。

在談話中，居里本人雖然也承認緬甸戰爭必須得到充分空軍支援才對，但是仍然辯稱美國沒有能力在三個月內運送500架飛機到中國。但是蔣介石直率指出，問題的根源是軍部對於此次緬甸戰爭並不熱心[12]。顯然，在僅僅四個月裡，蔣介石的行爲已經發生重大改變。1942年初，蔣介石全神貫注地要求英國盡快允許中國軍隊入緬作

9 "Memorandum for the Generalissimo", July 18, 1942, from Joseph W. Stilwell, Lieut. General, USA Commanding,《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7冊，第007號檔案夾。

1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July 19, 1942, p. 109. Tuchman, p. 408. Memo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July 30, 1942, and his own writing entitled "What is Future of China War Theater?", all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77-179.

11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6-661。

12 同上。

戰，以致並未要求美國預先承諾任何條件。他原先天真的假設是，所有同盟國當然會各盡所能地參加作戰。但是四個月後，蔣介石已經學到教訓，需要把盟邦間合作條件和具體責任精確列舉出來，並擬出工作進度表等等。蔣介石這些行爲上的改變，說明他終於從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失敗中吸取到痛苦教訓，特別是英國曾經答應過的空中支援從來沒有出現，致使中國地面部隊屢受重創[13]。蔣介石於是告訴居里說，中國在下次緬甸戰爭時必須要有充分空中支援，否則中國軍隊沒有理由再作無謂犧牲[14]。在本書以下幾章敘述同盟國在第二次緬甸戰爭的談判過程中，每當蔣介石堅持他的參戰立場時，其內心的動機多出於他發誓再也不要陷入同樣的圈套所致。

## 貳、最初構想：英美承諾和中國立場

蔣介石與居里就緬甸戰爭達成原則性協議之後，終於准許史迪威出席8月3日的會談並報告戰爭計畫的細節。在會談中，史迪威發誓定要收復緬甸，蔣介石也重申這是同盟國唯一可以洗刷戰敗恥辱的機會。會談結束時，合作的精神似乎又重新恢復[15]。

### 一、蔣介石開始行動

一旦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決定已下，蔣介石的認真度似乎與日俱增。他親自圈定參戰的精銳部隊[16]，指示何應欽務須在1942年底以前完成參戰各部隊的器械補充及人員補足[17]。針對美國而言，蔣介石不再堅持三個月內必須有500架飛機的要求，而只要求美國盡速達到500架飛機及每月5,000噸的目標。他甚至表示，中國願意派遣更多部隊前赴印度接受訓練及裝備[18]。宋子文對戰爭表現得同樣積極：他接受蔣介石的看法，認爲中國應該盡一切力量去參加作戰。他還主動承諾，要在華盛頓盡全力促成緬甸作戰[19]。

---

13　同上。

14　同上。

15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8月3日，《戰時外交》（一），頁685-687。本記錄的英文版本，和史迪威的言論，見：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For an official American military's account of the discussion, see: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81-182.

16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181-182. 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16日。

17　蔣介石日記，1942年10月17日。

18　Memorandum from Currie to Admiral Leahy, August 26,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19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2年8月29日，《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第14冊，領導對日抗戰—遠征入緬》，#31030399。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決定第二次緬甸作戰目標後，準備工作隨即展開。按照中國政府的理解，史迪威已經代表美國政府作出參戰表態，而美國政府也將會負起說服英國參戰的責任。因此早在英美兩國政府對緬甸戰爭作出任何正式承諾之前，中國政府已經採取具體行動進行準備工作了。

## 二、盟邦好整以暇的反應

和中國的「一頭熱」對比，美國表現冷淡，其原因是緬甸地區在美國全球化宏觀戰略中所占地位很低。故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一直要等到8月25日才首度探討緬甸收復的問題。更有甚者，他們有此行動並不是出自軍部主動，而是因爲美國總統徵詢他們對緬甸的意見和提出建議，迫使他們不得不作出回應[20]。難怪當馬歇爾將軍向其他參謀長們徵詢意見時，只有李海海軍上將一人說了一些空泛的話，其內容是他轉述了一位中國駐華盛頓代表最近向他保證，假如英美兩國都能通力合作的話，那麼緬甸路應該容易打通。李海將軍個人的意見則是，英美兩國都應該努力幫助中國繼續抗戰，因爲這樣符合英美利益[21]。其他參謀長或是說得更少，或是根本無話可說。他們的被動心態由此表露無遺。

事實上，美國軍部此時完全無法肯定，美國本身及英國對第二次緬甸戰爭將會作出何種承諾。9月1日，馬歇爾告訴史迪威說：「我不知道英國人此時是否能夠從印度動員足夠的軍隊。你在這方面的訊息比我的更可靠。」又說：「鑒於當前海運的形勢，美國能夠提供的僅是空軍而已，至於陸軍則似不可能。」[22]正因爲這些理由，所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拖到9月中旬，才初步著手第二次緬甸作戰的思考[23]。

果不其然，英國人有自己的想法。9月18日，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上提議把緬甸問題列爲議題時，英國的迪爾(John G. Dill, 英國駐華盛頓軍事代表團團長)元帥當即宣稱，衛佛爾將軍正在草擬他自己的緬甸計畫，其最終目的，只是要在1942年底或是1943年初，占領仰光西部的阿恰布(Akyab)港。迪爾元帥同時警告美國人，千萬不可將衛佛爾的計畫向中國人透露。他又強調，計畫中的第二次緬

20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August 26,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21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JCS 30th Meeting(August 25, 1942). Xerox File 1537, Folder 3, MFA.

22 Marshall message to Stilwell, September 1,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5, Folder 176.

23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JCS 33rd Meeting(September 15, 1942). Xerox File 1537, Folder 3, MFA.

甸戰爭和美國構想中的太平洋作戰密切關聯，目的在分散日軍兵力[24]。換句話說，即使英美參謀人員還沒有開始共同擬訂第二次緬甸作戰計畫之前，迪爾元帥已經強調，下一次緬甸戰爭作戰的時機，必須和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行動密切配合，幾乎完全不提中國急迫需要從緬甸運送更多的物資進入中國的需要。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會看到，開戰的時機問題最後將成爲同盟國軍事領袖最重要的關懷。

## 三、史迪威的反應和努力

英美兩國軍事領袖們對第二次緬甸作戰計畫的這種冷漠和慢條斯理的態度，當然令史迪威感到極爲沮喪。史迪威怨氣沖天地告訴馬歇爾說：根據他的觀察，

> 英國人只把目光擺在中東和日本對印度沒有當前的威脅的這個問題上，他們其實並不真正關切緬甸。衛佛爾對於緬甸攻勢只不過是泛泛而談，但是沒有具體的部隊和日期……英國人並不特別願意從海上進攻仰光，即使這是最好的辦法。衛佛爾不願意參加一個聯合作戰來收復緬甸。

事實擺得很明顯，到此時爲止，只有中國政府承諾提供21個師的兵力參加計畫中的所謂聯合作戰，而史迪威也承認蔣介石的承諾出自誠心誠意[25]。

史迪威對英美兩國軍方的怨氣，還可以從他自己的話中(9月27日)看出：「參加緬甸作戰的部隊只包括在蘭伽的(中國)部隊、(美國)空軍第10大隊、在雲南的(中國)部隊，和一小支英國部隊。換言之，這些本來就是我們已經掌握的部隊。多麼大方！哦！對了，(美國)軍部作戰科還會派一個專人來指導我們怎麼打仗。」[26]準確地說，史迪威這種嬉笑怒罵的態度表示，此時聯合作戰所構想的三個合作伙伴中，有兩個根本尚未明確表態。

美國軍部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悠閒懶散態度，不久也引起了居里的警覺。當他察覺到軍部的收復緬甸作戰計畫，似乎完全依賴英國和中國地面部隊再加上美國空軍

---

24 Supplementary Minutes, CCS 40th Meeting, September 18, 1942, Xerox File 1539, Part 3. MFA.

25 Stilwell cable to Marshall, undated but in reply to Marshall's cable of September 1,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5, Folder 176.

2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September 27, 1942, pp. 128-120. Not included in JWS t-w diaries.

時，他急忙寫信告訴馬歇爾(9月23日)說：「委員長和史迪威將軍兩個人都強烈地相信，只有美國地面部隊(參戰)才能激發英國人。」[27]居里同時還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軍部甚至也沒有擬出任何以物資去補給中國遠征軍的具體計畫。軍部只是輕描淡寫地通知中國政府說，中國軍隊將會從目前囤積在印度的租借法案物資中得到適當的裝備，但是不肯作出明確的承諾數字。

史迪威原先自以爲聰明，把蔣介石、美國軍部和英國拉進一個共同作戰計畫，但首先就遭到華盛頓上司們迎頭潑來一盆冷水，這實在是他未曾意料到的發展。居里也感受到同樣壓力，不得不主動作出努力，以避免第二次緬甸戰爭計畫胎死腹中。雖然他明明知道，史迪威的本意是以美國派遣陸軍參戰去鼓動英國參戰，但他現在卻被迫改爲向馬歇爾建議，先把精力放在慫恿中國參戰和美國空軍參戰的工作上。至於有關「美國部隊的最後運用」一事，則拖到以後再談[28]。換句話說，至少在目前，居里替馬歇爾想出了一個妙計，那就是分散中國人的注意力，不要把中國參戰和英美兩國參戰的承諾連接在一起。

此時，史迪威自己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構想也逐漸具體化。根據漢德(Thomas T. Handy, 軍部作戰部主管)將軍在10月1日所作的摘要敘述，史迪威的作戰計畫有下述要點：

> 英國、美國和中國軍隊從阿薩姆(Assam, 印度)向緬甸進攻；中國軍隊從雲南向緬甸進攻，中國軍隊同時從雲南向中南半島及廣州方向佯攻；為了配合這些攻勢，同時應該從澳洲向新幾內亞(New Guinea)及新不列顛(New Britain)進攻，而美國海軍也應該在西太平洋及西南太平洋地區，進行總攻擊以圖切斷日本的海上交通線[29]。

與此對照，英國此時擬就的緬甸作戰計畫卻與史迪威大不相同。根據漢德將軍的敘述，

---

27 Letter from Lauchlin Currie,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to General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U.S. Army, September 23,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28 Currie memo to Marshall, September 23,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1.

29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Marshall, from Thos. T. Handy, Major General,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October 1, 1942.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Photoprint File 73, Item 312. MFA.

> 英國的計畫是用11個師的兵力來收復緬甸。以對仰光和緬甸南部為主攻，以從印度北部向緬甸北部的陸上攻擊為佯攻。本計畫的設想是英國海軍可以控制孟加拉(Bengal)海灣(如果能夠得到美國海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助攻的話)，及戰鬥機可以在阿恰布(Akyab)建立基地的話。英國的計畫沒有提到中國軍隊的協助；事實上，英國人的立場是他們不預備把這些仍在醞釀中的計畫告訴中國人，因為後者保持秘密的能力太低[30]。

到1942年10月上旬，英美兩國的具體作戰計畫都還沒有成形。雖然史迪威非常希望能夠按照他和蔣介石達成的共識進行，但是英國人卻希望史迪威能夠把美國空軍第10大隊(除了援助中國的部分之外)的指揮權交給英國人行使，以便進行他們自己的作戰計畫。英國人更進一步要求，凡是在緬甸作戰的部隊應該一律交由英國人指揮，並且英國人應該有全權決定是否邀請中國軍隊參加緬甸戰爭。可以想像的，這個計畫馬上引起美國參謀人員的焦慮。原因是：1. 他們擔心英國人的計畫會妨礙美國想利用緬甸通道增加對中國運送物資的打算；2. 他們認爲應該至少賦予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的一部分任務，並且至少也應該向中國政府透露英國計畫的一小部分；3. 他們擔心，如果美國從中國撤走空軍第10大隊一部分飛機，而把它們轉交給英國人用在他們自己的緬甸戰爭的話，會引起蔣介石強烈的反對。因此，美國軍部指示史迪威就近和衛佛爾商量解決這些分歧[31]。

## 四、英美同意在1943年3月開戰，以及蔣介石的反應

經過艱苦的談判後，一直要等到11月3日，史迪威才能夠通知蔣介石說，他終於和衛佛爾達成了共識。共識的要點是：戰爭必須至1943年3月1日才能開啓；英國－緬甸－印度將出兵7個師，中國將以在雲南及在印度的兩支部隊同時參加戰鬥。雖然海軍在孟加拉海灣的作戰，還需要等待英國最後決定是否付諸實行，但是史迪威向蔣介石保證，英國在印度洋有大量海軍力量，因此海上攻擊行動勢在必行[32]。

儘管英美軍方的這個首次「共識」，已經是蔣介石和史迪威提出第二次緬甸戰爭

---

30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Marshall, from Thos. T. Handy, Major General,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October 1, 1942.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Photoprint File 73, Item 312. MFA.

31 Ibid.

32 蔣介石日記，1942年11月3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11月3日。

計畫約四個月之後才終於達成，而且具體實施的日期還要再往後推延四個月，但是蔣介石對英美兩國終於表態同意參加緬甸戰爭，仍然表示歡迎，並且出乎史迪威意料，他主動提出要幫助史迪威展開工作，包括授予史迪威對於中國在印度及雲南部隊的全部指揮掌控權。蔣介石同時承諾在1943年2月15日以前，把駐紮在雲南部隊的空缺補滿，以及把中國所有的砲兵單位全數配備給在雲南的部隊[33]。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慷慨大爲感動，令他禁不住懷疑：「一定發生了什麼事。假如他們說的是認真的話，那就太好了。這是我們跨過的最大的一步。」[34]根據中方資料顯示，史迪威所謂的「什麼事」不是來自中國國內或是國外的壓力，而單純是蔣介石內心的決定，正確表現出他當時對第二次緬甸戰爭的積極心情。不幸的是，蔣介石這種對緬甸戰爭自發自動的熱情，雖然大大超過了英美盟邦所表現的，但是卻不符合學術界歷來所持的基調，因此很少被提到。

但是蔣介石也明白告訴史迪威，開戰成敗繫於英國對制空權和控制孟加拉海灣的承諾。史迪威表示「完全同意」蔣介石的評估，並且補充說，全球所有戰區在進行戰鬥時，都必須有海空支援才對[35]。我們也必須記得，蔣介石除了應付盟邦之外，還需要面對國內的政治壓力。他曾經對他自己的部屬作過承諾，下次緬甸作戰時必定會有海空軍支援，而他必須履行這個承諾。此外，在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之後，國內對他的批評和對他聲望的打擊，雖然還沒有表面化，但是已經使蔣介石警覺到，千萬不可重複同樣錯誤。事實上，雖然史迪威與衛佛爾之間的協議讓蔣介石感到鼓舞，他依然從部屬群中聽到不少反對意見，甚至兩大軍事部門的首長何應欽和徐永昌都不苟同[36]。但是蔣介石依然否決了他們的意見，並訓令國軍將領對於作戰計畫的細節必須給予最高關注[37]。

與此同時，林蔚將軍和中國參謀總部的成員也與史迪威舉行會談(11月10日)，並告知史迪威，中國亟望在1943年春季如期開戰，並承諾在開戰前完成所有部隊的作戰準備。他們也清楚申明，鑒於日軍在緬甸戰場可以動員的兵力，可能包括11到16個步兵師團和1,000架飛機，因此中國軍隊在地面的進攻一定要有海空軍支援。當史迪威對於戰鬥中指揮權的安排表示關心時，林蔚當場毫不遲疑地提出，可以由衛佛爾將軍通盤指揮緬甸戰場上的中國軍隊。爲了消除英國人對中國軍隊在緬甸境內作戰的任何疑

33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3, 1942.

3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3, 1942, p. 139.

35 蔣介石與史迪威會談記錄，1942年11月3日，《戰時外交》(三)，頁618-626。

36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2年11月8日。

37 同上，1942年11月16日。

慮，他更明白宣示，中國對緬甸絕無領土野心。

史迪威的回應是向中國人保證，「關於海軍協同作戰一事，我認爲在近期內同盟國在北非的勝利打開了地中海之後，英國人可以派遣主力艦到孟加拉海灣，而英國也可以增加在這個地區的空軍。」[38]總括來說，中美雙方的軍事人員對於下一個緬甸戰爭的共識似乎已經日趨具體化。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在8月初和居里、史迪威兩人達成關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的協議之後不久，便開始把注意力放在改正中國軍隊的缺點上面，包括提高戰鬥精神和整頓紀律[39]，加強訓練和緊縮編制[40]，補充赴緬作戰部隊的人員空缺，甚至著手研究進攻緬甸的最佳路線等等[41]。11月初，蔣介石從印度召回羅卓英，指示他著手擬訂進攻緬甸的最後方案[42]。11月24日，蔣介石批准羅卓英所擬方案，27日作出開戰時允許美國派遣軍官到中國各個軍事單位的計畫，對於指揮系統作出更多安排，派邱清泉指揮在印度的中國部隊，並改派羅卓英指揮在雲南的中國部隊[43]。

12月，蔣介石命令在雲南的各師師長接受特別訓練，學習緬甸語言和如何與緬甸人民相處之道。爲賦予邱清泉更大的指揮權，蔣介石晉升他爲中將[44]。12月10日，他派陳誠將軍爲中國赴緬甸遠征軍總司令，28日又派羅卓英爲副總司令。在任命陳誠以後六天，蔣介石針對砲兵單位在緬甸的部署作出批示。他還與宋子文多次討論有關緬甸戰爭的準備工作，以及美國早先已經同意承擔的第二批30個師的訓練計畫[45]。

在催促中國將領們加緊準備緬甸戰爭的同時，蔣介石堅持英美兩國的海空軍必須也爲其承諾作好準備工作。蔣介石在11月12日明白表示，對中國而言，雲南的安全比緬甸的收復更爲重要[46]。言下之意，如果英美盟邦不能履行承諾，因而導致中國戰敗，則很可能會挑起日本進攻雲南，並直接威脅中國本身的生存[47]。中國對此無法接受。

---

38 Memorandum to General Stilwell from the C.G.S. Office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Council, entitled "Notes on Conversation held at General Stilwell's Residence on November 10, 1942", seven pag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older 15.

39 蔣介石日記，1942年8月9日。

40 同上，1942年8月13日。

41 同上，1942年10月13、17、21、31日。

42 同上，1942年11月5-7日。

43 同上，1942年11月24、27、29日。

44 同上，1942年12月2日。

45 蔣介石日記，1942年12月2、10、11、16、28日。

46 同上，1942年11月12日。

47 同上。

不難想像，史迪威對蔣介石這幾個月中的積極作爲倍感滿意。9月21日和蔣介石會談後，史迪威寫道：「他當場答應了所有的要求。他原來只肯送兩個師去印度。但是我們在蘭伽的成績說服了他。而且（在目前他）還只不過是看過照片而已。」[48] 10月14日，史迪威又寫道：「花生米要從10-15個師增加到15-20個師（到緬甸作戰）！一切看起來都不錯……花生米對我說，『在印度給你全權。一定要嚴格堅持紀律。』好吧。」[49]

史迪威注意到，蔣介石的積極態度也在其他中國將領身上流露出來。當史迪威提到他和中國將領的關係時，他寫道：「我相信我們現在有進展。」[50] 比如說，羅卓英對於蘭伽的訓練表現出極大興趣，而且想再送45,000名士兵到印度去受訓。「他簡直興奮極了」（9月16日）[51]。某次史迪威和一群中國將領開會，得到的印象是：「種下去的種子已經發芽了。許多以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現在都變成可能了。關於指揮的問題，他們看了委員長的建議後，劉斐說：『那就由你來指揮好了。』」[52] 陳誠的新職務也讓史迪威感到振奮。他信心十足地預言說：「陳誠在雲南享有全權，我們現在可以開動了。」[53] 史迪威和李宗仁將軍的會談也讓他滿意，因爲李宗仁對他又友善又稱讚。「所有的這些鳥兒們都決心要收復緬甸。四個月前，他們可不是這樣的。」[54] 12月6日，史迪威在和蔣介石的親信部屬談話之後寫道：「他們幾乎都在恭恭敬敬地聽我說話。」不但想要趕快行動，而且還表示要按照史迪威的意見去做[55]。總之，即便根據史迪威的觀察，中方的態度也和六個月前大不一樣了。

既有趣而又重要的是，史迪威感到，即使他的死對頭也改變了態度。比如說，史迪威發現何應欽比以前更爲合作，這讓史迪威既驚奇又高興。當他在9月28日把一份有關30個師的訓練計畫拿給何應欽時，他發現對方「非常友好」。何應欽對史迪威說：「任何時候你有任何問題，都請過來和我討論，我們可以很快地把問題當場解決。」史迪威描寫他的反應說：「我的天——這可能是真的嗎？說不定我們就應該這樣做事。」[56] 同樣，史迪威也察覺到，宋子文改善態度，顯得樂於合作[57]。在此後幾周中，

48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1, 1942.
49 Ibid., October 14, 1942.
50 Ibid., October 26, 1942.
51 Ibid., September 14, 16, 18, 21, 1942.
52 Ibid., November 10, 1942.
53 Ibid., November 18, 1942.
54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3, 1942.
55 Ibid., December 6, 1942.
56 Ibid., September 28, 1942.
57 Ibid., November 4, 7, 1942.

史迪威和宋子文會談的次數增加，會談的氣氛也更友好[58]。12月11日史迪威和蔣、宋會談後，更感到安心，因爲宋子文不但即刻接受史迪威的合作請求，而且支持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要求。正因爲他們兩個人合作，使得他們馬上得到結果：蔣介石同意讓史迪威行使指揮權，並把3月1日定爲緬甸開戰日[59]。史迪威在他自己不經意時所說的這些話，變成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那就是，蔣介石和他的將領們在這段時間裡，是如何以期待和熱烈的心態去迎接下一場緬甸戰爭。

而造成中國態度改變的一個決定性因素，應該是史迪威過去幾個月內在蘭伽訓練基地所展示出來的成績。一如史迪威所言，當中國領袖們最初僅僅是通過照片和影像所見，當即對蘭伽成績讚賞不已，後來派了高層人員去親自視察之後，更是毫無保留地肯定其眾多的優點。到此爲止，本書作者尚未能在中方資料中，發現任何對蘭伽訓練的批評保留之詞，只有眾口一聲的嘉許。蘭伽成績使得史迪威因爲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而破產的聲譽獲得恢復，重新燃起中國政府對他的信心，願意將中國將士的命運再度付託給他。當然，它也表現出中國政府（蔣介石）對於軍隊訓練改革的熱情。只是後者又和西方史學界的基調不能符合。他們寧可不去參考中方資料，因而努力說服自己，蘭伽是史迪威獨力創造的成績，而蔣介石的態度若非橫加阻擾，就是無法領會它的價值。這種預設的立場對於了解史實並無裨益（關於這一點本書將在結論一章中再予申論）。

## 叁、同盟國開始從承諾中退縮

### 一、英國興趣降低的先兆

相對中國的高昂情緒，英國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態度讓史迪威產生很大的憂慮。早在9月30日，史迪威已經抱怨：「英國有不合作的跡象。打電報向馬歇爾報告……那些雜種們還是可能破壞我們的計畫的。」[60]等到10月9日，他已經壓抑不住滿腔怒火，於是說道：「那些不切實際的英國佬，將要反對蘭伽的增兵計畫。這些可憐的笨蛋。他們的做法只是會破壞整個計畫。寫了一封火爆的電報向馬歇爾求救。」[61]他和衛佛爾10月17日的會談結果更是令他灰心。史迪威如此形容衛佛爾：

58 Ibid., month of November, 1942.
59 Ibid., December 11, 1942.
60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30, 1942.
61 Ibid., October 9, 1942.

> 一大堆胡說八道，抱怨這，抱怨那。他清楚地說，我們在此不受歡迎。舉出各種困難(作為藉口)——鐵路、公路、水運、糧食、運輸，等等。(抱怨緬甸戰爭)會拖延印度軍隊的發展。假如我們拿到卡車，他們就會減少能夠得到的物資……我們終於讓他們露出了本色。他們就是不想要讓中國軍隊參加收復緬甸的戰爭。如此而已[62]。

衛佛爾還坦白承認他不歡迎中國士兵到印度受訓。史迪威寫道：「(衛佛爾的託詞是印度)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中國士兵)，沒有交通工具，沒有補給品，或是任何東西……(英國人)一般態度反對中國人。但是，衛佛爾卻想要把我們的空軍置於他的指揮之下。」[63]

10月初，美國國務院官員戴維斯(John P. Davies, Jr.)從華盛頓帶回來的消息，更令史迪威沮喪不已。他感嘆地說：「這個戰區已經完蛋了。沒有援助會到來……總的來說，非常讓人沮喪。」他還寫道：「中緬印戰區沒有什麼希望。(同盟國)主要的戰略目標在其他的地方。只是讓我們靠自己的資源活下去。」[64] 在本章前文(貳-四)曾經提到，史迪威在11月3日向蔣介石報告他和衛佛爾所達成的「共識」。但是在中方追問之下，史迪威不得不向宋子文及何應欽承認，英國在未來的緬甸戰爭中，不願意保證能夠控制孟加拉海灣。即便如此，他還是催促中國人繼續進行他們自己的準備工作，仍舊以1943年3月1日爲開戰目標日。想不到的是，才過了三天(11月8日)，當史迪威見到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蘇馬維爾(James Somerville)上將，問他1943年3月可以有什麼艦隊實力時，這位英國司令官卻不願意作出任何承諾，也不願意說明他對孟加拉海灣究竟能夠控制多少。這些情形使得英美參謀人員，不得不把原先已經決定的第二次緬甸戰爭開戰時間再度延後，甚至不排除取消整個戰爭的可能性[65]。即使是史迪威，也迫於情勢而只好開始修改他原來第二次緬甸戰役計畫的一些重要部分。

當然，史迪威決定不把英國海軍司令的話據實轉告蔣介石。正好相反的是，當美國面對英國態度反覆時，其處理方式是向蔣介石提供錯誤印象，讓後者以爲推遲開戰對中國更爲有利。爲了達到這個效果，羅斯福在11月21日致蔣介石的電文中，再三強

62 Ibid., October 17, 1942.

63 Ibid., October 18. 1942.

64 JWS t-w diaries, October 2-3, 1942.

65 Cable from Stilwell to Wavell, November 8, 1942; cable from Wavell to Stilwell, November 16, 1942; both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46.

調，同盟國在法屬西非和北非的攻擊目的，是取得對整個地中海南岸的控制權。一旦成功，就可以從印度運送更多的武器進入中國。羅斯福甚至想誘導蔣介石相信，北非的勝利可以改變整個世界大戰的形勢[66]。因此中國應該耐心等待。然而美國人心裡明白，他們沒有誠實告訴中國人事情的所有真相。凡是能隱瞞的，他們決定予以隱瞞。就像史迪威11月21日寫道：「來自印度的壞消息。英國佬想的是一道有限的防線。他們的目標是一個笑話——(控制)阿拉堪山地(Arakan Hills)、欽山(Chin Hills)，以及卡勒瓦(Kalewa)。然後就騷擾日本的交通線。海軍上將什麼都不知道。因此，孟加拉海灣計畫也完蛋了。英國皇家空軍說不出來他們到底能夠做什麼。從全局來看，他們(英國人)只是想保守住緬甸北部，等到明年秋天才開始認真行動。」[67] 史迪威用語雖然尖刻，但準確說明了情況。

正因爲史迪威沒有把英國人從原先承諾暗中退縮的事實向蔣介石誠實相告，所以11月21日蔣中正致羅斯福電報，依然認真地敦促同盟國能夠按照原先預定日期(即1943年3月1日)向緬甸發動攻擊。他所擔心的是雨季來臨後，戰事又將延誤一年，而中國實在無法癡等[68]。11月28日，他告訴羅斯福說，邱吉爾原先承諾參加第二次緬甸戰爭的8艘戰艦和3艘航空母艦，現在都銷聲匿跡了。原來英國承諾的7個師，現在也減爲3個師了[69]。面對這些壞消息，蔣介石的反應是向羅斯福表達憂慮和失望。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並沒有抓住英國人的失信作爲把柄，借此推脫中國自己對緬甸作戰所作的承諾。正好相反，他只是要求羅斯福說服英國遵守它的承諾。

史迪威其實還向中國政府隱瞞了更多實情。因爲他從馬歇爾處已經得知，美國軍部本身也不打算爲下一場緬甸戰爭作出太多努力。馬歇爾明白告訴史迪威說，美國只會增加訓練教官、工兵器械和改進空運效率，但不會增加對華租借法案條例下的援助。史迪威聽後大爲震驚：「我的天哪！這就是給我們這個作戰的支援。我想知道他們給北非戰場的是什麼樣的支援。」誠如史迪威所言，他萬分擔心，如果把這些實況都向中國人和盤托出的話，不知道中國人的反應是恥笑他，還是愚蠢到會繼續信任他[70]。

羅斯福同時也再度試圖規避蔣介石對準時開戰的要求。12月3日他致電蔣介石，依然強調非洲的勝利將大大改善對中國的物資運送工作，因此他勸告中國實在不必爲

66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11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05-206。
6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21, 1942, p. 142.
68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2年11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206。
69　史迪威致宋子文及何應欽備忘錄，1942年11月23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12月28日。
7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26, 1942, p. 142.

緬甸戰事的延誤而焦慮[71]。基於羅斯福的保證，蔣介石隨即向他的將領們宣布(12月3日)，只要英國海軍能夠及時掌控印度洋，中國軍隊就應該以1943年3月作爲緬甸開戰日準備妥當[72]。蔣介石對於戰爭的認真程度，也可以從他寫給陳誠的信中看出(12月21日)。蔣介石在信中表示，他非常擔憂駐紮在雲南的國軍具有極爲複雜的地方色彩和歷史背景，並且擔心羅卓英是廣東人，可能無法駕馭這些部隊。因此，蔣介石希望陳誠能夠盡力改善這些部隊的士氣和風紀。因爲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緬甸作戰中作出優異表現，保證中國不會受到同盟國輕視[73]。

以上所述顯示，在蔣介石和史迪威達成緬甸戰爭協議後的半年之中，中方表現是積極從事準備，迫切盼望戰鬥能夠如期開展。相形之下，英美兩國政府則仍在舉棋不定，甚至企圖向後退縮。這個情況到了12月初變得最爲明顯。12月7日，衛佛爾有一封短信給史迪威，毫不保留地申述了英國對於緬甸戰事的新立場：

> 我急於要盡快和你會面，因為我的幕僚們在進一步檢查計畫之後發現，緬甸北部在雨季時將會遭遇嚴重的維護困難。再者，地中海與其他地區的發展，也讓我們不能確定是否在1943年初會有足夠的海空軍來支援這個戰區，使得緬甸戰爭在春天得以全面展開。由於這些原因，我們想在下一個雨季來臨之前占領大部分緬甸北部的構想，可能言之過早。讓我擔心的是，中國人千萬不要把準備工作做得太快，也不要把希望寄託在緬甸的早日收復之上[74]。

不難想像，史迪威立即反應是(12月8日)，「衛佛爾在推諉承諾(weaseling)，軍部在賴帳(welshing)，中國人在認真辦事。」[75]

儘管史迪威爲此專程飛到印度去爲衛佛爾打氣，但是衛佛爾卻提出更多保留。衛佛爾表示：他無法在雨季供應中國部隊。即使把原來承諾的7個師部隊減少到3個師之後，

71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2年12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207-208。

7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12月3日。

73 蔣介石致陳誠電，1942年12月21日，《特交文電—領袖事功之部，第14冊，領導對日抗戰—遠征入緬》，#31039737。

74 Cable from Wavell to Stilwell, December 7,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46.

7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146. JWS t-w diaires, December 8, 1942.

衛佛爾仍然要求把開戰日期更延遲到1943年11月以後再談[76]。史迪威在形容他對於英國人拒絕合作的感受時，怒氣沖天寫道(12月17日)：「跟衛佛爾一幫人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他們只曉得抱怨困難太多，不能提供第77旅，不能從阿恰布進攻。每一件事都不能肯定。蘭伽(Ramgarh)倒是可以。如果日本攻打保山的話，他們不會支援。他們還是只要保住更的宛河(Chindwin)線。狗屎！」[77]史迪威和英國海軍上將蘇馬維爾會談(12月20日)也令他垂頭喪氣。根據蘇馬維爾的說法，「沒有可能在孟加拉海灣從事作戰。沒有巡洋艦，只有三艘潛水艇和一些驅逐艦。不會願意靠近海岸線作戰。假如找得到日本運輸艦隊的話，可能會使用驅逐艦去攻擊。」[78]換言之，英國表示沒有從事海戰的實力或意願，只能進行小規模騷擾活動而已。

就是這樣，一直到1942年年底，史迪威面對的是英國人不願意在緬甸合作這一堵牆。儘管他不斷向馬歇爾尋求援手，但是得不到後者回應。事實上，史迪威用盡一切方法都不能使英國人回心轉意，而他在華盛頓的上司們，也沒有興趣運用手中籌碼去幫助史迪威解決難題。情形變成是，史迪威只能向中國人兜售他的夢想了。

相比之下，衛佛爾至少是誠實地警告史迪威，不要誤導中國人把戰爭的準備工作做得過頭。但是史迪威本人卻不預備接受同樣的道德拘束，依然不斷鼓勵中國誤以爲緬甸戰爭會準時開戰而繼續準備。然而無論遲早，中國政府終究會發現真相的。可是真正到了那個時候，史迪威和美國軍部又採用另一種邏輯，不但不責怪英國或是美國本身未能履行諾言，反倒責怪中國爲什麼要拒絕接受它們的託詞和誑語。

12月28日，蔣介石不厭其煩地再度致電羅斯福，要求如期開展第二次緬甸戰役。他向羅斯福保證，中國軍隊已經依照作戰計畫正在集結中，並準備準時進行戰鬥。他希望美國兌現其提供空軍支援的承諾，但是也強調，除非英國人履行承諾，否則中國軍隊將無法開始作戰。他提醒羅斯福，所有同盟國領袖們都已經一再向世人聲稱，將在1943年度收復緬甸，因此蔣介石敦促羅斯福說服英國人，提供他們早先承諾的海陸空軍兵力，務使戰爭能夠成爲事實[79]。

---

7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145-146, 148.

77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17, 1942.

7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145-146, 148.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20, 1942.

79 蔣介石在電報中指出，邱吉爾不久前曾經親口承諾過，英國將在印度洋集中8艘兵艦，3艘航空母艦及其他配備艦艇，以收復緬甸。但是最近史迪威從印度英軍將領卻得知，英國將無法實現諾言。更有進者，英國早先曾經承諾7個步兵師參戰，而現在卻只有3個師可以從事有限度的攻勢。這一切都大出中國意料之外。CKS cable to FDR, December 28, 1942.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 二、美國輕聲細氣的勸告和英國暴跳如雷的回應

英國一旦改變主意，就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美國領袖。1943年1月5日，馬歇爾將軍向其他幾位美軍參謀長們傳達了蔣介石給羅斯福的電報(12月28日電)內容，和他向史迪威所表達的立場，那就是：中國正在按照正常進度進行對於緬甸作戰的準備工作，但是中國軍隊必須等到英國軍隊履行諾言才開始戰鬥。馬歇爾向參謀長們承認：「有關這一點，英國海軍上將蘇馬維爾以前曾經告訴過史迪威稱，他的海軍力量不足，也沒有後援。依照史迪威的意思，在開戰前最好有某種形式上的海軍動作。」此處史迪威所謂「某種形式上的海軍動作」，用語曖昧，其含義似乎是想建議英國使一個障眼法，讓它的海軍在該地區虛晃一招，好讓蔣介石誤以爲控制孟加拉海灣的「海戰」已經開始，從而把中國軍隊投入戰場。馬歇爾轉述史迪威的話所顯示的是，在史迪威無法克服英國的阻力之後，他已經轉而開始思考如何更積極地對中國變戲法了。

因此，馬歇爾在簡報結束前，也心領神會地告訴同事說：

> 如你們所知，由於雨季開始後將會增加補給的困難，因此衛佛爾將軍對於陸地上作戰的規模相當懷疑。然而，我們又必須利用中國人對於進攻的意願。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方法，讓委員長得以安心，並允許攻擊能夠開始。所以，我建議我們向總統提供一份致邱吉爾的電文稿[80]。

馬歇爾提到的電文稿內容是，羅斯福要求邱吉爾立即採取行動，實現諾言。他並且客氣地解釋道，「我的用意，是要給委員長一些保證，以避免中國的攻勢受到停頓。」[81]換言之，馬歇爾希望達到的目的是引導中國趕快開始進入戰鬥，因此需要英國作出準備履行承諾的姿態，至於所謂「保證」的實質，他並未多言。

事實上，英國軍方在此之前已經探知馬歇爾的意向，並且作出了反應。雖然馬歇爾只打算建議羅斯福用溫和方式去說服英國履行承諾，但是英國並不領情，反而激起英國迪爾元帥一連串的回電，斷然否認英國曾經作出過任何承諾。迪爾首先指

80 Marshall memo to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and General Arnold, January 5, 1943. Verifax File 678, Item 2104. MFA.

81 All texts cited in: General Marshall's memo to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and General Arnold, January 5, 1943. Verifax File 678, Item 2104. MFA.

責(1943年1月2日)美國的說法不準確，因爲衛佛爾將軍從來沒有作過任何承諾[82]。隨後迪爾宣稱，他早已通知過馬歇爾將軍，孟加拉海灣戰爭並不確定，而且也曾請他轉告史迪威。迪爾更宣稱，蔣介石對邱吉爾的話的引用(即英國將以強大陸軍和海軍參戰)也有錯誤[83]。

迪爾對於馬歇爾作出的壓力有增無減，因爲1943年1月3日他接著告訴馬歇爾：「我的感覺是，你的電文稿會帶給邱吉爾首相一個錯誤的印象，那就是總統似乎同意蔣介石的要求，在孟加拉海灣必須要有強大的海軍行動，而且英國應該在雨季之前動員7個師的兵力。但是這些所謂的承諾，顯然指的是在今年雨季之後收復緬甸的作戰。」[84]換句話說，英國的願望是把戰爭更推遲到1943年年底。

迪爾提出的主張是，馬歇爾必須修改他爲羅斯福起草預備發給邱吉爾的電文稿，刪除任何對英國沒有遵守諾言的暗示。這就是說，英國不但想要取消以前的諾言，它還堅持要在歷史上留下光彩的記錄。因此，在此後的數天中，馬歇爾和迪爾舉行了一連串會商，多次交換修改過的文稿，企圖掩遮雙方歧見。根據馬歇爾記載，迪爾在1月5日直率地通知他，「孟加拉海灣的問題，是英國沒有足夠的驅逐艦去保衛他們陳舊的主力艦。而這又是他們在印度洋全部的海軍。這些船隻不敢進入孟加拉海灣，而迪爾也看不出有任何指望，讓他們能夠及時獲得驅逐艦，使它們可以在3月底以前參加作戰。」面對英國如此強悍攻擊，馬歇爾選擇了讓步，希望能夠找到其他解決途徑。他隨即把這個棘手的任務交給了丁勃曼(Thomas S. Timberman, 軍部參謀總部)上校，指示他去「設計(devise)一個辦法」[85]。換言之，去編造一個障眼法矇騙中國人。

湊巧的是，史迪威1月5日的一封信使得馬歇爾的處境更爲尷尬。史迪威在信中說，他雖然還不知道蔣介石對羅斯福有關孟加拉海灣戰事的電報會有何種反應，「但是蔣介石表示，他一定會繼續中國的準備工作，務期在約定開戰日之前完成……我們相信中國人會認真地做他們的準備工作。」[86]換句話說，正當英國企圖從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承諾中退縮之際，史迪威的報告卻是中國人仍在依照承諾作一切必要的準備。

---

82 Memorandum from Joint Staff Mission to Chiefs of Staff, January 2, 1943, in Verifax File 677, Item 2103. MFA.

83 Ibid.

84 The "telegram" here referred to the JCS's draft message for FDR to send to Churchill. Field Marshal Dill of the British Joint Staff Mission of the Office of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January 3, 1943.

85 Marshall memo to General Harny, January 5, 1943. Verifax File 678, Item 2104. Also: Marshall memorandum for General Handy. January 5, 1943. Verifax File 2392, Item 2524. MFA.

86 Stilwell message to Marshall, January 5, 1943. Verifax File 2392, Item 2524. MFA.

這個局勢不免讓美國面臨困難的選擇，到底是幫助英國人找一個方便藉口推遲作戰，還是建議縮小戰爭規模？是堅持盟邦應該信守諾言，還是狠下心來，強迫中國單獨承擔主要作戰任務？

## 三、1942年底——史迪威心情與態度開始劇烈改變

史迪威是中英美三國擬訂作戰計畫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他的態度與心理應該成爲一個有趣的觀察點。雖然計畫瓦解的導因是英國逐漸撤退，但是史迪威很快就把他的失望發洩到中國人身上。12月底蔣介石把中國立場明確向羅斯福表露後，史迪威便開始批評中國政府對於原始計畫過於拘泥刻板，並在日記中指責蔣介石和何應欽從事「破壞」，「花生米大叫大嚷說英國海軍沒有出現，和英國只貢獻3個師而不是7個師。而英國人則又抱怨他們做不到，並且把我看成是一個瘋子和一個惹事生非的混蛋。假如出了問題時，我一定會變成罪人。中國人和英國人都只想作旁觀者，讓美國人去解決日本鬼子。」[87]

史迪威此種言詞無疑是在爲「美國人」臉上貼金，因爲美國人從來沒打算派自己的軍隊去緬甸和日本人作戰。他的失望心情開始影響到理性判斷力，從而使他的分析也開始變得前後矛盾，躍然紙上。如前文所述，他1942年12月8日還說，「衛佛爾在推諉承諾(weaseling)，軍部在賴帳(welshing)，中國人在認真辦事。」[88]但是到了12月底，他就開始給中國人加壓力，理由卻是他已經發現完全無能力改變英國的行爲，也已經發現對中國施壓比較容易，而且只有這樣才可以挽救戰爭計畫，即使他這麼做必須大幅違背原先計畫也在所不惜。就這樣，英國人打算打退堂鼓，美國人既不願意開罪英國人也不願意增加自己的貢獻，剩下來的方法就是向中國人加壓力，並增加後者的罪惡感。

其實情形並無需變得如此複雜。三個盟邦對緬甸戰爭都曾作過承諾。如果英國人沒有意願完成使命，那麼美國大可以對之施壓，要求它履行諾言。但是假如英國的確沒有能力(無論是海、陸、空軍)兌現承諾，則同盟國只好把戰爭向後推遲。中國肯定會對這個結果大感失望，但是他們也將無可奈何，因爲他們寧可接受延期，也不願意像第一次緬甸戰爭那樣，由於準備不足或是同盟國不通力合作而承擔慘敗的苦果。有趣的是，美國雖然是對於此項共同作戰提供貢獻最少的國家，但它所提出的解決方法並不是增加自己的貢獻，而是對中國施加壓力，而其理由卻是因爲中國的準備工作做得最充分。至於這種做法是否會增加中國士兵的犧牲，甚或增加中國軍隊戰敗的機率，

8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ies of December 23, 1942; January 3, 1943. pp. 148-149.

88 *Ibid.*, entry of December 8, 1942. p. 146.

那就不是美國軍方願意操心的問題了。

有一個生動的例子，可以說明史迪威在此時如何竭盡全力挽回第二次緬甸戰爭。那就是他在1月2日寫信威脅宋子文說，如果中國不採取進攻，則將承受嚴重後果。史迪威提醒宋氏，緬甸戰爭的目的是幫助中國得到物資補助，因此中國必須幫助自己。雖然史迪威已經從衛佛爾處得知英國無法從事作戰，但是他仍然向宋氏隱瞞實情，甚至宣稱英國的印度軍、皇家空軍和美國空軍第10大隊都已經作好參戰準備，並警告中國不得以「英國海軍不參戰」作爲藉口拒不參戰。他警告宋氏，「美國人將會得到的印象是，中國人要等到所有別人參戰之後，他們自己才參戰。美國人將會拒絕把物資送給那些不會使用物資的人，或是不願爲物資而作戰的人。」史迪威還恐嚇說，「我想美國人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撤退他們的軍事代表團，甚至包括空軍第10大隊。」[89] 史迪威說這些話時，曾否在事先徵得美國軍部同意和批准，我們無法知道；我們也無法知道美國軍部是否知情。但有一點倒是非常明白，那就是他自己已經作了決定，要用一切手段使戰爭得以進行，至於後果如何，等到事後再去操心。

就在此時，馬歇爾在華盛頓已向英國壓力屈服（1月6日）。他和迪爾共同想出了一個方法，即使英國不全力參戰，依然使中國不得不參加緬甸作戰。這個方法就是讓馬歇爾和史迪威雙雙出面表示，依照他們判斷，同盟國在孟加拉海灣「並不」需要取得海上優勢。因爲日軍的增援很可能是來自陸地而並非來自海上。因此同盟國如果想要切斷日軍補給線的話，它們需要的不是海軍艦艇而是更多的轟炸機[90]。但是當史迪威向馬歇爾和羅斯福（1月9日）報告稱，蔣介石已經對在1943年3月準時開戰一事感到絕望時[91]，羅斯福立即馳電要求蔣介石不要急於作出決定，請靜待他（羅斯福）進一步努力。與此同時，馬歇爾也告訴史迪威稱，衛佛爾依然認爲英國在緬甸作戰中將無法完成其所分擔的任務。史迪威氣憤地寫道：「簡直是一塌糊塗。」[92]

## 肆、同盟國在緬甸利益的對比

以上敘述應該很清楚地顯示，到了1943年1月，同盟國在緬甸戰爭問題上的矛盾

89 Memorandum from Stilwell to Soong, January 2, 1943,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3, Folder 133.

90 Marshall letter to Field Marshal Dill, January 6, 1943, in Verifax File 678, Item 2564, MFA.

91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from Acting Chief of Staff General J. T. Marney, January 9, 1943. Verifax File 677, Item 2103. MFA.

92 JWS t-w diaries, January 10, 1942.

已經逐漸明朗化，原因是它們的國家利益之間已經發生分歧。

對於英國而言，緬甸是殖民地。因此它不可能在自己無法掌控的情況下，允許美國或是中國在緬甸境內作戰，否則它有可能會永遠失去緬甸。然而英國對歐洲和亞洲的態度又迥不相同。英國在亞洲儘管一度自我吹噓它的武力如何強大，但是未經苦戰就輕易放棄了香港、新加坡、馬來亞和緬甸等地。當然英國也想要收復緬甸，但是並不想爲緬甸付出沉重代價，也不想爲緬甸戰爭而分散英美在其他戰區擁有的資源。再說，英國當初保衛緬甸，主要原因與其說是爲了緬甸本身，不如說是爲了保衛印度。只要日本不威脅印度，緬甸戰爭就只不過是一項次要任務而已。

隨著歐洲戰局變化，英國愈來愈有理由相信，緬甸在美國打敗日本之後終將回歸英國統治。英國對緬甸戰爭的冷淡還有一個難以啓齒的原因，那就是它擔心中國大軍入境，可能引起中國人對其殖民地的覬覦。這也說明爲什麼英國在1942年底交給美國人的計畫時，明確表示不希望中國軍隊參與作戰。在此也應該注意，英國當時交出來的計畫不過是紙上作業，並沒有明確說明戰爭應在何時展開。更何況，英國人在有關第二次緬甸戰爭的事務上多半是和美國政府協商，從來避免和中國政府進行直接交涉。

縱然緬甸在英國全球戰略中所占份量有限，但是假如美國堅持要發動第二次緬甸作戰的話，英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還是想作出一副準備和美國通力合作的姿態。因爲如果他們不這樣表態，很可能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英國人必須答應參加第二次緬甸作戰，但是可以尋找各種藉口使之無限延期。換言之，緬甸是英國殖民地，他們當然希望收復，但是緬甸不是一個戰略要地，早收復或是遲收復並無關緊要。

相形之下，打從1937年開始，國民政府就千方百計防止或是拖延它失去通往西方的通道，因爲這些通道對於抗戰之能否持續至關重要。因此到了1942年，如果還有人以爲蔣介石或是中國人不懂緬甸通道對於中國抗戰的重要性，因此仍然需要史迪威來開導他們，那真是一件奇特而又自我陶醉的想法。基本上從1941年開始，美國的租借法案物資已經在印度堆積如山。毫無疑問地，中國領袖比任何人（包括美國人在內）都急於想把這些物資運進中國。

中國要考慮的實際問題是：如何達成這個任務和要付出何種代價？

就像西方領袖們在歐洲選擇開闢第二戰場時一樣，中國領袖也必須把選擇開戰時間和地點的利弊，作一個慎重的比較分析。同樣地，在決定以緬甸爲主要戰場前，也必須慎重考慮從哪裡開打，什麼時候投入主要兵力。如果中國領袖拒絕了美國的某些建議，並不表示他們欠缺智慧，或是無法了解本身利益所在，更不表示他們存心破壞。

如果他們選擇推遲戰爭，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他們可能認爲目前的代價或風險實在過大，因此才有這個主張。他們也可能是認爲，同盟國應該按照公平原則分配各自責任以增加勝算。如果人們採用前述邏輯思維方式審查歷史資料，那麼他們對中國和美國在緬甸問題上的爭執，就可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去進行理解。

如同前文所指出，中國領袖從第一次緬甸戰爭的慘敗中吸取了自己的教訓。蔣介石在開戰之前充滿樂觀期待，對史迪威又給予熱烈歡迎。而正因爲他亟望參加同盟國的共同作戰，因此粗心大意，只看到戰爭可能帶給中國的好處，而沒有仔細思考其他可能後果。他也因此沒有爲美國應該投入多少戰爭資源，和史迪威應該在戰爭中擁有什麼權限，去和美國政府討價還價。僅就他把嫡系精銳部隊交給一位素昧平生而又毫無戰功的外國人指揮這一事而言，蔣介石的表現可謂慷慨、友善，而又天真得離譜。只有等到戰爭結束時，他才察覺到自己所犯下的滔天大錯。他後來所作檢討，包括錯在何處和誰有責任等等，都自然而然會對他在處理第二次緬甸戰爭時產生重大影響。他在1942年春爲了急於參加同盟國體制下的軍事合作，未能在事先妥善做好防範工作，因此付出高昂學費，只能發誓絕不重蹈覆轍。特別是在籌劃第二次緬甸作戰時，他最痛恨的兩個因素依然存在，也就是英國背信棄義的可能性，和史迪威再度成爲中國遠征軍總指揮的風險性。

因此當中國政府堅持同盟國對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攻擊只能成功而不能失敗時，中國領袖們心中所想到的，不再僅僅是大量物資湧進中國的美麗前景，也必須是萬一失敗時的嚴重後果。因爲萬一失敗，日本便可能乘勝進攻印度，威脅中國賴以維護戰志的駝峰運輸線的發送基地。日本也可能進攻雲南，威脅駝峰運輸線在中國的終端接受基地，甚至進犯戰時陪都重慶。對中國政府而言，只有同盟國承諾給予充分的海空作戰支援，才能夠阻止日本人此類行動，增加中國陸軍在地面作戰的勝算[93]。

儘管直到此時，蔣介石依然相信美國政府和羅斯福個人對於中國的善意，但是美國移用飛機（1942年6月份）和不能依約對中國供應武器等事件，早已大大打擊了他對美國軍部履行承諾的信心。他心中禁不住懷疑，如果他所要求的條件不能兌現，中國是否應該輕易答應進行第二次緬甸作戰，還是他應該要求盟邦保證絕對履行諾言。從這個角度來看，蔣介石1943-44年間堅持盟邦必須在他採取軍事行動之前給予保證，其原因只是他曾發誓不再「上當」，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作爲國家元首，這也是蔣介

93 General Lin Wei's statement to Stilwell in Memorandum to Stilwell, from C.G.S. Off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Military Council, "Notes on Conversation held at General Stilwell's Residence on November 10, 1942,"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older 15.

石對中國軍隊和人民必須盡到的最低責任。不幸的是，同樣的行爲看在美國軍部領袖眼裡，就變成是「不合作」的證據，因爲蔣介石拒絕事事奉承美國人的意旨辦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籌劃第二次緬甸戰役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遠比第一次戰爭時更具關鍵性。原因是，在有關緬甸戰爭的事務上，美國人擔任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橋樑，因之中國和英國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實質上的直接溝通。而英美兩國之間不但有特殊溝通管道可以做秘密交易，而且還可以協力隱瞞中國。

由於以上的互動模式，無論情況如何變化，中國政府總是最後才知情，或是根本一無所知。本應該是三方面合作的第二次緬甸戰役，很快就變成爲英美雙方通知中國人要做或是不做什麼，以及何時該做。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府屢次因爲事出突然而陷於措手不及的狀態，因此他們的困難度和疑慮程度都加重了。而英美兩國對於自己改變戰爭規模和日程表的事實，寧可輕描淡寫，但是對於中國不能及時順應英美的突然改變而予以配合時，卻每每予以苛責，史迪威在這方面的作爲尤其顯得盛氣凌人。總之，中國軍隊雖然在戰場上將要負擔重大的戰鬥任務，而在戰爭決策過程裡反而淪爲配角，甚至被排除於局外。中國領袖們不能接受此種擺布本來就是意料之中的事。要想防止這種反常的三角關係及其不良後果，美國政府最好的策略是在中英之間不偏不倚，作一個忠實而雙方都可信賴的協調人。然而即使是蔣介石信賴的羅斯福也隨波逐流，愈來愈遷就英國。儘管羅斯福最初似乎完全相信第二次緬甸戰爭的必要性，不久卻根據英國人意見而不斷改變戰爭的時機和規模，原因就是他也覺得不必對中國人妥協，但卻必須和英國人妥協。簡而言之，從太平洋開戰以來，中英關係就已經瀕臨破裂，中國也因爲情勢所迫，把和英國溝通談判的主動權拱手讓給了美國，最後不免自食惡果。

## 伍、1943年初——原始作戰計畫開始縮水

大體而言，從1943年1月初開始，原先經過蔣介石和史迪威共同認可的原始作戰計畫，由於英美兩國各自的需要而遭到削減和刪改，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削減和刪改的幅度也愈益明顯。當美國馬歇爾將軍向英國迪爾元帥屈服時（見前文本章叁－二節），羅斯福也開始全面改變論調，企圖說服蔣介石放棄收復緬甸全境的打算，只把精力放在收復緬甸北部，並由此打通雲南到緬甸的通道。他同時向中國建議，即使英國不對

緬甸南部的日軍施行攻擊，中國軍隊仍然應該在緬甸北部進行獨自負責的局部戰爭[94]。

無庸置疑，羅斯福立場的改變基於政治考慮的成分多於軍事實質需要。不久之後，他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談到緬甸問題時（1943年1月7日），再度聲稱他看不出爲什麼同盟國必需占領仰光和緬甸南部。因爲在他看來，第二次緬甸戰爭的目標應該放在緬北修築公路即可。當他詢問在場的參謀長們爲什麼仰光需要是戰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時，此時的馬歇爾倒還是給了他一個誠實的回答，那就是，緬甸南部港口和鐵路系統的結合運用，可以大幅增加輸入中國物資的總量[95]。換言之，即使在羅斯福已經爲了遷就英國人而想縮小緬甸戰爭時，馬歇爾依然顧到戰爭的軍事價值而支持原始計畫，認爲應該同時對緬甸南部和北部進行攻擊。

當蔣介石從史迪威口中得知（1943年1月8日）更多有關英國無法履行其承諾的細節時，他即刻致電羅斯福，請他敦促邱吉爾履行諾言。蔣介石同時也向羅斯福保證，中國必將在3月之前依照原定計畫完成部隊的準備工作。蔣介石解釋他爲何不能接受英國的改變，「敝國軍隊與人民，經五年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消耗，實不能在緬甸冒第二次失敗之危險耳。」[96]

在此，人們不難看到一個歷史性的諷嘲。猶記第一次緬甸戰爭時，中國的主要目標是把國軍盡快送進緬甸戰場，俾有助於英國保衛仰光港。只有在英國多次的延誤和仰光港失陷之後，蔣介石才決定只在緬甸北部從事作戰。然而史迪威當時卻仍舊堅持仰光的收復至關重要，因此不惜把補給線已經拉得過長的中國軍隊送往南部的火線。他當時並沒事先取得英國固守陣地的承諾，以致中國軍隊遭受重大傷亡。現在，才過了六個月，蔣介石依然堅信仰光港的重要性，而有些美國人卻突然改變語調，主張只在緬甸北部打一場局部戰爭，前後變化之大能不令人深思？

## 一、美國開始壓迫中國接受縮水的作戰計畫

不多時，蔣介石執意要維持原始計畫的立場就開始激怒史迪威，因爲史迪威擔心，這正好會給英國人一個絕佳的藉口去取消整個作戰計畫。在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關於緬甸戰爭的根本性分歧從此變得愈來愈難協調。簡而言之，蔣介石要的是一個同盟國可以打得贏的緬甸戰爭，讓大批租借法案物資得以從仰光港運進中國。根據他的判斷，只要三個同盟國同心協力地履行各自的承諾，這個目標絕對可以達成。但

94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1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208。

95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 on January 7, 1943, Xerox File 1537, Folder 3, MFA.

96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1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210-211。

是史迪威更迫切想要的是戰爭必須趕快開始。如果能打一場全面戰爭，那當然最理想；如果不能夠，他也願意接受一場局部戰爭，並不惜徹底改道，讓美援物資得以進入中國。更有進者，如果有一個(英國)或是兩個(英美)盟邦不能(不想)兌現諾言，那麼第三個盟邦(就是中國)就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並加倍努力去完成目標。從中國立場而言，這種做法顯然風險太大，甚至不值。但是從史迪威個人利益爲出發點，這個立場自有其道理。因爲只有緬甸戰爭才能讓他重獲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沒有戰爭就沒有指揮權，或許終其一生都不再會有類似的機會。因此緬甸戰爭的規模無論是大是小，史迪威都急於開打。

到了1943年1月8日，史迪威對蔣介石不肯順從他的新思維方式去合作，已經顯得極爲不耐[97]。爲此，史迪威開始建議華盛頓加大對中國政府的壓力。不管英國參戰與否，中國都必須開戰。正如史迪威此時寫道：「除非我們變得兇狠起來，讓蔣介石現在就作出承諾，要不然的話，他就會變得再也無法控制了。我在發出給花生米的信件之前，已經警告過馬歇爾，而且我還準備好了一封最後通牒。假如它能得到馬歇爾同意的話，可以由華盛頓寄給花生米。假如我們可以讓軍部兇狠起來，以美國要從中國全部撤離作爲威脅的話，那我們或許可以有足夠的力量讓他們不能逃避責任。但是如果他們(軍部)不能兇狠起來的話，那麼我們從今以後就會把自己永遠放在花生米的掌心中。」[98]由於史迪威擔心「所有的事都停滯不前」，所以他很快就替美國政府捉刀起草了一份準備送交給蔣介石的最後通牒[99]。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段裡，史迪威在日記中也從不曾提到，他有向英國施加同樣壓力的企圖，或是讓美國增加自己作戰貢獻的建議。

## 二、玄機初顯——緬甸戰爭與太平洋地區戰爭緊密關係的開端

1943年1月10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表示，他需要一些時間和邱吉爾進行溝通，然後作出關於第二次緬甸戰役的最後決定。1月14日到23日，羅斯福與邱吉爾在北非舉行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 摩洛哥港口)會議。此時，美國明顯已對任何形式或規模的緬甸戰爭產生興趣，考其原因，則是基於對美國切身利益的考量。誠然，美國尚未改變它此前對中國戰區戰略價值的看法，那就是，中國是一個陸路反攻日本的集結區和轟炸日本本土的空軍基地。更重要的是，美國開始有了一個新認識，那就是：中國戰場和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之間有著密切關係。最直接的理由是：當美

97 JWS t-w diaries, January 8, 1943.

9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January 8, 1943, p. 152.

99 JWS t-w diaries, January 10, 13, 1943.

國進行太平洋作戰時，它的軍隊在1943年1月在兩個戰役中(所羅門Solomon和新幾內亞New Guinea)，遭遇日軍頑強抵抗而導致美軍傷亡慘重。因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對緬甸戰爭不再表現猶豫，而是在議程上給予更多的關注[100]。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第56次會議上(1月14日)，馬歇爾表示，緬甸戰場上的任何進展(包括僅在緬北局部作戰，或稱Ravenous計畫)都會對太平洋戰事造成極大影響，「主要是因爲它能迫使日本必須分散兵力到緬甸戰場(去作戰)，從而減少它對南太平洋地區的壓力，並減少它對我們船隻運輸的壓力。」[101] 這種說法首次透露了美國軍方的新思路：緬甸和中太平洋是相互密切關聯的兩個戰場。

美國軍事領袖在卡薩布蘭加的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會議中，多次強調緬甸戰爭和太平洋戰事之間的相關性。金氏(Ernest Joseph King)海軍上將和馬歇爾將軍也特別強調，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一定支持緬甸的戰事。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第59次會議上(1月17日)，馬歇爾將軍在強調美國太平洋作戰的重要性之後，緊接著作了一個驚人的表態，那就是除非緬甸戰役能夠以某些形式付諸執行，否則美國將被迫減少對歐洲戰爭的支援。馬歇爾進而花了許多時間解釋，美國必須支援在太平洋上眾多小島上的美軍。「他(馬歇爾)說他希望能夠進行緬甸戰爭，目的在減少我們在太平洋的風險，也讓我們能夠開動對德國的戰爭。」[102]

此時美國的參謀長終於亮出底牌，用最強硬的語氣通知英國軍方，爲什麼必須開展第二次緬甸戰役，而且爲什麼它不拘以任何形式出現，都會對美國自身的利益有所裨益。爲了使緬甸戰爭得以開展，美國不會容忍英國繼續拒絕合作，甚至將不惜以降低它對歐戰的貢獻作爲要挾。當然，美國人只有關著門對英國人才會點破這個道理。對於中國人，他們是絕對不會洩漏這個機密的。因爲面對中國人時，美國寧可繼續鼓勵後者相信，緬甸戰爭完全是爲解救中國困境而進行的。正因如此，中國人才更應該要心存感激，加倍努力，並且應該委曲求全地接受同盟國能夠同意的任何形式和規模的戰爭。這一套說法很快就變成史迪威一再重複的說詞。很可能是遵從馬歇爾最新指示，史迪威隨即著手擬出一個新的緬甸作戰計畫，並要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1月15日)推遲其同樣計畫的作業[103]。

---

100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269.

101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minutes, Xerox File 1539, Folder 4. MFA.

102 Minutes of the CCS's 59th meeting, January 17, 1943, Xerox File 1539, Folder 4. MFA.

103 The JCS accepted Stilwell's request at its 50th meeting on January 19, 1943.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the 50th JCS meeting on January 19, 1943. Xerox File 1537, Folder 3, MFA.

## 三、同盟國訂出新的開戰時間表：1943年11月

在美國壓力下，英國終於勉強同意在緬甸作戰，但是提議把開戰日推遲到1943年11月15日。屆時同盟國將在緬甸北部發動陸路攻勢，並在緬甸南部發動海空攻勢以圖同時收復仰光。話雖如此，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對最終是否真會開戰，依然作了重要保留。它在呈給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的報告書裡面(1月23日)指出，1943年11月15日只是暫定開戰日，要等到1943年7月，再進一步決定是否如期進行或者再度延期。它特別提到，海軍力量能否如期到位，還要看1943年夏天的情況而定[104]。換言之，1943年1月雖然決定在1943年11月開戰，但還要等到1943年7月由英美兩國重新審議，當然中國沒有參加審議的資格。

美國爲了達到緬甸開戰目的，還向英國作出了更大的努力；當英國軍方表示在1943年冬天或許無法集結足夠登陸艇，展開對安達曼群島(Andamans)及仰光作戰時，美國金氏海軍上將馬上主動提議，美國可以從南太平洋抽調登陸艇到孟加拉海灣使用[105]。美國的強硬語言終於讓英國人含糊承諾支持上述緬甸作戰計畫。爲了回報英國人的讓步，美國也答應照舊執行重歐輕亞的全球戰略。但是這次英美協議的模糊性，也爲以後兩國關係帶來許多困擾[106]。

卡薩布蘭加會議留下的懸案比解決的問題要多，它還製造了許多新漏洞留待將來雙方爭吵[107]。但是英美領袖並不打算讓中國人知道，他們達成的協議其實既複雜而又缺乏穩定性，因爲羅斯福和邱吉爾在會後，立即共同派遣阿諾德將軍(美國)和迪爾元帥(英國)，前往重慶向蔣介石通報他們所作的「決定」。2月6日，阿諾德將軍當著中國軍事首長的面，向蔣介石正式通報有關盟邦對於緬甸的最新決定。會議開始時氣氛相當友好，阿諾德所傳達的訊息是：最近美國在所羅門群島(Solomon)海戰中遭受大重大損失，因此更想把同盟國的攻勢從太平洋島嶼群轉移到亞洲大陸上來。爲了這個原因，美國期望能在1943年秋冬之際展開第二次緬甸戰役，打通緬甸路，把更多的物資送進中國。阿諾德進一步聲稱，美國已經決定派遣一支強大海軍力量，去控制仰光

104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T THE CONFERENCE OF CASABLANCA CONFERENCE" from "EXTRACT OF CCS 170/2, 23 JANUARY 1943" on the reconquest of Burma and reopening of the Burma road. In Verifax File 816, Item 2149. MFA.

105 Minutes of CCS's 60th meeting, January 18, 1943. Xerox File 1539, Folder 4. MFA.

106 Forrest C.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24-34.

107 *Ibid.*, p. 160.

附近海面，切斷當地日軍的後援。這些「決定」讓蔣介石感到振奮，因爲正符合他歷來的主張，而且新的時間表也是中國可以接受的[108]。但是我們可以看出，阿諾德將軍已經開始不露痕跡地扭曲和隱瞞英美決策的動機和目標，爲的就是誤導蔣介石，使之安心。

接下來，迪爾元帥聲稱英國海軍將會控制孟加拉海灣，並在仰光登陸，而同盟國空軍也將強勢攻擊日本地面部隊。迪爾聲稱，一旦緬甸收復，中國將成爲空中攻擊日本本土的基地。他並且承諾，英國海軍將提供大規模支援[109]。對於在場的中國將領而言，他們歷來最懷疑的就是英國人的動向。現在英國將領迪爾卻清清楚楚表示了英國的承諾，這不得不讓他們倍感放心。

不幸的是，這種友好氣氛在此後的幾次會議中很快消失殆盡。首先是美國空軍將領畢賽爾表示(2月6日)，由於種種困難，美國無法增加駝峰運輸量。蔣介石對於畢賽爾推卸責任的做法大感不耐，以致他沒有等到畢賽爾把報告作完就先行離開會場[110]。接著2月7日蔣介石召集英美將領與中國空軍將領舉行一個大型會議。當阿諾德將軍拒絕透露空運中國物資的時間表或是數量時，蔣介石立刻反覆聲明中國需要500架飛機和每月10,000噸的物資，他要求美國先訂出明確的時間表，然後中國才能履行在緬甸戰爭中所承諾的責任。史迪威抓住機會立刻要求蔣介石表白，如果不能達到這些目標的話，中國是否就會從此停止抗日。

用不著說，史迪威的挑釁質問語氣令蔣介石大爲憤怒，因爲蔣介石談的是在緬甸作戰的必要條件，而史迪威卻把話題擴大到中國是否抗日。縱然如此，蔣介石還是按捺住怒火告訴史迪威說，中國抗戰已經長達六年，不論是否有美國盟邦，中國也會繼續抗戰。然而史迪威毫不放鬆，緊接著又問，蔣介石的數字是否代表中國的「條件」。蔣介石答覆說，這些並不是中國的條件，而是中國的最低需要，隨即拂袖而去[111]。蔣介石的憤慨在他的日記中有清楚的反映：「此問可惡不敬已極。」但是在史迪威眼中，同一事情卻另有一種觀察。依照史迪威的說法，「我們作了結論，而花生米顯然打算逃避責任。我讓他作出承諾，他就生氣了。但是他還是明白地說，他會進攻(緬甸)。」[112]

這個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場小小的鬥嘴事件，但卻反映了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個人關係上的大問題。史迪威往往在完全沒有客觀必要的情形下製造對立情緒。他習慣性

108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6日。
10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2月6日。
110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7日。JWS t-w diaries, February 6, 1943.
111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7日。《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206。
112 JWS t-w diaries, February 7, 1943.

地把一個「要求」看成是「最後通牒」，把一個明明可以運用解釋或是禮貌就可以大事化小的場面，弄成劍拔弩張的局面。在上述的這個場景中，史迪威的用字絕非偶然，而是心有所圖。他的用意就是激怒蔣介石，讓他當著三個盟邦軍事領袖的面，說出一些他日後可以用來作爲把柄的話。

史迪威牽涉的許多爭執都屬於浪費精力，因爲它們並未關係到中美同盟的基本原則或是國家利益，它們只不過是個人恩怨，或是忍不住逞口舌之快而已。史迪威有一種天賦或是衝動，那就是偏愛用市井之徒在街上吵嘴的方式和語調，去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大事，可是這些大事都要用平和有節制的語氣和理性的態度才能處理得好。

史迪威的作爲也或許還有一個深層心理因素。遠的來說，1942年6月，他原本以爲可以把「三項要求」變成外交危機，希望引起美國政府強烈反應，然後迫使蔣介石屈服。此項企圖失敗後，他好像並未完全放棄這個願望。近的來說，1943年1月初他脅迫蔣介石和宋子文而未能達成目的後，內心非常失望，總想待機重試。1943年2月7日的會議似乎提供了這個好機會，讓他再度試圖挑起中美間一個新危機。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簡短交鋒，也可以有一個合理的解釋，那就是：史迪威極力想把某些話（諸如放棄抗戰，和日本人談和）塞進蔣介石嘴裡，激怒蔣介石使之失言，從而刺傷美國政府的神經作出激烈反應，並且堅定美國人向蔣介石施壓的決心。不過這一次史迪威失敗得更快，因爲蔣介石基本上拒絕接腔，使史迪威抓不到可以大作文章的把柄。只是第二天，蔣介石還是忍不住派宋子文向史迪威提出警告，以後切不可再用同樣語氣對他說話[113]。

蔣介石在和阿諾德將軍以及迪爾元帥會談後，於2月7日致電向羅斯福保證，中國軍隊的準備工作仍在進行，並且會如期履行承諾展開攻勢。但是蔣介石也提醒羅斯福，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空運工作效能太低，以致1月的運輸量只有1,700噸而已。蔣介石估計，如果緬甸戰爭果真在1943年11月展開，則中國陸軍和空軍每月至少需要10,000噸物資，他也保證中國屆時會把飛機場及其他周邊設施準備妥當，以配合擴大的空中活動[114]。簡言之，蔣介石依然希望緬甸的地面攻勢和中國本土的空軍建設工作得以同步進行。

三個盟邦的軍事首領隨後又飛往印度的加爾各答（1943年2月9日），繼續舉行擴大會議。在會議中，中國對於緬甸戰爭必須有海陸空三路同時進攻的立場，似乎再度得

113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8日。

114 CKS cable to FDR, February 7,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2. 又見：《戰時外交》（三），頁213-214。

到肯定。參加會議的中方代表是宋子文和何應欽，美方代表是阿諾德、史迪威和塞末維爾(Brehon B. Somervell)，英方代表是迪爾和衛佛爾。這是到此爲止同盟國舉行過的規模最大和層次最高的一次三邊會議，議題是緬甸戰爭。會上何應欽代表中國，承諾在1943年10月以前，把雲南10個師(Y部隊，十萬士兵)的準備工作做完。另外，在印度X部隊的準備工作也會在史迪威的直接指揮下完成。衛佛爾宣布英國將提供3個師(45,000士兵)，加上史迪威指揮的蘭伽中國軍隊，共同從西向東攻擊。當中國代表重複要求充分的海軍參戰時，在場的英美代表沒有一人提出保留意見[115]。因此中方代表以爲他們帶回國的是一個明確了解，那就是原先承諾的海軍參戰一事依然有效。當然，中方代表們完全不知道，英美代表的沉默並不表示他們贊同或是理解，而是他們根本不想去碰這個難題，因此只好裝聾作啞。

然而中國代表們的這個樂觀看法，不久又得到英國外相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的鼓勵。依照艾登對宋子文所言，英國肯定會以全力投入第二次緬甸戰役，包括使用足夠飛機取得孟加拉海灣的制空權，並協助該地區的海軍作戰[116]。

中國政府所不知道的是，英美兩國政府已經就緬甸戰爭的規模達成了另一個諒解。馬歇爾在一份致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中(2月16日)，引用魏德邁將軍從印度致馬歇爾信中所寫的一段話，「在印度和中國舉行的會議，結果令人滿意……有關緬甸作戰的仰光戰役那一部分，我們沒有把消息完全透露給中國人，因爲我們擔心會有被洩漏的危險。如果宋子文和您、總統、國務卿或是您的任何僚屬談話時，請千萬不要讓宋子文得知計畫中的這一部分。史迪威會感謝您在這方面的幫助，以便能夠穩住中國人的信心。在目前，中國人還只是以爲計畫還在修改中，具體的決定將需要等到將來才能做出。」[117]魏德邁當時是會議的參與者，他在給馬歇爾的信中所提到的「仰光戰役那一部分」，是指英國政府對於攻打緬甸南部其實並未作出具體承諾，但是這個關鍵性內幕卻千萬不可讓中國政府得知。而史迪威與馬歇爾已經正式成爲英國人的同謀者了。

就這樣，英美領袖以中國會洩漏消息爲藉口，把中國政府蒙在鼓裡，既不告訴他們盟邦具體的戰術細節，也不告訴他們對緬甸戰爭的真正意圖。單純從邏輯上來講，假如英美兩國確實打算進攻緬甸南部，但又擔心中國人會走漏消息，因此對中國人封鎖消息，這還說得過去，因爲這樣做的結果可以降低日本的警惕和準備，使盟邦的攻勢得以順利進行。但是當時情況恰好相反。盟邦告訴中國它們意圖以海空軍攻擊緬甸南部，而

11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2月9日。

116 Soong cable to CKS, April 1,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5.

117 Memo for FDR, from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3. Verifax File 636, Item 2006, MFA.

事實上根本無此意願。在這種情況下，假如日本人果真因爲中國在被盟邦誤導後洩密而受騙，其結果將是適得其反，因爲這將使日本加強它在南部的防務，運送更多或是超額的兵力進入該地區，這不是對英美兩國更好而對中國更壞嗎？假如上面的話旨在欺騙中國，那麼它對中國造成的後果將更嚴重了。因爲它們可能導致中國人以爲盟邦已經履行了它們的承諾，因此過早地把國軍兵力集中在雲南境內，從而減弱了中國其他地區的防務[118]。它們還可能讓中國軍隊單獨面對龐大的日本守軍，而盟邦承諾的支援行動又遲不露面。最後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把大量的日本海軍力量從太平洋地區引誘進入孟加拉海灣，同時也把大量的日本陸軍從亞洲大陸和東南亞各地吸進緬甸南部。從減少日本對太平洋地區軍事壓力的謀略來看，所有以上可能的發展都可以說是正中美國下懷。不過，完成這些複雜計謀的最重要條件是首先要欺騙中國，然後才能去欺騙日本。

同盟國作出一副要全面展開第二次緬甸戰役的姿態，的確可能誤導日本軍人去作「最壞打算」(worst case scenario)。事實上爲了準備應付同盟國即將來臨的猛烈攻勢，日本從1943年初就開始在組織上和戰略上採取了多項防禦措施，包括設立新指揮部、任命新指揮官、補充兵源和採用新戰略等等[119]。日本這些行動明白顯示，他們正在走進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所設下的圈套，把原本可以送往太平洋島嶼去和美國士兵搏鬥的部隊轉調到緬甸戰場。至於中國軍隊不但要去面對這些準備過當的日軍，而且還要接受沒有足夠盟邦海空支援的這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關係中殘酷的現實，中國人只好認命，自求多福了。

## 四、蔣介石的反應和期望

盟邦對蔣介石只報喜不報憂的手法，也並非每次都能如願。阿諾德和迪爾訪華之際，蔣介石已開始懷疑他們真正的目的，不過是英美兩國虛情假意的表示，向國際宣傳它們如何盡心盡意幫助中國。所以他爲了慎重起見，特意指示中國報紙不要登載他們訪華的消息[120]。2月21日，羅斯福發表聲明，宣稱美國今後戰略重點是從太平洋海面攻擊，轉移到依賴中國大陸攻擊日本本土基地時，蔣介石立即認爲羅斯福的目的是在激怒日本，讓它在1943年度加大努力粉碎中國的抗戰。他直覺地以爲這是美國的陰謀詭計，爲此感嘆道，中國因爲國力薄弱總是受歐美國家欺凌[121]。2月28日，蔣介石

118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5月23-25日。

119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53-354.

120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14、28日。

121 蔣介石日記，1943年2月21、28日。

再度感嘆道，中國在同盟國中的處境有如與「拐子、流氓、土霸」爲伍，可以任由他人凌辱宰割。儘管當時蔣夫人正應羅斯福總統的隆重邀請到白宮作客，照理說蔣介石內心應該充滿欣慰和感激之情才對，但他仍然認爲美國是在利用中國，而不是誠實的盟友[122]。

在此後兩個月裡，中美雙方繼續討論，美國爲準備緬甸戰爭所應提供的援助。羅斯福通知蔣介石(3月11日)，在華的美國空軍已經從美國空軍第10大隊分離出來，改組爲第14航空隊，並委派陳納德爲司令官。美國將加速行動，使陳納德能夠擁有500架飛機。一旦陳納德報告中國方面已經做好地面支援工程時，美國政府就立即把飛機盡快運抵中國。羅斯福同時向中國承諾，陳納德在1943年度內必定會得到一個強大的空軍，去對敵人進行猛烈攻擊。他甚至承諾，美國用於中國空運的運輸機在3月15日之前總數將達到137架，運輸量將達4,000噸。羅斯福說，如果同盟國要想對敵人施加壓力和保護它們自己的機場，則勢必致力於重新打通中國與緬甸間的陸上運輸線。他還鼓勵中國人去相信，美國在打開陸上交通線之後，仍將繼續把空運當成重要的輔助交通線[123]。

這大概是美國羅斯福總統答應提供500架飛機給中國，最清楚的一次了。而且總統對援華武器的承諾，比起軍部來既爽快，又大方。只是經常無法落實。

在此期間，中國政府經由美國的新聞界獲知，美國給予蘇聯的軍援在3月1日以前已經達到10,250,000噸，總值18億美元。另外，美國每月還提供蘇聯212架飛機。相對而言，中國歷來得到飛機的總數是179架(120架戰鬥機，其餘為轟炸機)[124]。大約此時，中國資料顯示，每月有80架飛機運送2,000噸物資進入中國，美國駐華空軍先取走1,000噸，剩下只有幾百噸分配給全中國戰區內的各個單位[125]。爲此，宋子文向羅斯福抱怨(3月25日)說，中國軍隊的問題是物資嚴重不足，無法有效作戰。而美國駐華空軍也因物資不足，無法充分發揮其潛能[126]。面對宋子文的壓力，美國政府在4月初才答應在1943年10月前把空運數量提高到10,000噸[127]。

綜觀1943年初期的發展，中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的分歧最早出現在1月份，到了4月份時就變得更爲明顯。馬歇爾在4月30日再次警告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說：「假如我們在該地區(緬甸)停頓不動的話，那就會對盟邦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的攻勢造成

122 同上，1943年2月28日。
123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3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216-217。
124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3月14日。
125 同上，1943年3月10日。
126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3月25日，《戰時外交》(三)，頁219。
127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4月3日。

致命性的後果。」[128] 這個立場馬上受到史迪威的呼應。他在次日（5月1日）就回覆給馬歇爾稱，中國戰區的戰事也必須以西南太平洋的戰爭需要爲依歸，切不可放任中國政府爲了本國政治需要而作出「隨意而不當的決定」（"whimsical and unsound decisions"）[129]。

顯然，美國政府此時最關心的是，緬甸戰爭如何能夠幫助美國紓解在太平洋地區面臨的軍事壓力。因爲美國海軍在1942年6月4-7日的中途島戰役獲勝，並在太平洋地區終於轉守爲攻之後，它才發現日本在許多島嶼上駐軍的防守能力極爲頑強，因而亟需想盡方法去削弱這股能力。緬甸戰場在此時進入美軍戰略家的視野，爲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本身的需要，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對中國而言，緬甸的重要性向來就是讓最大量物資從美國運抵中國，而這也是美國在官方宣傳上信誓旦旦所要達到的目的。從維護運輸線暢通的觀點來看，最合理方法就是收復緬甸的全部，讓物資可以經由三條管道同時運往中國：最大的物資流量可以經過海運在仰光下船，經由原有的鐵路公路系統向北運送；其他部分物資可以經由一條新建公路線橫越緬甸北部連接印度與雲南；剩下的物資也可以用在緬甸北部持續中印之間空運。這就是爲什麼蔣介石一向堅持第二次緬甸戰爭最初計畫的道理。但是一旦美國改變緬甸戰爭目的，把它當作一塊磁鐵來吸住最大數量的日本軍隊，使之無法兼顧太平洋的島嶼戰，那麼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讓戰爭盡早開始，而不是去計較戰爭的形式或規模，也不必操心它是否能夠最有效把物資運送到中國。毫無疑問，到了4月，美國戰略專家已把緬甸和南太平洋緊密結合在一起。正如本書隨後幾章將要討論的，一旦我們了解中美兩國戰略目的的差異，就更容易了解它們此後幾個月中採取的行爲。中國的目的是紓解物資的匱乏和抗戰困難，而美國的目的則是保護美國士兵的生命，兩者的目的非常不同。一旦我們在分析緬甸戰爭時，記得把這兩個目的分開處理，則許多在表面上看似模糊或是矛盾的現象，都比較容易清理出一條合理的邏輯。這也是本書稍後的分析要進一步交代的。

## 陸、1943年5月——一個不尋常的月份

就在這個關頭，緬甸戰爭的交涉突然出現一個大轉彎，一時間頗讓中國人手足失

128 Minutes of the 82nd meeting of the CCS on April 30, 1943.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minutes, Xerox File 1539, Folder 5. MFA.

129 Stilwell memorandum for Marshall, May 1, 1943. Box 8, Folder 61.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措。1943年5月是一個不尋常的月份，原因是幾件大事同時發生，直接和間接影響了同盟國對於緬甸問題的思考。

## 一、陳納德－史迪威在華盛頓的辯論

第一件大事是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發生了一場在歷史上著名的「戰略辯論」。兩位將軍被召回華盛頓，去陳述他們各自主張的美國對中國戰區政策。這一事件在史學著作中受到廣泛重視和深度討論，但是本書將要提出不同的史料和觀點。

此次事件的起源並不複雜。如前一節(伍-四)中所提，羅斯福在3月11日致蔣介石電文中，已經明確承諾加速增加對中國空軍的援助，一時間頗讓中國人感到興奮。然而到了在4月初，宋子文感覺美國的援助工作缺乏實質進展，因此建議蔣介石要求羅斯福把陳納德召回華盛頓諮詢[130]。這個由來顯示了幾個值得注意的要點。第一，促成陳納德去華盛頓的原動力來自宋子文，而不是蔣介石。宋子文關心的是外交問題不是戰略問題。他擔心的是美國軍部的一再拖延，將使總統諾言流於空談。第二，此時中方資料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蔣介石或其幕僚正在研討新的空軍戰略，並因此決定差遣陳納德回美國去作說客。第三，中方資料沒有任何跡象顯示，蔣介石與陳納德之間正在進行更改戰略的對話。綜觀這些因素，對於中國此一動作，最合理的解釋是，它從1940年就開始向美國要求的飛機數量遲遲仍未到手，因此失去耐心，決定由陳納德回美國作一次個人訴求。而此項建議來自宋子文也毫不奇怪，因爲他向來作風喜歡打鐵趁熱，好不容易得到總統親口承諾，因此趕快要求總統(而不是軍部)兌現。但是這個舉動卻立即引起史迪威的警惕，因此要求馬歇爾讓陳納德、畢賽爾和他本人共三人一同回美述職[131]。馬歇爾接受史迪威建議，把陳納德和史迪威召回華盛頓[132]。他們兩人回美國的表面理由，是協助政府制訂更合理的對華政策，可是實際上另有文章。至少，史迪威高度猜疑陳納德在和蔣介石串通搞鬼，因此要予以有效的阻止[133]。

早在史迪威尚未抵達中國戰區之前，陳納德已是中國民間家喻戶曉的美國英雄。史迪威既然認爲只有自己才最能夠幫助中國，他肯定對陳納德廣受中國人民愛戴感到不是滋味，甚至覺得備受威脅，更何況他們在美國軍隊中屬於不同軍種，兩人在政策上的差異因此變得更加尖銳。特別是當日本切斷緬甸通路以後，他們已被逼得連一丁

13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4月6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130。
131 JWS t-w diaries, April 12, 1943.
13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317.
133 JWS t-w diaries, April 18, 20, 21, 1943.

點物資也要你爭我奪。

在純粹私人關係層次上，他們兩人在1942年以前大概互不相識，所以他們對彼此的感覺，是從史迪威到任後才開始發展的。在他們共事的第一年中，陳納德沒有留下任何對史迪威不友善的評語，但是史迪威對陳納德的觀感則改變激烈。1942年3月4日，史迪威首次會見陳納德時，他的感覺還頗爲良好[134]。但是到了11月份，他對陳納德的批評就變得極爲尖刻，「告訴他(陳納德)閉起嘴巴，服從命令。」[135]等到1942年12月中旬，已經有跡象顯示，史迪威對陳納德的惡感，已經開始妨礙他們在公務上的合作互信了。史迪威用「響尾蛇」一詞形容陳納德的險毒，又用「愚蠢」形容他的建議[136]。不過到此爲止，史迪威怒火的矛頭還只是指向陳納德個人。1943年4月情形開始改變，因爲史迪威已經嚴重懷疑陳納德和蔣介石兩人狼狽爲奸。有趣的是，蔣介石在得知史迪威這一方面的言行時，反應是「史迪威誠愚拙疑忌之人也」[137]。

兩位將軍抵達華盛頓之後，分別拜會了許多重要人物，包括美國總統、史汀生部長、馬歇爾參謀長，以及聯邦政府中一大批官員。但是他們陳述意見最重要的場合，是4月30日參謀長聯席會舉辦的談話會，前後歷時三個小時。美國軍方對此保留了一份詳盡的會議記錄[138]。雖然馬歇爾在會議開始時就要求兩人先把重點說出，然後在討論時再談細節，但是史迪威接下來用了會議一半的時間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缺點作了全面性的評判，指責了中國領袖們的貪腐無能，軍隊缺乏對日軍作戰能力，卻使用精銳部隊封鎖「所謂的」共產黨(the so-called Reds)。他繼之又抱怨英國人的不合作。最後他嘲笑蔣介石對改進中國局勢一籌莫展，而他(史迪威)卻認爲挽救中國必須進行戰鬥收復緬甸全境(包括仰光港)，而其前提是以蘭伽經驗爲藍圖去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相比之下，陳納德的發言倒是簡潔扼要，只強調空軍的需要。他指出，日軍整體的作戰必須依賴東南亞的天然資源，經過中國沿海並通過臺灣海峽運往日本本土工業基地。而日軍在中國的作戰則必須依賴內河航運(特別是長江)，才能集中物資打擊中國地面部隊。因此，他主張第14航空隊應該先摧毀日本空軍，奪取東亞地區的制空權，然後攔截日本在中國內河和沿海的運輸船隻，這樣就能幫助中國陸軍

134 Ibid., March 4, 1942.

135 Ibid., November 10, 1942.

136 Ibid., December 16, 1942.

137 蔣介石日記，1943年4月7日。

138 "Conference with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Chennault at 10:30 A. M., April 30, 1943, in Room 3E-992, Pentagon Building, Washington, D.C.", 20 pages, Verifax File 1956, Item 3506. MFA.

和西南太平洋麥克阿瑟陸軍的兩路反攻。爲了建立這一個小而精的空軍(400-450架飛機)，他最大的指望是每個月可以得到4,000-7,000噸的補給品。陳納德特別申明的是，這個規模的空軍可以達成兩個目的：一、摧毀日本在東亞的空軍；二、進而摧毀日本在中國內陸及其與東南亞之間的航運補給線。他特別提到，這個空軍可以大幅提升中國的民心士氣，和鼓舞士兵奮力抗敵[139]。

在隨後的討論中，史迪威雖然也承認陳納德的數據相當務實，但是指出日軍如果損失過大時將會對同盟國空軍基地進行報復，並且引用1942年日軍對浙江衢州的攻擊爲例，證明中國軍隊將無法保衛這些空軍基地，導致空軍和駝峰運輸的雙雙瓦解。因此必須優先建立中國陸軍。說到底，史迪威主張駝峰運進中國的物資應該維持現有的分配比例，即他的練兵計畫應該得到總數的5/8，而空軍應該得到3/8。但是陳納德的立場是，他的空軍需要上述的噸數才能產生預期效果，因此不同意按照比例分配。

在這次會議之外，還有許多人士和兩位將軍接觸過，也都曾對他們的觀點和對他們的印象留下了零碎記錄，但是國務院的項貝克可能是這些記錄者之中，提供報告最詳盡的一位。他不但曾經和陳、史兩人分別舉行長談，而且還從別處搜集了許多資料，包括軍方高層將領對他們在參謀長聯席會上的發言的反應[140]。

根據項貝克記錄，陳納德對緬甸戰爭持高度保留態度，理由是英國不能提供艦艇在印度洋作戰、衛佛爾心態被動退縮、英國動向不明，而日本卻有足夠的兵力對付中英兩國在緬甸的軍隊。與此相對照，陳納德空軍已有輝煌戰績，以10比1的懸殊比例擊落和擊傷敵人飛機。假如這支空軍可以得到充足補給，那麼它可以達成三項任務：1. 干擾和打擊50萬噸的日本航運；2. 向中國境內及香港、中南半島、緬甸，以及中國的南海地區不斷發動攻擊，使中國境內日軍難以移動；3. 強迫日軍繼續陷於中國戰場，無法拔足。爲了達成以上任務，陳納德要求把他屬下的空軍增加到總共235架飛機(依照項貝克資料)，並提供足夠零件及油料。當陳納德被問到，如果美國空軍在中國如此擴張，是否會引起日本報復時，他的回應是，他的空軍足以應付日本空軍的攻擊，並且可以支援中國地面部隊，阻止日本地面部隊向昆明或重慶進攻[141]。

---

139 Chennault, "I am confident if we could get a reasonable air force and supply it, the morale of the Chinese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ould be greatly increased. They would be more determined to fight and would fight harder." Ibid., p. 13. 由此可見，增加空軍力量的動機不是賴以贏得戰爭，而是激勵中國軍民更能從事作戰。

140 JWS t-w diaries, same dates.

141 Memo by Hornbeck, May 5, 1943,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Notes on the requirements for a China air offensive" prepared by Soong for FDR, March 3, 1943. Soong

值得注意的是，陳納德此次在華盛頓向上級作報告時，從沒有宣稱他的空中攻勢可以取代地面攻勢，替中國贏得抗戰勝利[142]。他只是要求滿足他空軍的短程需要，使其實力足以沉重打擊日本在亞洲的空軍，進而大幅破壞其沿海航運，並且支援盟軍在中國和緬甸戰區的地面作戰而已[143]。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子文向蔣介石報告，陳納德在4月30日在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所作報告內容時，無一字提到陳納德曾經宣稱他的空軍可以打敗日本，更無一字顯示，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袖們曾經有過藉空軍打敗日本的遐想。不幸的是，馬歇爾在陳納德剛要開始對自己的觀點進行闡述時，卻決定離開會場，理由是他已經另外安排有約會。我們無法知道馬歇爾所持的理由是否真實或只是藉口，但是他把陳納德從重慶不遠萬里召喚到華盛頓，卻拒絕親耳去聆聽他的報告，這真是令人費解不已。他不但因此而喪失了向陳納德提出質疑的機會，也喪失了聆聽其他參謀長和陳納德對話的內容。更奇怪的是，馬歇爾在還沒有聆聽陳納德意見之前，竟然已坦白告訴陳納德說，他支持史迪威的觀點[144]。以馬歇爾這種心態，在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其實根本不曾產生過「辯論」。

其實史迪威在參謀首長會議所持的態度還是相當小心，因爲他表示同意陳納德對空軍作戰成果的展望，並沒有提出反駁。他的中心關懷只是，空中或地面作戰孰重孰輕和孰先孰後的問題。在史迪威看來，它們互相衝突，因此不可兼顧並籌。陳納德的主張是趕快加強空中攻擊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而史迪威卻以爲，在地面部隊尚未提升戰鬥力之前，根本不應加大空中攻擊的規模，因爲以中國軍隊現有裝備、補給和訓練狀況而言，根本無力保衛前線空軍基地。反之，他對自己主持的蘭伽陸軍訓練計畫讚不絕口，認爲這些中國部隊在緬甸戰爭任務完成之後，就可以返回中國保衛空軍基地。換句話說，史迪威認爲只有等到中國遠征軍完成在緬甸作戰任務之後，中國才可

(續)

Personal Papers, Box 61-5.

142 陳納德本人對於其屬下空軍能夠造成的戰果顯然也隨著時間在不斷修改之中。對於一個軍人，面對瞬息萬變的戰場和軍事科技的發展，這本是一個正常現象。史迪威本人的軍事生涯也是充滿了同樣情形。有關陳納德最早對於空軍最樂觀的估計，可以參考：Chennault letter to Wendell Wilkie, October 8, 1942, 4 pages. Xerox File 2197, #2. MFA. 但是等到1943年5月他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作正式報告和要求物資支援時，已經有了顯著改變。但是美國軍方有人無視於這種改變，仍然把陳納德形容為誇口他的空軍可以獨力打敗日本，並且一口咬定蔣介石也必定希望美國空軍可以替他贏得戰爭。許多年後，史汀生的傳記作者繼續唱此老調。見：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p. 535-537.

143 "Memorandum Re Conference with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McCloy, April 30,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14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1日，《戰時外交》(三)，頁224。

以開始進行空中攻擊。假如過早開始空中攻擊，那麼將會激怒日本奪取飛機場，從而使同盟國無法在未來對日本本土施行長程轟炸。因此對於史迪威而言，優先順序和時間先後的選擇非常明確；先加強陸軍，再談空軍；先攻打緬甸，再談轟炸。

就這樣，美國政府內部對於中國和緬甸的價值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在主要領袖中，馬歇爾堅決支持史迪威。軍部部長史汀生雖然對史迪威的口頭報告相當失望，但依然支持史迪威的立場，因爲他和馬歇爾一樣，認爲美國政府付出極小代價，而史迪威在中國成績斐然，因此值得他忠心相對。更有進者，史汀生一直懷疑有一群美國人心懷叵測，想破壞史迪威在中國的工作，而陳納德偏偏又是史汀生最懷疑的對象，因此對他有強烈惡感[145]。

相形之下，羅斯福被陳納德的大膽想像力所說服，又受到他對前景樂觀的感染。他同時也需要對蔣介石表達善意，因爲他事先就知道中國政府支持陳納德計畫的立場。宋子文告訴羅斯福總統說(5月3日)，蔣介石認爲一旦同盟國空軍在中國能夠取得空中優勢，便無需擔心日軍在地面上的報復行動。因爲過去日本地面攻勢都依賴速度緩慢的水運(江河運輸)補給，而這些補給線很容易遭受空中炸射，所以不宜過分誇張日本以地面攻勢去奪取中國飛機場的威脅。中國政府還特別指出，日軍最想摧毀的空軍基地應該是在桂林－衡陽一線，供美國第14航空隊使用的飛機場。但是儘管日軍四度企圖侵入這一地區(三次長沙，一次桂林)都被國軍擊退。最後中國政府還指出，即使真有激怒日軍進行報復的軍事危險，這個危險仍然需要和中國面臨的政治危險相權衡。假如中國人民普遍認爲同盟國根本無能力保護他們，讓日本飛機繼續其無情濫炸，那麼中國人的士氣必將崩潰。這個政治危險比起軍事危險更難以承受[146]。換言之，兩位美國將領爭論的焦點是軍事問題，而蔣介石還需要考慮中國民心士氣的政治問題。

這兩位美國將領之間的爭執，給美國政府對於緬甸戰爭的態度提供了一個背景因素。不久之後，霍普金斯告訴陳納德說，總統雖然支持陳納德的論點，但是也很難否決他的陸軍將領[147]。

---

145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p. 534-537.

146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from Soong, May 3,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5; Memorandum in preparation for Dr. Soong's forthcoming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May 10,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6-5.

147 "Memorandum Re Conference with 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 McCloy, April 30,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 二、羅斯福找蔣夫人進行秘密交易

第二件大事是羅斯福總統企圖和蔣夫人達成秘密交易。這個事件在一般著作中很少被提及。但是由於它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對中美同盟關係的了解，因此本章在史料和分析上都將提供新的看法。

1943年5月初，正是羅斯福和邱吉爾在華府準備召開代號叫三叉戟(TRIDENT)會議的前夕。羅斯福在5月3日接見前來美國訪問的蔣夫人[148]。羅斯福突然要求蔣夫人說服蔣介石，由中方單獨宣布完全取消第二次緬甸作戰計畫。不用說，蔣夫人聽到後大吃一驚。羅斯福給蔣夫人的理由是，美國軍隊無法不經過英國允許而進入緬甸，而英國已經考慮拒絕中國參戰的請求。5月4日，蔣夫人明白告訴羅斯福說，緬甸是中國的生命線，因此蔣介石將永遠無法同意他的建議。更何況，蔣介石在過去幾個月中，一直給中國人民一個盼望，讓他們以爲不久以後中國的補給情況將大爲改善[149]。蔣夫人猜想，英美兩國根本對第二次緬甸戰爭缺乏興趣，於是告訴丈夫說，英國人大概已經盤算過，在同盟國打敗德國之後，他們可以不經戰鬥就將緬甸收回。英國人也可能以爲，即使必須作戰，也不一定需要中國人參加。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英國人大可採取拖延策略，而不必經由和中國合作去收復緬甸[150]。

事情確實迫在眉睫，蔣夫人認爲她唯一能夠做的，就是抓住主動權，直接和羅斯福交涉，全力挽回這場戰爭。因此她向羅斯福表示，中國可以考慮放棄以前的立場，不再堅持戰爭的規模必須包括收復仰光[151]。蔣夫人隨即以自豪語氣告訴丈夫說，她和羅斯福作了一個合理的交易，而且靠她個人的力量，就把緬甸戰爭從完全被取消的邊緣上挽救回來。

但是蔣夫人也不禁有一種不安的感覺，認爲羅斯福想占中國人便宜，而她又看不透其中奧妙到底何在[152]。她的確懷疑羅斯福的動機，特別是後者表示，願意把全部空軍放在陳納德指揮之下，同時還限制史迪威的指揮權只能適用於防守部隊，而不能適用於攻擊部隊。還有一點更讓蔣夫人感到納悶，就是羅斯福竟然要求她對其兄宋

148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7日，《戰時外交》(一)，頁834-836。

149 同上。

150 Copy of Mme. CKS cable to CKS, forwarded to Soong by CKS Headquarters, May 18,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8-13.

151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7日，《戰時外交》(一)，頁834-836。

15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25-326.

子文保密[153]。我們不知道羅斯福是否對美國的軍方也保守這項秘密，但是他要求對宋子文保密，很可能是害怕宋子文必將強烈反對這個交易，甚至會藉美國新聞界的管道，把這項秘密交易公諸於世。

然而以宋子文在華盛頓政治觸覺超級敏銳，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得知他三妹和羅斯福所作的交易。5月6日，宋子文立即發了一封電報告訴蔣介石，由於邱吉爾即將前來華盛頓，因此請求蔣介石就如何應付此一形勢給予指示：是應該堅持原有的作戰計畫？還是接受羅斯福和蔣夫人達成的縮小戰鬥規模的安排[154]？很明顯的，在羅斯福和邱吉爾能夠聯手行動之前，中國必須作出自己的決定。

這些發展當即給蔣介石製造了一個難題。5月8日，他不但把羅斯福和蔣夫人之間所作交易的內容告訴了宋子文，同時指示宋子文，必須斷然拒絕英美政府想把緬甸戰爭局限於緬甸北部的任何試探。蔣介石表示，如果第二次緬甸戰役縮小規模的話，就不值得中國士兵犧牲性命了[155]。當宋子文將蔣介石的立場轉達給美方時，料想不到的是史迪威居然暴跳如雷。照理說，史迪威畢竟是在緬甸全境作戰原始計畫的起草人，理應贊成蔣介石堅持在緬北緬南全面作戰的立場才對。但是史迪威不但沒支持蔣介石(和他自己)的立場，反而把滿腔怒火發洩在中國政府身上，嚴厲批評中國人不合作，其軍隊貪污無能[156]。史迪威的失望之大可以想見。

對蔣夫人而言，她顯然不願意看到自己即將到手的「外交勝利」被宋子文攪局而失敗，遂趕緊向丈夫解說，緬甸全境戰爭顯然已經不可能實現，因爲英國人拒絕支持。她更進一步指出，羅斯福原本表示要完全放棄第二次緬甸戰爭計畫，只是幸虧在她再三勸說之後，才同意接受一個局部作戰，並且承諾提供美國資源去打通緬甸路。基於這些原因，她敦促蔣介石接受一個兩階段性質的作戰計畫。根據她的判斷，假如中國在第一階段接受羅斯福的局部攻勢方案，並在緬北贏得勝利的話，將來就會比較容易說服美國人進行第二階段的全境作戰[157]。

蔣夫人此時愈陷愈深，不禁讓蔣介石感到緊張。因而警告她說，她的交易可能使中國重蹈1942年的厄運。由於蔣介石擔心蔣夫人在華盛頓人單勢孤，可能上當受騙，因此命令她盡快啓程回國[158]，並且警告她，西方國家和軸心國家一樣能夠違背承諾[159]。事

153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8日，《戰時外交》(一)，頁837。
15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6日，《戰時外交》(三)，頁225-226。
155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227。
156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5月8日。
157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11日，《戰時外交》(一)，頁837-838。
158 蔣介石致蔣夫人電，1943年5月13日，《戰時外交》(一)，頁838。又見：蔣介石日記，

實上，蔣介石對於蔣夫人和美國在此次事件中的行爲非常憤慨，5月14日，他在日記寫道：「外交與軍事皆無人能了解余之意旨。代表者非自作主張，即不知輕重，貽談（誤？）要務，更覺煩惱。美國政府欺弱扶強，爲英左右，竟如此也。可痛之至。」[160]可以清楚看出，蔣介石認爲美國在英國的慫恿下設下陷阱，讓蔣夫人毫無戒心地往裡面跳。在他心中，既對蔣夫人的專擅輕率感到不滿，也對美國人偏袒英國而欺凌中國感到痛心。

不用說，蔣夫人並不如此想，反而對她丈夫的決定感到極度失望。縱然她無法違反他的意旨，卻依舊再次提醒蔣介石說：當她最初和羅斯福會面時，羅斯福正準備要完全放棄緬甸作戰，而現在至少同意保護新的緬甸路。再說，羅斯福原本想要蔣介石單方宣布放棄緬甸戰爭，並承受全部責難，而現在已經放棄了這種想法[161]。

究竟羅斯福爲什麼要向蔣夫人提出如此離譜的建議？這個問題到現在仍然是一個謎。由於他和蔣夫人作秘密交易時沒有第三者在場，而美國記錄也沒有任何羅斯福接見蔣夫人前曾和幕僚們商議的資料，因此羅斯福和蔣夫人會談前或是會談中，到底轉過什麼念頭，到現在爲止還是無法從美方資料中看出端倪。這個事實也說明了，爲什麼英文著作裡幾乎完全沒有深入討論過這一事件。但是從蔣氏夫婦和宋子文之間的密電來往又可以得知，這個事件當時得到中方的高度重視。

不過從羅斯福的性格和作風上看，倒是可以如此揣想：羅斯福最初似乎是想說服蔣介石單方宣布放棄緬甸戰爭，好讓美國把戰爭計畫取消的責任全部推到蔣介石肩膀上。即便美方達不到這個目的，也可以讓蔣介石不得不自動接受一個局部戰爭的退一步安排。就後者而言，它也可能是一種欲擒故縱的高招。當他看到蔣夫人對於一個局部戰爭的構想並沒有作出抗拒時，他可能認爲自己的計謀實在高明，不費多大力氣就把兩個盟邦間僵持了一年多的難題全部解決。假如他能讓蔣介石也接受這個局部性戰爭，他就可以向邱吉爾表功，他爲英國人爭取到蔣介石的讓步。爲了讓蔣介石上鉤，羅斯福非常願意施一些小惠作爲誘「餌」，比如增加陳納德的權力和減少史迪威的權力。然而同樣重要的是，他必須把宋子文排斥於局外，才能保證交易得以圓滿完成。但是羅斯福終究計謀未逞，這表示美國必須一切從頭開始，繼續在中英兩個盟邦間作協調工作。而在這些令人煩心的環境中，一個一直是最關鍵而又最深藏不露的因素就是，美國軍部從來不願意在緬甸承擔更多的責任。

（續）

1943年5月13日。

159 Copy of Mme. CKS cable to CKS, forwarded to Soong by CKS Headquarters in Chungking, May 18,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58-13.

160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14日。

161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13日，《戰時外交》（一），頁838-839。

最後還有一個疑問就是軍部的態度。美方沒有資料顯示軍部對羅斯福動作事先知情或是參與策劃。但是根據本章前文的討論，即使中國政府果真單方宣布取消緬甸戰爭的話，也一定會受到軍部嚴厲的反對和指責，繼而以高壓手段迫使中國重新承諾作戰。因爲緬甸戰區所影響的已經不只是中國的利益，而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軍部絕不會就此罷手。羅斯福固然可以不聲不響地置身事外（因為宣布是中國的單方行為），而中國將會是最大受害者，並且還會難以洗刷自己的名譽。

## 三、三叉戟會議經過和成果

### （一）英美兩國對緬甸戰爭出現分歧

第三件大事是英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了三叉戟（TRIDENT）會議（會期是5月12-27日），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先親自主持，討論世界大局，其中也多次涉及第二次緬甸戰爭問題。幾乎從會議一開始，英美對緬甸戰爭的評估就出現了嚴重分歧，而5月13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是一個轉捩點。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認爲，若要以最短時間打敗日本，就必須維持中國繼續戰鬥的意志，也必須重新建立中國與同盟國之間的交通線。但是英國的參謀長卻提出更根本的問題，那就是這場緬甸戰爭是否有必要性。他們認爲1943年11月15日開始作戰根本不切實際，因爲它將不可避免地分散盟邦對德國戰爭的人力和資源。再者，他們相信戰勝日本並不需要收復緬甸，更何況即使第二次緬甸戰爭能在1943-44年順利進行，也並不保證緬甸路可以在1945年中期以前打通[162]。

5月14日，衛佛爾提出一個更悲觀的評估。他強調緬甸作戰的各種困難，無論是緬北陸戰、全境空戰，或是緬南海戰，都是困難重重。他認爲最能夠幫助中國繼續抗戰的有效方法，莫過於增加駝峰運輸量，和加強陳納德的空軍[163]。英國人的論調當然讓史迪威大感不滿。但是當史迪威有機會當面向羅斯福和邱吉爾陳述意見時，他卻變得口齒拙笨，詞不達意，讓他自己感到極端沮喪[164]。

無論如何，英國採取的新立場是：不但1943年11月開戰不切實際，甚至整個作戰都可以取消。依據邱吉爾估算，打通緬甸路後最多每個月只能運送20,000噸物資，而且還要等到1945年才能全程通車。比較實際的方法是增加駝峰的運輸量，使其達到每

162 Minutes of 83rd Meeting of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ay 13, 1943, in Xerox File 2385. MFA. For more discussion of the divergent U.S. and U.K. views on Burma,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27-333.

163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209-210.

164 JWS t-w diaries, May 14, 1943.

個月30,000噸[165]。邱吉爾也不願英軍從事叢林作戰，他對空軍的效能更具信心[166]。邱吉爾既然反對，美國政府又不願意把自己的軍隊投入緬甸戰場，或是增加對中國空軍和陸軍的武器援助，種種跡象都讓蔣介石領悟到，羅斯福提議把戰爭局限在緬北的計畫，最終目的不過是讓中國人在緬甸單獨和日本人作戰而已。

### （二）中國開始顯示不耐

爲此，5月13日，蔣介石再度警告宋子文和蔣夫人說，如果盟邦不信守原來的作戰計畫，那麼它們的承諾毫無價值，而它們用欺騙方式，違背承諾和欺凌弱國，手法與軸心國如出一轍，可以說是一丘之貉[167]。值得注意的是，同盟國關係在此時才經過一年半光景，而蔣介石已經數度把盟邦的背信棄義和軸心國敵人的行徑等同視之，可見他內心失望、怨憤和沉痛之深之大之重。

蔣介石同樣對史迪威感到憤怒。原因是中國聽信他的承諾，冒著重慶暴露在敵人攻擊的危險，已經集中預期參加緬甸戰爭的部隊，而現在他的美國上司又告訴中國要放棄收復仰光的計畫[168]。顯然，這一切的反反覆覆，擴大同盟國之間關於緬甸問題的歧異，讓它們走向外交攤牌。在此每況愈下的形勢中，最讓蔣介石反感的是，英美兩國屢屢避開中國作出嚴重影響中國利益的決定。因此蔣介石一聽到邱吉爾將於5月訪問華盛頓時，立刻要求美國政府同時邀請宋子文和蔣夫人，共同參加英美領袖討論中國或緬甸戰爭的一切會議[169]。蔣介石這個舉動明顯點出，中美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美國對華政策中有一個基本矛盾。羅斯福一方面致力於把中國抬高成國際大國，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政府卻又不能擺脫以前的習慣，仍然在不允許中國參與，甚至在不讓中國知情的情況下，隨意決定中國的命運。

這種矛盾不可避免地加強了一部分美國領袖們的信念，讓他們認爲，所有美國對中國的作爲都是爲了中國的利益著想，甚或比中國政府自己考慮得更周全，因此其動機及效果均不容中國置疑。而中國任何不願順從美國領導的跡象，都是中國不知感恩或是存心破壞的證明。這個信念在史迪威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因此他才會一再指責中國，沒有對美國表現出足夠的感激之情。然而這樣的心態特別容易引起中國反感，

16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5月13日。

166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209-210.

167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13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343。

168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16日，《戰時外交》（三），頁229-230。又見：《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349。

169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15日。

因爲中國事實上早已認定美國是它唯一可以信賴的盟友，和它唯一可以接受的同盟國領導者，而且這種情緒，在蔣介石給羅斯福的信件中已經表露無遺。

1943年5月初發生的事件，也是這一個矛盾的表現。5月15日，李海海軍上將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報告說，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都相信，同盟國應該全力改善通往中國的空中通道的效率，然後再開始某種形式的緬甸地面戰爭。羅斯福更認爲同盟國可以先著手準備工作，然後再進入緬北。對史迪威對緬甸戰爭計畫的說明，羅斯福與邱吉爾兩人都表達了某種程度的不滿，認爲他前一天所作的簡報內容極差。邱吉爾甚至明白指出，史迪威對緬甸戰爭的解說不能令人信服。他同時表明態度，只要在不干擾建立空中通道努力的前提下，他願意讓緬甸戰爭的準備工作繼續進行。但是他明確要求，同盟國在最後決定是否根據構想展開緬甸作戰之前，必須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李海上將根據兩個領袖所表達的意見，向其他參謀長建議，美國應該繼續爲戰爭作準備，但是也要有心理打算，戰爭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縱然如此，此時美國依然告訴中國說，美國打算把緬甸路打通[170]。接下來的討論中，官方記錄明確記載：英美兩國一方面要保持它們各自在緬甸作戰這一件事情上的高度彈性，另一方面卻告訴中國，緬甸戰爭一定付諸實現，讓中國保持高度的備戰狀態[171]。這種做法的巧妙之處是，把一支龐大的中國軍隊綁在尚未定案的緬甸戰爭上，同時又讓美國享有完全的支配裁決權。它所造成的後果是，中國面對日軍攻擊中國其他地區時，不得使用這些被綁住的軍隊去支援，而中國由於這麼做而遭受的重大損失，則並不是美國人需要煩惱的問題。

美國參謀長們顯然努力運用他們集體智慧，去向中國政府隱瞞真相。金氏上將一再強調，美國必須在蔣介石腦海中製造一個印象，那就是，盟邦是在已經從宋子文口中充分地聽取了蔣介石的意見之後，才作出有關緬甸戰爭的決定。李海(William D. Leahy)上將更具體建議，向中國政府提供一些真假參半的訊息，希望誤導中國人以爲，同盟國下一步的行動必定是一場全面性的緬甸戰爭。而事實上這些訊息背後所代表的真正意圖，是把這一個全面性的緬甸戰爭變得完全沒有必要。馬歇爾也再三叮囑他的同事說，對中國人該說什麼和不該說什麼，都一定要非常小心，千萬不可露出馬腳。

基於以上的背景，李海上將於1943年5月15日第85次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建議，正式邀請宋子文出席5月17日的會議，給後者一個機會去申述蔣介石對於緬甸戰爭的

170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JCS 82nd meeting on May 15, 1943. Xerox File 1537, Folder 6, MFA.

171 Ibid.

看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個邀請並不是讓宋子文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正常業務會議，幫助同盟國認真討論緬甸戰爭的軍事價值等問題。恰恰相反，它真正目的是召開一次形式上的會議，作出姿態，讓宋子文發言，並借此向中國政府證明，英美兩國在宣布它們的決定之前，的確已經參考過中國人的意見[172]。

## (三)宋子文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上的發言

從中國人觀點而言，1943年5月17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爲中國在已經成爲同盟國成員17個月之後，它的官方代表終於首度有機會向英美兩國的參謀長，當面表達中國政府對同盟國戰略問題的看法。雖然蔣夫人也被任命爲中方代表，但是她選擇不參加會議，理由是她不願與邱吉爾同席而坐[173]。

雖然宋子文只是以受邀客人身分參加，而不是以成員身分參加，但他顯然有備而來。在演說中他提醒與會者說，羅斯福及邱吉爾曾經把他們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中的兩個決定通知蔣介石。它們是：1. 增加空軍力量以轟炸日本在華的地面部隊和日本本土；2. 動員同盟國陸海空軍力量，達到「全面收復」緬甸、打通雲南和緬甸之間通道的目的。然而其中加強空軍的承諾迄未實現，結果則是在華美國空軍只能保護中印之間的空中運輸線，而不能對中國地面部隊的作戰給予有效支援。1943年中期，美國能夠給予中國的唯一有效支援既然只是空軍，因此蔣介石希望能夠在未來的三個月內，准許把空運抵華的物資「暫時」完全用來補充在華美國空軍，期能達到陳納德期望的標準。這種措施將使美國空軍更能發揮協同地面作戰的正常功能。三個月期滿後，中國同意回歸原來的物資分配原則。

宋子文把他最尖銳的發言保留到討論緬甸戰爭計畫。他一再強調中國已經完全履行三個同盟國最早達成的協議，並無意提出任何新要求去使事情複雜化。中國唯一期望是英美兩國信守諾言。他明白指出，蔣介石所以拒絕把緬甸戰爭縮小到緬甸北部，原因是如此一來日本將繼續控制仰光港、縱貫緬境的鐵路、伊洛瓦底江的水運和緬南的公路網。宋子文在作結論時提出直率警告：既然英美兩國領袖自1942年起，就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告收復緬甸的決心，假如現在揚棄此項承諾，其結果將是使中國人

172 Minutes of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May 15, 1943. Xerox File 1539, Folder 5, MFA. 馬歇爾對於這個問題顯然用了許多心思。從5月初開始，他就向其他三位美國參謀長建議，設計一個場景，邀請宋子文到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發言，然後邀請史迪威和陳納德發言，其目的就是「讓宋子文可以向蔣介石報告，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已經聽取了中國的立場。」見：Marshall memo to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3, 1943. ibid.

173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18日。

民認爲同盟國已經不預備以武力打敗日本。同盟國爲此付出的代價將是中國人民喪失鬥志，並且中國將無法成爲反攻日本的根據地[174]。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邀請宋子文出席會議的初衷，不過只是作一個姿態，表示他們在對緬甸戰爭作出決定以前，已經和中國「商議」過。他們未曾想像到，宋子文拒絕依照劇本扮演這個角色，不願在這個場合說客套話，或是低聲下氣，行禮如儀。他反而抓住機會讓同盟國領袖在道德上感到歉疚。他在演講結束時警告說，如果同盟國毀棄諾言的話，後果將難以預測，但肯定是災難性的。宋子文所要傳達的訊息非常明確：以緬甸全境爲目標的第二次緬甸戰役，是三個同盟國的共同目標，在中國堅持其承諾之時，英美兩國卻在動搖、掣肘和企圖取消。

不少史學著作歷來都無條件地接受史迪威的說詞，而把中國政府描述爲不想進行緬甸戰爭，但是上述事實證明，一切正好相反。蔣介石和宋子文都一直嘗試利用各種不同管道，說服英美兩國遵守承諾，務使原來構想中的緬甸戰爭得以如期開戰。蔣介石對於這場戰爭之熱心，還可以從一件小事上表現出來：他竟然同意英國大使要求，准許英國派遣官員跟伴中國入緬作戰部隊，乘便盡快在緬甸重建殖民地體制。蔣介石給宋子文的解釋是，中國在緬甸的大目標是收復仰光及打通緬甸路，至於英國人想重建殖民地政府組織之類的「小事情」，無需與之糾纏[175]。

宋子文不斷提高聲調，抱怨英美兩國未能遵守承諾，不久就讓他和邱吉爾發生直接衝突。邱吉爾堅持他和羅斯福在卡薩布蘭加的協議只是一個設想，而非一個決定，因此英國當然有權改變主意。他甚至宣稱，如果英國將領(衛佛爾、迪爾)曾經向中國作過承諾，那就是他們越權行事，邱吉爾本人無需爲之負責。宋子文即刻反駁說，羅斯福和邱吉爾不但把他們的決定以電報方式通知蔣介石，並且還派高層代表到重慶敲定細節。當邱吉爾宣稱他只是在此次來美前數日，才第一次看到卡薩布蘭加的會議報告時，宋子文卻緊逼不捨，當場要求邱吉爾解釋，爲什麼他要拖到5月，才閱讀一個早在2月9日就已經作出的決議。邱吉爾當然無辭以對[176]。

儘管中國政府此時竭力避免作出任何責怪羅斯福的暗示，但是羅斯福被夾在兩個

174 Minutes of meeting of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May 17, 1943. Xerox File 1539, Part 5. MFA.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17、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0-232，335-337。

175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13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344。

176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3-234。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5-237。*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332.

盟邦之間的爭吵中，肯定尷尬萬分[177]。宋子文只好盡力爭取羅斯福支持中國立場，請他體諒蔣介石的心情。因爲蔣介石前一天聽到羅斯福送來對緬甸戰爭的好消息還爲之高興，而後一天馬上聽到邱吉爾送來的壞消息。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不快應該容易理解，尤其是他已經遵照卡薩布蘭加決議採取了實際行動[178]。值得注意的是，羅斯福儘管不願夾在中英兩國的爭論當中，但他沒有否認宋子文對於卡薩布蘭加決議敘述的正確性。

宋子文侃侃而談，其實讓羅斯福爲美國未能履行對中國的諾言更感到不安。當5月18日他接見宋子文時，宋子文拿出一份預備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稿請羅斯福過目，並請他檢查其中是否有錯誤之處。羅斯福讀後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意見。此電稿中有一段話特別值得注意。宋子文寫道：「5. 總統告訴我（宋子文）說，美國的立場是在秋天將與英國共同展開安那金（Anakin, 收復全緬）作戰。具體的計畫工作已經開始，在對於每一階段作戰的細部計畫決定之前，擬先把物資噸位和特殊裝備的分配計畫做好。一旦此項準備工作開始進行時，將由我轉交供您考慮。」[179]

在會談中，羅斯福也告訴宋子文說，他完全了解中國在軍事和經濟上遭遇的困難，因此打算採取兩項措施：1. 從7月1日起，美國從印度空運到中國的物資將達到每個月7,000噸。其中第一批4,700噸交給陳納德使用，第二批2,000噸交給中國陸軍，剩下的300噸再交給中國空軍；2. 從9月1日開始，美國每個月的空運數量將達到10,000噸，以後繼續增加[180]。羅斯福同時請宋子文轉告蔣介石，他充分了解，中國軍事經濟情況的嚴重惡化，只能在打通對外交通線之後才能得到舒緩。他同時重申立場說，緬甸戰爭必將在本年冬季展開[181]。

就在此次談話後不久，霍普金斯向宋子文透露一則消息，使美國總統對中國釋出的善意變得更加溫暖。按照霍普金斯所述，馬歇爾曾警告羅斯福說，如果總統決定支持蔣介石對於增加陳納德空軍分配額的話，那麼史迪威將無法返回中國任所。但是羅斯福不爲所動。霍普金斯更透露說，羅斯福的決定等於通知馬歇爾和史汀生，總統已經表示了他對蔣介石的支持和尊敬，同時也等於警告史迪威說，假如他繼續對蔣介石

177 1943年5月21日顧維鈞與宋子文談話記錄，《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314-316。

178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5-237。

179 Soong letter to FDR, May 18, 1943. Verifax File 1277, Item 3183, MFA.

180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232-233。羅斯福的分配數字來自馬歇爾，但是作了小幅度修改，見：Marshall memo to President, May 18， 1943. Xerox File 1523. MFA. 又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326.

181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21日。

態度不敬的話，總統將會毫不遲疑地把他召回[182]。用不著說，這些消息來自霍普金斯，意義實非尋常。到底中國人應該把它們看成霍普金斯在替美國總統傳話，抑是表達他個人對宋子文深厚私人感情的悄悄話？

正在中國人爲羅斯福的新承諾感到高興時，他們完全沒有料想到，美國軍方仍然把他們蒙在鼓裡。5月2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召開第86次會議，塞末維爾將軍滿懷信心表示，中印空中運輸量其實大可增加到每個月20,000噸。但是麥拉里(Joseph T. McNarney, 美國陸軍副參謀長)將軍馬上警告他千萬不要聲張，因爲萬一這個數字洩露出去，英國就可能會用它作爲藉口來要求取消第二次緬甸戰爭。會議其他成員也贊成不要聲張20,000噸的數字，應該繼續「只是說10,000噸」就够了，把能夠增加的數量暫時隱藏起來，留作他日之用[183]。

美國軍方決定把有關駝峰運輸量如此重大的實情隱藏起來，雖然說是讓英國人失去了取消緬甸戰爭的藉口，但是實際上卻重重處罰了中國，使它每個月少得到10,000噸援助物資。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軍部暗藏的玄機。因爲如果緬甸戰爭的最初目的是增加美國援華物資的運送數量的話，那麼既然現在空運已經可以接近或是達成目標，軍部就似乎應該盡量發揮空運的優勢才對。如今軍部反而要把這個優勢隱藏起來，這就似乎頗爲違反常理。反過來說，如果美國軍部的真正目的是不管用什麼方式，都一定要開啓緬甸戰爭的話，那麼它就寧可屈從英國局部戰爭的主張，也不願看到戰爭歸於流產。爲了進行這個大幅縮水的第二次緬甸戰爭，美國軍部一切作爲背後的出發點，就是要讓中國政府繼續相信，解決中國物資匱乏危機的唯一途徑，就是必須重開緬甸路，而且要讓中國派遣龐大的部隊參戰，負主要或甚至全部責任。但是此中自有其不可向中國人透露的奧秘。

## (四)同盟國恢復團結：表相和實情

讀者應記得，在相當一段時間裡，英美軍方一直用北非戰事來解釋他們爲什麼需要延遲第二次緬甸戰爭。北非戰爭一旦結束，這個託詞的功效照理也應隨之消失。就在中國政府以爲緬甸戰爭終於要付諸實現之際，他們馬上又要遭遇失望。因爲5月22日左右李海上將告訴宋子文說，英國人認爲除非獲得強大美國海軍支援，否則進攻緬

182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6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05號檔案夾。

183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JCS 86th meeting, May 20, 1943. Xerox File 1537, Folder 6, MFA.

甸南部太過危險。面對這種情況，李海上將再度向宋子文試探，中國是否願意單獨對緬甸北部發動攻擊。當宋子文重申中國的立場是緬甸戰爭必須在南部和北部同時發動時，李海上將隨即表示緬甸戰爭大概難以在1943年啓動了[184]。

蔣介石獲知這個突如其來的轉變後立刻懷疑，英國可能根本不希望發動第二次緬甸戰爭，甚或逐步取得日本人某種諒解，以中國作爲犧牲。當他想到邱吉爾居然敢於否認英國在1月份對緬甸曾經作過的承諾時，不禁火冒三丈寫道：「此誠帝國主義真面目畢露，不僅爲流氓市儈所不爲，且亦爲軸心倭寇所不齒。」當他提到羅斯福縮小緬甸戰爭規模的建議時，蔣介石同樣予以譴責：「吾人何不幸遭際此等不守信用鮮恥寡廉之政治家，乃知日德之所以必欲排除與痛恨英美之道矣。」[185]用這些話來形容盟邦，可見其急怒攻心失望透頂了。

一旦懷疑產生，蔣介石當然認爲合理的對策就是向美國人施加壓力。所以他提醒羅斯福說，阿諾德將軍在重慶時已經作了承諾，說美國將在對仰光的攻勢中扮演重要角色，提供必要海軍配合。阿諾德將軍甚至還提出美國參戰的艦艇的數量[186]。蔣介石對宋子文講得更明白。他認爲在北非戰場的問題解決之後，英美兩國對於以前在重慶及卡薩布蘭加的決議與諾言，「更應執行，絕無理由推脫違約，否則以軍事信約爲兒戲，其將何以昭信於世」[187]。

蔣介石的壓力似乎起了作用。5月25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羅斯福指示下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執行緬甸作戰計畫，並就若干重要作戰需要達成共識[188]。會議向羅斯福及邱吉爾提交了一份報告，羅列所有協議，並表示英美兩國可以進行原初構想的第二次緬甸戰爭。大約同時，美國總統終於取得邱吉爾的承諾，參加第二次緬甸戰爭。次日，羅斯福和邱吉爾批准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計畫書。但是他們決定只向蔣介石提交一個節錄本，僅重申同盟國對戰爭的決心一如既往（即是：海空軍攻勢、兩棲作戰，等等），而省略了許多關鍵性的細節。開戰日期依然定在1943年11月[189]。

---

184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3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05號檔案夾。

185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23日。

186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23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350。又見：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6月8、15日，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9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203-204，210。

187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22日，《戰時外交》（三），頁238。又見：《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350。

188 For more details, see: CCS 94th Meeting, Item 5.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ile 49.

189 Stilwell Papers, Box 7, File 49. 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6日，《戰時外交》

在本章前一節（陸-二）中曾經提到，英美兩國領袖在5月初舉行了三叉戟（TRIDENT）會議。由於中國沒有出席兩位領袖間的高峰會談，也沒有出席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會議，因此他們對會議決策過程中同盟國所考慮的因素、會場的氣氛，和參與者的情緒均一無所知。更何況蔣介石只看到會議決議的節錄本。因此，除非中國領袖們有習慣拿顯微鏡去精心審查手中文件的每一個字眼，否則他們就只能相信盟邦所提供消息的誠實性了。這個狀況對於中國如何處理有關三叉戟會議的訊息時就顯得特別重要。因爲在三叉戟會議產生的所有重要文件中，「仰光」這個地名靜悄悄地失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詞彙，如「激烈並具攻擊性的空中和地面作戰」、「對緬甸海岸的兩棲作戰」和「阻止日本海上與緬甸的聯繫」等等[190]。假如中國人把這些字眼當成占領仰光，那是中國人自己犯了天真的過失。

不幸的是，這正是中國人所做的事。他們以爲同盟國在三叉戟會議上重申了卡薩布蘭加的決議。但實際上，三叉戟的決議取代了卡薩布蘭加的決議，選擇了一個規模縮小了的作戰，而且根本不包括收復仰光。所以這樣的緬甸戰爭即便成功，它對中國援助的物資也只會以陸路、油管和空運的方式通過緬北進入中國而已[191]。不過，假如宋子文原本心裡還存有懷疑，以爲同盟國不會在孟加拉海灣作戰或是進攻仰光的話，那麼霍普金斯精心設計的一番話也讓他完全放心了。因爲在一個長達兩小時的密談中，霍普金斯不但明確地恭賀中國，在堅持占領仰光和收復緬甸全境的問題上打了大勝仗，而且還把說服邱吉爾讓步的功勞歸到羅斯福身上[192]。然而宋子文不知道的是霍普金斯其實言不由衷，因爲他心中知道的遠比他告訴宋子文的要多得多。霍普金斯參加了三叉戟會議，在私下對同盟國就緬甸問題態度的評價也最爲坦白。他在會議筆記寫道：「雖然在會議文件上規定了『要在1943年雨季結束之後，在緬甸展開激烈並具攻擊性的空中和地面作戰』，但是事實上，史迪威沒有得到他再三請求的美國陸軍步兵師。誠然，陳納德的空軍會得到補充，而在緬甸西部沿海，也有關於小規模的兩棲作戰的計畫，對於最後執行安那金（Anakin）作戰的準備工作也在繼續進行。但是它們都只是限於『行政上』的準備工作。換句話說，這些所謂的準備工作，是紙上作業，

（續）

（三），頁242-244。

190 For example, FDR cable to CKS through Soong, May 25,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2.

19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332.

192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6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05號檔案夾。

而不是把作戰裝備裝到船上。」[193] 換言之，英美兩國並未達成實質決定，但是卻決定裝模作樣，讓中國人相信作戰勢在必行。

當然霍普金斯還是因爲參加了會議所以才知道實情。而蔣介石對會場上發生的事情雖然一無所知，但是他還是覺得事有蹊蹺。羅斯福的電報曾說英美兩國已決定採取具體措施準備緬甸戰爭，包括向海岸線進行攻擊。但是蔣介石接到電報以後，在日記中寫道，「此乃完全欺人之詞，太不誠意。」[194] 但是爲了維持外交禮貌，蔣介石還是回信感謝羅斯福清除走向戰爭道路上的一個大阻礙物。他恭維羅斯福說，「尤其此次攻緬計畫，不惜排除萬難，毅然斷行。以及對各方運用之苦心，更使中對閣下欽佩與銘感不置。」[195] 儘管如此，蔣介石依然不忘重複聲明，中國參戰先決條件是同盟國履行它們在卡薩布蘭加的決議，以及阿諾德將軍在重慶作的承諾[196]。宋子文在此後也再一次從美國總統處得到保證，孟加拉海灣會有強大英國海軍作戰，並且一定收復緬甸南部[197]。

經過中美雙方領袖間這麼多次的會商和電報來往，美國的澄清終於使中國領袖相信，已經得到足夠保證，緬甸戰爭一定會按照原定計畫進行。中國政府這種新信念的表現是他們自己在5月底也作出了幾項讓步。此前，中國人一直要等到同盟國部隊先攻打緬南，然後中國才出兵攻打緬北，理由是同盟國必須首先切斷日本從東南亞抽調人員和武裝的運輸線。但是現在同盟國既然對第二次戰爭態度表現得如此堅定認真，中國政府也感到安心，因此願意接受南北兩地同步進攻的安排[198]。換言之，中國不再堅持先南後北的作戰順序。

到了此時，中方唯一對英美態度仍持懷疑態度的只有蔣夫人一人。遲至6月12日她依然告訴丈夫說，即使英美兩方目前完全接受他的計畫，它們以後還是可能反悔。她忍不住舊話重提，認爲更切合實際的方案是讓計畫分段實行。根據她對美國人心理的了解，假如中國人能夠先在局部(北部)戰爭中取得具體成績，那麼美國人會更願意在稍後進行全面(南部)戰爭[199]。

蔣夫人的悲觀看法不久就得到證實。1943年6月23日，她返國前夕到白宮向羅斯

193 Quotation from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732.

194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27日。

195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5月29日，《戰時外交》(三)，頁244。

196 蔣介石日記，1943年5月27日。又見：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5月29、30日，《戰時外交》(三)，頁245。

197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246-247。

198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8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05號檔案夾。

199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12日，《戰時外交》(一)，頁844。

福辭行時獲知，邱吉爾仍然不願對戰爭作出承諾，而美國也無法強迫英國採取行動。不過爲了安慰中國，羅斯福答應蔣夫人說，美國依然會在9月之前派遣兩個師的兵力前往緬甸[200]。以上所述，是1943年6月份的情況。

## 柒、小結

本章所參考過的資料，既不支持史迪威自認爲是第二次緬甸戰爭的倡議人和設計人的說法，也不支持他指責蔣介石是戰爭主要絆腳石的說法。事實上，中國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的關注，早在第一次戰爭尚未結束之前就已經開始。在本章所涵蓋的12個月內，中國政府立場始終一致，那就是，三個同盟國都應該各自履行承諾，務求如期開戰。

本章的討論也顯示，羅斯福對緬甸戰爭的立場，在短短的六個月裡（1943年1-6月）先後多次更改。他最早的立場是支持在緬甸全境作戰，繼而改爲支持局部作戰，再轉變爲要中方單方宣布取消作戰，然後回過頭來，先是支持全面作戰，繼之是要求局部作戰。羅斯福立場如此大幅度搖擺不定，其原因並不是他對戰爭重要性的評估有所改變，也不是他想尋找更好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而是因爲他無法贏得英國的合作，只好順著政治形勢向前走。同樣重要的原因是，美國並不願意耗費自己的資源打這第二次緬甸戰爭，即便後來爲了配合美軍在太平洋發動的攻勢，而改爲支持在緬甸進行大幅縮水的戰爭，美國仍然不願多投入自己的資源。美國這個態度就大大減少了它對英國施壓的力度，因爲美國等於是在請求英國出兵作戰。反之，設若美國當時願意承擔自己的一份兵力的責任（**也是史迪威和蔣介石所共同主張的**），則英國參戰的意圖必將相對提高，因爲它不願意被完全排除在戰局之外，而對緬甸未來情勢徹底失去控制。

羅斯福這種忽冷忽熱的多變作風，也嚴重擾亂了中國的準備步調，而且讓後者一直擔心戰爭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當然它更嚴重地干擾了整個中國戰區的防務部署，因爲中國爲了緬甸戰爭，需要無限期保留15到20個最精良步兵師的兵力作爲預備，其結果是嚴重削弱中國保衛其他地區的戰鬥力。

在同盟國最高階層間漫長的談判過程中，史迪威並非主要參與者，但一直是一位密切的關注者，並且也依然具有相當影響力。到1943年6月中旬，他開始呼應英美軍方的看法，並嘲笑中國政府堅持英美盟邦一定要收復仰光的想法是「天真」表現，並且把它

200 蔣夫人自紐約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25日，《戰時外交》（一），頁855。

看成是中國政府爲了不想參戰而作出的藉口[201]。雖然他的這些看法明顯前後矛盾，但卻深深地影響了他在華盛頓的上司。

再者，1943年5月間，史迪威和陳納德之間的辯論，也需要我們重新加以思考。多年來史學界主流的看法是，這兩位將軍的主張的確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戰略觀念，對於中國戰區未來的發展各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依照本章敘述，這場爭論的所謂「戰略」意義和影響，可能都被過分誇大了。這兩位將領之間確實有過大辯論，並且還把許多其他美國領袖們扯了進去。但是辯論所以如此激烈，最大原因並非其戰略意義有多深刻，而是在1943年春天，美國對中國提供的軍事援助量是少得如此可憐。在那種物資極度匱乏的條件下，即使在分配的優先次序上作一個微幅調整，都可能對不同軍種的將領們造成嚴重威脅，進而使他們忍不住把不同意見誇大成戰略層次上的選擇，以求在聲勢(宣傳)上壓倒對方。

就本質而言，陳納德和史迪威的辯論，充其量不過是一場行政單位中的內鬥，爭奪的目標只是在短暫的幾個月之內，對微量物資如何進行分配的問題而已。它實在不是一場可以影響整個亞洲大戰局勢，而又針鋒相對的兩個戰略觀念的基本衝突。即使完全採納陳納德的主張，美國也不可能爲中國建立一個強大空軍去打敗日本。反過來說，即使完全依照史迪威的主張，美國也不能爲中國建立一支強大陸軍去打敗日本。他們爭吵的兩、三千噸物資，在美國巨額的軍火生產總值中只是九牛一毛之數[202]。在同盟國的全球作戰體系裡，一個貨真價實的「戰略辯論」應該是如何重新分配「九牛」，而不是如何切割「一毛」。硬要把它提升到戰略觀念層次，委實牽強附會，言過其實，甚或蓄意避重就輕。因爲同樣的辯論不可能會發生在同盟國其他任何戰區之內。原因是，絕大多數有理性的軍事領袖都會主張陸、空兩軍均衡發展。

有關這一點，有幾組數字可以說明當時的情況。首先，從美國援助盟邦的數字來看，根據美國政府資料，從租借法案開始到1943年4月30日爲止(正是史迪威陳納德「辯論」之日)，美國總共向盟邦提供了價值$9,214,000,000美元的物資援助，其分配大致爲：英國——$7,030,000,000(76.3%)；蘇聯——$1,899,000,000(20.6%)；中國——$133,000,000(1.5%，但是其中大部分為紙上作業，或許沒有從美國撥出，或許滯留印度，沒有運進中國)；其他地區(加拿大、澳洲等)——$152,000,000(1.7%)[203]。就

20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16, 1943, p. 169.

202 經由駝峰運往中國的物資在1943年4月為2,515噸，5月為3,147噸。見："Historical Section, Headquarters, USAF in CBI, APO 885",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 Sec. 2: VIC.

203 "Secret Data on the War Effort", dated June 7, 1943.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整個太平洋戰爭期間而言，這種情形持續惡化，一直要等到戰爭最後一年(1945)，當德國日本相繼失敗後才略見改善。

**美國租借法案援助各國的數量**

百萬美元

| 年份 | 中國 | 占全部的百分比 | 其他各國 | 占全部的百分比 |
|---|---|---|---|---|
| 1941 | 26 | 1.7% | 1,540 | 98.3% |
| 1942 | 100 | 1.5% | 6,893 | 98.5% |
| 1943 | 49 | 0.4% | 12,011 | 99.6% |
| 1944 | 53 | 0.4% | 14,940 | 99.6% |
| 1945 | 1,107 | 8.0% | 13,713 | 92.0% |
| 總數 | 1,335 | 2.0% | 49,097 | 98.0% |

資料來源：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 350.

其次，必須記得的是，這些數字只是美援部分，並沒有包括爲數更爲驚人的美國軍方自己的兵力部署和戰爭支出。而美國在亞洲大陸(中國)和南亞地區(印度)沒有駐紮陸軍作戰部隊。在整個的中國－緬甸－印度戰區(China- Burma-India Theater)，美國軍事人員共有65,576名，其中59,382(91%)駐在沒有戰爭的印度，僅有6,194名(9%)駐在中國。其中約一半是空軍人員，只有約1,000名人員負責陸軍訓練和後勤業務，無一人是地面作戰人員[204]。最後說到美國的空軍規模，美國陸軍航空隊飛機總數，在1942年底已達到33,304架，1943年底達到64,232架；而美國海軍航空隊作戰飛機，1942年底也已達到11,813架，1943年底達到25,892架[205]。再就太平洋地區而言，美國和日本空軍的對峙實力是：1942年1月美國3,537架，日本2,520架，但是到了1943年1月，美國已達到11,442架，而日本只有3,200架，此後的差距愈拉愈大[206]。但是中國卻繼續爲500架的數目而掙扎。

204 "Personnel Strength All U.S. Units in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As of October 15, 1943",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0, File 115.

205 John Ellis, *Word War II – A Statistical Survey –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tants*(NY: Facts On File, 1993), pp. 242-243.

206 *Ibid.*, p. 233.

**英美德日四國的飛機生產量比較**

| 年份 | 日本 | 德國 | 英國 | 美國 |
|---|---|---|---|---|
| 1939 | 4,467 | 8,295 | 7,940 | 2,141 |
| 1940 | 4,768 | 10,826 | 15,049 | 6,086 |
| 1941 | 5,088 | 11,776 | 20,094 | 19,433 |
| 1942 | 8,861 | 15,556 | 23,672 | 47,836 |
| 1943 | 16,693 | 25,527 | 26,263 | 85,898 |
| 1944 | 28,180 | 39,807 | 26,461 | 96,318 |
| 1945 | 8,263 | ---- | 12,070 | 46,000 |

資料來源：Norman Polmar &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 pp. 880-881.

事實上，除了美國政府預設的立場之外，沒有理由迫使陳納德和史迪威兩位將軍，把中國戰區物資匱乏的現狀，當成絕對不可改變的事實，進而被迫在物資分配的優先順序和時間表上，成爲勢不兩立的對手。如果陳納德和史迪威兩人聯合起來，要求軍部重新檢討它對中國戰區的分配總數，或許才是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舉動。

這場辯論的所謂戰略性質還有一個令人懷疑之處，那就是實際涉及的考慮因素錯綜複雜(包括政治、軍事、中美雙方的心理狀態)，再加上辯論雙方爭取同情者的努力，又大量訴諸感情(個人恩怨、幫派心理、陸海空軍種間的爭風吃醋、以己度人，甚至散布謠言，中傷對手等等)，以致用錯誤的「一分爲二」思維方式，徒然造成一個軍種(陸軍)和另一個軍種(空軍)之間並無意義的對立情緒。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的心態因素。他在此時仍然安於現狀，對於駝峰的成績並不感到沮喪，也不認爲在印度的空運設備和作業程序有嚴重缺陷，更不曾向英國人力爭要求改善。因此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和陳納德爭奪當前的空運噸位，而不是力求增加噸位[207]。

遺憾的是，有些史學著作者在討論這場辯論時，並沒有仔細分析史迪威說法的正確性，更沒有參考蔣介石的言行，去檢驗他們自己判斷的正確性。這類著作有兩個明顯缺失。

第一，他們之中還沒有人去作基本的研究工夫，從蔣介石公開或是私下言詞，或是他和親信間的書信來往中找出憑據，證明他果然曾經認真相信，只要有500架美國飛機就可以擊敗日本。在此需要記得的是蔣介石和陳納德是兩個不同國家的軍人，就

207 Supplementary minutes of Joint Chiefs of Staff meeting, May 4, 1943. Verifax Folder 6, Xerox 1537. MFA.

像他和史迪威是兩個不同國家的軍人一般。必須分開處理。不管是陳納德或是史迪威的想法都不能和蔣介石的想法畫上等號。蔣介石對於空軍的想法究竟如何，必須從中國的史料中去找證據，不容隨興臆度。更何況，蔣介石和羅斯福都支持陳納德，這並不意味著羅斯福也想只靠陳納德打敗日本。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是都想摸索各種打敗日本的辦法，然後給予實質支援以測試它的有效性。

第二，他們之中沒有人費神檢查蔣介石早在1942年春天就明白表示過的態度，因爲他在那時就已經把史迪威後來頗以爲是慧眼獨具而用來批評陳納德的話講過一遍了。在這個意義上，史迪威的分析其實全無獨到見解，他只不過是拾蔣介石的牙慧，重複後者早已悟出的道理而已。

我們需要記得，早在1942年4月，美國軍方已開始向中國要求，允許美國飛機使用華東機場(浙江衢州)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有趣的是，蔣介石極力敦促美國推延此項行動，他的理由正是：中國的地面部隊還需要多一點時間，準備迎接日本必然會隨之作出的大規模報復行爲。事實上，蔣介石私下的反應更爲憤怒，因爲他認爲美國的要求根本違反中國的作戰計畫，純屬損人利己[208]。

但是時隔不久，美國卻在向中國保密的情況下，逕自發動杜立特(Doolittle)對日本本土的空襲，更未經中國政府批准便逕自把飛機降落在華東地區[209]。中國政府的官方姿態，雖然不得不強顏歡笑慶賀美國空軍轟炸東京成功，但是蔣介石私下的反應卻是萬分憤怒。原因是中國已經明白警告美國，它的空軍行動將會激怒日軍進行地面報復，但是美國當局根本不在乎中國華東地區承受重大災難。當日軍對華東飛機場(浙江衢州、麗水)的報復攻擊終於發生後，蔣介石認爲美國人想要使用這些飛機場的目的，只是想要收到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的宣傳效果，對於戰爭大局並不能產生重大影響。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後，他決定拒絕美國建議，不肯動用精銳部隊去加以保衛。換言之，美國政府只是爲了自己的宣傳需要和鼓勵士氣，想在空中有所表現，蔣介石則拒絕讓中國承受日本的懲罰。因此他只動用了戰區內的部隊進行抵抗。相對而言，蔣介石對西南地區的飛機場就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態度，因爲它們的戰略價值遠超過華東地區的飛機場。爲了保衛這些飛機場，他不惜動用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和美國駐華空軍[210]。

如此說來，在史迪威和陳納德進行辯論的12個月之前，蔣介石已經用同樣的理由警告美國軍方，在中國尚未對其地面部隊作出充分準備，並有能力保衛這些飛機場之

208 蔣介石日記，1942年4月14-15日。

209 同上，1942年4月18日。

210 蔣介石日記，1942年5月23、27、29、31日。

前，美國千萬不可魯莽使用空軍對日本進行大規模攻擊。然而美國就是因爲堅持展示其空軍威力，才把蔣介石的警告當成耳邊風，致使中國華東地區受到嚴重創傷。令人特別感到諷刺的是，史迪威在1943年5月間，大致重複了蔣介石在1942年5月已經說過的話，但他卻把它當成是自己的創見，同時懷疑蔣介石的智力不足以了解其中的關聯性。當然，時移勢變，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仍有其不同之處，因爲史迪威在1943年所最關心的是租借法案物資，他想要用其主要部分來支援自己的練兵計畫，而不願意用來維持陳納德小型空軍的作戰需要。

同樣具有諷刺性的是，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竟然會引用1942年華東飛機場失陷的例子，來證明史迪威所持論點是獨具慧眼的真知灼見。他們似乎忘記了，這些飛機場的失陷並不足以證明史迪威論點的正確性，反而正好證明蔣介石預測的正確性。蔣介石當年拒絕動用精良部隊保衛華東飛機場，是因爲這些飛機場對於中國抗戰大局並不具有舉足輕重地位。我們從蔣介石私人手稿中，其實看不出他對空軍曾有過太多的遐想(不管是蘇聯或是美國空軍)，或是把空軍看成是贏得戰爭的法寶。他對杜立特空襲日本所造成的戰果也沒有大爲激賞，即使私下在日記中亦未著筆。對他而言，保衛中國大後方永遠比一舉擊潰遙遠前線的敵人來得現實得多。

在此值得順便一提的是馬歇爾這位關鍵人士的看法。多年後，他在一次和替他寫傳記的學者談話(1956年11月21日)時，這位學者問了一個非常具體問題：蔣介石當年被陳納德的說法所「打動」的主要原因，是蔣介石不想用中國軍隊去打日本人？或是他只想用它們去打共產黨？或是他就是反對史迪威？馬歇爾的回答是：「我無法對蔣介石的反應作出任何解釋，我只能說他強烈反對英國人……」既有趣而又可惜的是，馬歇爾的回覆答非所問。他完全有機會作出一個清晰的判斷，而他竟然只說出一個聽起來不相干的理由，又未加以解釋。不過他至少沒有表示支持當時流行的陰謀論，也沒有指責蔣介石迷信空軍威力[211]。

最後還應該指出的是，無論是史迪威或是陳納德，他們的論點都沒有被後來中國戰區的發展證明爲正確無誤。有一種長年以來頗爲流行說法是，1944年日本發動一號作戰證明史迪威判斷正確，因爲一旦日本決心發動大規模地面攻擊，中國的飛機場便變得岌岌可危。這個說法本身大有可以商榷的餘地，因爲實際情況十分複雜(見本書第9、10章)。再說，不管史迪威和陳納德在辯論時各自申述的見解如何，蔣介石對於空軍的看法和採取的措施，應該接受單獨檢驗，而不應和以上兩位美國將領間的爭執

211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November 21,1956, Larry I.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364.

糾纏在一起。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可輕易地把蔣介石和陳納德在戰略思想上歸爲同夥人。迄今爲止，沒有史料顯示蔣介石或是中國其他領袖，曾經在1942-43年夢想用美國在華空軍的力量，在戰略上替中國打敗日本；而他們一再渴望的是，美國空軍可以對中國的地面作戰部隊進行有效的戰術支援。

美國的戰爭資源極其豐富，不愧是同盟國的軍火庫，但是它投入中國的戰爭資源極其貧乏。在這樣一個不尋常的環境之下，史迪威和陳納德的辯論根本無法產生長遠有效的戰略原則。他們爭吵的無非是少得可憐的幾百噸到幾千噸物資而已。無需誇張地說，它們僅僅只能裝滿一艘由美國開往英國或是蘇聯的軍火船而已。一個有真正意義的戰略辯論，應該在一個更高的行政和思想層次上進行才對。從這個觀點來看，所謂史迪威和陳納德「戰略辯論」的重要性，遠不如另外一場早已胎死腹中的辯論，那就是莊穆將軍作爲候選人時，企圖在軍部內部引起的辯論（見第2章）。假如軍部的領袖當時接受莊穆將軍的挑戰，並因此作出決定，認爲中國戰區根本不值得美國去投資，那麼它們在中國戰區就應該追求非常有限的戰略目標。反之，假如它決定中國戰區有足夠的重要性，那麼從1942年1月開始，就應該向中國提供合理數量的物資，史迪威和陳納德的辯論大概也就不需要發生，而美國軍方也不需要面對一個虛假的選擇（**到底是補充空軍或是陸軍**），因爲一定會有足夠的物資，同時滿足兩個軍種各自有限而又合理的需求。話說到底，即使有了500架作戰飛機之後，中國戰區仍然是同盟國在全世界各個戰區中，空軍力量最薄弱的地區，更不必說中國全國此時收到的全部援助物資的總數，只不過等於一兩個美國作戰師在世界其他任何戰區所能獲得的補給品而已。

總而言之，所謂陳納德和史迪威辯論雷聲大雨點小，是兩個軍種爲了一些小額分配不均所作的爭吵，不幸卻被人爲地誇張和提升到一個虛假的戰略層次上去大吵特吵。尤其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正當史迪威和陳納德被迫爲了每個月7,000噸物資的分配鬥得不可開交時，塞末維爾將軍卻已經有信心可以達到每個月20,000噸的空運數量了。這個空運物資的數量一旦實現，不但可以使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鬥爭變得毫無必要，而且各自都可以作出更好的成績。但是美國參謀長的錦囊中自有他們的妙計。他們寧可把這個能力秘而不宣，也不願意盡快發揮出來。而不久之後的發展也證明了塞末維爾將軍的自信是有道理的，當美國軍方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改善駝峰的效率之上時，他們很快就獲得成功。不知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是否還記得被視爲具有所謂「戰略」意義的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的辯論？

# 第八章

# 虛幻的樂觀和實質的衝突：1943年6月-1944年6月

## 壹、緬甸作戰計畫重現曙光

### 一、1943年7-8月：接踵而來的好消息

1943年6月中旬，史迪威從美國回到重慶，並向蔣介石報告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已經同意使用強大海軍力量掌控緬甸近海[1]。雖然史迪威帶給中國的是一項好消息，但是他在報告過程中態度之反覆還是令蔣介石大爲不滿。他最初告訴蔣介石(6月28日)說，他會呈交一份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詳細文件的翻譯本，其中包括戰鬥中要使用海軍力量。不久之後，他突然以保密爲由，拒絕交出該文件。當遭到蔣介石斥責後，他再度答應交出文件，但是隨即又反悔。這種反覆當然引起蔣介石極端不解和不快。他在日記中寫道：「史之愚拙頑劣卑鄙實世所罕有。美國有此軍官，而其長官馬歇耳且視爲一等人才，豈不怪哉。」[2]

在蔣介石終於拿到文件後，得知英美將在緬甸海岸進行海陸聯合作戰，控制孟加拉海灣，並切斷日本運輸線[3]。史迪威在受到蔣介石再度申斥後，還交出另外一份文件，詳列參加海戰的艦艇番號[4]，同時又提供一份備忘錄，說明英美參謀首長聯席

1 JWS t-w diary May 27-June 15, 17, 1943.

2 蔣介石日記，1943年6月28日。JWS t-w diaries, June 28, 1943.

3 英美參謀長聯席會備忘錄，1943年6月19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63冊，第007號檔案夾。For Stilwell's account, see: JWS t-w diaries, June 29, 1943.

4 史迪威呈蔣介石文件，「為取得孟加拉灣之制海權必須派遣之兵力估計書」，1943年無日期(但是大約在7月8日之前)，《戰時外交》(三)，頁628。

會準備如何進行緬甸作戰，內容大致與同盟國最早擬定的計畫一致[5]。看到這些文件後，蔣介石立刻表示接受英美兩國的各項建議[6]，並同時指示屬下將領加緊進行作戰準備[7]。

儘管中國政府對英美政府傳送來的「好消息」感到滿意，但是史迪威本人1943年5-6月間在華盛頓和重慶的言行，卻招致蔣介石高度憤怒，因此蔣介石在7月初的日記中寫道：「史迪威之言行態度實令人嫌惡，彼則以此爲輕侮我國所應爾。其實是其自暴自棄，卑鄙欺妄，使其美國軍人與民族降低特甚也。」[8]換言之，即使蔣介石在對英美有關緬甸戰爭的決定表示欣慰的同時，他對史迪威個人的不滿程度卻仍在持續升高之中。在他看來，史迪威對他的態度基本上是自大、懷疑、不敬，並把他（蔣介石）當成是一個既愚蠢又無知的人來看待[9]。如前文曾經提到，蔣介石對緬甸戰爭的態度和他對史迪威的態度截然不同，千萬不可混爲一談，否則就會導致人們作出重大誤判。這正是以往不少史學著作所忽視的要點，把他對史迪威個人的不滿誤解爲對緬甸戰爭的缺乏熱誠，而史迪威本人當然也特別希望去鼓動這種誤解。

然而在一個短期之內，史迪威對於蔣介石的強烈感覺似乎既未察覺也不在意。他反而爲蔣介石接受緬甸戰區的計畫而大爲高興。就像他7月12日日記所寫：「這是一個應該用紅筆勾出的日子」，原因是「花生米給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計畫作出了回答。白紙黑字，還簽了名。在經過一年的鬥爭之後，我們終於把他綁住了。讓他在書面上承諾了進攻緬甸。」[10]但是史迪威並沒有認真想過蔣介石之所以接受作戰計畫，是因爲他以爲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和史迪威都已經承諾，英國會在孟加拉海灣進行全面性海軍攻擊，也會在緬南和緬北同時發動攻擊[11]。

此時還有一些其他發展尤令蔣介石倍感放心。一個發展是羅斯福接受蔣介石建議，委派陳納德擔任中國戰區空軍參謀長，同時擔任美國第14航空隊司令官[12]。另一

5 史迪威呈蔣介石文件，「關於反攻緬甸之作戰計劃建議書」，1943年無日期（大約在6月19日之前），《戰時外交》（三），頁627-628。

6 蔣介石致史迪威電，1943年7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629。《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7月10日。

7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7月8日。

8 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4日。

9 同上，1943年7月29日。

1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July 12, 1943, p. 173. He had more to say in his t-w diaries. See: JWS t-w diaries, July 12, 1943.

11 蔣介石日記，1943年7月21日。

12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7月17日，《戰時外交》（三），頁252。

個發展是宋子文收到英國海軍司令官保證，英國一定會派強大艦隊進入印度洋，而且海軍在陸空軍準備就緒之後，絕不會耽擱開戰日期[13]。到了8月11日，邱吉爾再度以書面方式向蔣介石提出保證，一旦意大利戰局穩定，英國將立即向印度洋派遣大量海軍艦艇[14]。

因此，1943年7-8月間的一切表面跡象均顯示，緬甸戰爭計畫都正按照日程表進展。8月15日，蔣介石致電表達對邱吉爾承諾(8月11日)的謝意[15]。由於此時緬甸雨季即將結束，而蔣介石又得知羅斯福和邱吉爾即將在魁北克(Quebec)舉行會談，因此他敦促兩位領袖盡快擬定進攻緬甸的具體方案，期使昆明和仰光兩地間的運輸線早日通暢無阻[16]。

## 二、1943年8月底的魁北克會議

1943年8月19-24日的魁北克會議，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Southeast Asian Command, SEAC)，並指派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爲總司令，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領導下，負責加緊緬甸戰爭的籌備工作[17]。不過，此時美英兩國尚有歧見，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主張在緬甸全境發動戰爭，但是英國並不熱心，最後雙方妥協，把是否要收復仰光留待以後再決定。根據這個協議，馬歇爾通知史迪威說，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至少授權收復緬北，從而建築新路並擴大空運數量[18]。

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沒有把兩國的保留事項如實告訴蔣介石。他們實際上告訴蔣介石的是，同盟國正在作海軍和兩棲登陸戰的準備，目的是爲緬北作戰提供足夠的海軍支援，奪取孟加拉灣的制海權，以便切斷敵人向仰光方面的補給和增援[19]。另外宋子文也從羅斯福和邱吉爾處得到(8月23日)保證，同盟國肯定會對在仰光的登陸戰提供海上掩護行動[20]。

---

1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8月3日，《戰時外交》(三)，頁254-256。

14　蔣介石致邱吉爾電，1943年8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258。Message from Churchill to CKS, August 11,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7.4.

15　蔣介石致邱吉爾電，1943年8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258。

16　蔣介石致羅斯福及邱吉爾電，1943年8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259。

17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 257. Also: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 1958), pp. 253-254. 羅斯福及邱吉爾自魁北克致蔣介石電，1943年8月25日，《戰時外交》(三)，頁260-261。又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6日。

18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 256.

19　羅斯福及邱吉爾自魁北克致蔣介石電，1943年8月25日，《戰時外交》(三)，頁260-261。

20　Soong cable to CKS, August 23, 1943,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0-2.

實際上邱吉爾當時心中所想，和他對蔣介石所說完全是兩碼事。邱吉爾在他給參謀長伊斯麥(Hastings Ismay)的信中寫道(8月20日)：「我的立場和上次會議時完全一致，那就是從仰光經過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往北進攻曼德勒的戰爭，對於我們有害而無益。進攻阿恰布(Akyab)也同樣是浪費而且愚蠢的做法。」[21]因此，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1943年8月24日作出決定：「在緬北進行戰鬥。收復緬北的目的是改善空運路線，和建造在陸上通往中國的交通線。開戰日期擬爲1944年2月中旬……繼續準備在1944年春季的兩棲作戰……目的是占領阿恰布(Akyab)……」[22]會後也立即向羅斯福和邱吉爾報告此一決定。

這就是說，美國人其實已經對英國讓步，同意把緬甸戰爭的範圍縮小到緬北地區，並且還要延遲到1944年春天才發動。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此時的報告，明顯也不再提孟加拉海灣或是仰光港了。如果說美國人至少還期望在緬北作戰勝利後繼續向仰光推進的話，英國人則根本想避開仰光，直接進攻新加坡。換句話說，聯席會議達到的共識是只對緬北發動攻勢，至於是否向仰光進攻，則留待以後商量[23]。

就蔣介石而言，縱使有同盟國保證，他還是疑慮羅斯福和邱吉爾的電報別有玄機。但是特別讓他感到氣憤的是，儘管魁北克會議對援助中國尚沒有作出實質行動，但是英美政府卻急不及待地大肆展開宣傳，把它們的決議都說成是幫助中國的慷慨行爲[24]。

即使有關緬甸問題的協議寫得如此疏鬆，英國人還是認爲他們對美國施了一個莫大的恩惠，忍不住想趁機從美國人手中榨取更多油水。9月22日，英國印度軍總司令奧欽勒克(Claude John Eyre Auchinleck)突然宣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魁北克會議時曾經作過承諾，從原定撥給中國的每月10,000噸物資中抽出3,000噸交給他的部隊使用。這是一個龐大數字，相當於給中國全部物資的百分之三十。奧欽勒克既然聲稱是經過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授權，美國人當然不敢掉以輕心，可是經過仔細翻閱各項文件之後，認爲奧欽勒克的說法並無根據[25]。奧欽勒克的印度軍本來就已經得到大批美

21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 88.

22 "FIN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QUADRANT CONFERENCE", from "EXTRACT OF CCS 319/5, 24 AUGUST 1943".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2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57-359.

24 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9、31日。

25 General Auchinleck's message to General Stilwell, September 22, 1943; memo by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CCS, September 24, 1943; message from U.S. Chiefs of Staff to British Chiefs of Staff Regarding Burma-China, September 24, 1943; Combined Chiefs of

援物資，如今還想額外索取。而美國軍部雖然沒有接受奧欽勒克的要求，但也著實忙碌了一陣子，顯示他們對待中國和英國兩個盟邦的態度，的確有明顯差別。

魁北克會議語焉不詳的決議，逼使蔣介石不得不向羅斯福和邱吉爾重申其一貫立場：那就是，同盟國若不準備占領緬南海岸線和交通點，則敵人對仰光的後勤供應和兵員補充將源源不絕，甚至會使緬北戰事遭遇重大阻力[26]。爲此，蔣介石希望同盟國說明白，到底它們在孟加拉海灣預備採取何種海軍行動。因爲只有這樣，中國政府才能判斷緬北作戰是否具有意義[27]。更有進者，蔣介石還懷疑英國根本不願意見到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因此也希望美國能夠就此問題給予明確答覆[28]。儘管蔣介石心中存有這些疑慮，他仍舊期望戰爭能夠成爲事實。因此，他繼續從一般軍隊中抽調合格的士兵，去補足遠征軍缺額[29]。

與過去一樣，同盟國的反應不是向蔣介石澄清真相，而是加倍努力掩蓋真相。因此當蔣介石收到同盟國的回覆時，它表面上是向蔣介石提供更多有關計畫的細節，但實際上其文字之含糊使得蔣介石抱怨，儘管他細心研讀多遍，仍無法參透同盟國的意向究竟爲何[30]。這種情形自然增加蔣介石的懷疑，認爲同盟國的真正意圖，是根本要把中國摒除於緬甸戰爭之外[31]。

就在魁北克會議時，同盟國的另外一個擊敗日本的新方案也正在逐漸形成之中。英美高層參謀人員雖然仍舊認爲，中國是轟炸日本本土和最後在地面上進攻日本本土的最佳基地，但是他們同時逐漸認識到從中部太平洋地區向日本發動攻擊的可能性。雖然他們當時還沒有認識到，有可能從太平洋對日本本土實施空中攻擊，但是擊敗日本的路子似乎愈來愈寬了[32]。

一旦美國領袖決定要從日本人手中奪下中部太平洋地區之後，他們對於緬甸戰爭能夠吸引更多日軍增援的渴望就變得愈加強烈。換言之，緬甸戰爭的戰略意義，正隨著中國戰區戰略價值的改變而逐漸轉變中。在美國新一輪的擊敗日本大戰略裡，緬甸戰爭不再是爲了運送更多物資進入中國去增強中國的戰鬥力，而是利用它能夠從其他

(續)

Staff document O.C.S. 327/1, September 28, 1943. All in Xerox File 2029, Folder 8, MFA.

26 蔣介石致羅斯福及邱吉爾電，1943年9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261-262。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9日。

27 蔣介石致羅斯福及邱吉爾電，1943年9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261-262。

28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9月26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409。

29 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14日。

30 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19日。

31 同上，1943年9月25日。

3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57-359.

日本占領區或是本土吸引更多日軍去增援緬甸，從而減少日本可以增援太平洋島嶼的力量。同盟國的官方宣傳調子儘管未變，但是一個有趣的實質現象正在日趨明顯之中。那就是，儘管中國戰區戰略價值正在減低，但是緬甸戰爭反而變得更加重要。其根本原因是它可以幫助美國軍隊經由跳島戰略，加速向日本本土推進，並且大幅減少美軍傷亡。在美國早期戰略思想中，如果要想把中國扶植成爲強國的話，那一直是耗時費資的工作，何況成果還無法保證。但是正如馬歇爾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會議中的發言，如果利用中國和緬甸地區的戰爭，能夠拖住大量日本軍隊的話，那麼就可以立刻幫助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戰事的進展，至於中國戰區本身戰略價值的降低，或是能否得到充足的軍事補給，那就已經是一個次要的考慮了。

## 三、作戰計畫推進的跡象

9月間，蔣介石感受到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壓力：史迪威和中國將領。史迪威擔心的是，萬一緬甸戰爭不能實現，則英國人將據以證明他們的判斷從來正確，同時也會主張將今後同盟國作戰方向，從中國戰區轉移到東南亞其他地區去。如果緬甸戰爭計畫因之流產，也會讓英國人更有藉口，要求把原來分配給中國的軍火物資改送往其他地區(比如說英國人控制的地區)，隨後就會更加降低中國的戰略價值[33]。因此史迪威警告蔣介石說，中國唯有積極準備發動緬甸戰爭，才能避免這些不良後果。

從蔣介石角度來看，他當然極不願看到英國人從緬甸戰爭中抽身而退。他向來就懷疑英國根本沒有意願在亞洲作戰，也相信英國人內心深處不願意讓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更何況如果讓中國在戰後變成強國的話，還可能威脅到英國在亞洲的殖民地位[34]。在這種情形下，蔣介石似應認真對待史迪威的警告，盡其所能使戰爭計畫得以順利展開。

但蔣介石也同時從他自己手下的某些將領處得到另外一種訊息，這些將領感覺緬甸戰爭太像是一場宣傳把戲：羅斯福用之來唬弄美國的共和黨，邱吉爾用之來唬弄羅斯福，而羅斯福和邱吉爾又聯合起來唬弄中國人[35]。陳誠特別讓蔣介石惱火。雖然他是史迪威中意能夠率領中國遠征軍的少數將領之一，但他卻數度致函請求蔣介石解除其遠征軍司令官任命。蔣介石震怒之餘，乃至威嚇陳誠，若不收回要求，以後將永不

33 有關史迪威致蔣介石第56及57號備忘錄的描述，見：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9月15日。Also: memorandum from Stilwell to CKS, No. 56, October 6, 1943,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3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3日。

35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9月5日。

錄用[36]。因此，當史迪威認爲中國動作緩慢而感到不耐時，有些中國將領卻主張慎重從事，先由同盟國作出更具體行動以證明它們對緬甸戰爭的誠意。

中國將領們的懷疑，迫使蔣介石要求美國提出更多的證據，來證明它的確想在緬甸作戰。事實上，從1942年底以來，蔣介石就已經明白表示，希望美國可以增加對中國地面部隊的武器援助(包括步兵槍支、砲兵和工兵的裝備)，並且可以把這些援助的優先順序，擺在對空軍支援和蘭伽訓練工作的前面[37]。因此，蔣介石儘管對美國不派步兵到緬甸作戰一事採取默認態度，卻希望美國至少把更多的武器送到中國，讓中國能夠完成它自己對緬甸作戰的準備。順便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甚至要求美國把對中國陸軍援助的武器，看成是比對空軍的援助更優先。這就讓那些1943年5月附和史迪威，批評蔣介石只想靠美國空軍力量打敗日本的人的行爲，似乎更顯得無中生有了。

兩個來自同盟國的動作似乎令蔣介石感到鼓舞。10月15日，美國派後勤補給部長官塞末維爾(Brehon B. Somervell)將軍到重慶，商談作戰的準備工作。當塞末維爾要求蔣介石同意，由英國蒙巴頓將軍統領同盟國在緬甸的軍隊時，蔣介石當即予以同意[38]。幾天後，蒙巴頓本人也帶著邱吉爾的信件來到重慶(10月18日)，信中指出，英國準備在1944年2月在印度洋海域集結一個強大的海軍艦隊，以便對緬甸進行海上和空中攻擊。邱吉爾的信讓蔣介石覺得，這個艦隊比以前形容的更爲強大，而且一定可以摧毀日本海軍[39]。不久之後，在蔣介石所主持的三國軍事會議上，蒙巴頓再次明確陳述，同盟國爲緬甸戰爭所集中的海軍將會非常強大，而且超過日本海軍所能抗衡，同盟國的空軍同時也會有兩倍於日本空軍的實力。蒙巴頓敦促蔣介石讓中國遠征軍在12月前完成作戰準備，並且宣稱，他本人將親自決定同盟國軍隊在緬甸海岸登陸的具體地點[40]。兩位同盟國高級將領的訪問重慶，和他們在三國軍事會議上的言談，都讓中國領袖充分相信，緬甸戰爭確實將於1944年春天展開，而且英國和美國都將恪守它們的全部承諾[41]。

和過去一樣，史迪威對同盟國真正意圖的了解，遠遠超過蔣介石。因爲當蔣介石還在爲同盟國的姿態感到欣慰時，史迪威已寫好一個備忘錄，嚴厲批評東南亞戰區作

36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9月14、15日。蔣介石致陳誠信件，1943年10月14、26日，及11月15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3冊，#15422、#15434。

37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2年10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193-195。

38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10月17日。

39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10月18日。

40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10月19日。

41　同上，1943年10月20日。

戰計畫。史迪威備忘錄的日期標明爲1943年10月27日，他對東南亞戰區的作戰計畫形容如下：「(a)對緬甸戰爭的計畫工作充滿了對失敗的恐懼，不願意採取大膽行動。到現在爲止，所有的計畫都只是對後勤需要的估計而已。(b)一個強大的艦隊、強大的陸軍、強大的空軍將交給蒙巴頓指揮——而敵人卻沒有艦隊空軍，和只不過4-5個步兵師而已。」史迪威更進一步嚴厲批評計畫中的若干要點。比如說，從印普哈(Imphal)向更的宛河(Chindwin)的攻擊，竟然沒有過河計畫。再比如，中國遠征軍在印度和雲南的兩支部隊，需要依靠它們自己的能耐會師和開闢緬甸路。史迪威在備忘錄結尾時，毫不留情地寫道：「我們根本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偵察工作，更不必說認真地實行攻擊了。」[42] 就這樣，同盟國對付蔣介石的手法是裡一套外一套，務求不能讓中國政府得知真相。

## 貳、宋子文的失勢

恰恰在這個時候，史迪威本人的職位正面臨嚴峻考驗。

珍珠港事件以來，有兩位中國領袖在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關係中一直擁有重要的影響力。一位是蔣夫人，另一位是宋子文。但是他們扮演的角色和牽涉的深度各有不同。

蔣介石和史迪威在重慶見面時，蔣夫人幾乎全程參加而且經常充當翻譯。她自己也直接和史迪威有深度交談，並和史迪威保持單線聯絡方式。她從和居里的長期書信來往以及和羅斯福的接觸中，更加深了她對史迪威在中美關係中所占地位的了解。正由於她對中美關係許多敏感內情的掌握，和她對美國一般情況的了解，她成爲蔣介石處理史迪威問題上倚仗的心腹。簡言之，她不但是在重慶現場最權威的觀察者，也是蔣介石和史迪威接觸的參與者和私人參謀。在這些角色中，她唯一的弱點是她數度長期離開重慶，比如到美國和巴西醫病。在離開重慶的時候，她對於蔣介石和史迪威的交往過程，最多只得到一些簡報而不知道詳情。至於她和史迪威個人之間的關係，則是客氣而實事求是。他們之間偶爾也會在語言上針鋒相對，但是彼此並無深刻敵意。

宋子文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他從1940年中期即長駐華盛頓，是第一個和史迪威發生接觸的中國官員。開始時他對史迪威的任命表示出高度熱心，但1942年5-6月獲悉蔣介石對史迪威與日俱增的埋怨後，就從來沒有懷疑過蔣介石對史迪威的評判。事實

42 Memo from Stilwell to S.E.A.C., October 27, 1943,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7, Folder 215.

上，蔣介石的敘述很快讓宋子文認定，史迪威有精神不穩的症狀，建議蔣介石及早要求美國撤換。從蔣介石1942-43年間致宋子文的大量電文中可以看出，宋子文或許比蔣夫人更能體會蔣介石內心對史迪威的感受，因此他對處理史迪威問題的態度，也比他的妹妹更明快果斷。事實上從1942年6月開始，宋子文變成唯一主動設法去解脫蔣介石煩惱的中國官員。爲了達成這個目的，宋子文前後拜訪過美國總統、總統助理居里和霍普金斯，以及軍部高層領袖[43]。

在這幾個月裡，一個有趣的互動模式逐漸浮現。先是蔣介石會爲史迪威問題而向宋子文大吐苦水。當宋子文被蔣介石的述說激怒，因而主張蔣介石應該斷然要求美國政府撤換史迪威時，蔣介石又變得猶豫不決。就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宋子文以爲他已經從美國總統、其他白宮幕僚，乃至軍部領袖那裡得到足夠的默許，可以要求撤換史迪威，而宋子文本人也認爲這是最合情合理的處置方法時，蔣介石卻總是瞻前顧後，無法痛下決心採取最後必要的措施。久而久之，宋子文失去耐心，遂自作主張，決定採取必要的行動來爲蔣介石解脫痛苦。

## 一、宋子文試圖撤換史迪威的努力

1943年4-5月，史迪威回到華盛頓述職，宋子文此時終於對史迪威的作風有了親身體驗。史迪威在公開場合對著一大群同盟國軍事將領們，肆無忌憚指名道姓地抨擊蔣介石和嘲弄中國軍政領袖，而這些批評很快就在華盛頓政治圈中傳開。宋子文爲此異常憤怒。縱使宋子文以前只是蔣介石的忠實聽眾和忠誠參謀，此時他卻漸漸地變成一位把史迪威從中國趕走的策謀者。夏天過後，另外兩件事的發展進一步影響宋子文（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態度。一件是史迪威未能忠實履行美國總統在1943年5月所作的承諾。另一件是英美兩國決定成立新的東南亞戰區（SEAC）。

### （一）史迪威未能履行羅斯福政策

讀者應該記得，羅斯福在5月間曾親自批准一個新安排，准許陳納德空軍優先獲得經由駝峰進入中國的物資噸位。但是宋子文不久就發現，這個政策並未被忠實執行。阿諾德將軍私下告訴宋子文，由於史迪威對於空軍事務缺乏認識，所以他（阿諾德）不得不派遣自己的參謀長史特萊曼爾（George E. Stratemeyer）將軍到中國，去調節史迪威、陳納德和畢賽爾（Clayton L. Bissell）三個美國將領之間的矛盾[44]。宋子文於是

43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1942年7月。

44　Soong message to CKS, June 10, 1943.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2.

向蔣介石建議，中國應該乘機要求撤換畢賽爾，並拒絕接受史特萊曼爾將軍作爲陳納德的上司，蔣介石採納他建議的後一半，即史特萊曼爾不可成爲陳納德上司，但是卻沒有採取建議的前一半，因爲他擔心撤換畢賽爾會對美國政府造成難堪[45]。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宋子文爲保障1943年5月間得之不易的成果，願意採取更積極的措施去趕走不合作的美國軍官。但是蔣介石卻總是開不了口，曲意爲別人設想。這是他們兩人在個性上的重大差異。

8月中旬，中國政府已經相信史迪威是執行美國總統政策最大的阻力。此時距珍珠港事件發生已將近20個月，而陳納德的空軍仍然只有不到100架驅逐機。三個月前，陳納德得到的承諾是在7月15日以前會得到兩個中隊的戰鬥機，另加一隊高空作戰的P-38飛機。但是他只收到P-38飛機。當時在印度還有134架驅逐機，按理也應該撥歸陳納德使用。但是當陳納德提出申請時，他雖然得到史特萊曼爾的支持，卻被史迪威駁回，理由是這樣做會威脅到印度的安全。同一個月份裡，陳納德也獲得批准，可以要求一部分駐在印度的中型轟炸機交由他使用。當他根據指示提出要求時又遭到史迪威駁斥，理由是印度沒有補充飛機的其他來源。史迪威這一連串的駁斥，使得陳納德的空軍在年底天氣轉好時，將無法充分發揮空中攻擊的潛能。宋子文聞訊之後忍不住去向美國總統抱怨，說史迪威阻擾陳納德的努力，只有總統直接向史迪威下令，才能保證陳納德能夠獲得應有的物資[46]。

爲了增加壓力，宋子文隨後馬上向羅斯福提交一份備忘錄(9月27日)稱，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的戰鬥力，已下降到只剩下85架戰鬥機和9架中型轟炸機可供使用。因此，宋子文懇求美國總統採取必要措施，保證有關單位貫徹5月份協議。正如宋子文所指出，14航空隊飛機短缺的數量應該很容易就得到補充，因爲即使在印度一地，同盟國已經有250架戰鬥機和三個中型轟炸機中隊[47]。而且當面並無敵人。

當總統拿到這一份備忘錄時，才發覺原來他5月所作決定早已被部下不聲不響地一一擱置了。他立即要求馬歇爾查明原委並提出解釋。馬歇爾在10月4日提出答覆，不得不首度坦承，駝峰運輸在印度方面的工作，確實存在許多器材和管理上的缺陷，

45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12日；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6月14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7冊，頁205-209。

46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from Soong, “Re China Air Offensive”, August 19,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6-5.

47 Soong’s figure reflected the status on September 5. See: Soong memo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7, 1943.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16-5.

只有一半的運輸機（在1943年9月全部的書面數字是230架）真正在執行勤務[48]。然而馬歇爾在給羅斯福的報告中卻迴避一個事實：這些空軍都在史迪威統率之下（包括8,505名美國空勤和地勤人員），從來沒有認真發揮其潛能。在這方面，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可作參考：駝峰工作分由兩個部門負責。一個是軍方部門（ICATC），另一個是民航部門（CNAC）。民航部門只有23架飛機，爲軍方部門的十分之一，但是民航部門1943年8月的運輸量卻是軍方部門的三分之一[49]。史迪威轄下空軍部門效率之低由此可見。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發展引起宋子文的擔心。9月，宋子文收到美國記者艾索普（Joseph W. Alsop）從重慶發來的電報，內容是指控史迪威已經公然宣稱他無意執行總統5月份的決定，即使阿諾德將軍的空軍代表史特萊曼爾將軍持有異議也無濟於事，因爲後者和華盛頓之間的一切電報來往，都必須經過史迪威所控制的陸軍收發報電臺，因此任何負面的報告根本出不了史迪威總部[50]。

從宋子文的觀點來看，這類訊息無疑充滿爆炸性，因爲如果史迪威可以一手遮天，任意推翻中美兩國政府辛辛苦苦達成的協議，和經過美國總統親自批准的做法的話，那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對於史迪威辦事能力之不足，本來就已夠令中國人擔心的了，但是如果他再存心要破壞中美之間協議，那情況當然更爲糟糕。既然史迪威完全控制了美國陸軍在重慶和華盛頓之間的一切電訊管道，連史特萊曼爾也不敢輕易表達自己的意見，那麼宋子文很快得到的結論就是，想要根本改善中美關係的話，就必須撤換史迪威。不久之後，宋子文在華盛頓就開始主動出擊了。

## （二）東南亞戰區的成立

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上半年，史迪威和英國人的關係，也惡化到足以讓史汀生部長和馬歇爾將軍感到憂慮的地步。由於英美兩國正籌備建立東南亞戰區（SEAC），而美國想任命史迪威爲這個新戰區的副總司令，以提高史迪威在中國的威望和促進他的工作，因此美國政府當然希望史迪威能夠和英國人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同時因爲英美兩國已經決定把緬甸置於東南亞戰區的指揮系統下，史迪威作爲中美兩國軍隊指揮官，要在緬甸進行作戰，當然也有必要取得英國人對他的合作。爲此，馬歇爾在1943年7月1日，特別給了史迪威一個嚴肅的忠告，囑咐他千萬不可

48 Marshall memo to the President, October 4, 1943, Box 87, Folder 3,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MFA.

49 Ibid.

50 Telegram from J. Alsop to Soong from Chungking, September 11,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0.

開罪英國人。否則，不但會妨礙英美兩國在亞洲戰爭中的合作關係，也會影響史迪威本人在緬甸的指揮權[51]。當然其中最具實質者是對中國遠征軍的指揮權。

在這整個籌備過程中，中國政府對英美兩國有關東南亞戰區的布局幾乎一無所知。宋子文也只是從側面略知梗概而已。比如說，沒有人告訴他美國準備任命史迪威爲該戰區副總司令，也沒有人告訴他同盟國打算把在印度受訓的中國部隊，置於蒙巴頓將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的指揮之下。馬歇爾在8月底還悄悄告訴史迪威，「總統認爲，除非蔣介石堅持追根究柢，否則，你應該規避這個題目。但是即使蔣介石一定想知道底細，你的回應也必須非常有分寸……」[52]

馬歇爾的私房話使情形再明白不過了。英美兩國對於亞洲戰爭這個攸關中國未來的大事，背著中國就作了重大決定，那就是在英國人還沒同意參加第二次緬甸戰爭之前，就決定把中國軍隊交由英國人指揮。讀者還記得，美國在派送史迪威赴華並要求賦予他指揮權時，所作解釋是因爲中英兩國都無法接受對方軍官作爲統帥，而現在情勢卻表明，所謂中美聯軍其實主要是中國軍隊，而英美兩國卻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當作交易品，私相授受，並且還決定對中國隱瞞真相，非萬不得已決不讓中國人知情。即使如此對待中國，馬歇爾還是指望宋子文在回到重慶時，可以去勸說蔣介石接受盟邦所作的任何安排。

宋子文透過他在華盛頓的人際關係情報網，很快看到了成立東南亞戰區帶來的政治含義。美國軍部擔心英國人對史迪威的不滿，可能導致史迪威在中國的地位的降低。宋子文卻在成立東南亞戰區一事中看到難得的機會，可以使史迪威在中國戰區變成多餘的人物。這個看法讓宋子文積極開展其外交出擊。

## 二、第一回合：宋子文加緊在華盛頓的努力

8月底，羅斯福終於通知宋子文，美國準備任命史迪威爲蒙巴頓在東南亞戰區的副手。當宋子文對史迪威未來會和中國將領們發生摩擦的可能性表示關切時，羅斯福立即宣稱，他非常熟悉這個問題，而且已經擬出了對策，那就是從中國召回史迪威，以惠勒(Raymod A. Wheeler)或是史特萊曼爾將軍取而代之[53]。

總統的話給了宋子文一個靈感，既然蒙巴頓將成爲東南亞戰區同盟國軍隊統帥，有權任命他的副手，那麼同樣的運作模式也應該適用於中國戰區。換言之，蔣介石既

51 Cable from Marshall to Stilwell, July 1, 1943, Verifax File 3487, MFA.

52 Cable from Marshall to Stilwell, August 26, 1943,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5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8月30日。

然是中國戰區統帥，當然有權任命史特萊曼爾爲副手，並另外任命一個中國人作爲參謀長，同時派一個中國人作爲和蒙巴頓總部的聯絡官。9月5日，當宋子文請求霍普金斯對他這種想法提出意見時，霍普金斯的反應是熱烈贊同，他向宋子文透露，馬歇爾似乎已經對史迪威的工作成績表示放棄，「既然委員長和蒙巴頓之間可以建立直接聯繫，那麼史迪威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霍普金斯進一步認爲，蔣介石不適宜自任戰區統帥，而應該保持處於戰區統帥之上的四強領袖身分。當宋子文提議把中國戰區擺在蔣介石的管轄之下，由他任命一位中國軍人作爲戰區統帥的方案時，霍普金斯表示完全同意[54]。

此時宋子文已經接到陳納德求助的信號，陳納德宣稱華盛頓的5月決定正面臨破產，要求宋子文作一些挽回努力。又過了沒幾天時間，宋子文突然又得知羅斯福和馬歇爾都可以接受召回史迪威的方案，而且霍普金斯還表示他願意積極參與此項活動。如此大好機會，宋子文當然不願輕易放棄。因此9月初開始，宋子文主動向蔣介石發送了一連串電報，敦促蔣介石早下決心正式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55]。

然而，蔣介石的心情和往常一樣，猶疑不決。在6月蔣夫人離開美國之前，蔣介石還建議她應該乘著和羅斯福道別的機會提出史迪威問題。但是一如既往，蔣介石固然恨不得把史迪威盡快趕走，卻又不願把話爽快說出來。因此他告訴蔣夫人說：「但不必太正式，亦不以要求其撤換之方式出之。只以真相與實情告之如下……」[56]換言之，他一方面要蔣夫人以隱隱約約的方式向美國政府抱怨史迪威不能共事，另一方面又把主動權完全交到美國政府手中。

蔣夫人接到電報，根本不贊成撤換史迪威，她的理由有二：1. 撤換的要求會招致美國領袖不快，或因此阻礙緬甸戰爭之實現；2. 一切現行計畫及同盟國聯絡工作，歷來均由史迪威經手辦理，一旦換人，恐將引起工作困難[57]。說來說去，中國領袖們對於希望緬甸戰爭早日展開的熱望，還是讓他們對史迪威去留的態度變得瞻前顧後。果不其然，蔣介石聽到蔣夫人的擔憂之後，馬上打消原意，覆電說：「對史迪威事並非正式要求其撤換，不過使之察知實情而已。待有便乘機以閒談出之，否則不談亦可。」[58]蔣介石不了解美國人的文化和心理。在和美國政府(特別是軍部)討論史迪威去留問題時，如

54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Mr. Harry Hopkins, on September 5,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55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9月8、12日，蔣總統事略稿。

56 蔣介石致蔣夫人電，1943年6月18日，《戰時外交》(一)，頁852。

57 蔣夫人致蔣介石電，1943年6月20日，《戰時外交》(一)，頁854。

58 蔣介石致蔣夫人電，1943年6月21日，《戰時外交》(一)，頁854。

果中國政府採取的方式只是「閒談」，那就等於「不談」，美國軍方典型的反應就是相應不理，裝聾作啞。蔣介石以這種傳統中國式的行事方法處理國際關係，成功率極低，可是蔣介石偏偏習慣於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以致完全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正是因爲曾經有過以上所敘述的周折，所以當宋子文和霍普金斯進行共同策劃時（見上文），蔣介石心中又開始蠢蠢欲動，看到去史之事重現曙光。宋子文和霍普金斯商談後，在9月8日擬就方案，目的是要求大幅度調整中、英、美三國軍事合作關係。其中一個要點就是撤換史迪威，改組中國戰區。宋子文告知蔣介石稱，方案基本上是按照他和霍普金斯商談的思路所擬定，下個月他將會回國，和預定相偕來華的美國陸軍次長商量實施細節[59]。宋子文的方案令蔣介石大受鼓舞，他立即覆電，「請（宋子文）速與美國切實進行」[60]。

時機很快變成重要因素。宋子文馬上要回國述職，他想在離開華盛頓之前和羅斯福達成初步協議，徹底解決史迪威問題。爲此，宋子文再度就商於霍普金斯。9月15日，宋子文向霍普金斯表示，他非常擔心史汀生部長和馬歇爾會不計一切代價維護史迪威在華地位。但是霍普金斯表現得非常樂觀，認爲馬歇爾並不會支持史迪威。他請宋子文放心，因爲宋子文方案不但言之成理，而且有利於中美兩國關係。他甚至向宋子文傳授了如何向羅斯福提出要求的技巧，同時請宋子文安心，因爲他（宋子文）的方案其實是在幫羅斯福的忙[61]。

次日宋子文和羅斯福會談時，果然採用霍普金斯的獻計，但是羅斯福還是建議宋子文去找馬歇爾先行溝通。又過了一天，宋子文向霍普金斯覆述羅斯福的說法，並徵求霍普金斯的意見。讓宋子文想不到的是，霍普金斯竟然建議他不要聽從羅斯福的建議行事，因爲他認爲和馬歇爾根本談不出任何結果。相反地，霍普金斯自告奮勇，宣稱他會給羅斯福寫信，分析這個問題的政治含義，並建議總統應該自作決定[62]。宋子文當然非常興奮能夠得到霍普金斯如此大力鼎助，因此他在沒有得到蔣介石正式授權之前，就請霍普金斯付諸行動了。他非常希望在自己抵達重慶之時，能夠帶回勝利成果，也認爲蔣介石肯定會對趕走史迪威的消息感到喜出望外。

---

59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9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262-263。

60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9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263。

61 Interview with Mr. Harry Hopkins, on September 15th,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62 Note on Conversation with Mr. Harry Hopkins, September 17,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 三、第二回合：宋子文在印度的活動

1943年10月上旬宋子文飛往中國。美國軍部的陸軍次長並未隨行，其原因可能是馬歇爾已經事先得知宋子文的企圖，因此不讓陸軍次長牽涉進去。宋子文在途中路過印度時，卻告訴蒙巴頓和美國的塞末維爾將軍說，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要更換史迪威。塞末維爾將軍聽後即刻向馬歇爾報告。至於蒙巴頓，可能是因爲他上任才沒有幾天尚未進入情況，也可能是因爲史迪威在聽從了馬歇爾嚴重警告之後，開始改善對英國人的態度，因此給蒙巴頓的印象頗爲良好。不管事出何因，蒙巴頓建議中國政府應該保留史迪威職位[63]，同時還告訴宋子文說，他已向英國推薦史迪威作爲他的副總司令，因爲他相信史迪威有能力可以得到在東南亞戰區內中國軍隊的合作。

蒙巴頓的態度讓宋子文覺察到，他和霍普金斯9月擬訂的策略可能碰到新阻礙。宋子文本來打算安排蔣介石和蒙巴頓在重慶當面討論史迪威問題，但是現在他覺得事不宜遲，因爲一旦史迪威在東南亞戰區的任命發表之後，事情的發展就會變成難以預料了。因此他決定加緊步伐，趕在蒙巴頓還沒有機會向蔣介石開口爲史迪威說項之前，就完成了趕走史迪威的工作[64]。

以宋子文的政治歷練，他居然會在印度向英美高級將領透露他的計畫，這確實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舉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過於浮躁，認爲勝券在握，因此沒有等到時機成熟，就貿然地洩露底牌。另一種可能是他認爲一定能夠得到蒙巴頓的支持，所以感到非常篤定向他發出通知而已。但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他希望先聲奪人，由中國率先表明態度，使同盟國來不及也不便阻擋。從中國向來對英國充滿疑懼和不信任這一點來思考，宋子文恐怕是想走偏鋒，爭取蒙巴頓支持，或至少提醒他最好明哲保身，不要插手此事。宋子文原先以爲英國人對史迪威普遍不滿，所以他想，假如讓東南亞戰區新上任的總司令對史迪威採取保留態度，則史迪威的離職將是定局。然而，誠如塞末維爾和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 東南亞戰區副參謀長)兩位將軍所指出，蒙巴頓新官上任，也絕不願意被世人看成是對史迪威落井下石的人，更不願讓自己被看成是蔣介石手中的一顆棋子[65]。還有另外一種可能，蒙巴頓原先和史迪威沒有太多的接觸，

---

63 Cable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October 21, 1943, Verifax File 2671, Item 2578, MFA. 宋子文在與蒙巴頓談話時，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提出一封來自埃索普(Alsop)的信件作為證據，說明為何史迪威必須被革職的理由。事後，蒙巴頓秘密地把埃索普的信件抄件轉交給馬歇爾。埃索普的信件見魏德邁信件的「附件一」("Insert 1")。

64 Soong cable to Hopkins, October 13,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2-2.

65 Cable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October 21, 1943, Verifax File 2671, Item 2578, MFA.

對立情緒尚未產生，自己又對中國事務完全陌生，既然史迪威可以幫助他控制中國軍隊，他也不願意損失這個人才。

## 四、第三回合：宋子文在重慶發動攻勢

一如本章前文所言，自從史迪威在1943年6月中旬從美國回到重慶之後，他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便急劇惡化[66]。此後經過7、8、9月，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憤怒達到極點。因此在10月11日宋子文剛飛抵重慶，蔣介石就急急忙忙分別和宋子文及蔣夫人討論史迪威的事。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感覺，用他自己的話說：「此史正卑劣之小人，無恥極矣。」[67]此時蔣介石的其他言行也顯示，他希望撤換史迪威，如果不需要付出重大的政治代價就可以達到目的，他更是願意。

然而10月15日蔣介石在和宋子文及塞末維爾將軍會談時，他馬上發現有兩股壓力，逼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決定。

一方面，塞末維爾努力地企圖說服蔣介石不可撤銷史迪威的職務。他所持的理由了無新意，基本上是重複美國政府早已多次表達的看法：a. 美國找不到其他足以擔任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的適當人選；b. 美國找不到可以統領中國戰區美國部隊的其他適當人選；c. 馬歇爾強烈支持史迪威；d. 美國政府很可能甘冒挑起中美衝突的危險，拒絕任命史迪威的繼承人。但是塞末維爾也知所進退，絕口不說美國人認爲中國軍隊少不了史迪威這位「才華出眾」的指揮官，用沉默表現出他的外交技能。

另一方面，宋子文自告奮勇擔任會談翻譯人。這個場面最初似乎並沒有引起蔣介石的警惕，但是在翻譯過程中，蔣介石強烈懷疑，宋子文沒有忠實翻譯他對塞末維爾說的話，反而不斷把話題轉到要求史迪威立即離開中國。塞末維爾雖然不懂中文，也還能敏銳地觀察到在場的「蔣夫人在整個會談過程中顯得非常擔憂」[68]。這樣就造成了一個明顯的宋子文越俎代庖的局面。

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他爲10月15日會談所定的目的是，並非正式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而是把自己對史迪威的不滿充分說清楚，並要求美國重新慎重考慮這個問

（續）

Also: cable from Lt. Gen. Brehon Somervell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66 蔣介石對於史迪威處理英美參謀長聯席會文件的形容，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6月28日，7月4、29日，9月21日。

67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0-12日。

68 Cable from Somervell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蔣介石的記錄，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5日。

題[69]。一如既往，他希望美國人能夠體察他的心情而自動召回史迪威，則他將會大爲高興。但是如果要他明白且斷然要求美國撤換史迪威，他就會大感爲難了。蔣介石這種想法似乎並不是由於他對事情的後果作過理性分析，也不是由於他缺乏道德勇氣或是是非觀念，而是出自文化和個人心理約束，認爲如此直言不諱實在有違對待盟友之道，甚至還會傷害他和羅斯福之間的友情。蔣這種行爲模式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絕不少見。

10月15日會談使蔣介石感到極度不安，因爲宋子文不斷扭曲他的溫和迂迴做法，不斷自作主張提出強硬要求。但是次日會談時，他仍然讓宋子文擔任主要翻譯[70]。蔣介石個人的談話基調未變，還是向塞末維爾抱怨他在過去一年半中不斷作出個人努力，以求改善和史迪威的合作關係，但是始終未能如願[71]。

在這兩天中發生了另外兩件事，也間接影響了10月17日的會談氣氛。一是蔣介石收到美國方面送來的報告（10月15日），內容是蔣夫人在美國的演講已被列入美國國會記錄，同時還被多所學校採用爲學生讀物。這一報導讓蔣介石深爲感動，認爲美國人民對中國和他的家人懷有誠摯感情[72]。所以他更珍惜和美國的友好關係，不希望因史迪威撤職而引起兩國關係的惡化。

二是有幾位中國高級將領（如何應欽、商震）得知前兩天會談內容後，感到非常震驚，主動找上塞末維爾，表示他們願意勸說蔣介石改變立場。何應欽向來是史迪威最嫌惡鄙視的中國軍人，但是奇怪得很，此時他最支持史迪威繼續留在中國戰區服務，並且自告奮勇，要向蔣介石進言。10月17日，何應欽終於在私下向塞末維爾透露，下次會談蔣介石會改變立場；何應欽同時預言，宋子文不會在下次會談中出席[73]。

17日下午6時左右，會談如期舉行，蔣介石、塞末維爾、蔣夫人、商震四人參加，果然沒有宋子文。但是會談並無結果。塞末維爾離席後，蔣介石細心檢討過去兩天的發展，決定再作最後一次努力。他授意蔣夫人在當晚8時左右約見史迪威，並向史迪威清楚表達中方立場，那就是：史迪威必須保證今後將改變態度，服從蔣介石，否則便必須離開中國。中國方面把話說得很清楚，如果史迪威選擇提供該項保證的話，他還有希望重

69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5日。

70　Cable from Somervell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71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6日。

72　同上，1943年10月15日。

73　Somervell cable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新贏回蔣介石的原諒和信賴。但是如果他無法提出保證而導致其離開中國的話，則對史迪威個人事業將會造成沉重打擊。大約兩個小時後，史迪威回去見蔣介石，承認錯誤，保證以後絕對服從蔣介石。蔣介石接受史迪威道歉後，承諾給後者一個最後合作機會[74]。塞未維爾事後向馬歇爾報告，當時會場氣氛充滿歡欣。他不無誇張地寫道：「在經過一番交談之後，他們投入彼此的懷抱，全場一片熱愛和親吻。」[75] 次日(10月18日)蔣介石向塞未維爾宣布，他對史迪威的保證完全滿意。

## 五、宋氏姐妹神秘的角色

有關史迪威在1943年10月間面臨的職位危機，許多著作中都有討論，但是頗有一部分著作只把它當作軼事趣聞來處理，甚至加油添醋，津津樂道宋氏姐妹的秘密行爲。這個現象並不奇怪，因爲這些著作所使用的資料主要(或全部)來自史迪威本人，而史迪威正是以這種口吻來記載這件事。史迪威史料的問題並不是記載謬誤或是故事虛構，而是內容過於片面，因爲他自己也只是管中窺豹，臆度了許多自己並不知道的事情。有些著作還打著學術名目，也同樣人云亦云、以訛傳訛，實在是一件遺憾的事。它們因爲沒有參考其他相關資料，所以敘述部分大有欠缺，而對這個事件的分析更缺乏廣度和深度，甚至文不對題。但是讀者們需要的是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一個全面性和客觀性的掌握。因此我們必須重組許多歷史資料。

史迪威相當忠實地記錄了自己和宋氏姐妹(蔣夫人和孔祥熙夫人)間日漸頻繁的接觸。據他的說法，9月13日是一個轉捩點。宋氏姐妹召他去見面，相互間言談非常坦白。史迪威察覺她們的心情顯得非常急迫，想採取一些行動[76]。會談結果給史迪威留下的總印象是，宋氏姐妹和他已經「簽訂了一個攻守同盟」。雖然他弄不清楚對方的用意，但是他可以感覺到她們的認真程度[77]。此後一個月裡，宋氏姐妹給史迪威的感覺是，她們準備在蔣介石面前提高史迪威的影響力。史迪威這樣寫道：「May(蔣夫人)和Ella(孔祥熙夫人)已經宣誓成爲共同的陰謀者，彼此坦誠以待。她們信任我是認

7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7日。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October 17, 1943.

75 Somervell cable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76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3, 1943. Further contacts between Stilwell with one or both sisters took place on nearly a daily basis during September 13 and October 15 as long as Stilwell was in Chungking. See: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8, 19, 20, 21, 22, 25, 27, 28, October 4, 5, 7.

7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September 13, 1942.

真(做事)的，而且也願意予以協助。」[78] 至於對她們兄弟宋子文的意向，兩姐妹則是守口如瓶，而史迪威也摸不著頭腦，以致有一段時間，史迪威甚至還誤以爲宋子文和她們也是同黨[79]。史迪威記錄此事所用的語氣鼓勵了後來一些作者們，把這段歷史當成是中國政壇上茶餘飯後的趣事，也因此降低了事件的嚴肅性和嚴重性。

事實上，9到10月，已經可以看出宋子文和他兩位姐妹的立場漸行漸遠。一方面，宋子文在華盛頓處心積慮要達到撤換史迪威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的三妹宋美齡在重慶卻想盡方法要保住史迪威的職位，並且把大姐宋靄齡拉進來作幫手。無論如何，由於宋子文一貫遵行的規矩是，把他在華盛頓的活動不斷向蔣介石提出詳實報告，因此我們可以設想，宋氏姐妹對於宋子文在美國的行動瞭如指掌。也正因爲出於這層了解，所以當她們在9月初看到宋子文的努力似乎接近成功之時，她們更覺得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抵消宋子文的成果。因此9月中旬，當她們主動要史迪威來見的時機(13日)，正值宋子文驅逐史迪威的活動在華盛頓進入緊鑼密鼓階段，而蔣介石也表示熱心期望其成功。我們還可以合理假設，宋子文並不知道他的姐妹們在重慶的活動，因此並未採取任何反制措施。

宋氏姐妹行動的動機並不容易了解，因爲她們並沒有留下有關此事的文字記錄，而蔣介石的日記裡也沒有證據顯示，他在9月中旬曾授意宋氏姐妹去和史迪威接觸。這件事在史迪威筆下的模糊性和渲染意味，讓好事者忍不住向權力鬥爭、宮廷陰謀或是家庭內訌等花邊內幕方向思考，但是這種解釋並無助於我們想要深入而嚴肅地認識中美關係的努力。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根據本章前文所述(見第貳節)，由於宋子文和宋美齡對於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係有不同程度和性質的體驗，因此他們會持不同的立場，這一點並不奇怪。再者，宋子文和宋美齡對中國國家利益(如緬甸戰爭)各持看法，對中國和美國的政策彈性空間也有不同估計，所以各自採取自以爲是的途徑，去達成他們不同的目的。換言之，從一個比較嚴肅的角度去看，他們之間立場之爭的成分應該超過意氣之爭，更難與爭風吃醋扯上關係。至於宋靄齡加入宋美齡陣營的動機，只是爲了無法拒絕妹妹的邀請，或是和宋子文與孔祥熙的立場有關，則仍需要進一步從史料中去發掘。

有了這個廣角度的了解，我們再回過頭去研讀史迪威關於他和宋氏姐妹談話內容記載時，就可以得到新的啓示了。根據史迪威的說法，宋氏姐妹給他的印象是，她們同意史迪威的主張，認爲中國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接受英美的作戰計畫，積極著手準備第二次緬甸戰爭，並且鼓勵史迪威把建議書寫好，由她們代轉蔣介石。史迪威得到

78 *Ibid.*, September 20, 1943.

79 *Ibid.*, September 25, 1943.

的另外一個印象是，如果三人聯合在一起，就可以說服蔣介石，接受史迪威有關緬甸戰爭的計畫和中國軍隊的整軍計畫[80]。史迪威這個報導和蔣夫人之前在華盛頓所持的個人立場相當符合。事實上此時史迪威主張縮小緬甸戰爭規模的立場，正是當初(5月間)蔣夫人想要和羅斯福達成的秘密協議。

假如史迪威報導屬實，則顯示宋氏姐妹們完全違反蔣介石歷來堅持的緬甸全面戰爭的立場，反倒是宋子文絕對忠實遵循蔣介石的指示，只是宋子文的做法沒有辦法幫助蔣介石去克服他自己在政治和心理上的自我設限：因爲後者既不希望採取強勢行爲去開罪美國朋友，也不希望提出直接要求而違背儒家做人委婉曲折的道理。這些複雜因素可以說明，爲什麼蔣介石一直要拖到最後一刻才能作出決定。

## 六、宋子文付出代價：被打入冷宮

毫無疑問，在最緊要關頭的三四天，蔣介石對宋子文堅持己見務必趕走史迪威的做法，感到非常不快。從蔣介石看來，宋子文對史迪威的個人憎恨已經直接危害國家利益，因此他必須把宋子文從中美關係核心圈中盡快趕出去，否則將會帶來更重大傷害。蔣介石在日記中慶幸自己能夠堅持到「最後五分鐘」，沒有放任宋子文把中美關係帶到絕境，使抗戰無以繼續，他爲此不禁大大舒了一口氣[81]。

用不著說，宋子文完全沒有意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這個地步。事實上，幾乎所有當事人，包括蔣介石在內，都沒有想到事態會如此演變。根據蔣介石記載，18日早上他告訴宋子文說，前一天晚間他(蔣介石)已經和史迪威達成和解的事，並徵求宋子文意見。想不到的是，宋子文一聽之後，馬上大聲抱怨，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他深悔自己不該對蔣介石如此忠心耿耿。繼而又說，從今以後不會再替蔣介石在美國服務，最後甚至發誓以後永不和蔣介石共事。宋子文的發誓讓蔣介石也怒火三丈，忍不住把茶杯摔倒在地，同時連聲大喊滾出去。宋子文不甘示弱，也在重重關上房門後揚長而去。蔣介石事後在日記中寫道：「子文之自私與卑劣至此，實不能再爲赦宥。如不速去，則黨國之後患，將不堪設想矣。」[82]

10月18日中午，蔣介石和甫抵重慶的蒙巴頓舉行會議，商談緬甸戰爭問題。出席者有英國的格立斯但爾(Gordon E. Grimsdale, 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將軍、蔣夫

80 See: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3-October 15, 1943.

81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7日。

82 同上，1943年10月18日。吳國楨當時是宋子文手下的外交部次長，他對此次事件的形容記錄在《吳國楨傳》(臺北：自由時報，1995)，第2冊，頁397-398。

人、何應欽、商震、林蔚和董顯光，獨獨不見宋子文。其實，宋子文已經和蒙巴頓同車自重慶市區抵達黃山官邸，但是被蔣夫人在門外攔下，代表蔣介石告知宋子文，要他藉口身體不適，必須折返重慶休息[83]。

會談時，蒙巴頓發現蔣介石非常合作，答應把所有中國在緬甸的軍隊置於史迪威和蒙巴頓指揮之下。蔣介石並承諾在雲南集結中國軍隊，一定能在次年元旦之前完成備戰。但是他當然也強調，同盟國必須在孟加拉海域集中一個強大艦隊，進行兩棲作戰。有趣的是，當蔣介石問蒙巴頓英國對這事的態度時，就如蒙巴頓在事後坦白地向英國參謀首長所承認的，他當時只是給了蔣介石一個模棱兩可的回答，並且就此僥倖混過[84]。「連哄帶騙」已經成爲所有同盟國領袖們，在和蔣介石討論第二次緬甸戰爭時所持的唯一態度。蒙巴頓雖然是新官上任，已經盡得個中精髓。

此後幾天中，史迪威明顯改善的態度讓蔣介石感到滿意，因此更使後者慶幸自己能夠懸崖勒馬，斷然拒絕宋子文建議[85]。他認爲，保留史迪威是他正確的決定，因此避免了中美關係上的一個大危機。他希望史迪威能夠被他（蔣介石）的真誠和合作意願感動，可以全面改變史迪威對中國人的態度[86]。蔣介石這種新的樂觀心情，也表現在他對緬甸戰爭的具體措施上。11月6日，他命令加派兩萬名有經驗的老兵補充中國遠征軍[87]。

蔣介石對中美關係的樂觀心態顯然也感染了史迪威。11月8日，史迪威向馬歇爾報告，他和蔣介石的關係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好：阻礙正在逐一消失，何應欽辦事態度又認真，因此前景甚爲看好[88]。史迪威私下的感覺更爲良好。11月6日日記中寫道：他和蔣介石的關係幾乎水乳交融，一切順心[89]。他們兩人的關係顯然進入了蜜月期，彼此對對方的行爲感到滿意。其實這種和諧狀態本來就應該是中美同盟關係的正常狀態，而正因爲事實並非如此，所以才顯得異常特別。蔣介石在這種精神狀態中，指定史迪威在即將舉行的開羅會議上，代表中國作有關軍事的發言，這就更是他對史迪威的

83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8日。

84　Mountbatten's cable to the British Chiefs of Staff, as quoted in full in a report from Somervell to Marshall, October 25,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4, MFA. 又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19日。

85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24日。

86　同上，1943年10月31日。

87　同上，1943年11月6日。

88　Marshall memo to the President quoting a message that he had just received from Stilwell, November 8,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5, MFA.

89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6, 1943.

恩遇表現。

相對地，宋子文則是被打入冷宮。他沒有失掉外交部長的職位，也裝作若無其事地繼續處理例行公事。但是在重慶熟悉政治行情的人都知道，宋子文已經從政治核心圈和家庭聚會中被踢了出去[90]。11月16日，宋子安要求蔣介石私下召見宋子文以便重新修好，但是蔣介石餘怒未息，一口拒絕[91]。事實上，一直要到1943年耶誕節前夕，宋子文呈交了一封情文並茂的懺悔和請求原諒的信件之後，蔣介石才終於同意在孔祥熙家中會見宋子文[92]。大約一個月後，宋子文才恢復他和蔣介石的關係[93]。顯然，宋子文的懺悔信發揮了軟化蔣介石的功能。但是更重要的因素是，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樂觀維持了還不到兩個月，史迪威就故態復萌，證明蔣介石的天真設想徹底錯誤。儘管一直到1943年底，蔣介石還繼續堅持他10月17日的決定是正確的[94]，但是到1944年就不得不改口了。1944年9月，他終於心不甘情不願地承認，宋子文對史迪威的估計，或許從來都是正確的。

## 七、美國的備用方案

塞末維爾將軍在短暫停留印度期間，表現了傑出的管理才能；在短暫停留重慶期間，又表現了令人激賞的外交才能。他的上司史汀生部長歷來對羅斯福總統派到亞洲的所有外交代表都是持批判態度，唯獨對塞末維爾將軍這次亞洲之行讚賞不已[95]。塞末維爾將軍身臨其境，反倒顯得謙虛。比如說，針對他在重慶成功地挽救了史迪威職務的表現，他在呈交給馬歇爾將軍的報告書中，誠實寫道：「我好幾次都以爲我們的努力已經失敗。因此，當最後中方接受我方觀點時，我甚至需要掐自己一把，才能相信我們真的成功了。」[96]

事實上，蔣介石和宋子文當時並不知道，甚至連史迪威和塞末維爾也未必知道，假如蔣介石在1943年10月能夠按照宋子文的策略，堅持到「最後五分鐘」的話，他或許就可以讓史迪威不再成爲魔障而一勞永逸了。因爲處在關鍵地位的馬歇爾將軍和美

90 宋子文當時仍然接見外國使節，見《吳國楨傳》，第2冊，頁399-403。

91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16日。

92 同上，1943年12月24日。

93 《吳國楨傳》，第2冊，頁403-406。

94 蔣介石對1943年的年終總結，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31日。

95 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8), p. 536.

96 Somervell cable to Marshall, October 24,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國各軍參謀長，早已決定了放棄史迪威。根據史料顯示，在9月24日到10月1日之間，馬歇爾曾兩度主動建議史迪威應該去「休假」，而史迪威自己卻從來不曾提出過休假請求[97]。爲什麼這樣？很可能的解釋是，馬歇爾在這段時間裡已經聽到風聲，知道宋子文趕走史迪威的計謀已經得到白宮支持，因此想給史迪威和軍部本身一個漂亮的下臺階，主動抽身離去。事後在開羅會議時（11月21日），史迪威再度從馬歇爾口中得到證實：「馬歇爾在9月份時，曾經打算讓我放棄中國的職務，並讓我轉任第4軍軍長。到了10月份，他又打算讓塞末維爾接替我的職務……然後讓我擔任一個有體面的職務。」[98]

更具體的發展是：馬歇爾在10月19日已擬好了一份電報稿，準備發給史迪威。這封電文擬稿的內容是，美國政府面對蔣介石的堅持，已決定同意把史迪威調離遠東地區。馬歇爾在電報稿中坦承，兩個月前已經作出同樣的建議，只是當時受到參謀長聯席會的強烈反對而未採行動。現在連參謀長聯席會也一致認爲，一旦中國下了決心，美國別無選擇，而他們相信蔣介石的正式請求信隨時都會送達。馬歇爾在電稿結尾處寫道：參謀長聯席會屬意塞末維爾將軍繼任史迪威職位，並指示史迪威，就近和塞末維爾直接商量此一方案的可行性[99]。

值得注意的是，馬歇爾電稿的最後一段話，與他派塞末維爾將軍到中國去和蔣介石會談的姿態完全相反。塞末維爾被派去中國告訴蔣介石，美國絕對不會同意史迪威離職，而且即使史迪威離開中國戰區，也將會嚴重影響美國對中國軍事援助的計畫，甚至美國可能拒絕委派繼任人。但是事實上，軍部同時卻已準備好另一個方案，那就是把史迪威調離中國戰區，派另一位軍人到中國，繼續執行美國在中國的軍事計畫，協助中國軍隊達成建軍的目的。換言之，美國並不打算更改對中國的援助計畫，而這位繼任人選實際上已經抵達中國戰區的現場。

然而，由於塞末維爾將軍能說善道，史迪威懺悔道歉，宋氏姐妹穿針引線，以及宋子文的盛氣急躁等等因素同時匯集，終於在最後關頭改變了蔣介石的主意，也因此幫了馬歇爾一個大忙，而無需把已經準備好的電稿發給史迪威。就是因爲這個變化，中美同盟關係必須再承受12個月的折磨。馬歇爾沒有發出的電稿提供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假如蔣介石採納了宋子文建議，向美國正式提出要求撤換史迪威，則馬歇爾和美國

97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4, October 1, 1943.

98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1, 1943.

99 "Proposed Message for General Stilwell's eye only from General Marshall", October 19,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參謀長聯席會議很可能會接受他的要求，不會導致中美關係全面惡化，美國在華軍事活動仍將繼續推動。

當然蔣介石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他前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尋找各種機會向美國人發洩他對史迪威個性和工作的不滿，但是始終說不出正式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的這一句話。他把一切希望寄託在美國人臉皮薄之上，希望美國人在聽了中國人無止境的抱怨之後，應該會識趣地自動召回史迪威，這樣大家就不致傷了和氣。但是蔣介石完全不懂美國軍部領袖的行事作風，而且也無法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這就讓他在1943年10月，失去了一個將令他自己後悔莫及的良機。

## 八、1943年10月事件的正面影響

10月危機對中美關係最顯著的影響，是它促使美國政府終於認真檢查了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國軍事援華工作的效率。

自從駝峰空運工作開展以來，美國軍方對於不能把更多物資運送到中國，已經演繹出一套標準說詞，強調飛行途中所遇的種種困難（包括天氣惡劣、地形險峻、飛行高度超限、敵機阻截等等），並且堅稱美軍把能夠作的努力已發揮到極限，再無改善餘地。其實，美國軍方高階人士對於駝峰工作的缺失早已耳熟能詳，而且嚴重問題都出現在印度。比如說，五個駝峰機場與外界缺乏公路和鐵路線，以致物資運進機場造成嚴重阻塞。機場本身設備落後，狹小擁擠，無法容納堆積器材。跑道短小而且多數填土而成，下雨時即成沼澤，無法起降飛機。考究原因，部分是英國當局不予合作，部分是史迪威玩忽職守。而美國軍方領袖（包括阿諾德在內）並非不知情，但卻不作爲[100]。

10月4日馬歇爾向美國總統提出書面報告，才終於向總統承認根本問題出在印度一端，其中包括地勤工作上的重大缺失，史迪威指揮的地勤工作人員怠忽無能，以致飛機及軍援物品無法起飛，而飛行員又紀律廢弛，行動懶散，根本不想認真執行份內任務等等。難怪羅斯福看完馬歇爾報告後忍不住抱怨說：「幾乎所有我們要協助陳納德的計畫都落空了。」他只好希望塞末維爾的印度和中國之旅，可以爲駝峰工作帶來轉機[101]。

---

100 "Conference with General Stilwell and General Chennault at 10:30 A.M., April 30, 1943, in Room 3E-992, Pentagon Building, Washingtong, D.C." pp. 11-20.

101 FDR memo to Marshall, October 15,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3, MFA.

羅斯福也向邱吉爾表達了他的憂慮，並要求邱吉爾運用個人影響力去改善印度方面的缺失。羅斯福甚至表示擔心，如果現狀不能得到改善，則緬甸計畫和中國空軍的需要將會被盟邦遺忘，從而鑄成大錯[102]。馬歇爾立即把美國總統的不滿傳達給史迪威，並要求後者提出解釋[103]。

另一個讓駝峰問題變得複雜化的因素是，美國不能信守諾言，派B-29重型轟炸機進駐成都[104]。這個發展讓羅斯福再度責難馬歇爾。他在10月15日給馬歇爾的一封信中，不假辭色地寫道：「我對中國－印度的問題依然感到憤憤不已。現在阿諾德居然又告訴我，他在明年3-4月以前，無法讓B-29重型轟炸機在中國運作。每一件我們做的事情，似乎都出了問題。最糟糕的是我們每次作出的承諾都不能兌現。我們到現在還沒有兌現過一件事。」羅斯福接著又說：「我不懂爲什麼一定要送B-29。我們有的是其他種類的轟炸機。」[105]

阿諾德將軍10月18日向總統呈交了他的答覆，但其中只說了一部分實話。阿諾德說，B-29是唯一可以從中國起飛攻擊日本本土的轟炸機，但是由於美國國內有勞工糾紛，故無法如期運往中國，而羅斯福提到的B-17和B-24轟炸機，卻沒有足夠的航程可以攻擊日本。他的這一部分說法的確是誠實的。然而他沒有告訴總統的是，陳納德需要「中程轟炸機」，而B-17和B-24正好符合他的要求，但是他卻得不到這些裝備。換言之，阿諾德心中想的是戰略轟炸機，可以用來直接打擊日本本土；而陳納德指望的卻是戰術轟炸機，可以用以支援中國戰區之內的作戰和打擊日本在大陸沿海的補給線。阿諾德儘管只講了一半真話，但是他還是承認，如果能夠改善印度地面的交通和設施，那麼駝峰運輸量就可以大幅提升[106]。換句話說，史迪威應該可以做很多份內的工作，但是他卻沒有去做。

前述馬歇爾向史迪威提出的詢問，在等了許久之後仍然得不到史迪威的答覆，他終於在10月21日向史迪威下達指令，要求立即依照以前的承諾把轟炸機隊送往中國[107]。在

102 FDR cable to Churchill, October 16,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3, MFA.

103 Marshall cable to Stilwell, October 16,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3, MFA.

104 Arnold memo to the President, October 11, 1943,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105 Memo from the President to Marshall, October 15,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3, MFA.

106 Arnold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ctober 18, 1943,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107 Cable from Marshall to Stilwell, October 21,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此同時，阿諾德也對史迪威發出了內容同樣的指令，只是措辭跡近訓斥[108]。

10月塞末維爾將軍的遠東之行，顯示美國領袖終於想要了解史迪威是如何處理駝峰工作了。其實塞末維爾這次遠東之行，也在駝峰運作史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因爲他終於糾正了駝峰工作從開始以來就存在的眾多缺點，而這些缺點或是由史迪威直接造成，或是因爲他的怠忽而使得情況惡化。最值得注意的是，塞末維爾禁止飛行員們在地面上鬼混，而是把他們送到天空中去執行任務。塞末維爾發現有些飛行員在45天中總共只飛了30小時(每天工作不到一個小時)，他馬上增加他們的空勤時數。1943年10月16日，駝峰計畫在它的歷史上，首次達到24小時全天候運作的狀態。

同樣重要的是，塞末維爾恢復了飛行員對於飛機的信心。在此之前，飛行員對於C-46運輸機的性能非常擔憂，塞末維爾花了時間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並且改變他們的想法，轉而認爲它是最可靠的機種。塞末維爾同時注意到地面設施不足、零件短缺、跑道和副跑道不合規格、油料供應脫節、飛行員訓練不夠等等問題，他都一一加以解決。這些問題都是1942年開始累積下來的缺點，遲遲未獲重視。而也正是這些缺點長期沒有被發掘出來和加以改善，才讓美國軍方爲其不能對中國進行更有效援助，反而感到理直氣壯。

就這樣，塞末維爾在抵達印度後不久就宣布，經由駝峰運往中國的物資，在一個月之內(11月)就可以達到一萬噸，而且如果在印度的地面設施和交通能夠改善的話，則運輸量還可以繼續增加。塞末維爾對於駝峰運輸工作所做的改善，誠可謂出類拔萃[109]。

塞末維爾的成績，可以看成中國採用直接向美國總統抱怨策略達致的最大成功。中國在過去17個月一直依賴駝峰運輸維持抗戰，也一直聽到美國軍方教訓它，無論中國實際得到的援助是多是少，都應該感謝美國，因爲美國軍方已盡了最大努力幫助中國。可是如果蔣介石和宋子文不曾直接向美國總統抱怨，塞末維爾將軍就不會被派去印度，史迪威所導致的現狀也就會無限期延續下去。我們大可以想像，假如宋子文沒有致力於趕走史迪威並引起政治風波，則美國軍方不會反應得這麼爽快而有效率。在這個案例中，中國的抱怨最後引起了美國總統直接介入，同時也向塞末維爾將軍提供了一個機會，展示他優異的管理技巧和領導才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宋子文個人宦海

108 Cable from Arnold to Stilwell in New Delhi, India, undated but apparently around the time of Marshall's cable to Stilwell, i.e., late October,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4, MFA.

109 See: cable from Somervell from New Delhi to Marshall, October 23, 1943,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4, MFA.

上的挫折，也仍然給國家帶來了一些可觀的正面效果。

## 叁、在開羅討價還價

### 一、中國在開羅會議前的準備工作

打從珍珠港事變開始，英美領袖間的會面很快就變成例行公事，但是他們都不曾與史達林或蔣介石會過面。因此他們有意召集一個高峰會議，讓四個同盟國領袖在適當時機共聚一堂。按照常人想法，蔣介石對於此舉必定非常熱衷，因爲和其他三國領袖會面必然會增加他個人的國際聲望[110]。但是中方資料顯示，實情並非如此。在同盟國關係成立近兩年時間中，蔣介石除了和史迪威以及英美軍事將領有過不愉快接觸之外，也對英美等國的對華態度累積了許多負面印象。早在1942年7-8月，他在和居里密切接觸之後，即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以後不多見洋人爲要。」[111] 就國際關係而言，他最早不滿的對象當然是英國。1942年夏，他這樣評論道：「英人狡獪極矣。其無道德與不信義一至於此。若不崩潰，人道天理將滅絕矣。」[112] 蔣夫人有同樣的厭惡情緒，甚至強烈到避免和邱吉爾會面及拒絕訪問英國。

隨著時間和遭遇的變化，蔣介石對英國的惡感漸漸擴及其他同盟國。不久之後他寫道：「外交之侮辱漸烈。英國對華之遺棄，俄國對華之嫉妒，惟恐不至故矣（固矣？）。而美國對我之藐視與強制，亦益顯著。如我不能自強，則來日之壓迫，必更難堪。」[113] 這種感受到了1943年夏有增未減。蔣介石寫道：「對於各國對華之陰險侮蔑，以及其虛僞欺詐，更令人憂懼不置，道義公理完全喪失殆盡，不知此種世界將何以收拾，天地末日其將不遠，甚望新世界之大同主義早日來臨也。」[114] 羅斯福在這個時候（1943年6月）首次提出高峰會議的想法，蔣介石的立即反應是婉拒邀請。他私下在日記中所寫的理由是他並沒有足夠的虛榮心，想要擠進四強之列，去沾別國的光，也不想被其他三國領袖當作「陪襯」[115]。

稍後，羅斯福建議四國領袖共聚一堂，或是由羅斯福和蔣介石舉行雙邊會面，蔣介

110 For a hint in this direction, see: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52-53.

111 蔣介石日記，1942年9月22日。

112 同上，1942年8月19日。

113 蔣介石日記，1942年9月30日。

114 同上，1943年6月20日。

115 同上，1943年6月6日。

石反而勸羅斯福三思。他表示當然願意和羅斯福見面，但是提醒羅斯福，史達林未必願意參加，因爲蘇聯尚未對日宣戰。蔣介石的折中方案是英美蘇三國領袖先行會面，然後他和羅斯福另擇會面時間[116]。雖然蔣介石幕僚們一致認爲蔣介石不應該放棄如此良機，和世界列強首腦會面，但是蔣介石認爲他作爲中國領袖的尊嚴，應該放在會面的宣傳效果之上[117]。附帶需要注意的是，蔣介石回應的對象只是羅斯福，對於和邱吉爾會面則未置一詞，顯然興致低落。

至於會面地點，羅斯福最早提議（7月4日）是在華盛頓和重慶之間[118]。8月底，霍普金斯試探蔣介石是否願意飛到華盛頓會見羅斯福時，蔣介石即刻指示宋子文予以拒絕，並且囑咐宋子文不必作任何解釋。其實蔣介石拒絕邀訪的真正理由，是他不希望給世人一個印象，以爲中國領袖遠道去「朝見」美國總統。從這個角度思考，非洲就成爲適當地點，尤其政治上也是一個中性地點[119]。

蔣介石對於高峰會議這種保留態度，其實並不難了解。首先，他和其他許多當代民族主義者一樣，都不願意顯露出過分遷就西方人的形跡。其次，同盟國領袖儘管致力於提高蔣介石的聲望，但也讓蔣介石了解這些動作的虛假性。因爲在1943年8月中旬，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魁北克會面時，就完全忽視中國盟邦之存在，卻對蘇聯未能派代表與會表示失望。宋子文能夠在8月22日得到英美邀請參加會議，也是由於蔣介石不斷抗議的結果。但是等到宋子文出席時，英美兩國早已經把重要議題商量妥當，宋子文只不過是得知他們決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面對諸如此類的歧視待遇，蔣介石感到國際關係中缺乏道義，難怪蘇聯和軸心國可以爲所欲爲，因爲它們知道不會因此而受到懲罰[120]。所以，蔣介石無意興高采烈地去參加高峰會議，然後被其他領袖糟蹋。另一方面，蔣介石也早已決定，今後應該減少和外國人之間的交往。因爲在他眼中，外國人（特別是英國人）的狡詐無信令他備感寒心，而外國使節的行爲也和偵探無異。蔣介石自認爲在個性上失之過於坦率直爽，缺乏社交手腕。因此他認爲，爲了國家利益，更應該避開與外國人接觸才對。他在日記中寫道：「今而後，務必少見歐美人員，非萬不得已，不可接見，更不可常見。以余之粗直短拙，應隱藏不露，爲國自重也。」[121]

---

116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3年6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491。
117 蔣介石日記，1943年6月30日。
118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7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491-492。
119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8月21日。又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21-22日。
120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8月22日。
121 蔣介石日記，1943年8月19日。

蔣介石個人對盟邦的反感和心情的沉重，固然在他日記中已經表露無遺，但是他處理國際事務的手法，依然值得從其他角度加以思考。因爲自從開戰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致力於進入國際舞臺，無論是針對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或是羅斯福與邱吉爾的多次會議，中國政府都曾經極力爭取派代表參加。而宋子文則更是不遺餘力地在會場外打聽內情，甚至不請自來地「鬧場」。但是等到蔣介石自己有機會對這個高峰會議的形式和議程產生一些影響力時，他卻礙於「尊嚴」和「國格」的考慮而心存退讓，沒有經過任何鬥爭過程就把國際舞臺平白拱讓給別人。蔣介石這個決定雖然可以令人理解甚至同情，但是它的得失還是值得深思。它充分顯示出蔣介石作爲一個民族主義者，夾在強烈的「國格」感情和羸弱的「國力」現實之間，他給自己創造的活動空間是如何之狹窄。而在個人性格層次上，蔣介石從三十幾歲開始所習慣的人際關係，就是對孫中山的絕對效忠和黃埔學生對他的絕對服從，很少有與平輩人交往的機會，和外國人交往的經驗更加缺乏，不曾顯示出他具有外交才能。不幸的是，他一旦在未經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就接受擔任中國戰區統帥一職的同時，也立即把自己推向外交事務的火線，失去緩衝餘地，被迫和自己經驗中完全不熟悉的人物交往，對西方的行爲規矩又不夠了解，因此當然大幅增加他工作的困難度。在他和羅斯福的交往中，由於依靠的是信件來往，還有機會可以從容思考，其中又有宋子文居中轉陳，所以彼此之間尚有一片緩衝地帶。但是當他面對地位低於他的西方人物的粗糙言行（**史迪威、衛佛爾、白賴德，乃至菲利斯**）時，在失去體制上的保護屏障之後，短兵相接，則經常是痛苦不堪。值此時節，他心儀的行爲準則如「莊重」、「威嚴」和「內斂」等傳統美德，在和英美將軍們交往時多半是文不對題，派不上用場，而他所缺乏的「急智」、「善辯」、「好鬥」和「潑辣」等品質，卻又正是處理外交事務不可或缺的手法。假如以上這些推論合理的話，那麼它還可能讓人們不禁好奇，假如宋子文當時未被趕出中國政府權力核心之外的話，那麼以他的個性和作風，是否會對中國政府在（開羅）國際會議籌備時期的對策，和後來在會議中的行爲表現，產生大不相同的影響？

無論如何，9月中旬霍普金斯再度向宋子文透露，羅斯福即將和史達林會面，但也希望能和蔣介石會面。當霍普金斯再次詢問宋子何處會面地點爲宜時，宋子文的答覆依然是北非或是近東[122]。霍普金斯的試探，很可能是想說服蔣介石遷就美國意願，不然就會有被排除於高峰會議之外的風險。然而，蔣介石立場並未軟化。

蔣介石和史迪威關係的惡化，以及宋子文的失勢等發展，都影響10月對羅斯福、

122 "Interview with Mr. Harry Hopkins, on September 15th,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蔣介石會面的安排。蔣介石一直要等到10月底才接受羅斯福會面的邀請。蔣介石擔心，如果他再拒絕的話，很可能會被美國誤解成是一個赤裸裸的不友善行爲[123]。至於會面具體時間，蔣介石以前就曾經表示過，只要羅斯福在14天前告知即可[124]。

11月1日，羅斯福通知蔣介石，他尚未收到史達林回覆，但是希望蔣介石11月26日能夠和他以及邱吉爾在開羅附近會面[125]。既然羅斯福已經把時間和地點都提出了，蔣介石立即表示接受，但他私下對於此行依然不表熱衷[126]。11月6日，蔣介石指派史迪威成爲中國代表團成員，並代表中國戰區向盟邦提出軍事報告[127]。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的任命和史迪威的接受任命都明確地表示，史迪威是以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的身分前往開羅，他既不是美國駐華的軍事代表，也不是東南亞戰區的副總司令。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當史迪威在草擬的軍事報告書中，只把焦點放在中國對緬甸戰爭貢獻的兵力時，蔣介石特別親筆在報告上注明，中國軍隊參戰的前提是，同盟國必須在緬甸南部進行海軍作戰，並在1944年雨季來臨之前，全力進攻仰光港，目的在打通仰光港經過緬甸國境通往中國的通路。這些要點後來都列入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呈的報告之中[128]。

大約一周之後，羅斯福又通知蔣介石，他與邱吉爾打算在26日或是27日在波斯灣與史達林會面，因此建議把和蔣介石會面的日期提前到11月22日[129]。與此同時，羅斯福也派遣赫爾利將軍作爲個人代表，到中國和蔣介石就近商定會面細節。從11月9日到11月22日，只有兩周時間。蔣介石作爲中國元首，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和世界上最強大國家元首以平等地位會面，他只有這個短短的時間去做準備工作。

中國準備開羅會議工作過程中最不尋常的一件事，就是外交部長宋子文全程缺席，安排會議事務的責任改由軍事委員會幕僚肩負[130]。中方資料顯示，蔣介石和幕僚準備在

123 CKS cable to FDR, July 18,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7-2.

124 Ibid.

125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11月1日，《戰時外交》（三），頁495。

126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30日。

12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6, 1943, pp. 191-192. Also: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6, 1943.

128 Stilwell memo to CKS, November 11, 1943，見《特交檔案——外交》，第21冊，文件夾#1。又見：Stilwell memorandum to CKS, "Proposals for Coming Conference", Box 35, File 41,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中文譯本：「與帥座之備忘錄」，1943年11月11日。在同一檔案夾中。

129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11月9日，《戰時外交》（三），頁496。

130 「軍事委員會參事室自重慶呈蔣委員長關於開羅會議中我方應提出之問題草案」，1943年11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498-501。又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自重

開羅解決一系列宏觀性的政治軍事問題，包括討回日本非法侵占的領土和財產、戰爭賠償、懲戒戰犯、戰後中國重建和國際合作等事項[131]。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擬訂了一張清單，準備單獨和羅斯福商談。這張清單的內容包括：1. 日本在戰敗後應該把全部海軍艦艇和商船交給中國；2. 日本應該把在中國擁有的一切公私財產交給中國；3. 香港及九龍應該歸還中國並變成自由港；4. 所有日本剩餘的船艦、飛機及武器交給中國；5. 建立新的國際機構，包括東亞組織、地區性的參謀長聯席會[132]。

自從孫中山投身於革命事業以來，國民黨就一直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當成對外關係最重要的目標，主張中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平等地位上。1942年，蔣介石本人在作戰以外，最大關切是如何運用中國新的國際地位去爭取國際平等。這一年10月他在日記中曾經寫道：「閱歷來不平等條約原文，髮指皆裂。北京政府之昏聵一至於此。累積重重桎梏，皆欲由吾一時代負責解除，未知後之視今，作何感想也。」[133] 此後不久他又表示，一旦不平等條約廢除之後，他願意改善中國對英美的關係，在處理其他事物時採取更緩和的態度[134]。

既然中國和英美已經在1943年1月簽訂了平等新約，廢除了從前侮辱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因此中國的外交方針在開羅會議之前，便已經作了重大改變。蔣介石新的外交重點是極力鼓吹緬甸戰爭能夠早日實現。事實上，在他看來，參加開羅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盟邦遵守以前諾言。他私下也決定，緬甸戰爭的海陸空軍攻擊必須同時進行[135]。這也說明爲什麼蔣介石決定把和盟邦交涉政治經濟問題的權力託付給下屬，而自己直接掌握緬甸戰爭的談判權[136]。再者，蔣介石在出席開羅會議之前，心中已經決定遵行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不向盟邦要求施捨。因此，關於日本戰敗後的處置和中國要求賠償權利等問題，他採取的方針也是先聽取英美意見，然後發言，務必不要讓盟邦認爲中國過於貪心，而遭致輕視[137]。最後所提的這一點，再度顯示了蔣介石民族情結的敏感度，或是脆弱性。說到底，就是非常在意不能讓西方人看不起中國。

（續）

慶呈蔣委員長關於準備在開羅會議中提出之戰時軍事合作，戰時政治合作及戰後中美經濟合作等三種方案」，1943年11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503-506。

131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1月14日。

132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14日。

133 同上，1942年10月23日。

134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11月14日。

13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1943年11月14、17、18日。Tuchman, p. 511.

136 塔克曼女士對於中國政府在開羅會議上的意圖，有她自己一套看法，請參照：Tuchman, p. 514.

137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17日。

對日本要求賠償一事在戰後數十年裡，一直是中國民間爭辯不休的重大題目。而開羅會議前是蔣介石個人首度把注意力放到這個題目的時間。有趣的是，他最原始的考慮並沒有提到中國的政治經濟現實需要，也沒有下令中國政府有關部會去作出有數字作爲依據的賠償方案，反而是關心中國在盟邦間可能產生的形象和觀感。當然，由於開羅會議事出倉促，使中國政府無法針對這個問題作出仔細考慮，這也是問題結癥之所在，但是蔣介石思考的重點，對於了解他的政治心理和行爲，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啓示。

## 二、緬甸是蔣介石的主要目標

蔣氏夫婦及隨行高級軍政人員於11月21日上午抵達開羅[138]。蔣介石剛剛安頓好自己，便有英國官員來告稱邱吉爾也剛剛抵達，並擬於當天下午5時半前來拜訪。但是蔣介石堅持6時半先去拜訪邱吉爾。蔣介石和邱吉爾的會談持續了30分鐘。次日上午(11月22日11時)邱吉爾回訪蔣介石。中午霍普金斯來訪蔣介石，並稱羅斯福剛才抵達。下午5時蔣介石又前往羅斯福住所拜訪，並停留了一個小時[139]。

以上這些禮貌性拜訪的流水帳，本身並無重要性，在正常情形下本無需占據討論篇幅。但是由於坊間某些著作，喜把蔣介石描繪成一個心胸狹小而又虛榮心過強的人，因此必定要讓英美領袖們先去拜見他，以滿足後者自我陶醉的心理。而這些刻意加工的「小事件」，經過累積過程又被用來作爲塑造蔣介石整體形象的一項佐證，其目的或許是要證明，蔣介石借著開羅會議急於跳上國際舞臺去尋求自我膨脹。這個現象和在珍珠港事件開始時，有人認爲中國人必定舉國歡騰，額手稱慶的假設，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在有意無意之間透露出，持有這種意見的人自己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因此值得順便在此把事實加以澄清。

### (一)11月22日的初步接觸

中國人在開羅很快就發現，關於緬甸戰爭的討論將面臨重重困難。11月22日，商震將軍和蒙巴頓將軍舉行首度會談時，商震指出，既然蒙巴頓是英國在緬甸的最高軍事領袖，猜想他一定已經擬訂好一整套有關在孟加拉灣進行海戰的計畫，因此希望他(蒙巴頓)在開羅會議期間，能把這項計畫完全敲定。蒙巴頓的答覆是請商震放心，因

138 依照塔克曼的分析，蔣介石感到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因為他在抵達開羅機場時未受到羅斯福和邱吉爾的迎接。見：Tuchman, p. 514. 但是事實與塔克曼所形容者大有出入，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1日。

139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2日。

爲他的確已經把蔣介石在重慶給他的指示，完全納入作戰計畫之中。但是他也出乎尋常地自謙，表示自己在英國政府體系中，只不過是一位「資淺」官員，人微言輕，政府未必重視。因此他希望能夠得到蔣介石在會議上予以支持。換句話說，蒙巴頓的意思是，計畫已經擬好，但是能否被上司接納仍屬未知數。蔣介石立即決定在當晚9點鐘召見史迪威，商議對策。想不到的是，史迪威雖然是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分出席開羅會議，但卻未向中國代表團報備而擅自離團，並且不知去向[140]。用不著說，蔣介石認爲史迪威缺乏紀律和蓄意不敬，因之大感不滿。而史迪威卻在事後若無其事，把責任推脫成是溝通失誤[141]。可以想見的是，蔣介石和史迪威二人，又身不由己地開始走回到摩擦的老路上去了。

商震還從和蒙巴頓會談中(11月22日)，得知另一個令他大爲吃驚的消息，那就是英美將領原來已經就緬甸戰爭舉行過磋商。當商震詢問爲何沒有通知中國代表團參加時，蒙巴頓只能啞口無言[142]。事後邱吉爾透露，開羅會議議程的確是由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所擬訂，而他們認爲理所當然地無需徵求中國人意見。等到蔣夫人向羅斯福抱怨後，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才手忙腳亂地把次日會議變成名副其實的三邊會議。但是由於時間緊迫，已來不及再舉行一次會議來商談議程了[143]。

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行爲，不管是無心過失，或是成員心態的正確反映，都令人震驚。這群同盟國最高軍事將領應該了解，中國代表團不遠萬里從重慶趕來開羅開會，而且將爲緬甸戰爭提供最大的兵力，但是居然墨守傳統心態，認爲無需邀請中國人參加開羅軍事會議的實質討論，這真叫中國人不禁大爲憤怒，蔣介石的反應就是立即命令史迪威取消原來安排，不再向同盟國提供中國關於緬甸戰爭的行動計畫[144]。

## (二)11月23日的會議

1943年11月23日早晨，同盟國首領召開第一次關於緬甸戰爭細節的討論會，由羅斯福主持。蒙巴頓報告作戰計畫，並感謝蔣介石授權他指揮中國在緬甸的遠征軍。邱吉爾接著發表長篇演說，談到戰爭中他對海軍的承諾，提到參戰艦艇將有20艘之

140 王寵惠(呈蔣委員長)，「關於開羅會議日誌」，1943年11月22日，《戰時外交》(三)，頁508-546。

141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2, 1943.

142 商震(呈蔣委員長)，「隨節參加開羅會議日記」，《特交檔案——外交》，第22冊，第一部，檔案夾#1。

143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2日。

144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3, 1943.

多[145]。蔣介石對於邱吉爾能夠提出艦艇的具體數量表示滿意。

接下來，蔣介石終於有機會向羅斯福和邱吉爾當面解釋，他爲何一貫堅持緬甸戰爭中海陸攻擊必須同步進行。他說道：

> 假如我們能夠控制海面，切斷敵人的補給線，而我們的空軍又可以摧毀敵人後方的補給線的話，那麼對我們在陸地上的推進將大有幫助。反之，如果敵人可以自海上得到無盡的補給的話，那麼我們成功的機率將大為降低……我們必須了解，敵人不會輕易放棄緬甸。他們將會堅持作戰，因為假如他們一旦失去緬甸的話，那麼他們就無法保住華南和華中的地盤。因此，敵人一定會投入所有的力量去保衛緬甸。

蔣介石的結論是：「陸軍的集結必須和海軍的集結同步進行。換言之，集結陸軍的日子將由集結海軍的日子來決定。」[146]

在國家首領們會議之後，軍事將領的第一次全面會議在11月23日下午舉行，由英國陸軍參謀長布魯克(Alan F. Brooke)主持。會議一開始就出現劍拔弩張之勢，根本原因當然是中國一直延遲到當天上午才收到英國(蒙巴頓)計畫的有關資料，而且還僅是一個大綱形式而已，缺乏具體內容。中國人也沒有在事先接到通知，不知道該計畫將在同一天下午進行討論。換句話說，英美兩國將領們早已有充分時間研讀整體計畫的全文，而中國人卻只是在幾小時之前收到一份簡短大綱而已。

不難想像，當布魯克將軍在下午3時邀請中國人對蒙巴頓計畫發表意見時，商震的回答是：中國沒有收到蒙巴頓計畫書的全文，也沒有足夠時間仔細了解其內容，因此無法作出回應。當布魯克對於中國人的「缺乏準備」加以譏諷時，商震立即予以反擊，要求主席說明爲什麼日前討論議程設定時，不邀請中國參加。商震更要求得到一份完整的計畫書，讓中國人了解其翔實內容和提出意見。由於中國人拒絕進一步討論實質問題，主席只好悻悻然宣布散會[147]。

---

145 有關邱吉爾的談話內容，見：王寵惠，「關於開羅會議日誌」，附件二，「軍事問題會商經過」，1943年11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535-546。

146 王寵惠，「關於開羅會議日誌」，附件二，「軍事問題會商經過」，1943年11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535-546。

147 英文有關這個場景的描述，請參考：Tuchman, p. 517. 中文有關此次會談記錄，見：朱世民，「隨節參加開羅會議日記」，《特交檔案——外交》，第22冊，第一部，檔案夾#1。

我們從同盟國軍事將領之間互動的心理狀態中，不難得到一些啓示。中國代表團抵達開羅前，羅斯福已經在11月19日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成員作出決定，不向蔣介石透露美國打敗日本方案的細節(理由是恐怕中國人不能保守機密)，而只是由羅斯福向蔣介石作一個泛泛性的介紹。當霍普金斯指出蔣介石可能會要求羅斯福說明攻打日本的詳細計畫時，羅斯福表示他只打算給蔣介石一個一般性敘述，而不會提供詳情或是日期[148]。

此後在整個開羅會議過程中，中國代表團團員都被盟邦的某些動作，凸顯出他們似乎非常無能，對應該討論的事項缺乏準備，又似乎沒有能力作出紮實的計畫工作。但事實上，中國陷入這種窘境的部分原因，是英國人根本沒有給予適當尊重，然後使中國人在美國人眼中看起來相當愚蠢。中國人當然心裡有數，因此也十分痛恨英國人這種伎倆。即使像史迪威這個一向苛刻責備中國人缺點的人，也被英國人行爲所激怒[149]。顯然，英國軍人的心理是認爲，他們有權要求中國軍人對緬甸戰爭作出具體承諾，但是英國卻沒有義務把自己的作戰計畫告訴中國。

當天晚上7-11點鐘之間，羅斯福主持了一個全體同盟國軍政領袖們出席的大型餐會，並對國際政治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蔣介石利用這個機會，說明中國戰後處置領土的立場。他的重點是：1. 東北、臺灣和澎湖歸還中國；2. 琉球交由國際共管；3. 韓國和越南給與獨立。其他涉及的問題還有日本戰後的政治體制和對中國的賠償、蘇聯參加對日抗戰、新疆問題、投資問題和成立中美參謀長聯席會議等等[150]。

### (三)11月24日的會議

一旦中國人獲得了24小時的緩衝時間，他們便認真研究了英國的計畫書，並決定要求英國人解答一大堆疑點。會議在24日下午3時開場，中國人立即對蒙巴頓提出許多毫不留情面的問題。例如：1. 有多少參戰的英國士兵是白人？2. 在印度的白人英國兵會不會到緬甸作戰？3. 裝甲車和特種部隊各有若干？這些部隊的作戰經驗是否豐富？就作戰計畫而言，中國人的問題是：1. 在抵達更的宛河(Chingdewin)西岸後，英國軍隊是否仍向前推進？目標是什麼？2. 占領卡薩(Kasa)後，英國軍隊的下一步意圖是什麼？3. 英國在八莫(Bhamo)、臘戌(Lashio)等地軍隊將如何部署？最後中方再一

148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FDR and JCS on board a ship to Cairo Conference, November 19, 1943, in Xerox File 1537, Folder 10, MFA.

149 史迪威的描述，見：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23, 1943, pp. 197-198. Also: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3, 1943.

150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3日。

度申述了本身對緬甸戰爭的立場：1. 緬甸戰爭中的海陸攻擊必須同時進行。英國必須具體說出它海軍計畫和艦艇集結的準確日期。2. 中國必須有每個月一萬噸的補給物資。3. 緬甸戰爭的初期目標是占領曼德勒，第二期目標是占領仰光，並完全控制中國到印度之間的交通線[151]。

接下來的討論中，英國將領康寧漢(Alan G. Cunningham)向中國提出一項保證，那就是在作戰期間孟加拉灣地區一定會有足夠的海軍力量。與此同時英國也提出了一個讓中國人感到不安的新問題。蒙巴頓指出緬甸戰爭可能需要挪用送往中國的美援物資，這就將使中國得到的總量低於每月一萬噸。更有甚者，英國人有自己一套攻打曼德勒的計畫，屆時很可能還要再降低分配給中國的物資。中國的代表立即駁斥蒙巴頓的說法[152]，讓英國人頗感下不了台。

蔣介石在頭兩天會議中很快發現，邱吉爾既無法在1944年5月之前集結大量海軍，也不相信海上攻擊可以有效阻止日本從陸上把物資經由泰國運進緬甸[153]。他完全想不到邱吉爾竟然改變原先承諾，大吃一驚以後，立即在匆忙之中拜訪邱吉爾，企圖說服後者維持原來計畫，但是他的努力仍歸失敗[154]。最後蔣介石只好通知馬歇爾說，中國完全反對蒙巴頓的作戰計畫[155]。這個結局實在是大違中國政府的初衷。本章前文(參-二-(一))還提到，蒙巴頓原先的如意算盤是，聲稱自己的作戰計畫是融合了中方要求之後所作成的，冀此能夠把蔣介石捆綁住。不意中方在充分了解其內容之後卻對之予以全盤否決。

## (四)11月25-26日的會議

對於蔣介石來說，11月25日會議同樣令人失望，因爲邱吉爾表示緬甸戰爭將無法在次年5月前開展，他同時還拒絕說明兩棲作戰的具體地點，也不願意將之提前實施[156]。當天稍後羅斯福單方向蔣介石保證，緬甸戰爭必定會包括海軍攻擊，而且登陸作戰時間也將會提前。但是羅斯福也承認，他的意見其實尚未徵得邱吉爾同意。

---

151 有關史迪威對會場的反應，見：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3, 1943.

152 朱世民，「隨節參加開羅會議日記」，《特交檔案——外交》，第22冊，第一部，檔案夾 #1。又見：商震(呈蔣委員長)，「隨節參加開羅會議日記」，《特交檔案——外交》，第22冊，第一部，檔案夾 #1。

153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11月23、24、25日。

154 同上，1943年11月24日。

155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4日。

156 同上，1943年11月25日。

同樣重要的是，羅斯福也向蔣介石透露，英國根本不想讓中國變成強國[157]。此時蔣介石已經非常擔心蒙巴頓會搶走中國物資分配量的一部分，因此要求美國軍方必須把中國物資需求和蒙巴頓需求分開處理，以確保中國能夠得到羅斯福所承諾的每月一萬噸物資[158]。

以上這些發展清楚顯示，蔣介石在開羅會議上的努力目標，是要取得盟邦保證緬甸戰爭必將及早執行。而羅斯福雖然作出了各種努力，但始終無法說服邱吉爾遵守早先的承諾[159]。此時出席會議的美國領袖都很清楚，英美兩國確曾向中國提出承諾。正因如此，羅斯福在11月28日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晤面時，才會指出，如果盟邦能夠占領安達曼(Andaman)群島，就可以幫助空軍切斷日軍從曼谷到緬甸的補給線。他告訴參謀長們說，美國對中國有執行兩棲登陸作戰的義務。他更進一步說明，英國人已經告知蔣介石他們會加強在印度洋的海軍。講到這裡，金氏海軍上將插嘴說，邱吉爾在口頭上已經把支持緬甸作戰的海軍艦艇的具體數量告訴了蔣介石，而唯一能夠用得上登陸艇的地點只有安達曼群島而已[160]。美國資料證實中國有關英美兩國在開羅會議中作出承諾的說法，但是這些承諾後來卻被英美兩國蒙混過去了。

開羅會議始終沒有深入討論的一個議題是，美國本身對緬甸戰爭到底打算作出何種貢獻。蔣介石對此也沒有深究。史迪威原本想爭取到美國承諾陸軍參戰，而且還向蔣夫人提供一些計謀，傳授她用何種說詞最能打動美國政府採取此項行動[161]。但是中國人並沒有堅持這個要求，反而是由史迪威自己在11月25日向羅斯福提出，而結果卻是大失所望。就像史迪威事後尖刻的敘述，「羅斯福的計畫，是派遣一個海軍陸戰隊的旅到重慶來！而馬歇爾的計畫則是派遣一些小型的戰鬥隊。」[162]

## (五)蔣介石對開羅會議的印象

開羅會議無疑是中國處理國際事務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蔣介石本人第一次走上國際舞臺。但是他的成就和預期之間存在重大距離。中國代表團原先準備了一籮筐的外

157 同上，1943年11月26日。

158 王寵惠，「關於開羅會議日誌」，1943年11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521-524。

15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0月1日。西方學界也有人把責任歸諸蔣介石和邱吉爾，而認為羅斯福並無過失。見：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49-150. 但是本章引用的中文資料無法支持此種說法。

160 Minutes of the Eureka Conference, Xerox File 1537, Folder 10, MFA.

161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4, 1943.

162 Ibid., November 25, 1943.

交議題，想在開羅一舉解決，包括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各個方面。但是蔣介石的最後評價是，中國在開羅得到的政治成就，遠遠超過軍事成就。他感慨系之，僅是靠三國領袖大筆一揮，就讓中國承受了幾十年的國恥從此煙消雲散。這些政治成就包括東三省、臺灣，以及澎湖的回歸祖國，和對韓國獨立的承諾。他把經濟成就放在第三位，主要理由是蔣夫人認爲，她和羅斯福之間達成了一個有關10億美元借款的協議[163]。

至於軍事問題，蔣介石其實在11月底之前已有預感，認爲由於英國人不願意進行海軍登陸戰，所以緬甸戰爭大有可能會延遲到1944年秋天才進行[164]。但是經過和邱吉爾的個人接觸之後，蔣介石也不得不對邱吉爾和英國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敬意。他稱讚邱吉爾的才智和魅力出眾，而英國能夠有效處理殖民地千頭萬緒的問題，並使得殖民地人民對英國無可奈何，說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也確實當之無愧[165]。

有趣的是，蔣介石通過和羅斯福、邱吉爾及其幕僚的接觸，也對自己同胞的缺點產生更深刻的創痛感。返國途中，蔣介石在蘭伽訓練基地作了短暫停留。他注意到中國軍官無論在體能、專業知識，以及個人氣度上，都無法和西方軍人相比。他毫無保留地承認，中國人或許還需要20年努力才能趕上西方。假如不努力的話，則將永遠得不到西方人的平等對待。這個體驗令他悲痛不已[166]。他指責有些中國人只知奢言國家獨立平等的高調，卻不作痛切的自我反省，不去了解爲什麼會被西方人歧視的深層原因。開羅會議給他的教訓是，中國羸弱的主要原因在人才缺乏，中國必須用一代的努力推展教育，才有希望得到和西方人士平起平坐的真實地位[167]。

## 肆、德黑蘭會議導致計畫改變

然而即使是對同盟國如此沒有信心的蔣介石，也沒有料到同盟國改變主意的速度，竟然會快到叫他難以想像。12月6日，他剛剛抵達重慶國門，就收到羅斯福電報，建議把緬甸戰爭推遲到1944年11月才施行。羅斯福的解釋是，邱吉爾、史達林和他自三人已在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決定，在1944年春季對德國發動大規模攻擊，因此需要在歐洲集結大量海軍艦艇，無法同時顧及緬甸戰區的需要[168]。

163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8日。
16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30日。
165 同上，1943年11月30日。
166 同上。
167 同上。
168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12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286。

一如既往，羅斯福並未將延期的真實原因據實以告。德黑蘭發生的實際情況是，史達林要求盡快開闢第二戰場，羅斯福答應可以在1944年5月執行。邱吉爾歷來主張採取迂迴戰略，從土耳其和希臘進攻柏林。但是美國和蘇聯聯手主張從英法海峽直接攻打德國，因此邱吉爾趁機宣稱，英國海軍無法兼顧歐亞兩個戰場。這樣就讓邱吉爾和史達林結成伙伴，聯手對付羅斯福，逼美國同意取消緬甸海戰，以便英國海軍集中全力進攻法國北部。邱吉爾同時辯稱，一旦蘇聯承諾向日本開戰，同盟國也無必要在緬甸作戰或是大力支援中國了[169]。

爲了減少美國在太平洋地區作戰傷亡，史達林承諾在擊敗德國之後盡快向日本宣戰，交換條件是蘇聯在東三省得到某些特權。對於羅斯福和邱吉爾來說，蘇聯對日參戰可以減少同盟國對中國的依賴，而蘇聯從西伯利亞對日本本土進行空中攻擊，提供的機場也遠比中國更具優勢，並且可以就近從阿拉斯加取得供應[170]。因此，儘管美國軍事領袖不久之前才在開羅會議上極力推動緬甸戰爭，但是此時羅斯福卻直接主張削減對緬甸戰爭的支持度。羅斯福歷來所扮演的角色本只是蔣介石和邱吉爾爭論中的調和人；此後，假如緬甸戰爭還要執行的話，他必須變成直接向蔣介石施加壓力的主角。他的外交角色出現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 一、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最初反對德黑蘭決定

開羅會議宣言，經過中國、美國和英國簽字後，在12月1日昭告世界。諷刺的是，它在肯定中國是世界強國的同一時刻，其他兩個簽字國卻決定不再支持中國最大的軍事需要了。

羅斯福和邱吉爾回到開羅後三天，英美兩國的軍事領袖再度熱烈討論第二次緬甸戰役的規劃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反對取消海軍作戰計畫，宣稱歐戰需要雖大，但沒有必要把海軍資源從緬甸戰區調走。何況，如果取消海戰，蔣介石將會拒絕派遣（在雲南的）遠征軍進入緬甸戰場，如此一來，第二次緬甸戰役將淪爲空談，日本無後顧之憂，可以大量抽調在緬甸及在東南亞占領區的軍隊去增援太平洋戰場，抵抗美軍進攻。

羅斯福已經指出，同盟國對中國有道德上的責任，應該在仰光附近實行兩棲登陸作戰，只是邱吉爾堅決不肯讓步，他也無技可施。他的主要將領李海、阿諾德和馬歇爾等將軍，也相繼追隨羅斯福向英國人的壓力屈服，同意放棄海軍作戰。唯一持反對

169 Tuchman, p. 521.

170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800.

意見的是海軍上將金氏，他的理由是擔心蔣介石會認爲同盟國背信棄義。到了12月5日，羅斯福終於向英國人完全低頭，通知邱吉爾同意取消緬甸戰爭中的海軍計畫[171]。

羅斯福發信給蔣介石前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在1943年12月5日舉行第135次會議，再次討論緬甸戰爭問題。討論中有幾件事情令人注意。一是馬歇爾承認，由於同盟國改變主意，日本有機會在緬甸加強防務，從而使得中國軍隊在未來作戰時將會遭遇更大困難。不過，如果沒有緬甸戰爭，那麼日本就可以放心把這些軍隊轉移到其他戰場去使用。其次，塞末維爾將軍相信，中國將強烈反對同盟國不執行緬甸戰爭的計畫。即便如此，他相信蔣介石還是會留在同盟國陣線內，因爲同盟國勝利在望。他這番話非常正確反應了美國軍事將領的感受，那就是，中國非常希望緬甸戰爭能夠進行，後來有人指控中國不想進行緬甸戰爭，都是罔顧這些事實。三是金氏上將認爲，在緬甸南部發動兩棲攻擊，對於緬甸北部的戰爭至關重要，因此必須同時進行[172]。

12月6日，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向羅斯福和邱吉爾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有關緬甸戰爭的部分有以下幾個重點：1. 他們對於亞洲地區和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性作出了明確選擇，那就是對日作戰的重點應該放在太平洋；2. 他們同意把孟加拉灣和緬甸南部的兩棲作戰延遲到下次雨季後舉行，並把登陸艦艇轉移到歐洲戰場使用；3. 他們要求有關緬甸戰爭的其他一切準備工作照常進行，並對泰國緬甸間的鐵路和曼谷港口進行轟炸[173]。

這就是說，儘管美國總統已經致函蔣介石，對於英美兩國違反開羅會議承諾和導致緬甸作戰必須延期一事表示道歉，但是美國軍方依舊希望蔣介石能夠履行中國自己承諾的部分[174]。換言之，即使羅斯福和蔣介石在此後兩周爲延期事互通信函時，美國軍方領袖也依然堅持他們自己的這種想法。

## 二、史迪威和羅斯福在開羅會談

至於羅斯福本人對同盟國改變政策的態度，可以從他和史迪威在開羅的兩次會談中看出一些端倪。他們之間的第一次會談是在德黑蘭會議之前舉行的。史迪威的目的

171 Maurice Matl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p. 371. Also: Tuchman, p. 523.

172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Xerox File 1537, Folder 10, MFA.

173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AT CONCLUSION OF THE 'SEXTANT' CONFERENCE", from "EXTRACT OF CCS 426/1, 6 DECEMBER 1943". Verifax File 816, Item 2149. MFA.

17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70-71.

是說服羅斯福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到緬甸作戰，並任命美國軍官指揮中國在緬甸的部隊。

會談之前，史迪威興致勃勃地準備好一份說詞草稿，列舉5個要點，包括：兵力、行政權力、美國部隊、中美指揮系統和對在印度的中國軍隊(所謂X部隊)的指揮權等等。然而史迪威根本無法讓羅斯福關注這些實質問題，因爲羅斯福不但聽不進史迪威想要說的話，也拒絕回應史迪威有關派遣美國部隊的要求。會談完畢後史迪威滿腔怒火寫道：「注意：羅斯福根本不感興趣。」[175]

德黑蘭會議之後，史迪威在霍普金斯鼓勵之下，在12月6日再度要求晉見羅斯福，但是羅斯福依然不願觸及嚴肅問題。當史迪威詢問德黑蘭會議的政策改變將會如何影響美國對華政策時，羅斯福完全不答腔，而只是抱怨英國人的背信。在話題終於涉及德黑蘭會議本身時，羅斯福宣稱，他堅持了四天，希望維持有關緬甸戰爭的原議。但是英國人也堅持不想打仗，因此他本人被迫讓步，唯一的理由是他不能讓德黑蘭會議以失敗告終。當史迪威提醒羅斯福稱，如果同盟國不能重開緬甸通路，蔣介石將很難向中國人民提出解釋，羅斯福的回應是：「的確如此。但是假如我們不執行此項作戰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增加駝峰的運輸量。對！我們可以經由這個方法向中國運送更多的物資。」[176]顯然，羅斯福已經想好用增加美援的手法對中國進行補償，借此減輕同盟國加諸蔣介石之身的痛苦了。

史迪威個人筆記的標題，把他們這次會談形容成是一個商討中國政策的會議，但是總統下了決心不想談這個問題，反而花更多時間大談他祖父19世紀中葉在中國經商的奇遇趣聞。無論史迪威如何努力把話題拉回到正題上來，羅斯福同樣努力地東拉西扯，言不及義。最後當侍從人員宣布邱吉爾首相已經抵達官邸時，羅斯福立即順勢結束談話，而且還說：「好吧，就這樣吧。但是，請記得，你們都是大使。哈，哈，哈。對。你們都是我的大使。」史迪威顯然被羅斯福的態度惹得火冒三丈，但又不敢形之於色，只好在筆記結尾處寫道：「你(泛指後世的閱卷人)自己去下結論吧。」其厭憎而又無可奈何之情躍然紙上。

從史迪威筆記中可以清楚看出一點，羅斯福在整個談話中從未暗示準備對中國施壓，要中國單獨去進行緬甸戰爭。相反地，他聽起來語帶抱歉，並且表達了一個心願，

175 Tuchman, pp. 518-519.

176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on "Conference on Policy in China", December 6, 1943, at Kirk's House, Cairo, after the Teheran summit,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December 6, 1943, pp. 201-202.

希望以增加駝峰運輸量的方式，來減輕蔣介石遭受的打擊。最能表達羅斯福當時心情的是，他臨別時指望史迪威和其他美國官員扮演好「大使」的角色，用婉轉的方式去減少壞消息可能帶給中國人的打擊，而不是用疾言厲色的方式去扭曲他們的胳臂。

史迪威內心對羅斯福的評價更爲苛嚴。他說：「這傢伙真是個大笨蛋。我的天哪，他真是可怕，讓我們出來都嘔吐了。光是呆呆地坐在那裡，而卻一事無成。」[177]

史迪威對羅斯福如此尖銳的批評，也確實符合他的本性，說明他對自己的美國老闆也可以同樣嚴厲責備。但是讀者千萬不可把它和史迪威對待蔣介石的態度混爲一談。原因很簡單。史迪威前後和羅斯福在白宮和開羅有過數次會談，他在內心中從來沒有對總統有過衷心的敬佩。但是他的表面態度永遠恭謹守禮，甚或由於內心懼畏而導致其詞不達意乃至手足無措，完全沒有他在中國官員們面前所展示的尖嘴利舌和張牙舞爪的霸氣。由於史迪威這種笨拙的表現，他先後還曾受到羅斯福、邱吉爾，和史汀生的批評，但是從未回嘴，只是在回家後懊惱不已。即便是此次開羅會面，他打算嚴肅地去談政策，而且在事先還作了充分準備，卻被羅斯福賞了一記悶棍，但是他沒有作任何掙扎，更不敢絲毫發作，仍然溫順地吞下，無言退出，然後回家把一腔怒火發洩在日記裡。相較之下，他對蔣介石和一切中國政府官員，不但在日記中批評得體無完膚，而且還屢屢當面加以百般侮辱。這就是史迪威對中美兩國領袖們在態度上的差別待遇，也是蔣介石一再表示無法容忍的行爲。不幸的是，史迪威這種行爲，絕對沒有幫助他在中國樹立威信或是增加工作效率。正好相反，他卻讓美國政府付出了完全不必要的代價。

附帶應該注意到的是，在這次毫無進展的簡短會談中，卻曾經有如下一番對答：

戴維斯：無法打通交通對中國的影響是——

羅斯福：對，對。你們認為蔣介石還能支持多久？

史迪威：現在的情形非常嚴重，假如日本重複去年5月的攻擊的話，就可能讓他崩潰。

羅斯福：那麼，我們就應該找其他的人，或是一群人，能夠繼續——

史迪威：他們可能會來找我們。

羅斯福：對。他們會來找我們。他們真的喜歡我們……[178]

177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6, 1943.

178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on "Conference on Policy in China", December 6, 1943, at Kirk's House, Cairo, after the Tehran summit,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不管採用何種尺度來看，羅斯福這段話只不過是一大堆雜七雜八話語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根據史迪威的判斷，它們也是了無新意。何況羅斯福對蔣介石垮臺的可能性最多只說了一句閒話，而且是被動性的。然而就在史迪威從開羅回到中國後不久，他卻給竇恩將軍(Frank Dorn, 雲南中國遠征軍副司令和參謀長)傳達了一個號稱是最高機密的指令，囑他擬定一個謀殺蔣介石的方案，以備不時之需。史迪威同時向竇恩透露，這項命令「來自最高層」，但是未說出是誰。不過談話的脈絡是，史迪威暗示他曾經和美國總統有過會談，並宣稱總統對蔣介石頗爲不耐煩，同意必要時把蔣介石換走。史迪威說話的時空背景，很容易引導聽話人推測，史迪威引用的權威，也就是想要暗殺蔣介石的人，應該就是美國總統本人[179]。

目前資料顯示，羅斯福在開羅時的心情是失望，對英美兩國不能履行對蔣介石的承諾感到無能爲力，但是心存歉意。特別可以注意的是，當羅斯福問起蔣介石還能支撐多久時，他應該是擔心美國對緬甸戰爭失信，可能會危及蔣介石在中國國內地位的穩固性，而不是幸災樂禍地想把他幹掉。

但是羅斯福在德黑蘭所受的挫折，卻讓史迪威個人的心情產生急劇轉變。史迪威一直強烈盼望趕緊展開緬甸戰爭，因此對他而言，德黑蘭的發展是更大的打擊。他一旦了解美國無法強迫邱吉爾參加緬甸戰爭時，史迪威只能掉轉矛頭，把滿腔失望發洩到蔣介石身上，理由是蔣介石堅決不肯僅由中國單獨負擔在緬北作戰的任務。羅斯福可以接受這個事實，而且認爲美國對中國有所愧疚。但是史迪威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相反地，他怒火中燒，以至於抓住總統一些閒話，把它扭曲成爲授權制定一個計畫，必要時暗殺蔣介石。

雖然這個事件已經過去了將近70年，但是美國軍方仍有不少未解密文件。在這些目

179 Letter from Frank Dorn to Major General Wendell J. Coats, Chief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entagon, May 7, 1969.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6. 竇恩寫這封信的目的是請求陸軍部表態，他是否可以向塔克曼女士提供此項訊息在她的書中加以發表，和他是否將來可以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用。根據竇恩的說法，他的確曾經擬訂一項可行的方案並且得到史迪威的同意，但是也接到史迪威的指示暫緩執行，等待「上級命令」。當然，這項上級命令從未下達。竇恩也指出，他在史迪威的私人檔案中，找不出任何有關此項謀殺案的文件。同樣地，本書作者在羅斯福、馬歇爾，和史迪威的檔案中，也找不出任何蛛絲馬跡的證據。因此，這個現象有幾個可能的解釋：1. 竇恩無中生有，虛構故事。2. 史迪威膽大妄為，欺瞞上級，自作主張。3. 馬歇爾與羅斯福均為同謀，但是不在文字上留下任何痕跡。4. 有關的歷史資料確實存在，但是美國政府檔案審查人員扣留一切有關文件至今。以上每一種可能性對戰時中美同盟關係的含義都大不相同。作者個人認為第2種可能性最大。

前尚未公開的檔案中，或許存在足以支持史迪威說法的證據。不然的話，這段故事就很生動地反映出，史迪威乖張病態的行爲和心智，捏造命令，欺上瞞下，實屬膽大妄爲之極。當然，假如上述證據果然存在，而仍被美國軍方刻意掩蓋的話，那對於我們想了解羅斯福總統或是軍部領袖心態，它們就提供意想不到的線索了。

羅斯福在德黑蘭還有其他動作。當史達林提到中國國力羸弱時，羅斯福回應道，他寧可爭取有四億人口的中國，未來能夠作爲美國的朋友而不是敵人[180]。過幾天回到開羅後，羅斯福又興致勃勃地談到美國戰後要幫助中國重建[181]。這樣看來，羅斯福可能認爲，他在德黑蘭對中國作出的傷害，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提高中國國際地位來作爲補償。換言之，羅斯福此時的心情是，既然同盟國對緬甸戰爭的承諾不能兌現，那麼他準備找其他的辦法，去紓解中國的失望感和彌補中國的損失，例如小心處理中國的自尊心和增加到中國的空運數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開羅會議期間，馬歇爾表示願意把史迪威調離中國戰區。馬歇爾在談話開始時，還是保持禮貌地表示對史迪威的處境十分關切，既然史迪威和中國人之間相處的困難似乎愈來愈大，出於體恤，他因而而有此建議。但是史迪威並不領情，他反而表示他其實非常願意留在中國戰區工作。馬歇爾此時突然變臉，毫不留情地開始訓斥道：「既然是這樣，那你就應該停止胡言亂語。」史迪威趕忙爲自己辯護，聲稱他從來不曾在公開場合把蔣介石叫作「花生米」。馬歇爾立刻反唇相譏：「我的(老)天，你以前從不撒謊。現在也別撒謊(吧)。」[182]這大概是馬歇爾第一次對史迪威失去耐心。馬歇爾用「撒謊」(lie)這麼嚴重的字眼來形容史迪威不講實話的作風，已屬驚人。但是重要的是，史迪威的這種行徑和他在本書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個人作風如出一轍。史迪威從他處理本書早先討論的「三項要求」，到指稱蔣介石意圖與日本談和，再到他指示竇恩將軍擬訂暗殺蔣介石方案，前後行爲頗有一以貫之的連續性。

再回到緬甸問題上來。此後十天左右，美國對華政策開始出現分歧。一方面，總統以抱歉心態對待蔣介石，並明顯表示，打算將緬甸戰爭延期，並請求蔣介石予以諒解和配合。另一方面，軍部得知總統意向以後非常緊張，唯恐緬甸戰爭因而流產，於是努力挽回。至於蔣介石，他縱使對延期的決定非常反感，卻也無可奈何，只能勉強

180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 787.

181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on "Conference on Policy in China", December 6, 1943, at Kirk's House, Cairo, after the Tehran summit,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182 Interview of Marshall, October 29, 1956.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605.

回覆羅斯福(12月10日)，表示暫時接受延期建議，但是最後決定仍須等待史迪威自開羅回到重慶，向他報告羅斯福方案細節後才能作出。蔣介石乘機也指出，日本將利用同盟國專注歐洲戰場的空檔，加緊爭取在1944年內解決中國問題。蔣介石警告美國，如果日本加強攻擊，中國的抗戰可能無法再支撐一年。因此他要求美國像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向蔣夫人表示那樣，給與中國10億美元的貸款，並在1944年2月之後把空運數量增加到每月兩萬噸[183]。顯然，蔣介石也在探索一些補償安慰，當然他對中國困境的敘述也可以是完全誠實的。

簡而言之，上述一連串事件說明了一個簡單事實，那就是：羅斯福面對史達林和邱吉爾聯手施壓，逼不得已通知蔣介石，說明同盟國無法遵行剛在開羅會議上作出的承諾，並且向蔣介石道歉。蔣介石則認爲，他接受羅斯福對戰爭延期的要求是一個有風度的讓步。當然他心知肚明，他也根本無力改變德黑蘭的決議[184]。從最好的角度來看，中國可以把這個讓步轉換成討價還價的籌碼，要求美國支持它對借款的要求，提高空運數量和派遣更多的飛機等等。有趣的是，蔣介石和羅斯福兩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似乎相當接近，那就是彼此可以經由一些交換的手段平息中國的損失和失望。但是這個構想卻大大地違反了美國軍方的盤算。

## 伍、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新態度

### 一、史迪威建議縮小緬甸戰爭範圍

就在這個當頭，美國軍方對緬甸戰爭的態度出現一個大轉彎，他們下定決心，不計任何代價，務必要使戰爭成爲事實。

還應該記得的是，當12月6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提議將緬甸戰爭延期時，史迪威還恪盡職責地敦促蔣介石接受羅斯福的要求[185]。他甚至還指示留守重慶的助手赫恩(Thomas G. Hearn)將軍，去勸蔣介石務必要接受羅斯福的要求[186]。然而一周之內，史迪威卻徹底改變了態度，他宣稱戰爭必須如期展開，但戰爭的規模卻可以縮小，只要在緬甸北部作戰即可。

---

183 Message from CKS to FDR, December 9, 1943. Verifax File 3675, MFA. 其他歷史學者的解釋，見：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50-151.

18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7日。

185 史迪威致蔣介石電，1943年12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633。

186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7, 1943.

等到12月15日蔣介石會見史迪威時，史迪威已經開始警告蔣介石，如果中國不進行緬甸戰爭，則肯定會招致不利後果。史迪威說話的語氣，好像是譴責中國不遵守諾言。尤有進者，史迪威在邏輯上轉了一個大彎。他告訴蔣介石說，除兩棲登陸部分以外，新的作戰方案其實比原來方案更爲完善。史迪威的這番說詞無異是把蔣介石當成是徹底的白癡。當蔣介石依然拒絕改變立場時，史迪威憋不住一肚子怒氣，在日記中大罵蔣介石是「小雜種」和「僞君子」[187]。很明顯地，不管1943年10月以來，在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是否存在過類似蜜月關係，此時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緬甸問題重新撕裂了兩人之間的舊傷口，蔣介石此時對史迪威粗暴言行的反感又到了極點，他更加相信，他應該拒絕史迪威的建議，而決定接受羅斯福對延期的請求[188]。

史迪威無法強迫蔣介石接受他的新方案，爲此他感到非常沮喪。不久之後，他也開始責怪自己的總統早先不應該給蔣介石留一條退路。史迪威認爲羅斯福不應該向蔣介石提供一個選擇的機會，要嘛在1944年3月攻打緬甸，但是沒有海軍在孟加拉灣作戰，要嘛等到1944年11月，會有強大海軍支援之後再發動戰爭。依照史迪威此時的思路，羅斯福從頭開始就應該堅持蔣介石必須配合同盟國的行動。如果他膽敢不順從，美國就切斷所有物資供應。但是現在羅斯福卻給了蔣介石一條退路，就讓蔣介石更不想作戰[189]。在羅斯福原來想法中，增加駝峰運輸量本來是他爲同盟國失信而試圖作出的補償。但是在史迪威新布局中，他卻要以切斷援助，來強迫蔣介石接受一個大幅縮水的緬北戰爭。

史迪威很快在中國和美國兩地分別加緊他的施壓。12月16日，他和蔣夫人以及孔祥熙夫人會商如何在蔣介石身上下功夫。他也和蔣介石當面爭辯了一小時，但是發現後者「不可理喻」[190]。蔣介石完全不理會史迪威的壓力，逕直致電羅斯福（12月17日），正式表達中國接受把緬甸戰爭延遲到1944年11月的建議。在同一封電報中，他也表達希望，歡迎同盟國仍能努力設法提早實施緬甸戰爭[191]。

蔣介石同時還採取了另外一項措施。12月16日，他授予史迪威全權指揮中國在印

18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December 15, 1943, pp. 210-211. Also: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12, 14-15, 1943.

188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14、15日。

18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December 16, 1943, p. 212.

190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16, 1943.

191 Message from CKS to FDR, December 17, 1943. Verifax File 2675, MFA.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12月17日，《戰時外交》（三），頁288-289。

度蘭伽基地的軍隊(所謂X部隊)[192]。蔣介石何以突然如此慷慨，令史迪威百思不得其解，過了好幾天以後，他才相信蔣介石是認真的[193]。史迪威寫道：「一個月之前，我還有被撤職的風險，而現在他(蔣介石)卻給了我一張簽了名的空白支票。」即便時來運轉，史迪威依然保持和蔣夫人的合作。蔣夫人在12月19日向史迪威透露，除非羅斯福能夠親自干預，否則蔣介石決不會接受緬水的緬甸戰爭，也不會讓集結在雲南省的遠征軍(所謂Y部隊)進入作戰位置[194]。這個消息使史迪威更加希望羅斯福進行干預。事實上，也就是在這個時節，緬甸北部的小型戰鬥已經非正式地開始了[195]。

蔣介石當時把X軍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動機委實令人費解。宋子文事後的解釋是，蔣介石是爲了珍惜羅斯福友情而表達的善意[196]。的確，蔣介石也明白告訴了史迪威，他只會在同盟國遵守有關緬甸戰爭的承諾，並決定進行全面作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兩支中國軍隊(X+Y)的指揮權悉數交給史迪威[197]。另外一種聽起來合情合理的解釋是，蔣介石把美國協助裝備訓練的一小支中國部隊交給史迪威指揮，目的是安撫史迪威情緒，並借此堵住史迪威的口，不要得寸進尺地要求對中國其他部隊的指揮權。蔣介石提醒史迪威千萬不要被英國人利用，他也假定史迪威有足夠常識和正常心態，不致使用這支小部隊作爲賭本去從事大規模的冒險行爲。還有一個解釋，就是蔣介石對自己行爲的後果並沒有考慮周詳，也沒有過分在意，以致他在日記中都沒有提供任何線索，幫助學者去了解他的動機。當然，蔣介石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很少聽取幕僚們的意見，也是導因之一。

然而事實證明，蔣介石這個決定肯定是一個重大錯誤，因爲它對於後來緬甸戰爭的發展，產生了他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事實上，就在史迪威收到蔣介石授權的當天，他已經雄心萬丈地開始籌劃，如何運用這支小部隊去達成宏偉的目標了[198]。正如本書以後將會提到的，史迪威很快讓這支小部隊(X部隊)陷於生死交關的險境之中，逼迫蔣介石不得不投入更大的軍隊(Y部隊)以爲救援。換言之，史迪威真是把他手中空白支

19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December 19, 1943, p. 213. JWS t-w diaries, see December 16, 1943 entry.

193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18, 1943.

194 Ibid., December 19, 1943.

195 Ibid., December 24-31, 1943.

196 "Verbal Statement to be made to General Hurle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esent of the Aide Memoir" by Soong, September 24, 1944,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Document 29.

197 Ibid.

19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December 19, 1943, p. 213.

票的潛能發揮得淋漓盡致[199]。本書前文曾經提出一個資產擁有人和投資經紀人之間微妙關係的觀念，來說明史迪威和蔣介石的互動。這個說法在此再度證實其實用性。只是這一次經紀人的行爲更加膽大妄爲。他以威迫利誘的手法，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資產擁有人，使他先作出一筆風險極大的小額投資，然後在果然失敗之際，不得不投下全部家當作爲賭注，企圖扭轉乾坤。當然，資產擁有人自己思路不清和立場搖擺，也有其無可推卸的責任。再者，蔣介石的這個舉動也顯示出，施加壓力所能產生的後果之無法預測性。蔣介石可能以爲作出一個小讓步可以滿足史迪威的情緒，而史迪威則完全可以把這個讓步看成是他施行壓力的初步成效，因此而得到的教訓就是要繼續施加壓力，才能達成更大的目標。

## 二、羅斯福開始變調

對於羅斯福而言，一旦他得到蔣介石同意緬甸戰爭延期，便馬上致電感謝蔣介石（12月19日），稱讚他能夠體會美國「先擊敗德國」的戰略思想[200]。

萬萬令蔣介石想不到的是，羅斯福在一夜之間（12月20日）竟然徹底改變了立場。他的新主張是，即使沒有英國海軍參戰，中國也必須立即開始在緬北進行局部戰鬥。羅斯福的立場何以改變得如此之快，又如此之極端呢？他又如何能夠自圓其說呢？

要解答「爲什麼」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史迪威身上。簡單的說，史迪威對於德黑蘭會議的結局深爲不滿。儘管他知道中國對此結局同樣失望，但是他還是想竭盡所能去扭轉局面，使緬甸戰爭得以起死回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要中國完全不考慮英美兩國是否配合作戰，也不管擬議中的作戰是否對中國有利，但是中國必須立即派遣大量部隊供他指揮。12月19日，史迪威（在和蔣夫人談話之後）致電向馬歇爾強調，雖然英美兩國違背開羅會議的承諾，但是並不足以構成中國延遲出兵作戰的充分理由。由於開羅會議結束後，東南亞戰區已經擬訂一份緬甸作戰計畫，僅以攻占緬北爲目標，因此史迪威建議馬歇爾向美國總統提議，讓蔣介石盡快遵照東南亞戰區的計畫

199 有關美國陸軍部對這個事件的觀點，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 78. 但是本書所提供的材料可以提出一個不同的觀點，即：史迪威無法說明他為什麼蓄意違背蔣介石對於X和Y軍的明確區分，而對之完全規避不談。換言之，史迪威最樂觀的打算是只用X軍就可以擊敗緬北的日軍，進而達成和中國國境的連接。他最壞的打算是利用X軍去誘迫Y軍不得不加入緬北戰爭。不管情形如何發展，史迪威的賭注都只是中國軍隊，而不是美國軍隊。

200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5卷，頁459。

進行緬北戰爭[201]。馬歇爾同意史迪威的說法，並在24小時之內草擬了一份電文，請羅斯福簽字發給蔣介石。在這個匆忙的過程中，美國對於蔣介石曾經在開羅會議上正式否決蒙巴頓作戰計畫的聲明，完全置諸腦後。

就這樣，史迪威放棄了他打從1942年7月起就一直努力推行的緬甸全面作戰計畫。他終於也向英國人認輸，同時也愈來愈相信美國必須向中國施壓，否則第二次緬甸戰爭將永遠不會付諸實行。馬歇爾很容易就接受了史迪威的新立場，並立即採取行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知道羅斯福已在12月5日不顧他們反對，致電蔣介石要求中國同意緬甸戰爭延期。海軍上將金氏戰後回憶說，羅斯福這個舉動是他在整個戰爭期間唯一一次否決他參謀長們的意見[202]。但是，此時他們都爲能幫助史迪威讓緬甸戰爭起死回生而感到高興。

更有進者，羅斯福早先致蔣介石要求延期的電報是由他自己和霍普金斯共同草擬的[203]，因此，文字和語氣都相當慎重，符合外交規範，並且正確反映他本人對整個事件發展的態度。基於此，最合理的推斷是，羅斯福在12月5日到19日這兩周時間內，他個人態度前後保持一致。換句話說，他起先是以充滿歉意的心情，把戰爭必須延期的壞消息告訴了蔣介石，繼之是衷心感謝蔣介石能夠以諒解態度接受延期的建議。

但是在19日那天，羅斯福卻同時收到史迪威關於戰況的報告，和軍部替他擬好的電稿，等待他簽字寄給蔣介石。

當然，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天晚上羅斯福主動改變了主意。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白宮和軍部之間溝通出現故障。羅斯福遵循自己的思路，設法說服蔣介石推遲緬甸戰爭；但是軍部被史迪威催促，務必要中國盡快執行一個縮小規模的作戰計畫。軍部把電稿擬好以後，羅斯福只好簽字。理由是，他早先在12月5日否決參謀長建議時，已經感到非常爲難。到了20日，他實在沒有勇氣再度否決軍部了。從這個觀點看，史迪威和馬歇爾終於達到了他們開羅會議以來一直追求的願望，儘管緬甸戰爭規模已經被英美兩國大幅縮減，卻仍需總統出面要求中國傾全力參加，並致電蔣介石施壓。而羅斯福本人也向軍部壓力低了頭。

至於總統在電文中如何自圓其說，既不會出現前後矛盾，也不會給人以漫不經心的印象，這還需要精心處理。羅斯福根據軍部的新說法，抓住蔣介石對中國軍事和經

201 Stilwell cable to Marshall, December 19, 1943,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202 Ernest J. King and Walter Muir Whitehill, *Fleet Admiral King: A Naval Record*(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2), p. 525.

20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71.

濟所形容的嚴峻形勢，順水推舟地強調，解決中國困境之道，正是利用緬甸乾旱季節趕緊打通陸上運輸線。電文還提出警告說，蒙巴頓部隊即將發動大規模空中攻擊，因此中國不可置身事外，而必須把遠征軍盡快從雲南開往緬甸，發動陸上戰鬥[204]。同時羅斯福還丟出了一個魚餌等待蔣介石上鉤：他暗示財政部正在對借款和相關事宜從事研究，很快會有結果[205]。當然，史迪威已經從蔣介石手中拿到的X軍指揮權，也大大地增加了美國政府用中國資源去獨行獨斷的籌碼。

## 三、蔣介石的困境

不出意外，蔣介石的回應仍然堅持，如果同盟國不攻打緬甸南部和敵人兩側，則把中國軍隊投入緬北局部戰場無異是自殺行爲。他同時指出，既然中國駐印度軍隊的指揮權已經交給了史迪威和蒙巴頓，他當然不反對他們使用這支軍隊去從事他們的作戰計畫。他的理由是，這樣做至少尚不致直接影響中國本身的防務[206]。

羅斯福在前後幾次電報中，一再引用蒙巴頓等英國人的說法來支持自己的論點。這不僅於事無補，還等於是火上加油。事實上，打從1943年12月上旬以來，蒙巴頓本人已經開始直接和中國政府接觸，要求中國全面參戰，結果只是徒然增加中國政府的疑慮，以爲英國人布下陷阱，誘騙中國上當。12月10日，當蔣介石已經通知羅斯福表示接受緬甸戰爭延期時，此時蒙巴頓卻通知中國政府稱，雖然他對孟加拉海戰無法施行表示遺憾，但是陸上攻擊計畫仍在積極準備中[207]。一周後，當蔣介石再三詢問英國計畫中的緬甸戰爭開戰日期和規模時，邱吉爾和蒙巴頓依然堅決拒絕透露任何訊息。這些作爲只能加深蔣介石的懷疑和不安。在蔣介石心目中，羅斯福至少坦白說明了戰爭延期的理由，而邱吉爾和蒙巴頓卻言辭閃爍，只能加深蔣介石擔心他們會把中國推進更可怕的深淵裡去[208]。

一旦蔣介石開始對史迪威和蒙巴頓的動機產生懷疑，他們的任何行動都只能加劇他的懷疑。因此當他們兩人在12月19日聯合敦促中國出兵時，蔣介石益發相信他們根本不顧中國的死活，甚或懷疑他們惡意地把中國的失敗當成符合英美的利益[209]。12

204 FDR message to CKS, December 20, 1943. Verifax File 2675, MFA.

205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3年12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89-290。

206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12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291。For English text, see: Message from CKS to FDR, December 23, 1943. Verifax File 2675, MFA.

207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11日。

208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18日。

209 同上，1943年12月19日。

月20日，當史迪威向蔣介石轉交蒙巴頓的緬甸作戰計畫書時，他著意把蒙巴頓的計畫說成是和蔣介石自己最初的計畫內容相同，因此勸說蔣介石應該毫不猶豫地把Y軍送進戰場。毫不意外的，史迪威的語氣讓蔣介石大爲反感，因爲他不但認爲蒙巴頓的計畫內容根本與他不同，而且認爲它的目的只是混淆視聽和勾引中國上當。史迪威自己的急切心態也讓蔣介石相信，他和蒙巴頓狼狽爲奸，強迫中國參加一個極爲危險的戰爭[210]。而史迪威的新說詞跡近侮辱中國人的智力，更是產生反效果。

一天之後(12月21日)，羅斯福本人也捲入了這個複雜的局勢。他通知蔣介石稱，美國政府仍然在考慮對中國借款和增加空運及增加空軍飛機數量等要求，但同時催促蔣介石盡快接受蒙巴頓的新作戰計畫[211]。雖然蔣介石兩周前還把這些要求看成是美國對他同意延期戰爭的補償品，但現在羅斯福似乎已經變卦了，他不再認爲這些要求是蔣介石應得的補償，而是把它們當作魚餌以交換蔣介石接受蒙巴頓新計畫。換言之，在短短的兩天之內，羅斯福立場的改變令人目不暇接。他開始是勸誘蔣介石配合同盟國同意把戰爭延期，最後卻讓自己成爲蒙巴頓作戰計畫的強勢推銷員和支持者，極力主張中國立即加入緬甸戰爭。在這整個過程中，羅斯福把借款和飛機這兩個誘餌放在中國眼前晃蕩，既可以用來獎賞它的合作，也可以用來懲罰它的不合作。

可是蔣介石並沒有爲其所動[212]。他在12月23日給羅斯福的回信中重申，中國可以允許蒙巴頓指揮中國駐印軍去實現其作戰計畫，因爲這不會影響中國本身防務，但是雲南的Y部隊對中國本身的防務實在太重要，因此只有在緬甸戰爭依原計畫開展之後才會投入戰鬥[213]。

1943年歲末，蔣介石的感覺是：英美兩國正密切配合，增加壓力，企圖把中國拉進一個局部性而又充滿危險的緬甸戰爭中去。12月24日，蒙巴頓突然宣布緬甸戰爭即將開始，並且敦促中國立即加入戰鬥[214]。1943年12月29日到1944年1月9日之間，羅斯福多次致電敦促蔣介石盡快將Y部隊投入戰場，不過語氣依然維持禮貌。同時蒙巴頓也多次向蔣介石保證，英國將對作戰作出貢獻，那就是派遣一支所謂「長距離攻擊部隊」參加戰鬥[215]。史迪威也加大壓力，警告蔣介石，如果中國不參加蒙巴頓的新作戰計畫，則同盟國將不得不懷疑，中國到底是否真是有誠意把戰爭進行下去。

---

210 同上，1943年12月21日。
211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21日。
212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21日。
213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23日。
214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12月24日。
215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27日。蔣介石認為這些部隊只是游擊隊。

同盟國這些動作只能加強蔣介石的懷疑心。因爲在他眼中，蒙巴頓的真正意圖，可能是想乘機給中國加上一個不願作戰的罪名，使中國難堪。更可能是利用中國駐印軍來威脅他，不得不把雲南的遠征軍投入緬北戰鬥。尤其讓蔣介石憤怒的是，他認爲蒙巴頓企圖用雜牌的「游擊隊」(「長距離攻擊部隊」)來冒充正規軍，企圖掩飾英國根本無心提供足夠部隊參戰，但是還想裝模作樣，演一場假戲，以犧牲中國來謀取英國的利益。在蔣介石看來，這正是英國人狂妄的表現，把中國人看成是可欺的三歲稚兒，任人輕易玩弄於股掌之間[216]。用蔣介石的話來說，蒙巴頓的「長距離攻擊部隊」只不過是玩弄觀眾的低劣戲法。怪不得他誓言中國絕對不可以信任英國人[217]。

從蔣介石角度來看，英國人費盡心機違反承諾固然可惡。而史迪威不但對英國人束手無策，反而與其狼狽爲奸來脅迫中國人，更是不可饒恕。因此蔣介石奉勸蒙巴頓和史迪威兩人不要輕舉妄動，因爲同盟國所提議的延期也不過是再等六個月而已[218]。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依然希望和美國維持良好關係，並指示下屬一定要盡一切努力配合美國[219]。他在1944年1月9日致羅斯福的電報中也指出，同盟國的延期決定已經置中國於窘境，因爲他無法向中國人民解釋，爲什麼中國的需要總是被同盟國如此忽視。他聲稱非常擔心中國的民心士氣將會益趨低落[220]。顯然可以看出，蔣介石此時仍然希望能夠得到羅斯福支持，說服英國人盡快恢復緬甸戰爭的原始計畫。

## 四、蔣介石的動機和盤算

蔣介石既然已經在開羅會議上取得美國承諾，爲什麼會議後那麼快就接受羅斯福延遲緬甸戰爭的要求呢？他知道英美不願履行諾言，又如何抗拒美國驅使中國承擔作戰主要任務的壓力呢？

實際上，蔣介石之所以強烈希望緬甸戰爭能夠按時展開，主要原因是他非常擔心中國國內情勢。依他在1943年年底判斷，中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將難以挨過1944年。如果想不出辦法因應巨大的國內壓力，他的政權有可能面臨全面崩潰。

---

216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27日。
217 同上，1944年1月2日。
218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27日。
21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月8日。
220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1月9日，《戰時外交》(三)，頁293。

而解除中國內部困境的上上之策，則是重新開通國際交通線，尤其是能占領仰光[221]。值得指出的是，這也正與日軍1944年對華謀略的大構想相吻合，並非蔣介石危言聳聽。

縱使如此，蔣介石仍然沒有能力拒絕羅斯福對於延期的要求。原因很簡單，中國沒有同盟國充分的支持便貿然進行任何規模的緬甸戰爭，是難以想像的。如果輕率在緬甸作戰而遭致敗績，那不僅會是一個軍事上的失敗，它也將是一個慘重的政治和外交失敗。就軍事而言，戰敗將使中國遠征軍受到嚴重折損，使昆明暴露在日本直接威脅之下，駝峰運輸線兩端的基地受到破壞，國際交通線會因之被切斷，中國民心士氣將會一落千丈。從政治外交方面看，他擔心同盟國對中國的輕視將變本加厲，就像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敗後一般，不但美援數量立即銳減，而英國和蘇聯對中國也加倍輕侮。他決不能容許再次發生同樣的後果。

此時還有一個因素影響蔣介石考量，他預測不出兩年之內，太平洋地區將會有一場決戰，屆時中國務須爭取有一支強大軍隊去參加此階段的戰鬥。不然的話，戰後中國在國際上將無人理睬，在和平會議上也將被剝奪發言權，一如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和會上任人宰割一般。既然英美兩國自己都無意發動緬甸全境作戰，則中國毫無理由要被同盟國矇騙，糊裡糊塗把精銳部隊送去一個縮小規模、卻一定大量消耗精力的緬甸戰爭中去。一旦中國精銳部隊遭受重大損傷，同盟國將會把中國置於萬劫不能翻身的弱國地位[222]。蔣介石也知道，他拒絕參加緬甸戰爭可能引發不良後果（譬如沒有緬甸通路，美援停止進入中國等等），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只要是中國本身安全不受影響，而且能夠保持國家元氣，則中國在雲南的美式配備軍隊，在預期兩年後發生的太平洋決戰中，仍可能發生重要軍事作用，從而增加中國的發言權。這種盤算將會嚴重影響蔣介石此時的戰略決策。

當然蔣介石還有另外一層考量，這卻是他不會向史迪威這一類型的美國人透露的。那就是戰敗對他的政權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比如說，即使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已經過了兩年半，重慶政府想從各省徵集足夠的壯丁依然有困難，不要說一般部隊得不到充足兵源，就連預備出國打仗的遠征軍也感到困難重重。假如中國貿然進入緬甸作戰而再度遭受挫敗的話，則重慶政府面對地方勢力的抗拒時將更加沒有籌碼，也將更加無法從各省收到兵源和糧餉，那些盤踞各省的地方實力派軍人，將會張開眼估算

221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3年12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291。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1月9日，《戰時外交》（三），頁293。

222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17日。

中央嫡系軍隊的力量，然後決定是否順從中央政府的旨意[223]。

有鑒於此，蔣介石在接受羅斯福對延期的要求時，他的政治和軍事考量遠比史迪威所能想像者要複雜得多。史迪威唯一能想到的只是親自帶兵在戰場上與敵人搏鬥，而認爲蔣介石缺乏鬥志，怕在戰場上失利。或是認爲蔣介石更卑下的盤算，就是想保存自己派系的實力，靠美國人打贏日本。這都是史迪威在華服務時期一成不變的思維框架，是他賴以分析蔣介石動機的萬靈藥。只要遇到來自蔣介石的困難，就可以立即套用，而且永遠言之成理。以史迪威簡單的思考方式和對政治的驚人遲鈍，他沒有想到，蔣介石從1942年緬甸戰爭失利後，從英國人的表現中已經吸取慘痛教訓，所以在1943年底才會那麼執著，要求同盟國把彼此承擔的責任寫得一清二楚。他也對蔣介石必須面對的來自中國內部的壓力視若無睹，甚或幸災樂禍，因爲蔣介石在處理國內問題時的焦頭爛額，的確可以給史迪威帶來某種程度上的精神滿足。當然另外一件不可以忘記的事是，蔣介石和史迪威個人關係自1942年以後就不斷惡化(除了1943年10月以後的幾周以外)。基於這些原因，蔣介石一直擔心，中國軍隊在第二次緬甸戰爭時，不知將會遭受何種待遇。如前所言，蔣介石一方面對緬甸戰爭的開展期望殷切，另一方面對史迪威的指揮又憂心忡忡，甚至極力抗拒。讀者對中方這種微妙心理必須有正確的認識，即一方面它熱心緬甸戰爭，一方面它完全「不」熱心史迪威個人去指揮這場戰爭。如果不抓住這個要點，而只是從史迪威個人的感受和文檔去觀察中美關係，則可以完全被誤導。而這正是某些著作(特別是英文著作)所犯的基本錯誤。說白了就是，用錯了史料就會作出錯誤的判斷。

所有上述因素都可以幫我們解釋，爲什麼蔣介石在1943年底作他的年終總檢討時，會認爲他拒絕蒙巴頓的作戰計畫，是他在該年中作得最好的決定之一[224]。在他看來，他第一次被騙已經失之過於天真。如果還讓自己第二次被騙，就是不可饒恕的罪孽了。縱使如此，他依然繼續爲緬甸戰爭作必要的準備工作，並且盡力催促英美兩國履行他們的承諾。

然而就美國而言，一旦決定縮小戰爭範圍，很快就對蔣介石的固執失去耐心。兩個國家在心理上都已經準備把怨氣出在對方身上。因此在1943年12月到1944年1月之間，美國的對華關係出現一個重大改變。此時，美國的政策是和英國聯手，迫使中國對緬甸北部戰爭作出最大貢獻，而把自己的貢獻維持在一個低點。

---

223 同上。

224 蔣介石日記，1943年12月31日。

## 陸、美國開始翻臉

### 一、第一波攻擊

美國第一波攻擊是從1944年1月1日開始。先由羅斯福通知蔣介石，財政部不贊成向中國貸款10億美元。如本章早先已經提過(參-二-(五))，10億美元貸款是蔣夫人和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之外達成的共識[225]，這件事情在官方資料上缺乏詳細記載。根據蔣介石記錄，他和妻子11月26日閒聊時首次提到向美國請求借款和經濟援助的可能性，夫婦隨即決定先由蔣夫人出面試探羅斯福的意向，然後再決定是否提出正式要求[226]。僅僅是這個做法就顯示當時蔣氏夫婦心中並無把握，因此想盡量以不露痕跡的方式去探路。

次日早晨(27日)，蔣夫人單獨到羅斯福住處進行會商。根據美國說法，羅斯福只不過向蔣夫人表示願意考慮10億美元貸款的可行性，並願意指示財政部對此問題進行研究而已，並未作出任何承諾。但是根據中國方面記載，蔣夫人會後興高采烈趕回住所，告訴蔣介石稱羅斯福已經同意給中國貸款的「大綱」(意指基本原則)，並且會盡快處理細節。這也就說明了爲什麼蔣介石本人會在當天下午3時趕忙和妻子再度趕到羅斯福住處親自致謝[227]。到了1943年12月5日，蔣夫人又再度致函感謝羅斯福答應借款和把案件提交給財政部辦理[228]。顯然，蔣氏夫婦的理解是羅斯福已經作出承諾，而財政部的工作只是處理細節而已[229]。這個理解和中國以往向美國貸款的經驗完全符合。那就是一旦總統表態，財政部就很快可以把事情辦好。

關於羅斯福承諾貸款一事，迄今仍是歷史上一段未了的公案，原因是史料非常缺乏，但它卻在中美關係上引起了軒然大波，因此必須予以重視。不幸的是，當時在現場的兩個人——羅斯福和宋美齡——似乎都沒有留下文字記錄，這使得蔣介石日記中寥寥的幾句話變成最重要的線索。我們在此只能作一些合乎情理的推理。一種可能性是羅斯福的確沒有作出任何承諾，只是泛泛地答應把中方請求轉交財政部去研究而已。這個說法的含義是宋美齡聽錯了話，甚至是自作多情。另一種可能性是羅斯

225 有關塔克曼對中國10億美元借款的形容，見：Tuchman, pp. 525-526.

226 蔣介石日記，1943年11月26日。

227 同上，1943年11月27日。

228 《蔣總統事略稿》，1943年12月5日。

229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on "Conference on Policy in China", December 6, 1943, at Kirk's House, Cairo, after the Tehran summit,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福的確作過具體承諾，只是事後反悔。本書作者個人的判斷比較趨向後者。理由是：1. 宋美齡的英文理解和表達能力不至於聽不懂羅斯福的話，因此誤解的可能性非常小。2. 正因爲羅斯福作了承諾，才能解釋爲什麼宋美齡會興沖沖地在當天把蔣介石拉到羅斯福住所去道謝。而且這個舉動也非比尋常，一定是蔣氏夫婦認爲值得立即親自登門去鄭重道謝的大事。3. 如果羅斯福果然被宋美齡誤解了，他此時還來得及補救。他大可以當著蔣介石的面加以澄清，指正宋美齡的誤聽。一場空歡喜就可到此爲止。但是羅斯福並沒有這麼作，反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蔣氏夫婦的道謝。因爲在蔣介石日記中無一字提到羅斯福有保留態度。4. 當1943年12月5日宋美齡再度道謝時，羅斯福再度有機會指正宋美齡的錯誤，但是依然沒有表示異議。5. 即便在本書前面數章中，已經有多次實例顯示，羅斯福在對待中國人時可以輕諾(如邀請中國派軍事代表團赴美，向宋子文承諾召回史迪威)，但是也可以寡信，特別是當他遭到聯邦政府重要部門(軍部、財政部)的阻力時，他就可以反悔或是乾脆不認帳。在此次事件中，真正關鍵性的是時間。12月19日之前他需要向中國示好，以爭取中國同意緬甸戰爭延期。因此他還願意承認自己的確作出過貸款的承諾。而在12月20日之後他需要向中國示威，以壓迫中國參加緬北戰鬥，因此必須否認作過任何承諾。不幸的是，許多著作在談到這個重要事件時，都只是依賴美國單方面的資料，對於上述的各種因素未予思考。

無論上述事件真相如何，到了1944年1月初，美國進一步表示中國政府既然沒有用完1942年借款的半數，又未曾有效地抑止通貨膨脹，甚至還堅持把美元和法幣的官方兌換率維持在1比20上(而這個兌換率遠遠低於黑市價格)，因此沒有理由再向美國要求10億美元的新借款。而當時關於中國官員貪污和濫用美援的故事也已成了輿論抨擊對象，特別是關於孔宋兩個家族貪污的傳言不斷，引起美國人民異常不滿，也成爲拒絕貸款給中國的理由[230]。

誠然，在一個複雜的同盟關係中，財經問題從來不僅是一個簡單的金錢關係而已，而必然具有深遠的政治含義。1942年美國給中國第一筆借款，數目極小，目的在警告日本，因此政治外交的含義遠遠高於幫助中國對日本的戰鬥。國務卿特別顧問、前遠東司司長項貝克就一直相信，美國給與中國借款和信貸，其性質就是給中國不時打一個強心針，讓中國人民知道美國對他們的信心，並希望他們可以借此增加對自己

230 For Morgenthau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his reasons for rejection, see: Tuchman, p. 527. For FDR's message to CKS, January 5, 1944, see: Dept. of State, Decimal File, China, 893.51/7727A.

的信心，幫助領袖鞏固政府的地位、鞏固幣制和提高士氣，然後間接改善中國戰區的經濟、政治和心理的狀態[231]。項貝克因此告訴艾奇遜(Dean Acheson)，美國應該關注的是借款的政治意義，而不是它的經濟意義。但是財政部反對借款的理由主要是基於經濟考慮。軍部對此本應置身事外，因爲這不是軍部的專業領域，但是也極力反對借款。理由是想乘機警告中國，若不順從美國此時的戰略布局，就必須承擔痛苦後果。事實上，軍部這種高姿態的介入反而蓋過了財政部的立場。

蔣介石也立即看出羅斯福是在施展美國的威力，懲罰他不接受史迪威和蒙巴頓的緬甸戰爭新方案[232]。因此他決定展開還擊。1月14日，蔣介石向美國政府發出通知指出，既然美國不預備向中國提供借款，那麼中國要求美國支付它駐華人員和設施的一切費用，理由是這些費用已經造成中國財政上的巨大困難[233]。事實上這些費用數字龐大，對中國財政造成重大負擔，也讓一般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受到相當影響。因爲在落後的中國農村市場上，品質最好的消費品都優先供應美國軍人。蔣介石把話說得很清楚，萬一美國政府不願接受此項安排，那麼中國仍然預備擔負這些費用。但是萬一中國無法承擔時，美國人便只好聽其自然了[234]。換句話說，中國提出兩種方法解決其經濟困境；一是美國向中國提供借款，另一是美國支付自己在中國的一切費用，但是計算方式以官定的兌換率爲準[235]。

不難理解的是，美國政府也想使手中美金的價值增加到最大限度，因此它希望能夠用黑市價格兌換法幣。然而中國政府指出，日本對華經濟侵略策略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正是操縱黑市、顛覆法幣。美國既然是盟邦，如果要求以黑市價格兌換法幣，則其破壞中國經濟的殺傷力實與敵人無異。中國政府更進一步指出，美國人也應該擔負法幣貶值的部分責任，原因是美國人在中國，向來以不正常的高價搜購中國市場最上品的貨物供其生活所需。如果他們還要法幣再度貶值，實在有違盟邦情義。應該順便提出的是，中國政府回應美國的語氣完全由蔣介石親自定調，而蔣介石在致羅斯福的電文中，則有意採取強硬語氣，並囑咐孔祥熙以同樣語氣回應蒙巴頓的信件[236]。

就這樣，中美雙邊關係的惡化愈演愈烈。有趣的是，蔣介石的回應在美國政府不

231 Memo from Hornbeck to Dean Acheson, January 19,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232 蔣介石日記，1944年1月11日。

233 孔祥熙的估算數字，見：《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5月27日。

234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1月14日。

235 蔣介石日記，1944年1月12、15-28日。

236 蔣介石日記，1944年1月12、15-28日。

同部門引起不同反響。財政部和軍部的某些官員把蔣介石的言行視爲是有意威脅美國，但是國務院的某些官員則把它們看成只是一種姿態，只是中美關係中的偶發事件而已。事實上項貝克更進一步認爲，蔣介石的確有一股怨氣需要發洩，因爲他感到中國沒有被同盟國當作一個真正的盟友對待。因此他認爲，縱使中國的態度有可議之處，美國政府還是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處理中美兩國關係[237]。項貝克一方面了解事態的嚴重性，但同時也認爲解決方法其實並不複雜。那就是美國一方面應該申明有意願履行所有以前作過的承諾，另一方面表示願意和蔣介石共同探索一切能夠避免中美關係破裂的方案[238]。

就羅斯福而言，當他面對自己政府內部的分歧時，就會召集跨部會會議來協調它們之間的不同意見，並且向他提出一個集體性的建議。這個會議在1月19日舉行，參加者包括財政部、軍部和國務院代表。會議一開始，財政部和軍部代表就表示強烈反對國務院所擬的文件，因爲這個文件主張，美國應該考慮向中國提供借款和派遣代表團赴華(後者其實在羅斯福1月5日致蔣介石的電文中已經提過)[239]。有意思的是，財政部只是提出財政專業性的理由拒絕向中國借款，但是軍部反對借款的立場更爲堅定。國務院的代表並不認爲財政部和軍部代表的說詞有說服力，但是面對這兩個聯邦政府大部的強烈反對，孤掌難鳴，最後只好讓步。換言之，美國政府最後決定放棄國務院語氣緩和的文稿，而改採軍部和財政部提出的文稿、斷然拒絕蔣介石借款要求[240]。

項貝克對這個結局大感憂慮，因此立即再次向國務卿提出警告，借款一事牽涉的範圍，大大超過軍部和財政部目前所關心者，因爲它們不但會影響美國想贏得戰爭的政治和經濟策略，而且會影響到美國和中國在戰後的長期關係。依照項貝克的觀點，美國如果只是爲了意見不同或是態度這類枝節問題，而冒險和中國決裂，則不智已極[241]。國務院最後向美國總統提出說帖，主張美國不應該拒絕和蔣介石進行談判，更不應該冒著把中國和美國的作戰分割開來的危險，而應該就借款問題和蔣介石

237 Memo by Hornbe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8,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238 Memo by Hornbeck, January 18,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The memo was probably s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39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ubject: Request by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for a loan, dated January 20,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240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0, 1944, regarding "Request by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for a loan",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241 Hornbeck mem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Acheson, January 20,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繼續進行磋商才對[242]。

但是羅斯福最終還是接納了軍部和財政部共同擬定的電文，並於1月20日發給重慶。中美關係日後的發展證明項貝克的警告富於先見之明。蔣介石把美國的回電看成是它毀棄自己的諾言，而且還故意甩了中國一個耳光。這使得1944年整年蔣介石對美國的反感愈來愈深。設若當時借款問題能夠處理得圓滑些，可能情形就會大不一樣。其實中國過去的記錄已經一再顯示，中國不會真正把借款用完，美國也不需要實實在在拿出10億美元。但是如果美國政府同意向中國貸款，則蔣介石的態度肯定會趨於緩和。無論如何，拒絕借款造成了裂痕，很快使雙方關閉了互讓之門，包括稍後對指揮權轉移的談判(見第10、11章)。

## 二、後續的攻擊行爲

在兩國因借款問題而引爆的衝突中，羅斯福繼續就緬甸戰爭向蔣介石施壓。1月15日(1944年)羅斯福致蔣介石電，爲緬甸戰爭的必要性提出有趣的新邏輯。他重申應盡早打通經緬甸北部通往中國的通道。但也承認正在進展中的局部緬甸戰爭，其實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解決方案」，其言下之意似乎是承認全面戰爭才是一個完善的戰爭計畫。更有趣的是，他還企圖以樂觀而興奮的口吻去形容英美(包括中國X軍)軍隊在緬甸北部獲得的進展：沿著列多(Ledo)一線作戰的部隊正向敵人進攻，因此他主張同盟國(中國)應集中力量繼續推進，使公路修建計畫得以早日實現。但是羅斯福馬上又給蔣介石一個警告，假如中國拒絕將Y部隊投入蒙巴頓作戰計畫的話，那麼美國預備減少對中國的物資援助，並減少在印度爲中國所儲存的物資[243]。

從蔣介石的觀點來看，羅斯福的邏輯根本難以自圓其說。因爲蔣介石和羅斯福兩人都知道，中國已經再三通知美國政府，如果英國不履行在緬南作戰承諾的話，那麼中國最多願意提供的兵力就只是蘭伽的X部隊而已。換言之，蒙巴頓從來就不應該把在雲南的Y部隊列入他的作戰計畫之內，除非他自己的政府履行原來承諾。蔣介石的立場既簡單又清楚：東南亞戰區和中國戰區是兩個性質和等級大不相同的戰區。前者隸屬於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管轄之下，而後者是獨立自主戰區，從來不受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節制。因此不論是東南亞戰區的司令官或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沒有

242 Memo to the President, dated January 20, 1944, most likely writte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r possibly by Hornbeck. The mark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says "PA/H:SKH:FLB",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53. Attached to this memo was a draft of a telegram for FDR's consideration as a reply to CKS.

243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1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294。

得到中國戰區明確授權之前，都沒有權力把中國戰區的部隊放進它們的作戰計畫中去。史迪威所以能夠指揮中國軍隊，並不因爲他是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而是因爲他是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如果只是前者，他根本無權對中國軍隊說三道四，更不必說擁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了。

## 三、事關美國自身的利益

在這段歷史上有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必須提出，那就是：爲什麼美國人在1944年春季，在歷盡中國人和英國人一再給了他們那麼多煩惱之後，還會對緬甸戰爭表現得如此鍥而不捨呢？本章前文曾經對史迪威個人求戰的動機作過交代，但是是否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史迪威個人的動機和美國軍方的態度是不謀而合，相輔相成？抑是互相矛盾？

對這個問題，西方史學界早已提供一個標準解答，那就是：美國領袖比中國領袖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國國家利益之所在，而且也更努力想幫助中國，乃致不惜用盡一切手段(包括循循善誘和威迫利誘)，希圖能夠克服蔣介石個人心智上的冥頑不靈，和心態上的苟且偷安、存心破壞或是恐懼戰爭心理。如果研究者只是研讀史迪威遺留下來的文檔和接受他單方面的說詞(最好的例子是以寫史迪威傳記知名的塔克曼女士Barbara W. Tuchman)，則他們一定相信美國人的確是盡了最大努力，幫助中國建立強大的軍隊，修築更多的飛機場，俾便中國有力量向日本進行反攻。至於英國人，則愈是採取不合作態度，就愈讓美國人幫助中國的苦心和成績顯得難能可貴。一旦這個觀點被接受之後，就更容易認爲，史迪威指責中國領袖對美國的友誼不夠感恩是理由充分了，也更能夠相信美國政府強迫中國參加緬甸戰爭的動機，純粹是爲了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而這些利益卻是中國領袖所忽視的。在試圖解釋中國領袖爲什麼忽略中國利益時，不少學者依然採納史迪威本人的分析，最終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缺失上，或出於麻木不仁，或出於腐敗無能，或出於處心積慮。

這些指責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道理，特別中國政府當時軟弱無能的事實根據都不容駁斥，而在這方面，蔣介石和他的政治團隊自有其無法推卸的責任。特別令人納悶的是，蔣介石曾經多次沉痛感歎(見本書前文)，中國必須首先增進自己內部的國力，然後才能在外贏得盟邦的尊重。然而他雖然看清楚這個簡單的道理，卻始終拿不出作爲，更提不出成果。因此中國在抗戰時期內政品質崩壞的原因，仍然是值得史學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特別是當年政治人物早已謝世，黨派仇恨急速淡化，而重要史料又相繼公開，更是給學術界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環境，可以用客觀持平的態度重新檢討這

一段史實，提出上乘的作品。

但是只著眼於來自中國方面的原因，並不能解釋美國方面所作出的決定。比如說，這些說詞都無法真正解釋，爲什麼美國政府對於援助中國的自我宣傳工作，總是遠遠超過它對中國的實質幫助？再說，假如中國領袖既不理智也不認真追求自助，或者他們甚至還採用各種卑劣手段，去破壞美國人的慷慨仗義和糟蹋美國人的一番苦心的話，那麼美國人爲什麼不乾脆謀求其他可以擊敗日本的辦法？特別是針對緬甸作戰而言，既然中國政府已經明白表示願意順從美國建議，將(全面性的)緬甸戰爭延期，而此時又正值美國軍方已經大幅減低它對中國戰區戰略價值的估計，爲什麼美國的總統、軍部和史迪威將軍，還會如此鍥而不捨地想把中國拉進一場，明明是爲了中國著想，而中國反而毫不領情的戰役中去？這一連串的問題必須有一個更合理的解釋。但是史學界歷來並沒有去探索這些問題，而是以其標準答案爲滿足。

針對這類問題，邱吉爾曾經試圖提出一個宏觀性的解釋。如所周知，邱吉爾從來就不支持緬甸戰爭。他在戰後回憶1944年2月間的心理狀態和戰略估計時，曾坦白寫道，他極端反對在緬甸北部進行大規模作戰。在他看來，在緬甸和日本軍隊打仗極爲不智，更何況從緬甸建造一條公路進入中國，不但費用龐大而且曠日持久。等到公路工程完畢，說不定還來不及使用它就失去其戰略價值。退一步說，即使公路能夠及時完成並向中國軍隊提供補給，這些軍隊的作戰能力也未必有所增進。邱吉爾還認爲，美國在中國增建空軍基地的需要也會與日俱減，因爲同盟國在太平洋推進後，可以獲得更接近日本本土的空軍攻擊基地。這些考慮都讓邱吉爾堅信，在緬甸戰爭中投入人力和物力將是得不償失。但是邱吉爾感嘆，他始終無法讓美國人改變心意[244]。邱吉爾回憶過去時，不免對美國執著要在緬甸發動戰爭的動機感到好奇，他最後提出的解釋是，美國人偏愛「大主意」(big idea)，主意愈大，他們就愈有興趣和決心使之成爲事實[245]。

邱吉爾和美國人有歧見，還能用讚美的話語來解讀美國人的行爲動機，他所展示的不論是「雅量」或是外交手腕，都可謂難能可貴。但是他的分析還是充滿漏洞，是一個政治家的語言，而不是一個歷史學者的語言。首先是，史迪威既不是緬甸戰爭計畫(大主意)的創始人，也不是該計畫自始至終最執著的推動者。史迪威一方面誠心誠意相信緬甸戰爭是唯一可以幫助中國建立強大軍事力量打敗日本的方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強烈的決心要洗刷自己被日本人打敗的個人污點。1942年7月以後，許多美國領袖其實

244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560-561.

245 *Ibid.*

已經在緬甸戰爭問題前搖擺、退縮，甚或打算放棄。因此他們的興趣和決心是斷斷續續，時左忽右，而不是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更何況他們並沒有堅持在緬甸全面作戰的計畫，而是把戰爭的規模愈變愈小。邱吉爾強調美國人偏愛「大主意」，而且愈大愈能激起其堅持到底的決心，但就緬甸戰爭而言可說是言過其實。客觀地說，比起歐洲「第二戰場」這一個「大主意」，緬甸戰爭可謂小巫見大巫，難以稱之爲「大主意」。說它是「搖擺不定」，「一波三折」，或許更爲貼切。

邱吉爾分析更大的缺點可能是文不對題。因爲具體而言，要等到1943年春夏之交，美國的「主意」才開始成型，而且使美國逐漸變成它最熱心的支持者。而這個改變所以產生，與其說是美國想幫助中國的企圖心突然變得旺盛了，還不如說是因爲它想大幅降低日本在太平洋島嶼上的防禦能力。雖然這個想法早在1943年春天就已經出現端倪，但是美國的軍事計畫者一直要等到同年夏季才真正了解，緬甸戰爭對於當前美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它對於中國長遠利益的重要性。事實上，到了1943年8月舉行的魁北克會議上，他們認爲緬甸戰爭對美國的利益是如此重要，以致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威脅英國說，假如英國拒絕參加緬甸戰爭，那麼美國準備延遲歐洲的反攻計畫。

然而即使在1943年下半年，美國依然保持耐心，指望英國最終能夠遵守對(全面性)緬甸戰爭所作的承諾。然而當這個指望被德黑蘭會議打破之後，美國的耐心也被消磨殆盡。在此之前，美國只是努力改變英國的態度，設法促成中英兩國軍隊在緬甸的攜手作戰。但是在德黑蘭會議之後，美國的態度突然改變，不管英國是否參戰或是以何種方式參戰，美國下定決心一定要使戰爭在緬甸展開。在這個新局勢下，中國態度不免變成美國最大的頭痛問題。這個情況能幫助我們了解，爲什麼史迪威可以在1943年11月底的開羅會議上，還全力主張進行全面性的緬甸戰爭，甚至遊說美國政府出兵參加作戰，而到了12月15日就出爾反爾，轉而強迫蔣介石接受一個大打折扣的局部戰爭，甚至還對蔣介石作出恐嚇。唯一能夠解釋美國最高領袖(羅斯福、馬歇爾、史迪威)，所以在短短期間作出如此前後矛盾舉動的原因，就是緬甸戰爭牽涉所及，不再是中國利益而是美國利益。換言之，緬甸戰爭此時對美國的重要性，遠遠超過它對中國的重要性，因此無論規模大小，都必須開打。而中國戰略價值的降低與美國對緬甸戰爭的決定，兩者之間並無決定性關係。在這層意義上，美國軍方的考量肯定超越史迪威個人的動機，但是兩者卻可以不謀而合。

但是在中國人眼目中，德黑蘭會議後的發展顯示英美共同圖謀，不顧中國的意願，硬逼中國陷入一個局部性的緬甸戰爭陷阱中，去爲美國人作嫁。同盟國自1942年7月開始，對緬甸戰爭經過長時期精心籌劃和耐心的外交談判，目的就是讓戰爭能夠

在一切條件都成熟以後才發動。讓中國政府最意想不到的是，在1944年初它突然面臨一個既成事實，原來一個局部性的緬甸戰爭，已經在史迪威和蒙巴頓的主導之下，在緬北地區悄悄開打了。換言之，前此的一切籌劃和談判都等於是白費力氣。用不著說，中國政府對這個結局自然大爲憤怒。

以上這一連串發展，不需太多時間就把同盟國在開羅會議時營造出來的友好氣氛摧毀殆盡。中美關係急速轉變成赤裸裸的權力較量，雙方拳來腳往，互不相讓。美國政府想把中國在雲南的軍隊拉進緬北戰場的急迫表現，只能加深蔣介石的猜疑，並使他相信中國最好的對策是保障自身主權的獨立，拒絕參加不合理的軍事冒險行動，即使得罪美國也在所不惜。因爲只有這麼做，才能使中國不需乞求外國施捨。雖然蔣介石依然堅稱中國將繼續抗日，但是在私底下，他也確實擔心中國或許真有崩潰的可能。

# 第九章
# 第二次緬甸戰爭(1943年冬-1944年秋)及其影響

## 壹、戰爭終於展開

1943年底，緬甸戰爭雙方可以投入的兵力頗爲懸殊。史迪威指揮的中國X部隊共有三個師(第22、30及38師)，每師一萬二千士兵。英軍號稱有六個師，但實際戰鬥力頗爲可疑。此外，同盟國還有兩支特種部隊：一支是在英國軍官溫格提(Orde C. Wingate)指揮下的印度步兵第三師(Third Indian Infantry Division, 俗稱為Chindits)，先後在編制上建立了三個旅，但是裝備、訓練和戰鬥力參差不齊，每次能夠投入戰鬥的最多只有一、兩千人。另一支則是美國軍官梅瑞爾(Frank D. Merrill)統領的特種部隊(俗稱梅瑞爾的打劫者Merrill's Marauders, 也稱Unit Galahad)，有三個營的編制，也不過兩、三千人。兩者均屬於長距離滲透敵後作戰的特殊部隊(Long-range Penetration Groups)，通常以空降方式滲入敵後，武裝輕便，以靈活游擊方式騷擾敵人後方。它們的任務都是在緬甸中北部地區戰鬥。日本方面起初有五個師團，大多能征善戰。其中尤其著名的是第18師團，曾在新加坡戰役和第一次緬甸戰爭中戰功顯赫，是日本王牌部隊之一。不久之後，日本又向緬甸增援了三個師團，因此一共是八個師團[1]。

同一時間，中國在雲南省境內集結了11到12個陸軍師待命。根據蔣介石的決定，它們只有在同盟國履行義務後才會開往緬甸作戰[2]。

---

1 Tuchman, pp. 532-533.

2 蔣介石日記，1944年1月1日。

## 一、同盟國的作戰目標

東南亞戰區在緬北地區發動有限戰爭，宣稱目標是要從列多(Ledo)向東修築一條公路，延伸進入雲南省境，打破日本封鎖。東南亞戰區定下的任務是在1944年雨季來臨前，攻下日本在緬甸境內最北的軍事要地和空軍基地——密支那(Myitkyna)。一旦攻下密支那，美國就會獲得一個空運基地，大幅增加對中國的空中運輸量，而且讓飛行路線更加安全。爲了達成這個目的，蒙巴頓的英國部隊將從印普哈(Imphal)向東發動攻勢，其他英國部隊也會在阿拉堪(Arakan)沿海向阿恰布(Akyab)發動攻勢。簡言之，同盟國部隊的意圖，是從三方面(即從印緬邊境的北、中、南部)分別向日軍施壓，強迫它們向東退卻[3]。從大體來看，蒙巴頓負責的英印軍隊在印緬邊境中部和南部的攻擊只是助攻性質，主攻部分是由史迪威帶領的中國X部隊負責，目標是占領緬甸北部。

史迪威的指望是在5月雨季來臨前先攻下日軍幾個據點。一旦成功，就不管天氣如何繼續追擊日軍[4]。雖然史迪威手中只有少量部隊，他仍然計畫向敵人發動正面主攻，同時向敵人兩側出擊，以切斷敵人退路。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計畫，成功機率只能建立在日軍將領的無能和重大失誤之上，不幸日軍將領並非無能之輩。

即使在1944年1月，英國人依然不認同史迪威在緬北修築通道的想法，他們主張把作戰目標從密支那改爲孟拱(Mogaung)河谷，以便立即改善同盟國空中補給中國的運輸線。如第八章所說，邱吉爾本人也非常不願意在緬甸作戰，認爲這是捨本逐末的戰略。蒙巴頓則是想在1944-1945年之交，把同盟國預計用於緬甸的資源，轉投到馬來亞和蘇門答臘，發動新攻勢。因爲他估計屆時同盟國可以把歐洲戰場的登陸艇調來支援[5]。

## 二、日本的作戰計畫

其實，整個1943年，日軍就在心理上準備迎接盟國對緬甸的攻擊，因此從下半年開始就積極著手部署防務，以粉碎同盟國的企圖。1943年底，它的防禦計畫終於成熟。日軍作戰首要任務是切斷緬北至中國通道，次要任務才是防止緬甸南部不爲敵人占

---

3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561-563.

4 Frank Dorn, "Historical Report of Y-Force Operations Staff", p. 3,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5 蒙巴頓在1944年1月8日擬成東南亞戰區的作戰計畫，並立即派遣魏德邁將軍攜之赴華盛頓和倫敦請求上級批准。但是卻因為受到史迪威暗中破壞，在2月間被羅斯福和美國軍方否決。詳情請見本章頁428-429。另見：Tuchman, pp. 546-550.

領。但是以日軍在緬甸的兵力，無法控制如此遼闊的土地，因此決定主動攻擊印普哈，迅速侵入阿薩密省的阿拉干山脈，使英軍無法顧及其他方面，這是印普哈作戰之目的。因此，一旦東南亞戰區軍隊在1943年底開始行動時，日軍馬上採取反擊行動。在緬甸最北邊胡康方面，日軍第18師團阻擋了史迪威指揮的孫立人新一軍的攻勢。並同時在1944年1月開始向阿恰布地區進攻(第55師團)，將英印軍牽制在阿恰布，以策應日軍的印普哈作戰計畫。2月11日印普哈攻擊開始。而湊巧的是幾天之後美軍也在太平洋發動攻擊土魯克島、布朗島、瑪麗安那群島(塞班島)等地。1944年3月，日軍在阿恰布方面與英軍展開激戰。3月8-9日，同盟國溫蓋特空降部隊在緬北日軍防地內空降，使日軍受到干擾，引起日本空軍強力搜索和攻擊溫蓋特部隊，並再度自爪哇島增援緬甸(第2、53師團部分兵力)。此時日軍33師團在同昌附近包圍英軍一萬人，接近消滅，但是後來被救出逃回印度。3月15日，日軍第15軍第15、31師團向印普哈進行攻擊，進行順利。28日第15師團到達可喜瑪通往印普哈的公路上，以切斷該公路的交通[6]。日本大本營的計畫是希望在雨季來臨之前解決印普哈作戰，雨季後進攻阿薩密省的列多，從而直接威脅印度本土的安全[7]。

由於同盟國陣營內部意見分歧，緬甸局勢很快就陷入極度危險的境地。1944年2月初，日軍在阿拉堪地區開始反攻，企圖攻占印度南部的吉大港(Chittagong)。不過幾天，英軍便發現它們的退路已經被切斷，必須依賴空投補給才能生存。英軍剛穩住南方陣線，日軍又在3月8日改向中部地區發動攻勢，企圖切斷史迪威部隊的補給線。到了3月底，日軍從三方面向印普哈施加強大壓力。在此後的一個多月裡，英軍六萬人以及他們全部的現代化裝備，逐漸被逼到印普哈附近一個狹小範圍內，動彈不得[8]。面臨被殲滅的危險。

這些日軍攻勢如果不及時予以制止的話，不但很快就會威脅史迪威部隊後方的補給線，並且可能直接摧毀印度境內的駝峰運輸基地，甚至整個印度東部的安全。這樣當然也就會使緬北作戰計畫全盤落空。因爲一旦日軍切斷阿薩姆(Assam)到孟加拉之間的鐵路線，史迪威在緬北的部隊就會完全陷於孤立，並且遭受如同1942年一樣的失敗。到了3月中旬，局勢已經糟糕到連史迪威都擔心他的計畫將會全部失敗[9]。

---

6 陸海軍年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43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大事記。《大本營陸軍部》(8)，《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6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384-394。

7 同上，頁485。

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564-568.

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March 16-8, 1944, pp. 226-227.

東南亞戰區作戰計畫的膽大妄為，不僅使同盟國在緬甸北部地區可能全盤皆輸，也立即危害到中國本身。英軍因為失去補給線，所以不得不依賴空投方式。而空投需要徵用大量運輸機。因此，3-5月之間，蒙巴頓取得邱吉爾支持後，開始從駝峰工作抽取大量運輸機和補給品，來挽救他和史迪威兩人聯手造成的失誤[10]。這當然讓中國無法接受。

## 三、盟邦要求中國伸出援手

蒙巴頓和史迪威此時能夠解脫自己一手造成的險境的唯一途徑，就是要求蔣介石趕緊伸出援手[11]。就在此戰局急轉直下之際，羅斯福在3月24日致函蔣介石，堅持中國必須派遣雲南省的Y部隊兼程前往緬北投入戰鬥。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使用租借法案物資的權限也作出更苛刻的限制，以逼使中國就範。英國則配合美國，也向中國提出出兵要求[12]。在這個情況下，史迪威在3月28日匆匆趕往重慶求援，獲得蔣介石允諾，空運一個師（第50師）增援緬甸前線[13]。但是史迪威需要更大規模的援助才能脫險。總之，史迪威和蒙巴頓共同造成的危機，很快就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向蔣介石施壓，必須從雲南派兵全力參加緬甸北部戰爭。

這個發展正是蔣介石早已警告過史迪威的，而後者卻始終置若罔聞。還記得第一次緬甸戰爭時，日軍從泰國方面侵入並在緬南急速建立基地，導致中國和英國軍隊在緬甸北部和中部的防線相繼瓦解。同樣的，現在日軍三個師團在離開緬北戰場約300哩的南部，正向印普哈方向展開攻擊，也立即威脅到同盟國在緬北的軍事行動。這正是蔣介石為什麼屢次堅持，同盟國軍隊必須同時在緬北和緬南地區進行作戰的道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日軍無法享有內線作戰的優勢，並迫使他們遭受兩面甚至三面的同時攻擊。不幸的是，他最擔心的事現在終於發生[14]。

羅斯福受到史迪威戰報的影響，決定改變他和蔣介石打交道的基調。他原本對於X部隊的戰果大事吹噓，目的似乎是想激發蔣介石的遐想，引誘他趕緊出兵去分一杯羹，以免眼睜睜地看到勝利果實全部落入英美之手。但是日軍侵入印度之後，他收到的報告卻是緬北戰爭已面臨重大危機，所以只能改口要求蔣介石（3月22日）即刻把Y

10 蒙巴頓一度曾經要求從駝峰運輸隊中抽調100架飛機去應付他面臨的危機。見：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567-568.

11 蔣介石日記，1944年3月19-20日。

12 蔣介石日記，1944年3月24-26日。

1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ies of March 27-30, 1944, p. 228.

14 Tuchman, p. 551.

部隊投入緬北戰場[15]。雖然羅斯福這次電報所用的語氣比以往緩和，而且也依然誇獎中國X部隊的作戰成績，繼續引導蔣介石產生勝利已經在望的僥倖心理，但是他還是刻意隱瞞英美將領陷於困境，而迫切需要Y部隊解救的真相。

不難想像，蔣介石當然不是傻瓜，也看清楚了實況，因此他的回電(3月27日)重述他在開羅會議所申述的立場，只要英軍向緬南發動兩棲攻擊，中國軍隊馬上就向緬甸展開全面進攻。然而他爲了對羅斯福的要求作出正面回應，所以還是決定空運一部分在雲南的軍隊赴列多作戰[16]。其實，蔣介石此時心中已暗自決定，只要X部隊可以攻克密支那並向東推進，他就命令中國的Y部隊全數開往緬甸前線[17]。在此後幾天中，蔣介石已著手準備這項行動[18]。

像以往一樣，羅斯福對蔣介石有限讓步的反應前後反覆，令人目不暇接。4月2日，他歡迎蔣介石的回電，稱讚其決定對緬甸情勢大有幫助[19]。48個小時之內他又改變主意，批評中國讓步程度不足，因此採取嚴厲態度對付中國。羅斯福所以改變主意，其原因並不難了解。因爲此時緬甸西部的印緬邊境和沿海地區正進行激烈戰鬥，日軍對緬北史迪威軍隊的壓迫也正加強，史迪威的處境日趨險惡，亟需救援。羅斯福在4月4日致蔣介石電報中，不假辭色警告蔣介石，在雲南的中國部隊都接受美國武器，故必須盡快採取行動。不然的話，美國就沒有充足理由繼續向中國提供武器和訓練協助了。具體地說，羅斯福要中國軍隊能夠全面參與緬甸戰爭[20]。或許正和往常一樣，羅斯福這種反覆態度可以有一種合理的解釋，那就是：4月2日的電報可能是出自羅斯福本人手筆，表達他對蔣介石讓步的滿意，並沒有在事先和軍部商量。而當他收到史迪威來自戰場的不滿反應之後，又只好改變口氣。

羅斯福4月4日電報的粗魯語氣激怒了蔣介石，後者的直覺反應是電文必定是出自軍部擬稿，當即囑蔣夫人召見赫恩(Hearn)將軍(史迪威在重慶的副手，中緬印戰區美軍參謀長)，警告他中國無法接受這樣的電報。她同時再發了一封電報給史迪威，表達不滿[21]。蔣夫人嚴肅地告訴史迪威，請傳話給那個替羅斯福總統草擬電報稿的人，

15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3月22日。《戰時外交》(三)，頁295-296。
16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3月27日。《戰時外交》(三)，頁297-298。
17　蔣介石日記，1944年3月28日。
18　同上，1944年3月31日。
19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4月2日。《戰時外交》(三)，頁298。
20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4月4日。《戰時外交》(三)，頁299。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4日。
21　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6日。蔣介石草擬給羅斯福信件的大綱，1944年4月4日，見：《革命文獻拓影》，第18冊，頁123。

這種電稿將嚴重破壞中美關係[22]。顯然，蔣介石夫婦兩人都相信，4月4日電報的擬稿人必定來自軍部，而非白宮。

羅斯福這次的電文似乎很方便地就忘記蔣介石早就特別警告過他，如果英美兩國不履行它們對海空作戰的承諾，情況就可能會變得不可收拾。但是同盟國完全不以蔣介石的警告爲意，他們原本的如意算盤或許是，只要運用中國的X部隊，他們的作戰計畫就可順利完成。一旦這個夢想落空，他們才又趕緊轉過身來，逼迫蔣介石運送更多軍隊到緬甸前線解救危機。當同盟國無法抵擋日軍銳利攻勢時，羅斯福就被迫歪曲他的整個邏輯思維，無視蔣介石再三聲明的立場，反過來責備蔣介石不肯彈性配合同盟國行動。

在這種環境下最寬厚的解釋是，當同盟國作戰計畫遭到日軍意想不到的無情打擊時，他們只好向中國求助，但是它們採取的姿態卻是逼迫和高壓，而不是協商。英美政府此時迫在眉睫的考慮，不僅是史迪威手下的中國軍隊是否有能力單獨向密支那進攻，也是英國軍隊是否有能力阻止日軍向緬北地區增援和大規模進犯印度。一個完整的作戰計畫必須把各方面可能發生的狀況都考慮周全，而東南亞戰區將領卻以爲只要靠一個X部隊就可以獲得輝煌戰果。這種過分樂觀很快就被現實所粉碎。

另外一個更有說服力但是也更令人寒心的解釋是，同盟國(至少史迪威)事先早已清楚地知道，他們在緬北準備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取得預期的戰果。但是他們依然不顧一切勇往直前，原因就是他們背後隱藏著更大的目的，那就是借此製造一個嚴重危機，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把Y部隊送進戰場，以挽救瀕臨滅亡命運的友軍。換言之，同盟國和史迪威在屢次試圖說服蔣介石參加一場小規模緬北戰爭的努力失敗之後，唯一實現作戰的計謀，就是先把小部分中國軍隊投入戰鬥，使他們陷於潰敗邊緣，然後脅迫蔣介石出兵解救。從這個意義而言，蔣介石原先給史迪威的空白支票，的確讓史迪威派上用場。因爲它不僅讓史迪威使用了一次(把X部隊投入戰爭)，而且是讓他使用了兩次(再拉進Y部隊)。

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還要等到美國政府把史迪威個人檔案全部解密之後，或許才能得知。但是史迪威向來是一個以自己專業素養自豪的軍人，怎麼會以爲僅僅用手下三個中國師的兵力，就可以把實力超過他兩倍的日本久戰之師打垮呢？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反過來說，美國政府用盡了外交手段，都無法說服蔣介石參加緬甸北部的戰爭，但是史迪威設計把手下的兵力陷於潰敗邊緣時，卻可以讓蔣介石別無選擇，必須出兵營救。果真如此的話，那就真是美國軍方耍弄盟邦的一記高招。

22 蔣夫人致史迪威電，1944年4月7日，見：《革命文獻拓影》，第18冊，頁124。

也或許是對中國古代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最扭曲邪惡的一種運用。

## 四、史迪威對緬甸戰爭的個人動機

如果說史迪威有其強烈個人動機，想發動第二次緬甸戰爭，這應該不難了解。第一次緬甸戰爭是史迪威整個軍人生涯中，首次統率一支龐大的部隊(雖然只是中國軍隊)，如願以償地進入戰鬥，但旋即吃了一個大敗仗，僅以身免。他的自尊心和軍人名望的考慮，都不容許他忍受這個人生污點。

因此從1942年中期以來，史迪威一直有一個熾熱願望，那就是不計一切代價，務必把這個污點從他的記錄中洗刷乾淨。顯然，美國政府中也有官員看出這個道理。比如說，根據國務院的項貝克的觀察，第一次緬甸戰爭的慘敗，在史迪威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痕和一個熱切心願，那就是要在緬甸再和日軍一較高下[23]。

史迪威這種心理狀態，也能幫助我們從側面了解他對中國職務的態度。儘管史迪威在跟中國人打交道過程中遭遇各種困難，他心中也十分明白中國人恨不得趕他走路，但是他卻從來不曾要求調離中國戰區。即使在開羅會議時馬歇爾主動提議調往其他戰區，史迪威也不肯聽從老上司的建議。以他和馬歇爾之間親密的友誼來說，如果他接受馬歇爾的建議的話，一定可以得到一個體面的新位置。但是如果這樣做的話，就必須永遠背負著一個心理包袱，那就是：他是在緬甸被日本人打敗的美國將軍。以他在日記中使用過的強烈種族歧視字眼去稱呼日本人，他肯定無法忍受這個羞辱。

因此，一旦他警覺到辛辛苦苦籌劃出來的緬甸戰爭，終將被英國人破壞時，他立刻看出來唯一能夠挽救作戰計畫的策略，就是強迫中國作出更大的貢獻。這就說明史迪威爲什麼在開羅會議結束後，短短幾天內立場徹底改變。他最初還是盡職地試圖說服蔣介石，務必接受羅斯福對戰爭延期的要求。但是等他一旦把思路理清楚之後便改變主意，轉而催促軍部領袖，即便英國人拒絕充分參與，也一定要發動戰爭，並且把中國軍隊拉進戰場。依史迪威的個性，如果把緬甸戰爭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他本人對緬甸戰爭的執著混爲一談，也不奇怪。他很容易就說服自己，應該運用美國人手中一切的籌碼，來迫使中國聽話，因爲這才是真正在幫助中國，其實真正是在幫助他自己。

## 五、美國的官方說詞

史迪威的個人因素，儘管有助於增進我們對第二次緬甸戰爭的了解，但是他不可

23 Memo by Hornbeck, May 5,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能單槍匹馬改變美國政策。因此我們還需要超越美國政府的官方辭令，設法更深入地去了解美國的深層動機。

史迪威對於自己行爲的辯白是，他只是執行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12月6日所作的決定而已。正如史迪威所堅持的，在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指揮下，他的頂頭上司是蒙巴頓，因此他應該聽命於蒙巴頓。更何況蔣介石已經授權史迪威，自行決定如何運用中國在印度的部隊。羅斯福也是用同樣理由來衛護史迪威。依照羅斯福後來(1944年10月18日)爲了開脫史迪威的責任，而向蔣介石所提出的說詞，有關緬甸戰爭並非史迪威個人所能決定，而是由英美兩國軍事參謀人員擬出計畫後，由邱吉爾和羅斯福兩人共同批准，才付諸執行。因此，史迪威對於英美兩國只在緬北作戰而不在緬南作戰的決定，並不需要負任何責任。羅斯福又堅稱，他們的決定是經過嚴肅思考之後才作出的[24]。

但是從中國立場看來，這些說法卻是充滿漏洞。首先，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12月6日的文件中特別聲明，只有在取得蔣介石回應之後，才可以作出最後決定。而蔣介石在12月10日和17日也已先後表明他拒絕同意。羅斯福當時的態度顯然是尊重蔣介石的決定，而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事後卻不想這麼做。即便如此，無論是邱吉爾、羅斯福或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都沒有權力把他們的決定強加於中國。因爲中國戰區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戰區，既不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工作，也不受其指揮。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對中國軍隊沒有統御權，就像它對蘇聯紅軍沒有統御權一樣。

其二，東南亞戰區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指揮系統下的一員，當然必須遵守命令。但是史迪威的身分卻不一樣，因爲他既是蒙巴頓的部屬，也是蔣介石的部屬。他所以能夠統率中國軍隊，完全因爲他是中國戰區的成員，而不是因爲其他任何原因。因此，當史迪威面對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的指令時，他必須先選擇他到底是以何種身分來處理。如果他是以一個在東南亞戰區服務的美國軍官身分，則他手中沒有中國軍隊可供指揮。如果他是以在中國戰區服務的蔣介石盟軍參謀長身分，則他就可以被授權指揮中國軍隊，但是必須依照他最高統帥(蔣介石)的意志行事。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人想要使用中國軍隊，而又拿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和東南亞戰區作幌子，實質上則是赤裸裸的強詞奪理。

其三，史迪威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對東南亞戰區上司命令的忠實執行者，也是

24 Cable from FDR to CKS, October 18, 1944,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68-469. Also: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75, 471. 中文本見《戰時外交》(三)，頁688-689。

言不由衷。因爲他對待蒙巴頓等人也是陽奉陰違，當他不同意他們的命令時，他也會毫不遲疑地抗命或暗中破壞。在此可以舉一個相關的實例。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在開羅會議上曾提議在緬北從事戰鬥，以便修築一條陸上通道補給中國。然而英國人剛作出承諾不久便開始後悔，因此在1944年2月中旬，蒙巴頓派遣他的美籍副參謀長魏德邁，率領戰區的官方代表團遊說同盟國政府改變作戰計畫。依蒙巴頓的看法，美國要建築一條從緬北通到中國而又能雙向行車的公路計畫，在1946年6月之前不可能完成。因此他建議放棄此項計畫，改爲以加強空運方式增加運往中國的物資。他並且相信這種做法，既可以從緬北戰場上節省大量物資，又可以將之用於進攻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換言之，這種做法既可能建立到中國的(空中)運輸線，又可以協助預期中的美軍從中部太平洋地區向日本本土進攻。蒙巴頓想法已得到邱吉爾的支持，接下來就是要得到兩國政府的正式同意。這就是魏德邁代表團的使命。

但是史迪威還是只想在緬甸陸地上打仗。史迪威當然有權利持有自己不同的想法，而且也有權利在東南亞戰區的指揮體系內表達其反對意見。即使他無法改變蒙巴頓的看法，他也還可以在得到蒙巴頓允許之後，繼續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申訴。但是史迪威寧可背著蒙巴頓，偷偷摸摸地派遣自己的代表團去華盛頓進行遊說工作，企圖破壞魏德邁的任務。這種行徑大大地惹火了英國人，而且在幾個月後，增加了蒙巴頓必欲把史迪威從東南亞戰區剔除的決心(見第10章)[25]。其實，蒙巴頓本人此時對緬戰的態度非常模棱兩可。這一點在他1943年12月11日給史迪威的信件中表露無遺。一方面，他要求史迪威向蔣介石傳遞一個假消息，那就是英國海軍在孟加拉海域將有所作爲。但事實上只不過是虛晃一招(只是 "use the Fleet for a sweep or demonstration by itself.")，而且其動用的兵力只有原先計畫的十分之一而已。另一方面，他也不指望中國對陸戰出大力氣。他讓史迪威安心，假如後者無法說服中國派遣雲南遠征軍入緬作戰，但至少希望能夠爭取到讓蘭伽的軍隊參加戰鬥也就可以[26]。簡言之，東南亞戰區總司令既不想在孟加拉進行海戰，也不堅持中國遠征軍從雲南進入緬北從事陸戰。真正想要打仗的只是美國而已。

針對以上所列舉的理由，蔣介石心中當然完全清楚，第一、二兩項純屬狡辯。但是美方居然有模有樣地提出，顯然不把他的智力放在眼裡，這就符合了一句英文中的老話，「在傷害之後再加上侮辱」(to add insult to injury)。至於第三項，蔣介石當然對於東南亞戰區的內鬥情況並不熟悉，但是他自己對史迪威陽奉陰違和公然抗命的行

25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573-575.

26 Mountbatten letter to Stilwell, December 11, 1943. Xerox File 381, MFA.

爲，早已有過多次慘痛的親身經歷，所以任何美國官方的努力，要把史迪威裝扮成一位忠心耿耿服從上級命令的軍人，都屬於白費力氣。

更令人不解的是，爲什麼羅斯福對緬甸戰爭的態度，在經過多次猶疑不決後，會突然變得如此堅定強硬？作爲一位政治領袖，羅斯福已經顯示出他有耐心聆聽蔣介石反對開戰的理由。但是當他決定強迫蔣介石進行戰爭後，他就不再考慮蔣介石提出過的各種理由，而是一味堅持中國軍隊必須向緬甸開動，否則將會受到懲罰。他態度改變的原因何在？

對於羅斯福在短期內作出這麼前後矛盾的決策，合理的推測是，他在全球戰事的壓力下，實在無法細心關注緬甸戰爭事務，因此只好委託軍方用他的名義，替美國政府制訂外交政策[27]。這個案例再一次提醒我們，美國對華政策有其精神分裂症的跡象。就像1943年12月19-20日發生的事情一樣，羅斯福可以在一夜之間變臉，並且還表現得理直氣壯。究其原因，可能是美國以總統名義向蔣介石發出的電文，經常來自兩個不同的來源。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邏輯思考能力，和外交手段有著極大的不同。如果草擬人出自白宮(**或是羅斯福本人**)，則電文通常四平八穩，條理分明，而且合乎外交規格。如果出自軍部(**或是馬歇爾本人**)，則明顯表露出粗暴無禮，甚至強詞奪理。這就容易說明，爲什麼以羅斯福名義發給蔣介石的電文，能夠讓蔣介石無法適應，甚至怒火萬丈。因爲前一天電文的內容可以是文質彬彬和合情合理，而後一天的內容就變得張牙舞爪，盛氣凌人。不幸的是，在羅斯福總統萬務纏身的情況下，他又不得不依賴軍部的文書員去替他捉刀。

綜合以上所分析的各種因素，最合理的推測是，史迪威對於戰局充滿悲觀的報告，和他對中國軍隊參戰的強硬要求，都被馬歇爾採納，轉而又被後者放進軍部爲總統所擬的電稿之中，取得美國總統簽字後再寄給蔣介石。如果我們仔細對照馬歇爾向羅斯福提供的原稿，和羅斯福最後發送給蔣介石的定稿時，就會發現這種做法在戰時中美溝通過程中已經成爲慣例。在一般的情形下，也或許是當羅斯福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迅速地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回覆，但是當軍部在接到史迪威的報告後，又逕行替總統擬好了一封電報，而羅斯福在事務繁忙無法深究，或是無法拒絕軍部代勞的心情下，便貿然簽字發出，因此產生自我矛盾的現象。只有在少數例外情況下，羅斯福才會修改或是不採納馬歇爾爲他準備的電稿。如本書在幾個地方所述，這類情形在整個同盟關係中，一直是一個長期潛伏的危機，不時引發爆炸性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羅斯福在4月4日的電文中已經開始用詞粗暴，但是還沒有明白說出，假如中國拒

27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4月5、6、7日。

絕聽話，他將會懲罰中國。

## 六、美國壓力升級和中國入緬作戰

不久之後，中國政府得知在華美軍已經得到指示，假如中國依然拒絕派送Y部隊赴緬，則美軍將停止一切對華武器援助[28]。蔣介石當下的反應是以何應欽名義向美國致送一份警告，內容是中國將堅持本國立場，絕對不會向美國低頭[29]。不過蔣介石很快就放棄了這個立場，並在4月22日命令Y部隊向緬甸進攻，從而避免了中美之間的攤牌[30]。

蔣介石爲什麼改變主意？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他對美國壓力屈服。蔣介石本人對這個問題從來沒有提出過解釋，但他這麼做的理由或許可以更仔細地分析如下。第一，他從3月初就已暗中傾向於把Y部隊送往緬甸了，只是一直對美國人保密，或許是保留未來談判空間。果真如此的話，那麼他妻子自1943年5月以來所持的立場，也許已經改變了他自己的立場。但是這一點是否能夠成立，還需要其他史料去證實，特別是目前尚未出現的宋美齡個人資料。第二，美國壓力雖然日趨高漲，蔣介石也得知美國依然打算把長程重轟炸機派往中國，並且置於他指揮之下，這使他的怒火因之大爲降低[31]。第三，他得知美國計畫派遣副總統華萊士來訪，讓他感受到美國總統的善意[32]。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在4月10日廣播談話中，強調四強合作的重要性，美國看來的確是在以公平態度對待中國[33]。雖然這只是口惠，但是這和來自英國及蘇聯的冷漠態度大不相同。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那就是中國此時感受到的壓力不僅來自美國，也來自蘇聯。從4月初開始，蘇聯就在邊境地區不斷挑釁。在蔣介石感受中，羅斯福正在利用這些邊境困難對中國施壓，其程度超過中美成爲盟邦以來的任何其他時期[34]。因此蔣介石除了向壓力屈服之外，以上所舉外在因素可能也導致他改變原先立場。

總的來說，蔣介石毫無疑問是在向美國壓力屈服，這一點他自己當然不會明講，但是從他在5月份日記表露出來的感情也可以看出端倪。5月29日他寫道：「外交全賴

28 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13日。Schaller, p. 158. Tuchman, p. 567. Dorn letter to Stilwell, April 16, 1944,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35.

29 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13日。

30 同上，1944年4月22日。

31 同上，1944年4月14日。

32 同上，1944年4月15日。

33 蔣介石日記，1944年4月15日。

34 同上，1944年4月8、20日。

實力，決無感情可言。余與羅私人之感情，或因此喪失。但本來並無誠意可言，不過欲以吾國爲其利用而已。此時除積極力圖自立自強，與立定不求不倚之志節以外，另無其他挽回今日外交與軍事頹勢之道也。」[35] 兩天之後，他又寫道：「患難危急之來，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絲毫依賴之心，不僅無補於事，而且成爲他人奴隸矣。此時非求其我力圖自強以外，決無其他挽救之道。」[36] 兩者所指應該都和美國強迫他參加緬甸戰爭有密切關係。順帶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心目中的中美關係裡，一直都有所謂的「與羅(斯福)私人之感情」的這一塊小天地，這和本書其他章節的分析也極爲吻合。

大約與此同時，英軍對於緬甸戰爭的興趣似乎也降到最低點。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敦促英國人履行他們對緬北戰爭的承諾時，蒙巴頓回應(4月14日)道，要想在緬北達成增加中國陸上補給的任務，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事實上，東南亞戰區還選擇這個時節，把指揮總部從印度的德里移到錫蘭的坎底(Kandy)，雖然離馬來亞和蘇門答臘更近，但是離緬甸卻更遠了[37]。換言之，英國人的態度自1943年中期以來大致經過三個重要改變，首先是拒絕進行海戰攻占仰光港，繼之不願在緬甸南部作戰，現在又不願在緬甸北部作戰。即便如此，美國人似乎依然沒有能耐可以影響英國人的行動，反而加強了向中國施壓的力度和速度。儘管印度英國人的安全，也和中國人一樣，依賴美國物資援助，但是美國人認爲對中國人施壓所受的阻力將會較小。

中國大批部隊在5月17日渡過薩爾溫江，戰局旋即產生戲劇性變化。中國軍隊衝擊日軍第18師團陣地，很快就攻下騰衝，這裡是日軍在薩爾溫江西面防衛堅固的指揮部和重要補給與通訊樞紐中心點。中國軍隊第50師也占領了飛機場，使同盟國運輸機得以降落，因而大大改善了盟軍在緬北的形勢。至於在印緬邊境方面，日軍攻打印普哈作戰自1944年3月開始後就一直進展順利。4月初切斷科伊馬－印普哈公路，並占領公路上的要衝科伊馬，眼看將會取得勝利。但是中國軍隊在緬東北地區加入戰鬥之後，就對印緬邊境的日軍產生巨大壓力。因此，6月初，日本就被迫從科伊馬開始撤退。6月中旬，日本最終放棄了想把大批英軍包圍殲滅的企圖[38]。6月22日，同盟國軍隊收復科伊馬－印普哈公路，大舉進入印普哈平原，使日軍作戰計畫完全失敗[39]。在1944年7、

35 同上，1944年5月29日。

36 同上，1944年5月31日。

37 Tuchman, pp. 570-571.

38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 570. Also: Tuchman, p. 573.

39 《大本營陸軍部》(8)，《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6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841-844。

8、9月三個月中，日軍各師團全面後撤，傷亡重大[40]。

中國遠征軍(雲南Y部隊)一旦進入緬甸北部參戰後，英國人對控制它們的興趣隨即提高。5月23日蒙巴頓請邱吉爾向蔣介石轉達要求，他(蒙巴頓)需要同時對中國的X和Y部隊行使指揮權，以求使這兩支部隊得以密切配合[41]。蔣介石最後痛苦地接受了這個安排，名義上把中國軍隊置於東南亞戰區指揮之下，實際上則仍由史迪威直接操控。

就這樣，同盟國參謀人員在耗費了24個月時間精心籌劃，和三國政府在多次交涉得到共識後，緬甸戰爭終於在最不依照計畫的情況下開始了。中國被迫匆忙參加一個他們長期以來信誓旦旦絕不能接受的戰爭形式。中國軍隊在緬北狹小戰場內，承受了日軍主力部隊的抵抗。英國海軍沒有阻擋住日本來自泰國和仰光的物資和兵力增援，美國也沒有派遣陸軍參加戰鬥。即使同盟國空軍對戰爭的支持也不如原先承諾那麼多。

中國的Y部隊是中美兩國在珍珠港事變之前已達成的30個師訓練計畫中的產物。計畫執行過程中也曾經遭遇各種波折，美國的武器不能按期運到中國，和中國政府不能按期選拔受訓的部隊，兩者之間互爲因果(進一步的分析，請見本書結論章)。1943年4月29日終於在昆明成立美國的參謀隊伍，負責提供武器和訓練工作。換言之，Y軍在送往緬甸戰場前大約進行了一年的準備工作。

相對而言，日本在緬甸的軍隊從1942年5月到1944年5月，不但對中國本土建立了有效封鎖，而且在緬甸修築了強大防禦工事。除碉堡戰壕外，他們還設立了多處砲兵陣地，封鎖了山區通道，使得中國軍隊難以從正面發動攻勢[42]。其結果是，中國軍隊面對一支訓練有素、裝備齊全而又防守嚴密的部隊，而這個敵人自從1943年以來就不斷受到來自東南亞各地的增援，其結果是中國必須付出更高昂的傷亡代價。在頭五個半月的戰鬥中，中國遠征軍有23,000名官兵戰死，17,000名受傷[43]。以往不少西方史學著作習慣性地強調英美兩國將領的優異指揮才能，卻很少表揚中國遠征軍官兵如何英勇作

40　《大本營陸軍部》(9)，《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7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152-156，249-255。

41　蒙巴頓致魏亞特(Sir Adrian Carton de Wiart, 邱吉爾駐重慶軍事代表)電，1944年5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302-303。

42　"Historical Report of Y-Force Operations Staff", January 1, 1944 through October 24, 1944. This is a 27-page report submitted by Frank Dorn, Brigadier General, USA, Commanding, Chinese Training and Combat Command, to the Adjutant General in Washington,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43　Frank Dorn, "Historical Report of Y-Force Operations Staff", p. 25.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戰和承受重大犧牲，它們尤其不願提中國軍隊的犧牲，是爲了補救某些英美將領們犯下的愚蠢錯誤，或是掉進他們爲了達成早日開戰目的，而爲中國所設下的巧妙圈套。

## 七、緬甸戰爭和中國本土作戰之間的緊密關聯

事實上，中國爲緬甸戰爭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在緬甸當地戰場上中國將士的傷亡數字。因爲蔣介石的讓步，雖然使得同盟國可以在緬甸贏得重大軍事勝利，但是也讓日本在中國本土進行的「一號作戰」得以橫行無阻，大幅擴大了它對中國政治和軍事的破壞性。蔣介石其實早就看到這兩者之間可能發生的因果關係，而這也是他不願意加入一個準備不足的緬甸戰爭的重要原因。早在1943年12月，蔣介石就曾警告過羅斯福，日本可能從德黑蘭會議宣言中，看出同盟國今後將把全球作戰重點放在歐洲，這樣就會使日本有機可趁在中國戰場上爲所欲爲，並且在1944年度把中國抗戰能力徹底摧毀。蔣介石認爲日本有可能會對中國展開一個全面而具摧毀性的攻擊，除掉它的後顧之憂，並且借此提高日軍在太平洋區的士氣和實力。而這正是蔣介石最擔心的後果[44]。

果不其然，正當同盟國逼迫中國向緬甸出兵之際，日本也在積極備戰，並且幾乎在中國遠征軍從雲南開赴緬甸前線的同時，開始了「一號作戰」（Operation Ichigo, 中國戰史稱為豫湘桂作戰）。中國戰區內日趨嚴重的潰敗，和緬甸戰區內接二連三的捷報，不但形成鮮明對比，而且被史迪威用來作爲證據，認爲他對蔣介石所施展的高壓手段是完全正確的。不久之後，史迪威將會進一步對蔣介石施壓，並由此導致了1944年夏季他打算奪取全中國軍隊指揮權的危機（見本書第10、11章）。然而緬甸戰區勝利與中國戰區失敗的對比，可以有兩種絕然相反的解釋。一個解釋是把它們分離處理，看成是兩個獨立存在而且互不相關的事件。按照這個解釋，它們之間的鮮明對比恰恰證明，史迪威是一流將才而蔣介石是無能的統帥。另一個解釋則是把它們當成是互爲因果的事件，接著產生的問題則是，緬甸勝利是否導致中國失敗，或是加劇中國失敗的程度？多年來史學界的判斷大多受美國單方面資料影響，而趨向前者的解釋，但是新史料使我們必須重新檢討它們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 貳、緬甸戰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到目前爲止，大部分英文著作都把緬甸戰爭看成是，太平洋戰爭期間全面性令人

44 Message from CKS to FDR, December 9, 1943. Verifax File 3675, MFA.

沮喪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中，唯一值得稱道的成就和亮點，而把功勞歸諸美國政府，特別是史迪威個人傑出的表現。這些著作也嘗試去分析中國政府對緬甸戰爭的態度，特別是蔣介石個人的態度。有些著作更作出假設，認爲蔣介石雖然打從頭開始就沒有認真想在緬甸打仗，但是他還是對德黑蘭會議的決定感到失望，原因是這個結果打破了他想囤積大批從印度運到中國武器裝備的如意算盤[45]。不幸的是，這個思路逼使一些作者不得不對蔣介石的動機提出揣測，而他們又無法從中文或是英文資料中找出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論點。同樣不幸的是，他們也被逼完全不顧蔣介石長期以來屢次要求同盟國執行戰爭計畫，和英美兩國從來無意履行承諾的大量事實。

依照美國軍部官方歷史說法，緬甸戰爭主要目的是幫助中國建立一條安全的補給線，從印度經過緬甸通往中國內地。不少作者對此說照單全收。這個說法的邏輯非常簡單明確：中國只有得到充分補給後才有機會成爲強國，它的軍隊才能在史迪威改造後進行有效作戰，並對同盟國最後擊敗日本的大戰略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由於公路橫穿緬甸北部，因此只要收復緬北就足以達成這個目的，同時還可以改善空運航線的安全性，誠可謂一舉兩得。在某些作者看來，問題癥結是中國領袖不能看清楚中國自己的國家利益，蔣介石也不願意使用自己的軍隊去實現這個目標。中國這種「不合作」態度，看起來既是無法理解，更是無可原諒，唯一能夠提出的解釋是，中國領袖們要嘛就是愚蠢無知，要嘛就是苟且偷安。他們對於打敗日本毫無興趣，只是指望美國人替他們火中取栗，或是動機更爲卑劣。這些作者也認爲，既然美國裝備和訓練了中國遠征軍，美國當然有權要求這些軍隊依照美國人的意願作戰。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美國人施壓可謂合情合理，因爲只有這樣作才能把一個毫無戰鬥意志的盟邦，變成一個可以對最後勝利作出貢獻的盟邦。說到底，這都是爲了中國好。

但是事實上，1942-1944年緬甸戰爭的規模之大，它所牽涉的因素之複雜，和對國家利益的影響之深遠，都值得我們重新加以檢視。本章後半部將提供幾種不同方式，來衡量緬甸戰爭如何影響中國戰局。稍後，本書還會用一個更廣闊的角度，檢討緬甸戰爭對中國造成的政治和外交影響。

如果單純從軍事觀點而言，緬甸戰爭無疑是一個令人讚賞不已的大勝利。日本在1944年初在緬甸原來有五個師團，而且攻勢進展順利，逼使印緬邊境的英國軍隊節節後退。但是5月裡中國遠征軍一旦進入緬北戰場之後，立即強力壓迫當面的日軍第18師團。17日同盟國占領密支那飛機場，20日中國遠征軍開始對密支那市區發動攻擊。6月1日，中國遠征軍在拉孟方面渡過怒江(薩爾溫江)後深入日軍56師團防衛地，開始

45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50-151.

攻擊。

中國遠征軍的介入，同時嚴重威脅到日軍在印緬邊境的戰局。雖然日軍第15軍加緊印普哈作戰，但是開始認識到印普哈作戰前途黯淡。6月，第31師團由於印普哈作戰困難而放棄科伊馬，開始撤退。22日，英印軍打通科伊馬至印普哈路線，日軍印普哈作戰計畫破滅。7月2日，日軍停止印普哈作戰。13日，日軍緬甸方面軍重新部署戰略，第一次下達退卻令。

1944年8月初，日軍被迫下達第二次退卻令。月底，第2、56師團開始向雲南結集，並向龍陵和拉孟方向進攻，意圖似乎是希望切斷中國遠征軍雲南的後路。但是在兩周內，日軍在拉孟方面部隊和在騰越的守備軍相繼覆滅，日軍終止對雲南攻勢作戰。9月19日，日軍參謀首長對日軍在緬甸戰場的任務作出了一個重大改變：放棄切斷緬北中印通道的企圖，改爲保護緬南地區。換言之，日軍放棄在緬北作戰。10月下旬，中國遠征軍在怒江方面對日軍第33軍展開總攻擊。11月初日軍大本營再度增兵，將49、53兩個師團編入緬甸方面軍。11月中旬，日軍第2師團在八莫附近遭受中國遠征軍攻擊，陷入苦戰。同時，第15、53師團從密支那線退卻到曼德勒地區[46]。

在這一段時間裡，日軍的傷亡也達到驚人地步。1944年7月，日軍下達第一次撤退令。8月底，日軍緬甸方面軍的死傷者已達32,000[47]。到了1944年底，日軍戰場損失約六萬到七萬。自1944年7月起到年底，日軍大本營對南方軍補充約七萬五千兵源，其中一半以上送到緬甸[48]。到了1944年12月，日本參加緬甸戰爭的戰鬥單位，已達到10個師團和2個旅團。可見日軍對緬甸的重視[49]。

到了1945年5月，根據日軍記錄，當時緬甸方面軍的兵員戰力概況是，總計編制定額人數爲202,209人，在職人員爲90,303人，可以戰鬥的士兵共31,900人，住院病人爲61,731人，在1945年2月1日至5月底的陣亡、受傷、病死人員爲42,106人，傷病者達到22,000人。日軍在1942年3月占領仰光港，1945年5月失守，前後共三年多[50]。

---

46 陸海軍年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43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大事記。

47 《大本營陸軍部》(9)，《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7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360-361。

48 同上，頁749。

49 其番號是：1. 第15軍——15、31、33師團。2. 第28軍——2、54、55師團。3. 第33軍——18、56師團。4. 直屬部隊——49、53師團，第24、72旅團。見：陸海軍年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43冊，頁753。

50 《大本營陸軍部》(10)，《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8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194，342。又1944年5-10月，中國遠征軍造成日軍11,500士兵的傷亡，其中8,500人戰死。見：Frank Dorn, “Historical Report of Y-Force Operations Staff”, p. 25, Frank Dorn

不管用什麼標準來檢驗，這是同盟國的一場大勝仗。而其中出力最多的是中國遠征軍。但是必須檢討的問題是：緬甸戰爭是否達到它原定的大目標？比如，緬甸戰爭的勝利是否直接導致美國援助物資大量進入中國？中國本土的防務是否因爲精銳部隊開赴緬甸戰場而受到嚴重削弱？史迪威認爲，只要蔣介石願意解除對共產黨地區的封鎖，便會有足夠的軍隊防守中國其他地區，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如果緬甸戰爭不幸失敗，美國是否依然會對中國繼續提供強力支持？

對於這些問題，史迪威顯然不感興趣，也或許超過他的思考能力所及的層次。但是作爲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卻不得不反覆加以思考，尤其考量它們之間的關係。對於史迪威而言，緬北戰場是他軍事視野的全部，但是對於蔣介石而言，緬北只是他政治視野中的一部分。

## 一、向中國運送補給品

### (一)最初的展望

從一開始，緬甸戰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大幅增加美國對中國的物資援助。史迪威最初的目標(1942年7月)是每月能夠運送3萬噸物資[51]。到1943年5月，中國人自己變得更加樂觀。宋子文甚至預期緬甸通路每月可以運送10萬噸物資進入中國[52]。當然應該記得的是，當中國人在1942-43年間談論緬甸通路時，他們的理解是同盟國收復整個緬甸，包括從仰光港運進大量軍事物資，並不限於緬北公路而已。

當時只有邱吉爾對列多公路的功能一貫抱持懷疑態度。他在1943年5月曾經告訴宋子文說，緬北公路每月最多只能運送2萬噸，即使緬甸戰爭能夠如期開展，公路也要到1945年才能全程通行。因此更切合實際的做法是把駝峰運輸量增加到每月3萬噸[53]。

1943年8月，魁北克會議把目標訂爲每月運送85,000噸軍火和55,000噸油料。會議上的重要考慮是，公路可以運送足夠補給品，讓中國軍隊參加預定在1945年春天發動的

(續)

Personal Papers, Box 1.

51 張圻福、顧瑩惠，〈論史迪威事件與美蔣矛盾〉，載於張憲文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頁708-709。

52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3-234。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8月3日，《戰時外交》(三)，頁254-256。

53 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5月21日，《戰時外交》(三)，頁233-234。又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3年5月13日。又見：宋子文致蔣介石電，1943年8月3日，《戰時外交》(三)，頁254-256。Leslie Anders, *The Ledo Road*(Norman, Okla., 1965), pp. 75-78.

中美兩國陸空大反攻，從華東指向日本本土[54]。但是這個計畫馬上遭到批評，認爲無論從工程學或是戰術上來看都不切實際[55]。包括幾位重要美軍將領(魏德邁和惠勒Wheeler)在內，都不能接受史迪威的樂觀估計[56]。

到了1944年4月，當英美工兵專家都認爲無法在1946年1月以前完成一條單線公路時，早先關於緬北公路的爭論又重新爆發。美國軍部作戰科和空軍旋即加入爭論。作戰科主張削減緬甸路工程的規模，只把舊有通往雲南的小徑加以修復，讓砲兵和卡車可以通過即可。而空軍則仍然主張這項任務乾脆由駝峰空運隊來完成[57]。

但是這些爭論對史迪威毫不發生影響，因爲他依然堅持，緬甸戰爭的主要目的是盡量收復緬甸失土，俾能建成公路和油管以取代駝峰空運航線，從而成爲援助中國的主要通道[58]。

## (二)實際成果

### a. 緬甸路部分

就史迪威而言，不幸的是，他的反對者的意見被證明是正確的。在緬北地區落入同盟國手中之後，同盟國立即在1944年夏天開始築路工程，但是馬上發現這項工程是一個工程學上的噩夢[59]。儘管耗費大量金錢和人力，但成果不彰。造路缺乏計畫，匆促開工。由於地形和天氣因素，造路工程並不符合規範，保養工作更是所費不貲。有些路段從沒達到正常使用的標準，而其他則在暴雨之後遭沖毀而長期無法通車。結果是，在某些路段，運輸量極爲有限[60]。

緬北公路在1945年全線通車後，它戰略價值的局限性才被充分暴露出來。在日本投降之前，它每月最高的運輸量是1945年5月份的8,435噸(短噸short ton)，旋即下降，對抗戰勝利貢獻不大[61]。

---

54 Leslie Anders, pp. 143-149.

55 Albert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 1958), pp. 253-254.

56 *Ibid.*, pp. 253-257.

57 Leslie Anders, pp. 143-149.

58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 1956), p. 333. *Wedemeyer Reports*, p. 257.

59 Leslie Anders, pp. 143-149; *Wedemeyer Reports*, p. 335.

60 Anders, *Ledo Road*, pp. 224-228. *Wedemeyer Reports*, p. 335. 《蔣總統事略稿》，1945年1月22、28日。

61 有一個參數可以作為比較：1945年6-9月份，在歐洲戰場的美軍第一軍，每一天的汽油消耗量是430,000加侖。見：Ruppenthal, *Logistical Support of the Armies*, p. 503. For a more

**1945年從緬甸運進中國的物資**

| 月份 | 貨物運量(噸) | 汽油(加侖) |
|---|---|---|
| 2月 | 1,111 | |
| 3月 | 1,509 | |
| 4月 | 4,198 | 122,072(約439噸) |
| 5月 | 8,435 | 1,514,440(約5,530噸) |
| 6月 | 6,985 | 1,417,115(約5,187噸) |
| 7月 | 5,900 | 3,179,330(約11,601噸) |

資料來源：*Time Runs Out in CBI*, pp. 317-318, tables 4 and 5.

配合緬北公路工程，塞未維爾將軍在1943年2月曾建議修建一條平行的輸油管，俾能補給未來在華作戰的美軍，當時預期的美軍人數是10萬到50萬士兵。同年5月擬出具體計畫，前提是清除緬甸全部日軍和收復仰光港。到了1943年8月，英美參謀長聯席會終於批准，其具體的內容是從印度阿薩姆建一條4吋輸油管直抵昆明，再從加爾各答建一條6吋輸油管到達阿薩姆。由於英美兩國對於緬甸戰爭的規模始終反覆不定，以致輸油管計畫遭到多次修改。最後輸油管工程終於在1944年6月開工，並於1945年3月10日完工，全長1,760公里。到1945年7月爲止，這條輸油管一共運輸了300萬噸汽油[62]。雖然輸油管不像公路那樣容易受惡劣天氣干擾，它的功效依然難以令人滿意。在1945年5月達到最高峰後，運油量就開始下降。同年6月，輸油管送進中國的運輸量，果真證明不是杞人憂天，比預期大幅延誤。同樣，公路上的運輸量也大幅落後[63]。

### b. 中印之間的空運部分

和緬北公路相比，駝峰空運工作的表現截然不同。從1944年下半年開始，空運進入中國的數量大幅躍增，這個趨勢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爲止。1944年10月份的運輸量是24,715噸，11月份跳到34,914噸。當1945年1月緬北公路開通後，空運數量仍在持續上升。從1945年1月份的44,099噸，增加到6月份的55,387噸，再增加到7月份的71,043

(續)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utility of the pipeline, see: Anders, *Ledo Road*, pp. 219-221.

62 《蔣總統事略稿》，1945年3月10日。Also: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 Sec. 2:VIII.

63 Excerpt from memo, Subj G-4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Carbonado, from Hq. USFCG, office of A C/S, G-4, APO 879, June 27, 1945, in Chennault Personal Papers, Box 9, "Airlift, Military".

噸[64]。1945年1月，魏德邁將軍向軍部提出他訓練中國軍隊的計畫，他當時向美國政府提出的報告顯示，緬北公路儘管花費更多資金和人員來維持，但它的運輸量仍然不及空運數量[65]。如果以1945年作爲比較，那麼空運數量約爲陸地運輸量的四倍[66]。

戰爭最後一個月——1945年7月份——的比較可以看出最明顯的差異。在這個月裡，一共有91,183噸的租借法案物資送到中國，其中空運部分爲73,682噸(80%)，輸油管爲11,061噸(12%)，史迪威的公路僅提供了5,900噸(6%)[67]。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空運的效率將持續提高，但是緬甸路受制於天候地形，卻看不出有改善的指望。

### c. 評估緬甸戰爭的新思考方式

在西方作者中，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女士或許是史迪威緬北公路計畫最忠誠的支持者。她雖然也承認空運物資數量遠遠超過公路，但是提出解釋說，空運數量所以能夠增加，是因爲史迪威占領緬甸北部，運輸機可以飛一條靠南的航線。既能避免日本戰鬥機的攔截，又能縮短駝峰的航程。依照此一邏輯，緬北勝利獲得「意想不到」的結果(a bonus)，改善飛航環境，增加空運效率[68]。換言之，這還得歸功於史迪威在地面作戰的努力。

這個說詞的狡辯成分委實過於明顯。評估緬甸戰爭的成效，應該看它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而不是以它「意想不到」的結果作爲遁詞。如果什麼事情都可以這樣評估的話，那麼人類也用不著從事計畫，一切碰運氣即可。何況在現實情況裡，到1945年9月爲止，美國爲緬甸路的修築動用了17,000位工程人員，付出149,000,000美元的費用，犧牲1,133條人命。至於中國人付出的代價，則又是另外一筆帳了，但在人力和財力兩方面的付出，肯定都超過美國許多。鑒於空運數量是公路和輸油管總和的四倍以上[69]，人們不禁好奇，設若從1942年開始，美國就決定把同樣的人力物力財力，投注在改善空運工作方面，得到的成績是否將會大得多多？

其實，史迪威的支持者可能也沒有幫上他的忙。因爲他們無意中把他形容成一個不負責任和缺乏判斷力的軍人。對於像史迪威這樣自尊心極強的職業軍人來講，他或

64 Charles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Washington D.C.), Table 1 on p. 40. For slightly different estimates, see: Tuchman, p. 618. Also: Norman Polmar and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 p. 400.

6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s Runs Out in CBI*, p. 319.

66 具體的數字各為555,000噸和147,000噸。

6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CBI*, p. 365.

68 Tuchman, p. 618; Anders, pp. 242-243.

69 Anders, pp. 233-240.

許寧可承認自己缺乏先見之明或是判斷錯誤，也不願意被支持者去刻意粉飾，把他明明沒有料到的事情當成他的功勞。假如他不是缺乏先見之明或是判斷錯誤，那他就更無法解釋，爲什麼鍥而不捨推動緬甸北部戰爭，還爲了實現這個局部戰爭，不惜讓中美關係瀕於破裂，也讓中國本身安全受到無可彌補的傷害。

事實上，這些支持者的說詞，也在無意中暴露了英美軍事領袖缺乏處理問題的機智和靈活性。因爲如果日本戰鬥機的騷擾果真嚴重妨害駝峰運輸效率，那麼同盟國可以對日本進行一場有規模的空中打擊，摧毀日軍在緬甸北部的空軍基地，使之無法攔截駝峰運輸機。如果這麼做就可以達成同樣效果，那就不需要使用大量地面部隊，更不需要讓中國遭受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摧殘。史迪威支持者的說詞，不過是把史迪威描繪成一個短視而又心胸狹小的軍人，不堪擔負重任。這絕非史迪威本人所願忍受的評價。

## 二、戰爭時機的考慮

### (一)緬甸戰爭和一號作戰之間的關聯

由於以上原因，緬甸戰爭的時機和它最後的影響，也需要嚴肅地重新思考。1942年中期，中國人認爲緬甸戰爭符合中國國家利益。但是到了1944年春，就未必如此想。因爲當時日本正在展開「一號作戰」，這是日軍自1938年以來對中國戰區最猛烈的攻擊。中國此時的立場其實跟蘇聯並無不同。蘇聯拒絕在解決德國威脅之前向日本宣戰，以免分散實力；但是中國面對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時，卻被迫把遠征軍送往緬甸作戰[70]。在中國本土作戰的日軍數量，相當於緬甸戰場的3至4倍，然而史迪威完全不關心，也不履行他是中國戰區盟軍參謀長的職責，對日軍在華的大規模進攻，沒有作出任何應有的努力，反而逼迫中國把最精銳的部隊投入遙遠的緬甸戰場。

史迪威對河南省的淪陷似乎當成事不關己，甚至不願意花少許時間回中國一趟，接受蔣介石的諮詢。從1943年12月到1944年7月之間，他寧可把全部時間花在緬甸叢林裡。1944年6月1日以前，蔣介石曾兩度緊急召喚史迪威趕回重慶，商議如何應付一號作戰帶來的危機，但是史迪威不予理睬，甚至連信也不屑回覆[71]。這已經讓蔣介石大爲憤怒了。況且，當日軍攻擊達到高潮時，史迪威不准陳納德的飛行員動用儲藏在

70　有關對一號作戰的敘述，請參閱：《河南會戰》（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撰；曾清貴譯，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71　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1日。

成都的油料，去支援中國地面部隊[72]。史迪威在蔣介石嚴令下終於回到重慶，但是只停留兩天(6月4-5日)立即離開，沒有提供任何協助。

毫無疑問，假如中國能夠把Y部隊留在中國本土，則日軍一號作戰造成的破壞肯定會大幅降低。蔣介石很快得到結論，中國在緬甸戰爭中承擔的責任太不公平，因此在1944年9月15日告知史迪威，要嘛中英兩國軍隊立即同時向緬甸日軍進行強烈攻擊，要嘛由他召回一部分中國軍隊，去加強雲南防務。對此，史迪威完全不從蔣介石幕僚長的角度思考，反而大爲惱火，在日記中對蔣介石破口大罵，抱怨美國花了兩年半時間和大量人力、物力、金錢、時間，所要做的「完全是爲了幫助中國」，而蔣介石偏偏不知好歹[73]。就在這個時候，日軍正突破中國軍隊在華中的防禦線，向西南地區挺進，並且威脅到重慶的安全。

在這個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府對兩個盟邦的差別待遇。當涉及英國時，美國可以不顧蘇聯的屢次敦促，一直贊同英國首先必須鞏固本土防務的立場，推遲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決定。當涉及中國時，儘管中國本身情勢岌岌可危，有可能立即崩潰，美國卻一味強迫中國政府，把最好的軍隊送往亞洲的「第二戰場」(緬甸)。

更重要的是，史迪威尖酸刻薄的言辭，也透露出他對自己在中國戰區的最高使命認識混淆。蔣介石是中國戰區最高領袖，本來就有權決定一切有關中國的事務。但是叫史迪威無法接受的是，在任何「幫助中國」這個課題上，蔣介石居然敢持和史迪威不同的意見。對史迪威而言，此時中國國內發生的情況，應該由蔣介石自己去處理，史迪威本人則決不允許中國政府打擾他在緬甸的工作，即便是中國此時已經被日軍打得體無完膚，那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沒有理由讓他分神[74]。

英美兩國在緬甸戰爭中拒絕遵照原先計畫進行，導致中國必須付出慘重的政治和軍事代價，承受重大的人員傷亡。在緬北狹窄的戰場上，中國軍隊缺乏充分補給和海空支援，卻依然奮戰不已。換了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地區，同盟國的軍事領袖大概都不會發動這樣一場戰爭。但是在緬甸可以這麼做，因爲打仗的是中國的部隊。最後的結果則是，中國人由於同盟國參與不足，所以只好以犧牲更多士兵的生命來換取勝利。

## (二)優先順序的考量

史迪威對緬甸戰爭因爲屢次延誤而感到不耐，確實令人同情。只是真正重要的問

72 同上，1944年5月31日。

73 Tuchman, p. 625.

74 蔣介石致赫爾利備忘錄，1944年10月9日，《戰時外交》(三)，頁684-687。

題應該是：如果中國本身面臨崩潰危機，緬北公路即使打通又有什麼意義？緬甸局部戰場上的大勝利，如何可以和中國戰場上的大失敗相提並論？

設若日軍一號作戰的凌厲攻勢沒有被中國軍隊所阻截，則日軍大有可能占領雲南和貴州，從而使得緬甸的勝利變得全無意義。因爲日軍將可從中國內陸切斷中緬邊境和重慶之間的陸上交通，進而讓準備送往中國的大批美國軍火變成無處可送。後來情況的演變是，中國雖然沒有被日軍徹底擊垮，但是元氣大傷，在此後幾年中可以說始終沒有恢復[75]。

緬甸戰爭開戰時機值得特別關注的理由是，戰爭計畫已經因爲英美兩國的反覆不定而延誤了將近15個月之久。令人詫異的是，英美兩國政府從來沒有提出解釋，爲什麼不能依照原來要求再延期一次，而且只是延期六個月而已。如果再次延期，則可以大大幫助中國增強它的防務，也可以防止它政治的分崩離析和民心的渙散。再說，英美兩國本來就把緬甸戰爭的開戰日期定在1944年11月，中國政府也同意了這項決定。不意在幾天之內美國人突然變卦，轉而堅持必須在1943年底和1944年初開戰。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極端納悶的轉變。追根究柢，只有美國決策者自己才可以解釋，爲什麼在中國正在承受空前浩劫之際，他們不趕快解救中國的燃眉之急，反而傾全力去修築一條公路，而這條公路需要很長時間(約一年後)才能投入使用，運送物資進入中國[76]？

1944年春夏之際，中國精銳之師正在緬甸戰場奮力作戰之時，日軍也正在侵入中國的心臟地區。中國軍隊在史迪威指揮之下攻占了緬北的密支那，但中國同時卻失去了大部分華中和小部分華南地區。這個發展的長遠效應是，相對各省的地方軍政勢力而言，重慶政府在1945年的地位比起抗戰以來任何時期都要虛弱。

中國疆域遼闊，有實力的地方領袖手握兵權，各自爲政，對把中國軍隊送往國外作戰一事，意見分歧。比如說，李宗仁向來有抗日派的美名，在中國軍事領袖中，以治軍有方和驍勇善戰著稱，也和重慶政府的關係最爲密切。但是，他就認爲蔣介石犯了大錯，把大軍送往緬甸作戰，卻使中國本土空虛，無法應付日軍攻擊。當然，李宗仁當時並不知道，蔣介石實在是在美國強力壓迫之下不得不爾[77]。根據李宗仁的看法，

---

75 有關中國軍隊在一號作戰時期的損失，見：《河南會戰》。又見：國防部，《抗日戰史》(臺北，1967)有關河南、湖南、廣西各地戰役；何應欽，《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臺北，1962)。

76 中國的損失包括五十萬士兵的傷亡，八個省份的土地，和大約一億人民落入敵手。在國民政府管轄下的社會結構、政府組織，和經濟所承受的破壞，一直到抗戰勝利時均未能恢復。

77 見唐德剛，〈從美國檔案中看史迪威事件〉，《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冊，

蔣介石應該在廣西南寧集結兵力攻打廣州灣，打開一個港口，以便和同盟國海軍取得聯繫。李宗仁所持的理由是，日軍在本土和緬甸之間的聯繫如同一條常山之蛇，中國不應該打它的頭部或是尾部，而應該打它的身體。假如中國可以把投入緬甸戰爭的軍隊轉移到廣州灣使用，就能和菲律賓海域的美國海軍聯繫，切斷緬甸日軍的補給線，並迫使日軍自緬甸撤退[78]。徐永昌將軍也對緬甸戰爭持高度保留態度。1943年10月間，徐永昌最擔心的是，萬一同盟國不履行諾言切斷日軍的補給和增援，史迪威又貿然展開緬甸局部戰爭，則可能導致日軍從越南進攻昆明，中國將得不償失[79]。

其他還有一些軍事將領，基於不同理由，也反對緬甸戰爭。對於那些在一號作戰中遭受日軍嚴重摧殘省份的地方實力派領袖而言，他們對蔣介石的決定當然最感憤怒。因爲從他們看來，蔣介石不把國軍留在國內保衛鄉土，反而送到外國去打仗，因而使得他們家園遭受慘劫，這是一個極大的政治錯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決定派Y部隊出境，不但直接承受了一號作戰的失敗，也付出了極大的政治代價。任何對中國事務稍有了解的人都懂得一個簡單道理，蔣介石的地位高度依賴各省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合作，或至少是他們的容忍。然而史迪威卻對這個中國政治現實中最基本的道理，完全懵懂無知，或是視若無睹，從而把蔣介石的任何猶豫都當成是他個人奸詐、「不合作」或是「破壞」的證據。

有些史學著作持一種說法，認爲史迪威心中其實早已知道，日軍一號作戰不至於威脅到中國的生存[80]，因此對一號作戰並不擔心。史迪威本人也的確曾經堅持過緬甸戰爭不至於削弱中國防務，因爲中國還有一支大軍擺在西北對付共產黨。但是史迪威不知道而蔣介石卻心裡有數的是，這支軍隊在一號作戰一開始就已經投入戰鬥，而且遭受重大損失。他爲此大爲震怒，並嚴厲批評了胡宗南、湯恩伯、蔣鼎文等將領[81]。後來重慶受到日軍威脅，中國政府又趕緊從西北抽調了部分部隊增援，而這些部隊的表現依然和其他部隊並無二致。面對這種景象，史迪威馬上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解決方案，那就是裝備共產黨軍隊，因爲他認爲共產黨軍隊比國民黨的軍隊驍勇善戰。當然，這個建議馬上又增加了蔣介石的疑慮。

總而言之，把Y部隊投入緬甸戰場的時機，應該是評價緬甸戰爭的一個重要考量。換句話說，除了緬甸戰爭該不該打和以何種規模來打之外，還需要考慮「何時」打的問

(續)

頁124-125。

78 《李宗仁回憶錄》，頁548-549。

7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3年10月23日。

80 Tuchman, pp. 586-587.

81 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1-10、20、25-26日；6月10、13、15日。

題。應該注意的是，日本爲了一號作戰和緬甸戰爭，經過長期準備，一方面調集華北和東北的兵力，準備進攻湖南、廣西和貴州；另一方面也集結東南亞的部隊，準備應付同盟國對緬甸的攻勢。中國軍隊的戰鬥力本來薄弱，而X和Y兩支部隊卻是中國軍隊中，剩下來的兩支戰鬥力最強的部隊，總兵力不超過20萬人。顧此即會失彼，顧彼即會失此，無法分散使用。但是在史迪威留下的文檔中找不到任何跡象，顯示他曾經思考過這個簡單的道理。

日本完全有能力在相隔千里的兩個戰場上同時作戰，但中國只能把少量的精銳部隊，集中在最具關鍵性的一個戰場使用。毫無疑問，從1942到1943年，中國極力鼓吹緬甸戰爭並踴躍參與，因爲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大量的美國物資援助，從而徹底改變抗戰大局。但是到了1944年初，這個理由就不再存在了，因爲這個時候中國的最高國家利益是保障國家生存，而這個利益應該高於其他一切考慮，包括打通緬甸路在內。

再說，不同國家對時機的選擇，可能想法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只要從英國、美國和蘇聯三國對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時機的歧見，就可以看出，這並不奇怪。至於緬甸，中國認爲開戰的最壞時機可能是美國認爲最佳的時機，甚至說不定還是唯一的時機。最初，美國純粹從軍事效益和理性出發來衡量緬甸戰爭的可行性，因此才會同意蔣介石的主張，認爲以海陸空三軍同時向緬甸北部、中部和南部發動攻勢，是最能達到軍事目的的作戰方式。但是由於美國軍方歷來並不重視中國戰區，因此連帶也不重視緬甸戰爭，認爲並不是一件急事，所以只要英國人不同意合作，美國政府便寧可讓開戰時間一拖再拖。

但是一旦美國本身的國家利益變成最優先考量時，美國的態度可以急劇轉變，時機也必須及時掌握。而這正是本章打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 叁、緬甸戰爭事關美國切身利益

過去史學著作強調的是，史迪威和第二次緬甸戰爭如何致力於幫助中國，去打破日本人對中國的封鎖。但是它們很少提到緬甸戰爭的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犧牲中國利益去促進美國利益[82]。

如前文所述，緬甸戰爭突然展開的時機委實充滿玄機，因爲它違反常理。簡言之，從1942年6月到1943年12月的一年半期間內，美國處境一直頗爲尷尬，因爲對中國屢

82　這種史學立場的一個典型例證，請參考：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71-472.

次要求如期開戰，美國都無法給予確切答覆。但是開羅會議後，情況便急轉直下，沒有幾天，美國軍部就對戰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執意戰爭必須立即展開。這種態度上的急遽變化，不可能是因爲軍部突然下定決心要加倍協助中國，而是一定有其他更重要因素起了作用。

從這個角度探索，就需要問一個相關問題：是否緬甸戰爭和美國全球戰略思想之間有某種微妙關聯？美國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超過前所未有程度，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現象。設若美國軍部依然把中國看成是反攻日本本土不可取代的陸軍和空軍基地，那還比較容易了解美國爲什麼急於打通緬甸路。因爲這是唯一能把大批物資送進中國的方法，從而可以幫助中國進行必要的軍事改革和整編工作，爲中國能及早參加同盟國最後反攻作好準備。但是即便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美國參謀人員似乎也還是不應該對中國境內正在發展的悲劇完全視若無睹。不幸的是，這個說法似乎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因而需要去找出更好的解釋。

事實上，美國此時已經有一個新的全球戰略，那就是太平洋跳島戰略。在這個戰略下，中國戰區的戰略價值既然已經大幅下滑，緬甸戰爭也應該隨之失去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緬甸的功能是爲中國戰區服務，中國戰區價值降低，緬甸的功能也應隨之降低。而有趣的是，正是在這個骨節眼上，美國卻施加前所未有的壓力，逼迫中國立即盡全力去展開一個局部性的緬甸戰爭，這個現象顯然需要另外解釋。換句話說，美國既然認爲中國戰區的重要性日減，就沒有必要在最短期間內運送大批物資進入中國。尤其是當美國認爲，中國在最後擊敗日本的戰爭中，根本不會產生重要作用，它的促戰和迫戰的做法就更加非比尋常了。以上這些考慮使我們不得不轉換分析的焦點：我們需要關注的或許不是美國如何急切想幫助中國，而是美國如何急切想幫助它自己，即使傷害中國利益也在所不惜。只有這樣，才能夠更清晰有力地說明，美國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之間，爲何在態度上會有如此翻天覆地的改變。

## 一、太平洋戰場的日趨重要

### (一)1942年到1943年中期

同盟國在太平洋戰區的軍事發展，從1942年中期以後就漸趨樂觀。這一年3月3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決定把廣大的太平洋海域一分爲二；中部太平洋地區由海軍上將尼米茲(Chester Nimitz)負責，西南太平洋地區由陸軍上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負責。美國軍事領袖當時還沒有發展出一套擊敗日本的整體方案，但是

已經決定加強太平洋地區的作戰行動。5月7-8日美國在珊瑚海(Coral Sea)取得勝利，8月8日又對瓜地卡尼爾(Guadalcanal)展開攻勢，經過五個月慘烈爭戰後占領全島(1942年12月31日)。這場戰役的困難度無疑讓美國領袖體會到，如果緬甸和中國戰場能夠拖住日軍，一定對今後美國進攻日軍占領的太平洋島嶼大有助益。這說明了爲什麼1943年1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上，竟然對英國施加那麼大的壓力，以減少對歐戰的支援爲威脅，一定要英國承諾參加緬甸戰爭，而且要盡快發動攻勢。

隨著美國軍隊對這些島嶼推進，美國對於緬甸戰爭的需要就變得愈加緊迫。從1943年夏季開始，軍部內不同單位先後推出了幾個擊敗日本的方案[83]。同時，太平洋地區的麥克阿瑟和尼米茲，也各自擬訂了擊敗日本的方案。前者在西南太平洋地區緩慢推進，最終目標是收復菲律賓。後者在中部太平洋地區準備進攻吉爾伯群島(Gilberts)，然後向馬紹爾(Marshall)群島挺進[84]。雖然當時還看不出來哪一個方案有機會在短期內付諸實行，但是總形勢已經日漸明朗，那就是太平洋地區會變成美軍的主要戰場。相比之下，從亞洲大陸進攻日本本土的設想，雖然從珍珠港事件後一直主宰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戰略思想，此時卻逐漸失去吸引力。在這個過程中，美國不再把中國看成是進攻日本的唯一基地，那麼緬甸作爲補給中國戰區的必經之路，其重要性也隨著與日俱減[85]。等到長程航空母艦和長程轟炸機(B-29)發展成功，美國從太平洋基地派海軍封鎖日本海，並派飛機直接轟炸日本本土的可能性就變得越來越高。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決定，美國的主力將由中部太平洋地區發動攻擊，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負責配合，就是反映這個戰略思想的轉變[86]。

## (二)1943年中期到1943年11月

到了1943年中期，馬歇爾表示美國已有爲自己的利益而想打緬甸戰爭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愈來愈無關乎支援中國。他在一份呈交總統的備忘錄中(1943年5月)明白寫道，假如同盟國放棄緬甸戰爭，日軍會加緊打擊中國和印度的基地和空運。同時也會有餘力

83 Interview of Marshall on November 21, 1956, in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369.

84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438-443.

85 Interview of Marshall on November 21, 1956, in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369.

86 Philip A. Crow and Edmund G. Love, *Seizure of the Gilberts and Marshalls*(Washington D.C., 1955), p. 13.

幫助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地區集結大批部隊」，甚至進攻澳洲的達爾文(Darwin)港[87]。鑒於英國不願提供海軍參加作戰，馬歇爾表示願意將緬甸戰爭的規模予以縮小。根據他向美國總統提出的解釋，美國在緬甸加壓力，就可以達成分散日本兵力的目的，大有助於美國在太平洋的攻勢[88]。

值得注意的是，馬歇爾設想，由兩支中國軍隊在這場戰爭中挑大樑，印度蘭伽的X部隊和和中國雲南的Y部隊負責主攻，再加上一些英國部隊點綴。他也要求英國海軍在孟加拉海域「露面」，向中國政府傳達一個印象，英國海軍果真履行原先承諾，其實真正目的既不是建立一條同盟國的海上通道，也不是要占領仰光港。說穿了，虛晃一招、唬弄中國而已。

既然要誤導中國人，就必須欺瞞中國。因此馬歇爾警告美國總統說：「中國人此時並不了解英國對於仰光港的真正意圖，這是衛佛爾將軍特別關照過的。讓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們此時向中國人作出任何透露，說我們正在打算修改緬甸戰爭規模的話，他們一定會作出強烈的反應。」[89]

顯然，早在1943年中期，馬歇爾已經明白承認，美國軍方已決定和英國人合作，共同把中國引進一場規模縮減的緬甸戰爭裡去，而且由中國軍隊承擔主要作戰任務。美國軍方什麼事情都對中國守口如瓶，但遇到英國人提出要求時，卻展現出盡量予以配合的高度急切心情。一個明顯的例子發生在1943年12月。當時馬歇爾寫信給英國迪爾元帥，向迪爾提供所有美國總統和蔣介石之間談論緬甸戰爭的來往信函複本，同時保證美國已經敦促蔣介石接受蒙巴頓的要求，把駐紮在雲南的遠征軍開入緬甸[90]。在中國和美國的官方檔案中，直到目前卻還找不出任何證據，能夠證明羅斯福也把他和邱吉爾之間有關緬甸戰爭的來往信件送請蔣介石過目。正好相反，美國人和英國人最關心的是如何對蔣介石保密，讓他無法捉摸同盟國的真實意向。

1943年夏，美國新戰略思想開始進入行動階段。這一年7月2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作出重要決定，準備在1943年11月進攻吉爾伯群島(Gilberts)，然後在1944年1月進攻馬紹爾群島(Marshalls)。不到一個月，英美參謀長聯席會又在魁北克(Quebec)會議接獲命令，著手擬訂一個擊敗日本的精簡計畫。參謀人員隨即在1943年下半年擬出幾

87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Memorandum for FDR, undated but probably in April or May 1943. Verifax File 1277, Item 3193, MFA.

88 Ibid.

89 Ibid.

90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Field Marshal Sir John S. Dill, British Joint Staff Mission,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December 28, 1943. Verifax File 2675, Item 2584, MFA.

個宏觀性方案，分別主張由中部太平洋群島、臺灣或是蘇門答臘島發動攻勢。這些方案的共同點是，一致強調應該運用快速航空母艦群和長程重轟炸機的優勢，至於中國的角色則未被提及。

最能反映軍部這種思路的跡象，或許是1943年11月4日擬訂的文件。這份開羅會議前約三周擬訂的文件指出，美國在亞洲大陸的戰略無法在1946年以前付諸實現。如果美國要運用亞洲大陸作爲進攻基地，它必須先創造一些有利條件，這包括：1. 在緬北發動戰爭，開闢一條通往中國的公路，同時加強空中運輸能力；2. 裝備和訓練30個中國師；3. 在日本依然可以攻擊到的中國戰區地區內，設法修建轟炸機基地，以便攻擊日本本土。依照軍部估計，如果要執行以上這許多計畫，美國至少要派遣361,000人員到亞洲戰區，外加重轟炸機人員。從軍部看來，這些投資數量過大。因此分析的結論是，同盟國在亞洲戰區的進展不能配合太平洋地區的進展。同盟國對太平洋地區的展望是，在1945年1月從瑪麗安那(Mariana)群島對日本本土進行轟炸，1946年中期對日本本土發動兩棲登陸作戰。反之，如果從亞洲大陸發動對日攻擊，不但曠日持久，而且所需費用浩大，人員的運用也不合算，更何況勝算無法預估。

難怪這份文件的最後建議有兩個重點：1. 就中國戰區而言，幫助中國繼續抗戰，盡早從中國發動對日本目標的轟炸，但是不需要執意攻擊日本本土目標。只要開始這些行動，就會有利於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2. 就中國－緬甸－印度(CBI)戰區而言，美國不再作出新承諾(除了訓練中國軍隊30師之外)，要盡早結束美國在亞洲的工兵建設，並撤出工兵隊伍。文件最重要的建議是，美國指望在1946年中期擊敗日本，主要是經由太平洋路線達成目的，因此在亞洲大陸上的任何計畫，都無需去設想1946年中期以後可能發生的情況，也可以避開緬甸地區[91]。

## 二、太平洋戰略的明朗化

美國的新戰略思想，也就是撇開中國戰區，從太平洋直接攻擊日本本土，在開羅會議時益加成形[92]。會議前幾天，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吉爾伯(Gilbert)島成功登陸(1943年11月20日)。下個目標是馬紹爾(Marshall)群島，因爲此處的日本空軍和潛水艇基地，可以威脅澳洲和菲律賓的海上航線。

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不但向邱吉爾的壓力低頭，取消孟加拉海域兩棲作戰，

91 "SUMMARY OF SS 135: RE-ANALYSIS OF OUR STRATEGIC POLICY IN ASIA" November 4, 1943, in Xerox File 137. MFA.

9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52-55.

而且也否決了史迪威立即發動緬甸戰爭的的要求。美國的立場是對中國軍隊繼續履行已經進入實施階段中的計畫，但是不會使用更多的租借法案資源去訓練更多的中國軍隊[93]。羅斯福此時的想法非常單純而且合乎邏輯：既然中國的戰略價值正在降低，那麼緬甸戰爭的重要性也將隨而降低。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相應減少，甚至不需要盡快打通緬甸路了。更有進者，英美領袖在德黑蘭和史達林交易，讓蘇聯紅軍承諾參加對日作戰，此一發展只能進一步降低中國的重要性。只有在多日之後，羅斯福才放棄這種對緬甸和中國關係的單純直線思維，慢慢體會到軍部苦心，認識到對美國真正重要的，並不是緬甸和中國兩地的直接關係，而是它們與太平洋戰區之間的間接關係。

上述發展對中國的影響是：美國的大戰略思想既然已經把史迪威的陸軍訓練計畫擠壓成次要項目，那麼緬甸戰爭也應該變成次要戰爭。最後在1944年5月3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向史迪威下達一個新指令，中緬印戰區應對西太平洋即將發動的作戰給予空中支援，並指出此項空軍支援行動必然會減少駝峰空運對中國陸軍的補給和支援[94]。當史迪威要求馬歇爾說明原先提高中國軍隊戰鬥力的任務是否依然有效時，馬歇爾的回答是(5月27日)：美國當前的政策是在亞洲大陸避免任何重大動作。他進而明確指出，史迪威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從事可以有效幫助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打擊日軍的作戰活動，即使這些活動干擾了史迪威對中國軍隊的訓練工作，也在所不惜[95]。

這個新戰略思想可以幫助我們解讀某些事件，但同時也製造了一些令人費解的新問題。中國是參加開羅會議國家中，唯一對緬甸戰爭原始計畫充滿熱情的盟邦。依據美國人新戰略觀念，緬甸(甚至中國)在對日最後決戰中已經喪失重要性。只要蔣介石不要求美國提供大量人力物力參加緬甸戰爭，美國人對於蔣介石想要打仗的要求仍然願意予以滿足。這個事實解釋了爲什麼羅斯福並不急於向邱吉爾施壓，要他履行早先承諾。它還解釋了，爲什麼當羅斯福得知英國不準備在孟加拉海灣進行海戰和進攻仰光港時，他當即的反應就是去爭取蔣介石同意把戰爭延期。簡而言之，緬甸戰爭是一個三國協同作戰計畫，但是對於同盟國而言，它在1943年底已經失去原先在1942年具有的高度戰略意義。因此對於羅斯福來說，戰爭的延期(或甚至取消)並不是一件會令他失望的大事，因此很樂意幫助邱吉爾獲得蔣介石對延期的同意。

---

93 See text of Marshall's letter to Stilwell, dated May 27, 1944, in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63.

94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201-202.

95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363-364.

## 三、緬甸和美軍在太平洋地區挺進的關聯

然而上述戰略變化也製造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那就是，既然中國戰區重要性大幅減低，爲什麼史迪威還反而會增加壓力，逼迫蔣介石趕緊展開作戰？羅斯福又爲什麼在幾天之內會態度大變，轉而不遺餘力支持史迪威呢？

### (一)兩種不同的解釋

美國軍部檔案顯示，史迪威用盡力氣迫使蔣介石接受參戰計畫，已經和美國政府的態度有重大差異。這不但是因爲史迪威的計畫本身就有嚴重漏洞，也因爲它不符合美國爲擊敗日本而發展出來的新戰略思想。對戰勝日本而言，緬甸已經不關緊要。合理的解釋是，以史迪威的地位，他不至於對這個新戰略思想茫然不知。特別是他在開羅會議之後還逗留多日，而且和馬歇爾及其他美國將領保持密切接觸。假如他已經充分了解美國的新戰略思想，那麼他依然猛烈對中國施壓，就可能有另外兩個解釋。這兩個解釋可能並不互相衝突，有時反而是相輔相成。

第一個解釋是，史迪威體會到，這場緬甸戰爭是他洗刷1942年戰敗污點的最後機會。如果不發動第二次緬甸戰爭，他就永遠是日本人的手下敗將，永載史冊。爲了達到個人的目的，他不惜向中國政府許願，提供援助的數量超過了美國政府此時所願承諾的程度。史迪威同樣下定決心，不論使用什麼手段也要讓戰爭成爲事實。在這個意義上說，史迪威顯然不惜把對自己利益的考慮和他的自尊心，擺在美國總統指示的政策之上，而且橫下心來一定要達成目的。證諸1943年5-6月間，他對總統命令的陽奉陰違，這個可能性完全可能存在。

第二個解釋，可能也令人更加不安的解釋，則是史迪威的所作所爲，只不過是一個美國軍官竭盡忠誠執行美國的國家政策而已。前文所舉事實可以讓人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美國政府施加了那麼大的壓力，逼迫中國立即展開戰事，其目的並非如美國官方宣傳所言，是要提高由緬甸路向中國運送物資的能力，而是想利用中國軍隊達成美國所選定的目標。

事實上，在1943年底的情勢已經變得日漸明朗，除非同盟國能在亞洲其他戰區牽制大批日軍，阻止他們增援太平洋地區，否則美國就必須準備在太平洋戰場上承受重大傷亡。明顯的例子是開羅會議前夕的塔拉瓦(Tarawa)之役，兩天戰鬥中(1943年11

月20-22日），美軍傷亡3,300人，而日本防守軍死亡4,700人[96]。

如此血腥的對抗，一定加强了參謀長聯席會的決心，立即和英國及中國達成協議進行緬甸戰爭。就實際狀況而言，緬甸確實是綁住大批日軍的理想地點，阻止他們增援中部太平洋日軍占領的群島。換言之，美國需要在此關鍵時刻在緬甸挑起戰爭，並非讓緬甸可以增加對華的物資供應，而是讓美軍在中部太平洋地區可以減少遭遇的抵抗，而史迪威儘管也有他的私心，但是他此時的角色則是循規蹈矩的團隊成員而已。兩者之間可謂不謀而合。

一旦把緬甸戰爭和太平洋地區戰事合起來看，我們就可以把一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現象串聯起來，而看出它們內部深層的一貫性。我們也就能了解，爲什麼美國選擇用跳島戰略擊敗日本之後，不但沒有相應減少緬甸的軍事活動，反而是加強了緬甸的作戰。因爲不管中國是否願意，緬甸戰爭必定是美國加強太平洋攻勢的先決條件。事實上，依這個邏輯推理，如果能夠在亞洲兩個戰場同時進行戰鬥（緬甸、中國），就可以拖住更多的日軍。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正當中國和緬甸兩地的戰略價值降低之時，美國卻增強了在這兩個地方進行戰鬥的決心。它也能夠解釋，爲什麼史迪威可以完全違背蔣介石早先的指示，明確告訴史迪威只有權力動用X部隊，但是史迪威卻轉過身子脅迫蔣介石把Y部隊的指揮權也交出。最後，它還可以解釋，爲什麼史迪威和軍部如此強烈地反對蔣介石，想把一部分遠征軍召回中國保衛本土的企圖。簡單的說，如果中國把Y部隊留在中國境內保衛國土，它只不過能夠幫助中國，及早阻截日軍在亞洲大陸的進展而已。但是如果把它們放在緬甸作戰，則可以迫使日軍掉在東南亞的泥淖中拔不出腳來。

從Y部隊進入緬甸（1944年4月）到史迪威被召回（1944年10月）的這半年時間裡，美軍在太平洋島嶼間遭遇了極爲艱苦的戰鬥。瑪麗安那（Mariana）群島是太平洋中部地區的一個重要據點，其價值在於它可以用來作爲對日本最後攻擊的集結區。塞班（Saipan）和迪尼安（Tinian）等島特別適合作爲B-29重轟炸機的基地，可以直接對日本本土進行空襲。從1944年2月起，美國開始對日本進行大規模轟炸。即便如此，美國的跳島戰術仍然受到日本守軍頑強抵抗。在攻打塞班島前後三周中（1944年6月15日-7月9日），美軍登陸71,000兵力遭遇30,000日本守軍頑抗。儘管美軍有強大海軍和空軍砲火協同攻擊，但在第一天就陣亡2,000名士兵[97]。戰役終結時統計，美軍傷亡16,525人。至於

96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438-443.

97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p. 444-447. Also Norman Polmar and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Random House,

日本守軍則幾乎全部陣亡，只有1,000人倖存。隨後美軍進攻迪尼安島，情形雖然大爲改善，但依然叫美軍心驚膽顫。7月24日美軍陸戰隊以40,000士兵進攻，8月12日占領全島。美軍戰死317人，受傷1,550人。日軍戰死5,000人[98]。

總而言之，從1943年後期開始，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感受的壓力急速增加，當時美國關心的焦點已不再是同盟國如何能夠幫助中國，而是中國如何幫助美國了。一旦美國產生了這種心態，無論中國怎樣抱怨和抗拒，都無法阻止美國讓緬甸戰爭和一號作戰同時發生的願望。一號作戰的確並非美國所能控制者。雖然它也的確令蔣介石政府搖搖欲墜，但是客觀來說，也幫助美國防止日軍增援太平洋戰場的效果。但是緬甸戰爭卻是美國所能控制者，它逼日本把大軍集中在緬甸戰場，可以防止日軍轉用於太平洋島嶼，幫忙美軍減少傷亡人數。

## (二)史迪威的角色

這一連串發展也和史迪威態度的微妙轉變有關。從1942年7月到1943年底，史迪威的確盡其所能爭取英國、美國和中國，支持原始而大規模的緬甸戰爭方案。至於美國當時在太平洋地區發展出來的新戰略思想，史迪威大概沒有親身參與制訂[99]。但是照常理說，他是美國在亞洲大陸最高階軍事指揮官，對軍部戰略思想不至於一無所知[100]。軍部也應該向他提供有關戰略發展的訊息。

因此，德黑蘭會議否決開羅會議中英美三國達成的協議後，史迪威的態度突然大變，他開始大力推銷縮小規模的緬北作戰構想。換句話說，一直到1943年底前，史迪威都堅信原先的緬甸戰爭計畫是解決中國困境最有效的方案。但是到了1944年初，他卻放棄自己歷來的主張，變成美國新太平洋戰略的忠實執行者，盡其所能把中國最精銳部隊拉進緬甸戰場，全然不顧這個做法可能對中國產生的危害。也只有這樣，他想洗刷個人

(續)

1991), pp. 710-711.

98 Tinian距離東京1450空哩。美國在此建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機場，共有六條跑道，每條2哩長，寬度相當十條公路。1945年6月，B-29重轟炸機進駐這個飛機場，最終把原子彈投向日本。Polmar &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 p. 803.

99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November 21, 1956, p. 369. 此時太平洋新戰略的主要策劃人是馬歇爾、尼米茲和麥克阿瑟。

100 馬歇爾最遲在1944年5月26日已經以公文明確告知史迪威，今後打敗日本無需經由亞洲大陸向日本進行攻擊。見：Matl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p. 376. 但是以二人在開羅會議上的密切聯繫，馬歇爾當時就可能已經把這個新戰略思想通知史迪威。這也比較能解釋史迪威的態度在1943年底何以轉變得如此之快。

名譽的盤算才不致全盤落空。

純從軍事邏輯著眼，中國戰區的戰略價值既然降低，美國似乎更不需要爭取蔣介石在緬甸的合作。假如情況往這個方向發展，照理史迪威的心情應該感到輕鬆才對。他從來把自己看成是蔣介石不合作態度的受害者，現在終於可以吐口惡氣告訴中國人說，別再爲緬甸的事情糾纏不休了，因爲美國已經找到更好的打敗日本的方法，從此之後再也無需忍受蔣介石的無理取鬧了。正因爲理應如此，就讓人更是想不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居然還會一如既往繼續支持緬甸戰爭。只是進一步思考之後，我們才終於看出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箇中別有玄機。

李海海軍上將大概是美國軍事將領中，把這個矛盾說得最坦率的一個人。1943年12月5日，當他得知羅斯福已經通知蔣介石推遲開羅會議的協議時，李海已經擔心美國這項背信行爲將激怒蔣介石，停止對日抗戰。但其實更讓李海擔心的是，美國背信會對美國自己帶來負面影響。他寫道：「假如中國停止抗戰，麥克阿瑟和尼米茲在太平洋的困難局面將會變得更加嚴重。日本的人員將會得到釋放，轉而阻擾我們對日本本土的進攻。」[101] 從這些言詞可以看出，他最擔心的後果有兩個：一是蔣介石可能因失望而退出戰局，二是日本借此而加強在太平洋的防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一石二鳥的心理戰高招或許正是反守爲攻，主動指控蔣介石意圖以退出戰局來訛詐美國，藉此逼使蔣介石爲了澄清自己而不得不投入戰鬥？

無可懷疑，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新戰略，讓美國參謀長聯席會增加決心，在開羅極力說服英國和中國，支持在緬甸進行一個大規模全面性戰爭。一旦這個願望落空，最糟糕的結局是完全沒有戰爭。即使把戰爭向後推延六個月（到1944年11月）也不夠理想，因爲美國不願意把在太平洋攻勢也順延六個月。這個道理比較能夠解釋，爲什麼羅斯福本以爲戰爭延期能夠減少蔣介石的失望，而參謀長聯席會卻堅持戰爭必須盡快發動，以滿足美國本身的需要。即使延期六個月，也會增加美國在太平洋戰區的人員傷亡。

有趣的是，同樣的情勢發展卻讓英國軍方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英國參謀長在開羅會議時就已經指出，既然美國對日本的大進攻將會從太平洋地區發動，那麼就完全沒有必要對緬甸戰爭作出龐大投資。由於英國人本來就不關心中國利益，因此他們最

101 William D. Leahy, *I Was There: The Personal Story of the 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s Roosevelt and Truman Based on His Notes and Diaries Made at the Time*(New York: Whittlesey House,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0), pp. 213-214.

主要的考慮是，千萬不要讓緬甸這場小戰爭分散他們投入歐洲大戰場的資源[102]。

事實上，在蔣介石屈從美國壓力並把Y部隊送到緬北戰場後，美軍已經對太平洋戰略作出一個決定性的行動。1944年2月，美軍占領馬紹爾，參謀長聯席會準備進攻瑪麗安那群島。5月4日，聯席會重申決心，美軍要在菲律賓、臺灣和華東沿海登陸。此時聯席會對中國的興趣是利用華東建立重轟炸機機場，而不是利用中國軍隊從事地面反攻戰鬥。循著這條新思路，它給史迪威的指令是把密支那視爲緬北戰爭的重要目標。指令也說明史迪威的任務是打通緬甸到中國的通路，並且在中國只准許從事能夠幫助太平洋戰爭的活動[103]。

換句話說，史迪威所擬的緬甸戰爭原始計畫是傾全力援助中國，而現在大部分都已經被擱置。代之而起的是把中國軍隊當作棋子在緬甸戰場來使用，捆綁住大批日軍。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任何想要把部分軍隊從緬甸戰場召回保衛自己國土的要求，都一律會被指責爲存心破壞，而的確也是破壞了美軍的妙計。事實上美國給自己打造了一個最理想的局面，讓龐大日本駐華占領軍爲一號作戰而奔走忙碌，同時又把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海陸空軍機動精銳部隊，悉數引誘到偏遠的緬甸北部。這樣就大大削弱了日本對太平洋島嶼的增援，及其在菲律賓與臺灣的防務，便於美國進攻。

說明了以上背景後，就更容易了解爲什麼美國願意花那麼大力氣，下定決心要把中國推進緬甸這場對中國沒有太多好處的戰爭中，儘管美國充分知道中國此時進行緬甸戰爭顯屬違反自己的國家利益。在象棋戰略上，棋手在處於劣勢時，有時不得不採取「棄俥保帥」的策略，而此時美國的姿態，卻似乎是在逼迫中國採取「棄帥保俥」的策略。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軍方改變了它對中國戰區一向漫不經心的態度，突然下定決心要「幫助」中國，而其姿態比中國自己還要積極熱心。其中奧妙必須加以深思。

對於這些不尋常現象，一個說得通的解釋是，美國軍方對緬甸自有盤算，而中緬印戰區情勢的發展正中美國軍方下懷。在中國本土上，日本人正花大力氣要消滅國民政府，爲此甚至動用長期屯駐滿洲的重兵。在日軍凌厲攻勢之下，幾百幾千萬中國人民所受的災難是中國政府自己的事，無需美國軍方去關懷或是處理。說得冷血點，日軍在華的戰鬥拖得愈久，涵蓋面愈廣，它就愈無法加強太平洋島嶼的防務，而這些島嶼正是美軍此後幾個月準備攻擊的目標。

這就解釋了爲什麼美國軍方理直氣壯，要通過羅斯福的口告訴中國，既然中國軍

102 Minutes of the CCS's 135th meeting, December 5, 1943, folder number unmarked, MFA.

103 Tuchman, p. 571.

隊是美國裝備和訓練的，那麼就應該打美國人要他們打的仗。美國軍方對於中國軍隊的看法，其實和財政部長摩根韜1942年初所提出的建議如出一轍（見第2章）。摩根韜想用直接支付士兵薪餉的方式，去指使中國軍隊作戰，這個計畫之所以失敗，是因爲其雇傭兵的色彩委實過於明顯，使蔣介石無法下嚥。軍部改用武器配備的方式，高唱同盟國合作的調子，但又夾雜著以全面停止援助爲威脅的做法，卻頗爲成功。但是軍部做法的雇傭兵性質，依然隱約可見。

對日本人來說，他們打從1942年秋天起，就已經得知同盟國對緬甸的意圖，原因是同盟國不斷對外散布它們的意圖。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儘管英美兩國經常批評中國政府不能保守軍事機密，但是它們自己的官方文件更經常洩漏中國遠征軍的番號，因而幫助日本軍方推測這些軍隊的作戰能力。此外，美國駐華軍事記者，在從美軍來源得到中方軍事計畫和動態後，又習慣性地在沒有加密的電文裡向國內發送，很容易就被日本截收，爲其提供寶貴情報[104]。由於這些因素，日本有足夠時間集中它在東南亞的精銳部隊，將之轉送緬甸戰場。

1943年初卡薩布蘭卡會議及同盟國會後的宣言與活動，深受日軍重視，認定同盟國必將對緬甸進行全面進攻。根據日軍情報顯示，同盟國在印度的英美印度空軍，不但數目在增加（從1942年的270架增加到1943年的400架），而且在印度東部的空軍基地也大規模擴張。這些跡象都使日本大本營相信，日軍需要7-8個師團才可以抵抗，因此它採取的相應措施，是開始加強泰國和緬甸間鐵路的連接以增加運輸量[105]。

日本的備戰努力又受到英美兩國另外兩種幫助。一是它們屢次延遲開戰時間，給日本充裕時間備戰，二是它們沒有致力於攔阻日本海上運輸，讓日本順利地加強陸上防務。日軍在1943年3-4月份成立緬甸方面軍司令部，把18、31、33、56師團編入第15軍的戰鬥序列，另外將55師團直屬方面軍司令部。而且還繼續從泰國派送士兵（15,000人）開往緬甸[106]。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在1943年6月的情報指出，中國軍隊在雲南有21個師。英國印度總兵力爲70萬。全印度境內的空軍爲800架飛機（英500，美300）。面對如此龐大的同盟國部隊，日軍的因應之道是再增加兩個師團（31、54師團）的兵力，並開始儲存大約25萬噸的補給品[107]。爲了加緊建設接通泰國和緬甸間的鐵路，1943年，日軍投入士兵一萬人和當地勞工及俘虜共135,000人，參加工作。鐵路全長415公里，費

104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1月27日。

105 《大本營陸軍部》（6），《日軍對華作戰紀》，第24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122-133。

106 同上，449-460，467。

107 《大本營陸軍部》（6），《日軍對華作戰紀》，第24冊，頁953-962。

時8個月完成(1943年12月25日完工)[108]。到了1943年9月底，日軍在緬甸部隊已經有7個師團，其配置大致是：1. 緬甸中北部薩爾溫江正面——31、33師團。2. 緬甸中北部胡康谷地及密支那正面——18師團。3. 雲南怒江正面——56師團。4. 曼德勒附近——15軍司令部直屬部隊。5. 西南沿海－阿恰布方面—— 54、55師團； 6. 仰光港——緬甸方面軍司令部部隊和第五飛行師團[109]。顯然，日軍大部分兵力都是配備在緬甸中北部，準備對付中國軍隊。而且更多的補充士兵來自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個作戰部隊[110]。總的來說，日軍產生了防衛過度的效果，而這也正是美國想要達到的效果。

日軍在增強防衛的同時並不是坐以待敵，而是意圖發動一連串主動出擊，破壞同盟國的攻勢計畫。1943年6月，緬甸方面軍在仰光港召開會議，研究如何對付同盟國即將發動之反攻。會議討論主題是主動進攻印緬邊區的印普哈及阿拉堪山區[111]。因此，1944年初，日軍就展開一連串攻擊行動。這包括以空軍和陸軍打擊緬甸阿恰布(1月)，掃蕩潛入緬甸中部的溫蓋特部隊(2月)，並使其在承受重大損失後向印度撤退(3月)。3-4月，55師團在阿恰布的印典地區殲滅英印軍。第四飛行團開始支援緬西的阿恰布地面作戰。5月中旬第55師團將阿恰布地區的英印軍趕出緬甸之外。在3-4月間，緬甸方面軍司令部和第15軍司令部改組完成。原中國派遣軍參謀長河邊正三中將爲緬甸方面軍司令官，原18師團師團長牟口廉也中將爲第15軍司令官。日本空軍增加爲第三、第四、第五飛行團。6-7月，第15師團從中國戰區調往緬甸。中旬又把正在運送往爪哇的54師團緊急改送到緬甸。8月緬甸宣布獨立，並向同盟國宣戰。從7月開始，日軍開始積極準備印普哈作戰，到了12月，日軍印普哈作戰計畫進入最後階段[112]。

以上簡單的歷史回顧說明，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日本得到充分準備，可以頑強抵抗來犯的中國遠征軍，而中國軍隊則陷入苦戰。其結果是，美軍在太平洋的跳島戰爭能夠順利進行，並承受較輕的傷亡率。特別是上文提到的，緬甸戰場不但從南洋(和中國戰場)各地吸引了大批善戰的日軍師團，而且還從本國運來了大量的補充兵。這個歷史說明，美軍在太平洋島嶼上的大幅進展，和中國軍隊在中國及緬甸兩個戰場上的對日苦戰，是同時進行的。它們並不是在相隔幾千里的幾個戰場上，碰巧同時發生的孤立事件，而是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密因果關聯，甚至精心安排的。

---

108 《大本營陸軍部》(7)，《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25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頁89-90。

109 同上，頁115-117。

110 同上，頁477-478。

111 同上，頁101-104。

112 陸海軍年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第43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大事表。

1944年6月15日，美軍登陸瑪麗安那群島的塞班島，三周後占領全島，開始修建飛機場，讓B-29轟炸機準備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從此之後，太平洋戰略成爲擊敗日本的行動指南[113]。與此同時，中國作爲轟炸日本的空軍基地的重要性急速滑落。因此，在史迪威完成裝備、訓練和改造中國軍隊之前，中國軍隊其實已經發揮了一個重要作用，那就是減少了美軍在太平洋各次戰役中的傷亡率。

或許從美日雙方在遠東地區長期使用兵力的消長，最能看出美國戰略的成果。首先，在太平洋地區，日本的作戰部隊從1942年8月的4個師，急速增加到1943年初的8個師，但是從此之後增援速度減慢，1944年初爲11-12個師，到1944年6月（中國遠征軍入緬之時）爲20個師，達到頂點。相對而言，盟軍（美軍）在太平洋的兵力，1942年8月爲2個師，1943年初已有8個師，和日軍扳成平手。此後開始開始急速增加。1944年初爲23個師，1944年6月跳躍爲28個師，已經取得絕對優勢。而日軍總數從1944年8月份開始減少，到1945年6月只剩下3個師，而盟軍仍持續增長，到此時已經增加到34個師。換言之，逐日增加的美軍不斷攻擊外援無繼而急速損耗的日軍，在島嶼戰爭中幾乎是在消滅甕中之鼈。其次，在緬甸戰區，日本的兵力卻在增加。1942年底，日軍在緬甸只有4個師，但是到了1944年6月，卻增加到10個師。而且一直到1945年5月份，大致維持9-10個師編制。但是美軍在地域遼闊的中國－緬甸－印度戰區則總共只維持約20萬軍事人員（多為空軍和地勤人員，極少陸軍），這個數字不足美軍派赴海外戰場人員總數的百分之四[114]。因爲主要的作戰任務都由中國軍隊承擔。

## 肆、對緬甸戰爭的另外一種評估

本章從戰略層次對緬甸戰爭提出分析，目的在就1944年緬甸戰爭提出一個和學術界傳統看法並不一致的觀點，立論基礎有二，一是對美國資料的重新檢討，一是介紹新推出的中國資料。大部分現有著作在檢討第二次緬甸戰爭時，都強調一個重點，那就是戰爭自始至終都是爲了幫助中國。在某些作者的筆鋒下，美國政府，特別是史迪威，從來都是竭盡所能地想把更多的軍事物資送到中國，乃至迫不得已必須針砭中國領袖的短視，尤其要把他們從對自己國家利益漠不關心的麻木心態中拯救出來。這些著作的共同點，就是批評蔣介石，稱許史迪威和羅斯福。在這種處理歷史的方式背後，

113 Tuchman, p. 596.

114 John Ellis, *Word War II – A Statistical Survey – The Essential Facts and Figures for all the Combattants*（NY: Facts On File, 1993）, pp. 191-197, 229.

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基本假設，那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的國家利益緊密吻合，只是美國領袖比中國領袖的頭腦更清楚，更具戰略遠見，行動也更積極。可惜中國領袖不但不領情，反而處處加以掣肘。

但是實情比這個說法複雜得多。重溫1942-44年間第二次緬甸戰爭歷史時，有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 一、中國承諾的內容

以往史學界關於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長期流行一個先入之見，那就是，中國政府一貫推卸責任，讓英美兩國出力打通緬甸路，然後坐享其成。本章所述歷史事實顯示，中國政府一直急切盼望進行第二次緬甸戰爭，積極爭取參加同盟國共同制訂各階段的作戰計畫。中國領袖們普遍急切求戰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因爲他們在缺乏外援情況下，不但勝利無望，而且全民每日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經濟可能崩潰，政府可能垮臺，社會可能瓦解，而唯一可以解除這些痛苦的辦法就是大量引進外援。在戰爭漫長的準備期間中，中國肯定有其辦事無能的表現，但是從沒有食言而肥，要求撤回自己承諾的兵力貢獻或要求延期開戰。因此某些史學家在指責中國不熱心參戰一事上虛耗筆墨，實無意義。但是中國政府在戰爭的立場上每每與英美兩國不合，又是事實，其原因是中國感到對於緬甸戰爭的戰略或是時間表制訂毫無發言權，而一直被英美兩國排擠在決策門外。

更有進者，蔣介石對於如何打這場戰爭的立場前後一致。他從地形、後勤和部隊的機動性等方面看到敵人優勢，相信同盟國必須攻打緬甸南部，切斷敵人海上後援，才能在陸地上擊潰敵人。這個主張也正是史迪威本人最初所極力堅持者。事實上，蔣介石對美國參戰所提出的要求，遠遠低於其他中國將領們想要提出的要求[115]。至於中國自己的承諾，蔣介石提供當時中國戰鬥力最強的部隊，包括史迪威在蘭伽直接訓練及美國在雲南裝備和訓練的軍隊[116]。

蔣介石歷來主張同盟國在緬甸戰場上應該通力合作，各盡所能，打一場全面戰爭。這個計畫在戰術上看起來合情合理，因爲它和同盟國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計畫極爲相似。在歐洲，英美兩國首先對德國進行大規模轟炸，盡量破壞敵人的防禦工事和降低守軍的抵抗力，繼之是海軍艦艇漫天蓋地的砲轟，最後才是登陸戰，並以空降部隊輔佐之。這樣的軍事邏輯應該同等適用於亞洲戰場，也是美軍本身攻擊太平洋島

115 王世杰日記，1943年2月25日。

116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33.

嶼的模式。中國軍隊進入緬北作戰以後，如果英美海空軍也展開緬南作戰，肯定可以逼迫日軍處於劣勢，正如德軍在歐洲處於劣勢一樣。這就是蔣介石作戰計畫的主要內容。

## 二、史迪威和中國遠征軍的貢獻

緬甸戰爭勝利的功勞，相當一部分當然應該歸於史迪威和他屬下的美國軍官。這場勝利證明了史迪威的練兵才能和統御有方。但是如果把全部功勞都歸給美國人，而又把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官員描繪成是一群不合作者或是破壞者，則有失公允。美國軍方在蘭伽訓練基地的成就，有目共睹，的確可圈可點，但是他們在雲南的貢獻相對就有限得多。因爲這些部隊在中國指揮之下，只有少數美國官兵參加訓練工作。即使是美國軍人，也應該有所區別。如前文所指出，史迪威從1942年6月開始，就一直熱心籌劃第二次緬甸戰爭，並對訓練工作做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在1943年12月立場的轉折和1944年1-4月的冒進，卻也不必要地增加了中國軍隊的傷亡率。5月雲南遠征軍進入戰場，5-6-7月三個月戰事肯定是史迪威最好的表現。但是1944年8月他開始度假（見第10章），9-10月集中精力在重慶奪權（見第10、11章），最遲在10月底已經徹底脫離戰事。此後戰爭還進行到1945年8月，繼任者索爾登（Daniel I. Sultan）將軍和一批新的美國軍官們，他們也對緬甸戰爭作出了自己精彩的貢獻。這筆功勞帳不可以籠統地算在史迪威身上。緬甸（史迪威）公路或許可以說是史迪威個人的產兒（也顯示出蔣介石的厚道），但是第二次緬甸戰爭卻肯定不是。

在緬甸戰爭過程中，中國軍隊（X和Y部隊）一再投入激烈戰鬥，而且遭受重大傷亡，但是勇往直前，從來沒有出現任何不穩或是潰逃跡象，主要原因是這些部隊的司令官（如孫立人、廖耀湘、龍天武、潘裕昆等）都是重慶國民政府的忠貞幹部。假如他們的背景是典型的地方軍系，那麼打硬仗的命令恐怕容易引起懷疑，也可能導致抗命。而這正是蔣介石在一號作戰中所遭遇的困難。這些英勇中國將領在戰場上發揮的作用，絕不應該被美國軍官們所掩蓋。而他們所領導的士兵們的艱苦作戰，甚至爲國捐軀，更是應該受到歷史的認可和尊重。

## 三、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後遺症

### （一）英國因素

雖然英國在兩次緬甸戰爭中的貢獻都相當有限，但是它們在心理上，卻超乎尋常地影響了中國對第二次緬甸戰爭的態度，以及中美的雙邊關係。

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談到的，即使在中國參加第一次緬甸戰爭之前，蔣介石就擔心英軍不可寄以信賴。英軍後來在戰場上的表現，果然印證了他最壞的想法[117]。蔣介石絕對相信，中國軍隊所以在緬甸慘敗，首要原因就是英國人不肯認真作戰，不能維持紀律，不和中國友軍誠懇協調。尤其可惡者，在從戰場撤退之前，竟然對馳赴救援他們的中國軍隊秘而不宣[118]。第一次緬甸戰爭的慘敗，在中國人民之中引起絕大震驚，讓蔣介石相信，如果再遭受一次同樣失敗，則必將動搖國本[119]。蔣介石這些不滿情緒最能夠說明，爲什麼他在第二次緬甸戰爭之前，對英國人如此不信任，和爲什麼他一定要英國人提出絕對保證後，才肯讓中國出兵作戰。

事實上，蔣介石對英國人不信任程度之強烈也殃及中國官員，因爲他連稍有親英傾向的中國官員也一律予以敵視。最好的例子就是王世杰。當蔣介石懷疑王世杰在處理印度事務上對英國過於平和時，他就把王世杰趕出親信圈子[120]。即使是妻舅宋子文也不例外。當蔣介石認爲宋子文在處理財經問題上，有信賴英國專家的跡象時，立即給他一頓嚴詞訓斥[121]。1942年底，宋子文自動請纓赴英國爭取借款，蔣介石憤怒地加以拒絕，並指責宋子文出賣中國的國家原則：「爲爭其個人面子，而置外交方針於不顧。」[122]蔣夫人對於英國的嫌惡感與她丈夫基本相同。

中國在遭受第一次緬甸戰爭慘敗之後，所以還能維持和英國的同盟國關係，只是爲了兩個理由：一是兩國共同與日本爲敵；二是中國指望美國可以作一個公平可信的盟邦，保護中國利益，不被英國出賣。事實上，蔣介石對於英國的感覺和對日本的感覺相差不遠。因此，如果美國還想把這兩個國家都留在同盟國裡面的話，必須耗費心力去維持中英之間關係和中國對美國的信任。但是美國政府對於這項工作始終掉以輕心。

## (二)史迪威因素

在中國人眼中，史迪威在第一次緬甸戰爭中的表現，是導致中美關係事後急劇惡化的最大原因。蔣介石固然對美援數量不足感到失望，但是真正令他憤恨難抑的是史迪威個人的行爲，讓中國處境變得比稍前沒有美援時更爲險惡。

---

117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6-661。
11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2年4月29日。
119 蔣介石與居里會談記錄，1942年7月26日，《戰時外交》(一)，頁656-661。
120 《蔣總統事略稿》，1942年6-10月。
121 同上，1942年6-10月。
122 同上，1942年12月18日。

前後兩次緬甸戰爭當然是加深史迪威和蔣介石衝突的最根本因素。回顧第一次戰爭之前，他們兩個人還沒有足夠時間熟悉對方作風，兩人也都對自己的軍事領導才能充滿自信。蔣介石在他過去15年裡，與各式各樣國內地方勢力的鬥爭中，磨練出來的成就，都超過同時代其他中國軍事領袖們。相形之下，史迪威的名望是建立在訓練工作方面，當時正等候生平第一個機會，能夠把自己長年累積的想法在戰場上體現出來，證明自己同樣是一位傑出的大軍指揮官。當機緣突然把這兩個人擺在一起時，任何一方都很難輕易佩服另一方的統率能力而自甘居下風。而第一次緬甸戰爭卻偏偏使史迪威的威信在中國人眼中大受損傷。

因此要持平評估第二次緬甸戰爭的話，還必須從兩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是蔣介石對於戰爭的強烈願望，另一方面是他對史迪威再度成爲中國遠征軍指揮官的強烈疑慮。正如以前幾章所述，打從1942年6月以來，蔣介石對是否要撤換史迪威一事一直猶疑不決。雖然他在1944年9月以前始終下不了決心，但是猶疑不決的心情，已經嚴重影響他對緬甸戰爭的談判態度了。

## 四、中美兩國國家利益的相輔和相悖之處

設若中國在1944年初堅決拒絕參加緬甸戰爭，後果將會如何？

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的經濟和民心士氣將承受嚴重打擊，軍隊改革重整的希望將會破碎。但是既然同盟國的勝利幾乎已經在望，蔣介石政府應該可以躲在重慶挨到戰爭結束。如果他選擇了這條道路，就會產生一個重大軍事後果：因爲日本爲一號作戰和緬甸戰爭動員了大約在60萬到75萬士兵。即使它只能把其中一小部分抽送去增援太平洋島嶼，也將使美國登陸部隊付出更大的傷亡代價。

換句話說，每個國家不同的選擇，都會對其他同盟國家產生不同的後果。光指責中國不願意爲了同盟國共同利益去打緬甸戰爭，本身就是一個過於簡單化的思考方式。即使在盟邦之間，各國仍然有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也不例外。不幸的是，美國政府在和中國打交道時，特別是在自己的官方宣傳上，往往表現一種趨勢，把明明是美國的利益解釋成爲中國的利益，而且在中國偶爾不附和這種論調時，還會提出嚴苛指責。

實事求是地說，美國利益和中國利益，既有其一致處，也有其衝突點，主要決定因素是誰付出何種代價和得到何種報償，以及在特定時刻這種報償對哪一國更重要。幾乎從同盟關係建立一開始，兩國政府就不斷有分歧，這本屬正常，毋庸諱言。中國政府可以了解美國重歐輕亞的戰略思想，這個思想對於歐洲民主國有利，但是對中國

卻是失望。蔣介石小心翼翼地想運用中國有限的軍事力量打勝仗而不打敗仗，這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他要求英美兩國爲緬甸戰爭作出合理貢獻，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至於緬甸戰爭本來也是同盟國應該共同分擔責任的戰爭，美國人也同樣想從這場戰爭中得到好處，美國政府和後來某些研究者，把它說成是美國對中國無私的援助，實在無補於歷史真相的探討。

史迪威一直信誓旦旦，強調他的出發點純粹是要促進中國的國家利益，而緬甸戰爭是唯一能夠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他對於自己動機的純正性和崇高性充滿信心，以致他把來自中國領袖的任何異議，一律看成是無知、愚蠢和不愛中國的最好證明。明確地說，第二次緬甸戰爭原始計畫和目標的確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假如這個戰爭按照原計畫忠實而又及時地發動的話，它會爲中國的軍事重建工作奠定一個堅實基礎，接受美國武器和訓練的幫助，提高戰鬥力，並且幫助更多的租借法案物資能夠源源不斷地由陸路進入中國內地。假以時日，中國有機會成爲在陸地上反攻日本的根據地，和在空中攻擊日本本土的出發點。它也有可能提高中國在戰後的軍事力量和外交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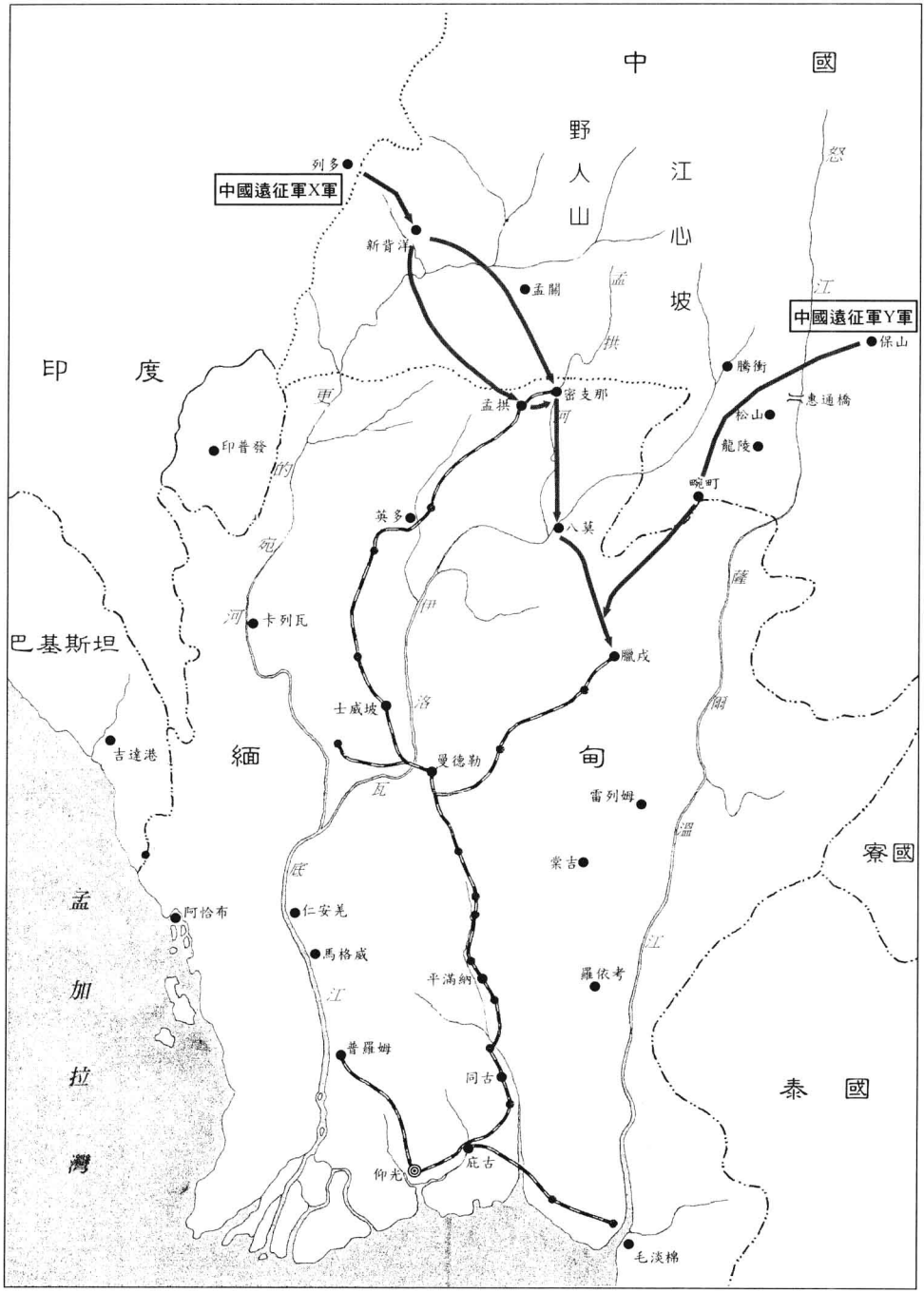
然而，即使一切都能按照計畫進行，以上這些願望也只能等到1946-1947年才能充分實現。但是在1944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已經開始了長達九個月的對中國經濟、社會、政府，和軍隊的殘酷打擊。在這個時節，中國只有一個凌駕一切之上的國家利益，那就是阻止日軍的猛烈攻勢，保護成百上千萬的中國人民，和防止中國的全盤崩潰。而正在這個關頭，最能擔當這個責任的中國部隊，卻在史迪威和美國政府的驅策之下開赴緬甸作戰。

這個發展所說明的是，緬甸戰爭作爲是亞洲的第二戰場，它在基本戰略原則上，和歐洲的第二戰場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歐洲戰場上，英美兩國決定開闢第二個戰場的目的，是要舒緩德軍在東戰場對蘇聯紅軍所施加的壓力。但是在亞洲，英美兩國卻對中國施加極端的壓力，把它的軍隊分割使用，進行兩地作戰。亞洲的第二戰場不但沒有減輕日軍在中國境內的壓力，反而使之更爲加劇。簡潔地說，第二次緬甸戰爭在1942年初次設想時非常合理，但是到了1944年初實際執行時，它的性質已經大變。從戰術層次而言，它無疑是一場輝煌勝利，這可以從敵軍傷亡和同盟國收復失土的數字便可看出。但是在戰略層次上，它只是爲美國帶來了一場大勝利，讓英國撿了一個大便宜，但是對中國卻造成了一場大災難。

說到最後，第二次緬甸戰爭最初在史迪威和蔣介石的共同構想之中，應該是最合情理的方式來增加美國對華的援助。陳納德第14航空隊的成立，美國的長程重轟炸機

的派駐中國，中國30個陸軍師的裝備和訓練計畫等等，都是這個宏觀計畫中的重要部分，可以經由戰爭而逐一實現。但是情況從1943年就發生了變化。緬甸戰爭的規模和時機，不再是由中國需要多少美國物資援助和其迫切性來決定，而是由美國和英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需要來決定。因此，戰爭計畫的幾度修改，開戰日期的一再拖延，英美兩國承諾的屢次反悔，都是只由英美兩國來決定。雖然不少史學著作曾經嚴厲指責過中國政府沒有按照時間表來完成準備工作，而這一點也自有其事實上的根據，但是英美兩國的舉棋不定才是一個重大的導因。事實證明，當英美兩國一旦作好了他們自己的準備時，它們完全有辦法迫使中國人立即遵照它們的意旨行事。而且中國軍隊在戰場上的表現，也證明它們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紮實，因此才能夠打敗敵人。

緬甸戰爭終於在1944年春天發動，這一事實證明了以上論點的正確性。當中國正在被日軍一號作戰打得體無完膚之際，僅是指望把物資經由緬甸送進中國已經不能救燃眉之急。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避免全盤瓦解。因爲假如中國果真不幸瓦解了，那麼美國的物資援助根本無處可送。但是英美兩國對於這麼簡單的道理卻無動於衷，它們依然決定在緬甸北部發動戰爭，是因爲只有這樣才能解救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燃眉之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緬甸戰爭完全符合了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擬訂的全球戰略，而不是促進中國戰區的利益。說白了，第二次緬甸戰爭其實是一個英美兩國的作戰計畫，但是需要中國兵力來使之實現。說起來也甚爲有趣的是，這種情況相當符合美國領袖們在太平洋戰爭一開始時就提出的基本構想，那就是，所謂中美軍事合作的內涵，就是由美國提供領導，由中國提供人力。由美國人發號施令，由中國人俯首執行。在這個狹窄的意義上來說，美國的運籌帷幄或是「理國謀略」(statecraft)實屬上上乘。




第二次緬甸戰爭中國遠征軍進攻緬北路線

# 第十章
# 美國爭取對全部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 壹、念頭的起源

### 一、羅斯福的官方理由

1944年7月初，羅斯福突然要求蔣介石，授予史迪威指揮全部中國軍隊的權力，使中美軍事合作關係達到一個新轉捩點。依照羅斯福說法，他提出這個極端要求只有一個動機，那就是要挽救中國免予全盤崩潰。他說明他雖然非常清楚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但是鑒於史迪威有超人的判斷力、組織和訓練才能，並在中國戰區建立了輝煌戰功，因此只有他才能改變中國的命運。爲了增加對蔣介石的壓力，羅斯福宣布即將擢升史迪威爲陸軍上將，要求立即把史迪威從緬甸戰場召回，讓他指揮所有的中國軍隊，阻止敵軍前進[1]。

一個盟邦領袖要求另一個盟邦拱手讓出它全部軍隊的指揮權，交由一個外國軍官來行使，這在世界史上的確超乎尋常。因此，不可避免的問題是：羅斯福提出這種要求的主要原因，真是擔心中國崩潰嗎？還是另有隱情？提出之前他到底曾否仔細考慮它的後果？蔣介石對這個要求的反應如何？史迪威本人又打算如何行使這項權力？

關於這一連串重要問題，美國學界似乎並無意深究，他們只是對於羅斯福的說詞照單全收，而且認爲美國軍事領袖，是對全局深思熟慮後才慎重提出，絕非衝動魯莽。根據這個說法，羅斯福提出要求純粹是爲了解救中國危急，而提出的時間則是緬甸戰局已經達到正常進展階段，可以允許史迪威把注意力轉移到拯救中國的艱巨工作上

---

1 FDR letter to CKS, July 4, 1944. Verifax File 2563, Item 2559, Part 2. MFA.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中文本，1944年7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634-635。

來，而中國的危機又到了最緊迫關頭，不容拖延。有一位學者直接了當地說，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拯救中國危機的方法，不是把美國軍隊送去中國解圍，而是把史迪威送去中國，讓他統領所有中國軍隊，並賦予全權啓發和指導中國的戰鬥行動[2]。史迪威本人記錄給人的印象也是他既無私念，又不曾暗中操作，只不過服從華盛頓上級的命令行事而已[3]。簡言之，一旦史迪威在緬甸戰爭中勞苦功高地爲勝利奠立了穩固根基後，便馬不停蹄地趕到中國戰場，承擔更爲艱巨的軍事任務。這其中隱含的意義是，美國和史迪威本人對中國真可謂恩深義重。

的確，羅斯福提出要求之時，正是中國處於極端危急的狀態之下。日軍的「一號作戰」是日軍自1938年以來在中國境內發動的最大規模攻勢。它在1944年4月動員了將近50萬軍隊，從河南開封（第一期）渡過黃河，沿平漢鐵路南下，攻打湖南（第二期）和廣西（第三期）。中國軍隊無法阻擋敵人銳利攻勢，有些軍隊表現得顢頇無能，貪生怕死，極度可恥（河南守軍急速崩潰，並且被地方民團和土匪繳械，指揮官落荒而逃），有些軍隊卻能英勇犧牲，頑強抵抗，可歌可泣（湖南守軍，特別是方先覺的第10軍堅守衡陽四十餘日，城破時彈盡援絕，傷亡殆盡），但是終究無法阻攔敵軍進展。6月，日軍開始威脅廣西和貴州，甚至可能進攻雲南和四川。這些省份都是中國抗戰的最後根據地，是美國第14航空隊對中國戰區地面作戰部隊進行戰術支援的基地，也是未來美國長程重轟炸機預備對日本進行戰略轟炸的基地，當然還是中國接受駝峰空運接濟物資的終點站。因此，如果日軍一旦占領這些省份，重慶政府勢將瓦解，而美國勢將無法在華進行軍事活動。毫無疑問，中國亟需美國施以援手。

然而羅斯福此時對蔣介石提出要求的真正原因，遠比他在電文中所稱的要複雜得多，甚至可能比他本人所知道的還要複雜得多，因爲其中包含的隱情可能並非總統所能掌握。同樣地，傳統學術著作在處理羅斯福這個要求時，也以曖昧態度處理許多本來應該明確說明的事情，或是乾脆避而不談，因此妨礙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追求。

誠然，羅斯福在1944年夏季知道中國軍隊節節挫敗，因此可能會主動提出某種相應措施。但是有兩個其他因素對他產生重要影響：一是副總統華萊士（Henry A. Wallace）訪問中國後提出的嚴重警告，一是史迪威在印度和英國軍方相處得水火不容。就這二者而言，羅斯福當然充分了解前者的內容，但是未必體察後者的重要性。

---

2 Tuchman, p. 596.

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ly 2, 1944, p. 243. See also: JWS t-w diaries, July 2, 1944.

## 二、華萊士的報告

華萊士在1944年6月底訪問中國，曾和蔣介石多次長談[4]，6月28日他在返國途中從印度向羅斯福提出警告，強調一號作戰對中國的破壞程度，要羅斯福作好心理準備，除非同盟國立即採取斷然行動，否則整個華中地區，包括美軍空軍基地，將於3至4周內陷入日軍手中，蔣介石政府將遭受空前的政治和經濟衝擊，中國將失去對同盟國的軍事價值。

華萊士指出，如果及時採取正確步驟，危機也可以變成轉機，讓一切能夠有新的開始。當他談到解決方案時，華萊士完全無視於史迪威的存在，和他歷來在中國戰區推行的政策。華萊士告訴羅斯福說，此時需要的是一個才能優異的美國將軍，並把政治和軍事的權力同時委託於他一人。

華萊士明白指出，這個人絕對不應該是史迪威。因爲蔣介石已經明白告訴華萊士，他無法信任史迪威，而華萊士在此次訪華行程中，也根本不願安排和史迪威會面。他也不認爲目前在中國戰區服務的任何其他美國將領，足以擔當此一重任。華萊士心中的理想人選是：1. 可以贏得蔣介石的信任，可以向蔣介石作有關政治和作戰的建言；2. 有能力指揮在華的美國軍隊；3. 有能力提高中美兩國的軍事合作。華萊士同時認爲這位美國將軍在涉及政治問題時，必須有權直接和白宮保持聯絡。華萊士的建議是，羅斯福任命魏德邁將軍(Albert C. Wedemeyer)擔任此項職務[5]。

華萊士是戰時訪華地位最高的美國領袖，親眼看到中國的危急，他的報告高度強調了中國局勢的嚴重性，以及中美軍事合作的必要性。但是他明確表示，史迪威無法擔當大任[6]。還有一點該注意的是，雖然華萊士敦促羅斯福接受蔣介石的請求，派遣總統個人代表前赴中國，但是他卻並沒有主張這位美國軍官必須有權指揮中國軍隊。

## 三、史迪威和英國人關係的日益惡化

與此同時，在幾千里以外，印度的另外一個發展每天都令馬歇爾頭痛不已，其根本原因就是史迪威在東南亞戰區，已經到了無法立足的地步。回想蒙巴頓將軍初上任時，還曾力保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職位，但是不久之後，卻發現自己愈來愈無法忍受史迪威的行事作風。馬歇爾心中非常清楚，過錯多半出在史迪威身上，因爲他之前就

---

4　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21-24日。

5　Wallace message to FDR from New Delhi, June 28, 1944, Verifax File 2194, Item 2505, MFA.

6　有關華萊士建議撤換史迪威，以及高斯大使和馬歇爾的參與，見：Tuchman, pp. 594-595.

曾經警告過史迪威，要小心處理和蒙巴頓的關係。但是史迪威不以爲意，反而經常出口譏諷蒙巴頓[7]。

早在開羅會議時，蒙巴頓已經想趕走史迪威，但遭到羅斯福拒絕[8]。細算起來，此時離蒙巴頓在宋子文面前支持史迪威(10月)還不足兩個月，可是他已經悔不當初，自認判斷錯誤。但是蒙巴頓不是蔣介石，不會因爲碰壁而就此罷手，反而是鍥而不捨。1944年6月11日，蒙巴頓回倫敦述職時，又向英國政府舊話重提[9]。到了6月22日，史迪威終於知道蒙巴頓真是想把他趕出東南亞戰區，並且已經向馬歇爾提出正式要求。可是即便如此，史迪威本人似乎還沒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10]。

不過對馬歇爾而言，蒙巴頓幾近最後通牒式的請求令他絞盡腦汁。東南亞戰區成立之初，馬歇爾自己就曾創下先例，把自己捆綁住了。當時邱吉爾提議要英國軍人道格拉斯(Douglas)元帥擔任第一任司令官，但是馬歇爾堅決反對，理由是道格拉斯明目張膽地聲稱他不喜歡美國人[11]。最後英美兩國達成妥協，由蒙巴頓擔任司令官。現在輪到蒙巴頓用同樣理由來指責史迪威明目張膽不喜歡英國人，如果馬歇爾拒絕蒙巴頓的請求，無異是自打耳光。

可能是爲了安慰史迪威，也可能是企圖叫批評史迪威的人閉嘴，軍部開始了將史迪威晉升爲上將的作業程序[12]。

## 四、史迪威令馬歇爾陷於困境

1944年7月1日，馬歇爾的電報終於徹底改變了史迪威的心情。馬歇爾通知史迪威說，英國人確實不斷要求撤換史迪威，理由明白指出英國軍官們無法和史迪威合作，而史迪威又把全部時間和精力放在緬甸戰場，忽略了他對東南亞戰區司令部的責任。不管馬歇爾如何努力抵制英國人壓力，他在6月底不得不承認無法再拖下去了，因此只好告訴史迪威，美國必須採取某種相應措施。事實上馬歇爾擔心的是，英國人根本不容許史迪威繼續在東南亞戰區保持任何職務，包括緬甸在內。簡單的說，英國人要

7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on October 29, 1956, in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605.

8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60. See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50.

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40.

10 *Ibid*., p. 243.

11 Ed Cray,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 and Statesman*, p. 140.

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79.

史迪威從東南亞戰區地盤徹底掃地出門。而馬歇爾又必須在短期間給英國人一個明確答覆[13]。可以想像的是，馬歇爾的處境相當困難，因爲一位美國陸軍上將竟然被一個盟邦視爲不受歡迎人物，而美國的陸軍參謀長必須趕緊替他另外找一份有體面的工作。讀者當然也可以看出，蒙巴頓對史迪威的指責幾乎是中國抱怨的翻版，唯一的差別是蒙巴頓劍及履及付諸行動，而蔣介石卻不斷承受內心煎熬，無法採取斷然措施。

正在此時，中國局勢當然也著實令馬歇爾擔憂。馬歇爾很清楚，史迪威從來沒有把心思放在中國戰區事務上。因此他努力摸索，企圖找出一個辦法，讓史迪威此時回心轉意，把精神貫注在中國戰區事務上。馬歇爾在電報裡語氣近乎賠小心地展開試探，徵詢史迪威是否可以考慮回到中國戰場去產生一些正面影響。馬歇爾甚至坦白承認，他並不知道蔣介石是否會允許史迪威再度過問中國軍事。不過鑒於中國情況危急，他依然想聽聽史迪威的意見，以便能向羅斯福匯報[14]。

馬歇爾電報的語氣和重點都非常明顯。他想聽聽史迪威意見，然而並不知道想聽何種意見，因爲他自己心中並沒有譜。鑒於史迪威在過去歲月裡，一直只關心緬甸叢林裡的戰鬥，對於中國戰區的發展並不熟悉，再鑒於史迪威即將被英國人踢出東南亞戰區，馬歇爾探索的重點是，史迪威能否回到中國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比如說，多花一點時間在重慶，更積極參與中國防務計畫，更關心美援物資的分配等等。換句話說，「去做出一點成就」。但是馬歇爾也有心理準備，蔣介石可能根本不歡迎史迪威回到中國。馬歇爾肯定還在摸索答案的過程中，因此他歡迎史迪威提出任何看法。

但是馬歇爾不得不回覆英國人的最後通牒，因此只好向史迪威提出一些初步對策，那就是把打通緬甸路的計畫依然放在史迪威名下，但是實際指揮交由一個部下行使。史迪威則把主要精力轉到中國，致力於中國軍隊的重建和提供領導，同時在參謀長聯席會的指導之下控制駝峰空運。從馬歇爾電文的文字和語氣裡明顯可以看出，他絞盡腦汁是爲了找辦法對付英國人的壓力，因爲假如英國人不急，他將會樂意「拖下去」，而史迪威也可以繼續留在緬甸叢林裡作戰。現在既然此路不通，最好的退路就是讓史迪威名義上仍舊保留緬甸職務，減少他對美援物資的直接控制權，然後回中國戰區履行他早已不聞不問的聯軍參謀長職權[15]。在電報結尾，馬歇爾知道他的建議將

13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JWS, July 1, 1944, in Marshall Pere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Tuchman, pp. 595-597.

14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JWS, July 1,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15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JWS, July 1,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逼迫史迪威作出重大自我調整，因此充滿歉意地邀請史迪威向他提供建議，並且懇求後者千萬不要因爲這個情勢而怒火衝天[16]。

## 五、史迪威的窘境

從史迪威的角度來看，馬歇爾電報含義全然不同，並且令他痛苦不堪。因爲它表示史迪威即將要失掉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官的尊貴頭銜，並且要交出辛苦兩年多才剛得到手的緬甸戰爭主導權。更糟糕的是，史迪威除了回中國戰區以外別無去處，而且即使回到中國戰區也只不過是作蔣介石的部屬，做那些他從來就不願和不屑做的參謀工作，其中包括一些連馬歇爾自己也說不清楚的重整和領導中國軍隊的工作。

自1942年6月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以來，史迪威最想要做的莫過於在緬甸叢林裡擊敗日軍重振英名。5月初才好不容易把中國遠征軍逼進緬北戰場，而不到兩個月，他的這個指望眼看就要落空，他的痛苦可想而知。在過去歲月裡，他一再忍受和英國人及中國人難以相處的折磨，爲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緬甸戰場上揚眉吐氣。但是現在恐怕不但得不到這份應有的滿足，而且還要眼睜睜地看到別人接收即將到手的戰功。更糟糕的是，馬歇爾建議的所有出路都逼他繼續與蔣介石共事，也不再有機會指揮一支大部隊打一場大仗。馬歇爾的提議，只能逼使沮喪不堪的史迪威，不得不在最短期間內想出一個可以轉敗爲勝的奇招，因爲英國人等不及要把他趕走了。

事情的演變是，史迪威使出了起死回生的奇招，把馬歇爾的雙重頭痛，轉變成他軍旅生涯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神來之筆。馬歇爾的電報只是表示對中國戰局的憂心，要求史迪威予以關心。但是史迪威在24小時內所作的回覆卻是，他既堅持要在緬甸戰爭中繼續產生一定的作用，也要得到中國戰區一切部隊的指揮權，主導中國對日戰爭。無論用何種尺度來衡量，史迪威的想法都可謂出奇制勝，令人嘆爲觀止。他側身閃開即將被英國踢出印度的奇恥大辱，提出的對策卻是意氣風發，凱旋回到重慶，領導中國軍民抗戰。

## 六、史迪威對中國戰區的漠視

依常理設想，史迪威之所以有膽量自告奮勇地要指揮中國軍隊，必定是他除了高度關心中國的安危之外，還有一番宏圖，想要借著指揮權才能夠得以大展。這個想法是否正確？

16 Ibid.

如前文所述，1942年中期以後，蔣介石對史迪威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他長期忽視聯軍參謀長職務。史迪威儘管強烈批評中國軍隊的種種缺點，但是多半屬於粗枝大葉的表相，對於這些缺點的深層來源，並沒有深入獨到的見解。事實上，他除了關心中國遠征軍事務之外，並不願意花時間去了解中國部隊的複雜性。從1943年12月20日到1944年9月6日，在中國戰區遭受重大挫折的九個月期間內，史迪威待在中國戰區崗位上的時間總共只有4天[17]。而每當他把注意力轉移到中國戰區時，其結果又是傷害多於幫忙。一個明顯的例子是，1944年4月12日，他突然發出指令，禁止陳納德直接和蔣介石來往，並規定今後所有交往必須通過史迪威的管道予以轉達。這個命令不切實際，因爲陳納德和史迪威一樣，除了是(史迪威屬下的)美國第14航空隊司令官之外，也是中華民國的空軍參謀長。再說，這個指令也沒道理，因爲史迪威既是在華擁有多重身分，而堅持享有可以任意和蔣介石以及中國其他官員直接來往的權利，但卻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禁止陳納德以同樣方式履行他的職責。

偏偏事有湊巧，史迪威訂立新規矩之後剛過兩天，蔣介石就按照老習慣向陳納德諮詢一個技術問題，而陳納德也認爲不得不趕緊提供答覆。但是爲了謹慎起見，特意先把答覆送到史迪威在重慶的暫時辦公室，卻發現史迪威人在印度，而他的副手又在生病。陳納德不得已把答覆直接呈交給蔣介石，這就引起史迪威大怒，在陳納德頭上扣上一大堆罪狀，包括不忠於長官、違背軍紀、走後門，甚至是公然侮辱長官和蔑視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權威等。5月27日史迪威決定啓動軍紀處分程序，要求軍部免除陳納德第14航空隊司令官職務。雖然史迪威的指控書被軍部不予置評地退回，但是這個動作肯定激怒蔣介石。因爲陳納德是最能得到中國人普遍擁戴和讚佩的美國軍人，而且是過去四年來爲中國抗戰出力最多的一位美國軍官[18]。這個案件也很可能讓蔣介石更加警惕，一旦史迪威正式獲得中國兵權，他的粗暴橫蠻作風不知將會如何變本加厲？

另外一個案例也發生在4月中旬。陳納德不斷請求史迪威批准使用庫存油料，以應付河南前線的危急戰況，協助中國步兵抵抗日軍機械化部隊[19]。陳納德的空軍數量

17　其中包括3月份兩天(28、29日)回重慶要求蔣介石向緬甸前線增兵，和6月份兩天(5、6日)回應蔣介石的緊急召喚。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228-240. 又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6月5-6日。

18　Cable from Brig. Gen. B. G. Ferris, Deputy Chief of Staff, Headquarters CBI, to Chennault, May 8, 1944; Cable from Chennault to Commanding General USAF, CBI, May 14, 1944; Cabl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May 29, 1944; all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31.

19　陳納德空軍實際收到的資源經常少過他原先被批准的分配額。例如：他在3月份從駝峰運輸只得到4,736噸。

雖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20]，但是他並沒有要求更多的飛機，只要求更多的油料，增加現有飛機的升空作戰時間。須知日軍正因爲能夠完全放心運用陸上和水上各種方式運送大量物資到前線，所以才敢在任何地點集結大量物資，準備攻擊而不怕遭到損失。

陳納德盡力想說服史迪威，這次一號作戰的性質和往常日軍攻勢大不相同。這次日軍不再有足夠的兵力，像以往那樣浪費在搶奪秋收糧食之上，而是想一鼓作氣徹底摧毀中國的抵抗意志，從而讓日本取得在亞洲大陸維持內線防禦和補給的優勢[21]。換言之，在陳納德眼中，一號作戰代表一個嶄新的威脅，性質和從前日軍的攻擊活動完全不同。因此陳納德請求史迪威同意撥出更多物資，從事更多的空中戰鬥。他在給史迪威的長信的最後一段，低聲下氣地說，他非常抱歉打擾史迪威，但是希望史迪威能夠同意他的請求[22]。

陳納德的請求立即得到中緬印戰區副司令官索爾登(Sultan)將軍的支持，後者並向蒙巴頓建議(4月13日)把東南亞戰區前此抽調走的20架C-46運輸機，全數歸還第14航空隊建制，作爲支援之用[23]。然而在中國戰區的美軍軍官都遵照史迪威旨意行事，結果陳納德等了一個多月還得不到答覆，只好再度寫信給史迪威(5月29日)，指出他的庫存量已經大幅降低，急需史迪威援助，以便摧毀日軍基地，切斷其補給線並對中國地面作戰部隊提供空軍支援[24]。

對此要求史迪威依然無動於衷，蔣介石只好出面，緊急召喚史迪威飛返重慶協商，但是史迪威卻不加理睬，蔣介石怒火中燒到什麼地步不難想像。他此時終於承認，他去年10月改變撤換史迪威的決定，是重大錯誤[25]。相對之下，史迪威卻躊躇滿志，他告訴妻子，根本不想理睬中國和印度的催促，只想留在緬甸叢林裡跟士兵們在一起[26]。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此時的日記和留下的其他文字，對中國戰事並無關心表示。非常明顯，中國的事應該由蔣介石自己去操心，緬甸的事才是他的唯一關心。

在這方面，史迪威對於中國戰區空軍角色的看法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史迪威在

20 就比例數而言，陳納德的估計是：日本空軍在4月份在亞洲有1,170架飛機可以攻擊中國的基地，而且以每個月100架的速度增加。

21 Letter from Chennault to Stilwell, 5 pages, April 8, 1944,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31.

22 Ibid.

23 Letter from Sultan to Mountbatten in New Delhi, "Subject: Diversion of Air Transport Command Aircraft", April 13, 1944,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7, Folder 40.

24 Chennault letter to Stilwell, May 29, 1944,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31.

25 蔣介石日記，1944年5月31日，6月3日。

26 Diary entry of January 10, 1944, in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20.

1942年中期到1943年中期的一年之間，始終堅決反對增加對於陳納德空軍的支援，他提出的論點有兩個：一、在實踐上，這樣作必定會引起日軍報復，而對後方的美國空軍基地進行打擊。二、在學理上，戰爭必須以步兵爲主導，空軍(甚至砲和裝甲兵)都只能是輔助性武器("auxiliaries")，無法決定大局。可是1944年春夏之際，日軍已經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總攻擊，直接威脅到這些空軍基地，而這場戰爭卻並不是因爲中美空軍的挑釁而引發的，史迪威卻依然對陳納德和蔣介石支援空軍的要求充耳不聞。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兩人的要求並不是派遣更多美國飛機到中國戰區，而只是多得到一些油料和彈藥，讓現有飛機增加作戰能力而已。更加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物資已經在駐華美軍的倉庫之中，只要取出使用即可。因此史迪威斷然拒絕就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一個簡單的解釋是史迪威長期不在中國，可能不了解中國戰場的急迫情勢，所以才作出這般違反理性的決定。但是更可能的解釋，是史迪威落井下石，想藉中國的危機對陳納德和蔣介石施加懲罰。其實還有一個更可怕的解釋，那就是馬歇爾是史迪威的同謀。因爲馬歇爾在1944年6月6日曾經發過一通電報告訴史迪威說，在1944年中期進行的意大利半島作戰時，英美盟邦動用了7,000架飛機，而德國只有200架飛機。但是馬歇爾特別叮囑史迪威，此項消息絕對不許向陳納德透露[27]。顯然是避免陳納德據此要求增加對中國空軍的援助。這個動作不免令人產生一些聯想。一、同盟國和納粹國在意大利戰場的空軍比例是35:1，即使抽調500架飛機去滿足中國當時的全部需求，其比例依然是32.5:1，繼續保持絕對性優勢。二、美國軍方(史迪威)一再訓斥中國政府不可迷信空軍，然而在其他戰場卻盡全力去爭取絕對空中優勢，甚至不惜從中國戰區抽調飛機去滿足其他戰場的需要。而史迪威卻在同時指責中國政府貪得無厭，對於美國的慷慨援助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感恩。這個現象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互相矛盾，其實不然。說白了，美國軍方和史迪威的說法只有針對中國戰區才有效，因爲中國戰區在美國軍方的心目中根本沒有重要性。當然在此過程中，中國老百姓才是日軍鐵蹄下最大的遭難者。如果以上解釋果然成立的話，那麼史迪威(美國軍方)的行爲就只能令人髮指了。

史迪威的確能夠和中國士兵共甘苦，他在這一方面的表現絕對足以爲中國將領們的楷模。他長時間置身於一個最讓他滿足而又最不讓他頭痛的工作環境，那就是緬甸前線，在熱帶叢林裡和士兵同吃同住，同在一小塊土地上作戰，幾乎與世隔絕，只靠無線電和外界聯絡。他在給妻子的信件中，把這種生活描繪得有聲有色。他特別感到稱心的是，緬甸森林是幫助他躲開蒙巴頓和蔣介石的最佳屏障：「把那些挑

27 Marshall radiogram to Stilwell, June 6, 1944. Xerox File 1103, Item 5750. MFA.

糞的工作留給幾個部下去做。」[28] 6月14日給妻子的另一封信中，史迪威寫道，儘管緬甸森林裡到處是雨水、泥濘、蚊子、水蛭和各種問題，但是比起重慶和印度來還是好得太多[29]。史迪威的心情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上在史迪威的檔案裡，唯一可以看出他1944年7月1日以前對中國戰區情況關心的跡象，是在他給妻子的一封短信。可是這封信與其說是關切中國災難，不如說是這些災難令他感到心滿意足。他寫道：「中國的局勢看起來非常糟。我相信花生米將會爲他的愚蠢和頑固付出極高的代價。我以前就曾經向這個笨蛋提出過解決的方法，但是他就是不聽。現在一切都已經晚了，而他卻在大叫大喊(求救)。一年前我就已經給他們提出過警告，但是那時他們自以爲什麼都懂。」[30]

幾天後，史迪威終於有機會讓蔣介石付出他的代價。當蔣介石親自請求史迪威多調撥一點物資給陳納德，協助中國軍隊地面作戰時，史迪威斷然加以拒絕，所持理由是情形還不夠惡劣。史迪威反而建議蔣介石，用中國自己的資源解決陳納德的問題[31]。

顯然，即使中國面臨崩潰，史迪威關心的也不是盡力挽回頹勢，而是在和蔣介石打交道時占取上風。也就是這種心理讓史迪威在6月中作出決定，中國的情況還不夠糟糕到需要他批准，動用儲存在成都倉庫中的美軍器材和油料。

從上述史實中不難看出，在1944年7月以前，史迪威極少關注中國戰區事務，並沒有發展出一套處理危機的獨到見解，而在其偶爾作出干預時，其結果只能對中國戰局造成更大的傷害。

## 貳、史迪威對中國戰區重新燃起的興致和出奇制勝的手法

史迪威接到馬歇爾7月1日電報後，心情的沮喪和怨憤，在一封寫給妻子的信中暴露無遺。他寫道：「中國這邊的情況看起來非常糟糕。如果我能夠有機會到華盛頓去大叫大喊地告訴他們，『我早就說過事情會這麼發展』的話，那將是一件令人感到暢快的事。但是我相信他們此時也已經看出我想要說的話是有道理的了。這正是去年5月我的說法，但是當時空軍的一幫孩子們，自信他們可以光是用飛機就可以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去。正因如此，我當時也被丟進了垃圾桶裡去。」史迪威接著把他內心深處

28 JWS letter to wife, January 12, 194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220-221.

2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42.

30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40.

31 Messag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June 6, 1944, in Xerox File 1103, Item 5750, MFA.

的私密想法透露給妻子：「假如當前的危機嚴重到可以把蔣介石趕下臺，而又不至於把中國搞垮的話，那就真的值得了。」[32]

這些話非常有啓發性。它的前半段追溯到1943年5月間他和陳納德的所謂戰略辯論。顯然，史迪威此時認爲日軍的一號作戰正好驗證了他預言的準確性。但是這個認知可能完全偏離事實，因爲依照本書以前的分析，一號作戰的動機，並非因爲日軍想對中美空軍出色的戰績作出懲罰，而是出於它本身此際的大戰略考慮。因此這半段的內容，只是表明史迪威依然跳不出自己想算舊帳的心態，而事實上（如本書前文所言）空軍的「孩子們」，從來沒有說過他們的飛機可以把日本人趕出中國去的話，而蔣介石自己也不曾有過此類遐想，幾乎全是史迪威想像力過於豐富，或是深文羅織的產物。至於後半段話則非常傳神地描述了史迪威的圖謀，甚至幸災樂禍的心情。在此後幾小時之內，這正是史迪威全力以赴的目標。

史迪威在他回覆馬歇爾信中，提出一個簡單的要求：獲得中國戰區全部軍事指揮權。接著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最終摧毀了他個人的事業，也讓中美關係瀕於決裂邊緣。這將是本章和下一章要關注的重點。

## 一、史迪威轉敗爲勝的奇謀

史迪威在7月3日覆信中，首先敦請馬歇爾千萬放心，可以把他調離東南亞戰區，並任命索爾登（Sultan）將軍作爲繼任人[33]。史迪威如此大度的開場白，即刻便解救了馬歇爾的尷尬境遇，使後者大大舒了一口氣。因爲一旦有了史迪威承諾，他馬上就可以答應英國人的要求，結束自己將近一個月的折磨。史迪威如此慷慨大方，想必也令馬歇爾更加急於投桃報李。因爲既然史迪威給了他下臺階，那麼他也必須在心理上準備努力地去滿足史迪威其他方面的要求。

而史迪威也確實沒有給馬歇爾一絲喘息空間，因爲他在作了這個自我犧牲的姿態之後，緊接著提出一個大膽建議，那就是：他當然願意回到中國戰區，但是如果繼續現在的身分，可能無法產生效果。因此史迪威建議總統應該給蔣介石寫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採取先發制人的高姿態，強調美國已經在中國作出巨大投資，批評中國政府和軍隊軟弱無能，強調在非常情況下必須採用非常手段。最後露出底牌：蔣介石必須把中國軍權全部交由史迪威行使。

然則史迪威得到軍權之後，究竟打算如何運用它來解救中國呢？

---

3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44.

33 Messag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July 3,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MFA.

史迪威認爲中國大部分軍隊已經受到嚴重打擊，因此無法抵抗日軍。唯一出路是解除陝甘寧邊區的封鎖，使在封鎖線上的國共雙方軍隊都可以參加抗日戰鬥行列。史迪威信心十足，中共軍隊會接受他的命令，因爲兩年前中共已經表示願意接受史迪威指揮，所以史迪威相信他們現在也會同意奉行他的命令。

總之，史迪威告訴馬歇爾，時機萬分迫切，總統必須立即壓迫蔣介石交出全部軍隊指揮權給史迪威。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可以拯救危難中的中國[34]。

從實質上說，史迪威的回信有幾個重點。第一，它強調中國情況將會在短期內導致滅頂之禍，唯一挽救的希望是把軍隊指揮全權立即交給史迪威。第二，它宣稱中國軍隊願意接受他的權威，蘭伽的訓練已經證明這點。第三，他解救中國的方法其實是出奇明確而乾脆，就是把歷來浪費在互相牽制的國共雙方軍隊從陝北地區解放出來，共同對付日本。史迪威相信，他作爲一位美國軍人，有能力調解國共鬥爭，因爲他只要對他們曉以大義，團結是爲了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就可以使他們信服。正由於史迪威長期以來一直相信國民黨用於封鎖中共的軍隊人數既多，裝備又精良，反之共產黨軍隊則是善戰之兵，只需要有新式裝備就可以充分發揮戰力。因此史迪威認爲，他既能向這些軍隊提供統御才能，又能向他們提供新式武器，便可以使中國的局勢大爲改觀。

以上對這段歷史的敘述，和多數史學界著作不同之處在於，它指出美國政府要求中國交出軍權的原始動機和時機並不單純，與其強調美國如何急迫想用激烈手段來替中國解除困境，不如強調美國需要趕緊找出方案，打破英美之間的一個外交僵局，和爲史迪威個人職務尋找出路[35]。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羅斯福向蔣介石提出的官方理由只不過是遁詞，而且可能連他自己也沒有弄清楚來路（見下文）。

## 二、馬歇爾的催化功效

在任何情形下，要替另外一個國家行使軍事指揮權都是極爲困難的事。即使在同一個國家體制之內，政府中一個部門內部的權力轉移都需要經過理解、小心分析、從長設計等步驟，並提出有效的執行方法。戰時，大多數國家都不願意貿然更換指揮官和徹底更改指揮系統，尤其不願意這兩件事同時執行。這就像在體育比賽中，大多數的球隊都不願意在比賽進行中途更換教練，出於同樣道理。而要想把另外一個國家的軍隊指揮權拿過來，比起在本國內更換指揮官更是困難重重，在大多數情況之下，根

34 Message from JWS to Marshall, July 3,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3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20.

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依照美國軍方正規作業慣例，美國軍部或是地區性指揮部的參謀人員，在決定重大政策或是進行戰爭之前，事先必定仔細研究課題，然後向上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提出報告，經過審查後再作出決定。美國參謀長聯席會的業務會議經常延續幾個小時，仔細檢查和詳細討論屬下送呈的報告，有關部屬也會列席以備諮詢，然後由參謀長們作出決定。但是在史迪威這個案例上，軍部參謀作業系統根本沒有啓動運作，即使是史迪威本人的參謀人員，也沒有事先探討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具體執行方法、費用和成功率等問題。事實上，對這些微妙而重要到關係中國勝敗存亡的問題，連馬歇爾和史迪威本人都沒有斟酌過，他們只有一個基本信念：美國軍官的領導能力肯定比中國優越，而且中國軍隊肯定樂意而又乖順地聽從美國人命令。當然，萬一有中國人不聽話或是表現不佳，就可以依照美國軍隊的規章，把他們撤職或是送軍法處分。儘管史迪威對絕大多數中國軍隊和指揮官一無所知，卻從不懷疑自己有能力得到他們的信仰，說服他們放棄狹窄的地方主義心態和鄉土觀念，或者放棄自私自保的割據盤算，鼓舞起他們的戰鬥精神，爲國家而戰。

同樣重要的是，史迪威還相信他有能力說服這些將領，用自己手中的武器去和日本人作戰，無需美國向他們提供新武器。史迪威還相信，必要時他甚至可以說服他們繳出手中武器，由指揮總部集中重新分配到其他各部隊使用，以便發揮全國武器最大的使用效率。最後，由於史迪威手中握有控制租借法案物資的王牌，因此在他指揮受到抗拒時，還可以用來懲罰那些不服從命令的將領。史迪威全部的方案都建立在一個基本信念上，那就是由一個美國軍官統御中國軍隊，並無歷史、文化、心理和心智上的隔閡問題，反而能夠產生比蔣介石和任何中國將領都更好的效果。在史迪威心目中，他所以能夠達成以上效果的原因，是他相信中國人會把他看成衷心要幫助中國的美國友人，心中別無雜念，只是一心一意想要保護中國國家利益。萬一有些中國將領冥頑不靈，不接受他的精神感召，那他們也只好乖乖接受他的軍法制裁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但是也不那麼令人詫異，因爲它基本符合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經交代過的那種典型思想。這種思想1942年1月在美國文武官員中已經廣泛流行。到了1944年7月，時空因素已經大變，他們也多了兩年多的時間去驗證中國的實際情況。不幸的是，他們的心態和智慧依然沒有任何改善跡象，因爲他們依然不能平心靜氣地去估算，這個政策到底能產生什麼效益和付出什麼的代價。

如前文所述，馬歇爾原本擔心他的「報憂」電報會惹得史迪威「爆跳如雷」（explosion），因此他電文的語氣盡量在賠小心，卻沒想到史迪威竟然如此爽快同意離

開東南亞戰區。或許馬歇爾意外驚喜之餘，完全想不到考慮某些根本性問題，迫不及待就把史迪威的覆電擇要，收入當天給參謀長聯席會成員李海、金氏和阿諾德等將軍（7月3日）的參考文件中，並通知他們準備次日（7月4日）採取行動[36]。換句話說，馬歇爾要求其他三位參謀長在聽到史迪威建議的24小時之內就給予支持。

馬歇爾的打算是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向總統提出一份備忘錄，因此通知其他三位參謀長，必須在當天下午一點鐘開會之前念完該文件。但是他卻直到7月4日早晨才寫好備忘錄初稿。這份文稿相當長，內容先介紹中國局勢，再以所有參謀長的名義，建議總統要求中國把指揮權交付給史迪威。

以上這個過程表示，馬歇爾很可能只給其他三位參謀長不足四個小時的時間，去弄懂到底馬歇爾打算把什麼樣的話放進他們嘴巴裡去[37]。在隨後會議中（7月4日），參謀長聯席會幾乎沒有進行實質討論，便通過了馬歇爾準備好的建議。然而他們卻向美國總統諉稱，他們已經對中國局勢進行了詳盡分析，而且「一致認爲」必須採取立即行動挽救中國危機，並要求羅斯福在馬歇爾代擬的電稿上簽字，立即發送給蔣介石[38]。

馬歇爾動作所以如此迅速，不僅僅是因爲史迪威幫了他一個大忙，避免了和英國人的一場難以解決的爭端，同時也因爲史迪威提出的解決方案既簡單乾脆，看起來又似乎有希望能夠解救中國的危機。同樣重要的是，它完全符合美國自珍珠港事件以來對華政策的基本精神，那就是美國並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史迪威對中國戰場的敘述和他對危機緊迫性的警告，都讓馬歇爾相信這是一個一石兩鳥的最上上之策。難怪馬歇爾照單全收史迪威電文中的文字，同時又把這些文字嵌進爲參謀長聯席會起草的建議書，最後又放進他（們）爲總統草擬的致蔣介石的電報之中。

仔細算來，其他參謀長們只有比馬歇爾更少的時間去思考眼前這個突發事件。即使他們能夠用整個上午思索這個問題，最多也只有四個小時而已。但是他們真正能夠使用的時間應該要少得多，或是根本不存在。原因是這一天是7月4日，美國的國慶日，他們的時間不免會被各式各樣的慶典活動所占據，甚或需要他們親臨主持，發表演

36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General Arnold, from Major General Thos. T. Handy,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July 3, 194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20.

37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General Arnold, July 4, 1944, from Major General J. E. Hull, Operations Divisio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17. MFA.

3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Admiral William D. Leahy, Chief of Staff to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July 4,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17. MFA.

說。他們之中很可能有人在下午一點鐘會議之前，根本無法分神去考慮中國問題。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就是，馬歇爾在給參謀長的簡報中，刻意淡化英國人要把史迪威趕走的事，而且提到史迪威的電文時，也只是強調他對中國惡劣局勢的敘述和建議。因此參謀長們得到的訊息並非全面，對於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不甚了解。這當然對他們想作出理性的判斷，就更增加了許多困難。

## 三、馬歇爾替總統擬就的電文稿

馬歇爾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爲總統擬就的電文稿，強調中國局勢正在急速惡化，經過慎重考慮之後，認爲應該馬上採取積極措施，防止情況加速惡化。既然中國領袖自己無法控制局勢，那麼只好由美國來採取必要措施。由於中國問題的癥結是軍隊缺乏作戰能力，和領袖忽略軍隊工作，因此參謀長們認爲當前在中國的軍隊和物資，必須由一個人來進行重整工作，務求有效對日軍進行戰鬥，而能夠擔當此一重任的唯一人選就是史迪威將軍。基於這些理由，參謀長們集體建議羅斯福，馬上要求蔣介石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行使，並晉升史迪威爲上將[39]。

參謀長聯席會(馬歇爾)的建議書和他們替總統擬好的電報文稿，在當天下午送抵白宮，羅斯福給蔣介石的電報則在當晚發出。很可能羅斯福對於電文只粗略看了一眼，因爲作爲總統，羅斯福在國慶日的慶典活動中，也必定有許多必須躬親履行的義務。

## 四、羅斯福的要求

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羅斯福重複了參謀長聯席會提供給他的所有重要論點，只是有的地方用語略加緩和。馬歇爾立即通知史迪威，總統給蔣介石的電報隨時可能抵達重慶。他告訴史迪威，後者已經得到總統全力支持，還提醒史迪威心理上要有所準備，因爲這個要求將會惹惱許多中國人，讓他們覺得顏面盡失。因此史迪威還必須努力去爭取中國人的支持[40]。馬歇爾採取的唯一防範措施，是警告史迪威務必盡量避免激怒蔣介石，而史迪威接到馬歇爾忠告之後也立即提出保證，將盡一切努力把事情處理妥善，絕不會辜負馬歇爾及總統對他的厚愛和信任[41]。史迪威更保證，他將全心全

39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U.S. Chiefs of Staff, July 4,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17, MFA.

40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JWS, July 7, 1944. In Verifax File 2563, Item 2559, Part 2. MFA.

41 Cabl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July 9, 1944, as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力讓指揮權轉移工作平穩順利。

等到羅斯福採取行動時，副總統華萊士對史迪威的負面批評一事已經過了一周，或許已被羅斯福忘記。因此羅斯福對史迪威表示全力支持，通知蔣介石美國政府將晉升史迪威爲上將，請蔣介石立即「將彼自緬召回，置彼於閣下直屬之下，以統率全部華軍及美軍，並予以全部責任與權力，以調節與指揮作戰。」[42]

要不要晉升史迪威爲上將，這本是美國政府內部事務。但是在當時情形下，完全不和中國協商就宣布此項命令，也有明顯用意，要以美國政府對史迪威的獎賞來對中國施壓，逼中國順從美國旨意。因爲一旦美國在史迪威升遷問題上賭上了國家尊嚴，它不但讓中國更難拒絕接受史迪威，同時也斷了美國自己的後路。萬一中國拒絕，其後果必然沉重打擊美國聲望[43]。以同理推之，美國政府的單方面行爲，也讓自己後來受到加倍的損傷。因爲當蔣介石最終把這位剛剛掛上四顆將星的軍官踢出中國時，美國的顏面實在無法維持。在這個意義上，美國對於蔣介石承受壓力的錯誤估計，終於導致其自食惡果。

以上敘述顯示，美國官方文件關於史迪威指揮權所採取的說詞，和實際情況間其實有幾個重大出入。第一，與羅斯福的官方說詞正好相反，蔣介石並不真正需要特意把史迪威從緬甸戰場召回，因爲史迪威正被英國人趕出緬甸和印度，亟需找一個新的立身落腳之處。再說白些，美國官方的說詞和後來史學界所採取的說法是，美國在中國萬分危急的時刻伸出援手，派遣史迪威去解救中國之急。而事實上，史料呈現出來的似乎正好相反。是美國在史迪威處境窘迫之際，想到了利用中國去爲史迪威解套。這不禁讓人對美國自詡爲戰時中國忠實盟友的說詞，有重新評估的必要。第二，美國對指揮權的要求，並非參謀長聯席會深思熟慮如何應付中國危機後，設計出來的妥善解決方案，而是史迪威個人爲了自救而倉促出爐的解套之計。沒想到這個計謀，竟然被他的頂頭上司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在24小時之內全盤接受。馬歇爾轉過身來把史迪威的計謀推銷給其他參謀長，而後者在缺乏認真考慮的情況下，又集體蓋上他們的橡皮圖章。在參謀長聯席會把擬好的電稿送呈羅斯福總統時，後者第一次得知這個建議，竟然毫不猶豫在電稿上簽字。其中道理說是十分難懂，卻又十分簡單。因爲在羅斯福看來，電文是他的最高軍事領袖們聲稱運用集體智慧的產品，既然全體一致通過，當然不會出問題。他也沒有時間去仔細了解這個舉動的重大政治和軍事後果，匆

(續)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83.

42 Marshall message to JWS, July 7,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43 史迪威晉升上將的消息在1944年8月2日正式宣布。

匆送出電文。由於美國政府中沒有任何一位官員曾經對此問題仔細思考，因此也沒有作出推行這個決定的進一步計畫和設立任何機構。美國的打算是，先讓史迪威把指揮權抓到手，然後走著瞧。即便失之急躁，美國人還是相信他們的成績肯定會超過中國人自己所能做出者。

美國政府決策者處理這個案例，凸顯它對中英兩個盟邦的差別待遇。早在1943年8月，邱吉爾已經表示，希望羅斯福任命一位最高統帥，指揮英美兩國軍隊，負責指揮預計在1944年5月施行的跨渡英倫海峽作戰（歐洲第二戰場）。當時羅斯福和邱吉爾心中都已經認定馬歇爾爲最恰當人選[44]。即便如此，兩個盟邦還是花費了四個月時間精心策劃，舉行了無數次會商，簽署了各種措詞嚴謹的協定，最終放棄原始構想，在1943年12月改由艾森豪將軍擔當重任[45]。相比之下，美國對於史迪威的任命簡直是一場兒戲，輕率、任意而衝動。當然，美國所持的說詞是中國戰區的情況緊急，但是要耗費四個月才作出的決定和只要一天工夫就作出的決定，其間差異之巨大，令人不得不看出，美國對待兩個盟邦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 叁、蔣介石的回應和提出的條件

不難想像，蔣介石接到羅斯福電報的反應（7月7日）是既震驚且憤慨。當他把電報拿給妻子看時，禁不住歎息上帝爲什麼如此懲罰他[46]。特別讓他難過的是，羅斯福電報抵達之日正是七七抗戰的七周年紀念日，是日本企圖征服中國和中國決心抵抗到底的紀念日。美國政府似乎並未注意到這個日子的特殊意義，但是蔣介石就不同了，他聯想到羅斯福的電報，在他看來，中國抗戰本就是反抗日本人想統治中國的野心，而現在美國人想統治中國的野心比日本有過之無不及，這封電報是對中國的莫大侮辱，充分暴露美國想要徹底主宰中國內政的陰謀[47]。

等到蔣介石情緒恢復平靜之後，他初步結論是有三個選擇：一是全然拒絕美國的要求，二是接受要求，三是緩和要求可能造成的傷害。他在7月7-8日開始草擬給羅斯福的回電，決定選擇第三條路[48]。因此他給羅斯福的回覆中包含以下幾個重點：第一，

44 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 260.
45 *Ibid.*, pp. 279-470.
46 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7日。
47 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7日。
48 同上。

他接受羅斯福請求，同意把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但是希望能多些時間做好準備工作。蔣介石的理由是中國軍隊的政治背景複雜，如果準備不周，恐會引起混亂，並且妨礙中美合作。第二，他要求羅斯福派遣一位個人代表，來協調他和史迪威之間的關係。第三，即使美國提出如此極端的要求，蔣介石仍然表示信任羅斯福對中國和對他個人的友誼[49]。

蔣介石到底基於何種理由，這麼快就對羅斯福電報作出正面答覆？答案並不明確，但是至少有兩個可能的解釋。第一個是他打算規避現實，利用各種藉口拖延時日，消磨羅斯福的銳氣，最後使美國的要求不了了之。不過，假如他本來的動機是採取拖延戰術，那他至少可以再拖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才給羅斯福回電。然而他卻選擇及時回電，所以這個解釋缺乏說服力。第二個是蔣介石基本決定接受羅斯福要求，但由於擔心許多其他因素，包括國內可能引起的政治風暴，和史迪威不愉快的共事經驗，以及把整個中國軍隊交給一個外國軍官指揮的不可知後果，等等。因此他在交出指揮權前想做好萬全措施。雖然這種做法和蔣介石以往的行爲大有出入，但是在美國巨大壓力下，這或許是他最切合實際的對應方法。

美國政府對蔣介石回電的解讀，可以嚴重影響它此後數周中，如何看待蔣介石的行爲和它自己的對策。從當時美國領袖的心情來看，他們大概非常高興這麼輕易就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他們也可能得到一個印象，那就是既然蔣介石已經作出承諾，那麼下一步就是等他短期內兌現承諾，而不節外生枝。殊難想像的是，美國領袖中，沒有一位曾經對蔣介石此時心情產生過好奇，想追根問底。在記述美國決策過程的官方記錄中，也沒有一位領袖曾經將心比心，試圖把蔣介石當作中國的領導人，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來理解，問問蔣介石的感受將會如何。恰好相反，他們毫無例外地都一致等待蔣介石盡快把兵權雙手奉上。當蔣介石沒有讓他們如願以償時，他們馬上指責蔣介石故意失信，食言而肥。

## 一、蔣介石的感情反應

事實上，羅斯福電報讓蔣介石的情緒在整個7月間洶湧澎湃。有時（比如7月11日）他會發誓，要盡力維持好中美關係，「對美外交自當力圖補救」。萬一終歸徒勞，也只

49 English text of CKS letter to FDR, dated July 8,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17. MFA.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中文本，1944年7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637。

好聽天由命，必須保障中國獨立、自主和拒絕向外國屈服[50]。但是有時(比如7月14日)，他又會感歎過去中國孤軍抗日的日子其實好過得多。自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領域，都落入美國掌控之中，而美援的本質也不在支援中國，而只是替美國作宣傳工作和利用中國[51]。再有時(比如7月16日)他又發誓絕不再對美國作出任何讓步，指責美國的要求是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行爲。他也推測，假如拒絕美國請求，美國將會停止援助，撤退空軍，間接幫助日本擊敗中國[52]。在7月16日，當孔祥熙來電報告，羅斯福依然堅持中國必須立即宣布史迪威任命時，蔣介石的反應是，他也堅持中國不在如此重大事務上作出輕易讓步[53]。換言之，蔣介石逐日掙扎，陷於劇烈矛盾之中。

蔣介石很快嚐到美國施展高壓的苦頭，並爲之憤恨不已。7月15日，蔣介石得知史迪威的重慶副手菲利斯(Benjamin G. Ferris)將軍要立即遞交一封羅斯福發來的電報。當天是星期六，蔣介石於是指示由林蔚將軍代爲簽收。然而菲利斯將軍竟然堅持，就算是林蔚代收，也必須由蔣介石親筆簽收，蔣介石聞訊，震怒莫名，斷然拒絕接受電報。當菲利斯終於讓步，並在次周一把電報送達時，蔣介石發現電報語氣和菲利斯的態度一樣粗暴，因爲羅斯福宣稱如果中國不能努力作戰，則兩國此後將無繼續合作的基礎。難怪蔣介石閱後的反應是，中國必須開始準備單獨對日作戰[54]。

美國高壓手段，加上日軍對衡陽的猛烈攻勢(中國總共在這裡抵抗48天)，迅速讓蔣介石陷於極度沮喪。這種心情在7月21日的日記中最是表露無遺。他寫道：「天父乎。余今已突入陷阱之中，四面黑暗，遍體鱗傷，若不矜閔施救，恐不能實現上帝所賦予之使命，其將永受羞恥。」[55]

當然，蔣介石憤怒的對象不僅是美國所提關於指揮權的要求，同時也是史迪威行使這個指揮權的前景。他自然而然把滿腔怒火傾洩在羅斯福身上。比如他在1944年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以余平時受侮最甚、刺激最烈之人，而必欲余忍受此一事，此何等事？若不臥薪嚐膽，知恥忍辱，將何以自立立國耶？」[56]他同時也責怪自己過去一年處事失誤，才有當前困境，讓美國軍方領袖以爲他無法招架美國壓力。在他自

50　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1日。
51　同上，1944年7月14日。
52　同上，1944年7月16日。
53　同上。
54　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5、17日。
55　同上，1944年7月21日。
56　同上，1944年7月31日。

責的失誤當中，最重要的是他1943年10月間處理史迪威去留問題的優柔寡斷[57]。他也終於承認，當時不應該聽信宋氏姐妹的話而拒絕宋子文的建議。正如他所寫道：「余之愚昧極矣。昔之自負爲決心與果行者，今將變成猶豫誤國之罪人矣。其將何以覺悟澈改而自處之。」[58]

8月初，蔣介石開始懷疑美國政府正在進行陰謀，其目的是擁立孫科以取代他自己。這個懷疑使蔣介石對於美國的觀感大爲改變。他寫道：

> 帝國主義之面目全露，其意非使中國為其附庸不可。然一加分析，則並無不了之困難。只要我軍事與財政之權在握，以及官兵與民眾之信仰不失，則中國軍民之眾，土地之大，如我再能自立自強，克己復禮，則革命基礎不致動搖，事業前途尚多光明也。何竟為外物所制而自餒耶[59]？

事實上，到了8月底，蔣介石坦承羅斯福電報對他心理的威脅：「自本年七七以來，每聞羅有來電，無不疑懼戰兢，以其非威脅即壓迫之電。皆爲余之恥辱臨到之時也。」[60]這一段話大概是蔣介石對史迪威指揮權要求後，心理狀態的最無修飾的自我寫照。

以上對蔣介石理智和感情反應的敘述，不但說明羅斯福電報對他傷害之深，也說明他依然缺乏和美國決裂的決心。在讀他此時日記時，一個有趣的發現是，他所寫的文字非常忠實表達了私下內心的感受，但不能正確形容他在公開場合的行爲。事實上，蔣介石儘管內心感到極端憤怒，他依然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滿足美國要求的細節上。由於他在外表上表現出來的沉著及沉默，因此許多親信部屬都無法臆度他的真正態度，也無法從他那裡了解美國要求的真正目的何在。他們唯一的印象是，美國的要求，來勢有如晴天霹靂[61]。

這些親信由於對於美國意圖不解，因此他們對蔣介石的建議也各有不同。沒有人建議蔣介石應該斷然拒絕美國要求，然而不同的官員卻提出接受美國要求的不同理由。

---

57 同上。
58 同上。
59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6日。
60 同上，1944年8月23日。
61 王世杰日記，1944年7月15、27日。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7月18-19日。

宣傳部部長王世杰認爲，一旦美國將軍指揮中國軍隊，即使蘇聯參加對日戰爭，中蘇之間的衝突也必將減少[62]。軍事智囊徐永昌將軍則認爲，羅斯福電報表達了想幫助中國的真誠心意，因此中國應該極力配合。更具體地說，徐永昌主張中國大可以先把幾個戰區置於史迪威指揮之下，作爲示範區或是實驗區，並期望借此對其他戰區產生積極效應[63]。有趣的是，沒有一位中國官員同意美國政府的說法，認爲只有史迪威才能紓解中國的危機。

## 二、蔣介石提出的條件

蔣介石在7月8-15日發給羅斯福的一連串電報中，表達了三個立場。首先請羅斯福放心，中國戰局並非如美國政府所想像的那麼惡劣，中國完全可以應付日軍攻勢，而他自己也會對中國戰區的成敗負起全部責任[64]。其次他提議中美兩國完全可以從長計議指揮權轉移工作，以求過程完善，不必過於倉促[65]。最後蔣介石更提出承諾，只要史迪威能夠表現合作精神，他自會毫不猶豫地將指揮權交出[66]。

根據蔣介石看法，轉移指揮權的準備必須顧及三個方面。

第一，蔣介石不同意羅斯福的決定，讓史迪威全權掌控租借法案物資，以及置共產黨軍隊於史迪威指揮系統之內。蔣介石認爲這兩點可能對未來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敦促羅斯福改變立場[67]。

第二，蔣介石建議兩國政府應該簽訂一項正式協議，明確規定它們有關指揮權的權利和義務。協議內容應該包括租借法案物資支配權、人事任免決定權、責任歸屬問題、對工作成績的檢查等等方面，以避免未來引起不必要的糾紛。他特別強調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兩國政府的合作不可能僅限於軍事範圍，合作應該是全面性的[68]。

第三，蔣介石也強調中美兩國軍隊的基本差異。中國軍隊不僅在組織、紀律和工作作風方面和美國軍隊不一樣，它們特別重視人際關係、部隊的沿革歷史和地方色彩的背景。因此，他需要時間處理這些個人和心理因素，然後才能放心地把軍隊交給美

62　王世杰日記，1944年7月27日。
63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7月23日。
64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7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639。
65　同上。
66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7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637-638。
67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7月8日，《戰時外交》（三），頁635-638。
68　同上，頁635-636。又見：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7月11日，《戰時外交》（一），頁175-176。

國人指揮[69]。

以上三點大致決定了中國政府談判的基調。

## 三、赫爾利作爲斡旋人

前文曾經提過，蔣介石回覆羅斯福電報時要求美國派遣一位斡旋人，羅斯福很快就答應派遣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作爲他個人代表來華。後來由於赫爾利向羅斯福作出對史迪威不利的言詞，因此有些史學著作以尋找原罪的思維，把蔣介石這一要求看成他處心積慮的計謀，目的在製造這位斡旋人和史迪威之間的衝突，進而達成其全盤破壞史迪威的計畫，最後蔣介石玩弄美國人的陰謀詭計終於得逞。爲了能夠在邏輯上言之成理，同時又達到支持史迪威的立場，因此有些歷史著作能夠作出的最好方法就是醜化赫爾利，把他形容成頭腦簡單、自我陶醉的粗漢，喜歡炫耀自己，行爲類似小丑。而他在面對中國險惡的政治時，又不知天高地厚，被蔣介石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後還在史迪威背上捅了一刀，破壞了美國對華政策。事實上，即使史迪威尚未離開中國之前，重慶的一些美國軍官已經指責赫爾利出賣了史迪威。後來不少學者更是堅信，他是導致史迪威撤職的直接禍首。依據這種看法，赫爾利的任命是當時美國外交政策上的一大敗筆，而且是蔣介石強加於美國政府的一個奸計。

以上這些傳統的說法其實漏洞百出，因爲赫爾利任命的緣起和他後來在史迪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遠遠比這些傳統說法要複雜得多，因此本節的目的就是更全面地去檢查相關史料，重新認識此一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貌。

### (一)派遣特使的理由

赫爾利出使中國其實沒有中國陰謀成分在內，而是充分符合美國官方自己的設想。早在1944年9月以前，羅斯福和蔣介石已多番使用個人代表(特使)傳遞訊息。稍早的例子包括拉鐵摩爾來重慶，宋子文去華盛頓，居里兩度訪華。1944年6月中美關係開始惡化時，蔣介石派遣孔祥熙作爲個人代表赴華盛頓訪問，理由是孔祥熙是他最能信賴的同事，對中國政治、經濟和財政等事務都有全面了解，因此最有能力向羅斯福傳達蔣介石本人的觀點[70]。正因爲如此，蔣介石要羅斯福派一位具有同等資歷的個人代表前來中國，乃是理所當然。早在美國提出指揮權要求之前，中美兩國領袖已經

69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7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637-638。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7月12日，《戰時外交》(三)，頁639-640。

70 《戰時外交》(一)，頁172-173。

就交換特使問題開始商談。副總統華萊士熱烈支持這個做法，只是他心中最理想的中方候選是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71]。這個背景可以幫助解釋，爲什麼蔣介石在7月8日提出答覆並邀請美國派一位特使前來中國時，羅斯福當即爽快予以同意。

作爲美國政府決策過程中重要的一員，馬歇爾對蔣介石的動機很快就產生了警惕之心。因此他在7月8日試圖說服羅斯福，既然蔣介石已經答應交出指揮權，那麼美國就應該集中精神，趕緊把指揮權早日拿到手，而不要爲派遣特使一事去分神[72]。但是羅斯福沒有接受馬歇爾的建議，反而在7月13日逕自電告蔣介石說，他正在物色一位具有政治遠見的人士作爲他的個人代表，以謀求和蔣介石合作。羅斯福同時也向蔣介石強調，當務之急是任命一位軍官，立即指揮中國軍隊在華中地區的戰鬥活動[73]。

我們並不清楚羅斯福否決馬歇爾建議的理由是否和華萊士有關。但是華萊士在7月8日確實收到蔣介石的一封電報，內容是希望羅斯福派特使到中國，處理中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等重要問題，並促進雙方合作[74]。這封電報的目的當然是敦請華萊士從中促成。華萊士在和羅斯福會面時，很可能也討論了這個問題。另外一個可能則是，羅斯福本人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讓他比馬歇爾更能體會蔣介石的處境。他收到蔣介石電報後，曾經向李海上將表示(7月13日)，蔣介石說的話也有相當道理[75]。簡而言之，羅斯福一方面能夠體會史迪威和馬歇爾的心情，催促蔣介石趕快抓緊時間轉移指揮權。另一方面，他也認爲蔣介石延長時間的要求並非沒有道理。不過，這並不是羅斯福延誤馬、史兩人建議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此後四個星期中，羅斯福本人離開華盛頓，到舊金山和阿拉斯加，最後抵達珍珠港，召見麥克阿瑟和尼米茲討論太平洋戰略[76]。總統一旦離開首都，一般政府工作的步調頓時緩慢下來。因此，羅斯福的延誤是出自他個人行程的需要，與蔣介石扯不上關係。

### (二)挑選赫爾利的原因

一旦羅斯福決定派遣個人特使，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決定人選。馬歇爾的對應之

71 華萊士從成都致蔣介石信件，1944年6月27日，《戰時外交》(一)，頁871-872。

72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from Marshall, July 13,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18. MFA.

73 FDR message to CKS, July 13,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18. MFA.

74 蔣介石致華萊士電，1944年7月8日，戰時外交(一)，頁875-876。

75 As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386.

76 羅斯福返抵華盛頓的日期是1944年8月17日。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386-387, 416.

道，是絕對保證這個特使能和史迪威以及軍部充分配合，而不致變成絆腳石。8月3日當馬歇爾把總統的決定告訴史迪威時，也表示他的錦囊之中已有妙計，排除任何可以干擾史迪威工作的人成爲特使候選人。

馬歇爾告訴史迪威說，爲了要保證後者今後能夠順利展開工作，他突然想到赫爾利將軍是一個上好特使人選。根據馬歇爾評價，赫爾利和總統互動良好，能力強，過去又一直讚賞史迪威處理蔣介石關係時的態度，工作上應該能給與史迪威很大幫助。因此，他打算向羅斯福推薦委派赫爾利擔任特使一職。不過由於事關史迪威未來，故想先徵求意見。馬歇爾最後強調說，「我愈想愈覺得這個主意不錯。因爲赫爾利正是你早就應該有的幫手。」[77]

顯然，從馬歇爾角度看來，赫爾利的優點爲旁人所不及：老練外交家，總統信任的智囊，對史迪威充滿好感，並且對陳納德充滿惡感[78]。集諸多優點於一身，實在無人可比。

總之，馬歇爾在特使任命過程中，技巧地關閉了羅斯福的選擇之門，先是推出赫爾利的名字，繼而向史迪威保證，只有得到史迪威同意後才會正式推薦[79]。更有進者，根據馬歇爾原意，赫爾利只是一個輔佐史迪威的角色，而這也與赫爾利本人的想法甚爲一致。簡言之，赫爾利決不是蔣介石陰謀得逞插手送進來的禍害，藉此阻擾史迪威的計畫。相反地，他是馬歇爾和史迪威親手挑選和推薦的，因爲他們都認爲他是史迪威最好的支持者。他不但不是羅斯福白宮的班底幕僚，而且還具有陸軍出身的優勢。事實上，在馬歇爾的心目中，赫爾利和史迪威兩人，都是美國從蔣介石手中奪取軍權計畫的重要執行人[80]。

當時跡象顯示，馬歇爾的計謀相當巧妙。赫爾利第一次訪華(1943年11月)爲時短暫，但史迪威已經和他建立友誼，讓史迪威相信他們兩個人是知音，對於中國問題的看法高度一致。根據史迪威報導，當赫爾利在這一年11月19日首度得知，蒙巴頓預備把史迪威從印度和緬甸趕出去時，他立即警告蒙巴頓不要輕舉妄動，並把史迪威形容成在美國陸軍中地位極爲崇高的將領。如果蒙巴頓膽敢冒犯史迪威的話，後果一定不會愉快。赫爾利也把史迪威形容成是以獨力支大廈的氣度，讓中國在危難中得以維持抗戰的

77 Marshall cable to Stilwell, August 3, 1944, in Xerox File 1203, MFA. Also,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7, Folder 221.

78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15-416.

79 Marshall cable to Stilwell, August 3, 1944, in Xerox File 1203, MFA.

80 Marshall message to Stilwell, August 3,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功臣，並說美國人民把史迪威看成是「中國的救星」[81]。因此，他警告蒙巴頓最好不要招惹史迪威。到中緬印戰區訪問的美國人，雖然也發表支持史迪威的言論，但是沒有一個人說得像赫爾利這麼堅強有力，難怪史迪威對赫爾利持有極爲良好的印象。

8月10日，羅斯福正式通知蔣介石，決定任命赫爾利爲他的個人特使，同時也催促蔣介石立即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82]。因此，如果蔣介石在此之前擔心羅斯福的動機，因而不願交出軍權的話，他顯然把羅斯福任命赫爾利爲特使看成是安撫他的姿態[83]。於是他8月12日回電羅斯福，聲稱他已經開始準備讓史迪威得到指揮權的工作，並希望一切可以順利進行[84]。

簡言之，派送特使是羅斯福自己的主意，但是決定人選幾乎是馬歇爾和史迪威共同主導，而赫爾利正是他們心目中的上上之選。

## 肆、美國加緊施壓要蔣介石交出軍權

鑒於美國領袖們一致認爲中國的崩潰迫在眉睫，因此他們得到指揮權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史迪威面臨的難題是，中國數百萬軍隊來自不同地域背景，有不同政治效忠對象，要想在他們上面建立一個全局性指揮系統，洵非易事。

中國有十個戰區，史迪威當然不可能全部理解，但是他必須對他今後要共事的中國人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才能有助於工作展開。這一大批中國軍隊不但有不同的訓練、組織、紀律和裝備，他們指揮官的學識素養、個人性格和作戰閱歷也大不相同。他們甚至對日本人和僞政權的態度也各有心中一本私帳。除此之外，還有一大堆中國軍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因素需要考慮，才能建立新而有效的指揮系統。因此，史迪威在一旦得知行將擔負如此重大而又複雜的大任之後，理應抓緊時間盡一切努力去研究中國軍隊實況，並擬出一套審慎全面的執行計畫才對。有趣的是，史迪威完全不作如此想。

### 一、史迪威休假期間的閒情逸致

史迪威向美國政府發出十萬火急警訊，聲稱中國即將全盤崩潰。而令人費解的

8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November 10, 1943, p. 193.

8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8月11、19日。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8月19日，《戰時外交》（三），頁653-654。

83 《戰時外交》（一），頁162。

84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8月12日，《戰時外交》（三），頁650。

是，在這個緊要關頭他卻表現得相當閒散，完全看不到他對中國戰局的憂心忡忡。7月29日，他結束東南亞戰區任務後，開始給自己放了一個月的長假。儘管他此時仍然擔任中國戰區的官方職務和責任，但他沒有向蔣介石請假，就徑自前往印度南方的錫蘭島逍遙去了[85]。僅就軍紀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明顯的失職和抗命行爲。但是在中美同盟關係中，這是史迪威正常作風。

在錫蘭島一個月度假期間，史迪威下定決心犒勞自己的辛苦，盡情享受舒服和尋找各種娛樂。他的日記和其他私人文件提供了大量多彩多姿的描繪，內容足以讓一個有豐富經驗的旅行家羨慕不已。他除了逛商店、看風景、在公園裡散步和曬日光浴之外，還參加了許多旅館舉辦的晚會聚餐，或者是乾脆睡大覺。他盡情玩紙牌，有時一玩幾個鐘頭不肯罷手，而且日復一日，跡近沉迷。史迪威在給妻子的信中說，他要把時間打發在讀書、休閒和睡覺之上，不參加任何會議，把一切事務交由屬下參謀們去打點。特別讓他稱心快意的是，那些英國佬完全搞不懂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86]。他心中或許得到最大的快感就是，那些把他趕走的英國人本來以爲他必定會每日愁眉苦臉，卻想不到他居然會如此逍遙灑脫。這大概是他感到能夠對英國人作出的最好報復。他的記載中還有另外一個惹眼的地方，那就是他絕口不提是否思考過，如何去幫助中國度過當前難關；也不提是否指示過幕僚，預先爲指揮權的轉移和運作做出規劃，以便得到指揮權之後可以立即派上用場。

沒有人可以責怪史迪威去度一個短期的休假，尤其是他在緬甸叢林中奮鬥了那麼長的時間，更是不可以雞蛋裡挑骨頭。當然他應該事先向中國戰區遞呈請假報告，在得到批准後開始度假。令人訝異的是，史迪威在向每個人警告中國即將被災難吞噬，而只有他有能力拯救中國之後，卻能夠遠在錫蘭優哉游哉地享受漫長的假期。即便羅斯福特使赫爾利此時還沒有趕到重慶上任，史迪威也沒有躲開重慶的藉口。史迪威向來有閒不住的個性，同盟國就第二次緬甸戰爭舉行的漫長談判以來，史迪威都積極參與。緬甸戰爭籌備期間，他想趕快開戰，因此心情急切，想把所有準備工作做好，一旦開戰命令下達，便可以完成心願。而現在他卻反常地輕鬆自在，一副中國戰事與他無關的姿態，這其中的玄機實在不可忽視。

或許最明顯的解釋是他的動機改變了。由於他此時的最高目的是取得指揮權，所以如果中國戰局變得愈糟糕，那麼他的談判籌碼就愈增加；如果中國崩潰的預言變得愈

85 See: JWS t-w diaries, July 29-31, 1944.

8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ies July 29-August 29, 1944, pp. 246-250. Also: JWS t-w diaries, July 29-August 29, 1944.

真切，他就變成愈不可少的救星，而他的態度也就可以變得愈強硬。就這個情形來看，在當時世界戰爭的雙方陣營裡，大概沒有一位身負重任的將領可以像史迪威一樣，把自己的責任拋諸腦後如此之久，又能如此盡情享樂。在此期間，蔣介石幾次敦促史迪威返回重慶，商討指揮權轉移的細節[87]，但史迪威始終不慌不忙，慢條斯理。事實上，當他終於偕同美國特使赫爾利以及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返抵重慶時(9月6日)，已經是離他警告中國面臨崩潰60天以後的事。這種情景，正像是一位救火隊長，在發出最高等級的火災警報以後，決定留在家裡喝茶看報，理由是上級還沒有把他的新升官令發下來。史迪威此時感到最大的滿足，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在1943年就已經警告過你們了[88]。以上所敘述的一切，史迪威的日記提供了最完整的史料。

## 二、華盛頓加緊壓力

與此同時，史迪威在華盛頓的上司發給蔣介石一連串電報，催促後者趕緊交出指揮權。比如在7月15日致蔣介石的電報中，羅斯福警告，假如指揮權不趕快轉移，那麼中美合作將無前途可言[89]。8月10日，史迪威的一封信讓馬歇爾憂慮大幅升高，因爲史迪威警告說，中國即將「爆炸」，有一群地方軍人正醞釀要把蔣介石趕下臺[90]。羅斯福一旦決定指派赫爾利擔任個人特使後，在8月23日給蔣介石發一電報，內容是請蔣介石安心，赫爾利一定會協助史迪威行使指揮權，並幫助史迪威了解中國政治的複雜性。因此羅斯福認爲，蔣介石已經沒有任何理由拖延史迪威的任命了[91]。爲了更提高蔣介石的合作意願，羅斯福在8月23日還向蔣介石表示，他正擬訂支配租借法案物資的新規定，將不再讓史迪威負責該項工作[92]。

## 伍、蔣介石「辭職」的念頭

從蔣介石角度來看，羅斯福所採取的大方向雖然正確，但是他並沒針對蔣介石的

8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50. Also: JWS t-w diaries, August 26, 1944.

8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2, entry of September 17, 1944.

89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7月17日。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7月15日。《戰時外交》(三)，頁642。

90 Stilwell message to Marshall, August 10,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91 FDR message to CKS, August 21,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Folder 8, MFA.

92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8月23日。《戰時外交》(三)，頁654-655。

三點意見(見前文)作出具體回應。蔣介石特別感到憂心的是，美國政府根本不理睬蔣介石以簽訂協議方式界定指揮權的主張。這一舉動表示，美國人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一張空白支票，由美國人任意填寫其內容，中國人不得加以限制。假如蔣介石果真順從羅斯福要求，把指揮權匆忙移交給史迪威，那麼他和美國人談判共產黨軍隊及租借法案物資等重要問題時，手中將一無可以運用的籌碼了。因此羅斯福的電報只能引起蔣介石的高度不滿。在他看來，這等於是美國要求中國無條件奉上軍事領導權[93]。蔣介石環顧四周圍的處境，終於不得不開始考慮一個重要的選擇。

經過兩整天掙扎，蔣介石最後決定(8月25日)以合作態度處理羅斯福的要求，但是他強調必須保持中國國內安定。他甚至一度願意接受美國政府使用共產黨軍隊的要求，條件是美國不可以對中國政府官員行使任免權[94]。但是在他內心，蔣介石認爲(8月26日)美國人欺人太甚，他們對中國的侮辱已遠比日本侵略更難以忍受。他也感嘆美國人的欺壓，超過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任何外國加諸於中國的欺侮[95]。無論如何，他還是相信應該堅持忍辱負重的初衷，跟美國繼續交涉，並希望中國最終可以度過難關。因此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 惟考慮結果，對美外交方針，不能不用逆來順受之道。故決定極端容忍，接受其要求。如運用得當，對俄對共，或有轉變環境之可能。不特不宜固拒，而且加以信任，期待情勢之好轉。此一政策之決定，乃為國家存亡成敗之所繫，自信其能因禍及福，轉敗為勝也。以余自反，對美對俄毫無虧欠與愧疚之心也[96]。

然而蔣介石剛作了上述決定，他的心情在8月最後五天又被羅斯福攪亂。導因是羅斯福寄來一連串措詞粗魯和語帶威嚇的電報，令蔣介石怒不可遏。在這幾天裡，蔣介石的日記寫得極長，焦點全在中美關係。有兩個問題最令他擔心：1. 他應如何去理解羅斯福的動機和美國要求的真正含意；2. 他應採取什麼對策。

到這時，蔣介石對羅斯福的態度有了重大改變。在此之前，蔣介石對羅斯福極爲

93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24日。
94 同上，1944年8月25日。
95 同上，1944年8月26日。
96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26日。

尊重，對他幫助中國獲得四強地位心存感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7月23日致羅斯福的電報，對羅斯福幫助中國再三道謝[97]。蔣介石表達對羅斯福友好和尊敬的語言，並非外交客套，因爲中國政府和英國、蘇聯的通信中從來沒有用過類似語句。對於上述羅斯福語氣粗魯的電報，孔祥熙的判斷是，這些電報必定沒有經過羅斯福過目，只是總統助理擬好電文以羅斯福名義發給蔣介石[98]。

到了8月底，蔣介石對羅斯福的友善和信賴已經開始消失。此後，蔣介石不斷抱怨，羅斯福其實是把中國對他的感激當成籌碼，逼中國完全順從美國旨意。孔祥熙8月28日來電，火上加油，因爲孔祥熙指出，羅斯福的言行突然都變得更具威脅意味。這就不免令蔣介石懷疑，美國所以要求整個軍隊的指揮權，其實不過是美國制定的脅迫中國大計畫中的第一步而已[99]。如此說來，未來發展將更爲可怕。

蔣介石對自己心理最詳盡的剖析，大概是他爲8月發生事情寫的所謂「本月自反錄」。其中不但分析許多實際事情，也全面宣洩自己的感情。他寫道：

> 我軍指揮權移交關係及利害問題之研究。甲、美藉招我為四強之一之虛名示惠於我，使我受其控置(制)，並藉此以要脅吾人以遂其所欲，使我不能脫其藩籬，此乃盜虛名而受實禍也。乙、因以甲項之故，我政府恐美國不能諒解，乃事事顧慮，對內不能制共，損傷我政府之威聲，對外隨附人後，不能有所主張，徒作他人之傀儡，消失我革命獨立之精神。丙、彼則以示惠於我，凡彼之所要求於我者，無不強制逼迫，非達其所欲不可，而我所希望於彼者，則彼皆置之不理，故我對彼，只有盡其義務，而毫不能享有權利，使我手足束縛，不能有絲毫自由之行動。尤以對內對共，更使我不能實施政策為甚。今日對美外交實已損失我自由之精神，無異於倭寇往昔之對我也。當此成敗存亡關頭，今後美國對我者，尚有利益幾何，與我之抗戰建國之政策必欲仰賴美國者幾何，美國究竟有控置(制)中國之陰謀否，以及美羅今後對余果有諒解與合作之可能否。不能不徹底研討分析，以定根本之方針也[100]。

97 Memorandum from CKS to FDR, July 23, 1944. Xerox File 1124, Item 2561. MFA.
98 孔祥熙和顧維鈞在1944年9月23日談話，《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436。
99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28日。
100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31日。

在此同時，還有一些其他事件，也令蔣介石對美國政府的反感超過對羅斯福個人的反感。先是，他要求史迪威盡快從錫蘭返回重慶(8月26日)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史迪威卻置若罔聞[101]。8月28日他又得知，重慶的美國陸軍已經通知美國公民開始作好全面撤退準備。這使得蔣介石不禁懷疑，美國軍方企圖把他推翻[102]。事實上，蔣介石得到的結論是，美國對華態度不比日本對華態度更好，因此不免懷疑，中國到底能從同盟國中得到甚麼好處[103]。因此他8月底的日記已經開始透露，他已在認真考慮是否應該辭去所有軍事和政治職務(當然中國戰區也會宣告解散)，並且認爲只有辭職一途，才能讓中國免於美國控制和恢復他個人的自主權[104]。顯然在他心中，跟美國決裂已變成是可以想像的出路了。

當然，蔣介石也考慮到決裂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比如說，日本可能利用這個機會給予中國致命的一擊，徹底解決其所謂中國問題。國內中央軍可能完全瓦解，而無法恢復戰鬥力。各省地方實力派可能伸張自治權，推翻重慶政府，甚至和日本達成和平協議。同盟國(美國)在自由中國地區可能培植一個傀儡政權(例如孫科)。這個傀儡政權雖沒有能力作戰，卻很可能被迫對共產黨和蘇聯作出重大讓步，因而造成中國大規模的政治和社會震盪。一旦這些發展成爲事實，西方國家便會得到需要的口實，明目張膽地干涉中國內政，並借此恢復西方在中國的殖民統治體系[105]。蔣介石認爲他唯一的希望，是以辭職的舉動去說服羅斯福尊重中國的國家榮譽，放棄高壓策略，並真心誠意和蔣介石合作[106]。所謂「辭職」一詞是蔣介石在日記中所使用的隱晦語詞，也是他最秘密的私心話。依據他的政治作風，或許他所指的就是宣布「下野」的做法，至於法律程序應該如何處理，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說明，恐怕也無法深究。

8月31日，蔣介石回顧過去五天的想法，依然認爲唯有辭職一途才能讓他解脫美國壓迫和重獲行動自由[107]。然而隔一天，也就是9月1日，蔣介石突然改變心意，認爲中國最好的出路仍然是與羅斯福合作，並決定接受美國要求，只要這些要求不損傷中國基本國家利益，就應該忍住一口氣吞下[108]。他在次日日記中對過去幾天的心情作了更清晰

101 JWS t-w diaries, August 26, 1944.
102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28日。
103 同上，1944年8月31日。
104 蔣介石日記，1944年8月29日。
105 同上，1944年8月31日。
106 同上，1944年8月30日。
107 同上，1944年8月31日。
108 同上，1944年9月1日。

的表述，形容美國的壓力和凌辱如下：

> ……皆為十年來所未有之恥辱。處境至此，悲慘已極。今日環境，全世界惡勢力已聯絡一氣，來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獄張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個波浪無不是威脅我。這樣摧殘我的情景誠是毫無理由。自思我往日，雖驕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報應，而且問心實無愧怍之事。惟信此皆出於主的旨意，只有忍耐接受而已[109]。

一旦他作出這個決定，赫爾利、納爾遜(Donald M. Nelson, 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和史迪威又相繼抵達重慶，蔣介石遂在9月7日召見史迪威進行40分鐘會商，並向史迪威仔細解釋得到指揮權之後應如何和中國軍隊相處。同一天蔣介石也通知赫爾利說，原則上已決定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110]。在此後日子，蔣介石非常積極地解決中美兩國之間在細節上依然存在的歧見。

應該指出的是，蔣介石的辭職念頭並非裝腔作勢，也不是借此虛聲恫嚇美國。所以連他最親密的幕僚(可能包括蔣夫人在內)都不知道他有這個想法。這種做法與他在此次危機中的處事作風非常吻合。一旦了解這一點，我們便會更容易了解，9月初兩周中，史迪威、赫爾利、宋子文和蔣介石之間的談判。假如蔣介石從來不打算和美國人真心真意談判，他就沒有必要鄭重考慮辭職一事。在那種情況之下，他大可以採取盡量拖延的策略，和美國人玩下去。

依理類推，假如蔣介石確實認真考慮過辭職，並且準備接受和美國決裂的後果，那麼美國人就必須十分謹慎地運用壓力策略，務必不要超過蔣介石能承受的底線。雖然8月底蔣介石最後還是選擇了避免和美國全面決裂的做法，但是這整個過程已經為9月份中美關係發展作出了嚴重預警。

## 陸、中國轉移指揮權的步驟

關於指揮權轉移之前應該完成何種準備工作，中美兩國間存有重大歧見。蔣介石的立場是要有充分準備，而美國政府並不以為然。美國人本來就懷疑蔣介石沒有誠意

109 同上，1944年9月2日。
110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7日。

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所以一旦中國政府交出指揮權的速度不如理想，他們立即認爲是有意拖延，有被欺騙的感覺，並相信增加壓力是可以讓中國屈服的不二法門。

移交指揮權工作看似簡單，但是中美雙方對於「移交」一詞認知不同。從所有的中方資料裡面，本書作者目前還看不出，蔣介石或其他官員在7月7日之後採取過推諉戰術的跡象，只發現蔣介石絞盡腦汁，一直想要釐清自己感情和現實上的考慮。他一方面認爲美國的要求威脅到他的權力基礎，公開挑戰他的領導才能，並且無情地踐踏中國國家尊嚴。但另一方面也非常擔心移交指揮權可能引起的政治後果，包括重慶政府的穩定、軍隊士氣的維持、高級將領的反彈、地方軍人和共產黨的態度等各方面。蔣介石認爲正式「移交」指揮權之前，必須就這些問題作好安排。

美國政府施壓蔣介石交出指揮權時，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假設：蔣介石既然是中國國家元首，當然和西方現代國家一樣，手中擁有可以操控指使國家軍隊而具有實質內容的權力，統稱爲指揮權，因此他只要以政府名義昭告全國軍民，宣布史迪威已經成爲他們新指揮官(或是總司令)，移交手續就告完成，實質的權柄就已經落入史迪威手中，而史迪威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行使這一項權力。他們無法理解，中國政府爲什麼把移交指揮權看成那麼複雜的問題，在行爲上拖拖拉拉，除非是想把它作爲賴帳的藉口。

不幸，美國的假設誇大了蔣介石手中權力的實際內涵。美國是一個制度化的體制，國家領袖擁有什麼權力在憲法中規定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取得位置，就可以指揮下級官員。但是中國絕不是這樣的國家，蔣介石或許手中並沒有制度化的權力，所以他能夠指揮中國軍隊還要靠制度外的力量。即使他有指揮權，同時也把它交給了史迪威，但是史迪威缺乏制度外的其他因素作爲支援時，就未必能夠指揮得動中國軍隊。從蔣介石需要靠制度以外的因素去指揮中國軍隊來看，與其說蔣介石是一個善於玩權弄術，置中國於其股掌之上的主宰人，還不如說他是中國政軍大環境中的一分子，自己也逃不出這個大環境運行中的潛規則，絕不是以一紙命令，就可以把指揮權隨意轉移他人之手的。

無論如何，蔣介石「有條件」地接受羅斯福要求，至少表示願意將指揮權交出。這個決定也讓他採取若干步驟，要等到兩國在重要事務上達成協議後，才開始交出指揮權。那麼他心目中的安排工作究竟是什麼？

## 一、蔣介石幕僚的建議

羅斯福的要求無疑造成一個嶄新的局面，使中國軍事領袖都不知如何因應。最受其直接影響的兩位中國軍事領袖是何應欽(軍政部長和參謀長)和徐永昌(軍令部

長）。他們都表現得有些手足無措。當蔣介石指示他們研究如何處理美國要求時，何應欽天真地建議，中國應派代表去英國了解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如何行使指揮權。徐永昌將軍則建議採取第一次大戰模式，當時法國福熙（Ferdinand Foch）元帥名義上是聯軍總指揮官，實際上每個盟邦都掌控其本國軍隊。徐永昌進一步建議，中國先劃出兩個戰區（第六、第九戰區），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觀察效果後再決定如何交出全國軍隊指揮權[111]。鑒於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實質上參與國際同盟關係，而美國的要求對中國而言又是如此的「史無前例」，這兩位軍事首長的惶惑也就不難理解。在這兩者之間，何應欽的想法最爲天真。因爲艾森豪的指揮權是經過英美兩國長期研究協商而形成的產物。美國人歷來拒絕和中國政府簽訂明文協議，爲的就是要避免中國要求採用同樣模式，因此絕對不會向中國政府透露其具體內容。

依據中文資料，中國政府第一份相關官方文件是何應欽提交的實施方案。何應欽在蔣介石回覆羅斯福要求後十天呈交（7月18日），要點是：1. 政府軍應區分爲攻擊部隊和防守部隊兩種。一部分攻擊部隊（每個戰區2-5個軍）可交由史迪威指揮，對日軍展開進攻，其餘則接受訓練和改編。2. 美國應負責攻擊部隊的組織、裝備和後勤，中國負責人員配備和人事任免。3. 中國應授權史迪威決定戰鬥序列和任命指揮官，時間以戰爭期間爲限。4. 共產黨部隊純屬內政問題，不應列入本計畫。假如美國因此停止對中國援助，則中國應該準備獨力作戰，絕不屈從美國要求。5. 中國在印度軍隊的指揮權應交給史迪威下屬。6. 美國要求中國把所有軍隊交由美國軍官指揮，違反中國過去七年抵抗日軍和維護國家獨立自主的初衷，其後果勢必傷害中國國家尊嚴。中國既然不可能像蘇聯一樣，堅持獨立行動，因此也可以接受羅斯福要求，並和史迪威進行磋商，先把細節談判妥當[112]。

上述何應欽報告的重要性在於它顯示，蔣介石在接受羅斯福要求把指揮權移交給史迪威之時，並未採取拖延戰術，而是立即命令何應欽進行策劃，要把移交細節予以精確化和合理化，而何應欽也很快就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個舉動似乎說明蔣介石最初的動機並不是唬弄美國，而是在對面臨的問題進行嚴肅慎重的思考。相對而言，在美國軍方和史迪威個人文檔中，本書作者還找不到類似的實施方案或是細部規劃的痕跡。由此或許可以看出，雙方對於指揮權轉移一事在心態上的巨大差別。中方是力求精準，美方是大而化之。

111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7月18日。

112 何應欽對於史迪威指揮權事項向蔣介石提出的報告，1944年7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643-644。

## 二、蔣介石扮演的角色

蔣介石在一封致羅斯福的電報中(7月23日)表示，他已準備把所有的政府軍交由史迪威指揮，但共產黨軍隊必須等到後者同意接受中央政府命令後，才能付諸實行。他還表示，兩國政府仍需就史迪威的官銜、職權，及其與蔣介石的工作關係等細節達成協議。最後，他表示想要獲得美國援華租借法案物資的掌控權，但是隨即聲明，他也願意把這個支配權轉而託付一位美國軍官，只要此人不是史迪威即可接受[113]。值得注意的是，熊式輝在7月29日曾問蔣介石，是否考慮將史迪威撤職以結束當前所有頭痛問題。蔣介石回覆說，完全無此可能，今後不願再談此一問題[114]。這些事情發展顯示，此時蔣介石已經接受了，中國不得不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事實。而何應欽呈交的方案，已經成爲中國政府立場的基調。

8月中旬，蔣介石對史迪威新職的名稱和職權，又都親自作了進一步的思考，並形成具體想法。在一件親筆草擬的文件中，他對史迪威的職銜和權力作了更精確的界定：

> 名稱
>
> 一、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中美聯軍前敵總司令。
>
> 職權
>
> 二、前敵總司令承中國戰區統帥之命，指揮戰區前線各軍作戰。
>
> 三、指揮部隊：中國戰區列入戰鬥序列之前線作戰部隊，皆受前敵總司令指揮，戰鬥序列另定之。
>
> 四、……
>
> 五、……
>
> 六、中國戰區內，凡中國領土，包括東北、臺灣在內，各級地方行政與人事均由中國政府直接管理。
>
> 七、中國軍隊之人事行政應依中國軍隊人事法規及其行政系統辦理[115]。

---

113 Memorandum,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uly 23, 1944, in Verifax File 2561, Item 2559, Part 2. MFA.

114 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23。

115 "Matters To Be agreed upon Prior to the Appointment of General Stilwell as Field Commander" undated,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Document 22. 又見：

羅斯福8月21日回信，接受蔣介石的對指揮權的定義，但是作了幾個修改。最重要的是，羅斯福認爲史迪威的職權應該包括所有的中國軍隊，即攻擊部隊、防守部隊和共產黨部隊。另外，他對蔣介石提的細節問題一律置之不理。因爲在他看來，這些細節無需逐條考慮和約定，當務之急是把指揮權盡快交到史迪威手中去行使[116]。

在這裡我們可以再度看得出，中美雙方在心態上和談判策略上有重大分歧。羅斯福的立場是，先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拿到手，再讓美國人思考如何去運用它。這個「空白支票」策略給予美國人最大的彈性，而且可以兌現多次。任何時候，只要美國人感到他們遇到阻力時(當然這也由美國人來決定)，他們就可以抱怨問題是出在授權不夠充分，進而要求中國讓出更多的新授權。即使失敗是由於美國人的人爲錯誤所引起，亦復如是。如果中國人表現出某種程度的保留或是遲疑，就會引起新一輪外交危機，促使美國施用更大壓力來迫使中國讓出其他的權力。簡言之，中美兩國的互動關係將變成類似螺絲釘式，每當美國想追求新目的時，就把螺絲釘扭緊一點，從中國政府手裡壓榨出更多的讓步。由於戰時中國一切政府行爲皆以軍事活動爲最高優先，政治經濟各領域的決策皆爲軍事服務，因此史迪威的軍隊指揮權絕非只限於軍事範圍而已，最終必會使他的權力擴張到全國性範圍，而且凌駕於中國政府之上。

相對而言，蔣介石主張把指揮權問題當成外交問題一樣來處理。他主張先把史迪威指揮權的權限加以明確規範，再把可能引起糾紛的問題梳理明白。由於中國是交出指揮權的國家，而美國是接受指揮權的國家，中國當然要求獲得某種程度的保障，使美國不致得寸進尺，不斷要求交出更多的權力。對這個問題，蔣介石特別敏感，因爲他認爲在1942年第一次緬甸戰爭時，已經犯過一次大錯誤。當時中國對史迪威職權的定義完全和史迪威自己相左，但是苦無文字爲憑，被美國人隨心所欲地予以擴大運用，導致慘痛結果。1944年他又上了一次當：因爲他只是授權史迪威使用X部隊，沒想到史迪威竟然把Y部隊也拖進了緬甸戰場。事到如今，蔣介石對開這種「空白支票」已經產生嚴重恐懼症。因爲沒有規範的授權，往往會導致權力極度膨脹的結果。

(續)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8月14日，《戰時外交》(三)，頁651-652。又見：蔣介石手擬指示，1944年8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652-653。

116 FDR message to CKS, August 21,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0, MFA.

# 柒、8月到9月中旬的談判

## 一、蔣介石接見赫爾利與史迪威

一旦蔣介石內心認爲交出指揮權乃是無可避免之事時，他下一步的努力就是要肯定史迪威不會濫用指揮權。因此他在9月7日和史迪威會面時，花了將近40分鐘時間詳細討論今後史迪威應該如何指揮中國軍隊。他特別強調，史迪威今後的工作內容六成是軍事，四成是政治[117]。根據史迪威形容，蔣介石的態度和緩而友善。史迪威把他們的會談說成是一場「愛之餐」。蔣介石見面後宣稱，對史迪威完全有信心，鼓勵史迪威不要客套，請就中國駐緬軍隊司令官人選表示意見。蔣介石的表現，讓史迪威既感意外，更高興不已[118]。

同天，蔣介石會見赫爾利和納爾遜時，也明確表示會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119]。9月8日，蔣介石又親筆草擬史迪威指揮權的重點，其中包括：史迪威職務名稱及權責；指揮範圍涵蓋中國戰區戰鬥序列全部部隊；美國向中國提供的武器裝備由中國政府控制使用；軍事人員及行政依照中國規定行事；所有中國戰區的地方政府由中國中央政府直接管理[120]。從在此之前所引用的幾個中方文件可以看出，蔣介石個人參與的程度逐漸增加，重點也在不斷重複，因此中方的立場已逐漸凝聚成形。

稍早9月4日，史迪威和赫爾利在印度會晤時，赫爾利已向史迪威傳達馬歇爾對後者的全力支持[121]。他們兩人抵達重慶後不久，史迪威益加相信赫爾利是他的忠實夥伴，赫爾利會和納爾遜一樣，全力支持史迪威對中國的兩項期望：一是國家統一，二是軍隊指揮權統一。他並且相信他們兩人在達到上述目的之後，才會和中國討論美國援助的問題[122]。

由於赫爾利此時的目的就是全力支持史迪威，所以當宋子文表示中國必須有權控制租借法案物資時，赫爾利斬釘截鐵拒絕了宋子文的請求。赫爾利這種強硬態度

11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58, diary entry of September 7, 1944.

118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7, 1944.

119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7日。See: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7, 1944.

120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8日。《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8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9月8日。

121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September 4, 1944, p. 250.

122 *Ibid.*, undated notes, p. 257. Also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undated, in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令史迪威高興不已，慶幸美國政府能夠派遣赫爾利來保護美國的在華利益[123]。在9月16日，宋子文再度以中國國家尊嚴爲理由，要求由中國控制租借法案物資，赫爾利的回應更加尖銳，不但指責宋子文胡說八道，而且提醒宋子文，租借法案物資是美國人的，美國人高興給誰就給誰。赫爾利還緊追不捨，告訴宋子文說，這些物資的使用也牽涉到美國的國家尊嚴，甚至他們子孫的尊嚴，因爲將來將由他們來付帳[124]。

赫爾利這些坦率犀利的話，正是史迪威自己所想說的，怪不得他聽得異常順耳[125]。事實上，史迪威深受赫爾利言語的鼓舞，不久之後也以同樣語氣訓斥宋子文[126]。總括來說，直到9月19日，史迪威親手遞交羅斯福致蔣介石電函前，史迪威都堅決相信，赫爾利是美國政府送來支援他的最佳夥伴。而赫爾利的言行也充分證明，史迪威的判斷是正確的。

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8日進行第一次長談。兩人都急於解決最複雜的問題。蔣介石希望中美雙方簽訂正式協定，仔細界定史迪威權限，而赫爾利的對策是擬就一份官方聲明，由蔣介石單方面宣布，內容依照美國軍部意思，對史迪威的職權作最寬鬆的界定。赫爾利還擬好另外一份文件，請蔣介石直接交付給史迪威，說明後者的指揮權範圍。不久之後，史迪威本人也把一張標明指揮系統的圖表呈交給蔣介石。蔣介石對圖表作了一些小修正，史迪威也覺得沒有問題[127]。

事實上，蔣介石對這幾次會談的進展高度滿意，因此趕緊寫信給正在巴西養病的妻子，宣稱會談成果超出預期[128]。這麼說來，史迪威與赫爾利到達重慶最初幾天發生的事情，顯然令蔣介石大爲安心。在他們抵達之前，蔣介石曾經惴惴不安，爲此他特別準備了一個文件，以便萬一雙方發生衝突時，可以用來對美國政府提出一長串尖銳批評。但在實際和他們接觸後，蔣介石的心情起了重大變化，他開始以樂觀態度和他們商談實務，以致不需再提批評之事。準備的文件也沒有派上用場。

---

123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September 8, 1944, p. 258. Also: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8, 1944.

124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September 16, 1944. pp. 261-262.

125 *Ibid.*

126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6, 1944.

127 Report from General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3, 1944. In Xerox File 1110, Item 144. MFA.

128 蔣介石致蔣夫人電，1944年9月8日。《蔣總統家書：寄夫人》，第3冊，#412。

## 二、幾項初步共識

表面看來，9月初，事情在朝好的方向進展。史迪威也看出情形正在改善。據他記載，蔣介石同意任命自己並賦予完全信賴。但是他也指出，雙方在有些事務上仍然沒有達到共識[129]。毫無疑問，在此期間如果有一個重要因素改變蔣介石心情，把他從辭職邊緣拉回來繼續和美國政府合作的話，那就是赫爾利給他的好印象。蔣介石可能感到，羅斯福的確選了一個適當的人作爲他們之間的橋樑。因此，即使把指揮權交給了史迪威，他也不必擔心會發生嚴重的摩擦。

另一個稍爲次要但依然有利的因素，可能是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納爾遜的態度。9月7日，納爾遜和赫爾利兩人與宋子文舉行長談。納爾遜告訴宋子文說，羅斯福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日本永遠淪爲弱國，經濟上無力恢復武裝力量去從事侵略，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最上策就是幫助中國工業化，取代日本成爲亞洲的工業和商業強國。納爾遜直言，美國所以願意幫助中國，不僅僅是爲了中國的利益，也是爲了美國本身的利益[130]。

這種率真而友善的言論，出自總統最高經濟代表之口中，當然容易使中國人相信，他們在處理其他雙邊事務時，應該盡量和對方維持良好關係。這件事情對於宋子文來說，還有一層特別的重要性，那就是他個人至少從1943年9月起，已經開始關注中國戰後的重建工作了。他曾經敦促霍普金斯請美國總統注意這個問題[131]。現在納爾遜的說法，聽起來像是美國總統對中國請求已經作出了善意回應。

在這種友善的新氣氛中，中國人願意提供指揮權的範圍，竟然在某些方面超過了美國政府原來的要求。根據赫爾利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現在邀請美國軍方，全盤改造中國軍隊的後勤補給業務，反倒是史迪威不敢接受，因爲他擔心美國軍方的後勤專家無法勝任此一工作。儘管如此，赫爾利還是忍不住滿心喜悅地指出，美國將領指揮中國陸空軍，而美國人又擔任參謀長或是副參謀長，甚至美國人還指揮後勤部門。如果真成爲事實，等於是把整個中國軍隊的運作重任全部委託給美國人了[132]。

---

129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130 Hand-written notes probably by Soong himself, "High Light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Donald Nelson & General Patrick Hurley and Dr. T.V. Soong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7, 1944 at Dr. Soong's Residence",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131 "Notes on Conversation with Mr. Harry Hopkins, Sept. 17, 1943",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9.

132 Report from General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3, 1944. In Xerox File 1110, Item 144. MFA.

正因爲如此，9月8日以後，中美雙方有關指揮權的談判似乎正走向最後完成階段。

## 捌、談判遇上波折

然而，談判還留下兩個高難度的懸案。一個是蔣介石認爲租借法案物資在進入中國之後應該交由中國控制，另一個是共產黨軍隊的問題。9月8日，蔣介石告訴赫爾利說，爲了中國統一，他願意把共產黨軍隊納入國軍指揮系統，條件是它們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命令，真正成爲國家軍隊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支獨立軍隊。赫爾利在談話中得到的印象是，蔣介石花了很多時間努力解決這個問題。就在一周前，蔣介石已經默許把共產黨提出的條件予以公開，而且他自己也針對這個題目發表公開談話。看在赫爾利眼裡，所謂共產黨軍隊問題應該會得到圓滿解決[133]。

9月9-12日，宋子文、何應欽、赫爾利和史迪威進行一連串會商，討論史迪威指揮權的細節。就在9月11日那天，蔣中正獲知宋子文與赫爾利的會商頗有進展，爲之特別欣慰[134]。9月13日，雙方在幾個重要問題上達成共識：1. 史迪威指揮部隊，而最高軍事委員會負責後勤和其他行政事務；2. 史迪威對中國軍隊有獎懲權；3. 共產黨軍隊包括在內，但前提是雙方就共產黨問題進行進一步磋商，取得協議[135]。

9月17日，蔣介石的軍事智囊林蔚和徐永昌兩將軍，針對史迪威指揮權的細節舉行會商。他們取得共識，史迪威可以指揮所有在中國政府戰鬥序列內的部隊。蔣介石親自決定史迪威的職銜是「前敵總司令」[136]。顯然，蔣介石放棄了何應欽以前的建議，把攻擊性和防守性部隊分開，所以史迪威指揮權包括「全部」中國軍隊，唯一例外是共產黨軍隊，留待以後決定。經過四天的緊張會商，談判似乎終於有了突破。這個發展說明，一旦蔣介石決定讓步，會商的成果便立刻顯現出來。

### 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

關於指揮權界定的談判進展得如此順利，剩下來的問題似乎只有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了。這個問題看起來並不難解決，因爲美國總統和軍部在史迪威返回中國之前，就已經趨向於接受中國的立場了。

---

133 Ibid.

134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1日。《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11日。

135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9月13日。

136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9月17日。

8月底，馬歇爾感到蔣介石馬上就會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了，他同時開始思考作必要的調整，幫助史迪威順利展開工作。他在8月31日提出一些建議，並要求史迪威給予回應。第一，他希望史迪威接受新任命時，盡可能把會遭遇麻煩的事務減至最輕程度，因此打算免去史迪威的一些責任，例如租借法案物資、駝峰運輸工作等等，改由參謀長聯席會或軍部接管，但是保證這些工作的執行仍然符合史迪威的旨意。第二、他打算把中緬印戰區一分爲二：中國戰區由史迪威指揮，緬甸印度戰區由惠勒(Wheeler)將軍指揮，並出任蒙巴頓將軍的美國籍副統帥。所有在中國的軍隊，不論海陸軍種，也不問來自哪一個同盟國，都將置於史迪威指揮之下，唯一例外是長程轟炸機[137]。

馬歇爾雖然邀請史迪威表達意見或提出建議，但是他也承認，這種安排並不符合常規，只是不得不作出這樣曲折的安排，理由是需要協調的因素過於複雜：包括印度政府、東南亞戰區、駝峰運輸、緬甸路上的中國軍隊、蔣介石的主張和個性，以及史迪威想要扭轉中國危機等等。因此，他只提得出這樣一個非比尋常的安排[138]。

史迪威回到重慶前夕，馬歇爾又把方案作了更多修改。他告訴史迪威(9月4日)說，索爾登(Sultan)將軍將統帥緬甸印度戰區的美國軍隊，魏德邁將軍將被任命爲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官。至於租借法案，馬歇爾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1. 如何管理租借法案物資？2. 美國應該對中國作出何種承諾？

在管理方面，馬歇爾打算讓中國派一名代表參加重慶的委員會，但是委員會主席必須是美國人，而且必須直接聽命於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至於運往中國的軍事物資本身，將交由美國的補給管道負責處理。這種安排的優點是讓蔣介石得到一些感情上的安慰，似乎中國已享受了與其他盟國一樣的待遇，但實際上虛多於實，因爲美國並沒有減少它自己的控制權。

至於美國究竟對中國應該作出何種程度的援助承諾，馬歇爾的想法是：在德國戰敗之後，可以把所有中國能夠有效運用的武器都送往中國，唯一的未知數是時間快慢。馬歇爾同時也說明，美國在中國的軍事任務是進行空中戰鬥，而地面作戰則必須由中國軍隊自行負責，而後者最優先的任務則是保護補給線和空軍基地。值得注意的是，馬歇爾對於美國在德國戰敗之前究竟打算給中國何種援助則未置一詞。

馬歇爾在信件中指出，美國政府的目的是去幫助史迪威執行指揮官的任務，消除任何可能干擾他執行任務的複雜因素。他保證一定設法滿足史迪威的需求，把凡是可

137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Stilwell, August 31,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6, MFA.

138 Marshall message to Stilwell, August 31, 1944, in Xerox File 1213. MFA.

能引起史迪威煩惱的事務，一律交給緬甸印度戰區或是華盛頓軍部去處理[139]。顯然，馬歇爾已經願意在租借法案的談判上與蔣介石各讓一步。

但是對於史迪威而言，他信奉利益交換(quid pro quo)的做法，而租借法案物資在他的認知中一直是極重要的籌碼，攸關他是否能夠有效運用指揮權的重要先決條件。9月初史迪威抵達重慶後，他在和宋子文接觸過程中，已經察覺蔣介石所以願意在指揮權問題上表現友善，其動機就是想換取對租借法案物資的支配權，心中已經對蔣介石產生反感[140]。9月12日，蔣介石和赫爾利再度會商，重提租借法案問題，赫爾利加以拒絕，恐怕就有史迪威相同的考量[141]。9月14日，蔣介石從赫爾利處得知，史迪威不願意放棄租借法案的控制權，但蔣介石在這一點上也絕不讓步[142]，於是這方面的談判陷入僵局。

純從問題性質而言，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本應該由中美兩國政府最高領導層次去協商，而不應該交由戰區層次的史迪威去裁決。羅斯福已經告訴馬歇爾，他準備不讓史迪威過問租借法案事務，而馬歇爾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是在馬歇爾往往經由他和史迪威之間的特殊溝通方式，讓史迪威對美國政府的重要外交決策取得否決權。鑒於史迪威的個性和他對利益交換觀念的獨特理解，他已經發展出一套控制運用租借法案物資的獨到手法和作風，因此極不甘心輕易放棄這些權力。

## 二、9月15日的交鋒

租借法案遭遇的波折，很快就讓一周前的樂觀氣氛大受侵蝕。9月15日史迪威和蔣介石會談時，情形更加惡化。爲了幫助讀者了解這個情勢變化的緣由，必須先把史迪威和蔣介石對當天情況所作的兩個不同報導作一比較。因爲到目前爲止，大部分英文著作都只是以美方資料爲論述基礎，它們對於蔣介石和史迪威在9月19日的會面，都給予高度關注和大篇幅的討論，但是對於9月15日的會面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的確是一個疏忽。因爲9月15日的交鋒，對蔣介石和史迪威在9月19日以後處理彼此關係的態度，將會產生重大影響。讀者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和先後順序。

史迪威的記載見於他給馬歇爾的信件(9月15日)。史迪威首先把會談的焦點放在當前戰局。他嚴詞指責長江南岸的挫敗，並將罪過歸於蔣介石屢犯不改的老毛病——

139 Marshall message to Stilwell, September 4, 1944, in Xerox File 1109. MFA.

140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8, 1944.

141 Ibid., September 14, 1944.

142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4日。

指揮失當，因爲蔣介石人在重慶，卻對前線戰事胡亂發號施令，不知所云。更可恨的是，蔣介石不反躬自省，去設法改正中國戰區本身的指揮失誤，反而企圖插足緬甸戰區事務，因爲他通知史迪威說，如果後者在一周內不能展開對緬甸日軍的積極攻勢，他就要把一部分遠征軍調回中國作戰。史迪威認爲此舉將使他在緬甸的努力前功盡棄。史迪威繼之向馬歇爾報告說，他堅信蔣介石對長江南岸的軍事發展毫不在意，因爲蔣介石已經認定日本人不會在該地區再次展開攻勢，他的如意算盤是靜待美國打敗日本，坐收其成[143]。除了給馬歇爾的報告之外，史迪威在當天日記中也提到了蔣介石想從龍陵(Lungling)調兵回國。史迪威對此大張韃伐，指斥蔣介石的戰略和戰術思想都荒唐已極[144]。簡而言之，史迪威的報告把焦點首先凝聚在美國軍方最關心的戰局，然後把矛頭指向蔣介石必須對長江南岸的軍事失利負完全責任。他接著又指責蔣介石要求從緬甸調回部分遠征軍純屬無理取鬧，或是存心搗亂，嚴重威脅到同盟國在緬甸辛苦得來的戰果。在史迪威報告中，他把這兩件事形容成似乎是彼此並不相干的兩個孤立事件，只是它們同時都能證明蔣介石的愚昧與無能。雖然史迪威的信看似只是對事實的客觀陳述，但是它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突出中國最近在軍事上遭受的更多挫敗，和蔣介石胡亂指揮造成的損害，借此加重馬歇爾對轉移指揮權的迫切感，以圖防止更大的災難。當然，史迪威還有一個不變的基調，那就是蔣介石不想打仗，只是貪圖占美國人的便宜，借美國人去打敗日本。只要提出這個論調(**不管證據何在**)，就保證可以激起美國軍方高度反感。讀者必須警覺的是，通過對「著重點」和「隱瞞點」的交叉運用，一封電報就能夠達到操控電報閱讀者的情緒反應。而這也正是我們需要對照不同資訊來源的主要原因。

反觀蔣介石對事發當日的敘述，遠比史迪威的報告詳細，而且把過程說得清清楚楚，因此交代了事情的因果關係。根據蔣介石的說法，史迪威在會談之初就大肆批評廣西全州守軍的無能，把它看成是蔣介石的錯誤指揮所致。蔣介石於是反唇相稽，指出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也缺乏進展，轉而要求史迪威趕緊指揮X部隊向八莫方向進攻。若其不然，他就要把龍陵方面的部分遠征軍調回中國作戰，以解救中國本身的危急，這樣就不致讓中國的勁旅在緬甸前線無所事事，虛耗精力。史迪威毫不讓步，也立即指出，假如中國需要援軍，大可以把胡宗南部隊從封鎖陝甘寧邊區的任

143 JWS telegram to Marshall, September 15, 1944, in Photoprint File 150, Item 2560, MFA.

144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5, 1944. Also: Diary entry of September 15, 1944, in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1.

務中解脫出來[145]。史迪威所以如此憤怒是出於一個基本立場，那就是他認爲在緬甸作戰的中國部隊是「我的部隊」，因此蔣介石無權干預。因此，在雙方還沒有進入討論正題之前，這一場開鑼戲就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拉回到1942年的6月了。

這個會議的重要性在於，史迪威完全忘記在此敏感時機的談判攸關中美兩國大局。史迪威對蔣介石大發雷霆，只是讓對方重新想起以前不愉快的關係，喚起他原有的疑慮和反感。兩個人的唇槍舌劍只是表相，真正的原因是租借法案的談判面臨一個死結，讓史迪威在追求指揮權的路途上遭遇到障礙。當中國人表示不願意讓史迪威繼續掌控租借法案物資時，史迪威自然而然把它看成是中國人企圖破壞他的指揮權。按照史迪威的推理，一旦租借法案物資落入蔣介石手裡，由他控制分配，就能爲所欲爲，共產黨軍隊也就得不到援助，史迪威的指揮計畫和軍隊改革計畫就可能全部落空[146]。史迪威想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蔣介石的企圖不能得逞。因此他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嚴厲批評廣西全州的守軍，藉以殺一殺蔣介石的威風，不料激起蔣介石反擊，反而譏諷史迪威在緬甸戰場上進展緩慢。

事實上史迪威選擇全州戰事作爲攻擊蔣介石的材料，完全找錯靶子。如果他花多一點工夫了解中國戰區的軍事政治，就可以避免犯下這麼淺薄的技術錯誤。因爲蔣介石對於全州防守的無能而引起的憤怒程度，遠超過史迪威所感受者。他原先從守軍將領得到的保證是全州一定可守三個月，但實際上只守了三天就陷入敵手[147]。根據史迪威的指控，全州案例是蔣介石軍事指揮失誤的最佳證明，但是他卻不知道全州是蔣介石「政治無奈」的最佳證明。原因是全州守軍的指揮官是第93軍軍長陳牧農，屬於地方實力派軍人，蔣介石根本無法掌控這個部隊[148]。

全州失守後，蔣介石事實上極爲震怒，下令將陳牧農交付軍法審判，卻想不到他的命令立即遭到地方軍人阻擾。地方軍人出面爲陳牧農緩頰，主動提議由他們負責監督對陳牧農的處分，並拒絕把陳牧農交給重慶政府處置。蔣介石只好親自出面干預，才使陳牧農提交軍法審判，並於9月20日執行槍決。然而由於史迪威咄咄逼人，蔣介石絕不可能承認自己其實完全同意史迪威對全州防務的批評，更不可能承認他無法控制地方派系的軍隊。事實上，這種事件正是蔣介石所最擔心的，並且曾經一再警告美國政府，在軍事指揮權能夠交出之前，必須先行解決「政治」困難。然而美國人對蔣

145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15日。《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9月15日。

14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p. 261-262, entry of September 16, 1944.

147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4, 1944.

148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4日。

介石的困境懵然無知，反而視蔣介石的說法爲藉口。最終史迪威也爲他對中國軍事政治的茫然無知，而又膽敢抓權的魯莽行徑遭遇挫折。

蔣介石既然對史迪威對全州的指責無言以對，唯一可做的便是對史迪威在緬甸戰場的表現反唇相稽。9月8日以後，蔣介石開始擔憂，史迪威和蒙巴頓兩人掌握了大部分在緬甸的中國軍隊，既不向八莫進攻，也不定出進攻日期，看似處於猶疑不決狀態，而中國卻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蔣介石當然非常氣憤[149]。蔣介石憤怒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擔心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按兵不動，將鼓勵日軍直接向雲南西部發動攻勢[150]。結果可能是迫使中國在國境內進行兩面作戰，既要在湖南迎擊一號作戰的日軍，又要在雲南迎擊緬甸來犯的敵人。正因爲如此，蔣介石希望在緬甸的中國軍隊要嘛採取更積極的行動，讓日軍無法抽身威脅雲南，要嘛調回雲南，協助當地守軍抵抗日軍的入侵。史迪威置蔣介石的請求於不顧，不難想像，自然會引起蔣介石的憤怒。

另一個增加雙方緊張關係的因素，是對史迪威得到指揮權的具體安排。9月8日，蔣介石聽說赫爾利和宋子文兩人已經達成協議，中美雙方即將簽署有關指揮權細節的正式協定[151]。蔣介石多時以來一直期望這個安排，現在終能有望實現，當然非常高興。但是到了9月15日，蔣介石又得知美國其實不想簽訂任何協議，而只是想讓指揮權的內涵盡量模糊化，不由大怒，在日記中氣憤填膺：「其對余污辱欺妄竟至此也。惟情勢至此，決與之據理力爭，不能再事謙讓，並作獨立作戰之準備，以防萬一也。」他當即決定採取強硬立場保護國家利益，即使因此而導致美國停止軍援，中國脫離同盟國，乃至必須單獨對日作戰，也在所不惜[152]。鑒於赫爾利原先答應簽署協定，一周後又改變主意，其原因可能遭到軍部否決。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對本章前文(陸-二)的分析也是一個佐證。

本節所討論的重點——9月15日的會談——就是在這樣一個劍拔弩張的氣氛下發生的。這次事件在形式上和實質上都產生了嚴重的殺傷力，而且都是由史迪威主動引起。從形式上而言，史迪威當天沒有通過任何預約，突然盛氣凌人地抵達蔣介石辦公地點，排開侍從人員的阻擋，堅持蔣介石必須立即出來接見，這種倨傲無禮當然激起蔣介石高度的不快，也使他在自己部屬面前顏面喪盡。不難想像的是，在蔣介石心中，如果史迪威在還沒有拿到兵權之前就已經如此囂張，等拿到兵權之後的態度就更難預

149 同上，1944年9月9日。
150 同上，1944年9月11日。
151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8日。
152 同上，1944年9月15日。

測了。在談話的實質內容上，史迪威一張口就嚴厲譴責蔣介石對全州失守的過失，也反對中美之間就指揮權事務簽署任何外交協議，並斷然拒絕蔣介石的要求，讓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盡快發動攻擊，以紓解日軍對雲南的威脅[153]。史迪威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著意省略了以上所敘述的這一連串重要情節，就讓馬歇爾完全無法了解蔣史二人在會議中在感情上的互動過程，這樣自然容易讓他作出錯誤的解讀。而類似的例子，在史迪威向馬歇爾提出的報告中屢見不鮮。而蔣介石的日記卻把感情部分交代得很清楚。而「感情」、「態度」、「精神」正是兩人之間最大的引爆點。而史迪威對他的美國上司們卻一貫加以隱瞞。

9月15日的衝突顯示出，蔣史二人的心情都已經非常惡劣，任何一方都想出手給對方一記重擊，否則難以平息心中之憤。它也顯示，不管羅斯福、馬歇爾、赫爾利或是納爾遜等人，如何努力調和這兩個人的關係，都效果不彰。他們兩人過去長期分隔在兩地，王不見王，衝突還有一個緩衝，現在面對面，而史迪威又違反了一切外交禮儀，衝入蔣介石辦公室興師問罪，兩人之間長期以來積壓的惡感，立刻就達到爆炸點。更糟糕的是，史迪威這次的行爲，顯然使得蔣介石得到一個非常明確的印象，他們之間的關係類似外國主子和中國臣僕。他們儘管都曾信誓旦旦願意合作，但兩人之間根本沒有理性合作的基礎。這次會面的結果是，蔣介石斬釘截鐵通知史迪威，除非中國遠征軍立即發動對八莫的攻勢，否則他將立即把一部分軍隊調回中國。史迪威只好怒氣衝天地離開蔣介石辦公室[154]，並立即向馬歇爾告狀。

9月15日的衝突其實已經爲四天後(9月19日)的外交風暴作了伏筆。史迪威急不及待地在等候報復機會，因此在僅隔四天之後羅斯福措辭嚴峻的信件到達時，在史迪威眼中，它充分證明了自己歷來堅持對中國政府唯一的對策就是不斷施壓，而現在終於獲得總統的採納。因此史迪威萬萬不肯失去親眼看見蔣介石這個「小花生米」，向美國總統匍匐在地全身發抖的千載良機，難怪他堅持自己必須親手送交信函，並且當場宣讀。同樣，蔣介石也體會到，如果表現出絲毫軟弱，只會徒然招致史迪威取得指揮權後對他施加更多的侮辱而已。

1944年9月15日的衝突和1942年6-7月間的多起事件(本書第4章)有許多相似之處。一方衝動之下作出的行動，立即引發另一方報復。一旦「撕破了臉」，雙方關注的焦點是在下一個回合中如何奪回上風。史迪威每每作出逾越身分的行爲，除了個性使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他過分高估自己後盾的力量，同時又過分低估了蔣介石的毅力和民

153 同上。

154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5日。

族(及種族)敏感度，堅信美國政府必定會支持他壓倒蔣介石的抗拒。雖然蔣介石是中國最高國家領導人，但是史迪威和美國軍部除了口頭上虛與應付以外，打心底從來沒有把他當成是邱吉爾或是史達林看待。儘管美國總統一再告誡，千萬不要把蔣介石當摩洛哥酋長對待，但是軍部根深柢固的種族主義心態，再加上中美兩國由於國力懸殊所引導出來的盛氣凌人的架勢，絕不會因爲總統的一兩句善意勸告就消失無蹤。當這兩個性格倔強而又主觀自信的人相處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同樣的摩擦不斷重複發生，而同樣的行爲也不斷在他們身上發生。然而一旦蔣介石下定決心，不惜破釜沉舟，他們之間的戲就演完了。而這正是1944年9月的新發展，事情大出史迪威意料之外。

蔣介石對9月15日事件的情緒反應，當然不爲美國領袖當時所能得知。但是我們今日仍然可以加以注意。他檢討了中國過去幾年來承受的打擊，包括軍事挫敗、經濟惡化、共黨顛覆、政治干擾等問題以後，得到結論，認爲這些打擊都和美國的輕視、無知、不公平待遇，以及倨傲無禮，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現在，美國不但拒絕把已經依法撥給中國的租借法案物資交由中國分配，甚至悍然拒絕和中國簽署一項正式協議，規定史迪威指揮權的細節，其對中國的侮辱已經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他認爲中國必須有決心單獨對日抗戰，不再依賴同盟國。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對余污辱欺妄竟至於此也。惟情勢至此，決與之據理抗爭，不能再事謙讓，並作獨立作戰之準備，以防萬一也。」[155] 很有可能，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心理上的承受力已達到極限。若再遇到美國的壓力和侮辱逾越此一界線時，他很可能就會採取斷然立場，準備單獨繼續抗日到底了。回顧戰時同盟關係，中國是一個弱小的盟邦，必須仰承強國的鼻息，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爲了顧全大局而忍辱負重，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負責任的行爲。但是在處理與史迪威的個人關係上，他的優柔寡斷和瞻前顧後，加上以他自己之心度美國人之腹的偏差，又讓中國失去了幾度可以和平解決問題的機會，最終不得不面對單獨作戰的選擇，則又是自食其果，責無旁貸。

更諷刺的是，當時中國戰場上發生了兩件令廣大中國人民雀躍鼓舞的大事，卻使史迪威感到情緒低落，憂心忡忡。一件是在9月14日，由霍揆章將軍指揮的軍隊終於把日軍從騰衝擊退。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經過三個月旺盛的攻擊，傷亡五萬士兵，贏得空前大捷[156]。9月17日，史迪威又得到消息稱，日軍已經從龍陵撤兵。史迪威對於這兩個發展不喜反憂。他寫道：「如果日本人真的撤退了的話，花生米就會變得更

155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5日。
156 同上，1944年9月16日。

是不可控制了。」[157] 由此可見，本來對中國抗戰是兩件天大的喜訊，到了史迪威眼裡，卻變成了可能阻擾他奪權美夢的壞消息。他所擔心的是，萬一中國人把這些勝利當成是肯定本國軍隊有能力阻止敵軍前進，甚至迫使其退卻的證據時，中國就可能不願意把指揮權交付給美國人行使。因此從史迪威的立場來說，當務之急莫過於盡快把指揮權抓到手裡，免得中國人被這些消息鼓舞到改變心意。

## 三、史迪威加大賭注

在中美關係領域裡，蔣介石9月16日聽到的消息依然很壞。宋子文在一場會議中對租借法案物資再次提出要求，不但再度遭到拒絕，也被史迪威親口透露的有關指揮權運作細節感到心寒。根據史迪威的描述，他必須有全權在各戰區之間任意調動部隊、合併不同番號的部隊、解散現有部隊、建立新部隊、從一個部隊抽調人員補充另外一個部隊，甚至改變軍隊的建制。與此同時，蔣介石必須保證絕對不會干預史迪威的工作，而且史迪威必須有權委任外國軍官擔任中國職務[158]。爲了肯定中國人會對他如此慷慨協助中國的情義心存感激，史迪威進一步告訴宋子文說，如果不是因爲他深愛中國和中國人民，他大可不必留在中國服務，因爲他隨時可以指揮一支美國軍隊。然而爲了中國，他過去兩年半，受盡侮辱、輕視和欺騙。因此，他雖仍然願意幫助中國，但是也要提出條件，保證他的工作可以順利完成[159]。

史迪威口中所謂的「條件」包括立即任命陳誠爲國防部長和白崇禧爲參謀首長。他最後撂下幾句狠話給宋子文去咀嚼：「我並不想要這個爛差事。但是如果我接受它的話，我必須要有全權。假如中國不合作的話，在美國將會產生惡劣的後果。」[160] 歸根結柢，有關租借法案物資的討論已經談不下去了，史迪威也已經提出了他的最後通牒。

無獨有偶，蔣介石在同一天也從美國高斯大使那裡收到一個語帶威脅的訊息。高斯表達了一個希望，那就是能夠看到中國在戰後和會上代表亞洲發言，而且仍然可以維持四強之一的地位。在蔣介石聽來，高斯的話既是恐嚇又是侮辱，當然讓他氣憤。用蔣介石自己的話來說：「余聞此言，無異利刃刺心。若不自立(力)更生，何以立國。何以雪恥。而史迪威之刁難輕侮，更令人難堪無已。本周外交之逼人及各種方針與對

157 Stilwell t-w diaries, September 17, 1944.

158 Quotations from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36-437.

159 Memo from Stilwell to Soong, September 16, 1944, quoted in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37.

160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6, 1944. Also: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68-169.

策交涉之忙迫，實爲從來所罕見也。」[161] 在中國人心目中，高斯的話必然是奉華盛頓的命令傳達，其目的是在增加史迪威的談判籌碼。中國人聽到了美國提出的恫嚇；如果中國人膽敢不合作，那麼將來美國很可能會在戰後的和會中，拒絕在外交上支持中國，也不再支持中國四強之一的地位。就蔣介石而言，美國這種做法只能加重他自己的反抗情緒[162]。

## 玖、攤牌前夕的狀況

羅斯福9月19日致蔣介石電報抵達前夕，指揮權移交工作的進展可說有得有失。若從純粹技術層面來看，蔣介石打心底已經接受了美國要求，並且十分認真地想把指揮權的範圍加以詳細規定。在有關共產黨武力的問題上，史迪威和蔣介石的最初立場大相徑庭。史迪威打算用武器裝備共產黨軍隊，並立即把他們投入對日戰鬥中。但是蔣介石擔心一旦共產黨軍隊得到武裝，就會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挑起內戰[163]。就蔣介石而言，他已經把自己的立場說得很清楚，至於史迪威和共產黨是否願意合作，只有他們自己才能決定。有趣的是，此後的發展顯示，史迪威在這個問題上相當願意讓步。

對於租借法案物資控制權一事，雖然羅斯福和蔣介石兩人都表示願意妥協，但是史迪威卻極力反對。蔣介石和史迪威兩人之間的私人關係在9月中旬惡化，重新燃起彼此的敵意，並不是偶然發展，只不過是他們兩人長期以來互動關係的延續而已。史迪威依然故我，打心裡看不起蔣介石，認爲「民族主義」只不過是一面可恥的幌子，他應該把蔣介石趕下臺以維護中國的利益。他也堅信必須把租借法案物資的支配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因爲只有這樣才能有效推動他的利益交換政策。同樣，蔣介石也是依然故我，他對史迪威的動機充滿疑懼，把自己看成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象徵，也早已下定決心不容自己的尊嚴受人任意踐踏。9月中旬，客觀的環境再度把兩個難以相處的人放在同一個舞臺上，期望他們之間的互動關係能夠和諧而互信，真無異於緣木求魚。

不幸的是，美國領袖普遍缺乏親身體會，那就是，即使面對的是窮困和效率低落的人們，也必須小心應付，因爲這些人的自尊心和榮譽感並不麻木，有時反而會過度敏銳。美國人在1944年初順利強迫蔣介石把雲南境內的中國軍隊送進緬甸戰場，可能

161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6日。

162 同上。

163 孔祥熙與顧維鈞會談，1944年9月23日，《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436。

讓他們誤以爲，以前和中國人打交道所以特別頭痛，都是因爲沒有及早下定決心向中國施壓所致。現在一旦施加壓力，蔣介石果然立即屈從。從1944年初的這場外交勝利中，可能讓史迪威和他的上司嚐到甜頭和信心，認爲施加壓力的確是對付蔣介石最好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沒有一位美國領袖，尤其是軍方領袖，曾經用心去了解蔣介石的個人經歷。而這一個忽略，使他們大大低估蔣介石面對危難時敢於破釜沉舟的果斷力。事實上，從1920年代開始，蔣介石就一再地證明，當他被對手逼到超過某一個限度時，其反應往往可以表現驚人。美國政府在處理中美同盟關係時所持有的狹窄視野，自然讓它能夠獲得的成果遠遠低於它的期望，或是它的國力所能達到的程度。

同時應該注意的是，在7和8月份，中美兩國對於指揮權的細節的界定幾乎沒有進行過對話，因爲絕大部分的計畫工作都是由中國政府單方面做的，美國政府並不參與。而美方資料也沒有跡象顯示它的軍部做過獨立的參謀工作。爲什麼如此？答案可能有三個。

第一個答案是，美國政府只想經由一個簡單的官方舉動，把指揮權正式移交到史迪威手中。換句話說，蔣介石應該做的就是把指揮權盡快交出來，其他一切後事由史迪威去操心，無需訂出細緻規定，絆手絆腳。第二個答案是，美國政府或許擔心，如果一旦同意進行商談，中國政府就會無限期拖延指揮權的移轉。因此，美國政府寧可對蔣介石施壓，逼他趕快交出軍權，也不願意花工夫和中國政府商量移交細節。但是從中國政府立場來說，細節是必須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不管用何種尺度來衡量，沒有一個有責任心的國家領袖，會在沒有得到任何保證之前，貿然地把本國的軍隊指揮權交給外國，除非無條件投降條款規定不得不爾。第三個而且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答案是，美國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著手計畫這項工作。他們對中國軍隊的背景並不了解，也沒有足夠資料和得力幕僚去策劃，如何掌握一個有三、四百萬士兵的外國軍隊。他們有的只是對自己的才能的自信心，並且願意大膽嘗試任何新鮮事物。鑒於美國軍事領袖，包括參謀長聯席會，沒有仔細考慮後果，便糊裡糊塗向中國提出指揮權的要求，事到臨頭，唯一出路也只好把心一橫，將一切希望寄託在史迪威身上。在他們看來，最合理的盤算是，史迪威既然有膽量開口要求指揮權，那麼他當然知道得手之後應該如何運用。

這樣看來，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態。美國政府相信首先要做的是由中國作出一個官方告示，再加上一個隆重的移交典禮和職位頭銜，大功即可告成。至於細節部分，就等到以後無法逃避的時候，再由史迪威硬著頭皮去見招拆招。相對而言，中國政府要求把指揮權轉移手續講得清清楚楚，而

且堅持只有一切內容規定詳盡之後，才肯把指揮權交出去。無論美國政府如何嚴厲警告中國，猶疑不決只能使中國情況加速惡化，但是中國政府的態度始終是，中國的命運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負責，無需外人置喙。

說到這裡，我們就能更容易理解，爲何美國作爲指揮權的接受者最願意接受一張空白支票，而不希望雙手被細節所捆綁。假如他們在得到指揮權後能夠使中國局勢有所改進，就可以把功勞歸給自己。萬一無法改善局勢，就可以把責任推卸給中國當初沒有給他們足夠的權力，轉而要求中國交出更多指揮權。或是指責中國政府沒有誠心提供合作。我們也因此更容易理解，爲什麼蔣介石希望和美國簽訂一個詳盡的協議。既然中國是給予的一方，他當然希望知道到底給出去的是什麼。因爲一旦指揮權交出去之後，就不容易收回來。再者，因爲中國政府認定史迪威不可信賴，因此更是希望把一切要點都能夠白紙黑字寫明白，以便保護中國不要被美國的奇招怪術弄得措手不及。他們特別記得清楚，爲了區區兩千萬美元的借款，摩根豁財政部長規定中國政府必需簽署正式而詳細的協定，不然拿不到一文錢。現在美國人想接管中國的全部軍隊，卻不願簽署任何協定。在中國政府眼中，美國這種做法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理由，那就是蓄意讓情況模糊化，以便有朝一日在其他領域裡提出新要求或是爲自己脫罪。對他們而言，史迪威本人的行徑記憶猶新，他把原來局限於X部隊在緬甸的使用權擴張到在雲南的Y部隊。前車之鑑不遠，中國最擔心重蹈覆轍。而有關指揮權的交涉也再度凸顯出，本書數度借用的資產擁有人和投資經營者之間的關係。對美國(投資經營者)一方而言，它失敗的後果完全不傷本身元氣，最多只不過是賠上史迪威的聲望，最後拍拍屁股一走了事，連道歉都無需說一聲(史迪威1942年5-6月有例在先)。因爲儘管美國人嘔心瀝血地幫助，中國政府就是貪腐無能，文武官員更是貪生怕死又不合作，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歸根結柢，都是中國人的錯。但是對於中國(資產擁有人)而言，它失敗的後果則可能是血本無歸，國破家亡，甚至陷於萬劫不復之地。在戰時中美同盟關係中，由於雙方國力差異懸殊，這一直是中國政府無法扭轉的劣勢。

# 第十一章
# 蔣介石和史迪威最後的攤牌

## 壹、史迪威撤職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史迪威從中國戰區被召回的消息，對於大部分美國人而言，不啻晴天霹靂。大部分美國人對史迪威的印象是他工作成績出眾，一心一意只想和日本人作戰，而他的努力卻被貪污腐敗無能的中國政府所一再阻擾破壞。史迪威在美國新聞從業人員眼中更是一個廣受歡迎的人物，他個人作風平民化，完全沒有蔣介石的僵硬和中國官員的刻板，而他對自己看不慣的人物和事務，又能直言無諱，從來不規避或是咬文嚼字[1]。因此在1942-44年間，史迪威在中緬印戰區的事蹟受到美國媒體普遍傳播。許多美國人民對他感到熟悉而又親切，相信他拯救了中國，在一大群被動而又無能的黃種人當中，是唯一的一位白種人的希望之星[2]。

因此，當史迪威被灰頭土臉地逐回美國時，美國新聞界爲之震驚。有一位學者曾經說過：

> 大部分關心中美關係的觀察家都同意，史迪威將軍在1944年10月被羅斯福總統召回一事，對於兩個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轉捩點。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事件對中國的後果，可以和日本偷襲珍珠港和雅爾達密約的後果相比。
>
> 然而不同的人從這件事卻得到了不同的結論。國民黨的領袖們認為他

1 Stephen R.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50.

2 See: numerous newspaper clippings in the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6.

> 們贏得了美國增加了的援助和政治支持。羅斯福以及繼任的杜魯門則把這個事件看成是引導他們不再信任和支持蔣介石。雖然這兩位總統都沒有完全地切斷和國民黨的關係，但是兩任美國政府也都不願意增加對中國政府的援助，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個政權縱使還沒有被判為註定失敗，但是也是被視為氣息奄奄了[3]。

有學者更說，

> 史迪威的召回暴露了許多最根本的問題，包括軍事戰略、同盟國政治、中國的內爭、對於革命的態度，以及個人性格的衝突。而所有這些問題產生的大背景，是美國決心不計一切代價，務求擊敗德國和日本[4]。

只要對當時美國新聞界作一個粗略掃描就可以看出，史迪威的召回是美國人民對中國政治態度上的分水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分歧自此變得愈加分明。多數報刊雜誌支持史迪威，並同時批評羅斯福不該縱容姑息一個腐化的國民黨政權[5]。只有魯斯出版集團極力支持蔣介石政府[6]。

正如一般人所知道，導致中美兩國之間衝突最重要的事件，發生於1944年9月19日。當天史迪威把一封羅斯福的電文遞交給蔣介石。但是一般史學著作因爲所引用的資料本身就存有許多空白，所以沒有詳細說明事件過程以及其前因後果。這些史學著作忠實地交代了美國人的看法、分析和決策，但是忘記整個事件本來是中國和美國當事人之間非常複雜的互動過程。如果不了解其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想法或是作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史迪威爲什麼會被召回。更糟糕的是，在整個事件過程中，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意圖、策略、行爲等等都作了許多假設，再據以制訂對策，而這些對策經常是基於對中國領袖心理的誤判。最糟糕的例子就是史迪威本人，他雖然身爲當事人，但是對於自

3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p. 158.

4 *Ibid.*, p. 159.

5 For a copy of Brooks Atkinson's dispatch on October 31, 1944, see: Radio Service, *OWI*, November 3, 1944,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6 Telegram by Stettinius,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U.S. Embassy in Chungking, #1410, November 1, 1944,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 401. Also: Tuchman, pp. 646-648. Also: MacKinnon, *China Reporting*, pp. 159-163, 168.

己的處境和對手的動機，都表現出極大的誤解甚或無知。不少史學著作由於所參考的資料不夠，不但敘述部分過於偏頗，分析部分也不時出現錯誤。這個歷史事件應該讓我們切記一個簡單不移的治學道理，那就是，若是要想了解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就一定要先研讀雙方的資料，不能只聽單方面的說詞。

前面第十章已經提到，8-9月間的一連串事件，已經把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緊張關係帶到瀕臨公開破裂的邊沿。就在這個時候，羅斯福致蔣介石的電報在9月19日來到，從此揭開一幕歷時將近一月的戲劇性政治變化（9月19日－10月20日）。事實上，史迪威的革職，經歷前後幾個階段，並非突然發生。本章目的就是把雙方主要人物勾畫出來，並試圖了解他們各自行動的原因何在，以及他們互動的結果如何。

## 貳、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來歷

談及美國總統9月19日致蔣介石的信件時，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學家是這樣敘述的：「史迪威的報告是在OCTAGON（魁北克會議代號，1944年9月）會議時，呈交到總統和馬歇爾手中。總統批准了一個回覆，發給史迪威轉交（給蔣介石）。」[7] 然而實際情形比這個敘述複雜太多。

大多數人把分析焦點放在1944年9月19日，史迪威遞交羅斯福信件給蔣介石這個舉動上。但是我們必須注意，要不是兩天前史迪威和馬歇爾做了一些其他動作，羅斯福也不會在此時此刻發出信件。一定要了解這些動作，才能了解羅斯福爲什麼會寫這一封信件，以及他如何寫出這一封信件。

羅斯福寫這封信件的最直接動力來自史迪威的幾封報告，內容都是警告美國：中國戰區即將面臨巨大災難[8]。馬歇爾將軍馬上把這一訊息在9月16日提交參謀長聯席會（第178次會議），促請予以關注。馬歇爾口頭上轉述了史迪威報告的內容，說明中國情況萬分危急，除非中國當局馬上提出對策，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馬歇爾隨即告知其他參謀長，他已經擬好一份致蔣介石的電文稿，準備提請總統採用。他隨即在口頭上宣讀了一遍準備好的文稿，並邀請其他參謀長提出評語。會議記錄顯示，當時其他參謀長都沒有發言，原因可能就是事出倉促，根本來不

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42.

8 See: JWS cable to Marshall, September 12, 1944, in Xerox File 1111, Item 5751, MFA. Also: JWS cable to Marshall, September 15, 1944, in Xerox File 1111, Item 5750, MFA.

及充分掌握史迪威報告的內容，更來不及推敲馬歇爾爲羅斯福捉刀的信件文字、語氣和外交後果。參謀長們匆匆同意這個文稿後，馬上送請美國總統簽字發給蔣介石[9]。

美國官方記錄顯示，參謀長聯席會讓馬歇爾再次用一個極不尋常的方式主導會議程序。這一次，馬歇爾甚至事先沒有把電文稿抄本送請他們過目，只是口頭念了一遍就徵求大家意見，難怪其他的參謀長根本說不出什麼深刻意見。他們的作爲，基本上只是把各自的判斷力束之高閣，在馬歇爾草擬好的文稿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以全體通過的形式送請總統採納。這種粗糙的處理方式，過不了幾天就在中美關係上產生驚天動地的後果。

美國資料還顯示，羅斯福此時正在魁北克出席會議，忙著和邱吉爾會談，而雙方爲了如何處置德國問題也爭執不休。馬歇爾準備好的文稿是在9月16日送到羅斯福手中，羅斯福當天就簽了字[10]。這整個文件處理過程顯示，羅斯福，如同他的參謀長們一樣，也沒有充分的時間去了解文稿的文字或是內涵。他之所以依然簽字，原因或者是被當時會議的重擔所迫，或者是他認爲參謀長們既然已經集體簽字，必定是慎重地考慮過文件的內容，所以他大可放心簽字。這種美國對華政策「政出二門」的現象，本書稍前已經作過分析，無需在此重複。

如果前面的描述無誤，就可以說，史迪威選擇了爆發這次危機的時機，同時也界定了美國政府所能作的反應。如同第十章所述，史迪威的報告是寫在他和蔣介石9月15日的衝突之後，其內容的詳實性和公正性都有大有可疑之處。誇大中國當前危機是他能夠動員美國壓力去打擊蔣介石最有效的手法。而馬歇爾不但對史迪威提供的事實報告和判斷照單全收，並且抄錄了史迪威報告中的文字和分析，放在自己爲總統草擬的文稿中，至於羅斯福的工作，就只是簽字批准而已[11]。羅斯福7月7日要求中國交出指揮權的電文，和9月19日提出他的最後通牒之間，都沒有太多的親身參與。他這個美國政策的決策人，事實上已經被史迪威和馬歇爾所僭越，而其他的參謀長們爲了順從史迪威和馬歇爾的行動，也只好蓋上橡皮圖章了事[12]。

---

9 Minutes of US JCS meetings, Xerox File 1537, Folder 13, MFA.

10 See Marshall's proposed text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2, MFA. On a separate piece of paper, it was written, "To Pres. at Quebec, by C/S w/little information note."

11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p. 172-173.

12 美國軍方歷史學者的解釋，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47, especially footnotes #10, 11.

## 叁、羅斯福9月19日信件的內容和送達方式

羅斯福信件上面注明發出日期是1944年9月18日，但是送達蔣介石之手時已經是重慶時間9月19日。這個信件省略一切外交辭令，直接了當地提出結論：「余詳細閱讀關於中國局勢之最近報告後，余與各最高參謀即深恐在最近之將來，閣下將不能不與一非常之局面相見。」接著批評蔣介石對緬甸前線注意不足，如果遠征軍得不到中國即時補充和援助，那麼「其以絕大犧牲而取得之勝利，將必歸於烏有。」「如閣下不立即補充緬北部隊或不立即派遣生力軍協助在怒江方面之華軍，則吾人將完全消失開放接濟中國陸路線之機會，而且直接危害現有之空運途徑。果然，則閣下必須準備接受必然之後果及負完全之責任。」

警告之後，羅斯福把話鋒一轉，回到中國國內問題：「在過去數月中，余曾屢次請求閣下採取斷然步驟，以取消對於閣下個人及中國全局漸漸實現之危局，茲者因閣下延擱委任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所有之軍隊，致損失中國東部之重要土地，其影響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測，日軍陷桂林之後，吾人在昆明之空軍站將受直接之威脅，而由印度之空運噸數亦不免因而銳減。」羅斯福在電報結尾聲稱：「余堅信閣下唯一可以破壞日軍對中國計畫之方法，即立即補充怒江方面之部隊，加緊繼續推進，同時立即委任史迪威將軍授以全權指揮所有中國之軍隊……余與此間各最高人員均認爲閣下及吾人對於援助中國所有之計畫如再延擱猶豫，必將完全消失。」[13]

眾所周知，羅斯福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頭幾個月中，一再警告部屬不要以對待摩洛哥部落酋長的態度對待蔣介石。但是到了現在，羅斯福本人的行爲就跟他自己的批評一樣。或許他已經對蔣介石感到煩厭，或是他過於信賴馬歇爾和其他參謀長，認爲他們擁有作出正確政治判斷的能力，所以終於讓自己的名字放在一個信件裡，而這個信件的內容對待蔣介石的態度，遠比他對待摩洛哥部落酋長要粗暴得多[14]。

多年來，人們總是揣測，史迪威親自向蔣介石遞交羅斯福信件時，可能作出了一些失格的舉動，以致蔣介石在承受羅斯福的文字傷害以外，也承受了史迪威個人行動

13 Message from President Roosevelt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September 18, 1944. Xerox File 333, Item 5750, MFA. 中文翻譯見：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9月18日，《戰時外交》（三），頁658-659。

14 For another account of how the letter was produced, see: Tuchman, pp. 629-630.

造成的傷害[15]。赫爾利給羅斯福的報告也給人一個印象，差錯出在遞交信件過程中[16]。正是這種報告，讓美國政府最初認爲蔣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跟羅斯福的信件無關，全是史迪威個人的魯莽粗劣行爲所致[17]。可是史迪威對這一指控極力否認，誓稱他絕對沒有在遞交過程中作出過任何不得體的舉動[18]。事實上，依據史迪威向馬歇爾提出的報告，他9月19日下午5時40分把羅斯福信件送到蔣介石手中，當時蔣介石「唯一的回應是『我知道了。』」[19]隨即結束會見。

史迪威對於事實的敘述基本上和中方會議記錄吻合。但是他也巧妙地隱瞞了幾個重要情節。根據中國和赫爾利的記錄，當天下午4到5時，蔣介石和赫爾利以及納爾遜兩人開會，心情頗爲愉快[20]。納爾遜坦誠指出中國許多缺點，提出改善建議，也針對戰後重建工作提出構想，得到蔣介石高度讚賞。蔣介石還急切邀請納爾遜戰後重返中國，監督他建議事項的落實工作。正當時鐘敲打5點時，蔣介石仍在和赫爾利、何應欽、宋子文、朱世民四位討論，如何宣布史迪威指揮權任命的最後幾個細節，史迪威這時匆匆趕到會場，要求先和赫爾利在會場外單獨談話[21]。

當史迪威把羅斯福致蔣介石的信件交給赫爾利過目時，赫爾利馬上就被信件的文字所震驚，認爲不應該此時交給蔣介石，理由是他認爲史迪威指揮權一事即將大功告成，不宜節外生枝。但是史迪威堅決主張無權截留總統電報，於是兩人同時進入會場，由史迪威把電文交給蔣介石，並請朱世民把譯文當場宣讀。赫爾利趕緊阻止這個舉動，並提議說，既然電文已經附有中文譯本，蔣介石大可以自己閱讀。蔣介石閱讀完後，相當平靜地說，「我知道了」，並立即指示散會[22]。純粹從技術層次上來說，史迪威宣稱

1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41-442.

16 General Hurley letter to FDR, September 25, 1944, in Xerox File 2992, Item 236, MFA.

17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General Arnold, September 28, 1944, from Marshall.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3. MFA.

18 "Personal message from General Stilwell to General Marshall dated September 26th,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MFA.

19 JWS cable to GCM, September 20, 1944, in Xerox File 333, Item 5750. MFA.

20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43.

21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擬好一份命令，任命史迪威為中國陸空軍總司令，《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9冊，第002號檔案夾。蔣介石個人的記錄，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9日。美方的敘述，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43-446.

22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9月19日。又見：《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19日。美方的敘述，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43-446.

他在會面時沒有作出任何失格的舉動，的確是實話實說。但是把一封信件交到對方手中，雖然只是一個簡單動作，但是可能蘊藏有特別情緒，只要送信者伴隨以肢體語言，對方便能心領神會。而史迪威作爲一個信差，既無法又無意隱藏自己真實的情緒。

事實上，史迪威自己對他在送交羅斯福信件時的舉動和精神狀態提供了最權威的詮釋。這次事件後，史迪威作了一個記錄，寫道：「9月19日。炸彈到達了而且也送了出去。羅斯福命令蔣介石趕快履行他的諾言。蔣介石大發脾氣。」[23] 在另外一張紙上，史迪威潦草寫道，「個人參考資料。1944年9月19日，花生米的滑鐵盧。」[24] 史迪威9月19日的日記寫得更是生動：「用紅筆在我生命的日曆上畫上一個記號。終於，終於，羅斯福把話說白了，接著還說了一大堆，而且每一句話裡面都安放了一個爆竹。一個大爆竹。我把那張紙交給了花生米，然後坐回到椅子上去，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去欣賞那個場景。那支槍正好打中了那傢伙的太陽穴，而且打穿了過去。打得乾淨俐落。他除了臉色發青和啞口無言之外，居然還紋風不動地坐在那兒。他唯一對我說的是『我了解』。然後光是坐在那兒撥弄他的腳。真是太棒了。真是太棒了。我們現在『和那個(摩洛哥)酋長吵架』的光景可是大不相同了。我們已經浪費了兩年光陰，但是羅斯福總算是終於張開了眼睛，而且還狠狠地揍上了一拳。」[25] 這樣洶湧澎湃的感情多年瘀積在胸懷，像史迪威這種個性的人，不管如何努力掩藏，都很難設想當時他不會形諸於色，更何況他或許根本沒有掩藏的慾望。

史迪威接著在9月21日寫了一封信給妻子，尤其把自己的情緒暴露得淋漓盡致。他寫了一首詩，用最惡毒的語言形容自己傷害蔣介石後所得到的快感。他這樣形容從復仇過程中得到的滿足：我用眼睛瞪著花生米，用腳緊踢蔣介石的屁股。我是一個跟惡名昭彰鯨魚作生死搏鬥的獵魚手，現在終於有機會把魚槍插進鯨魚的身體，然後眼睜睜看著鯨魚在死亡中受盡苦楚。「哦！那種上天賜給的歡娛感覺！我終於把花生米的臉給砸爛了。」[26]

字裡行間，史迪威把自己的仇恨和報復心宣洩無遺。他毫不諱言，爲了這一天，已經等了許多日子了。他自己的記載誠實道出，他要的就是報復，而且一定要眼睜睜

23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undated.

24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Personal and Family File, B-14, 1944. undated.

25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or diaries marked 9/19/44,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33, Personal and Family File, B-14, 1944. The same entry can be found in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3, but unfortunately certain words have been deleted by the compiler to conceal Stilwell's true emotions.

2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4.

看到對手流血且匍匐在地，再補上一腳，才心滿意足。史迪威說得明白，對他來說，這是一場善惡生死之爭，現在是他「贏了」，他絕對不會隨便失去欣賞對手趴在地上俯首求饒的快樂。假如以上這些字句是出自一位軍中士官長的筆下，它們顯現出來的文采或許還值得上級表揚，但是出自一位四星上將之手，則不但有損他個人體面，也有損他所代表國家的形象，更令他的盟邦心寒。假如連中國最信賴和心儀的盟友都這樣對待中國的話，那中國又何必去反抗日本人的侵略和屈辱呢？事實上，史迪威在行文中經常也用了些詛咒和侮辱性字眼(如Japs)去形容敵國日本人，但是本書作者在通觀他的文檔後，還沒有發現他用過同樣惡毒的字眼去作踐這些敵人(包括東條英機在內)，可見他對蔣介石仇恨之深。總之，史迪威對現場的形容儘管在技術上並無失實之處，但是他當時的肢體語言，恐怕無法掩飾他內心的真實感情。在這個意義上，史迪威自己的記載確實給史學界提供了最權威的原始資料。

## 肆、蔣介石的反應

然則蔣介石當天的反應，究竟是否像一句「我知道了」所顯示的那樣平靜呢？

蔣介石和往常一樣，也用自己的話記錄下感覺。日記寫道：「實爲我平生最大之污辱，亦爲最近之國恥也。」他也注意到，羅斯福這次電報簽發的日期是9月18日，前一封電報寫的是7月7日，爲什麼總是選擇近代史上中國橫遭外國侵略者凌辱的日子，是否故意在傷口上撒鹽[27]？蔣介石還在羅斯福電文的空白處寫道：「此電無異於哀的美敦書，不僅侮辱我個人，而且壓迫我國家。余自革命以來，日本與俄國對余之威脅雖甚，然亦並未有如此之難堪者也。」他還說這封信是羅斯福政治生涯的一個大「污點」[28]。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和史迪威對於感情宣洩方式的對比。到了此時，蔣介石還只是著重陳述自己感情的痛苦，但是對於羅斯福仍然用如此溫和的口吻(污點)去「淺」責，可見他實在無法從類似「待人以寬，責己以嚴」等古訓中解脫出來，而且太強調他與羅斯福之間的個人關係了，但說得殘忍一些，這一點很可能是他的「自作多情」。

他另外親筆起草(但並未遞交)了一份給赫爾利的備忘錄，特別指出，史迪威9月19日交送羅斯福電報時的「態度與精神」，不得不讓他感到「極端之悲觀與無窮之

27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9日。

28 蔣介石在羅斯福來電上的親筆批註(無日期)，請參閱：《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176-179。

慘痛」，並且讓他已經完全放棄和史迪威合作的任何期望。總結備忘錄時，他請赫爾利設身處地去想一想，他何以再能和史迪威繼續共事[29]？換句話說，在蔣介石在內心裡也很清楚，9月19日雙方雖然沒深入交談，但是史迪威送交電報時的「態度與精神」，已經把他的真實感情暴露無遺，而蔣介石還不至於愚蠢到看不出來。蔣介石對赫爾利講得婉轉，但是在他的日記中則說得更明白：「是可忍孰不可忍。」他還萬般無奈地問道：「上帝使我恥辱與痛苦，何一至於此！」[30]蔣介石是忠誠的基督教徒一事，歷來廣受人們懷疑乃至嘲弄，認爲泰半是一場政治戲法，其目的無非先是博取宋美齡和家人的歡心，後是博取美國人的支持而已。這個問題並非本書研究範圍之內，應該另由專家剖析。但凡是看過蔣介石日記的人，對於他的敬畏基督教上帝和堅持奉行宗教儀式，都不免得到深刻印象。因此，他在表達傷心之時，口呼上帝，我們不可看成是官樣文章，而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虔誠教徒在心靈受創時發出的呼喊。

蔣介石認定史迪威是羅斯福電報的幕後主使者。兩三天前，他已經嚐到類似的威嚇了。9月15日史迪威的破門而入和頤指氣使，接著9月19日羅斯福來電都讓蔣介石相信，史迪威今後的表現一定會變本加厲。無論史迪威如何自辯，也無論他如何強調自己送交電報時舉止適當，但是他在美國總統電報抵達前的行爲，和這封電報抵達的時機，都夠蔣介石把怒火集中發洩在史迪威身上了。

隨後幾天，史迪威仍在回味勝利，而蔣介石的怨氣卻與日俱增。9月21日日記中，蔣介石評論史迪威說，此人「陰險卑劣毫無人格已極」。他發誓，今後對外國人員的做法，只要對其失去信心就一定立即解雇，千萬不可在下定主意之後，還聽別人(顯指蔣夫人)勸說，中途動搖[31]。他在9月22日的日記中提到，史迪威想把持指揮權，出發點全是爲了一己之私念，置中美關係於不顧[32]。

毫不意外，此時蔣介石見得最頻繁的人是宋子文。倒是蔣夫人身在美國，完全被隔離在此次事件之外[33]。我們或許可以猜測，即使蔣夫人在重慶，她也無力回天，因爲她前一年10月的作爲，正是蔣介石今日痛苦的根源[34]。

---

29　蔣介石手擬致赫爾利備忘錄，共12頁，1944年(無日期)，應該是9月下旬，並未交給赫爾利。《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第25冊，#15557。

30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9日。

31　同上，1944年9月21日。

32　同上，1944年9月22日。

33　同上，1944年9月19、20、23-25等日。

34　同上，1944年9月21日。

蔣介石雖然在日記裡傾吐滿腔怒氣，但還是竭力克制自己的行爲，並花了很長時間思考如何回覆羅斯福來電。9月19-20日，他和宋子文會面，指示後者轉告赫爾利，蔣介石擔心史迪威可能會誤用指揮權而造成中國動盪不安。蔣介石的理由是，有三分之一的中國軍隊曾經有背叛中央政府的前科，而有更多的軍隊根本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裡。蔣介石的另一個擔心是，中國人無法忍受外國人侮辱，而這正是史迪威幾天前對他作出的行爲[35]。

即使到了這個關節，蔣介石對美國人依然守口如瓶，絲毫不吐露內心情緒。9月20日，赫爾利陪納爾遜前來向蔣介石辭行，蔣介石也沒有多談羅斯福的電報，只是簡略說了一句，中國人不會長期忍受史迪威的侮辱[36]。納爾遜和赫爾利兩人都努力迴護羅斯福，把有關電報的過失歸諸軍部。他們甚至大膽揣測，羅斯福根本沒仔細讀過電報稿。但是他們還是建議蔣介石不妨致電羅斯福請求澄清，蔣介石對此卻緘默不語[37]。所以當納爾遜離開重慶返回美國時，他跟赫爾利一樣，完全不知道蔣介石將會如何處理這個事件。因此他只能根據自己匆促之間的觀察，向羅斯福提出報告。

其實蔣介石本人也陷於天人交戰之中。根據他自己的形容，他9月21日晚開始嚴重失眠，腦海中盡是羅斯福的電報[38]。更重要的是，他決定到黃山官邸與世隔絕數日，摒除所有幕僚，單獨思考對策[39]。大約從9月22日起，蔣介石開始親自起草對羅斯福的覆電，開始思考如何正式向美國提出把史迪威撤離中國的要求。9月23日，蔣介石下定決心，史迪威必須離開中國，但是歡迎美國另派一名軍官來中國接任[40]。根據蔣介石的敘述，「十三年來余受國際上之恥辱，未有今日之甚者，且亦未曾受有日本軍閥如此之污辱與壓迫也。」在他看來，美國違反同盟國精神，破壞合作關係，因此中國無需再被同盟國關係約束，應該重新掌握行動自由。換言之，在蔣介石看來，羅斯福語帶侮辱的電報和粗暴行徑，已經迫使中國不得不對中美同盟關係重新評估，並作最壞打算。正是出於這一考慮，蔣介石的電稿主要列舉史迪威劣跡，作爲撤換史迪威的依據[41]。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蔣介石草稿中每一個字都是親筆所寫，沒和任何幕僚商量。他在9月24日才對宋子文告知他的最後決定，並與宋子文商議採用何種外交方式，處

35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0日。
36 同上。
37 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28-29。
38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2日。
39 同上。
40 同上，1944年9月22、23日。
41 同上，1944年9月23日。

理史迪威撤職的相關事項[42]。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中國資料並未顯示，宋子文在蔣介石作出決定前發揮過任何催化作用。宋子文顯然學到1943年10月的教訓，變得小心謹慎。他不敢忘掉，當年極力鼓動蔣介石撤除史迪威，曾經帶給自己的痛苦惡果。

蔣介石對羅斯福電報的語氣雖然極爲憤慨，卻耐著性子不正面駁斥羅斯福，只把矛頭指向史迪威[43]。事實上，他根本不直接回覆羅斯福的電報，而是把赫爾利當作傳信人，希望由後者把他的回覆轉交給羅斯福[44]。蔣介石運用赫爾利的方法分爲兩個部分：一個是他和赫爾利進行長時間會談，二是交給赫爾利一個「備忘錄」(aide memoir)。運用赫爾利作爲中間人的好處，使蔣介石在許多問題上可以暢所欲言，不需擔心得罪羅斯福。但他同時也可以肯定羅斯福必會細心傾聽他想說的話。蔣介石對於自己這個做法，顯然感到相當滿意，相信最終一定會幫助中美兩國躲過一場大劫[45]。

## 伍、赫爾利逐漸撤回對史迪威的支持

### 一、蔣介石和赫爾利在9月24日的會談

蔣介石使用了五天時間去思考他的最後決定。9月24日，蔣介石召見赫爾利進行五小時會談，在場官員只有宋子文一人[46]。當然由他擔任翻譯。這個與1943年10月15-16日同樣的場景，必定讓蔣宋二人心中都有微妙的感觸。此時，赫爾利抵達中國已有兩個星期。他終於有機會首度聽到蔣介石全心傾述自己對羅斯福和史迪威的感覺，以及對指揮權問題的看法。

由於蔣介石事先已經有幾天時間組織思路，準備可謂相當充分。他因爲心中已經決定不再作美國人「傀儡」，所以想把話說得清楚透徹，無所遺漏。他認定美國人已經作出推翻他的打算，也決定盡一切力量予以反擊，反正心中已經沒有忌諱[47]。對赫爾利而言，這次會談真是大開眼界。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蔣介石要說什麼，突然在那幾個鐘頭之內，腦子要塞進大量不熟悉的訊息，而且還要針對許多議題作出即席反應。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對赫爾利的智力和外交技能，實在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因爲他的許多臨場回應

42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4日。
43　蔣介石對史迪威批評的內容，請參閱：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3日。
44　蔣介石致孔祥熙及蔣夫人電，1944年9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675。Also: Message from General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3, 1944, in Xerox File 1156, MFA.
45　蔣介石在羅斯福來電原件上的親筆眉批，無日期，《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176-179。
46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4日。會議詳細記錄見：《戰時外交》(三)，頁662-671。
47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4日。

將來都會產生長遠後果。

這次會議的中國官方記錄顯示，蔣介石有足夠時間平復情緒。在會議中，他既不憤怒叫囂，也不無端指控，只是平心靜氣說出立場。他直說史迪威的缺點，但也稱讚史迪威的優點。宋子文在場，無疑提高蔣介石表達意見的效率，而宋本人也再度得到影響會談內容和過程的機會。宋子文爲了這次會談，事前準備了6頁大綱，概括會談應該談論的所有重點。這種做法和他慣常的作風大不相符。因爲宋子文歷來自視極高，對自己能說善道和臨場應變急智都充滿信心[48]，從來不會慎重到親自草擬發言大綱。但是這次卻是例外，足見他格外的慎重。

相對而言，赫爾利進入會談之前根本不知道蔣介石已經下決心解除史迪威職務。因此會談一開始，他還以爲會和蔣介石繼續探討史迪威指揮權的實質問題[49]。依照赫爾利判斷，蔣介石最苦惱的事情可能是共產黨軍隊。因此他提議首先討論這個題目，並且繼而用了許多時間去讓蔣介石安心。依他的說明，史迪威其實和赫爾利的想法一致，主張共產黨必須先接受中央政府的權威，然後才可以討論如何納入史迪威指揮系統[50]。

但是過不多久，赫爾利就察覺自己完全搞錯了方向，因爲蔣介石很快就把主題放在他爲什麼無法和史迪威共事這個問題上。蔣介石的批判非常詳盡：史迪威缺乏專業能力，根本無法指揮像中國這麼複雜的戰區。蔣介石還明白表示：身爲中國領袖，實在無法把國家命運交給一個不能信賴而且又不服從命令的人手中；他固然由衷感激羅斯福對中國的友情，一定會盡全力配合羅斯福的意願，但是也表明，如果羅斯福的要求傷害到中國立國精神和原則，則絕對不會向羅斯福的壓力屈服。這些原則包括：中國建國的主義不能變更，中國主權不容損害，國家尊嚴與個人人格必須互相尊重，不容絲毫玷污[51]。

蔣介石檢討中美關係完畢後，正式向赫爾利宣布決定，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並且邀請美國另派一名軍官來華以爲替代。當赫爾利探問蔣介石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時，蔣介石提到艾森豪(Eisenhower)將軍的名字[52]。就這樣，赫爾利在五個小時內得知蔣

48 "Verbal Statement to be made to General Hurle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ide Memoir" by Soong, September 24, 1944,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document 29.

49 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記錄，1944年9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63-671。

50 同上。

51 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記錄，1944年9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63-671。

52 同上。

介石不滿史迪威的全部原因，以及他毫無商量餘地的要求撤換史迪威。赫爾利終於醒悟整個事件需要徹底重新思考了[53]。

## 二、蔣介石9月25日的備忘錄

會談次日(9月25日)，蔣介石交給赫爾利一份備忘錄(aide memoir)。在文件的前一個部分，蔣介石同意任命一位美國將軍作爲中國戰區中美軍隊總司令，指揮全部中國陸空軍，並同時任命這一位軍官爲中國戰區參謀長。在後一個部分，蔣介石拒絕將此項任務交付給史迪威，反而要求解除後者在中國戰區的一切職務。蔣介石宣稱，他一度視赫爾利來華爲促進他和史迪威合作的最後希望，一旦得到史迪威願意合作的保證，準備任命他爲中國軍隊的總司令官。「但是當史迪威將軍明白表示他無意與我(蔣介石)合作，並且認爲他的任務事實上是指揮我時，以上一切努力均不得不停止。」[54]

蔣介石提出備忘錄後，又由宋子文以個人名義把另外一封信送交赫爾利。其中說明，蔣介石希望說明，問題癥結在個性不合，而不在原則衝突。有關統一指揮權的問題，蔣介石和美國總統的立場完全一致，但是必須任命合適的人選執行政策。蔣介石同時指示宋子文向羅斯福表達他的問候和信賴[55]。

蔣介石和赫爾利談話和備忘錄的內容，有兩點值得注意之處。第一，他把當前危機的本質作了最狹窄的解釋，即它是中國國家領袖和一位美國軍官之間的個性衝突。在這種情形下，最合理的解決辦法是把這位美國軍官解職，不需把其他題外事件牽涉進來。第二，蔣介石試圖把美國軍方和美國總統一分爲二。他控制自己，不對羅斯福作任何攻擊，讓羅斯福能夠維護顏面。事後發展證明，這兩點都在赫爾利身上產生了預期效果。當赫爾利把有關文件呈送給羅斯福看時，他附加了一封私人信件，向羅斯福報告，蔣介石和史迪威個性不合乃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而蔣介石要撤除史迪威的決心同樣不可動搖。

值得注意的是，赫爾利並沒有爲了衛護史迪威而去反駁蔣介石，也沒有鼓勵羅斯福去支持史迪威。恰好相反，他只是簡單告知羅斯福，蔣介石的決定不可改變，而他本人也接受蔣介石的說法，認爲他們兩人在個性上水火不容。赫爾利是第一個身在中國現場，而對史迪威保持中立態度的美國高層領袖，不像馬歇爾總是義無反顧地支持

53　同上。

54　Message from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5,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3, MFA.

55　宋子文致赫爾利備忘錄，1944年9月25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217。

史迪威論調。這個事實迫使羅斯福不得不重新審視當前危機的來源，同時也給了羅斯福本人一個下臺階[56]。

如前所言，蔣介石作出決定之前完全沒和任何人商量。9月20日，他拒絕赫爾利私下會面的請求。9月21日，蔣介石寫信給妻子，略微提到史迪威，卻沒有透露他準備採取何種行動[57]。蔣介石的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當時都和父親同住，也都不知道身邊發生的巨變[58]。蔣介石更沒有讓其他文武官員知道當時情形。連參與史迪威指揮權許多細節討論的何應欽也不例外[59]。孔祥熙和蔣夫人是到了9月26日才從蔣介石信中得知他要革除史迪威職務。蔣介石同時要他們放心，無論美國人採取何種行動，中國都不致崩潰。事實上，美國魯莽滅裂只能幫助中國從外國控制中解放出來，國內情況更能自主，而國際關係也能減少屈辱和痛苦。他同時警告他們，千萬不許爲美國人說項，而務必配合中國的決定，催促美國人盡快將史迪威召回[60]。9月28日，蔣介石再度致電孔祥熙，囑其盡快啓程回國，不要再向美國人請求任何援助，因爲那麼做只能徒然招致侮辱而已[61]。蔣介石在同一天也告訴熊式輝，他已決定開除史迪威，囑咐其不必擔心美國人反彈[62]。

現有中文資料顯示，蔣介石在9月24日或25日決定，中國將不顧美國可能報復而堅持自己的主張。在他看來，最壞的結果無非是中國孤立無援，回到珍珠港事變前的境況，但是好處是可以把中國從國際強權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美國軍事援助本來是史迪威利益交換政策中的一張王牌，但是現在似乎已經完全失去功效。事實上，蔣介石採取的行動已經讓他自己無路可退。蔣介石把備忘錄交給赫爾利後，在日記中對自己的解脫心情作了簡短而又傳神的描述：「此心愁鬱頓消，本年七七以來所負之重軛爲之全釋，以生死存亡至此已置於度外矣。故本週亦爲本年最快暢之一週。」[63]

事件的發展不免令人產生對歷史的感歎。從第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以來，蔣史之間的人際關係急速下滑，這本來可以在人事領域內處理乾淨，如同蒙巴頓處理史迪威一

56 Message from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5,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3, MFA.

57 蔣介石致蔣夫人電，1944年9月21日，《蔣總統籌筆》，#15610。另見：《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21日。

58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5日。

59 同上，1944年9月30日。

60 蔣介石致孔祥熙及蔣夫人電，1944年9月26日，《戰時外交》（三），頁675。

61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9月28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4冊，頁221。

62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8日。

63 同上，1944年9月30日。

樣。果真如此，那麼人事關係和政策內涵就可以得到明確分離，不致造成不必要的紛擾。最好的例子是第二次緬甸戰爭前漫長而艱難的交涉。中國政府明明熱心進行緬甸戰爭，但卻擔心史迪威再度成爲中國遠征軍的指揮官。前者是政策問題，後者是人事問題。如果蔣介石能夠坦然把這一點向美國政府表達清楚，就可能使中美兩國政府在籌備戰爭時得到更大的進展。但是由於蔣介石的優柔寡斷，無法在人事問題上作一了斷，毅然革除史迪威，反而造成一種景況，讓史迪威有機會把蔣介石對他個人的不滿解釋成是對美國政策的反對，從而引起美國反彈。指揮權一事的爭論也如出一轍。蔣介石已經接受美國要求轉移指揮權，但是無法接受史迪威個人行使該項權力。在兩次事件中，中美兩國在政策上的共同空間其實相當大，但是都被人事因素所羈絆，引起了本可避免的大衝突。因此，從處理中美同盟關係的大局著眼，蔣介石和羅斯福都必須承擔「該斷不斷」的責任，使雙方的痛苦無謂地延續了兩年多。

## 三、孔祥熙9月28日的報告

長期以來史學界流行一種看法，認爲假如羅斯福接受史迪威建議施加更大壓力，蔣介石大概就會屈服。另一方面，假如孔祥熙9月28日不向蔣介石發電報，蔣介石也不會有足夠勇氣堅持要求解除史迪威職務[64]。一如往常，這些立論完全依賴史迪威的判斷而省略了獨立求證的工夫，他們沒有警覺到的是：連史迪威本人對當時的處境都相當缺乏了解。就史迪威而言，他的確深信孔祥熙的報告改變了一切：「孔祥熙給了一些霍普金斯提供給他的錯誤訊息，使蔣介石以爲羅斯福會支持他。」[65] 然而本章前述內容已經顯示這種看法的錯誤，因爲它忽視蔣介石的內心感受、決策過程和決策時間的順序。再者，這些著作並未試圖去了解蔣介石訊息來源的真正重要性何在。就這樣，史迪威的「管中窺豹」卻被某些作者當成是「全豹」來看，難怪就出現文不對題的結果。事實上，蔣介石不僅接到孔祥熙來電中的訊息，稍早也接到赫爾利傳遞來的訊息。這些訊息使他對美國決策過程，和羅斯福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更深刻的了解。但是千萬不可忘記的最根本事實是：蔣介石在接到這些訊息之前，已經作出他的決定。

第一個訊息是9月25日來自赫爾利。赫爾利晉見蔣介石時，偶然提到不久前曾發生的一件事，那就是羅斯福自己忙碌時，曾指示史汀生部長就共產黨問題代他寫一封

64 Tuchman, p. 636.

65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undated.

信給蔣介石。事後不久，卻發現史汀生的電報措辭不當，不能適當表達他自己的心意，因之甚感遺憾。因此在赫爾利離開華盛頓之前，羅斯福特別關照赫爾利，處理中國事務必小心謹慎，而且事事應該和蔣介石溝通商量。赫爾利明白告訴蔣介石，史汀生的電報不能完全代表羅斯福的態度，建議蔣介石根本不需予以理會[66]。當危機仍在發展中時，赫爾利提供的消息一定讓蔣介石大爲高興。他終於從總統特使口中得知，有些以羅斯福名義發出的電報，其實並沒有經過羅斯福過目。代羅斯福起草電報的政府高官有時用詞苛嚴無禮，羅斯福本人知道後並不認可。這個消息當然鞏固了蔣介石的信念，羅斯福是一個講道理的人，比其他美國政府官員容易相處。只要他能夠和羅斯福直接打交道，就不需費神去理會其他政府官員了。

孔祥熙9月28日發來的電報，再度證實蔣介石想法的正確性。孔祥熙電報的重要性不是它幫助蔣介石作決定（因為決定已經作出），而是讓蔣介石相信，羅斯福在利用另一個管道向蔣介石傳遞一些訊息，而其內容大不同於9月18日電報的訊息。孔祥熙電報所報告的是，他和霍普金斯有過一番談話，內容是羅斯福看到蔣介石9月25日覆電後的反應。霍普金斯和孔祥熙的談話方式，給中國人一個明確的印象：蔣介石在重慶利用赫爾利向羅斯福傳遞訊息，羅斯福也同樣地就近利用霍普金斯這條線，向蔣介石傳遞非正式訊息。這就讓蔣介石不得不重視這些訊息了。

霍普金斯接觸孔祥熙的時機，可能也有獨特的重要性。如前文所述，早在9月28日，蔣介石就已經指示孔祥熙盡快離開華盛頓返回中國，不要猶豫。假如白宮知道這個訊息，便可能產生一種緊急感。因爲孔祥熙一旦離開美國，美國總統在華盛頓就不會再有一條直通蔣介石的管道了。雖然到目前爲止，尚無檔案可以證明這兩件事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它們都發生在同一天(28日)，可以讓我們推測霍普金斯接近孔祥熙的時機，或許有其特殊的意義。

## 四、霍普金斯的介入

到底孔祥熙傳給蔣介石什麼訊息？第一，羅斯福聲稱他並不相信所聽到關於蔣介石的負面批評。他尊重中國是一個獨立國家，而蔣介石是這個獨立國家的領袖。這個訊息馬上表達了羅斯福的善意，放鬆了雙方對峙的緊張局面。第二，既然蔣介石已經在原則上接受了關於指揮權的建議，所以有關史迪威的問題只是他並非適當人選。雖然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正式回覆電文之前，仍需要先和馬歇爾商量，但是他個人認爲完全

66 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記錄，1944年9月24日，《戰時外交》(三)，頁663-671。

可以另選別人取代史迪威。這個訊息等於是交出了羅斯福個人的底線[67]。

霍普金斯提供以上消息來源，本身就是啓人疑竇的事情。比如說：孔祥熙是否捏造消息，或是誤解霍普金斯的口信？依照本書作者的判斷，兩種可能性都非常之小。孔祥熙一向小心謹慎，不如宋子文的敢於自作主張。更何況他自己原本所持的立場正好是與蔣介石相反，因爲他主張中國應該對羅斯福讓步，仍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所以他不至於有意或無意曲解霍普金斯的說法，誤導蔣介石作出與孔祥熙本人信念相違的決定。

另一個問題是：霍普金斯有無自作主張把消息透露給孔祥熙，還是在羅斯福授意之下才把消息傳出？

霍普金斯多年來對史迪威確實缺乏好感，也曾經與宋子文合謀把史迪威從中國戰區趕走。但是霍普金斯並不是初入宦途的稚童而是政海老手，他應該懂得史迪威事件此時的高度敏感性，也知道羅斯福正竭盡全力挽救史迪威的政治命運。在這個關鍵時刻，霍普金斯不可能漫不經心，作出任何拆他主子臺的舉動。因此這個說法聽來並不合情，也不合理。果真如此，則霍普金斯就不夠格作總統最信賴的智囊了。再說，霍普金斯和孔祥熙關係並不密切，不是彼此可以推心置腹或是閒聊胡扯的朋友。因此最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霍普金斯是在羅斯福授權之下向蔣介石傳遞一些特定的信號，不可能是他的信口開河，也不可能是他的詞不達意。

我們容易了解，蔣介石會從這些重要政治情報中作出自己的推論。他可能看出羅斯福其實並無敵意，倒是馬歇爾肯定是一個麻煩。他也可能相信，羅斯福想依賴霍普金斯和孔祥熙這條線路，達成一個私下解決之道。假如這個消息加強了蔣介石原本的決心，則不奇怪。只是任何想把孔祥熙報告當成是影響蔣介石決定主要因素的企圖，卻經不起本章前文所提出的反面證據的考驗。

縱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追問另一個問題：爲什麼羅斯福會這麼快就把信號釋放出來？誠然，目前並沒有史料可以追蹤羅斯福思路轉變的過程，但是合情合理的解釋應該是：蔣介石斷然要求解除史迪威職務的舉動終於震動羅斯福，逼他不得不看到，歷來無條件信賴馬歇爾處理中國戰區軍事問題的做法，竟然帶來如此嚴重後果。他也終於意識到，他一直以爲馬歇爾和參謀長們作出建議前，一定慎重考慮過一切有關因素，而現在事實證明這個假設原來根本就是錯誤的。蔣介石的反應之強，令羅斯福從

67　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9月28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02檔案夾。另見：《戰時外交》（三），頁576-577。

因循苟且的惰性中清醒。赫爾利的報告也帶來了一個震驚。他向來尊重赫爾利的看法，而現在赫爾利的報告，竟然完全不同於過去幾個月從馬歇爾和史迪威傳來的訊息。羅斯福終於意識到，他的軍部領袖們可能犯了一個重大政治錯誤，必須由他親自出面擺平。然而顧慮到本國的體制和士氣，他在出手處理前，仍然必須和馬歇爾商量。因此，他和霍普金斯的談話，很可能就是預先把他自己對於這件事的看法向蔣介石透露，然後希望蔣介石也能夠體諒他的處境，並作出相應的妥協。

霍普金斯是白宮處理對華政策的重要人物，他和宋子文的親密私人關係，曾在促進羅斯福和蔣介石關係的過程中起過關鍵作用。宋子文回重慶後，羅斯福還選擇運用霍普金斯這個管道，顯示他仍然想採取私人外交的手法，只不過此時對方變成孔祥熙而已。蔣介石和宋子文兩個人在重慶，很自然地便看到霍普金斯作爲一個傳信人的重要，而且高度重視他傳遞訊息的內容。因此毫不足怪地，中國人也決定依循同樣的做法，霍普金斯既然要和孔祥熙保持聯繫，宋子文也決定和霍普金斯保持來往。

蔣介石正式提出撤換史迪威的要求後，宋子文隨即以個人名義給霍普金斯發了一封電報，內容有以下幾個重點。第一，他強調蔣介石的決定絕對不可更改。他告訴霍普金斯，他(宋子文)曾經提醒蔣介石撤除史迪威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但是蔣介石決不妥協，並告訴宋子文，經驗使他堅信，如果繼續保持史迪威的職位，結果只會把蔣介石變成在自己國度裡的囚徒。蔣介石不但堅持不會改變決定，更告訴宋子文已有心理準備去接受一切後果。宋子文的言下之意是，羅斯福大可不必再存挽救史迪威職務的僥倖心理。

其次，宋子文暗示，如果史迪威能夠離開中國，則中美關係有可能大幅改善。用他的話說：「我認爲當前是美國能夠影響中國採取正確政策的最佳時機。」依照宋子文的說法，蔣介石已明確表示，準備全面接受納爾遜改善中國財政和經濟的一切建議，他也明確表示願意與赫爾利共同合作，尋求盡快解決共產黨問題之道，並派宋子文訪問蘇聯，改善中蘇關係，把中國軍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的繼承人，把中國軍隊後勤業務交給美軍掌控，並對中國軍隊的人事進行大幅度調整。

宋子文在電報結尾處寫道：

> 假如總統能夠派遣一位得力的軍官取代史迪威，而此人又能具有赫爾利和納爾遜所表現的精神、坦率和外交能力的話，我認為中國政府必定會在政治和軍事上進行根本性的重整。如果不然，那麼所有問題將在未來的緊要關頭陷於僵局。我之所以如此開誠布公地表達個人意

見，原因是我擔心這是最後的機會。為了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我們必須掌握這個機會[68]。

毫無疑問，霍普金斯和羅斯福一定仔細咀嚼過這封電報的每一個字。

## 五、中國其他領袖的介入

這場危機中還有兩類中國人扮演了不同角色：蔣介石的政治敵人和蔣介石的親信幕僚。

先說蔣介石的政治敵人。地方實力派領袖對於重慶發生的危機並不十分了解，但是重慶的消息靈通人士肯定知道從7月7日以來發生的事情。根據蔣介石自己的政治情報顯示，孫科在蔣介石和美國的關係惡化後，很可能已和美國政府建立了秘密聯繫，而美國政府也把孫科當作接替蔣介石的最佳人選。孫科的支持者主要是1920年代國民黨西山會議派的老政客（居正、鄒魯、于右任等等）。這些人沒有政治地盤，也沒有軍隊後盾。如果美國政府真以爲他們在推翻蔣介石以後，能夠組織一個有效的抗日政府，那將是莫大的錯誤。對於蔣介石而言，僅僅是聽到美國政府可能參與這麼一個陰謀，就已經足夠激怒他採取更加堅決的立場，一定要和美國周旋到底[69]。在他眼中，這些和美國人勾結的中國人的所作所爲，本質上和汪精衛向日本出賣中國利益的做法並無不同[70]。

再說蔣介石的個人親信，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一直要到9月26日才初次聽說中美關係產生了嚴重裂痕，但是仍不了解事件的細節[71]。9月28日蔣介石終於向個別親信透露所作決定[72]，親信聽後都大吃一驚，並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做法。張治中認爲蔣介石應該把兵權全部交給史迪威，並相信英美兩國絕對不會支持共產黨[73]。王世杰可能是蔣介石幕僚中，唯一對整個事件作過最細心思考的一位。他擔心美國軍部會因此而改變今後反攻日本的戰略。他指出，美國軍方人士中向來有一部分人，反對從中國大陸發動對日本本土的攻擊，而認爲應該從太平洋直接進攻。萬一軍部採取後面這個方案，那麼日本將無限延長占領中國，而中國犧牲的人數將會大大增加。假如預期中的

68 Soong cable to Hopkins, undated,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1-1.

69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8日。

70 同上，1944年9月27、29日。

71 王世杰日記，1944年9月26日。

72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8日。王世杰日記，1944年9月28日。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28-29。

73 親信們在1944年10月2-4日對蔣介石之批評。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30。

中美聯軍不能建立，那麼東北和蘇聯的關係，甚至共產黨問題，都會變得極其複雜。在蔣介石的眾多親信之中，似乎唯有熊式輝表示對蔣介石的決定全力支持。考查其原因，或許是他以前曾經親身體會美國人侮辱所致[74]。其他知情的中國領袖，則都認爲蔣介石應該讓步。其中以顧維鈞大使最爲坦率。顧維鈞敦促蔣介石拿出政治家風度，接受美國對於指揮權的要求。他同時警告說，如果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羅斯福便很可能會認爲他無法信任中國的抗日決心，轉而支持蘇聯。一旦這種情況發生，中國就會失去四強之一的地位[75]。

蔣介石面對這一群親信幾乎異口同聲的懇求時，他的回應是，不需要過分在意外國人的批評，不管是否能夠得到盟邦資助，中國都一定有堅持繼續抗戰的決心。在蔣介石心中，中國已經向美國作出過多讓步，而中國愈是哀求美國伸手援助，美國愈是肆意侮辱。蔣介石宣稱，如果中國此時再不採取堅定態度，則它會淪爲英美手下的汪精衛附庸政權。即使中國未必完全崩潰，也逃不掉被美英列強瓜分宰割和統治的結局。其實，蔣介石在致孔祥熙的一封電報中，已經指責美國對待中國有如對待附庸國一樣[76]。當然他同意中國政府需要改造，但改造必須在中國自主情況下進行，而不是被外國人脅迫而不得不爲之[77]。正如蔣介石9月底所說，假如美國壓力持續增加，中國唯一的出路只有與之「絕交」，並準備單獨對日本作戰[78]。蔣介石此時對中美關係所以發展到9月底這個地步作了一些回顧。他寫道：「彼美狂妄盲昧，以爲余無其援助乃可一推而倒，中國即可完全受其統治之妄想，是與昔日俄倭對我者無異，乃彼不以此爲戒，反而欲重蹈其覆轍爲可惜耳。余則只要能自立不撼，何足爲慮也。」[79]

事實上，蔣介石不但拒絕親信勸他自我克制的請求，也進一步斬斷自己的退路。10月1日，他首先向一群高級將領說明和美國人的交涉情況[80]。次日他又向國民黨中常會報告有關史迪威糾紛的細節。與此同時，由於他深深懷疑美國人在鼓動孫科進行反蔣活動，因此公開叱責孫科近日的「乖張言行」[81]。他明白告訴國民黨領袖們史迪威必須離職，而他已經正式要求羅斯福另選他人繼任。他也明白指控馬歇爾長期以來想要把

74 王世杰日記，1944年9月30日。

75 顧維鈞致蔣介石電，1944年9月29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9冊，頁110-113。另見：《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0月5日，《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437-438。

76 《顧維鈞回憶錄》，第5冊，頁437-38。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0月1日。

77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0月1日。

78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日。

79 同上，1944年9月30日。

80 同上，1944年10月1日。

81 孫科對於蔣介石的批評未作出任何回答。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2日。

史迪威變成中國軍隊總司令，英美兩國又不斷造謠國民政府垮臺在即，企圖迫使蔣介石俯首淪爲美國傀儡。他強調中國在珍珠港事變前一直能夠團結抗戰。將來即使不與美國結盟，也仍然堅持抗日。他誓言，「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可以死亡，但絕不辭職。」他更明言，「我們無法知道在未來的交涉中，我們能否成功。但是不管發生任何後果，我們必將繼續奮鬥。沒有我們的參與，別的國家必定無法戰勝日本。」在結束報告時，蔣介石說明他能夠接受的美國條件限於是：1. 一位美國軍官在(中國戰區)參謀長的指揮下統率中美兩國軍隊，但是不包括其他中國軍隊(指的大概是共產黨軍隊)。再者，此人個性必須有服從心，而且「必須得到我的同意」。2. 租借法案物資，必須依照英國和蘇聯的前例由中國政府分配。3. 共產黨軍隊必須服從中央政府的領導，才有可能成爲中美聯軍的一部分[82]。

10月4日孔祥熙又送來一份報告，使蔣介石對美國態度得到進一步認識。孔祥熙報告他不久前才和羅斯福會面，氣氛十分融洽。羅斯福不僅細心傾聽孔祥熙對於史迪威的一長串批評，而且透露他已經和馬歇爾商量召回史迪威的問題。不過馬歇爾依然不肯讓步，所持理由是他認爲中國問題的癥結不在人事而在制度，並且認爲史迪威是無可取代的人才。因此馬歇爾仍然要求羅斯福轉告蔣介石，讓史迪威留在中國繼續服務。不過羅斯福告訴馬歇爾說，蔣介石終究是中國領袖，必須尊重他的意願，因此美國需要物色一位繼任人[83]。一旦蔣介石得知羅斯福的態度如此，他就在10月5日告訴國民政府五院院長，他已經要求美國撤回史迪威，並請他們要有心理準備，今後中國可能必須單獨對日作戰[84]。不久之後，他又把這項決定向更下一級軍官宣布。

這一連串行動顯示，蔣介石已經決定把自己的政治威望和史迪威的撤職捆綁在一起，而且表示他已經公開走上不歸之路。如果還有美國人或中國人試圖挽回，則其努力註定失敗。

但是蔣介石的親信們感覺事態過分嚴重，不肯放棄他們的溫和主張。10月3日，張治中和王世杰再度主動找蔣介石談論史迪威問題，張治中帶有質問的語氣問道：爲什麼在發出要求史迪威離職電報前，不先和幕僚們商量一下？蔣介石答覆說，他早就知道幕僚中沒有一個人會支持他的決定，因此連諮詢的過程都毫無必要。王世杰不肯罷休，堅持蔣介石應該事先商議，因爲事情的發展很可能導致軍部改變美國的軍事戰

82 "Generalissimo's Speech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Kuomingtang",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cript of CKS's speech, undated,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83 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10月4日。《蔣總統籌筆》，#33040224。

84 王世杰日記，1944年10月5日。

略，繞開中國直接進攻日本。王氏的說法只是重新激起蔣介石對軍部的憤怒而已[85]。10月4日孫科終於向蔣介石低頭，他不但提出道歉，並且宣布對蔣介石忠誠不貳[86]。

從以上敘述，可以清楚看出9月19日事件對蔣介石的感情傷害之深，他下定決心不顧國內反對、美國恐嚇，乃至國際孤立，一定要把史迪威趕出中國。

## 陸、史迪威的感受和對策——發動攻勢

從中方資料整理出事件發生的經過後，我們同樣關心：美國政府如何理解當時的情況？如何分析中國的動向？又如何策劃他們的因應策略？

史迪威是整個事件的關鍵人物，因此他的感情和行爲最值得我們重視。然而從史迪威本人留下來的資料來看，他似乎對9月19日事件在蔣介石心中所引發出洶湧的感情波濤懵然無知，當然也可能是故意視若無睹。直到9月24日，史迪威依然充滿自信，認爲蔣介石舉手投降的時刻可能隨時到來[87]。史迪威的自信也有部分來自另一個宋氏姐妹：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這位孫夫人在9月24日的一次家庭宴會上，對史迪威讚不絕口[88]。史迪聽後大爲受用。

史迪威充分享受了自己的「勝利」滋味後又等了好幾天，仍然看不到中國人屈服跡象，於是決定打鐵趁熱，進一步施壓。他堅持信念，只要美國政府肯採納他的建議，願望便可以實現[89]。他最先想到的動作就是求助於馬歇爾。史迪威告訴馬歇爾（9月22日），他早已看穿蔣介石處理指揮權一事中施展的卑劣伎倆。史迪威寫道：

> 蔣介石還是在玩他的老把戲。一開始時，他看起來似乎爽快地同意了指揮權的安排，而且也暗示同意了把共產黨軍隊放在我的指揮之下。接下來，他就開始拖延，一直拖到今天。他在口頭上狡辯有太多的困難需要時間來一一克服。但是事實上，他心裡想的是，我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進展既迅速又有效，讓他大可以不必作出任何努力就能坐享其

85 王世杰日記，1944年10月3日。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4日。

86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4日。

87 史迪威此項估計透露在他於1944年9月24日給其夫人的家書中。見：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5.

88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4, 1944.

89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0, 1944. Tuchman, p. 632.

> 成。他想的就是借此避免承認共產黨，和讓一個外國人去指揮中國的軍隊。

史迪威進一步對納爾遜向美國政府所作的報告的價值提出質疑。他寫道：「由於納爾遜的角色正中蔣介石的下懷，因此蔣介石對他表現得客客氣氣，而納爾遜也以爲雙方口頭上的約定，代表了對方一定會認真地把它們付諸執行。」最後史迪威請馬歇爾和羅斯福一定要繼續向蔣介石施壓，否則只會鼓勵蔣介石以爲他的拖延策略終將得售[90]。

換言之，在9月19日之後，當史迪威依然沒有看到蔣介石有任何動靜時，他直覺的反應是和以往完全一樣，那就是，蔣介石又在玩弄拖延戰術的故伎。而史迪威也依舊使用自己習慣的思維模式替蔣介石作心理分析：蔣介石只是想讓美國人在太平洋取得勝利，他自己可以作壁上觀而不需付出任何代價。有趣的是，儘管此時客觀情況已經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但是史迪威依然牢牢抓住老一套分析方法，結果當然得到和以前一樣的結論。只是僅僅幾天之後，事態發展很快證明史迪威的判斷發生了嚴重錯誤。

## 一、史迪威對中國的直接懲罰

9月25日，史迪威終於從赫爾利處聽到壞消息，得知蔣介石堅持要他離開中國戰區。他的震驚和憤懣之情當然容易體會。用他自己的話說：「經過兩年8個月的努力之後，得到的回報是被人在膿包上打了一巴掌。」[91] 史迪威立即用他最熟悉的方法力圖扭轉頹勢[92]。

首先，他運用手中直接控制的資源提醒蔣介石，假如後者繼續違抗美國人的意志，那麼他的日子將會變得很難過。其次，他把共產黨問題拉進來威脅蔣介石，暗示美國大可以放棄蔣介石政府。最後，他用中國危機和崩潰的可能性，促使羅斯福和馬歇爾加大對蔣介石的壓力。由於不了解蔣介石9月19日以後的強烈心理變化，史迪威這些舉動徒然引起蔣介石的更大反感，更加害怕史迪威得逞，也更加堅持絕不讓步。即便羅斯福此時已經親自過問中美外交事務，又採取了相當緩和的姿態，也無法改變

90 Stilwell message to Marshall, September 22, 1944. Xerox File 1112, MFA.

91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6, 1944.

92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September 25, 1944, pp. 265-266. See also: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5, 1944.

蔣介石的心意。

史迪威具體動作的第一招是宣布準備從中國撤退並返回美國，包括第14航空隊撤離，美國軍方在華指揮部人員也將從重慶撤退等等[93]。這些措施看在蔣介石眼裡，只是史迪威運用手中資源對中國進行恫嚇罷了，因此不爲所動。

## 二、史迪威利用中國共產黨作爲討價還價的工具

史迪威第二招是利用共產黨軍隊作爲籌碼。他似乎十分相信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發生重要作用，而共產黨領袖也將願意把軍隊交由自己指揮。他最近一次和共產黨接觸是9月13日。中共代表林祖涵和王炳南會見史迪威時，聲稱帶來朱德和毛澤東的問候。他們對史迪威有意訪問延安表示歡迎，並約定以後再次會晤[94]。現在，史迪威想取得赫爾利支持，要赫爾利幫助他和共產黨保持聯繫。9月23日，史迪威送給赫爾利一份建議書，表示打算親自訪問延安，向共黨領袖提出合作計畫。他期望能夠說服共黨領袖接受蔣介石在名義上的領導地位，並接受史迪威作爲他們部隊實際上的指揮官。他更建議在黃河以北使用共產黨軍隊，並以武器裝備五個共產黨師，而美國還會把X部隊、Y部隊和共產黨軍隊列爲最優先裝備的三個對象，只有等它們得到重新裝備以後，美國才會協助中國其他部隊[95]。爲了逼使蔣介石認真對待史迪威使用共產黨軍隊的意願，史迪威總部還向蔣介石提供了一份號稱是來自朱德的電報，邀請史迪威訪問延安[96]。最後，史迪威宣稱，他只需要在延安停留三天時間，就可以完成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安排[97]。

此處無需深究史迪威對共產黨軍隊戰鬥力的估計是否正確，也無需辯論他是否有機會或能力指揮共產黨軍隊進行實戰。我們此地能看到的景象是，他還依然以爲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蔣介石頭上，並且認爲共產黨軍隊是他手中的一根大棒子，可以用來敲打蔣介石。史迪威此時把朱德的電報拿出來，肯定只會達到一個效果，就是增加蔣介石的疑懼，使蔣介石相信史迪威和共產黨已經串通在一起了。

雖然我們還不知道所謂朱德電報到底來路如何，但是可以提出下面兩個揣測：第一個揣測是，共產黨領袖得知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產生了嚴重裂痕，他們非常樂意在

---

93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7日。

94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13, 1944.

95 Schaller,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p. 171. Tuchman, pp. 632-633.

96 朱德的電報由史迪威在重慶辦公室轉交給蔣介石(1944年9月，無日期)。《戰時外交》(三)，頁672。

97 熊式輝，《海桑集》，第5b冊，頁28-29。

這個關鍵時刻發出一份邀請電報，加深蔣史之間的矛盾。第二個揣測是，史迪威主動要求共產黨向他提供該項電報，增加他對付蔣介石的威嚇力度。不管實情如何，拿出朱德電報只能火上澆油，讓蔣介石益發相信必須把史迪威趕出中國戰區。

## 三、史迪威向馬歇爾求助

史迪威過去最常用而且也是一再證明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向馬歇爾不斷發送電報，請求華盛頓支持。史迪威聽到「壞消息」後立即展開行動。他在9月26日致馬歇爾的電報中，還爲蔣介石拒絕把指揮權交給他提出一個新解釋。根據史迪威猜想，可能是因爲日本電臺形容史迪威野心勃勃，想把自己變成中國太上皇。史迪威甚至懷疑中國政府是這個謠言的始作俑者，主動向日本電臺提供了這個假情報[98]。史迪威在提到這個消息時，其態度之認真，令人懷疑他個人的心智是否早已和現實脫節。身爲美國陸軍上將，擔負同盟國軍事大任，史迪威居然會抓住敵人的這種低劣宣傳伎倆而大作文章，也只能讓人感到他已經到了「技窮」的地步了。

爲了強調蔣介石不值得信賴，史迪威告訴馬歇爾說：

> 蔣介石無意對於未來的抗戰作出任何努力。任何人如果想要促使他抗戰的話，都會被阻止甚至消滅……他認為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爭臨近結尾，因此他可以使用拖延伎倆，把整個作戰的擔子放在美國身上。他既無意進行任何民主化的改革，也無意和共產黨締結統一戰線。

至於蔣介石反對把指揮權交給他，史迪威向馬歇爾保證，錯誤絕對不在自己：

> 目前的摩擦只不過是掩蓋他真正意圖的藉口而已。他的備忘錄完全是一派胡言……道理非常簡單。他手中並沒有握住任何關於我的把柄，因此他只好籠統地說他和我個性不合。他聲稱我們兩個人之間缺乏合作也是荒唐可笑，因為我們歷來都在努力地和中國人合作……至於說到個人行為方面，請相信我從來沒有違反過中國人的禮儀。他說我認

98 Personal message from General Stilwell to General Marshall dated September 26th,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MFA.

> 為我的任命是去指揮他，更是無稽之談[99]。

最後談到如何打破僵局，史迪威建議的大膽才真正表露無遺：

> 我現在完全相信，只要蔣介石掌權一日，美國就無法從中國得到合作。我相信他只是會繼續他的拖延政策，又同時爭取更多的借款和戰後的援助，其目的是鞏固他的地位，而這個地位的基礎是一黨專政、反動政策、鉗制民主意識、依賴秘密警察的統治手段。

換句話說，史迪威的目的是說服馬歇爾和羅斯福，如果要想改進中美合作關係，必須先推翻蔣介石政權[100]。

一如往常，史迪威的電報在馬歇爾身上產生預期效果。9月28日，馬歇爾通知其他幾位參謀長，他們應該聯合起來向羅斯福提出一封電報稿，由總統簽名後發送蔣介石，而且(像以往一樣)他已經把電報稿擬好。但是由於本書作者目前尚不能肯定的原因，馬歇爾擬就的電報稿並未被羅斯福採用。可能的原因有幾個：馬歇爾實際上並沒有向參謀長聯席會提出這個電報稿，參謀長聯席會沒有通過把電報稿呈交羅斯福，或是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呈交後被羅斯福拒絕採用。無論如何，羅斯福在參謀長聯席會會議後，並沒有立即發送任何電報給蔣介石[101]。

羅斯福沒有立即發送一封新電報給蔣介石，似乎表示他已經運用自己的判斷力來

---

99 "Personal message from General Stilwell to General Marshall dated September 26th,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MFA.

100 在馬歇爾圖書館所藏的史迪威的該項文件有兩個不同的版本。一個長的版本中許多文字在短的版本中經過相當程度的修改和刪除。軍部原來收到的是長的版本，但是短的版本重新命名為 "Personal message from General Stilwell to General Marshall dated September 26th", September 26, 1944. 在短的版本的末端有以下文字："Orig. to Gen. Handy by C/S w/note 'Copies should go to Ad. Leahy & Gen. Arnold' GCM". 這顯示出一個可能性，即：短版本是爲了其他幾位軍種的參謀長們而刪減的，這樣他們就沒有機會看到史迪威電文的原文。見：Message from JWS to Marshall, September 26, 1944. Xerox File 1114, Item 5250, MFA.

101 See: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Admiral King and General Arnold, from Marshall, September 28, 1944. On the top margin of the original, it was pencil-marked "NOT SENT". Also: Marshall text of proposed message for the President to send to CKS, September 28, 1944. Xerox File 2029, MFA.

解決當前危機，而馬歇爾的建議已經不再被無條件地接受了。如前文所述，也正是在這個骨節眼上，羅斯福和霍普金斯進行了一場長時間的談話，而後者又把內容詳細經由孔祥熙轉達給蔣介石。就在羅斯福爭取更多時間思考問題或是求取冷靜緩和的機會時，馬歇爾不斷催促羅斯福採取行動。9月28日到10月4日之間，馬歇爾感覺到，羅斯福可能不願意再以高壓手段逼迫蔣介石就範，於是又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草擬了一個備忘錄，在得到李海海軍上將的支持後，呈交給美國總統[102]。

馬歇爾在這個備忘錄中（注明的日期是1944年10月4日），提出兩個理由敦促羅斯福採取行動。一個理由是，美國已經作了很大犧牲去幫助中國，因此不能退讓。第二個理由是，一旦史迪威鎩羽而歸，其後果將對總統本人的政治利益大爲不利[103]。在美國體制下，馬歇爾的第二個理由由一位職業軍人向總統提出實屬不恰當，但是他似乎已經覺得無路可走，只好朝羅斯福的政治軟肋下手。當然馬歇爾還有一個難以啓齒的理由，那就是他無法爲史迪威在美國找到一份合適工作。也正是爲了避免同樣這種窘境，馬歇爾才會在1944年7月不惜耗費九牛二虎之力，強迫中國把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豈知才過了兩個月時間，同樣情形再度發生，誠然令他焦頭爛額。

## 柒、史迪威9月29日以後的局部讓步

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正在華盛頓忙於挽救史迪威命運時，史迪威本人在重慶也決定作出局部讓步[104]。當史迪威從林蔚將軍處探知（9月28日），當前僵局的關鍵可能是史迪威堅持使用共產黨軍隊後[105]，馬上送一份備忘錄給何應欽（9月29日），撤回他要使用共產黨軍隊的主張[106]。這個「讓步」對史迪威而言，代價可謂極其低廉。因爲

102 Marshall memorandum for Admiral Leahy, October 4, 1944. Also: Marshall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Action to be taken in the event that General Stilwell is to be relieved from duty in China" and "Proposed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Generalissimo", Oct. 4, 1944. Xerox File 2029, MFA.

103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ctober 4, 1944, in Xerox File 2029, MFA.

104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9月29日。

105 林蔚似乎在暗示，假如史迪威放棄有關共產黨的提議，則蔣介石可能對其他的提議予以同意。

106 史迪威的原件在《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8冊，第012檔案夾。史迪威致蔣介石備忘錄（由何應欽轉交）1944年9月29日，《戰時外交》（三），頁676。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6.

他從來就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他聲稱共產黨願意接受他指揮的說詞[107]。史迪威的假設顯然是，既然蔣介石還沒有把決定告訴任何人，說不定也是爲自己留一條退路[108]。也就是有這麼一個錯誤判斷，史迪威一方面希望蔣介石自找下臺階，另一方面也讓他自己以爲小小讓步便可扭轉大局。

但是蔣介石此時既然已經走上不歸之路，史迪威的小小讓步當然不能緩和局勢。史迪威因爲達不到預期後果，也得不到中國回應，因此再度求助於馬歇爾和羅斯福。9月29日史迪威致電馬歇爾說，他已經放棄有關共產黨軍隊的要求，因此不認爲蔣介石還有任何藉口繼續反對他的任命。在電文中，他又提出新的攻擊焦點，大膽地把目前僵局的責任歸諸宋子文蓄意破壞，同時還對蔣介石對他的不滿提出進一步猜測，認爲蔣介石可能以爲是他慫恿羅斯福寫信，故意羞辱蔣介石[109]。有趣而又令人無限感歎的是，到這個時節，史迪威依然沒有認識到，蔣介石對他的反感遠遠大於共產黨問題，而宋子文在此次事件中其實只扮演了一個小心翼翼的陪襯角色，不敢輕越雷池半步。史迪威對當前局勢的推測幾乎全部錯誤。而他在這幾天中對周遭環境和動態的訊息、反應、分析和行爲，也正是他在中國戰區服務兩年半的縮影。既缺乏自知之明，更缺乏知人之明。他所迷信倚仗的是美國無限的國力優勢，相信美國的壓力可以使他無往而不利，但是對於所在國的政治軍事行情，只能一知半解，既不肯勤奮學習，也不屑小心求證，始終堅信自己是中國問題專家。最後只好借助於道聽塗說，異想天開。不但蒙蔽了自己，也誤導了華盛頓的上級。他唯一猜對的是，蔣介石認爲史迪威是鼓動羅斯福來信的罪魁禍首。

## 捌、羅斯福再度介入

美國政府接到蔣介石9月26日發出並令人極度惱火的回覆後，居然在十天之中毫無動靜，真是不尋常之至。到底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一個合理的推論是羅斯福終於認識到史迪威和馬歇爾造成的傷害有多大，因此親自關懷中國這個爛攤子。不容置疑，赫爾利的訊息也使羅斯福對於兩國之間的爭端，有了一個全然不同的理解。在羅斯福眼中，赫爾利是具有政治和軍事判斷力的人，對他見解的尊重不亞於對馬歇爾

10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 431-433, footnote 92. 該書作者並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以支持史迪威的說法。

108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entry of September 29, 1944, p. 267.

109 Message from JWS to Marshall, September 29, 1944. Xerox File 1115, Item 5750, MFA.

的尊重。因此當赫爾利發自現場的報告和馬歇爾的報告截然不同時，羅斯福不得不加以重視[110]。

正如前文所述，赫爾利9月23日向羅斯福提出的報告，包括他和蔣介石9月8-18日達成協議的清單。這份報告明確告訴羅斯福，蔣介石已經向幾乎所有的美國要求作出讓步，並且指揮權的轉移隨時可能實現。赫爾利這份報告寫在他知道蔣介石決定要求撤換史迪威之前，因此語氣充滿樂觀。史迪威看後也表達了他個人的支持。赫爾利和史迪威兩人似乎都沒爲9月19日的事件感到特別憂心，難怪赫爾利寫道：「您在9月19日指示史迪威將軍交給蔣介石的電報的內容，我非常熟悉。我已經向蔣介石建議，不要直接回應您的電報，以免造成僵局。」他又說：「儘管歧見依然存在，但是我相信情況將會改善。」[111]所以僅僅一天之後，羅斯福突然接到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的消息，他的驚訝程度可以想見。面對新局面，羅斯福能夠作出的最合邏輯的推理就是，既然指揮權轉移的條件早已和蔣介石談妥，那麼蔣介石態度突然改變的唯一理由，必然是出於史迪威個人行爲的失當，何況這也正是蔣介石在覆電中所反覆強調者。羅斯福雖然在過去兩年應該早已知道蔣介石的感受，但是直到細讀蔣介石9月24-25日致赫爾利的函件，才終於第一次靜下心來傾聽蔣介石，並試圖體會他內心的感受。

## 一、白宮的補救措施

如上文所述，霍普金斯和孔祥熙不久之後的會面絕非普通閒聊而已。身爲政壇老手，又是羅斯福的心腹謀士，霍普金斯不可能在這個極爲敏感的時刻，未經美國總統授意便漫不經心地去和孔祥熙密談。所以最合理的解釋是，也如上文所述，羅斯福精心導演了這一幕，目的在表示，儘管他仍需要安撫馬歇爾和史迪威，但是正在收回中美關係的主導權。

如果羅斯福的確認爲中美兩國就指揮權問題幾乎已經取得共識，而史迪威使之毀於一旦，那麼他的這一個想法，似乎也被自己派往中國的另一位特使的現場目擊報告所證實了。10月4日納爾遜剛回到華盛頓，就對赫爾利的表現讚不絕口，他基本上證實了赫爾利給羅斯福的報告：史迪威9月19日致送羅斯福電報前，赫爾利和蔣介石幾乎已經解決中美兩國之間的所有重要政治和軍事分歧[112]。由於羅斯福聽到的這些新消息都和馬歇爾的報告相反，因此羅斯福決策時不得不感到猶豫，不願意再接受馬歇爾單

110 相反地，塔克曼認為赫爾利在此次事件中並未產生重要影響。見：Tuchman, p. 640.

111 Message from General Hurley to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23, 1944, in Xerox File 1156, MFA.

112 Schaller, pp. 172-173.

方面的建議繼續爲史迪威向蔣介石施壓。羅斯福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時間思考自己的政策取向。

過去有些著作認爲，羅斯福之所以不再支持史迪威，並向蔣介石讓步，是他考慮到自己在總統大選中的政治利益[113]。政治考量確實很可能是羅斯福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馬歇爾試圖打動羅斯福的一記高招。不過羅斯福也可能察覺到，馬歇爾太阿倒持，利用總統專注於全球戰爭和國際關係事務，暗中把美國對華政策的裁量權置於己手。馬歇爾一連串冒失的舉措，加上一些毫無意義的粗暴言辭，終於使中美關係陷入不必要的困境，而現在正是羅斯福重新主宰美國外交事務的最佳時機。一旦羅斯福把注意力放回到對華政策，他很快就能夠以一個政治家的心胸和智慧，去體會蔣介石面對的困難，增加尋求解決問題的彈性。

10月1日，史迪威終於了解到他在中國戰區的職位遇到嚴重麻煩。當他聽說孔祥熙給蔣介石的電報中，提及羅斯福已經對蔣介石的要求作出讓步時，史迪威寫道：「那個有橡皮腿的傢伙(指羅斯福)已經開始割我的脖子，並且把我丟出去了。赫爾利感到非常沮喪，但是我並不然。他們傷害不了我。我盡了一切能力去保護美國利益。去他媽的。」[114]史迪威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的良心是乾淨的。我服從了命令。除了看到美國被(他人)占了便宜讓我難過之外，我別無遺憾。」[115]

即便如此，史迪威依然對高壓策略的功效充滿信心，希望能夠爭取到馬歇爾和羅斯福的繼續支持(10月1日)。他所持的理由依然是，只要美國繼續施壓，蔣介石最後一定會退縮，因爲蔣介石根本沒有拒絕美國要求的本錢。史迪威告訴馬歇爾說：

> 我相信只要中國人認為總統不會軟化時，那麼目前的僵局定可迎刃而解。如果我們可以讓中國知道，美國正在著手準備從中國撤退的話，那麼蔣介石就必須向中國人民去解釋他到底幹了些什麼。人們的反應必然強烈，因為他們都知道中國無法失去美國的支持。但是如果蔣介石贏了這個回合的話，那他就會變得無法控制。假如我透露風聲，說美國正在準備撤退的話，那他就必須露出他的底牌[116]。

113 Schaller, pp. 172-173.

114 JWS t-w diaries, October 1, 1944.

115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68.

116 Message from JWS to Marshall, October 1, 1944. Xerox File 1116, Item 5250, MFA.

然而此時羅斯福對如何應付當前危機已經有了自己的主意。一個跡象是，羅斯福夫人突然在10月3日拜訪正在美國紐約醫病的蔣夫人，並邀請蔣夫人去白宮小住[117]。從一個角度來看，這可能只是一個單純的私人友誼行爲，也符合羅斯福夫人歷來待人寬厚和善的作風。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可能是羅斯福精心設計的細膩外交動作，希望借此得到蔣夫人的協助，改變她丈夫對史迪威的決定。這個舉動的時機讓人覺得後一種解釋比較合理。但是蔣夫人婉拒邀請，所以沒有產生任何後果。

緊跟著羅斯福夫人的邀請，羅斯福本人和孔祥熙在10月4日也有一場會談，其內容已在本章前文(伍-五)中陳述[118]。總而言之，羅斯福此時送給蔣介石的信號是，他和馬歇爾之間的看法已經出現差距，而羅斯福終於親自出掌大局。

## 二、馬歇爾挽救史迪威的最後努力

但是馬歇爾仍然無法接受蔣介石要美國召回史迪威的要求。在一份備忘錄中(10月3日)，他不但建議美國總統拒絕任命另一位美國軍官去取代史迪威，他甚至建議美國總統明告蔣介石，在這種新情況下，美國不得不改變緬北作戰計畫，並把B-29重轟炸機從中國遷移到更安全的地方[119]。看起來，馬歇爾採納了史迪威建議，準備以美國從中國撤退來威脅蔣介石[120]。

次日，馬歇爾決定改弦易轍，採取另一對策，也再次得到參謀長聯席會的支持，以參謀長聯席會名義呈交總統一份備忘錄(10月4日)，裡面寫道：

> 我們在經過慎重的考慮之後一致認為，在當前的情況下，只有一個人可以挽救中國的危機，那就是史迪威將軍，而且他也只能達到部分的效果。任何一位其他的美國軍官，都必須花好幾個月的時間去熟悉環境，建立關係和威望。而在這段時間裡，局勢將急劇惡化，並可能導致全盤的瓦解。

117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0月3日。

11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10月4日。

119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ubject: Outline of a possible message to the Generalissimo Regarding Relief of General Stilwell", October 3,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4, MFA.

120 JWS t-w diaries, October 1, 1944.

他們接著警告羅斯福說：

> 一旦史迪威被革職之後，他必須回到美國來。假如我們接受蔣介石的要求，那麼對於史迪威的威望的打擊，將使他在亞洲不再能發揮功能，不只是在中國，而且在印度亦將如此，理由是我們在當地和英國人的關係，也一直處於非常困難的狀態之中。因為英國人也一向反對史迪威的主張，向敵人採取攻勢的決心。
> 因此，我們強烈地建議總統把附上的電報送交蔣介石，作為挽救局勢的最後努力[121]。

不論羅斯福此時心中已否作出最後決定，他都無法拒絕參謀長的集體要求，必須爲挽救局勢作出最後努力。

## 三、羅斯福在10月5日提出妥協方案

在上述情況下，羅斯福於10月5日發了一封電報給蔣介石。羅斯福爲了表示沒有向蔣介石屈服，也爲自己找了一個可以接受的下臺階，所以只是稍微責備蔣介石沒有履行8月12日的諾言。接著他就表示，既然中國目前情勢已經非常險惡，所以美國不應該再承擔委派一位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的責任。羅斯福進一步建議，讓史迪威擔任中國在緬甸和雲南部隊的指揮官，但是對蔣介石表示讓步，同意免除史迪威的聯軍參謀長職務，並不准許史迪威過問有關租借法案物資的事務。羅斯福更表示，打算讓陳納德繼續擔任第14航空隊司令官，赫爾利繼續擔任處理中美軍事問題的特使，並由索爾登(Sultan)將軍在緬甸主管駝峰空運，至於留在緬甸和雲南的史迪威，則繼續負責中國軍隊的訓練。羅斯福又表示，他還會另派一位美國軍官，主持在華美軍的後勤工作，並協助中國軍隊建立後勤制度。羅斯福在電報結尾處語帶威脅說：「余望閣下對上述建議是否可以接受迅予電覆，余覺吾等設使將史迪威自緬甸戰事方面予以撤換，其結果之嚴重，將遠甚於閣下所意料者也。」[122]

---

121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Subject: Situation in China", Admiral William D. Leahy fo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ctober 4,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4, MFA.

122 FDR message to CKS, October 5,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戰時外交》(三)，頁677-678。

讀者馬上可以發現，這封電報和前此由羅斯福署名但實際上由馬歇爾或軍部幕僚起草的幾封電報，在語氣上大不相同。事實上馬歇爾此時還在爲羅斯福草擬了一封電報，內容是嚴厲指斥蔣介石的缺點，疾言厲色警告他，如果不趕快照著美國人命令行事，就需要準備承受災難性的後果[123]。這封電報是10月5日草擬的，如果還記得蔣介石早已把7月7日和9月18日的電報看成充滿侮辱，則馬歇爾草擬的這封電報稿的粗暴程度更超出不知若干倍。它只能被形容爲一個將軍訓斥一名小兵的語調，其中明白警告蔣介石，或者無條件徹底服從，或者接受一切不幸後果。幸運的是，羅斯福這次沒有採納馬歇爾的文稿，他採用的是另外一個內容比較務實而語氣比較平和的電報稿。馬歇爾的這份電報稿至今仍在軍部的檔案之中，其內容和語氣真可以使人大開眼界，也可以幫助學者對軍部主導下的中美同盟關係得到一個嶄新而令人震驚的認識。

顯然，羅斯福期望用一個局部性的讓步來換取蔣介石的妥協：史迪威不再是中國戰區的聯軍參謀長，也不再統御中國境內的軍隊。爲了進一步安撫蔣介石，羅斯福還答應不准許史迪威過問租借法案事務。不過史迪威仍然繼續擔任中國在印度、緬甸和雲南地區部隊的指揮官。從這個提議看來，羅斯福認爲他能夠從蔣介石手中得到的最大交易就是回到7月7日前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羅斯福只提出一個含糊的威脅，如果把史迪威趕出緬甸戰場，會導致嚴重後果，至於什麼嚴重後果，並沒有進一步明講，也就是說，沒有美國撤銷對中國支持這一類具體恐嚇。

羅斯福提出的交換條件顯示，假如他早就介入中美關係過程的話，中美關係或許根本不至於惡化到如此地步。但是在美國陸軍官方歷史學家筆下，羅斯福避免使用明顯的恐嚇卻變成美國政策失敗的關鍵。根據這項推理，蔣介石之所以有恃無恐，原因就是他相信不合作不會激起美國強烈報復，所以不把美國的意願當一回事[124]。可以看得出來，這些歷史學家忠實反映了史迪威（馬歇爾）對付蔣介石的心態和手法，也接受史迪威的判斷，認爲美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對蔣介石施加無情壓力，一直到他屈服爲止。但是這些歷史學家完全不了解蔣介石的心情，而這一心情正是把他從一個極端推到另一個極端的主要原因所在。或許可以說，當美國軍方歷史學者沉湎於閉門造車時，他們造出來的車也只能在自家後院馳騁而已。

---

123 Marshall, "Draft of message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Generalissimo", October 5,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4. MFA.

124 有關美國軍方歷史家的觀點，見：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459.

## 玖、最後的掙扎

蔣介石收到羅斯福10月5日電報後，再度親筆草擬對羅斯福的覆電。他數易其稿，文字大幅刪塗，字數超過數千字，可見他落筆的慎重程度[125]。就像9月19日以後的幾天一樣，他仍舊是一個人埋頭苦幹，不讓幕僚介入。但是和上次略有不同的是，幕僚從羅斯福10月5日的電報已得知事態的嚴重，同時也看出一線希望，因此大力敦促蔣介石接受羅斯福的妥協方案。

但是蔣介石10月7日私下對羅斯福來電作評價時，態度和往常大不一樣，其天差地遠頗令人吃驚。他提到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間，曾經寫過三封語帶怨懟的電報給羅斯福，事後都擔心冒犯了羅斯福，深爲自責。現在感受完全不同。他寫道：「而今反覺爲得矣。若未有此三電，則不能發現羅斯福猙獰之面目，而余猶以其真爲和平救星矣。」[126]

這些話出自蔣介石親筆，確實令人震驚而又極具啓示性，因爲自從他和羅斯福交往以來，從來不曾用過如此負面的文字形容對方。直到1943年底，他從來不吝嗇在信中表示對羅斯福的友誼和尊敬。別以爲這是外交辭令。他跟蔣夫人、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其他中國官員寫信時，也經常用同樣的字眼稱讚羅斯福。「和平救星」很真切地表達了蔣介石從前的看法。而他對邱吉爾和史達林就完全不一樣了，不是指責就是懷疑。即使偶爾收到羅斯福措辭嚴厲的信件，他也認定是出自馬歇爾或是軍部之手。但是羅斯福10月5日送來的電報，卻叫蔣介石有一個新認識，羅斯福終於說出真心話，既讓他失望，也讓他憤怒。「猙獰之面目」已經把羅斯福和邱吉爾及史達林歸爲同類了。

蔣介石幕僚聽到羅斯福新的讓步後開始行動。10月8-9日，陳布雷、王世杰、張治中以及其他人，分別勸蔣介石接受妥協，但是每一個人都被碰了一鼻子灰[127]。王世杰力陳中國不應讓此次事件變成僵局，如果中國和美國疏遠，只能加劇本身的軍事危機。陳布雷認爲羅斯福既然作出這麼重大讓步，蔣介石也應該接受其要求，允許史迪威留在緬甸[128]。幾位軍事領袖則勸蔣介石不要堅持對史迪威的態度，因爲這樣做可能

125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0月6日。又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6-7日。
126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7日。
127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8、9日。王世杰日記，1944年10月10日。
128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8日。

妨害對日抗戰[129]。何應欽對於美國可能自華撤退一事，尤其感到憂心忡忡，主張妥協尤力。

然而最強烈要求蔣介石妥協的則是孔祥熙。他10月9日來電說，經過多次和霍普金斯談話後，相信霍普金斯的談話確實是經由羅斯福授意。霍普金斯懇求孔祥熙能夠理解，史迪威問題把羅斯福陷入極端困難，希望蔣介石能幫助美國總統從中解脫。霍普金斯強調把史迪威送往緬甸的好處，是可以讓他盡心盡意工作，還暗示如果妥協成功，可能會有甜頭，例如增加運輸機和其他租借法案物資。孔祥熙在電報中還說，羅斯福方案是馬歇爾和軍部能夠提出的最大讓步，而羅斯福已無他路可走。有趣的是，孔祥熙個人的立場是，他認爲蔣介石應該依照7月約定，把全部指揮權授予史迪威[130]。孔祥熙個性隨和，柔順服從，平常從不敢批蔣介石之逆鱗，而這次竟然如此旗幟鮮明地表態，理由不外是，他寧可冒犯蔣介石，也不想讓中國陷於萬劫不復。蔣夫人此時仍在美國，孔祥熙的上述說法可能間接也反映了蔣夫人的立場，甚或是經由蔣夫人授意而寫的。

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了所有謀士的進言，因爲事到如今，蔣介石唯一能夠接受的結局，就是史迪威從中國戰區徹底消失。蔣介石於是指示宋子文，務必在10月9日夜半之前把拒絕羅斯福的電報發出。在蔣介石身邊所有親信當中，唯有宋子文贊成蔣介石的決定。他還告訴王世杰，如果蔣介石在這個節骨眼上讓步，就會淪爲美國的「傀儡」[131]。事後看來，蔣介石選擇10月10日國慶前一夜把電報發出，並非時間湊巧，而是有意向美國示威，重申中國國格，洗刷羅斯福7月7日和9月18日電報所加諸中國的羞辱[132]。

## 一、蔣介石斷然拒絕

眾所周知，蔣介石10月9日覆電，全盤拒絕羅斯福的建議。他告訴羅斯福說，他非常願意配合羅斯福的希望，不管是派一位美國軍官指揮中國全部軍隊，或是僅僅指揮緬甸和雲南的中國軍隊，他都同意。但是這一個美國軍官必須得到自己的信賴，兩人能坦誠合作，而史迪威缺乏這些基本條件[133]。

---

129 同上，1944年10月20日。

130 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10月9日。《特交檔案——中日戰爭》，第59冊，第002檔案夾。

131 王世杰日記，1944年10月9日。

132 同上，1944年10月10日。

133 Message from CKS to FDR, October 9,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中文原件在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4年10月9日。《戰時外交》(三)，頁683-684。

蔣介石另外有一份表面上寫給赫爾利，但實際上是要給羅斯福過目的備忘錄(10月9日)，他在裡面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對史迪威的不滿，以便羅斯福了解事情全貌。除對史迪威人格缺乏信心外，蔣介石還指出，他根本無法信任史迪威的軍事判斷。他特別不滿同盟國對緬甸戰爭的失信，同時責怪史迪威對中國施壓，脅迫中國把精銳部隊送往緬甸戰場，因而加重中國戰場本身的困難。蔣介石最後表達的立場是，他無法再和史迪威共事[134]。

蔣介石發出上述電報後，他幕僚群的沮喪可以想見。他們全都擔心羅斯福的反應和中美合作的前景[135]。但是蔣介石本人鬥志高昂，宣稱他已經準備接受最壞後果，在所不惜。正如蔣介石告訴孔祥熙一樣，除非史迪威能夠免職，否則中國將面臨巨大災難，中美合作將不可能繼續。因此，他寧可乾脆拒絕羅斯福，免得將來夢魘纏身。他答應美國派一名軍官擔任中國軍隊的指揮官後，萬一中美關係仍然無法改善，那將不是他的過錯，因爲他已經作了應該有的讓步。他進而指出，即使美國真要全面從中國撤退，包括第14航空隊一併撤離，其後果也未必對中國有害，反而大有可能對中國有利。他叮囑孔祥熙務必要相信他(蔣介石)的判斷，不要給美國人任何鑽空隙的活動空間[136]。總之，孔祥熙千萬要置身中美關係事外，不可讓美國人有任何可乘之機[137]。言外之意，也可能是警告蔣夫人切不可像1943年5月一樣，自作主張，捲入是非。

爲了粉碎美國人的僥倖念頭，還以爲他們仍有挽救史迪威職位的餘地，宋子文在10月10日再度致電霍普金斯稱，蔣介石已經同意羅斯福的主要請求，他不管美國軍部如何強迫羅斯福要求把史迪威留在緬甸，都不會同意，心裡也已準備好任何可能發生的後果[138]。宋子文電報提供的訊息相當明確，蔣介石對總統十分友善，但對軍部十分反感。假如羅斯福此時尚存一絲希望，以爲他可以支持軍部，要中國人吞下美國的要求，則宋子文的電報可說是把這個想法徹底粉碎了。

此時，蔣介石心中當然完全清楚切斷中美之間所有交流管道的後果，但他已經準備好接受和美國徹底「決裂」的一切後果。他寫給孔祥熙的信和寫在自己日記上的文

(續)

另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44年10月6、8、9日。

13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135 王世杰日記，1944年10月10日。

136 蔣介石致孔祥熙電，1944年10月10日。《戰時外交》(三)，頁687-688。

137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0日。

138 Soong cable to Mr. H.C. Chun in Washington, October 10, 1944, for hand-delivery to Hopkins,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Soong's identical message to Harry Hopkins, October 10, 1944, to be delivered by his brother T.A. Soong,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36.11.

字都充分顯示，他對任何美國可能提出的威嚇，都已經作到充耳不聞的地步。事實上，他9月19日以來的一舉一動，也顯示出一個道理，假如蔣介石感到被壓迫的力道超過一定限度時，史迪威所津津樂道的施壓策略就會全盤失效。10月12日，蔣介石私下進一步決定，假如羅斯福依然拒絕召回史迪威，他就準備把赫爾利來華之後，中美兩國間就史迪威指揮權問題交換的各種往來電文和文件公諸於世，由中美兩國人民來評判其中是非曲直。由於中國仍將承諾履行同盟國的各種義務和權利，即便中美關係最終仍不免破裂，其責任也不在中方[139]。讀者或許馬上可以聯想到，蔣介石想把兩國爭論訴諸美國輿論的念頭，和他1942年6月想把中美將領們送上美國軍事法庭的打算，頗有相似之處，說明他即使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仍然對「公道自在人心」的說法存在一定程度的遐想和信心。

## 二、史迪威最後的努力

最不理解蔣介石心情的人，莫過於史迪威。他像往常一樣，堅決相信蔣介石所以能夠拖延，是因爲美國施壓不夠。因此他認爲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必須做出更大的動作。10月9日，蔣介石從陳納德處得知，史迪威剛剛下令第14航空隊將其戰鬥人員的工作量削減百分之五十，而且拒絕繼續撥發新飛機和器材給中國[140]。如此巨幅縮減，勢將斷絕對中國地面作戰部隊的空中支援，使它們無法抗拒日軍攻擊[141]。顯然，史迪威感到必須要運用手中最後的資源，加大壓力迫使蔣介石就範，即使這樣做將會傷害中國的對日抗戰和廣大民眾的安全，也正是他想要製造的痛苦。當這個計謀得不到預期的中方屈服時，史迪威又另闢蹊徑，宣稱擬約見何應欽面商中美關係。但是蔣介石立即指示何應欽，不准接見史迪威(10月10日)[142]。

得不到中方絲毫回應，史迪威只好再向馬歇爾求援。他給馬歇爾兩個黑白分明的選擇(10月10日)：要嘛強迫蔣介石接受史迪威作中國軍隊指揮官，對抗日作出更大的貢獻；要嘛縱容蔣介石一意孤行，使中國戰區完全失去價值。兩者只能選一。史迪威這樣結束給馬歇爾長電：

---

139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2日。

140 同上，1944年10月9日。

141 Notes by Soong, undated but probably around October 9, 1944, judging by its contents. in Soong Personal Papers, Schedule A, Box 26, pp. 38-39.

142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0日。

> 簡約地說，目前的情況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胡同。問題核心並不是委員長反對我，而是他不想再做任何作戰的努力。他當前的立場看起來是基於對我個人的不滿，但是如果他成功的話，他還是能夠找到其他的理由不跟我的繼任人合作。他只不過是把我的革職，當成是他的一個拖延的藉口。而孔祥熙給他的一個關於和霍普金斯先生談話的錯誤消息，顯然讓他大受鼓舞。
>
> 我的感覺是，假如我們能夠找到一種方式告訴委員長，他雖然誤聽了孔祥熙的報告，而對中央委員會做出過欠缺思考的演說，但是他依然可以全身而退的話，事情或許仍有轉機。我已經提過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可行方式。但是假如我認為我的革職真正能夠達到這個目的的話，我肯定是頭一個去建議的人[143]。

## 三、赫爾利介入危機的過程和深度

任何關於指揮權危機的討論都必須考慮赫爾利所扮演的角色。歷來史學界對赫爾利在9月19日之後幾周中的活動都有大量揣測。不少人認爲由於赫爾利「背叛」史迪威，羅斯福才會放棄其支持史迪威的決心。更糟糕的是，他們指責赫爾利與蔣介石合謀，在史迪威背上捅了一刀[144]。史迪威自己似乎也相信，他是被赫爾利攆出中國的(Hurleyed out of China)[145]。在本章前文對中國領袖動機和決策過程提供了新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重新檢查這些觀點的正確性。

關於赫爾利和蔣介石合謀的指控，是出自對於事情發展先後次序的誤解，幾個先入爲主的錯誤假設也起了作用。這都顯示學者們只研讀美國單方面史料的風險性。

根據本章前文，儘管赫爾利提過會面請求，但是蔣介石穩身黃山官邸，根本拒絕和赫爾利接觸。當9月24日赫爾利終於見到蔣介石時，蔣介石不但已經作出決定，而且有足夠時間把自己的說詞演練了許多遍[146]。因此蔣介石向赫爾利宣布「最後的決

---

143 Messag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October 10, 1944, in Xerox File 1118, Item 5720, MFA. Also in Xerox File 2029, Folder 8, MFA.

144 依照Schaller的說法，在此後的數周中，赫爾利顯然已經在暗中決定和蔣介石共同設計趕走史迪威。見：Schaller, p. 170. 依照塔克曼的暗示，赫爾利在蔣介石與史迪威的鬥爭中採取了支持蔣介石的立場，其動機是他自己想成為美國駐華大使，因此需要向蔣介石示好。見：Tuchman, p. 634. 但是兩人都只是猜測，而沒有提出直接證據。

145 Tuchman, p. 644.

146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0-24日。

定」，一方面把不能與史迪威共事的理由說得淋漓盡致，另一方面則再三強調對中美關係的珍惜。

9月25日，宋子文緊接著告訴赫爾利說，蔣介石在三方面絕對不會讓步，就是：中國政治信仰（三民主義）、國家主權和蔣介石個人尊嚴。爲了維護這個原則，中國將不惜任何犧牲：若非如此，中國即使留在同盟國內並贏得戰爭，也不如沒有同盟國而輸掉戰爭[147]。

明顯地，赫爾利當時得到的結論是，蔣介石堅定不移，絕非自己能力所能扭轉。因此，當中國人表示打算把一切不滿的理由，都要透過白紙黑字寫出來時，赫爾利能夠提出的建議只是，中國人可以把怨氣出在史迪威一人身上，但千萬不要辱罵美國總統。蔣介石當即接受建議，將這一個立場納入備忘錄，成稿之後交給赫爾利（9月25日）。蔣介石固然也承認赫爾利對其信稿文字修飾的貢獻，但是他認爲赫爾利所作所爲，無非是一個外交官在知道無法改變蔣介石心意以後，爲自己國家盡應盡的責任[148]。所以蔣介石在私人日記中，並無一字嘉許赫爾利協助中國之意，只認爲他所作所爲是一個美國特使別無選擇的做法而已。

有人認爲，如果赫爾利當時傾全力去支持史迪威的話，蔣介石就會知難而退。這種想法充分反映了美國軍方的一貫想法，既高估自己的威嚇力量，也低估對手個人尊嚴和民族情緒的敏感度，也不知對方受創痛的深度。在蔣介石過去的政治生涯裡，每當他被壓迫到超過某種限度時，他都會斷然接受和強大外國決裂的慘痛代價。北伐時期和蘇聯的決裂，蘆溝橋事變和日本的作戰，及1938年爲了德國軍事顧問之事不惜冒和德國斷交的風險，都是具體的例子。1944年9月，蔣介石再一次被推到決裂邊沿。他把決定先通知中國領袖，然後才通知赫爾利，就是早已打定主意斷絕了自己的退路。

美國軍方人士，特別是史迪威，從未認真探討過蔣介石對中國國家利益的看法，而只是認爲他們和蔣介石的關係，不過是一場心智的博弈而已，說穿了，看誰在角力過程中先喪失鬥志，而完全忽略對方的心理反應。對這些軍方人士而言，蔣介石信誓旦旦所說的國家民族觀念都不過是煙幕彈，試圖借之掩藏自己的卑劣行徑而已。他們反倒是把自己看成比蔣介石集團更關心中國利益，而蔣介石只不過是自吹自擂的民族主義冒牌貨色，僅關心個人和他統治集團的私利。這些假設使一些美國軍人，從一開始就把中美關係當作一場遊戲，而又不知道這個遊戲的最大限度在那哪裡，不知道蔣介石真把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個人尊嚴，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底線，一旦受到踐踏，可

147 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25日。

148 同上，1944年9月26日。

以付出生命而在所不惜。從史迪威的角度去看，他和蔣介石之間的鬥爭只是單純的意志力之爭，勝利秘訣在「壓迫、壓迫、再壓迫」，蔣介石最終必將就範。但是，對蔣介石而言，這個鬥爭關係到他的政治生命和國家存亡。美國軍方對蔣介石的心理和想法，可說從未認真去了解過，直等到羅斯福出面干預才踩煞車，而羅斯福也才有機會重新檢視馬歇爾和史迪威所推動政策的內容。中美雙方在這場鬥爭中的賭注有如此大的差別，無怪乎羅斯福最後只有讓步。不幸的是，即使羅斯福讓了一步，仍不能使蔣介石回心轉意[149]。

如果了解蔣介石的心理狀態，那麼蔣介石能夠讓赫爾利不得不接受他的決定的這一舉動，就一點也不奇怪。因爲要不然的話，結果就會像赫爾利警告羅斯福那樣，同盟國關係將從此終結。

從赫爾利的觀點看，這個危險在10月6日已經發生了，那是羅斯福提出妥協方案後的第二天(**提議將史迪威派赴緬甸，10月5日**)。就時間順序說，羅斯福先作了讓步，讓步的本身並沒有受到赫爾利太大的影響，而赫爾利接下來希望能和蔣介石在羅斯福讓步的新基礎上達成一個協議。但是到了這個時刻，蔣介石已在考慮三天後雙十國慶節時，如何向中國人民發表演說。他此時心中的底案是向全國人民保證，中國即使沒有盟邦也要繼續抗戰到底，情形固然可能變得很糟，但不會比留在同盟國內忍受無理要求更壞。因爲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立國原則是保衛國家的「獨立自主」，反抗外國的一切壓迫和控制[150]。

因此蔣介石10月7日接見赫爾利時，一開始就關閉了妥協之門，明白宣布，緬甸戰爭是中國戰區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不可以違背中國戰區最高軍事領袖的指揮。史迪威不再是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中國也不允許他繼續指揮在緬甸和雲南的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決定聽來斬釘截鐵，赫爾利唯一能夠作的補救就是提出文字上的修正建議。他遂就蔣介石如何起草對羅斯福的覆電提出建言，避免傷害羅斯福的尊嚴。在此同時，他向蔣介石提議，先用中文起草覆電，再翻譯成英文，寄出之前請先和自己進一步商量[151]。中方會議記錄顯示，這次會議的過程相當奇特。因爲美國總統的特使竟然

149 塔克曼女士對於1944年9月份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錯綜複雜的爭執的最基本原因，作了一個既簡單又明確的解釋：「說到底，他們的分歧就是選擇支持陳納德的方案或是史迪威的方案。前者主張用美國空軍替中國作戰，而後者主張幫助中國人為自己作戰。」不幸的是，塔克曼女士只知大膽下結論，而不知小心求證，更看不懂中文資料。這種先設立場，後選證據，甚至不選證據的做法，實非歷史學之福。見：Tuchman, p. 633.

150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6日。

151 蔣介石與赫爾利會談記錄，1944年10月7日，《戰時外交》(三)，頁678-682。

要和蔣介石密切磋商，共同想出一個策略和起草一份最有效率的覆電給羅斯福，目的則是集中目標打擊史迪威，並讓羅斯福躲開砲火的傷害。事實上，在交換意見過程中經常出現的景況是，赫爾利好像是替蔣介石作參謀，兩個人共同努力說服羅斯福接受蔣介石決定的政治現實[152]。不過，必須記得的重要事實是，赫爾利爲蔣介石殫精竭慮的最高目的是棄俥(史迪威)保帥(羅斯福)，依然是盡心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一旦赫爾利發覺無法說服蔣介石放棄旺盛攻擊心情時，他最能夠做的事就是減輕蔣介石攻擊行爲的力度，讓它造成的損傷只像輕輕碰擦一下而已。順便一提的是，正由於羅斯福已經作出讓步，因此蔣介石國慶日演說的語氣也改得緩和多了[153]。

在蔣介石的備忘錄後面，赫爾利附上他個人的評語，供羅斯福參考。他寫道：

> 我幾乎不斷地在和委員長開會。上週末，我還和他在城外度過。我們之間關於史迪威的討論一直延續至今。在我離開華盛頓之前，您指示我，此行的大目標，是阻止中國的崩潰，和維持中國軍隊的抗戰。作為您要想達到這些目標的總計畫，其中的一部分是維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在檢討此地的情況之後，我認為，中國沒有另外一位領袖，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地和您合作。也沒有另外一位中國領袖，具有如蔣介石一般的領導能力。蔣介石和史迪威在基本上互不相容。您今天面臨的是，在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您必須作出選擇。您和蔣介石之間其實沒有其他的歧見。蔣介石已經答應了每一個您的要求和建議，唯一的例外是史迪威的任命問題[154]。

在得知史迪威自己已送出一封電報給馬歇爾(10月10日，如前文所述)後，赫爾利隨著又發出第二封電報給羅斯福(10月10日)，反駁史迪威的說法：

> 我的看法是，假如您決定在這次爭論中支持史迪威的話，您將會失去蔣介石，甚至失去中國……假如我們讓中國崩潰的話，假如我們無法

152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7-10日。

153 蔣介石在10月8日下午修改演講稿內容。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8日。

154 Hurley's memo to FDR, October 9,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 使中國軍隊繼續抗日的話，儘管上天所有的天使都認為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它也不能改變歷史的定案。美國將在中國遭遇失敗……因此，我恭請您解除史迪威的職務，另派一位美國將軍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指揮所有在中國的陸空軍部隊[155]。

這是赫爾利能夠用的最明確的方式，說出自己的判斷，目的並不是支持蔣介石，而是反對史迪威，以及保護他心目中的美國利益。從道理上來說，赫爾利是羅斯福的特使，他效忠的對象是美國總統，史迪威是他的工作內容和對象，因此他和史迪威之間的關係並不存在「拋棄」或是「背叛」的問題。他對史迪威問題只有建議權，而無裁決權。最後決定「拋棄」史迪威的是羅斯福，而他之所以這麼做，原因是史迪威辜負了總統對他的信託，未能達成政府賦予他的使命。而這又正是美國軍方難以說出口的話。在這種尷尬情況下，赫爾利變成了史迪威支持者最方便的出氣筒。

## 四、羅斯福對史迪威的支持逐漸消失

把話題拉回到華盛頓，支持史迪威陣營的最早裂痕出現於參謀長聯席會內部（1944年10月12日）。李海上將讀了蔣介石致赫爾利的最新備忘錄後，告訴麥拉里（McNarney）將軍說，總統除了召回史迪威之外別無他路可走。然而馬歇爾此時不在華盛頓，因此李海認爲總統應該等到馬歇爾回到華盛頓後再採取行動[156]。兩天後（10月14日）李海又告訴麥拉里將軍說，總統正在物色一位美國軍官去統御所有的中國軍隊，他要請蔣介石提出三個比史迪威更優秀的人選。李海轉達了總統命令，要麥拉里著手物色[157]。顯然，羅斯福的立場已經軟化，李海得知總統的意向似乎是，願意任命另外一位美國軍官指揮「全部的」中國軍隊，所以朝這個方向開始準備對策。這也表明，羅斯福讀了赫爾利信件後，傾向於接受蔣介石的意見，但是仍然覺得應該等馬歇爾回華盛頓之後再採取行動[158]。假如這個看法正確，那麼阻止羅斯福和蔣介石合作願望的

---

155 Schaller, pp. 173-174.

156 Memorandum for Colonel Pasco, October 12, 1944, from J.E.H. in the Operations Division.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157 Memorandum for the Chief of Staff, "Subject: Relief of General Stilwell." October 14,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158 1944年10月14日，軍部麥拉里將軍向馬歇爾報告稱，總統正在考慮任命一位美國軍官指揮中國全部軍隊。羅斯福將要求蔣介石提供三位他認為比史迪威更優秀的軍官的名單，同時也要求馬歇爾準備好一位他自己認為適任的人選。總之，總統的意思是指望

決定性因素是馬歇爾。

在羅斯福等待期間，赫爾利仍然在緊張工作。10月13日，蔣介石從宋子文處得知，赫爾利已經改變態度，支持他召回史迪威的要求。部分原因是赫爾利發現史迪威撒謊，而赫爾利也已明告羅斯福，假如不把史迪威召回，則赫爾利本人就要辭職回國。但是假如羅斯福願意召回史迪威，則赫爾利的建議是羅斯福可以現在就接受蔣介石的要求，但是暫不公布，推到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過後才付諸執行。赫爾利的新方案得到高斯大使支持。高斯本人曾和宋子文單獨談話，建議中方讓史迪威留任一段時間，以免羅斯福在總統大選期間，因爲這件事的公諸於世而遭受政敵攻擊。高斯此時又畫蛇添足，忍不住好奇地向宋子文打聽，蔣介石究竟打算如何處理共產黨問題。豈知這一問恰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馬上叫蔣介石怒火高漲，認爲美國人就是丟不開要干涉中國內政的惡習[159]。

赫爾利所提的新方案可能來自白宮授意，而由赫爾利和高斯兩人聯手執行。既給蔣介石帶來好消息，也讓他面臨新的難題。所謂好消息是指赫爾利終於毫無保留地支持蔣介石立場。所謂新的難題是指赫爾利提的複雜安排和時間拖延，它固然可以在總統大選前保持羅斯福的顏面和減少他的政治風險，但是也可能爲中國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因爲個性善變的史迪威無論留在重慶或是印度，一定會負嵎頑鬥，不知會爲中國帶來什麼問題。根據過去的慘痛經驗，蔣介石拒絕赫爾利這個維護羅斯福個人政治利益的妥協方案[160]。或許他此時不免又想起1942年7月和居里達成的協議（見第6章），到最後卻被軍部和總統賴帳。

蔣介石堅持立場的結果是，赫爾利10月13日終於又發一封電報給羅斯福，建議馬上召回史迪威。他雖然把電報交給史迪威過目，卻將之交由美國海軍在重慶的電臺發出。這個舉動的重要性在於，從此以後，赫爾利和總統之間的電文往來不再經過史迪威總部，史迪威不再有干預和改變赫爾利意見的機會[161]。這一個改變可以解釋爲，羅斯福從此不再依靠馬歇爾將軍的陸軍，而是依靠李海將軍的海軍來維持和赫爾利之間

（續）

馬歇爾同意此項安排。蔣介石最初提出的人選是Eisenhower, Handy, 及 Patch，但是稍後又改為Patch, Wedemeyer, 及Krueger。蔣介石之所以把Wedemeyer排在Krueger前面，是因為前者比較年輕。見："Army - Plans and Operations: China Aid Program Files, 1945-1949", Nos. 25-28. in Xerox File 3565, Item 90. MFA.

159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3日。

160 蔣介石對風險之估計，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4日。

161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undated.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72.

的通訊往來了。這樣就把史迪威和馬歇爾同時排除在外了。

羅斯福覆電在10月15日抵達重慶，歡迎蔣介石提名三位美國軍官，再由美國圈選其中一位供蔣介石任命，以取代史迪威。只有到了此時，蔣介石才終於肯定史迪威必定會被召回。在此期間，蔣介石又從赫爾利處得知，這次危機的一個轉捩點是納爾遜和羅斯福在白宮的會談，這次會談乃是應赫爾利的建議而舉行，並對羅斯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62]。對史迪威而言，他已經完全被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直到10月17日才察覺他所製造的危機或許即將結束[163]。

即便如此，史迪威還保持樂觀心情，認爲事情還需要一段漫長歲月才能獲得解決。10月5日到17日之間，史迪威只收到過馬歇爾一封電報，內容略微提示羅斯福給蔣介石覆電的要點。史迪威看後相當不滿，因爲這完全不是馬歇爾過去把美國總統和蔣介石之間來往電文全文抄送的習慣作風。但是讓他更失望的是，馬歇爾沒有一字提到美國當前政策的走向。依照史迪威的推想，總統在沒有聽取馬歇爾意見以前，決不致採取任何行動，而馬歇爾又身在法國前線多日，使總統無法就近諮詢。更何況，總統大選即將來臨。因此依照史迪威的想像，整個問題必將拖到大選之後才會處理[164]。然而，危機的結束卻來得遠比他想像的要快得多。

## 五、羅斯福最後的決定

1944年10月18日，離危機爆發剛好一個月，羅斯福終於決定徹底召回史迪威。正如我們現在已經熟知的，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件聲明，美國政府在當前情況下，不擬負擔中國軍隊作戰指揮的責任。在蔣介石提名的三位美國將領中，兩位另有任務，無法調往中國戰區。他因此可以任命魏德邁將軍爲中國戰區美軍司令，並由蔣介石同時任命爲他的聯軍參謀長。羅斯福指出，原先的「中國－緬甸－印度戰區」將分割成爲兩國戰區：中國戰區當然由蔣介石主持，但是緬甸－印度戰區則由索爾登(Sultan)將軍擔任司令官。第14航空隊則留在中國戰區內[165]。

---

162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0月15日。又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15日。蔣介石提名的三個人選是：Patch, Wedemeyer, and Kruger.

163 史迪威此時方才得知羅斯福總統已經要求蔣介石提出三位美軍將領名單，而蔣介石的回覆是：Eisenhower, Handy, 及Patch.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77.

164 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undated. Also: JWS t-w diaries, October 17, 1944.

165 Message from FDR to CKS, October 18,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亦見《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0月19日。Stilwell's hand-written notes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28, Career File A-23, 1944, undated.

顯而易見，羅斯福的信件和他稍前所持立場有一個重大的差別。他早先的立場是中美之間的一切協定照舊，只是史迪威的職位被他人取代而已。遲至10月14日，這還是李海海軍上將的理解(見本章玖-四)。而現在，他肯定表示美國不願再承擔中國軍隊指揮權的責任。這個改變主要來自馬歇爾的堅持反對。美國政府這個立場的改變不免引起人們一些感想。首先，馬歇爾的反對，其意氣成分恐怕遠遠大於政策成分。總統贊成的主張他反對，美國政府耗費了三個半月經由外交交涉而好不容易達成的成果，被他在短短兩天之內予以拋棄。仔細想來這也並不奇怪，因爲馬歇爾從提出指揮權要求開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爲史迪威找出路(量身定做)，本來就是人事考量凌駕於政策考量之上。現在史迪威在中國戰區的出路既然完全被切斷，那麼馬歇爾就再也沒有必要去堅持指揮權了。更何況美國此時撤銷該項要求也是一種發洩憤怒的方式，雖然違背羅斯福的意願，但肯定讓馬歇爾感到出了一口氣。這麼看來，美國政府花了偌大力氣去爭取指揮權，甚至不惜以中美同盟關係作爲賭注，骨子裡並非反映它的政策導向，而是出於對人事安排的權宜之計。人事變了，政策立即轉向。其次，馬歇爾的新立場其實在本質上是對蔣介石最大的讓步，必定被後者歡迎不已。因爲一切又回歸7月1日以前的狀態，只是在這幾個月裡，中國的軍政局勢被美國播弄得人仰馬翻，而中國軍隊和人民在一號作戰中，由於遭到史迪威的蓄意懲罰而承受重大傷亡和破壞。當然這些都不是美國人願意去操心的事。

馬歇爾10月18日也趕忙給史迪威發了一封電報，警告他事件即將結束，沒有任何挽回餘地。更有進者，馬歇爾警告史迪威在總統作出最後決定之前，不准發表任何言論[166]。正如史迪威10月19日日記所寫，「(斷頭臺上的)斧頭終於落下來了。」他後來又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政客們現在完全掌控了局面，所以這種猴把戲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此地有些人原來還以爲羅斯福會對蔣介石保持強硬態度，而我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會出賣。所以我現在終於可以和這群流氓地痞道別了。」[167]一直到斷頭台的利刃砍到脖子時，史迪威還是跟從前一樣，把失敗的責任歸於所有其他人，就是對自己並沒有任何反省。他形容自己在中國戰區的經驗是，「在三年的時間裡，所得到的是被忽視、被侮辱、被出賣和被破壞。」[168]

讀者馬上可以察覺，史迪威這個總結和本書前此所引用的蔣介石的感受所產生的

166 Message from Marshall to Stilwell, October 18,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60, Folder 57. MFA.

167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p. 273.

168 *Ibid.*, p. 269.

對比，其差異程度之大，委實令人咋舌。但是這個對比至少可以幫助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把心態如此懸殊的兩個人擺在一起去共同營造同盟關係，肯定只能導致災難性結果。在這個意義上，人事問題處理的不當，實在是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最大的敗筆。

事情進展自此加快速度。蔣介石通知羅斯福（10月20日）他接受羅斯福10月18日提出的安排。同時也作出自己的讓步，承諾在緬甸戰場給予最充分的合作，願意任命索爾登（Sultan）將軍統率在印度和緬甸地區的所有中國軍隊，並充分補充這些部隊的缺額。他進一步同意，索爾登將軍指揮中國軍隊進行戰鬥時，只要不涉及緬甸戰場的重大戰略決策，都不必事先和最高統帥蔣介石商量[169]。換言之，蔣介石多時來對史迪威戰場指揮能力的憂心忡忡，現在對於索爾登將軍卻採取高度信任態度。

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召回，事後只留下一個簡短記載：

> 史迪威已得美政府之撤回，此為本年內對外各種困難之癥結；且對此事之隱痛，亦可謂極人生所未有也……中美國交不因史迪威而敗者，殊為莫大之幸運，中美已誤之國交，抗戰已頹之形勢，皆得由此啟其機鑰。此後軍事、外交與內政各要務，乃可按計畫實施歟[170]！

對自己過去幾個月裡所經歷的痛苦，蔣介石這樣形容：「自本年七七接羅斯福電至今，爲期恰百日，而此百日之受橫逆與壓迫，其悲慘情形，實非第二人所能想像。」[171]

1944年10月20日，史迪威在赫爾利陪同之下，花了25分鐘，僵硬矜持地向蔣介石道別。蔣介石一面稱讚史迪威在中國服務的成績，另一面也指出兩人個性不合無法共事。9月19日危機爆發後不久，蔣介石曾告訴赫爾利說，他在史迪威被召回之前拒絕和他見面。這一點他算是做到了，這次道別是兩人一個月以來的第一次見面，也是兩人此生中的最後一次[172]。第二天下午2時30分史迪威離開重慶，經昆明飛往密支那，此後他再也沒有回到中國這塊土地上。他在中國戰區總共服務了32個月，而正是在這

169 CKS message to FDR, October 20,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1, Folder 25. MFA.

170 《戰時外交》（一），頁19-20。

171 蔣介石日記，1944年10月20日。

172 同上。

個期間，中美關係一再被推擠到瀕臨破裂的邊沿。

## 拾、史迪威在美國所受的冷落

史迪威結束中國服務的那天，景況悽慘，令人扼腕。他11月1日抵達華盛頓市郊機場，等待他的是一個冷淡而淒涼的迎接儀式。在飛機場內，他見到久別的妻子。還沒講幾句話，馬歇爾派來一位上校便立即趨前傳達馬歇爾的指示：不許和新聞界接觸。馬歇爾爲了保證史迪威不再越軌，還另外派了兩位將軍「監護」他[173]。雖然馬歇爾本人當晚驅車探視了史迪威，但是並沒有一句話提到史迪威盼望的新職，只是叫他先回家休養一段日子，耐心等待[174]。史迪威對自己在華盛頓所受待遇的形容聽來更令人心酸：「馬歇爾昨晚來看我……他根本沒有工作讓我去做。我告訴他可以把我降級去做一個師長。他只是笑一笑，並且告訴我先休一個月的假再說。他還告訴我可以馬上就走。顯然，軍部巴不得能夠把我趕走，而且在大選之前不許說話。」難怪史迪威感覺是被軟禁了：住處有憲兵站崗，上級又嚴令封口[175]。

11月29日（美國總統大選已經結束），史迪威終於忍不住向馬歇爾陪著小心，試探問道：「我親愛的長官：您的問題兒童在12月4日就將休完四個星期的假期了。我會想來東部探望我的兄弟姐妹們，然後聽從您的命令，或是向您報告復職，或是返回原住地。敬請指示。」史迪威還請馬歇爾放心，自從回國後，每次和新聞界接觸，都緊閉著嘴巴。即便姿態如此之低，馬歇爾還是要等到12月20日才覆信給他說，不久將會爲他安排一個出路[176]。

這些書信來往和過去的形式大不相同。在此之前，馬歇爾幾乎每天都和史迪威保持聯絡，有時甚至一天有兩三封電報來往，而現在三個星期才寫一封信。在此之前，馬歇爾的信件，對史迪威的「非凡的成就」總是稱讚不已，現在面對史迪威的求職熱望，只是冷冷答應爲他設法「安排」而已。史迪威1944年11月在美國加州挨過的這段強制假期，比起1944年8月在錫蘭度過的自動假期，兩者簡直有天淵之別。在錫蘭，他意氣飛揚地縱情享受戰勝者的滋味，睜眼看著周圍英國人不知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

173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3, 1944.

174 馬歇爾對此事的記載，見：Pogue,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 p. 479.

175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4, 1944.

176 See: Stilwell Personal Paper, Box 33, "Personal and Family File, B-14, 1944." Also: Stilwell letter to Marshall, November 29, 1944.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8, File 11.

藥，已經使他樂不可支。再看到蔣介石這個「敵人」在中國受苦受難，內心更是感到無比暢快。在加州，他卻是被扔在一邊，完全無人理會，在自怨自艾中度日如年。史迪威雖然在1945年1月23日終於得到新任命，成爲在美國駐紮在本土的陸軍地面部隊司令官(Commander of the Army Ground Fo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177]，然而他與馬歇爾的關係已變得相當疏遠。多年後，有人提到史迪威經常以不當言辭侮辱蔣介石一事，詢問馬歇爾對此如何看待，馬歇爾的回答是，「當然史迪威的大錯是他缺乏語言技巧……但是我當時不知道他寫給妻子的信中會寫得更糟糕。在我爲他做了那麼多事之後，他的妻子最後還反過來攻擊我。」[178]短短幾句話道盡了馬歇爾和史迪威公誼私情的破產。

史迪威在中國的經驗最後還有一個歷史小註腳。1945年8月初，就在日本投降前幾天，蔣介石突然得知，馬歇爾打算派史迪威率領美國第10軍由琉球到中國沿海登陸。這消息使得蔣介石大感不安，於是立即請求赫爾利轉告杜魯門總統，中國政府絕不歡迎史迪威率軍來華[179]。當然不久日本投降，這一事件沒有後續發展。就這樣，史迪威和中國的緣分終於徹底斷絕了。

177 Tuchman, p. 651.

178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on October 29, 1956,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605.

179 蔣介石日記，1945年8月2日。

# 第十二章
# 魏德邁的新途徑——並非太少，確實太遲

史學界許多討論中美戰時同盟關係的著作常表現出一種趨勢，那就是，把史迪威在華服務期間，看成是美國努力遵循一個合理的對華政策的時期，而且史迪威也被描繪成竭盡所能地在執行這個政策。史迪威的革職象徵這個政策的破產，同時證明美國在中國作出的政治和軍事巨大投資終歸浪費。對於不少的人來說，史迪威灰頭土臉地離開中國，它本身就證明了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不值得作爲美國盟邦，而史迪威離職後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時所發生的事情均乏善可陳，更缺乏歷史價值。對於史迪威的忠誠追隨者而言，任何人對中國的看法如果偏離了史迪威的所作所爲，都無法得到他們認同，如果那個人是史迪威的繼任人的話，當然更逃不過苛刻批評了[1]。

本書對於這種觀點無法苟同。純從邏輯上說，至少有兩種方式可以處理史迪威離開中國戰區後(1944年11月-1945年8月)的中美同盟關係。第一種方式是把它當成美國政策失敗後的尾聲，一筆帶過即可，無需多加討論。第二種方式是把它當成一個全然不同政策的開始，一個關係轉變的契機，因此值得特別予以關注。

關於第一個方式，本書前此各章已經對它的正確性從多方面提出質疑。在此只擬綜合地提出兩點意見。首先，在美國政治體制下，總統才是政策的最後制訂和裁決人，而軍部部長、馬歇爾、史迪威都只是在聯邦政府中不同階層的執行者。正如本書舉出過大量事例說明，由於羅斯福總統日理萬機，因此造成一種畸形現象，在對華事務上經常由軍部越俎代庖，甚至長期僭越主導。這種現象也因爲羅斯福的依賴、放任和縱容而變成常態。以致有些人在討論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時，形成一種奇特心理，不是去檢查軍人應該如何忠實地執行總統的意志，反而是檢查總統應該如何去聽從和無條件地支持軍人的主張。這種本末倒置的思路在學術著作中時有顯露，誠屬有趣。其

1 有關塔克曼女士對魏德邁的形容，請參閱Tuchman, pp. 548-549.

次，關於史迪威在華時期美國對華政策應該如何評價，也是問題重重。本書第二章在處理莊穆將軍提名過程時已經略有討論。但是還有幾個更基本的問題必須提出。史迪威所代表的所謂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這個政策的理論是否經得起檢驗？這個政策在史迪威的主持下是否得到有效的執行？如果執行失敗，其責任是史迪威本人？是蔣介石和中國政府？抑是羅斯福總統？諸如此類的問題，雖然部分答案已經散見在本書各章中，但在本書結論一章中還將會更深入地加以綜合討論。在此可以說的是，在史迪威主持期間，美國對華關係的政策性其實未必明顯，但失敗的命運恐怕卻難以避免。

因此，本章的目的在探討是否可以用第二種方式，來分析在史迪威離開中國戰區後的十個月裡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鑒於本書以前各章陳述和分析的重點，本章也必須提出一連串相關問題：1. 魏德邁的背景和他與史迪威的私人關係對於了解中美關係有無影響？魏德邁對於史迪威留下的人員和措施採取何種態度？是蕭規曹隨？小幅修改？或是改弦易轍，徹底更新？2. 鑒於史迪威時代和蔣介石與馬歇爾的關係成爲中美關係中的主要因素，因此我們也需要了解魏德邁與此二人的關係有無質變？3. 魏德邁在職不到十個月戰爭即告結束，他在此時期內有無任何建樹？魏德邁在中國的經驗是否可以幫助我們探索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倘若史迪威當年根本沒有被派赴中國，歷史又可能如何發展？換言之，美國對華政策是否曾經出現過其他的可能？

因此，本章目的並非爲了要填補史迪威離華後幾個月時間的空白，而是要提供一個新視角以檢討整個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並展示處理此合作關係，除了史迪威所提供的模式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性，同時也要提供一個新平臺，以重新評估某些著作對戰時中美關係所持論點的正確性。

## 壹、魏德邁為人處事與史迪威不同之處

本書以前各章充滿了對史迪威個性和行事作風的敘述，也反覆說明了它們如何影響了中美關係。作爲繼任人，魏德邁具有何種個性和專業背景？他的行事作風如何？他怎樣組織幕僚和展開工作？這些都是我們首先需要尋求的答案。

### 一、魏德邁的背景

西點軍校畢業後，魏德邁進入陸軍指揮參謀大學(United State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 [CGSC] at Fort Leavenworth, Kansas)，並以榮譽生資格畢業(1936

班）。1936-1938年間，他到德國國防大學進修。之後進入美國軍部計畫部門，主張以打敗德國爲美國戰略的首要目標，其對德國軍事的了解深受上司馬歇爾賞識。

他和史迪威的背景有兩個明顯不同之處。第一，他是馬歇爾的晚生後輩，沒有私人情誼，卻有知遇之恩。不像史迪威是馬歇爾的同儕和好友，兩家來往密切；魏德邁一直是馬歇爾的部下，對後者畢恭畢敬。第二，他雖然也在中國天津服務過兩年時光（1930-1932），但是他從不自詡爲中國問題專家，反而對那些自以爲懂得中國的美國人感到不安之至。他曾經寫信告訴馬歇爾說：「每一個到過中國的美國人，不論是文職或是軍職人員，都試著要分析時局。在回到美國之後，更以權威姿態侃侃而談。」即使1945年8月魏德邁已在中國身居要職，而又累積了九個月實地經驗，但仍不敢以中國問題專家自居。他只是相信，以他的特殊機緣，他可以把取得的一些特定訊息和結論，提供給總統和馬歇爾作爲制訂政策的參考[2]。他說這些話時，並不是故作謙虛，而是實實在在表達內心的感覺。魏德邁和史迪威之間最大的區別是：魏德邁是帶著一個開放的頭腦去中國，邊工作邊觀察學習；而史迪威抵達中國時已經充滿自信，認爲他對中國的所有問題都已經在腦中有了答案，而且這些答案比中國人自己的答案更精闢正確，因此中國人只需照著他的指導行事即可。一旦中國人不能或是不願按照他的旨意辦事，史迪威馬上就怒火三丈高聲斥責，或是抱怨他沒有受到重視，或是懷疑他人蓄謀破壞。

## 二、魏德邁在東南亞戰區的工作經歷

與史迪威正好相反，魏德邁對德國和蘇聯都有濃厚興趣，所以最初的事業願望是能夠在歐洲戰場上一展身手。但是事與願違，1943年8月東南亞戰區成立時，他被任命爲蒙巴頓手下的美籍副參謀長。即使接受任命之後，他也沒有對中國事務產生特別興趣。他對中國事務的認識基本來自軍方的正常管道，或是和英美軍人私下接觸。總結的說，他就任中國戰區職位之前，對中國事務的了解並不比當時美國一般將領更深刻。即便到了1943年底，他似乎依舊相信，蔣介石唯一的興趣只是爭取在戰後鞏固自己和他「嘍囉們」的地位，而中國政府肯定不會積極參加同盟國對日軍作戰。他的解釋是，中國人的計謀是等待同盟國替他們打敗日本[3]。在這一點上，史迪威對魏德邁的影響甚爲明顯。說白了，史迪威是美國陸軍中的首席中國問題專家，也是被軍部依

2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October 21, 1943. Verifax File 2671, Item 2578, MFA.

賴爲處理中國事務的不二權威。而魏德邁對中國的了解大概與莊穆將軍和許多其他陸軍將領不相上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陸軍中的中國問題權威誠非史迪威莫屬，但是他卻把份內工作弄得一團糟。而美國陸軍卻有許多位與魏德邁背景相同的將領，他們既不了解中國，也不關心中國，但是具有優秀軍人品質，成熟穩重的感情，和理性客觀的判斷力。這種人是否可以在中國戰區作出一番成績，這將是本章探索的重點。

## (一)魏德邁對史迪威的觀感

其實，一直到史迪威離開中國爲止，魏德邁全盤接受軍部的看法，認爲中國戰區不可缺少史迪威的領導，而他自己也毫無保留地支持史迪威。具體的證據很多。比如說，1943年春天，當魏德邁初次聽到中國領袖對史迪威不滿時，立即寫信給馬歇爾說：

> 依據我個人的觀察，史迪威對中國－緬甸－印度戰區情況的了解程度，超過英國人，也超過中國人。因此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讓中國人知道，史迪威享有我們全部的信任，而我們也把他視為有關中國重要問題的首席裁決者。

魏德邁甚至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授予史迪威一枚優異服務勳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Medal, DSM)，藉以提高他在中國的威望，以利在中國工作的推展[4]。1943年10月，魏德邁聽到宋子文反對史迪威，再次立即請求馬歇爾趕緊採取因應措施[5]。在致馬歇爾的信件中，魏德邁徹底支持史迪威，反對「委員長的陰謀詭計」之類的言詞到處可見。

有趣的是，魏德邁如此崇敬史迪威，史迪威卻對魏德邁並不欣賞。魏德邁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史迪威日記時，史迪威寫道：「這個年輕人可真是欣賞他自己。我把我的戰術計畫講給他聽，現在他反過來把它們變成是他自己的，再講給我聽。」[6]語中帶有輕蔑。開羅會議期間，史迪威更是露骨表示對魏德邁的反感：「魏德邁這傢伙，他可真是把魏德邁當成一個重要的人物了。」[7]沒過幾天，史迪威的火氣似乎變得更大。他寫道：「我真有些受不了那一個(自以為)重要的年輕人。」[8]1944年6月，史迪威輾轉聽

4 Memo for FDR, from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3. Verifax File 636, Item 2006, MFA.
5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October 21, 1943. Verifax File 2671, Item 2578, MFA.
6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November 3, 1943, p. 191. 魏德邁此時46歲。
7 JWS t-w diaries, November 25, 1943.
8 Ibid., November 27, 1943. Also: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November 27, 1943, p. 199.

到蒙巴頓已向馬歇爾要求，以魏德邁或是索爾登將軍取代自己出任東南亞戰區副總司令職務時，簡直無法克制自己的情緒，他寫道：「我的天哪——被魏德邁來取代——簡直是一大恥辱。」[9] 9月指揮權危機爆發時，魏德邁只是一位旁觀者，但是史迪威依舊把怨氣出在他身上[10]。10月19日他聽到魏德邁被任命爲他的繼任人時，史迪威又寫道：「所以橡皮腿(羅斯福)終於放棄了。所有的人都對魏德邁這個人選大感不滿。」[11] 看來，史迪威對魏德邁的觀感，可說是前後一以貫之，就是「不好」兩個字。

## (二)魏德邁對緬甸戰爭的看法

不過，魏德邁對於史迪威在中國事務上的支持，並不包括史迪威對中國戰區或是緬甸戰場的戰略觀點。史迪威決心要把中國的所有資源和能夠拿到手的英美兩國資源，全部投入緬甸戰場，不計代價地指責中國領袖破壞緬甸計畫。相較之下，當中國政府由於同盟國拒不履行諾言，而對緬甸戰爭採取保留態度時，魏德邁卻似乎能夠理解中國政府的立場。當同盟國不肯集結武力在仰光一帶實施兩棲登陸作戰，而導使蔣介石認爲自己受到英美領袖的存心欺騙時，魏德邁也表示可以理解，不應該加以譴責[12]。

更重要的是，魏德邁認爲第二次緬甸戰爭根本就是不智之舉。他1944年1月寫信告訴馬歇爾說，同盟國的資源不應該浪費在緬甸這樣一個次要戰場上。因爲這樣做正中日本下懷，對所有同盟國都有害而無益。魏德邁戰略思路的主要著眼點不是兩軍正面對抗，而是後勤補給路線，因爲缺乏後勤補給的軍隊將無以爲戰。從這個觀點出發，他主張美軍應該從太平洋地區向荷屬東印度群島切入，切斷日本戰略物資的運輸線，並借此揮軍指向亞洲海岸線。理由是日本本土作戰需要東南亞戰略物資的支援，切斷日本本土和東南亞的運輸通道，將逼迫日本海軍作出強烈反應，而爲了確保海運暢通，不得不削弱日本在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的防務，這將有助於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反攻，同時也讓日本在印度和緬甸戰場的部隊得不到有力增援，成爲孤懸海外的一塊力量，最後將不戰自潰。總之，魏德邁相信，打敗日本的最有效的方法，決不是經由印度、緬甸和中國，一步一步在陸地上向日本本土進逼，而是從太平洋地區直接進攻

9 White, *The Stilwell Papers*, June 22, 1944, p. 243.

10 JWS t-w diaries, September 22, 1944.

11 Ibid., October 19, 1944.

12 Letter to General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from Major General A. C. Wedemey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January 17,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6, MFA.

日本本土[13]。明顯的對比是，史迪威願意用盡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務求占領緬甸，甚至只是緬甸北部亦可。而魏德邁卻把中國放在全球戰略觀中衡量，不時檢討中國應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在魏德邁眼中，中國不過只是全球棋局裡的一顆棋子而已。

1944年1月31日，東南亞戰區召開會議，魏德邁和史迪威兩人戰略觀點的歧見終於表面化。和往常一樣，史迪威認爲中緬印戰區最重要的任務是發動緬甸戰爭，打通一條進入中國的通訊和補給線；而魏德邁持相反看法，認爲即使占領了緬甸北部，也無法在兩年之內建成通往中國的陸上補給線。與此同時，東南亞戰區總部參謀人員則從英國觀點，作出一個接近魏德邁觀點的反攻方案，主張把英美兵力用於進攻馬來亞和蘇門答臘。會後魏德邁受蒙巴頓委派，向英美參謀長聯席會報告東南亞戰區的意見。史迪威竟然背著蒙巴頓暗中也組織了一個秘密遊說團，由波特勒(Boatner)和戴維斯(Davies)率領，趕赴華盛頓謀求軍部支持。蒙巴頓發現史迪威的行動後大爲光火，認爲這是下級向上級進行顛覆和抗命。儘管如此，史迪威最終還是得到軍部和白宮的支持[14]。蒙巴頓當然爲之更加憤怒。

總體來說，魏德邁對緬甸戰爭不同意見的重要性，是在他接任史迪威職務後才顯現出來的。他此時開始以一個嶄新角度處理緬甸戰爭，從而顯著減輕中美同盟關係中的嚴重衝突。

## 三、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

依據魏德邁在接任前對史迪威在華工作的高度認可，一個合理的推測是他最初的打算或許趨向蕭規曹隨，繼續執行史迪威的計畫。但是他馬上發現此路完全不通。史迪威倉促離開重慶，因此沒有和魏德邁當面辦理移交手續，這一點當然可以理解。但是史迪威卻選擇了既不維持個人基本禮貌，也不盡忠職守，在離職前沒有向留守的部下作出任何辦理移交的指示，也沒有留下重要的文檔記錄，幫助繼任人得以順利進入工作情況。魏德邁接管任務後發現，史迪威的舊部下對於史迪威的計畫也茫然不知，因爲史迪威習慣把想法裝在自己腦袋裡，這也許正是史迪威痛恨辦公室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結果是，魏德邁發現一切都需要重新開始。

---

13 Letter to General Marshall, Chief of Staff, from Major General A. C. Wedemey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South East Asia Command, January 17, 1944.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6, MFA.

14 Tuchman, pp. 549-550.

也正因爲如此，魏德邁爲了趕緊和中方建立工作關係，被逼一切從頭開始，在白紙上畫出他自己的藍圖，也因此解脫了史迪威模式的羈絆。綜合魏德邁在組織工作隊伍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大致可分爲三方面：第一，他大幅調整指揮部的人事；第二，他重新調整中國戰區工作的優先順序；第三，他重組在華的美國主要部門，加強彼此間的合作。

## (一)新的人事安排

魏德邁抵達重慶後不久就發現，史迪威留下來的許多工作人員，儘管資歷深厚，但不僅不能成爲得力助手，反而是絆腳石。原因是，史迪威個性剛強，吸引了一批在思想上和行事作風上都和他相似的部屬。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許多部屬在開始工作後就會發現，要想在這麼一位意志堅強的上司底下生存和升遷，就必須接受他的觀點，甚至模仿他的習性。而在許多時候甚至可能模仿得過了頭，不但成爲風尚而且還有互相攀比的怪現象[15]。馬歇爾事後回顧這個現象時，曾經說過：「我向來認爲史迪威在中國遭遇到那麼多困難，是因爲他在部屬面前(亂)說話，而他的部屬們也仿照他的作風，進而冒犯了委員長。」[16]

在史迪威領導下，如果一位軍官對中國問題持有不同看法，恐怕很難生存，更不必說升遷了。事實上，史迪威的指揮部也作出一定的努力，要剛從美國本土派來的新兵，盡快掌握「正確的」觀念去看待中國政府和中國人[17]。和他們的長官一樣，史迪威部屬們普遍相信，他們對中國官員的嚴厲批評，不僅是中國官員罪有應得，也是幫助後者從怠惰和麻木中清醒過來的唯一方法。在中國，的確有相當數量的官員具有嚴重缺點，亟需糾正。只是如果批評者是以嘲弄和居高臨下的姿態表達出來，中國官員就會把美國人的批評視爲出自蔑視、種族優越感或是赤裸裸的惡意，也就看不到美國「盟友」和日本「敵人」之間到底差別何在了。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至少在蔣介石、宋子文和一群中國官員心目中，就因爲這個緣故，認定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只比日本人

15　史迪威對於其下屬的行事作風不能符合他的品味時，經常提出批評。實例散見：JWS t-w diaries, March 1942-October 1944.

16　馬歇爾在1957年4月11日的訪問談話，Larry I.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er C. Pogue*, pp. 243-244.

17　史迪威屬下對抵達中國戰區的美國新兵進行新兵訓練時，就開始批評中國軍政及領袖，並因此受到美國國民軍協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Guard Association)的抗議和馬歇爾的訓斥。有關文件見："Notes To Bear In Mind When Dealing Or Working With The Chinese", orientation pamphlet issued by Stilwell's headquarters in Chungking, 1942-1943, 34 pages. Letter from Major General E. A. Walsh to Marshall, August 8, 1944; letter from Marshall to Walsh, August 17, September 26, 1944. All in Xerox File 1161, MFA.

略微友善一點。倘使美國人(如史迪威和軍部)也只知道對中國人一味採取高壓姿態，那麼中國人就很難把他們和英國人區別開了。這也能夠解釋，爲什麼蔣介石和中國政府官員，對於在華的美(陸)軍會產生那麼大的反感，而對美國空軍則有如瘋狂地敬佩、愛戴和感激。

我們應該記得，羅斯福總統早就告誡部屬，不要把蔣介石當成摩洛哥酋長來使喚，而居里則是察覺到這個問題嚴重性的第一位美國高層官員，並提議應予改正。1942年7月居里曾向羅斯福建議，凡是要派往中國的軍官都應該接受一段時間訓練，許多已經在中國服務美國軍官的態度，也仍需加以矯正[18]。居里還預言說：「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最好方法，就是讓我們的代表團**有一個適當的團長**。」不容置疑，居里訪華的所見所聞已經讓他產生危機感，而史迪威正是危機的源頭。即使是馬歇爾本人，也早就了解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了。他戰後回憶說，他曾經嚴厲指斥史迪威的幕僚口不擇言，對於中國官員，包括蔣介石在內，不管在公開或是私下場合，都一律大放厥詞，恣意批評，簡直目中無人。若干年後，馬歇爾依然認爲史迪威的大錯，是縱容他的部屬口不擇言，意態猖狂[19]。但是史迪威卻把這些忠告當成耳邊風，也絕不約束部下要行爲檢點，使得上行下效的現象變得格外嚴重。

魏德邁上任後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呈請軍部同意更換史迪威的參謀長赫恩(Hearn)將軍和副參謀長菲利斯(Ferris)將軍。他們兩位是史迪威在緬甸前線時留駐在重慶的高階助手。本書稍前已經形容過他們的活動，特別是菲利斯對待蔣介石的惡劣表現。同樣重要的是，魏德邁決定要作風迥異於史迪威的陳納德將軍留任，而這個陳納德將軍正是史迪威的眼中釘。

## 竇恩將軍的案例

最能表現魏德邁人事安排的例子，就是竇恩(Frank Dorn)將軍。竇恩崇拜史迪威，是史迪威的高級助理，也是他的心腹，他的軍中事業緊緊隨著史迪威發達。他在史迪威任駐華武官時也在武官處任職。珍珠港事件後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新職時，竇恩尚只是陸軍上尉，幫助史迪威料理公共關係。但在短短三年之內，便被擢升爲准將，擔任中國在緬甸和雲南遠征軍的美籍副參謀長。史迪威需要一位信賴得過的部下

18 Currie's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submitted to FDR, August 24, 1942, in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4.

19 Matl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pp. 372-373.

設計刺殺蔣介石方案，就把任務交給了竇恩[20]。戰爭結束後，竇恩是少數寫書頌揚史迪威事蹟的部下。

竇恩將軍全盤接受史迪威對中國事務和中國領袖的一切觀點。他和中國官員交往時，便以史迪威爲榜樣，模仿史迪威的做法，用各種小名和綽號嘲弄醜化中國領袖，並且從內心看不起他們。竇恩認爲自己完全有資格對大多數中國領袖評頭論足。他寫的一份評鑒中國高級將領的資料(1944年1月份)充滿蔑視、不屑和誇大。在他筆下，大部分中國高層將領和參謀人員都是「愚蠢、自私自利、不負責任，而又無能。完全缺乏領導才能。」[21] 1944年9月22日，在一份呈給史迪威的備忘錄中，竇恩列舉了44位在雲南境內中國遠征軍部隊長官的名字，階級一律爲將官，然後用刻薄語言逐一點評：「道德上的懦夫」、「愛哭的娃娃」、「捏造情報」、「應該予以槍斃」、「是我在任何國家看過的最愚蠢的人之一」、「絕頂愚蠢」、「能力不足以當班長」等等，不一而足[22]。然而正是這一群被竇恩批評得一文不值的將領，帶著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場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

竇恩嘲弄中國將領，幾乎是他上司的翻版，對人評頭論足的消息來源也一樣來自市井流言。竇恩和史迪威遣詞用字習慣也十分相同，這絕非偶然，只是顯示，竇恩心中非常明白，什麼樣的報告是他上司所樂意看到的。同樣有趣的是，幾個月以後，魏德邁必須和這一群被竇恩嘲弄的中國將領打交道，而成功地鼓舞他們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戰績。

竇恩還有一個地方和他的老上司極爲相像，那就是對中國政治圈裡流言蜚語的情有獨鍾。比如說，他津津樂道，蔣介石夫婦「打起架來像一對野貓兒一樣」[23]。對他們的婚姻也有自以爲精闢獨到的分析。基本上他認爲蔣氏夫婦代表槍和錢的結合，然後繪影繪聲把蔣介石和宋美齡婚姻的不堪說了一大通[24]。更讓人不解的是，竇恩在1930年代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武官，並且和當時在中國服務的德國軍事顧問有所接觸，居然還把這些德國軍事顧問形容成希特勒的爪牙[25]。假如竇恩只是一個普通人，這種張

20 Dorn's letter to Major General Wendell J. Coats, Chief of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ay 7, 1969.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6. Also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p. 75-79.

21 Dorn memo to Stilwell, January 4, 1944.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22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Also see: Dorn memo to Stilwell, September 22, 1944,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6, folder 204. Same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1.

23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 33.

24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pp. 19-21.

25 *Ibid.*, p. 43.

冠李戴只會博得識者一笑而已。但是竇恩是史迪威手下大將，身負美國對華軍事工作的重責大任。依他的身分，還會犯如此幼稚錯誤，難免令人感到啞然。

竇恩不但鍾愛內幕消息，尤其爲自己能夠據以判斷中國領袖而引以自豪。下面幾段抄自竇恩個人檔案的用語，可爲代表：「孔夫人不可太過信任」，「蔣夫人只不過是孔夫人顯示她的權力的工具而已」，「蔣夫人一直是孔夫人的工具和傀儡」。類似的評語也牽涉到孔祥熙、宋子文、何應欽、陳誠和大批中國領袖[26]。作爲一位美國職業軍人，竇恩對中國的「宮廷政治」興趣如此高昂，而又津津樂道各種流言蜚語，的確是一件頗不尋常的事。但是一想到他和史迪威同屬於所謂的「中國通」群體時，也就不足爲怪了。竇恩所表現的這種對中國政治事務分析的膚淺度，在史迪威部下裡屬於典型，許多其他軍官可能還不如他。以他們對中國官員們的心態，再加上對中國事務的拙於求知卻勇於評頭論足，他們在開展本身工作時遇到阻力也就不難理解了。

更有甚者，竇恩還對整個中國的民族性作出獨具一格的心理分析。依照他的學說，世界各國的民族性(國民性)都可以分成兩類：陽性和陰性。英國、西班牙、日本、德國，和美國都屬於陽性，而中國和法國則屬於陰性。當一個國家國力衰落時，就自然淪爲陰性。就心理上說，中國人文雅、敏感、有尊嚴、玩世不恭、缺乏宗教信仰、紙醉金迷，甚至殘忍暴虐，集諸一身。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趨向，「只要對他們施加壓力，他們就會溫順服從。作爲一個民族而言，他們缺乏道德良心。只想用最低劣的伎倆和殘暴的手段去保護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利益。只要情況需要時，在他們的本性中既不講求真理也不講求誠信。」最後的結論是，「換言之，中國人就是一個陰性的民族」[27]。以上這段奇文對於竇恩將軍心智狀態的顯露遠遠大過他對中國民族性的剖析。它不禁令人感歎，有了這樣的人才作爲美國駐華高階軍事領袖，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怎能不荊棘滿途？事實上，竇恩在史迪威剛剛離職後，就發現魏德邁是一位難以共事的上司。在一個標題爲「魏德邁」的長達5頁筆記中，竇恩對新上司大張韃伐。他描述魏德邁的缺點包括：「神氣活現，囉囉嗦嗦」，「說起話來像傳教，可以作一個傳統型的好牧師」，「裝模作樣」，「從不聆聽別人的意見，只陶醉在自己的演說中」，「態度惡劣，用手指頭直指高級軍官，對他們指名道姓，而不加職稱以示尊重」，「所學的完全來自書本和學校」，「紙上談兵的類型」。竇恩還指控魏德邁，唆使部下打小

26 See: a large number of hand-written comments by Dorn under such titles as “Situation (Sino-American) in China”, “Dr. Chiang Mon-lin -- March 8, 1945”, “Madame Kung -- March 9, 1945”, all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4.

27 Frank Dorn, commentary entitled, “Stilwell vis-à-vis Chiang K’ai-shek”, written probably in early 1945, no date. 2 pages.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4.

報告，刺探關於他的活動。

當然在竇恩眼中，魏德邁還有更嚴重的缺點：「他經常提出囉囉嗦嗦的計畫，規定應該如何執行任務，讓人聽起來好像是嶄新的觀念。但是當別人告訴他說這些計畫其實早已付諸實行時，他的回答要嘛是堅持這是一個新的制度必須實行，要嘛是批評以前的做法有錯誤而缺乏效率。」

在竇恩心中，魏德邁的一個重大罪狀，是讓史迪威時代留任的高級軍官們感到心灰意懶，覺得新長官讓他們在中國人面前丟臉。竇恩抱怨他每次向魏德邁進言時都被加以糾正，而且被斥爲是「老中國通」的陳腔濫調。從這些怨言中，不難體會竇恩和其他思路相同的同事對魏德邁的敵意，以及失落感。竇恩和他的同事們終於發覺，他們過去以自己(史迪威)的方式對待中國人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魏德邁不再允許他們對中國人耀武揚威，而這卻讓這群美國軍官們感到在中國人面前臉上無光了。

當然，最令竇恩和其他高級軍官憤怒的，莫過於魏德邁對史迪威留下事蹟大不以爲然的態度。簡單地說，魏德邁和他的新任幕僚們對史迪威的所作所爲，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崇敬之意，反而事事予以否定，認爲以前一切作爲都是錯誤，難怪遭遇失敗。魏德邁下達的指示是：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得和以前不一樣。在竇恩的感覺中，魏德邁似乎對所謂「中國通」特別反感，把他們當成是一切錯誤的根源[28]。

魏德邁接受中國戰區任命前，幾乎不認識史迪威麾下這些軍官，再加上他對史迪威本人原有的高度認可，因此對史迪威的部下們不可能抱有偏見。但是一旦接觸之後很快發現，他們對中國人的刻薄態度正是妨礙他完成任務的一大阻力。於是劍及履及，立即開始清理門戶，而竇恩正是他的首要目標。在一份送呈美國陸軍總部的業務考核報告中(日期是1945年1月25日)，魏德邁給了竇恩最沉重的打擊。他的評語是：「在我認識的500位將領中，竇恩的排名位置是第499位。」魏德邁意猶未盡，繼續寫道：「這位軍官頭腦好、聰明、有決斷力，但是他的忠誠度令人懷疑。不合作、極端自私、判斷力不成熟、不可信賴。」[29]

對於一位將級軍官而言，魏德邁這些評語可以說負面已極。竇恩是史迪威最賞識和信賴的人，在他麾下扶搖直上，是其他同事仰望的模範。而魏德邁卻視竇恩如草芥，完全沒有價值，甚至是最壞的榜樣。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準確表現了兩位指揮官的

28 Dorn's hand-written personal notes, 5 pages, undated but probably written in December 1944.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4.

29 Wedemeyer's memo to the Adjutant General, Washington, #AG201.61, dated January 25, 1945. In Frank Dorn Personal Papers, Box 2.

個人作風，和他們希望哪一種下屬執行他們的政策。這個對比當然不會逃過蔣介石的法眼和關注。他得知竇恩被革職後寫道：「此人爲史迪威軍下第一驕橫侮華之人，美竟撤去，則援華之誠意又進一步矣。」[30]

魏德邁明白告訴馬歇爾，他要的是能夠和中國政府建立一種新的合作精神和互相信賴氣氛的軍官。他所以把竇恩和其他類似軍官解職的理由，是他們表現出失敗主義色彩，不能接受合作，因此不能配合新政[31]。

1945年4月，魏德邁向馬歇爾報告，駐華美軍內部的人事改組已接近完成，並產生了明顯效果。新任命的軍官值得信賴，而他們在後勤和軍醫等領域協助中國，已經作出重大貢獻[32]。魏德邁相信，他的總部可以開始幫助中國軍隊增加對日本的抵抗了。

魏德邁努力清除史迪威留下的舊人，但是對自己賞識提拔的新人也決不護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謝飛斯(Gilbert X. Cheves)將軍。他曾極力稱讚謝飛斯的工作能力並予以擢升，一旦發現他的才能達到極限，便馬上請求更換[33]。

因此，魏德邁的立場相當鮮明；他需要的幹部不是無止境批評中國人缺點的人，而是能夠實際幫助中國人改正缺點的人。不用說，經過魏德邁改組後，參加他團隊的美國軍人很快就領會新上司的期望，並努力遵照新上司的意志行事。在此同時，魏德邁的改組動作，當然也令中國人感到安心，進而促成雙方在一個新基礎上建立更好的合作關係。

## (二)優先順序的調整

魏德邁第二個要務是，重新界定聯軍總部和第14航空隊之間的體制關係，化解它們間多年來的積怨。

魏德邁和史迪威一樣，也認爲中國應該立即建立一個小而精的陸軍，因此在使用駝峰運來的物資分配問題上，很快就和空軍產生歧見。魏德邁知道有關分配政策的兩造支持者以前曾把爭論鬧到白宮，但是他很快也發現，必須改變原來的分配公式。魏德邁就任四個月後率直告訴馬歇爾說，他堅決反對把大部分駝峰噸位分配給空軍而忽略了陸軍的需要。他主張用比較多的物資去裝備和訓練中國陸軍，使其能夠充分發揮

30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5日。

31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32 Ibid.

33 Ibid.

戰鬥效能[34]。

魏德邁認爲，除非地面部隊可以保衛飛機場，否則敵人將逐個占領飛機場，使得駝峰的增加量不能得到最大效益[35]。這個看法和史迪威的主張基調相同。但是魏德邁和史迪威最大不同之處是，他不是對駝峰運輸量的低落視若無睹，而是要求軍部增加駝峰運輸噸位。他也不是處心積慮地去剋扣對陳納德空軍的支援，而是維持空軍現有的分配量，但是把今後增加的駝峰噸位全數撥給陸軍使用。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在魏德邁給美國軍部的報告中，從未指責美國空軍圖謀霸占資源，也沒有暗示蔣介石想用美國空軍替中國打敗日本。

美國陸軍和空軍對於駝峰運輸量的競爭向來非常激烈。從1942-1943年期間，先後驚動了蔣介石、宋子文、馬歇爾、史汀生，甚至羅斯福本人。1943年，蔣介石全力支持空軍，且得到白宮的承諾。人們想到這段往事，以爲魏德邁凍結空軍分配量的主張，一定會引起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令人想不到的是，魏德邁1945年所作的決定僅激起陳納德的微弱抗議，蔣介石更無一字抱怨。在中方檔案中，完全看不出蔣介石曾經試圖改變魏德邁的決定。對照之下，當年史迪威分配駝峰噸位引起鉤心鬥角和相互詆毀，魏德邁同樣的做法卻沒有產生太大波瀾，這正好證明中美同盟關係已經改變。結果在其領導下駝峰運輸量大幅度提高，中國陸軍使用物資的效率和來自中國政府的支持度，也都遠比史迪威時代高得多。由此可見，指揮官的聰明才智和處事能力的差別有多麼重要。

還值得注意的是，蔣介石從前支持陳納德，曾引起揣測，認爲蔣介石若不是對空軍力量完全無知，或是天真過了頭，就是他內心希望借美國空軍力量爲他贏得戰爭，或者希望偷偷摸摸囤積軍火，準備未來的國共分裂和內戰。現在，這項揣測由於蔣介石毫無動靜而突然變得完全沒有根據。蔣介石行爲的唯一合理解釋是，魏德邁的新政策對他不是威脅。史迪威和魏德邁同樣是美國人，但他信賴魏德邁，不信賴史迪威。只要美援物資源源而來，而且數量逐日增加，不管魏德邁把它們分配給陳納德的空軍，或是他挑選的中國陸軍師，蔣介石都一律歡迎。

### (三)個人恩怨

魏德邁的第三個當務之急，是改善美國在華各軍種之間的關係。美國人之間的人

34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5,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9, MFA.

35 Ibid.

際關係不見得比中國單純。而在史迪威年代，美國人之間的內鬥，不僅妨礙美軍推展其援助中國的工作效率，而且在緊要關頭使中國軍民成爲最直接的受害者。本書前面幾章已經列舉了若干事例，說明史迪威剋扣空軍器材油料，因而加大了中國軍民的傷亡。因此魏德邁在改進美軍內部問題之前，必須先了解問題的由來。

魏德邁到任前對陳納德並不熟悉，但是滿懷反感。魏德邁最初對於陳納德的印象來自馬歇爾，而後者從來對陳納德強烈不滿。原因是陳納德不但在軍事上有自己的主意，並非事事順從史迪威，而且深獲蔣介石信任，更能上達天聽，直接和羅斯福聯繫。更糟糕的是，馬歇爾認爲陳納德是個陰謀家[36]。早在1943年初，他就已經警告魏德邁說，陳納德和埃索普(Alsop)狼狽爲奸，在背後破壞史迪威[37]。這個警告當然大大提高魏德邁的警覺，對陳納德有了先入爲主的惡感[38]。即使到了1944年12月初，魏德邁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依然對陳納德頗爲負面。他寫道：「他(陳納德)是一位傑出的戰鬥機飛行員，但是我相信他不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39]然而，一個月不到，魏德邁就改變看法了，不但相信能夠得到陳納德全心全意的合作，而且認爲陳納德和埃索普暗中勾結中國人的說法全屬子虛烏有[40]。他向馬歇爾報告說：「陳納德的坦誠，和保證他會全心全意的支持我和美國在華的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欣慰。」[41]

魏德邁態度上這種戲劇化的改變，是將近一個月來和陳納德多次談話的結果。這些接觸使他了解，陳納德原來沒有從史迪威總部得過任何工作指示，都是不得已之下依據自己判斷行事，而這樣做了以後卻得罪了史迪威[42]。陳納德還告訴魏德邁說，他在戰後並無任何打算，只是想回老家釣魚、打獵和享受安適生活。他和魏德邁非常坦誠地談到以前共事過的同僚，包括史迪威、赫恩、竇恩、畢賽爾，把彼此矛盾歸諸他們對中國事務的缺乏了解，並沒有作任何憤恨不平的人身攻擊。陳納德也說明，他和總統之間的直接通信，完全是總統命令，不得不服從。陳納德明白指出，他和羅斯福通信時，並無意迴避史迪威或是軍部，當然不表示他對他們不忠；他更沒有和中國人

36 JWS t-w diaries, December 16, 1942.

37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38 Letter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1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8, MFA.

39 Ibid.

40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41 Ibid.

42 Letter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1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8, MFA.

勾結去拆史迪威的臺[43]。

魏德邁明知馬歇爾對陳納德強烈不滿，但是還能給陳納德機會證明他的人格和工作能力，這頗爲難得。儘管魏德邁把分配給陳納德的物資減少了相當一部分，陳納德完全服從命令，而且全力配合。以前陳納德和史迪威之間存在的敵意，並沒有妨礙此後陳納德和魏德邁之間的合作。魏德邁在1945年4月15日決定，他必須告訴馬歇爾：「陳納德將軍忠誠而又有效地履行了我在本戰區所倡導的政策。爲了公平起見，我必須說明，我對他優異的工作成績，感到完全滿意。」[44]

魏德邁能夠在他和陳納德之間培養出新的合作精神，但是依然無法醫好馬歇爾在陳納德身上留下的舊傷。1945年6-7月間，陳納德申請退休，同時也向魏德邁遞交了一封長信，詳述他在中國的工作經驗和與史迪威的關係。魏德邁建議他不要向軍部呈交該信，陳納德執意不從，不但再次呈交該信，而且還提出更多證據，請魏德邁務必全部轉呈馬歇爾過目。陳納德的用意是讓官方資料完整，他說相信馬歇爾因爲聽到史迪威的讒言才一直對他不公平，直到魏德邁來到中國戰區之後，一切改觀，他始首度得到長官的公平待遇[45]。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魏德邁取代史迪威後，在華美國軍官的心態和效率都出現重大改善。許多史迪威未能實現的主張，都逐漸在魏德邁領導下實現。魏德邁推薦進入中國戰區工作的部屬，在主觀意願上願意和中國人合作，在實際工作上也證明了他們的確有合作的能力。由於美國軍官終於願意做蔣介石早先就希望他們做的參謀工作，因此美國軍官也終於能夠幫助中國軍隊進行重大改革。在這個過程裡，美國軍官雖然名義上仍然只是顧問，卻實際獲得更多的指揮權和管理權。這些突破都是因爲人事變更而成爲可能。史迪威對蔣介石的輕視，爲魏德邁堅定而符合禮節的態度所取代。而史迪威和陳納德之間勢同水火的衝突，也爲魏德邁開誠布公的精神和穩健領導作風所取代。

---

4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44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45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但是本書作者在陳納德、魏德邁和馬歇爾的個人檔案中，都未能找到陳納德的這封信和相關資料。一個可能是軍部(國防部)檔案審核官員認為該項資料過於敏感而決定予以扣留。此種情形並不意外，因為史迪威和宋子文的個人檔案中，都有空白檔案夾，內容被美國政府官員扣留。

## 貳、魏德邁如何處理他與蔣介石及馬歇爾的關係

### 一、中國人眼中的魏德邁

1944年10月20日，美國總統通知蔣介石，決定召回史迪威並任命魏德邁將軍爲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和在華美軍指揮官[46]。11月1日，魏德邁抵達重慶上任。

魏德邁上任時所面對的中國政府態度，顯然無法和當年史迪威來華時相比。史迪威上任前已經得到美國領袖極力推崇，魏德邁卻沒有那種幸運，軍部部長史汀生和陸軍參謀長馬歇爾都沒有給魏德邁熱情洋溢的讚詞。蔣介石對魏德邁除了幾次短暫會面外，也缺乏深刻了解。蔣介石真正中意的人選是美軍在歐洲戰場戰功顯赫的將軍。魏德邁的聲望肯定不如他們，因此魏德邁既非蔣介石的首選，也非他無法接受的人物，蔣介石對他既沒有高度期望，也沒有給他熱烈歡迎。

其次，魏德邁面臨的中國局勢也遠比史迪威來華時險惡。史迪威抵達中國時，中美同盟關係剛剛開始，雙方感情依然融洽。蔣介石殷切期望從這個新盟邦獲得實質性援助。魏德邁甫就職，蔣介石已不敢對美國援助存任何奢望。事實上美國軍方老大不願意指派魏德邁出任新職，而在中國人眼中，魏德邁的任命只不過是爲掩藏中美關係裂痕，而在傷口貼上的一塊紗布而已。

魏德邁和史迪威來自同樣一個美國軍方，而蔣介石很難忘記，這個軍方曾極力抨擊過他本人和中國的軍隊，因此無法奢望魏德邁和其他美國軍人會有任何實質上的不同。事實上蔣介石對魏德邁的第一個評價，是他在魏德邁抵達重慶第五天的日記(11月6日)裡寫下來的：魏德邁的心態一如其他美國軍人，總以爲中國需要美國援助，乞求魏德邁高抬貴手施捨，表現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一貫輕視。特別讓蔣介石感到不滿的是，魏德邁在中國人爲他布置的歡迎會上表現冷漠倨傲。蔣介石致歡迎詞時說了一大堆客氣話，表達了中國對魏德邁的充分信任，而魏德邁居然面無表情，連例行的謙讓領情之詞都不曾回敬一句，使得蔣介石大感意外和自討沒趣。難怪他事後承認，如同冰涼的雨水傾盆而下，頓時把他對這位美國軍官的友誼表示洗得一乾二淨[47]。也難怪11月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又把魏德邁形容成一個典型反映軍部仇華心態的例子[48]，指責魏德邁「彼政

46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0月20日。
47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6日。
48 同上，1944年11月7日。

治腦筋絕無也」，他的任命是美國沒有絲毫誠意援助中國的明確信號[49]。

這真是一個充滿灰暗的開端。歸根結柢，當時沒有幾個中國人或是美國人相信，史迪威離職後中美同盟關係會有任何改善的指望。

## (一)魏德邁最初面臨的難題

魏德邁對中國局勢最初的觀點和其他美國軍人並無不同。他在呈送給軍部的第一件報告中列舉中國軍隊的缺點，如：軍官缺乏現代化軍事知識和能力低落，士兵健康情況極差，營養不良，武器老舊，徵兵制度充滿缺陷，地方軍人魚肉鄉民，幾乎是史迪威批評的翻版。但是這同時也顯示魏德邁出色的學習求知能力，很快就進入情況，並且掌握了史迪威自視爲獨到見解的訊息。事實上，由於他的報告充滿了負面訊息，以致羅斯福在和孔祥熙談話時，大量引用據以表達對中國局勢的悲觀和失望[50]。當然，羅斯福的做法也增加了蔣介石對魏德邁的牴觸情緒。

魏德邁上任後對蔣介石的印象同樣惡劣。他的不滿包括：蔣介石在重慶直接指揮前線作戰，不斷改變作戰計畫和決策，完全不了解運輸和後勤需求等等[51]。

魏德邁到重慶沒有多久，便在昆明和重慶的防務問題上，和蔣介石發生嚴重衝突。原因是蔣介石經常改變主意，又不事先通知魏德邁。但是魏德邁和史迪威不同之處是，史迪威碰到這種場合，總是忍不住冷嘲熱諷，甚至破口大罵。而魏德邁則只是就事論事，避免無謂的口舌之爭。換言之，當魏德邁和中國人產生歧見時，他不會直接打擊對方自尊心，而是以堅定有禮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奇怪的是，魏德邁和史迪威一樣，都據實指出中國軍隊的缺點，但是中國領袖對魏德邁的建議和批評，卻有大不一樣的反應[52]。

## (二)在中國的磨合過程

魏德邁儘管詳列中國軍隊的各種缺失，卻證明有能力用新的合作和互相尊敬的精神與中國人共事，並使情況得到顯著改善。美國軍方在同盟關係建立三年後，也終於在重慶成立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總部。魏德邁還勤奮地赴前線各地實地考查，對於中國軍隊的實況得到第一手資料。比如說，僅僅是1945年6月份之內，他就走了幾千里路，

49　同上，1944年11月9日。

50　孔祥熙致蔣介石電，1944年11月16日。《戰時外交》(一)，頁202-203。

51　Letter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1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8, MFA.

52　Ibid.

巡視中國軍隊在長江南北兩岸的防地[53]。珍珠港事變以來，沒有一位美國將軍肯花時間做同樣的事情。所以魏德邁對中國人作出觀察或是批評時，總能舉出真憑實據支持自己的論點，既不是謾罵，也不是以偏概全，讓聽者口服心服。

史迪威要抓指揮權，但從來沒有想過如何承擔幫助中國軍隊發展和建立更好後勤系統的責任。魏德邁則不然。當下屬建議美國應該幫助中國軍隊建立一套有效的補給系統時，立即向馬歇爾提出具體方案，請求批准[54]。不久，他又同意把中國的後勤部門放在他的指揮系統之下[55]。值得一提的是，這個要求不僅沒有引起任何衝突，反而得到蔣介石的欣然同意。

魏德邁工作短期內就作出出色表現，以致納爾遜1944年12月向總統報告時非常興奮，宣稱中美關係在過去幾周內已有令人矚目的改進。納爾遜特別指出，蔣介石和美國軍方的關係轉爲良好，正和魏德邁密切合作，阻止日軍向四川推進。納爾遜提醒總統，三、四個月前的情形糟糕透頂，而現在中國政府主動推行重大改革。納爾遜的報告中列舉了許多實例，說明中國政府無論在軍事或是經濟方面，都有令人振奮的進步[56]。

因此，頗具諷刺的是，史迪威曾經預言過，假如中國不趕緊把指揮權交給他就必將全面崩潰。可是史迪威本人離開中國戰場後才不過幾周，中國局勢反而大幅改善。史迪威不屑一顧的中國需求(如軍隊後勤業務)突然得到美方回應，而史迪威極力反對的意見(如把遠征軍調回中國加強本國防務)也突然得到重視。這一切改變成爲可能，就是因爲史迪威本人離開了中國。

當美國輸入中國的資源達到一定規模，又沒有一位史迪威在旁邊根據個人喜怒好惡隨意關上運輸管道時，中國人也開始表達合作的意願。有趣的是，中國方面的事務負責人依然是史迪威嗤之以鼻的原班人馬，並未經過重大人事改變，但是美方負責人的更換卻立即改變了雙方的行爲模式，並作出令人滿意的表現。

### (三)中國人態度改變的跡象

中國人行爲上的改變可以從多方面來解釋。但魏德邁的個性和言行肯定起了關鍵

5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54 Message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ecember 2,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6, MFA.

55 Report written by Donald M. Nelson,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to China, to the President, December 20, 1944. Xerox File 2029, Folder 7, MFA.

56 Ibid.

作用。在中國人眼裡，魏德邁立場堅定，不自大，也不會侮辱和看不起別人。他對中國人的批評雖然很多，但是提出時態度誠懇，而且都是爲了增進中國本身的利益。所以沒有多久，中國人對魏德邁的好評便出現了，而且與日俱增，中美官員之間的合作關係同時隨著改善。

蔣介石和魏德邁相處兩周後，很爲魏德邁全身投入改進中國指揮系統和西南各省防衛部署的努力所感動，對魏德邁的觀感出現戲劇性一百八十度改變。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奸詐劣性，完全相反也。其辦事緊張積極，我國軍人應效法之。」[57]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他能夠給另外一個軍人的讚譽，恐怕不可能比這幾句話再高了。

蔣介石在這麼短時間裡觀感改變的原因並不難理解。從魏德邁抵達重慶之日開始，他們兩人之間就建立了一個工作常規，爭取每天會面[58]，討論中國戰區內各種軍事問題，包括指揮系統、組織、作戰及訓練、駝峰運輸、廣西防務、戰區重新劃分，甚至建立一支新軍等等[59]。蔣介石在1942年初邀請美國軍人充當聯軍參謀長，原來就是爲了能夠在以上各領域得到諮詢和協助，但是卻被排斥，而要等了兩年多才終於得到美籍聯軍參謀長的關注，認真執行他的職權。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魏德邁絕非靠著曲從蔣介石意旨而贏得對方善意。恰巧相反，他對中國軍隊缺點的批評，恐怕比史迪威更爲尖銳而詳盡，而且打從抵達重慶之日就沒停過。比如說，1944年11月21日，魏德邁在一個漫長而又令中國人感到如坐針氈的會議上，淋漓盡致地把中國軍隊的缺點數說了一遍。蔣介石感到震驚，卻不氣憤，並於事後在日記中寫道：「所部不力，積習難改，夫復何言。爲(惟)其所云者，亦多良藥苦口之言，若不再自振奮，雪恥圖強，將何以爲人耶。」[60]

魏德邁這次發言後六天(11月27日)，蔣介石和魏德邁再度詳談後，認爲中國必須認真對待魏德邁的警告，並指出魏德邁的話應該讓中國人聽了之後感到慚愧不已才對[61]。11月30日，他聽到魏德邁徹底批評中國將領們的劣跡，在日記中又寫道：「使余愧感萬分。」「然而魏德邁等對我國軍事與行動之批評，實令人慚愧無地，然而其熱忱與直諒可感。不如往日史事之陰狠，故余對之，但有興奮與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62] 接

57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16日。
58　此類會談經常超過一小時。見：蔣介石日記，1944年11、12月。
59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4日。
60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21日。
61　同上，1944年11月27日。
62　同上，1944年11月30日、12月1日。

著12月9日，魏德邁當著赫爾利和宋子文的面，要求蔣介石解釋，爲何在沒有諮詢他的意見之前，擅自改變昆明防守計畫。蔣介石不但感到欠魏德邁一個詳盡解釋，而且答應今後定會改善和美軍之間的溝通[63]。但是，一旦牽涉到原則問題時，魏德邁的態度會變得毫無商量餘地。比如說，當他發現中國運用租借法案物資違反美國政策時，馬上向蔣介石提出強烈抗議。而蔣介石也趕緊指示宋子文加以改正[64]。就這樣，一個原本可能導致中美關係產生重大裂痕的事件（例如1942年7月間的兩架運輸機事件），就得以用平靜而又堅定的外交手段在幾分鐘之內解決了。

魏德邁對中國軍隊的批評和史迪威並無實質上差別，但是他從中方得到的回應卻截然不同。道理就在他用的方式：有禮貌而不是出口傷人，理性指出而不是狂妄叱責，幫助對方看出和改正缺點，而不是存心打擊和摧毀對方自尊。魏德邁謹守既合禮節而又堅持立場的作風，即便使用了比史迪威更露骨的語言，也總是用積極正面的精神處事。一旦蔣介石信任了魏德邁的真誠和敬意，就不管魏德邁批評的內容如何，蔣介石都把它們看成魏德邁的善意表現和盡忠職守。因此，儘管魏德邁的批評令人感到痛苦，蔣介石還是把它們當成是「良藥」勉強吞嚥。尤其讓蔣介石領情的是，中國戰區中存在的許多問題，過去都被史迪威擱置不顧，現在魏德邁主動關注，並將之改善。蔣介石在態度上的這種改變，使得中美兩個盟邦在魏德邁抵華之後的頭幾周內就減少了摩擦，增加了合作。

應該記得，蔣介石對魏德邁個人的讚詞，是在他仍然不信任美國軍方的情況下說出來的。他們兩人關係的改善，也導致蔣介石減少對美國軍方的敵意。比如說，1944年11月中旬，蔣介石因爲美國軍方未能把原先承諾的物資送達中國，也沒有把原先承諾的機場建造費和維持費交付中方，對美國軍方仍然大表不滿[65]。但是12月初，蔣介石卻開始讚揚美國軍方，這是長久以來難得聽到的聲音。蔣介石巡視貴州貴陽時，發現當地軍隊情況極壞，便非常坦然地對同僚承認，中國實在不可以責怪美國人對中國的批評，接著就極力嘉許美國人批評其實是負責任的表現，並告誡中國將領，如果沒有美國人協助，中國在印度的遠征軍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卓越的戰績[66]。到1945年初，蔣介石對魏德邁的工作成績和個人品質，已經感到非常滿意，以致他告訴羅斯福（1945年2月17日）說：

63 同上，1944年12月9日。
64 同上，1944年12月28日。
65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17、27日。
66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2月1日。

> 魏德邁將軍奉派來華之後，我中國軍事之改進，獲得其不少寶貴之協助。彼豁達爽直之熱誠與切實而精詳之工作精神，實為余所罕見者，余得與彼合作，殊覺非常愉快。余之同僚，與彼感情亦極融洽，故現時中國軍事上之設施，已因此而日見加強[67]。

有趣的是，史迪威的尖酸刻薄雖然讓一些美國軍人得到某種畸形的心理滿足，但是魏德邁安詳莊重而又誠懇的態度卻更贏得中國人的合作。學術界曾經提出一種說法，蔣介石對魏德邁的稱讚其實言不由衷，而是爲形勢所迫，不得不爾。他們指出，蔣介石在史迪威事件後知道自己闖了大禍，嚴重冒犯羅斯福，因此不得不處心積慮討好羅斯福，而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作出姿態，假裝和史迪威的繼任人相處融洽。這種看法距離事實太遠，是只有堅決拒絕參考中方資料的人才能閉門造得出來的「車」。因爲凡是關注戰時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當時最受中國人普遍尊敬的美國軍人是陳納德，而魏德邁在戰爭結束前夕在中國人中的聲望，已經能和陳納德並駕齊驅了。這些學者之所以不願承認此時中美關係的確有實質上的改善，其原因就是因爲這個史實和他們原先的立場不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寧可修改歷史，也不願意修改自己的立場。

### (四)建立互信的過程

有兩件事大大鞏固了蔣介石對魏德邁的信賴和崇敬：第一是魏德邁同意把部分遠征軍從緬甸戰場抽調回國；第二是魏德邁執意要和蔣介石一起死守重慶。

#### 1. 中國比緬甸更重要

魏德邁剛就任新職，就必須作出一個重大決定。我們還記得，蔣介石向美國壓力低頭把軍隊送往緬甸戰場時，日軍正展開一號作戰，進攻河南和湖南。蔣介石在這一年夏天，已經要求撤回一部分遠征軍，以應付中國本土的緊急情況，但立即遭到史迪威的怒罵。1944年12月初，魏德邁願意放棄史迪威的僵硬主張，告訴軍部說，中國局勢嚴重惡化，必須召回至少兩個師的兵力，以保證昆明空軍基地不至於落入日軍手中。魏德邁向馬歇爾保證，他非常不願意召回兩個師去妨礙蒙巴頓作戰計畫。但是經過深思熟慮後，仍不得不提出這一請求，相信馬歇爾在同樣情況下也一定會作出同樣決定[68]。

---

67　蔣介石致羅斯福電，1945年2月17日。《戰時外交》(三)，頁312。

68　Letter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ated December 10, 1944, and Marshall forwarded a summary to FDR on December 2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魏德邁和史迪威大不相同的是，他並不把中國遠征軍當成是「我的軍隊」，而且把當務之急和未來期望分得清清楚楚。換言之，不管緬甸戰爭未來的勝利能夠帶給中國多大好處，中國當前最迫切的需要，是趕快解除日本進攻的軍事危機。如果不能有效解除當前危機，而只是想到緬甸戰爭結束後，每個月可能進入中國的10萬噸物資，那不過是在作白日夢而已[69]。

馬歇爾在這個事件中的態度同樣值得注意。在此之前，他曾經全力支持史迪威，斷然拒絕中國請求。而現在他卻建議參謀長聯席會接受魏德邁的請求，這顯然需要一番新的說詞。馬歇爾的邏輯是這樣的：「委員長已經決定要召回這些部隊。說到底，它們是他的部隊，服從他的命令。根據魏德邁所提供的有關當前的危急局勢的報告，我們無法反對委員長的裁決，去運用他自己的部隊，去對付中國面臨的威脅……」[70]接下來，馬歇爾還採取連串措施，幫助魏德邁實現他的請求，包括說服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和邱吉爾接受魏德邁的建議[71]。

這個舉動代表的是，美國軍方態度產生了決定性改變，尤其是馬歇爾本人的巨變。他不但突然接受魏德邁調回中國軍隊的建議，而且承認中國完全有權利這樣做。他放棄了過去以停止一切對華美援，或是取消緬甸路計畫作爲恐嚇中國的做法，也放棄了原先堅持這些部隊既然接受美國裝備和訓練，就應該接受美國人命令，從事美國人認爲有利於中國的戰爭的說法。假如馬歇爾早幾個月前就採取同樣立場，說不定中美兩國關於史迪威的危機可以全部避免。當然，馬歇爾拒絕改變主意，付出慘重代價的是中國軍民，而不是美國人民。因爲正是在那幾個月裡，日本軍隊得到一個擊垮中國軍隊的絕好機會，使中國社會承受巨大破壞，直到抗戰勝利突然來臨之時，仍遠遠未能恢復。從這個角度來看，一號作戰對於中國戰後局勢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嚴重。

對於中國而言，幸運的是魏德邁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和史迪威分道揚鑣，而且沒有絲毫猶豫，務求用一切方法挽救中國戰局。即使在挑選回到中國的部隊時，蒙巴頓希望挑選遠征軍中戰鬥力較弱的部隊，而魏德邁卻堅持挑選戰鬥力最強的部隊（如第22師和第38師），全力解救中國的燃眉之急[72]。魏德邁的立場使蔣介石大爲感動。

（續）

Folder 27, MFA.

69 Message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20, 1944, which Marshall provided some excerpts to the President. Xerox File 2990, Item 225, MFA.

70 Marshall's memo to the JCS, in Verifax File 1175, MFA.

71 所有引文均見Verifax File 1175, MFA.

72 同上。最終第14師及22師被空運回中國馳援，但此時日軍的攻勢已經在獨山遭到中國軍隊的阻截，因此並沒有發生決定性影響。塔克曼女士對此事持不同意見，請參閱：

## 2. 魏德邁決定和蔣介石死守重慶

一號作戰末期還發生另外一件事，雖然沒有造成任何實質後果，卻對蔣介石產生了巨大心理效應。

1944年12月初，日軍兵鋒抵達四川和貴州兩省接壤之處，有把攻擊矛頭指向重慶之勢，中國軍隊似乎無法阻擋。據蔣介石日記，魏德邁敦促他及早準備把中央政府遷往昆明，但是他斷然拒絕撤離重慶[73]。12月4日，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魏德邁再次提出同樣建議，並告訴蔣介石應該優先考慮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他的個人尊嚴，他又斬釘截鐵回應道，即使重慶陷於敵人包圍也絕對不會出走。一旦魏德邁了解到蔣介石的決心，他隨即聲明，只要蔣介石拒絕離開重慶，他也將留下不走，一定與蔣介石共存亡[74]。

魏德邁12月7日給馬歇爾的報告，證實了蔣介石的記載。根據魏德邁的說法，當他建議蔣介石擬訂撤離重慶計畫時，蔣介石「斷然宣稱他打算留在陪都。如有必要的話，甚至不惜死在那裡」。在這個關鍵時刻，蔣介石心中無疑是充滿犧牲決心，但是魏德邁的政治嗅覺讓他聯想到蔣介石的其他考慮。正如魏德邁告訴馬歇爾說，「我們在這裡做的每一件事，都有許多政治含義在內」，蔣介石表示與重慶共存亡的決心也不例外[75]。魏德邁根據這個理路思考，得到的結論是，蔣介石決心留在重慶，他的政治考量不止是因爲四川人口眾多(六千五百萬)，物產豐富，也是因爲離開四川以後勢必要進入其他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勢力範圍，屆時他可能遭到把持、抵制，甚至叛亂。根據魏德邁推測，假如蔣介石撤退到昆明地區，雲南的龍雲很可能就會把他軟禁起來，或是把他當作人質來裹脅中央政府[76]。由於龍雲和汪精衛政府關係一向曖昧不明，蔣介石一旦落在龍雲手中，對中國抗戰前途可能會有無法預測的嚴重後果。

魏德邁在政治敏感和觀察細膩兩方面，顯然比史迪威高明許多。相形之下，前者可以稱得上是謀臣，而後者卻是武夫。但是蔣介石此時的處境，實際上遠較魏德邁所

(續)

Tuchman, pp. 659-660.

73 蔣介石日記，1944年12月2日。

74 同上，1944年12月4日。

75 雖然魏德邁並非中國事務專家，但是比號稱中國事務專家的史迪威似乎更具政治敏感度。史迪威並非完全不了解雲南對重慶政府的反抗情緒，但是他對於這類複雜政治問題毫無耐心。從史迪威的觀點來看，假如雲南省主席不聽從命令，蔣介石就應該將之撤職。

76 Letter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ated December 10, 1944, and Marshall forwarded a summary to FDR on December 2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7, MFA.

猜測的更爲險惡。

11月初，廣西桂林守軍在宣布決心死守以後，僅僅抵抗一天就棄城而逃，日軍如入無人之境。這個防禦結局大出蔣介石意料，因爲守軍號稱桂系最精銳的戰鬥部隊，而且這是保衛他們自己的鄉土。守軍不但有足夠時間建築工事，更從中央政府得到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最好武器[77]。對桂軍的潰亡，蔣介石非常震怒，但是因爲軍隊屬於桂系，只能抑住滿腔怒火。桂系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雖然事後都爲部隊的無能向蔣介石道歉，可是並不願意以軍法懲治失職將領[78]。李、白兩人是蔣介石最信賴的地方軍人，所部在中國軍隊中素有善戰之名。他們布置在桂林的守軍，究竟是敗在戰鬥力薄弱，還是敗在想保存實力，並不是我們此地要關注的問題。但是這次軍事失敗卻充分說明了政治現實，即便是蔣介石最親密的政治夥伴，他們也必須保護手下親信，而不願意將其交付蔣介石接受軍法審判，而蔣介石在面對他們的抗拒或是無能時，也只好徒喚奈何。

類似情形也在其他地區發生。比如說，11月中旬，一個粵系部隊(第90師)在沒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況下，便擅自開進江西贛州的飛機場內。蔣介石既無力命令該師離開機場，也無力處分抗命的該師師長。理由其實非常簡單：師長是名義上屬於中央嫡系的廣東籍軍人薛岳將軍的弟弟，而他開進機場可能來自薛岳本人授意，企圖截留美國空運赴該地的武器[79]。用不著多說，蔣介石面對整個事件除了緊張和憤怒之外，別無對策。在中央政府所在的四川省，當鄰省貴陽陷於日軍威脅時，許多地方突然出現大批標語要求地方自治和要求省主席張群下臺，而張群正是蔣中正爲順應「川人治川」輿論而任命的四川籍親信軍人[80]。這一年年底，蔣中正派何應欽到雲南視察公務，雲南實力派軍人龍雲立即認爲中央政府預備對他有所不利。結果是，省政府拒絕接待何應欽，龍雲衛隊緊閉省府大院大門，放哨站崗，氣氛緊張，衝突大有一觸即發之勢[81]。

地方軍人的紀律散漫和猜疑抗命，決定蔣介石能夠運作的範圍。史迪威對於這些問題的複雜性或是茫然無知，或是等閒視之，反而把它們看成是蔣介石缺乏維持紀律的意志力和心智力等劣跡的鐵證。前述史迪威對於全州戰敗的肆意攻擊(見第10章)就是這種幼稚錯誤的表現。在一味責怪之餘，史迪威轉而急不及待地躍躍欲試，要求蔣介石交出指揮權，由史迪威來處理這類抗命失職行爲。至於蔣介石是否手中果然有

77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11日。
78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1月11日。
79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17-22日、12月3日。
80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4年12月12日。
81 同上，1944年12月25日。

「權」可放，那可不是史迪威願意進一步去追究的問題。相形之下，魏德邁就大不一樣了，他知道蔣介石的不行動，並非出於缺乏意志力，而是缺乏足夠的強制力。太平洋戰爭期間，即使蔣介石有足夠的意志力，願意冒挑起內戰危險去壓制抗命的地方勢力，他也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執行。更不用說，日本人會爲中國人的內鬥而大喜若狂了。

一旦魏德邁決定和他長官一起死守重慶，他趕緊向馬歇爾保證，自己絕非失敗主義者，情況也絕非瀕於絕望。他作此決定的原因很簡單，只是要肯定未來不會有人說：「在中日戰爭決定性的最後階段裡，美國人拋棄了中國。」[82] 事後的發展是，日軍並未能進攻重慶，但是蔣介石卻被魏德邁表現出來的榮譽心、勇敢、責任心和對中國人的尊重所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魏且以余守重慶則彼亦願同生死不離左右之言相約，更使余起不孤寂之感矣。」這成爲魏德邁能夠贏得蔣介石信任和尊敬的最重要原因[83]。無可置疑，蔣介石當時一定在內心中把兩位美國軍官，在類似的情況下的行爲作了一次對比。1942年5月，一個美國將軍比他屬下所有的中國官兵都更快地從戰場上消失無蹤。但是在1944年12月，另一位美國將軍卻堅決拒絕離開職守，誓與他的長官同生死。

## (五)合作範圍的擴大

即使遭遇困難，魏德邁依然以積極精神和高度誠意幫助中國人。正如他對馬歇爾所說：「我正在盡一切努力，在一個合作而又友好的氣氛之下，去(和中國人)建立互相尊敬和信任。」[84] 魏德邁用不了多少時間就表現出，他對中國人的態度及對中國人心理的分析方式，和史迪威大相徑庭。單就對中國人的態度而言，他向馬歇爾寫道：「我對應委員長的方式是友善、直接和堅定。我相信他現在對我有好感，而且尊敬我……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不要冒犯他的自尊心，同時保持自己的顧問的地位，使他沒有失去面子的恐懼，或是認爲我會強迫他作出違反軍事常識的舉動。」[85]

---

82 Message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20, 1944, which Marshall provided some excerpts to the President. Xerox File 2990, Item 225, MFA.

83 蔣介石日記，1944年12月9日。

84 Message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ecember 2,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6, MFA.

85 Letter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ated December 10, 1944, and Marshall forwarded a summary to FDR on December 2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7, MFA.

魏德邁的舉止也和史迪威大不相同。史迪威只要碰到中國人的反對意見，就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氣，化爲火光四濺，辱罵傷人。在這方面，他的日記是最好見證，因爲裡面充滿了對各階層中國官員的詛咒和侮辱，他對中國領袖的態度也經常是劍拔弩張或是怒目相向。實際相處時，也總是肆意諷嘲或是大聲叱責，指望中國人吞下自己的尊嚴，默默忍受史迪威的叫囂。史迪威私下對於中國人的感覺充滿懷疑。他用來分析中國人態度的字眼包括「陰謀、出賣、挖牆腳（undercutting）、使花招（skul-duggery）」等等。在此我們或許可以對史迪威的作風作出一個推測，那就是除了表現他無可自抑的個性之外，也許還可以有更深一層的謀略考慮，那就是：如果史迪威能夠以粗暴武斷的姿態一舉而徹底摧毀對方的信心的話，則此後就可以無往而不利，對方將完全放棄自己的判斷力，俯首順從史迪威的決定。如果史迪威的盤算果然是想如此達到一勞永逸的成效的話，那麼他的失算就是找錯了對象，因爲蔣介石絕非那號人物。

相對而言，魏德邁從來不作越軌失格的行動，或是用侮辱性詞句形容中國官員。即便面對他認爲離譜的情況，魏德邁依然保持風度，用成熟、巧妙和外交手法處理[86]。這就怪不得他在短期內可以作出具體的成績來。如他在12月初給馬歇爾的報告中說，已經採取措施改善中國士兵的伙食，減少貪污，把軍隊食品供應放在美國軍官直接監督之下[87]，並指派美國軍官主持貴陽和昆明之間的運輸補給工作，另外也選派四位美國軍官協助中國後勤部門。他同時得到蔣介石批准，建立基本規矩，在部隊集結地點配備美軍醫護人員，不容許任何有疾病的中國士兵被送往部隊作戰[88]。12月14日，蔣介石請求魏德邁協助擬訂把軍隊精簡化的計畫，著手軍隊的改造和訓練、改革人事制度、貫徹軍隊紀律、消除貪污、提高士兵薪餉和生活品質，及補足中央軍的空缺[89]。在正常情況下，這些事項本都應該包括在一個合理的軍隊整頓改革計畫之中，中國軍隊亟需全力以赴。十分奇怪的是，史迪威在華服務幾近三年，蔣介石竟然沒有機會和他商討這些重要問題。

過了一個月，蔣介石訂立了更多的具體計畫。1945年1月14日，蔣介石擬了一張工作進度表，列出1945年度應該執行的項目。內容頗值得注意：一，在六個月之內，完成對36個師缺額的補充，同時完成對日反攻的準備工作。二，在六個月內完成青年軍十個師的訓練工作；三，在中央15到30個軍中實施改革，包括人事、工作考績、後

86 Ibid.
87 Ibid.
88 Ibid.
89 蔣介石日記，1944年12月14日。

勤業務、教育和訓練等各方面工作。改革的目的在增進專業素養、制度化和戰鬥力。蔣介石甚至把1945年的作戰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6月以前收復南寧和柳州。第二階段是在10月以前收復廣州和香港。第三階段是在年底以前收復衡陽、長沙和武漢[90]。這是蔣介石長久以來第一次爲中國軍隊訂出具體進度表，他的企圖心的旺盛和對中美軍事合作的樂觀心情均由此可見。

魏德邁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在中國戰區內同盟國關係的結構問題上，針對許多缺點進行補救和匡正。他注意到同盟國在中國戰區內有許多單位各自爲政，互不協調，甚至彼此衝突，爭奪駝峰物資，因而使局面變成混亂。例如，僅在軍事情報領域，就有英國、法國和荷蘭的單位，加上美國政府自己又有七個單位，各行其是[91]。對這種現象，史迪威從不關心，但是魏德邁則是取得了蔣介石支持，對它們加強管理。最後，魏德邁甚至試圖解決蔣介石越級指揮的問題，這是史迪威和蔣介石最尖銳的衝突點之一。爲了矯正蔣介石遙控的指揮作風和習慣，以及人事安排，魏德邁建議重慶領袖只向作戰部隊指揮官下達一般性指示，至於完成任務的具體方法則由指揮官負責，指揮官不能完成任務時則給予處分。蔣介石原則上同意這種做法，但是魏德邁了解，蔣介石多年積習，並非在短時間內可以徹底改變[92]。

### (六)一號作戰

針對一號作戰帶來的中國戰局惡化，魏德邁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細心審查過去六個月來的美國情報資料，發現原來日本的動向和準備其實早已有跡可循，但是中國沒有採取相應措施，美國軍方也不曾對中國作過任何建議。魏德邁從抵華後幾周的實際經驗中可以想像，中國組織渙散，軍事低能無效，政治勾心鬥角，種種因素都讓它無法及時採取有效措施[93]。如本書前文所述，中國軍事失敗，除中國軍隊本身的理由外，還有幾個重要原因：當時美國在華高層軍官奉行史迪威的意旨，一心忙於緬甸事務，認爲中國戰事與自己無關，運進中國的物資不增反減，空軍沒有足夠油料和彈藥支持地面作戰，精銳部隊送往國外戰場等等(見第10章)。魏德邁原以爲他有充分時間準備

90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4日。

91　Message from Wedemeyer to Marshall, December 29,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8, MFA.

92　Letter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ated December 10, 1944, and Marshall forwarded a summary to FDR on December 2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7, MFA.

93　Message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ecember 2,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6, MFA.

昆明防務[94]，豈知甫抵中國上任，就被一號作戰帶來的危機弄得手忙腳亂。

一號作戰後期，魏德邁所關心的是如何幫助中國解決問題，而不是把他自己的解決方式強加在中國人頭上。魏德邁對中國部隊的作戰效率估計得頗爲務實。基本上，他承認中國部隊的表現難以預測[95]。因此當蔣介石決定要從西安地區抽調六萬士兵支援昆明防務時，魏德邁立即表示，願意提供空運工具。雖然這些部隊在史迪威和其他美國軍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認爲是蔣介石的精銳之師，但是魏德邁的評價則大不一樣[96]。連中國人自己也心裡有數。王世杰就坦白承認，這些部隊衣衫襤褸，營養不良，戰鬥力低落[97]。但是爲了挽救中國政府免於崩潰，這些部隊卻是蔣介石最後能夠動用的「生力軍」。

儘管困難重重，魏德邁仍然竭盡一切努力挽救局勢[98]。也正由於魏德邁和蔣介石兩人能夠密切合作，在幫助中國成功阻截日軍凌厲攻勢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這一個結局無形中也證明一件事：早先美國政府曾經堅持，除非把指揮權立即交給史迪威，否則中國必將面臨敗亡，這顯然是一個錯誤的預言。

## 二、魏德邁與馬歇爾的新關係

從前文討論中可以看出，馬歇爾在戰時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中，一直扮演極端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馬歇爾鼎力支持，史迪威不可能在中國長期任職，更不可能一意孤行。因此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的特殊交誼，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因素。史迪威的革職代表馬歇爾政策的失敗，和對他個人聲望的沉重打擊。因此馬歇爾內心肯定感到五味雜陳。前文提到史迪威回美後如何受到馬歇爾的冷落和傷害，但是馬歇爾自己受到的傷害其實比一般想像更大更深。因爲事件嚴重損傷了馬歇爾的個人聲譽，不久他對總統的建議和替總統草擬的電稿都慘遭棄置。這些都是以前極少發生過的現象。不過，至少在史迪威離華返美之初，馬歇爾依然認爲，由他批准和由史迪威執行的對華政策本質上是正確的。換言之，就對華政策和態度而言，馬歇爾與史迪威實爲一體。馬歇爾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投入，與史迪威並無二致。

---

94 Ibid.

95 Ibid.

96 Ibid.

97 王世杰日記，1944年11月27、30日。

98 Letter from Wedemeyer in Chungking to Marshall dated December 10, 1944, and Marshall forwarded a summary to FDR on December 20, 1944.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87, Folder 27, MFA.

因此史迪威的革職，立即衍生出一個馬歇爾可能如何面對史迪威繼任人的態度問題。從一個角度說，如果史迪威的繼任人工作受到挫折，使得中國戰區情況愈加惡化，則馬歇爾可以得到心理滿足，甚或幸災樂禍。因爲這正好證明他原來政策的正確性，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早就警告過你們了吧！」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如史迪威的繼任人使中國戰區免於崩潰，他又應該感到安慰，因爲這符合美國國家利益，雖然仍然不免會有一絲絲的失落感，因爲顯然他和史迪威的最壞預言被證明是錯誤的。對美國利益更好但是對馬歇爾心情更壞的發展是，中國的情況在史迪威離華後不但沒有惡化，反而大爲改善，這就等於證明馬歇爾缺乏知人之明，同時長期盲目地支持了一個錯誤的政策。作爲凡人，馬歇爾自有其七情六欲，因此在他需要和魏德邁建立新的工作關係的同時，不可能不被這些複雜微妙的感情所干擾。

簡單的說，魏德邁要想順利展開在中國的工作，也必須精心培養和馬歇爾的關係。但是魏德邁既然缺少史迪威早先具備的優勢，因此更需要特別注意自己言行的拿捏恰當，培養出新的感情和信任，然後才能使馬歇爾捐棄前嫌，贏得他的支持。魏德邁和馬歇爾建立關係最重要的溝通方式，和史迪威與馬歇爾之間大不相同。

史迪威和馬歇爾之間往來的書信，既大量又頻繁，有時一日數起。它們大多數是電報，篇幅較短，內容偏重事實報導，很少提供精確細節，更少見深度分析，多半是點到爲止。馬歇爾則經常把史迪威工作範圍外的美國最高機密文件轉發給他閱讀，幫助史迪威掌握大局。這些文件不但有蔣介石和羅斯福之間的來往書信，還有孔祥熙、宋子文、蔣夫人、居里、邱吉爾和許多其他人的文牘。馬歇爾還經常把他替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草擬的電報文稿，在沒有被採納或是正式發出之前就交給史迪威閱讀，讓史迪威預先知道總統或是軍部準備向其他領袖傳達的訊息，並有充足時間思考，在真正收件人尚未收到信件正本時，史迪威就已經知道如何去對付可能引發的問題。這就會讓史迪威在交涉中占盡先機，反而使正本收件人感到措手不及。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他們兩人之間大量的通信中，史迪威的情緒從來沒有失控過。即便是以他出了名的壞脾氣和語言粗暴，在馬歇爾(「我親愛的上司」)面前永遠謙卑有禮，好像每當他坐下給馬歇爾寫信時，他整個人就突然脫胎換骨似的。當馬歇爾責備他的缺失時，史迪威也從不還嘴，只是趕緊認錯，答應不再重犯(雖然旋即重犯)。他在信件中不時感激馬歇爾對他的寬厚大度，和對他家人的友善關懷。當一位美國四星上將在上司面前，柔順得自貶是「您的問題兒童」(your problem child)時，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確實超乎尋常。

然而史迪威另外也有一個習慣，那就是對馬歇爾掩藏某些事情的真相。這種行爲

不時會讓馬歇爾在和第三者交涉時，由於不知情而陷入尷尬處境，甚至影響他個人行爲的適當性。在某些情況下，當馬歇爾收到對於史迪威不利的傳聞時，也一定會向史迪威求證，但是未必能得到誠實可靠的答案。

儘管有以上問題，馬歇爾和史迪威兩人對他們之間的溝通方式，雙方都感到滿意，並維持了彼此間的信任。史迪威對馬歇爾忠誠（或是柔順），馬歇爾對史迪威絕對信任和支持，都是他們之間私人友誼和職業關係的結晶。然而，他們這種親密關係的風險是，彼此缺乏以批判精神去看待對方的看法和政策取向，也不願意開敞心懷去聽取別人意見。就這樣，在華盛頓的馬歇爾和在中緬印戰區的史迪威，變成影響美國對華軍事政策最重要的兩個人。他們兩人安於聽從對方的意見，使第三者難以介入。

相對而言，魏德邁和馬歇爾之間從來沒有建立如此親密關係的基礎。因此，當魏德邁到中國戰區服務時，他和馬歇爾保持聯絡和讓軍部關注中國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大量給馬歇爾寫信，而他在這方面的做法又和史迪威大不一樣。

魏德邁甫到中國戰區上任，就給馬歇爾寫信，內容詳盡，幾乎包括他接觸到的每一件事情和搜集到的每一個訊息。這些信件一律都是單行打字，通常有3-5頁，間或多達11-12頁。數量之龐大，令人不禁好奇，魏德邁每天忙碌工作，如何擠得出時間寫這麼長、這麼多而內容又這麼豐富的書信。1945年2月，魏德邁還增加了一個新方法：除了討論中國戰區情況的正常備忘錄外，每月15日固定給馬歇爾寫一封私信。備忘錄的內容可以給軍部各主管傳閱，沒有安全顧慮。私信內容則比較敏感，題材是有關人事或是情報，只供馬歇爾一人閱讀。魏德邁解釋他所以採用這種做法，是因爲他深深體會，在中國處理人際關係比制訂合理政策更加重要。魏德邁認爲，如果用人得當，即便制度欠佳，工作依然有做好的希望。反之，只有良好制度，但用人不當，則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99]。通過這些私信，馬歇爾逐漸對中國事務和局勢獲得前所未有的了解。隨著了解愈趨深入和細膩，馬歇爾也首度開始對這些事務有獨立分析的能力，無需和以前一樣全盤依賴史迪威判斷。

馬歇爾對魏德邁觀感的改變，也是一個微妙而又緩慢的過程。當魏德邁上任之初，馬歇爾自己的創痛猶新。因此，他對魏德邁信件的反應可能是憂慮乃至警覺，因爲這些信件對中國戰區局勢的形容，遠不及史迪威所說那麼嚴重和絕望，而對蔣介石和其他中國官員的評價，又遠不及史迪威那麼嚴苛。馬歇爾當時心中所想可能是，史迪威所描繪的蔣介石奸詐狡猾，而魏德邁又對於中國事務缺乏經驗，終於使他墜入蔣介石圈套之中。

99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5,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9, MFA.

美國軍方歷來耿耿於懷的，就是蔣介石在1942年1月曾經說過，他比較歡迎沒有遠東經驗的美國軍官來華任職，某些軍人就把這個建議，當成蔣介石處心積慮矇騙美國人的首要證據。不意魏德邁剛剛上任，這些預言似乎就得到印證，實在不得不令馬歇爾格外擔憂。

即使中國局勢逐漸證明魏德邁的確在作出實質改善時，馬歇爾還是有難言的椎心之痛，原來他和史迪威的中國政策都是錯誤的。霍普金斯私下就曾向宋子文透露，史汀生和馬歇爾兩人對於魏德邁所作出的成績，感到相當不安。這個內幕消息並不難理解，因爲這正好證明史迪威當初的預測是無的放矢[100]。

然而隨著時間推進，馬歇爾逐漸了解魏德邁的爲人做事，也開始爲他的成績感到欣慰。後來甚至把魏德邁的信件轉呈給總統，並整段引進自己對總統的報告中[101]。馬歇爾心理上的這種改變，導致他後來批准魏德邁提出的軍事改革計畫，並投入許多美國在史迪威時代堅持不肯釋放的資源。可以看得出來，馬歇爾和他在中國的首席軍事代表之間的關係，從1945年初就開始大幅改善。馬歇爾的支持也讓魏德邁能夠更大膽地開展軍事改革計畫。但是態度改變究竟是逐漸的。在某一個時間點之前，馬歇爾只支持那些中國政府原先所抵制的改革。其後馬歇爾也支持中國政府主動提出的改革方案。魏德邁無疑是這一個轉變過程中最重要的推手。

回顧這段歷史，原本對史迪威向來無條件支持的馬歇爾，最初對魏德邁的工作雖然未必幸災樂禍，但肯定是一位冷眼旁觀者。即使他最初對魏德邁沒有過高的期望，但也很快看出其努力的精神。1945年春天，馬歇爾和軍部其他領袖開始稱讚魏德邁的成績，但是魏德邁的反應卻是謙虛一如往昔。他在4月份報告中告訴馬歇爾說：「我察覺到了你們對我在中國的建樹，給了許多了不虞之譽。其實，我們的努力還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如果能夠把美國方面的智慧與努力，和中國方面的真誠合作結合起來的話，我們可能可以對戰爭作出真正的貢獻。我們現在正在朝這個方向去努力。」[102]

## 三、居間改善蔣介石與馬歇爾之間的關係

蔣介石與馬歇爾素不相識，一直要等到開羅會議才首度見面。但是由於史迪威的介入，兩人間早已產生強烈的互憎。只要這個感覺一日存在，中美關係就會是一條荊棘滿布的道路。

---

100 《蔣總統事略稿》，1945年4月15日。

101 一個實例是魏德邁在1944年12月4日寫給馬歇爾的信件，後者在12月20日又把全信附在他呈給總統的備忘錄中。

102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魏德邁在致力於處理中美同盟關係的實質問題之餘，也沒有忘記設法消除馬歇爾和蔣介石之間的隔閡。魏德邁非常清楚，他在中國戰區的成敗，馬歇爾的善意和支持是關鍵所在。因此努力消除馬歇爾和蔣介石之間的芥蒂。爲此他告訴馬歇爾說：「對於中國人心理的變化莫測，您是有親身經驗的。因此，當我說委員長的行爲和反應經常令人無法探測時，您一定會了解我的意思。從去年秋天開始，他心裡可能就一直以爲您對他的感情受到史迪威革職的影響。（我肯定）他對這個問題採取了一個頗有難言之隱的態度。」

爲了要讓馬歇爾安心，魏德邁指出其實是蔣介石在修復他們雙方關係上先走出了第一步，理由是蔣介石曾經私下告訴魏德邁說，他有意邀請馬歇爾訪問中國，但是怕遭到拒絕。蔣介石同時也告訴魏德邁，他在羅斯福去世時曾寫信給馬歇爾致唁，然而沒有得到理會。魏德邁大吃一驚，立即調閱文檔，發現馬歇爾的回覆其實早已送達蔣介石總部，只是未被送呈蔣介石閱覽。蔣介石對這個發現大感尷尬，他居然以此誤解馬歇爾，爲此再三表示歉意[103]。

魏德邁同時也告訴馬歇爾，蔣介石非常感謝馬歇爾建議讓幾位在歐洲戰場戰功顯赫的美軍將領訪問中國。其中一位辛普孫（William H. Simpson, 美軍在歐洲戰場第九軍軍長）將軍，後來在馬歇爾安排下前來中國訪問，受到蔣介石竭盡所能地熱誠歡迎[104]。魏德邁這一類的動作，用意都在拉近馬歇爾和蔣介石之間的距離，消除兩人敵意，也好讓他自己在中國戰區的工作更能順利展開。我們無法從史料上直接衡量蔣介石和馬歇爾兩人內心對對方的感情，但是魏德邁的努力肯定有其成就。因爲魏德邁所扮演的角色和史迪威正好相反。史迪威當然從不曾在蔣介石面前詆毀馬歇爾，但是在馬歇爾面前則不遺餘力地醜化蔣介石。魏德邁正好相反。他在給馬歇爾信件中並沒有刻意替蔣介石抹白，但是卻讓馬歇爾看到一個形象不同的蔣介石。反之，魏德邁推行的改革和與日俱增的美援物資，也使蔣介石看到軍部和馬歇爾善意合作的具體證據。就這樣，雙方原先的敵意肯定逐漸在消失之中。

## 叁、魏德邁改革的內容

究竟魏德邁幫助中國推行了哪些重大改革？前文提到，魏德邁改善中國士兵的伙

10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104 Ibid.

食和一般待遇，也把中國軍隊的後勤部門制度化。但是他上任之初最大的成就，是保證中國的抗戰不致因戰敗(一號作戰)而中斷。這個任務在1944年底完成後，魏德邁終於可以把注意力轉移到，改正中國軍隊長期存在的基本缺點和中國戰區的一般問題上了，而這些正是史迪威無暇或是無心關注的事務。

1945年2月中旬，魏德邁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已經開始以樂觀語調指出工作成績了。由於中美雙方信心已經逐漸恢復，友好氣氛正在加濃。更多優秀的美國官兵來到中國服務，所以在短短三個月之內，作出可觀成果[105]。

## 一、改造中國軍事體制

在魏德邁提議的全部改革方案中，最困難的莫過於對現行軍事體制的改革。所有當代關心中國問題的觀察者都一致批評，中國軍隊數量龐大，戰鬥力低落，並造成國家財政上的一大負擔。史迪威也曾指出這些問題，中國官員(包括蔣介石)和民間對此更是深感痛切。所以看出問題並無需慧眼獨具，美國軍部在這方面對史迪威的讚譽實在有野叟獻曝之嫌。重要的是如何提出解決方案，並將之付諸執行。

魏德邁的解決方案(1945年1月初)是，保持50個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師和日軍作戰，並向美國建議依據這個基數提供裝備，每一個中國師的師部都派一位上校級美國軍官擔任聯絡員，由他指揮60名美國官兵擔任教官負責訓練。由於中國當時已經有27個美國裝備師，因此下一步是裝備9個師，再下一步是裝備14個師。魏德邁不但要完成史迪威控制從印度到雲南交通線的計畫，並且打算在六個月內占領廣州灣海岸線上的港口，打開第二個通往西方的通道[106]。

蔣介石心理和感情上的改變，使得魏德邁推動軍隊改革得以順利進行。1945年初，他終於看到美國對中國態度的轉變，開始相信這是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第一次誠心誠意幫助中國，因此居然改變口吻，承認美國這個國家的立國精神確實比英國和蘇聯崇高，「其立國精神決非如英俄專以侵略統治爲主義也。」[107]蔣介石此一改變可謂驚人。

蔣介石審查魏德邁所提建議，包括如何運用美援物資裝備、如何接受美國訓練和改造(包括青年軍)，他都認爲內容「非常重要」，應該立即付諸實行[108]。值得一提

105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5,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9, MFA.

106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5年1月10日。

107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6日。

108 同上，1945年1月10、13日。

的是，史迪威在過去兩年多的時間裡，也曾夸夸而談軍隊的改革，但始終沒有拿出一套既符合中國國情，而又能讓蔣介石放心的具體方案來。魏德邁提出的方案正是蔣介石歷年來最盼望得到的美國幫助，因此得以順利推動。事實上，1945年1月中旬，蔣介石自己已經變成對中國軍隊缺點批評最嚴厲的人。他在1945年1月16日的日記中寫道：「今日最大之恥辱，乃國軍敗創，紀律廢弛，內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同乞丐，以爲目前之大恥，而爲國際所詬誶者。應以此整頓軍隊，充實兵力，爲雪恥圖強之第一步也。」[109]

這種互信合作關係，說明中國政府在1945年1月底，爲什麼既不討價還價，也不藉故拖延，便欣然同意整改70個中國師，其中36個師用美式配備，30個師由中國自己裝備，其他4個師則來自印度。根據徐永昌將軍記載，中國軍隊當時共有530萬士兵的名額。整頓以後剩下350萬士兵，其中250萬在前線，100萬在後方[110]。雖然這些數字依然太過龐大，但是它們表示蔣介石已經在軍隊改革的路途上向前跨了一大步。

## 二、中國軍隊應該有多少？哪些部隊應該接受整改？

根據魏德邁建議，最先接受整改的部隊應該分成攻擊部隊和防守部隊兩種，而攻擊部隊應該優先接受裝備和訓練。這一點似乎和中國（何應欽）原先在1944年7-8月間所提的建議不謀而合，也或許是從它衍生而來。與此同時，剛成立的青年軍已經開始訓練，而蔣介石也已經挑選出36個師，其他部隊則進行縮編或是裁撤[111]。

蔣介石最果斷而痛苦的措施，或許是對自己親信部隊的整改。2月初，他告誡中央軍將領必須虛心學習美國軍官的眾多優點，包括行動迅速、講求實際、不作表面功夫和能夠接受新觀念等等[112]。蔣介石警告他們，假如不想被美國人看不起，就必須好好向美國人學習。2月底，蔣介石採取措施，撤銷中央軍8個軍級單位的番號。這顯然是一個痛苦決定。與此同時，他卻不得不保留若干既無紀律、也無戰績的地方派系軍隊。這種做法看起來有違整改的公平和效能原則，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認，這是爲了使地方軍隊安心，證明這次整改並不是蔣介石使用障眼法消滅地方部隊，擴充嫡系部隊[113]。而這正是多年來國民政府裁軍計畫難以克服的一個困難。無論計畫在客觀上如何公正合理，都必須在中國的政治軍事現實的土壤上推行。

1945年3月初，當他接到有關衛立煌總部貪污事件的報告時，親自下令將總部解

109 同上，1945年1月16日。
110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5年1月29日。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0、13、18日。
111 《蔣總統事略稿》，1944年1月31日。
112 蔣介石日記，1945年2月7日。
113 同上，1945年2月28日。

散，並精簡總部的下屬單位。何應欽警告他，這樣做會引起嫡系部隊的恐慌，尤其這些部隊剛在緬甸立下戰功，會被批評爲鳥盡弓藏的絕情。蔣介石也承認這樣做的確有後遺症，會使他感到痛苦萬分，但是爲了國家前途，別無其他選擇。蔣介石這次裁撤的作戰有功單位和黃埔學生，比起以往都多，蔣介石堅持這是爲了解決中國問題所必須付出的代價[114]。

依照魏德邁計畫，36個師的整改工作應該在1945年5月份完成，屆時就可以配合美軍登陸部隊進行作戰。但是徐永昌將軍私下承認，有些部隊依然抗拒整改。有些部隊甚至提出威脅，假如它們被指定爲整改對象的話，就會出現「不穩」局面。換句話說，就是可能叛變或是投敵[115]。

與此同時，軍隊的徵兵徵糧工作依舊困難重重。無論重慶政府和美國人之間的合作關係如何改善，軍隊整改工作如果沒有地方實力派軍人的合作或是默認，都將無法推行。而兵源和糧源正是地方勢力手中的兩張王牌。雲南的龍雲就是一個鮮明例子。從1945年1月開始，蔣介石就不得不討好龍雲，請求他把更多的壯丁送到整改單位補充缺額。本來徵兵員額根據中央政府下達的命令辦理即可，但是現在蔣介石卻必須和龍雲進行討價還價，商量具體數目[116]。他得到的回應是，「滇龍跋扈反抗之情日亟矣。」[117]到了3月末，由於談判成果不彰，蔣介石又親自飛往昆明，請求龍雲支持整改工作[118]。不意龍雲的回應卻是侮辱傲慢，甚至重彈要中央軍撤出雲南的老調[119]。蔣介石無功而返。雖然感覺氣憤填膺，但是爲了維持中國脆弱的政治軍事團結局面，只能忍氣吞聲，日記中卻難掩他真實的感想。3月25日他寫道：「自革命黨政以來，從未遇地方當政者之冷酷與跋扈有如此者，夜郎自大，惟有澹然處之，不足在意也。」[120]幾天後又寫道：「滇龍之輕侮冷酷實爲意料所不及。」[121]

一旦整改工作開始進行，魏德邁就答應蔣介石更多的回報，鼓勵蔣介石對整改工作更爲投入。3月底，陸軍總部直屬軍事單位，加上青年軍7個師，都已完成整改，補足缺額。這是當時中國軍隊的一大成就[122]。4月，魏德邁抓住時機，告訴蔣介石說，

114 同上，1945年3月3日。
115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5年2月6日。
116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13日。
117 同上，1944年2月29日。
118 同上，1945年3月24、25日。
119 同上，1945年3月20、24、25、28日。
120 同上，1945年3月25日。
121 同上，1945年3月31日。
122 同上。

假如中國能夠裁撤更多的部隊，美國可以把負責裝備的部隊從35個師增爲50個師[123]。這對於中國而言當然是一個喜訊，但是必須作出相應努力以爲交換條件。魏德邁交叉運用施壓和報償的細膩手法，和史迪威一味迷信壓力的橫蠻作風相比，二者之間實有霄壤之別。5月初，魏德邁又進一步提議把中國全部軍隊整改並重組爲80個師。蔣介石的第一個反應是加以同意，但是三思之後認爲過分極端，恐怕引起嚴重動盪不安，又改變心意。蔣介石認爲，魏德邁代表一個典型的美國人，缺乏耐心，有操之過急之病[124]。然而幾天之後，蔣介石顯然在內心經過了一番掙扎，又仍然接受了魏德邁的計畫，只是作了兩個修改。一是把國軍總數從80個師增加到100- 120個師。二是把完成的期限從1945年12月推延到1946年5月。蔣介石並表示希望由一個中美聯合參謀部門共同擬訂實施計畫和檢驗程序[125]。這一個過程顯示，中美雙方對於整改中國軍隊已經建立共同目標，即使在細節部分有分歧時，也是以協商方式加以克服，而分歧的理由並非出於抵制，而是達到更務實的目的。這可說是同盟國之間應有的合作精神。

不久之後，美國人再度激起中國人的樂觀心情。根據王世杰記錄，6月，美國答應提供39個師的裝備，支持中國軍隊的整改工作。美國軍事和經濟顧問也告訴中國政府說，他們可以改進中國自己兵工廠的生產量，擴大規模到足以裝備另外80個師。如此一來，根據美國估計，中國將可以維持一支有120個師的武力[126]。1945年8月，魏德邁提出新一輪的建議，建立和訓練一支擁有20個突襲隊的特種兵單位，由美國情報組織（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負責監督[127]。

對魏德邁的工作成績，赫爾利在三個月前呈交給杜魯門總統的報告中，已讚不絕口。根據赫爾利評價，魏德邁的優點包括：決定正確、知人善任、執行計畫時迅速而有效，精準運用中美兩國資源，阻止日軍繼續向昆明和重慶進攻。赫爾利還讚揚魏德邁能夠和蔣介石精誠合作，改善兩國參謀人員的工作關係。魏德邁的訓練和整改中國軍隊全都通過蔣介石實施，而且成效顯著[128]。

由於魏德邁向中國政府承諾了具體的獎勵，而且逐一兌現，因此蔣介石的合作意

123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5年4月28日。

124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5日。

125 蔣介石日記，1945年5月9日。

126 王世杰日記，1945年6月17日。

127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128 Message from Ambassador Hurley to President Truman, May 21, 1945,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71, Folder 31, MFA.

願就容易理解了。事實上，魏德邁所作所爲，正是蔣介石從1928年就想要達成的目的，但是在抗戰期間不敢嘗試，擔心會破壞中國國內微妙的政治和軍事均衡。現在魏德邁無疑變成最受歡迎的催化劑，而且他的諾言還真能兌現。徐永昌將軍並非蔣介石的嫡系將領，對中國軍政的諸多弊端經常提出坦誠批評。他此時也開始對局勢感到樂觀。根據徐永昌報導，中國軍隊自1945年春季以來已對日軍主動出擊多次，日軍若不是退守工事，就是放棄陣地[129]。魏德邁自己的觀察也印證了徐永昌評估的正確性。經過多次實地考察之後，魏德邁告訴馬歇爾說，他個人對兩國軍事合作前途深具信心[130]。

總結而言，中美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到了1945年中期，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融洽程度。

## 肆、魏德邁的成績單

到了1945年中期，魏德邁在幾個重要領域裡也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改變。

### 一、指揮權及相關事務

指揮權一直是中美同盟關係中具有爆炸性的衝突點。史迪威想抓權，蔣介石極力抵制。然而到了1945年，蔣介石卻自動願意把指揮權非正式地和美國人分享。他認爲魏德邁領導下的美國人是誠懇幫助中國，不像史迪威時代，美國人總是一心一意想把中國變成傀儡。因此魏德邁可以向馬歇爾（8月1日）報告，他的部下麥克魯爾（Robert B. McClure）將軍，事實上正在指揮40個中國師的兵力[131]。

與此同時，蔣介石和下屬對魏德邁的禮遇，也和他們與史迪威的牴觸情緒形成鮮明對比。蔣介石不但在軍事問題上對魏德邁推心置腹，也在敏感的內政外交政治問題上不時徵求魏德邁意見。最好的例子是蔣介石向魏德邁吐露心聲，道出他和龍雲之間的矛盾（1945年7月30日）。魏德邁的回應恰如其分。他說他理解蔣介石的苦處，會讓昆明美軍提高警覺[132]。但他沒有答應介入中國內政，只能在暗中讓美軍嚴密監視龍雲的異動。

---

129 徐永昌將軍日記，1945年1月份。

130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131 Ibid.

132 蔣介石日記，1945年7月30日。

中美雙方軍事領袖之間這種良性互動，完全不見於史迪威年代。原因是史迪威從不關心蔣介石來自中國內部壓力的感受。至於蔣介石，他不信任史迪威，也和他沒有足夠的交情可以說私心話，甚至怕說出口之後會被史迪威嘲弄，或者落井下石，反過來用來作爲脅迫蔣介石的把柄。

魏德邁在1945年8月初，向馬歇爾作了一份具有高度啓發性的報告。他寫道：

> 在過去幾個月來，委員長和其他的領袖們對我的友善一直在增加，而且有時也讓人感到尷尬。我所採取的行動準則想必也是您在同樣情況下會採取的。那就是，避免和任何中國人發展親密的私人關係，在和他們所有的人交往時，我個人的態度，永遠保持率直和禮貌。委員長經常向我諮詢有關和外國的政治事務，以及中國本國的內政事務。我總是婉轉地告訴他，我在這種情況下，提供的任何意見都沒有官方的認可，純屬私人意見。有些時候，他對我的信任和依賴，幾乎是孩子氣。他面臨的是許多複雜的問題。坦白地說，我認為他在心智上或是專業上，都沒有足夠的素養和經驗去處理它們之中的大部分問題。遺憾的是，他旁邊沒有足夠的有個性或是有能力的人，值得他信賴和委託。我相信他(蔣介石)喜歡赫爾利，但是也清楚後者的毛病——主要的是赫爾利說話太多而且又口不擇言。因此，蔣介石似乎不敢向我們的大使推心置腹。有一次，他剛開始和我談起赫爾利處理共產黨的問題時，我趕忙把話題扯開。他也馬上察覺到我不願意在他眼前評論另外一位美國人。從那次之後，他就再也沒有和我評論過任何其他的美國人。赫爾利隨意說話的習慣，的確是有些讓人尷尬。我真希望能夠坦白地告訴他：「派特，你說得太多了。」赫爾利的形象，和一位我所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相似，那個人就是我的父親，而我從打心底就喜歡他[133]。

從以上報告中可以看出，蔣介石不但主動把許多權力交給魏德邁行使，也徵求他對中國軍事問題的專業意見，更在敏感的國內和國際事務上邀請魏德邁提供建議。在

13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魏德邁筆下，蔣介石並不是史迪威形容的那個居心卑劣而又詭計多端的獨裁者，而是一個能力和眼界有限，但是極願向魏德邁推心置腹的弱國領袖。他希望從魏德邁處得到的協助，正表示美國政府1942年想要在中國獲得影響力目的的達成，也讓中美兩國的軍事同盟和政治夥伴關係更爲順暢發展。不幸的是，在中國取得影響力這個願景並沒有在史迪威時代實現，是因爲史迪威抵達重慶時，就已經帶來自己一整套根深柢固的看法和做法，一味想要作中國人的導師，要求中國人只能俯首服從，而不要發表意見。魏德邁之所以能夠改變情況，則是因爲他以持平心態和成熟感情，從理性基礎上去尋求和中國政府合作的空間及改善合作的技巧。正如本章前面曾經提過的，在整個美國陸軍將領隊伍裡面，具有史迪威特質的將領肯定僅他一人，但是具有魏德邁品質和才幹的將領或許還有許多，而美國政府在一個時期裡，卻偏偏堅信只有史迪威一人可以達成美國的目標，而忽略了自己更大更好的人才庫。這真是無比的歷史諷刺。

## 二、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接觸

在中美兩國交涉的所有問題中，最能激起蔣介石疑懼的莫過於美國希望能和中共直接接觸。美國陸軍(駐延安)觀察組(the U.S. Army Observation Group, Dixie Mission)和史迪威本人，通過秘密管道和中共建立聯繫，便引起國民政府領袖的高度不安。魏德邁到達中國之後，蔣介石的態度不再那麼疑神疑鬼，不再千方百計阻擾美國人和中共的一些往來。早在1944年11月，蔣介石已同意赫爾利訪問陝北延安[134]。1945年6月，魏德邁表示也想去訪問，蔣介石也立即同意[135]。只是幾天以後，魏德邁因爲無法和共產黨就行程達成協議，未能成行[136]。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邀請魏德邁改變行程，到臨近共產黨根據地的中央政府管轄區進行視察。魏德邁事後提交報告，蔣介石對報告內容的詳實豐富大爲激賞[137]。

8月，魏德邁指出，美國人無法分辨國共雙方對製造衝突事件相互指控的真實性時，也向蔣介石提出一個補救辦法，那就是在國共毗鄰地區，讓美國派出少數幹部到國軍每一個師的師部，以便及時報告這些師的駐防地點、活動和部署。與此同時，美國也指望能夠和中共直接談判，在他們的部隊裡作出同樣安排。根據魏德邁的記載，「委員長又一次表示同意此項安排。」[138]雖然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但是這個安排並未成爲

134 蔣介石日記，1944年11月5日。
135 同上，1945年6月10日。
136 同上，1945年6月18日。
137 同上，1945年6月29日。魏德邁視察地區包括陝西、甘肅、綏遠等西北省份。
138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事實。目前尚找不到資料顯示，是美方未向中共協商，抑是中共未予同意。

## 三、一個新而務實的互惠關係

即便兩國關係朝著正面方向發展，魏德邁依然不免偶爾遭遇挫折。一個例子就是中國政府當時正大力鼓吹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喚起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操，建立十個師的青年軍，每個師一萬人。爲了鼓勵青年自動參軍，蔣介石還給予特別待遇。他的號召得到熱烈回應，證明當時社會抗日情緒的高漲。事實上，不久之後，參軍的人數便超過預定編制。在青年軍創辦之初，魏德邁主張不要把這些自願參軍者單獨組成軍隊，而應該把他們分散到由美國負責訓練的各師之中，藉以提高所有這些師的普遍素質，而且應該用對待普通士兵的方法對待學生兵，把他們投入實際戰鬥之中。從軍事效率和社會公平的角度著眼，魏德邁的主張非常有道理。但蔣介石認爲中國社會一向對學生的待遇有別於一般平民，從政治考量，對社會現實讓步。因此，無論魏德邁如何費盡唇舌，始終無法改變蔣介石心意[139]。

但是魏德邁的另一主張卻立即得到蔣介石的認可。1945年中期，有五個在印度受訓的遠征軍師級單位返回中國（番號是第14、22、30、38和50師）。它們是中國當時最精銳的部隊，穿美式制服和皮鞋，攜帶美式槍枝，吃美式伙食，有充足戰鬥經驗並打敗過日本勁敵。這一切都讓他們感到自豪自信，有時也不免頗爲自傲。由於他們在緬甸時的伙食受到特別照顧，因此英國人同意在他們回國後繼續供應同樣標準的伙食六個月。但是魏德邁認爲，這種做法會讓在中國的部隊產生被歧視的感覺，進而影響士氣。因此建議所有軍隊都按照美軍制定的「新伙食」計畫供應。儘管這五個師是蔣介石特別鍾愛的部隊，而且減少伙食也會冒著使他們失望的風險，蔣介石依然立即同意，這五個師應該和其他的師接受同等待遇[140]。

租借法案物資的控制權一直是蔣介石和史迪威糾纏不休的題目。魏德邁不可避免地繼承了這項衝突來源。但是過不了多久，蔣介石得到的印象是，美國不會偷偷把武器交給共產黨或是地方軍隊，而且交給中央政府軍隊的武器式樣會更多，數量會更大，因此非常安心。儘管他還是像以前一樣希望由自己掌握控制權，但不再像以前那麼堅持[141]。史迪威時代，不但武器和物資的來源不可靠，即使是已經運到的部分，史

139 Wedemeyer Letters to CKS, May 5, 1945, in Marshall Papers, Box 90/20. Also: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140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141 蔣介石日記，1945年1月6日。

迪威的分配也採取擠牙膏方式，把大部分物資留下來作爲他最偏愛的施壓法寶。在實際分配時，他更依據個人喜怒行事，結果讓中方毫無事先計畫餘地。魏德邁來了以後態度大有改變，但是蔣介石依然無法達到期望，因爲魏德邁始終堅持（在1945年1月的會議上）保留史迪威時代美方對物資的控制權，所以中國政府一直等到物資實際交給中方之後才有權力處置[142]。

儘管中美雙方對租借法案物資的立場各持己見，執行的氣氛卻比以前大爲改善。魏德邁讓中方有了信心，知道他會秉公處理分配事務，而且全心全意幫助中國，不會對中國的需求漠然無睹，也不會把物資當成要脅和恐嚇中國的撒手鐧。中方當然想得到更大的掌控權，但是由於給予者和接受者之間心態的大幅轉換，和物資大量而又源源不絕運到，中方的不滿情緒大爲降低。換言之，人際關係的改變加上物資數量的增加，有效減少了兩國間有關物資援助的尖銳摩擦。

總體來說，蔣介石和魏德邁之間合作關係的基礎日益穩固。最顯著的證據是，蔣介石在日記中不再出現情緒爆裂的言辭。不但對魏德邁如此，對中美關係的大局也是如此。一旦雙方都能撇開情緒而以積極正面的精神相互來往，意見相左的情況縱使仍然出現，然而雙方都不再把這些現象看成鬥氣和爭面子，改用理性和禮貌的方式來解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魏德邁來華之後中美關係的發展，給了蔣介石一個機會，重新喚起他在史迪威時代長期積壓心頭的改革願望，並進一步提升了他實現這個願望的熱情。蔣介石上一次全心全意信賴外國人幫助他促進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是在德國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法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將軍擔任顧問的年代。比起這幾位德國顧問，魏德邁具有三個決定性的優勢。第一，在希特勒上臺後，中德關係日趨緊張，衝突時起。而中美之間卻一直是同盟國關係。第二，德國顧問團規模小，能夠涵蓋的軍事範圍有限，但魏德邁團隊非常龐大，少則數百人，多則數千人。有各式各樣的軍事專家。因此，影響力自然要大得多。第三，德國對中國的軍火供應是純商業行爲，而魏德邁掌控的租借法案物資援華工作，不但規模宏大，而且不斷擴張。難怪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得以獲得新的生機。

## 伍、日本投降前夕的中國戰區

太平洋戰爭末期，中國戰區的軍事情況究竟如何？魏德邁又如何展望中國的未

142 同上，1945年1月13、14、20日。

來？

魏德邁在1945年8月1日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信心十足地說：

> 在整個中國戰區中，我們目前正在執行的是進取性的防守。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點都對敵人加壓力，但是同時也謹慎地不要留下漏洞去妨礙Carbonado戰役（攻打廣東沿海地區作戰計畫）的準備工作。我已經下了命令去壓迫敵人後退，但是也要避免大規模的陸空戰事。我們已經達到了Carbonado戰役的前期目標的這個事實，即占領南寧－柳州－桂林等地，已經讓人們大受鼓舞。再往前看，我們非常有信心可以直接向沿海地區挺進。我們急於建立海上交通線……去占領廣州－香港地區……可能指向汕頭、福州、溫州、廈門等地。在9月裡，大概會有20個完成裝備和訓練的師可以投入攻勢之中。由於時間的限制，這些師的狀況可能比不上在印度受訓的中國師，但是士兵們將會有豐富的伙食，不斷供應的軍火器材，而且受傷的官兵將會受到恰當的撤退。這些因素能夠影響任何人的士氣，但是特別是中國士兵，因為他們在過去一直被忽視和虧待[143]。

當然，由於魏德邁寫信之後不到一周，戰爭就宣告結束，因此他對於中國軍隊的雄心未能付諸實現。

魏德邁眼中中國戰區在全球戰局裡所占的地位，一直是引人注意的題目。他在剛到中國上任的頭兩個月裡，就已經就遠東未來應該採取的戰略，和中國戰區在爭取對日戰爭最後勝利中應該扮演的角色，發展出一套和史迪威截然不同的看法，他1945年2月告訴馬歇爾說：

> 在遠東的作戰應該動用海陸空三軍，直指日本群島。在今後幾個月中，我們應該避免在中國內陸大量消耗美國陸軍兵力的戰事。假如我們運用上述的戰略依然不能擊敗日本，而且日本又顯然下決心要在亞洲大陸和同盟國決一死戰的話，到了那時，我們還是可以在中國動用

143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 陸空聯合作戰的方式，將日本的最後抵抗力加以摧毀。最合理的辦法，是集結我們的主力，去占領那些愈來愈靠近日本本土的海空軍基地(在太平洋戰場)，其他可以輔助這個目標的作戰也應該展開。在這些輔助戰爭中，中國沿海地區的作戰就可以切斷敵人的運輸線，而在沿海的陸空或是兩棲作戰，就可以配合中國戰區本身的陸空作戰。以上是我對作戰的一個簡潔的說明[144]。

在魏德邁這個戰略宏觀計畫裡，沒有提到要從中國向日本進行大規模的地面反攻，而即使在中國發動沿海作戰，目的也只在輔助太平洋區的主要作戰。他根本沒有提到史迪威一再強調的共產黨軍隊和其華北占領區。

4月，魏德邁再度寫信給馬歇爾討論太平洋作戰。此時，尼米茲海軍上將和麥克阿瑟陸軍上將似乎一致認爲，美國應該環繞日本本土在東亞發動一連串輔助性的攻擊行爲，但是魏德邁主張在太平洋發動大規模而且有持續性的攻擊，直接指向日本本土[145]。魏德邁的主張等於是放棄以前馬歇爾和史迪威對於中國戰區採取的立場。換言之，在魏德邁的認知裡，他在中國戰區的工作，與其說是爲了打敗日本而作出貢獻，不如說是爲中國自己建立一個強大的軍隊而盡心竭慮。在這個意義上來說，魏德邁的看法實在頗具前瞻性。

或許正因爲魏德邁有這種看法，所以他十分擔心中國手中的時間有限。儘管中國正在作出戲劇性的改進，魏德邁仍有一種不祥預感。8月1日他在給馬歇爾的信中，假設戰爭突然停止，中國可能遭遇的境況：

> 我們正在努力地在為日本的屈服而作出各種可能性的準備：突然來到的和平，或是再打幾個月，或是長期作戰。坦白地說，假如和平在今後幾周內突然來到的話，我們在中國將措手不及。就美國(在華機構)而言，我們可以處理自己的人事和財產權益，但是由於我們許多活動都和中方緊密關聯，因此一旦和平突然來臨的話，後果將是一片混亂和失序。針對復員，防止傳染病流行，恢復公共事業(水電等)，建立

144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February 16, 1945, in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19, MFA.

145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pril 13,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0, MFA.

> 平衡經濟，和遷移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工作等等，中國政府都沒有擬出計畫……我曾經向委員長強調必須事先對上述的問題作出計畫，而他也已經向各部下達命令。但是我對結果並不樂觀……[146]。

本章在一開始就曾提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那就是，史迪威的離開中國，到底應該遵循學術界的傳統觀點，把它視爲戰時美國對華政策破碎的標誌？抑是採取一個新觀點，把它視爲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本章所提供的史料充分顯示，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非常明顯：魏德邁在華的短短十個月，絕非中美同盟關係的尾聲而可以一筆帶過，反而是一個新的契機，應該得到高度重視。本章內容顯示，在魏德邁領導之下，美國溫和的說服力、堅定的領導力、豐富的財力物力，和不張聲勢的壓力，都達到了高效率的結合運用，使得美國發揮了一個盟邦可以指望的最大作用。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終於建立了對美國的信心，認識到美方的意見和物資對於提高中國國力的價值，因此給予充分合作和信賴。如果中美同盟關係在更早時間，就能夠在這個穩固的基礎上展開，那麼中國在抗日戰爭裡或許可能作出更大的貢獻，也或許能幫助中國領袖對和平的到來作出更好的準備。不幸的是，日本投降來得比人們所預期的要快得多，魏德邁最擔心的結局終於發生，蔣介石和他的政府在極端艱苦條件下，撐過了八年抗戰，卻完全沒有辦法承受勝利所帶來的結構性的挑戰。

146 Wedemeyer letter to Marshall, August 1, 1945. Marshall Personal Papers, Box 90, Folder 21, MFA.

# 第十三章
# 結論

在一般論著中，結論一章通常篇幅都比較短，其功能是把書中已經闡述過的資料和分析，提綱挈領地予以總結或是重點地加以發揮即可。但是本書的結論章卻反而較長。原因是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是兩國歷史上重要的事件，不但影響了當時世界大戰的局勢，而且對兩國關係此後的發展產生了長遠影響，應該受到高度關注。學術界過去多年來對於這段歷史，不但曾經提出過各種不同的敘述，而且衍生出許多深具影響力的剖析和推論。這些史學界累積的成果到目前已經深植人心，成爲學術界的主流思想。由於它們所涵蓋的範圍都和本書的內容有密切相關，因此本書作者感到必須在本書所使用到的資料基礎上，對它們所持的立場和申論提出作者個人的評價和回應，讓讀者們能夠對這段歷史產生一些新的思考。這就難免增加了篇幅的長度。

在正常情況下，多數國家締結戰時同盟關係的主要動機，是爲了結合多國力量，增加戰勝機率。這個動機當然也是導致中美同盟關係的根本原因。在本書結束前，我們可以從三方面來評價同盟關係的得失：一是它如何幫助兩國達到戰爭勝利的目的；二是它在走向勝利的路途中，如何處理同盟關係內部的問題；三是對同盟關係的一些重點性問題提出總結。

## 第一部　贏得戰爭

### 壹、同盟國的凝聚力

中美同盟的最高目標是能在最短期間內，以最經濟方式戰勝日本。這個目標凌駕於其他一切目標之上。

儘管中英美三國官方宣傳，都習慣性地把這場戰爭形容成是民主對獨裁的抗爭，

事實情況卻遠比這種說法更加複雜。「獨裁」確實是形容軸心國的恰當字眼，但以「民主」形容另一陣營卻未必合適。美國誠然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發達的國家，但是其國內黑人和印第安人並非受益者。英國在英倫三島高度崇尚民主價值，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區卻是最具掠奪性的帝國主義國家，被許多地區人民痛恨入骨。雖然英美兩國楬櫫看似莊嚴神聖的「大西洋公約」，藉以喚起歐洲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爭取政治自由和民族解放，但是它們同時堅決拒絕簽署亞洲殖民地人民廣泛祈求的「太平洋公約」。這種僞善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至於說到蘇聯，它內政的兇暴殘忍，和最壞的法西斯國家並無二致。

最後說到中國，尤其難於界定。它既不是典型的東方式專制國家(oriental despotism)，也不是法西斯主義國家(雖然有些人喜歡套用這個名詞形容它)，更遠遠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基本上，它是一個落後的亞洲國家，徒具一黨專政之名而無其實，也不具備一個現代國家應有的組織、效率和紀律。如同在本書一開始所說的，中國的政府結構依然保留許多帝制時代遺跡，它的經濟主軸是農業，它的政府軍隊雖然在保家衛國的工作上不能勝任，但是堅決拒絕向日本侵略者屈服。

因此，這四個國家結合在一起，它們唯一的共同利益只是堅決反對軸心國的侵略和統治而已。

## 貳、中美同盟的特性

### 一、同盟關係對於兩個國家不同的意義

從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的中美同盟關係，對於中國而言意義極爲重大，而對於美國也有相當大的重要性。

對於中國而言，同盟國是中國在整個民族歷史經驗中，首度和西方國家建立實質性的軍事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戰不能算在內)。在此之前，中國已經單獨和日本作戰了四年之久。無論從國家統一的程度、社會的凝聚力、工業的生產力、軍事科技和戰鬥能力，或其他相關角度加以考慮，這場戰爭的雙方實力懸殊，日本有一切的理由相信三個月內可以摧毀中國的抵抗，它唯一犯的錯誤，是嚴重低估中國人民抵抗外侮的堅韌意志，而這個意志的支撐力則是中國近代萌芽的民族主義。

正因爲中國領袖深知本身的軍事弱點和國力淺薄，因此他們首先想到的對策就是，集中全國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和力量，企圖在上海給予日本一記迎頭重擊，使日本知難而退。一旦這個計謀失敗，中國花了十年寶貴光陰(1928-1937)累積起來的軍事

資本也消耗殆盡，面對中國領袖的難題是今後如何把抗戰繼續下去。這就是爲什麼中國政府會提出「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觀念。也就是說，運用中國遼闊的疆土，延遲日軍侵入內地的速度。但是這樣的戰略到底能夠達成什麼結果？關於這一個問題，胡適的答案非常簡單：「苦撐待變。」對不同的人而言，「變」可以有不同含義，「變」如何產生也有不同可能性。它可能是日本內部文官和軍人之間，因爲戰爭漫無止境而發生分裂，可能是日本人民厭戰心理高漲，也可能是日本經濟無法承擔戰爭的費用，或是人民生活程度的降低，使政府相信這場戰爭根本得不償失。當然，也有可能是激起了某種程度上的國際干涉，或許更可能的是國際調停，但未必是對中國的直接軍事援助。

簡而言之，在珍珠港事變以前，沒有一位中國領袖曾經奢望以中國自身的力量單獨擊敗日本。對於中國而言，能夠「撐」已經是一個奇蹟了。但是就「變」而言，也沒有一位領袖期望西方國家拔刀相助，甚至幫助中國打敗日本。事實上，就在這段時間裡，還有西方國家或明或暗地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向日本妥協。因此，在這個階段，當中國政府領袖們忍不住要使用「戰勝」或是「打敗」日本等語詞時，他們的意思是讓日本的侵略無法得逞知難而退，而不是把日本軍隊擊潰趕回老家去。如果指的是後者的話，那就是癡人說夢。

基於以上考慮，19世紀中葉以來飽受帝國主義凌辱和侵犯的中國，能夠和美國結爲盟邦，這是中國所作的最重要政治和軍事行動。這個同盟關係不但讓中國避免了軍事潰敗和政治屈服，也避免了經濟和文化的破產。最後，它更爲中國贏得了一場遠非本國能力所能奢望的勝利。

由於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中國撐得夠久，因此得到的回報大大超過中國領袖所能想像。參加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聯盟，使中國的國際地位陡然從一個半殖民地上升成爲世界四強之一，進而對戰後世界的發展取得了發言權。這一切都是在短短四年中發生的變化。誠然，中國本身已爲戰爭作了慘重犧牲，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珍珠港事變，一夜之間改變了中國的命運，而只有中美同盟關係才能使這一切的正面結果成爲可能。

對美國而言，這個結盟的意義也至爲重要。自從1890年代它變成太平洋強國以後，在美國的外交、商務和戰略意識中，一直把日本放在亞洲的中心位置。事實上，在中日戰爭的四年期間(1937-1941)，美國的政策是一貫拒絕中國的任何拉攏。只有在日本直接攻擊美國之後，中美聯盟才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然而就像莊穆將軍任命過程所顯示，美國領袖早在正式提出歐洲優先的全球戰略之前，已經決定把中國戰場當

成一個次要戰場。

即便如此，中美同盟關係也讓美國獲得實質利益。當我們比較美國對中國所作投資和收益時，就顯得特別明顯。正是因爲中國抗戰，美國可以從容執行它的重歐輕亞戰略，直到戰勝德國爲止。無論中國的戰鬥效率如何低劣，設若中國抗戰早就終止，美國實行其全球戰略的能力將會大受限制。設若日本獲得中國的自然資源，又建立了一條亞洲大陸的交通線，它的戰略選擇彈性和作戰能力就將大幅度提升。比如說，它可以利用內陸的鐵路公路線，把南洋戰略物資安全運到日本本土，既可以遠離美國的空中攔截，又可以避免英美海軍的騷擾。設若日本可以把將近一百萬士兵調離亞洲大陸，它就有機會把英國勢力趕出印度，甚至和軸心國在中亞會師。另外一個可能性是，它能夠讓日本更有力量從西伯利亞攻打蘇聯。設若蘇聯被迫同時對日本和德國作戰，它就不可能在歐洲東戰場綁住大量德國部隊，而後者對於消滅英國的力量就可能會大幅增加，而稍後英美兩國在開闢歐洲第二戰場時必然會承受更大傷亡。最後，設若中國不再繼續抗戰，那麼日本在太平洋地區對美國的威脅就將大大增加。可能的結果之一是幫助日本有效動員其海空軍，在太平洋地區攻擊美國據點，或是向澳大利亞推進。結果之二是對阿拉斯加進行攻擊，逼使美國從歐洲撤回更多的陸空軍，防衛國土的西疆。

簡言之，儘管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低落，無法單獨把日軍趕回本土，但是如果中國置身在同盟國之外，那肯定會對美國的戰略選擇產生重大影響，使美國自己的對日戰爭變得難以預測，而付出的人命代價變得更大。因此，從這幾層意義而言，美國從中美同盟關係中得到的收穫也極爲可觀。

因此，在中美同盟關係中，雙方都得到利益。如果美國方面有人自認是施捨者而中國是受惠者，那就是荒唐至極的想法。沉醉在這個想法裡，只能讓美國人帶著扭曲的心態處理盟邦之間的關係。赤裸裸的事實是，美國幫助中國就是幫助自己。對於這一點，羅斯福似乎看得很清楚，但是某些軍方領袖就顯得體會不足。

## 二、兩國之間不同的心態與運作方式

儘管兩個國家都從同盟關係中得到好處，但是它們同時也對這個關係相當失望，以致摩擦迭起。誠然，即便是在最理想的環境下，盟邦之間產生摩擦，原本是正常現象。但是中美同盟關係所遭遇的，卻是連綿不斷的爭議和衝突，其頻率之高和程度之強烈都異乎尋常。

這種現象最明顯的解釋就是，雙方國力和文化差距實在太大。在四個盟邦之中，中國和美國的國力和性向大概距離最遠。美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也是最發達的

「西方」國家，工業化的程度最爲先進，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國家高度統一，法制健全，而且全國同心協力支持反軸心國戰爭。一旦美國決定國家總目標後，就能動員高度有效的行政機器，制訂戰略和戰術，把資源注入軍火生產流程，製造世界最先進和威力最強大的武器，最後啓動指揮控制機制，把美國集體的威力發揮出去，把敵人打得無法招架。

中國的情形完全相反。它是四個同盟國中唯一非白人國家，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都與其他三個國家大不相同。因此，美國和中國對打敗日本的問題發展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利益，乃至不同的時間進度表，本是可以預料之事，無需感到詫異。從全球戰略著眼，美國人認爲先打敗德國然後攻擊日本是天經地義；理由很簡單，德國對同盟國的威脅大過日本。在這個戰爭過程中，美國指望中國的至少是繼續抗戰，如果中國可以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參加最後向日本本土的攻擊，那是最理想不過。總結來說，美國對於中國這個盟邦價值的衡量，著眼於它廣大的人口、地理位置、作戰潛力和其他效能。

至於中國本身，過去四年單獨對日抗戰，損失奇慘，既然有了新戰友加入，自然希望戰爭能夠因此而早日結束。就這個意義來說，蔣介石極力想要說服美國採取的全球戰略，要嘛是亞洲優先，要嘛是歐亞並重，絕不會主張歐洲優先，這實在不難理解。他是中國領袖，當然有義務盡一切努力，減少或是縮短中國人民的苦難。但是蔣介石心裡也很明白，一旦美國採取歐洲優先的戰略，他也無能爲力。他不能接受的是，美國的政策不僅是歐洲優先，而且把中國排擠在同盟國最高軍事會議之外，對租借法案物資分配吝嗇不公，還想奪走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蔣介石原來指望從同盟國得到的好處，不但遲遲未能兌現，反而要忍受不公正又不平等的待遇，憤恨之至。中國在過去單獨作戰的歲月裡，心態只是以能「撐」爲滿足。一旦加入同盟國之後，不免就想參與同盟國事務並且亟思有所作爲。如果中國的處境比單獨作戰時並不見顯著好轉，那種失望之情可以想見。這是中國和美國不斷摩擦的根本原因。

兩個盟邦之間還有態度不同的問題。對美國而言，中美同盟關係只是全球眾多盟友關係中的一環，但對中國而言，卻是中國最重要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同盟關係。中國寧可依賴美國作爲中介人處理對英以及對蘇關係，而不願和它們進行直接接觸。要想知道中美兩國對同盟關係的輕視或是重視，只要看兩國的領袖如何處理同盟關係中最重要的兩個領域就可以了。這兩個領域是政治關係和軍事關係。

在中國方面，對美關係中的政治和軍事部分，完全由蔣介石乾綱獨斷，他從最大的軍國大計管到最小的運作細節，而且經常不和幕僚商量就逕自定奪。如前文所述，

能夠和蔣介石深入討論中美關係的幕僚，數目不會超過半打。他們只是在被徵詢時才有機會發言，不能主動提出自己對美國政策的主張，更不能主動從事外交活動。有兩個例子說明，一旦逾越這個分寸，後果就非常糟糕。第一個是1943年5月蔣夫人和羅斯福私下交易，第二個是1943年10月宋子文試圖把史迪威趕出中國。蔣夫人受到警告，立即停止和羅斯福的交易，宋子文則被直接打入冷宮。在整個中美同盟關係年代裡，蔣介石親自作出中國的每一個決定和行動。中美關係一直是他獨攬的領域，他和美國人會談，作出決策，甚至親自起草和美國領袖們來往的電文。事實上，他這種做法使得當時的駐美大使(胡適、魏道明)或是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國楨)，都感到自己是局外人，對當前的中美關係形勢並不了解。至於這種操作方式的利弊，在本書前文已經申述過(第八章第叁-一)，此處不再重複。

美國處理對華政策的作風則大不一樣。珍珠港事變之前，美國的傳統做法是遵照聯邦政府的分工制度，軍部(國防部)、國務院(外交部)和財政部各司其職，最後必要時才由總統裁決定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軍部在美國對華政策的各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國務院基本上被擠到後臺。這並不是因爲國務院領袖對中國事務缺乏主見，而是因爲白宮忽視他們的意見，甚至否決他們主動提出的建議。

就實際情況而言，美國軍方很快成爲主導美國對華政軍政策的部門。一般情況是，史迪威是軍部有關中國訊息的唯一來源。中國的需要和中國的問題全由史迪威陳述，史迪威有權挑選他想和中國人商談的議題，有權當場作出決定，也有權決定和中國人交往的基調。當然，他也讓中國人知道，他有權替美國政府發言。

史迪威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力之大，還有另外三個原因。一是馬歇爾絕對信任史迪威報告內容的準確性、分析的合理性和建議的可行性。換言之，馬歇爾把這些報告當成自己的產物而予以運用。二是參謀長聯席會在有關中國問題上，願意順從陸軍參謀長的意見，再以集體名義向羅斯福轉呈，讓美國總統誤以爲它們是最高軍事領袖深思熟慮的成果。三是戰時美國總統的時間和精力已經大幅透支，無法顧及中國事務，既然參謀長聯席會已經作出集體建議，他就大可放心在文件上簽名，作爲正式外交文件發出，而無需仔細研讀其內容。這幾個因素的結合，使得史迪威在1942-1944年之間，成爲美國對華政策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任何討論中美戰時聯盟關係的歷史，都不能忽略這個根本事實。換言之，中國的對美政策一律是在最高層次(蔣介石)決定，而美國的對華政策，相當一部分是在軍部或是史迪威的層次決定。

兩國國力懸殊，照理說美國應該享有主導優勢。不管想實行何種政策，都可以叫中國照單全收。中國經濟落後，軍隊虛弱，武器破舊，唯一可以贏得戰爭的機會，就

是接受美國領導並和美國通力合作。1941年12月，沒有一位中國的領袖膽敢想像，世間還有什麼事情能夠比得到美國作爲盟邦更讓他們心滿意足了。

純從理論來說，美國有足夠的彈性可以決定如何運用中美同盟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這也是美國決定把中國摒除於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門外的動機，因爲既然美國有信心可以指使中國依照它的意志行事，那麼就沒有必要和中國在聯席會中去「商量」了。照理說，美國的最低願望是維持中國現狀，不淪爲日本傀儡，借此阻止日本軍火工業利用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根據這個思路，美國對中國只需要加以「善意地忽視」(benign neglect)，就可以長期保持遠東現狀，換取時間去應付世界其他地區更迫切的問題。蔣介石在過去四年中已經多次拒絕日本談和的試探，足以證明美國「善意地忽視」的策略是可以達到其目的。用不著多說，中國領袖肯定會抱怨被忽視，但是他們除此之外還能做什麼？赤裸裸的現實是，蔣介石手中完全沒有籌碼可以逼迫美國做違反自己心願的事。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軍部最合算的選擇是只需成立一個規模擴大的美軍顧問團，在中國戰區工作，而無需另外派一個高規格的軍事團體前往，更不需要派一位三星中將親臨中國戰區指揮軍事。換言之，這是美國以最低代價換取可以接受的結果的一種方法。

## 三、同盟關係的成果

如果從最低要求的角度看中美軍事合作關係，那麼它的成績確實斐然。儘管產生了許多摩擦，這個同盟關係最終還是達到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擊敗日本。

就中國而言，同盟關係帶來的好處遠超過它最大的夢想。珍珠港事變前，中國最大的願望是恢復到1931年9月18日以前的局面，從來就沒有夢想過擊敗日本，更沒有奢望過一舉而把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全盤趕出中國。對於一個每天都在爲生存而掙扎的亞洲弱小國家而言，它根本沒有資格規劃日本戰敗後亞洲未來的局面，甚至沒有力量要求歸還臺灣和澎湖，更何況希望參與規劃新的世界秩序了。中國所以能夠把這些題目當作國家目標，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國參加了中美同盟。

簡而言之，中國從中美同盟關係中獲得的利益，遠超過幾代中國領袖們的想像，那就是把日本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勢力從中國徹底清除出去，甚至在未來把日本變成一個不容許武裝的鄰國。同時收復臺灣、澎湖和東三省，使中國的疆土大致恢復到滿清時代的最大邊界。其他的好處也讓中國振奮異常：成爲世界四強之一，成爲聯合國創始國，以及大幅提升國際聲譽。當我們把這些成果放在一起，中國參加同盟國，可說是其領袖自明清兩朝以來處理對外關係遭遇的最好機緣，以及所作出的最明智決定。

就美國而言，與中國的結盟也有積極意義。雖然它的歐洲優先戰略降低了日本的地位，但是中國能夠牽制日本的作用依然有其重要性。儘管中國軍隊無力進攻日本，但是它的抗戰卻把大量日軍拖在亞洲大陸，使其無法實現軸心國1940年9月期望的政治合作和軍事會師。中國作爲盟邦，不管軍事效率如何低劣，至少可以讓美國的全球戰略獲得機會，按照本身的進度表進行，先擊敗德國，再收拾日本。而爲了得到這些收穫，美國在中國戰區所作出的投資，比起全球其他戰場可謂微不足道。1942年到1943年兩年之中，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占美國租借法案總支出僅約千分之四左右（0.4%），每個月輸入中國的物資數量，少則一、兩百噸，多則不過幾千噸，相當於一個美國步兵師每個月戰鬥所需的極小部分。更何況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從未向廣大的中國戰區派遣過一個作戰師。

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援助物資交付中國，美國爭取到幾年時間，從容準備它對日本的全力進攻。像前文所述，即使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美國仍能利用中國軍隊綁住一大批訓練有素的日本士兵，使之同時陷於中國和緬甸兩個戰場，從而大大減少美軍在太平洋島嶼和其他地區的傷亡，並加速對日本本土的致命打擊。除了在軍事上使用中國兵力綁住了大批日軍之外，美國政府還運用外交手法獲得第三重保險，那就是背著中國把後者的國家利益去交換蘇聯對日本宣戰的承諾（雅爾達密約）。就憑這三記妙招，美國把整個亞洲大陸上的軍事威脅幾乎完全擺平了。撇開道德問題不談，僅就其戰略和政略的運用而言，美國政府的智慧（狡黠）表現實在不得不令人感嘆。

最後結局是，美國的勝利來自原子彈和B-29重轟炸機，而不是過去三年期望的地面總反攻。由於美國自珍珠港事變以來就決定賦予中國戰區較低的優先地位，因此這個戰略可以說運用得相當巧妙，而且成果豐碩；它得到的回報遠遠超過人員和物資的投資。

總而言之，本書的研究結果顯示，我們對於戰時中美同盟關係的評價，完全不需要像某些著作所說的那麼負面。假如同盟關係的唯一目的只是戰勝日本，那麼中美兩國都達成了各自的願望。兩個國家的收穫，都比沒有同盟關係時要超過許多。在這個狹義的領域裡，中美兩國在戰後關係和遠東局勢的雙重惡化都不應該改變這個歷史的評價。

## 第二部　處理同盟關係

如果從處理同盟內部關係的角度評價中美同盟，就必須承認它是災難重重的同

盟關係。又如果美國的目標是大幅提升中國的戰鬥力，則美國的成果離開目標就更遠了。此前，史學界對整個同盟關係的評價非常明確：美國曾竭盡一切力量幫助中國達成這個目標，所以失敗的根源在中國[1]。然而，本書收集的材料，不但讓我們對戰時歷史的許多事實和它們的後果重新評估，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索中美同盟關係中困難發生的深層原因。本書前文的敘述和分析，應該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這個同盟關係，也應該有助於我們對關係緊張的原因，提出更合邏輯而且有史實根據的解釋。

因此在本書結束之前，應該討論以下問題：爲什麼兩個盟邦的大目標有共同點也有分歧點？它們各自如何看待對方？有沒有先入之見或是預先假設？它們自己的動機又是什麼？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它們之間互動的方式和實質？

## 壹、政策目標

### 一、美國的目標

美國對中國的目標，以珍珠港事變爲轉捩點，前後差別甚大。珍珠港事變前，美國政府從來不曾發展出一個有系統的對華政策。儘管它經常彈「門戶開放」原則的老調，但是從來沒有意願將之付諸實行。即使1941年11月珍珠港事變前夕，當美國軍方領袖預測中國即將崩潰時，美國政府也沒打算採取任何具體手段維護「門戶開放」原則[2]。

一旦美日開戰，許多美國領袖突然提出各種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張。國務卿赫爾戰後的總結回顧當時寫道：「對於中國，我們有兩個目標。第一個是共同作戰。第二個是承認並幫助中國成爲強國，在戰時和戰後都和其他三個西方強大的盟邦——蘇聯、英國和美國——享有平等地位。目的是爲了籌備成立戰後的國際組織，和建立東方地區的穩定和繁榮。」[3]赫爾的說法非常簡潔，總括他和國務院同事對戰時美國對華政策的看法[4]，但是這並不表示聯邦政府其他部門的思路同樣清楚，或是接受這些

1 例如國務院發行的白皮書，軍部發行的有關史迪威和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的官方歷史(三冊)，以及塔克曼女士的著作。

2 Their memorandum of November 5, 1941 as cited in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0-1950*, p. 23.

3 Cordell Hull,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 Macmillan Co., 1948), II, 1583.

4 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Hearing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82nd Congress, first and second sessions, 1951-1952, p. 2839.

看法，更不表示這些部門忠實執行了國務院認爲合理的對華政策。

白宮就是明顯例子，它的對華態度經常前後矛盾和曖昧不清。羅斯福誠然高瞻遠矚，對中國深具好感。從長遠來說，他希望中國變成強國，但是希望中國是一個緊跟著美國的強國。事實上，中國戰時領袖對這一點也可以欣然接受。但是處理中美關係日常事務時，羅斯福經常善變，而又漫不經心。在和蔣介石交往的過程中，他的態度可以從最溫文有禮立即轉變成漠然無情，再變成張牙舞爪。雖然在某些美國官員心中，羅斯福內心對中國擁有特別溫情，比如，他對自己家族以往在中國經商的經驗總是津津樂道，同時又對「四億中國人」表示親切，但是在他身邊工作並留下歷史記錄的親信，卻無法說清楚他內心深處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到底是什麼。假如羅斯福曾經有過一個有系統的對華政策，他肯定不曾遵循這個政策處理中美關係中的日常事務。

誠然，羅斯福的幾位代表(居里、華萊士)曾經表示美國希望國民政府擴大政權基礎、提高行政效率、保證官員清廉，乃至努力練兵打仗。但是沒有一個人曾經和蔣介石作過深度和坦誠的交談，說明美國要如何和中國共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

最重要的是，美國軍方和它在中國的最高代表，既不贊成總統想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意見，也不想在幫助中國繼續抗戰之外作出更多的努力。換句話說，對於軍方而言，中國能夠留在對日戰場上，就已經達到它的基本要求，不必多花心血，也不必多耗費美國物資。至於國務院，儘管它對美國對華政策能夠說得頭頭是道，軍部領袖對中國戰區既有自己主意，也有自己的做法，不勞國務院費神。

## 二、中國的目標

相對而言，中國對美國的政策目標和它1937年以來的外交總目標完全一致，那就是爭取外國借款支持經濟，以及取得外國軍火抵抗日本。從1937到1941年爲止，中國政府爲了達到這些目的，先後試探過英國、蘇聯、德國、意大利、法國和美國，但是只從德國和蘇聯得到過有意義的幫助。

珍珠港事變爆發後，中國人自然期望美國改變態度，提供大量援助。他們的目標包括陸軍裝備和訓練，計畫初期是30個師，不久增加到90個師，最後增加到120個師。計畫還包括建立空軍，爭取更多的借款和租借法案物資，修築緬甸公路，開展駝峰空運，協助中國戰後大規模復員和重建。但是在同盟關係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對美國援助的吝嗇一直不滿，而自己也沒作出足夠的努力改進國軍戰鬥力，或是增加對建立戰後世界秩序的影響力。

## 貳、觀感與假設

### 一、美國軍部的基本方針——小幅投資，大幅收成

正如本書在第二章提到的，美國軍部對中國戰區的重要性(或不重要性)，在珍珠港事變後頭幾天內就已經作出評估。這個評估進而爲美國可以追尋的目標定出基調。

然而，儘管軍部只願意把少量的援助品分配給中國，但卻希望在中國追求雄心萬丈的目標。首先，它想要利用中國的地理位置和遼闊地域，建立一大批空軍基地，打擊日軍在中國沿海的補給線，從而空襲日本本土。其次，它想利用中國豐富的人力資源，對日本在亞洲大陸的軍隊進行積極反攻，進而攻擊日本本土。爲了達到這兩個目標，軍部認爲中國必須建立強大陸軍，保護這些空軍基地。但是要達到這兩個目標的途徑，並不是經由美國增加援助，而是由美國人加以開導，把中國本身已經擁有的自然和人力資源，發揮出更大的效用。

### 二、尋找一個合理策略的理論基礎：史迪威的利益交換原則(*quid pro quo*)

如同第二章所述，許多美國領袖在同盟關係一開始就相信，增加中國對戰爭貢獻的最好方法，就是彼此之間建立分工，美國出「將」，中國出「兵」。他們幾乎一致認爲，美國的要求完全合理，既會得到中國領袖的歡迎，也會得到中國官兵的擁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沒有任何一位美國領袖對這個想法產生過任何疑慮。美國領袖們沒有人曾經提出警告，中國人有可能會把美國的要求，看成對中國國家榮譽的打擊和對蔣介石個人尊嚴的侮辱，更不用說是對中國軍事政治的顛覆。對這個現象的合理解釋是，美國領袖下意識地根據他們和菲律賓人相處的經驗，以爲中國人既然同是亞洲人，美國人便可以用同樣方法來對待。假如這個揣測果真成立，那就是莫大不幸。中國人和菲律賓人的歷史截然不同，處境也大不相同。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經驗，跟當時東南亞其他殖民地區比較起來，確實開明而大方，而菲律賓的民族主義也尚處於萌芽階段。

相對而言，中國人儘管在辦事效率方面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甚或落後於菲律賓，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早已如火如荼，普及民間。由於這種不尋常的歷史背景，中國民族主義者，對任何外國想統治中國的意圖，或是民族和種族優越感的表現，反應都非常激烈。對所有西方國家都是憤恨不已。唯有對美國人似乎是一個例外。美國享有中國人民的好感，道理很簡單。美國在近代歷史上表現得最友好，明顯的侵略行

爲殊少。假如美國不能珍惜中國人這種心理和感情上的好感，就很容易叫中國人得到一個結論，所有西方人都是一丘之貉。當莊穆將軍試圖讓美國政府思考到底如何幫助中國，而被軍部領袖拒絕時，就已夠令人遺憾。到史迪威讓中國人相信他並不關懷中國需要，只一心想抓中國兵權時，事態就變得十二萬分嚴重了。

美國領袖認爲中國一定會柔順地接受他們的要求，這個想法本身便間接說明，他們爲什麼不用心尋找如何鼓勵中國人作出最大努力的好方法。在美國聯邦政府中，對中國人心理最關懷的官員多半集中在國務院，而國務院也正好是戰時外交決策過程中最被冷落的部會。這個事實說明爲什麼像項貝克這類官員，在正常情況下本應該參與制訂美國對華政策，卻不得不淪爲旁觀者，甚至對中美兩國之間發生的一些大事茫然無知。事實上，從珍珠港事變發生以來，國務院對於軍人主宰對華政策這個趨勢就一直憂心忡忡，特別擔心的是軍部處理美援的態度。大致而言，國務院認爲軍部和派駐中國的軍官(包括馬格魯德和史迪威)都缺乏政治頭腦和歷史觀，只呆板地看到眼前的效率，而無法體會美國的整體和長遠國家利益(包括戰後世界局勢發展)。因此，縱然他們已經喪失對華外交發言權，但是內心仍然主張增加美國對華援助。他們甚至指責軍方玩弄數字把戲，把中國政府自己花錢購買的物資也謊報稱是援助品。更有甚者，他們還收集了總統和軍方領袖歷來的發言，指出其中不乏誇大對中國的援助，意圖欺矇國會和美國民眾[5]。

美國總統羅斯福、軍部部長史汀生和陸軍參謀長馬歇爾，都沒有留下資料，可以顯示他們曾經認真思考，如何具體幫助中國提升工作效率。在這一方面，財政部部長摩根韜和史迪威將軍倒是兩個例外。摩根韜部長提議把提供中國士兵的糧餉與其作戰表現掛鉤，由美國支付，遭到蔣介石嚴詞拒絕後，就沒有試圖舊事重提。剩下來只有史迪威將軍提倡「利益交換」(*quid pro quo*)原則了。雖然史迪威也從來沒有透徹說明，他這一個原則到底內涵爲何及如何實施，但是當他在華任職的幾年中不斷地引用這個名詞，不禁讓人認爲他對自己的想法一定充滿信心。同樣地，當他指責別人錯誤，特別是美國總統行事錯誤時，也一再提出這個名詞作爲評判標準，更可見他對自己的信念牢不可移。

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表達，所謂利益交換原則就是有「予」有「取」，一方以一件

5 例如：Ambassador Gauss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8, 1942, Gauss statement to Stilwell favoring more aid to China, August 12, 1942; Hamilton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undated but around May 20, 1942; Hornbeck let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4, 1943; Hornbeck let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31, 1943; and many other similar documents, all in Hornbeck Personal Papers, Boxes 52 and 53.

有價值的事物，去換取另一方一件有價值的事物。用文雅的話說，是禮尚往來，投桃報李；用粗魯的話說，則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理論上說，用這種方法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最是合情合理。因爲儘管各國政府在討論彼此關係時，喜歡提出「深厚友誼、文化認同、道德價值」等冠冕堂皇理由，但是關係最終的基礎必須符合利益交換原則：我給你一個好處，你就還我一個好處。一個國家給出一個東西，就要從另一國取得它想要的東西。友誼、文化和道德考量都只是添加劑和潤滑油，而不是主體。

在觀念層次上，利益交換法似乎應該具備三個要素。第一，雙方必須有強烈願望進行利益交換，各造必須有對方想要的東西，這樣才有交換(**交易**)動機。如果一方無意交換，則交換過程根本無從開始。第二，雙方必須同意接受對方爲合宜的交易對手，交易或是交換行爲方得以完成。如果只是單方有交易願望，那麼會產生一廂情願的情況。第三，每一造想要從對方得到的東西，必須是對方在能力範圍內可以提供者。如果超出能力範圍，則不論說服、誘騙、恐嚇，甚或暴力，都無法完成交易。再有進者，一旦交易活動開始，理想的狀態是雙方能夠彼此協商或是取得一種默契，用何種速度及數量可以使交易兩造雙雙感到滿意。比如說，在同盟關係裡，建立一個規律，定期或是不定期地核算成果，讓雙方相信交易合算，雙方的信心都能夠經常得到肯定。換言之，雙方最好能夠建立一個增長互信的機制，而它應該建立在及時而且不斷兌現承諾的基礎上。

不幸的是，在實際情況裡，中美同盟關係大多數時候都沒有讓任何一方的願望得到滿足。相反的，它們的關係其實是浪費在不斷相互指責和劍拔弩張的對峙中。考其原因，並不是因爲史迪威挑選了一個錯誤政策理論，而是他不了解如何把理論轉換成實踐。就中美同盟關係而言，最基本的事實是，美國希望得到中國出色的作戰表現，而中國希望得到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假如兩國都能遵照利益交換邏輯調適行爲，或許可以製造雙贏局面。換言之，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政府一直渴望能夠建立一支強大、現代化，而又能征善戰的軍隊，而這也正是美國的目標。因此在客觀的事實上，雙方交換的動機可謂相當旺盛。只是這個事實並沒有被史迪威看清楚。相反的，在史迪威心目中，蔣介石只是一個心胸狹小、目光短淺的小人，妄圖用盡各種藉口，使出渾身解數，阻擾美國想要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的一腔熱忱而已。這個認知的差誤，立即嚴重破壞了利益交換的基礎。

更有進者，史迪威儘管尖銳批評美國其他領袖未能依照利益交換原則行事，但他自己對於利益交換原則的理解也非常奇特，這可以用來解釋他爲什麼失敗得那麼徹底。在史迪威心目中，利益交換只有一個含義，就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應該

果斷而無情地施壓，逼迫中國就範，達成美國自己的願望。大致而言，史迪威是在1942年緬甸戰敗後開始鍥而不捨地強調利益交換的主題。他在一封給馬歇爾的電報中指出，要想在中國作出任何工作成績，僅是運用個人影響力或是講道理都屬徒勞，必須依賴「壓力和討價還價」(pressure and bargaining)才能產生效果[6]。但其實他心中想的只有壓力，而沒有討價還價。因爲史迪威歷來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總統對中國作出讓步，他認爲這樣只會引來中國作出更多的要求，貪而無厭。所以美國唯有堅持中國必須充分履行其承諾才能防止它的破壞和拖延[7]。而如本書前面各章所言，承諾的內容最好由美國加諸於中國，但是履行的責任則由中國單方承擔。

在史迪威的操控下，利益交換失去原來應有的雙向交易性質和精神，不再是互通有無，而是單方面一味威脅恐嚇，而另一方面必須立即順服。如果中國稍有不從或是順從的速度太慢，就正好證明美國施壓力度不夠，必須再接再厲。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每當史迪威大叫大嚷要美國領袖採用利益交換原則時，總是發生在他遭遇中方阻力的時候。每當這個時候，史迪威根本沒有耐心仔細思考，如何善用美國的優勢去交換他最大而又最務實的目標，反而恨聲不絕，責罵中國人對美國的援助不知「感恩圖報」。這種指控聽起來頗爲滑稽，因爲它似乎和利益交換的基本精神完全相違背。

史迪威在落實他所謂的利益交換原則時，還忽略另外兩個重點，一是他不知向對方提供甜頭以換取對方合作的重要性。他總以爲酸醋比蜂蜜更能迫使別人就範，而不了解蜂蜜是人見人愛的物品，而酸醋則是人見人厭的物品。另一個是，他不知道向對方提出的要求必須是對方能力所及者，不能硬逼著對方去做不可能的事情，而他總是反其道而行。

當然，史迪威的弱點是手上並沒有足夠的蜂蜜，去落實他心目中的利益交換原則。史迪威的嚴重技術錯誤是，他經常把美國的總國力和他在中國戰區能夠運用的力量混爲一談。史迪威喜歡展示美國豐厚雄偉的總國力來嚇唬中國，其結果卻正好提醒中國人，原來美國人是那麼強大，但是又那麼吝於協助中國。

更糟糕的是，他的直線思路使他在執行政策時缺少細膩靈活，不懂審時度勢，即使手中握有相當本錢時，也不知善加運用，反而把事情弄砸。史迪威指出中國軍事眾多的缺點，此舉雖無創意，卻是十分中肯，合乎事實。如果他想要改正這些缺點，也有可以達成目的的途徑。可惜的是，他經常向美國政府提供並不確實的訊息、觀念和計畫，而且作出考慮欠周的行動，背離利益交換原則。美國人當然擁有中國想要得到

6 Stilwell memorandum for Marshall, July 30,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6.

7 Stilwell memorandum for Marshall, May 1, 1943.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8, Folder 61.

的一切資源，而且數量龐大到超乎中國人可以想像的程度。正是因爲有這些資源，只要美國依照利益交換的邏輯行事，它應該可以得到最高程度的效果。然而史迪威想要改正中國缺點的許多方法，卻偏偏都違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實況，而史迪威本人對這一點還茫然無知，不但採用的解決方案達不到效果，反而經常帶來反效果，也爲自己惹來無窮盡的怨憤。

假如史迪威明確讓中國人知道，只要作出成績，美國人就會提供獎賞，那麼他手中蜂蜜所能發揮的效力就會大幅增加。當然，這可能是史迪威能力所不及的，因爲華盛頓打心底並不想向中國提供超出他們意願的資源。史迪威在個人行爲上，經常忘記美國外交傳統上的兩句格言。一句是，「手上拿著一根大棍子，但是說話時輕聲細氣。」史迪威最嚴重的個人缺點，就是不懂得如何和顏悅色跟中國領袖交談，而他自以爲手上拿了一根大棒子，在中國人眼中偏偏又不覺得粗大。更糟糕的是，史迪威對中國領袖的自尊心傷害次數太多了，以致痛苦產生麻痺作用，有朝一日史迪威真要動手揮棒，中國就變得不那麼害怕了。

美國外交的第二句格言是，「手中既有棍子又有胡蘿蔔」，威迫利誘交相爲用，以取得對方合作。不幸，軍部給史迪威胡蘿蔔（或是蜂蜜）不多，而史迪威又運用不當，使得中國人認爲，除非美國人願意以英國人或是日本人的同樣方法對付中國人，要不然美國人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傷害中國？到了1944年8-9月，蔣介石認爲美國從中國戰區的總撤退已經不可避免，此時史迪威還掄著棍子，而蔣介石卻根本無所畏懼了。

下文的第叁節將分析妨礙運用利益交換原則的重要因素，而這些因素，都和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及其領袖的認知和觀感有密切關係。認知正確與否，可以影響交換過程的順暢和穩定。如果交換的一方對於另一方有嚴重的認知誤差，就會使交換觀念走錯方向，交換方法文不對題，只能製造摩擦，甚至無法進行。第肆節則將焦點凝聚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上，那就是有交換意願的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要求，是否爲對方在能力範圍內能提供和滿足的東西。如果不是，則利益交換原則將無法運作。

## 叁、史迪威對於中國政府及蔣介石的認知與假設

既然同盟關係裡的雙方，手中都握有對方希望得到的東西，剩下來的工作就是，兩方如何營造最有利的條件，讓利益交換原則得以順利落實。在這方面，美國有一個重要的不利條件，就是對中國政府及領袖們觀感不佳，評價極低。史迪威觀感的大部分都是在1941年以前形成的，它後來又影響了多數美國領袖，其中有兩點產生了特別

重要的後果。

一是他們認爲中國不可靠。有一種說法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採取秘密計畫，要美國打敗日本，而它可以坐享其成。另外也有一種說法是，蔣介石所以急於得到租借法案物資，其動機不是用它來打日本人，而是用來準備抗戰結束後的內戰，以消滅國內反對勢力(包括共產黨)。還有一種說法是，蔣介石可能突然宣布和日本達成和平協議，或是蔣介石會以中國可能崩潰來威脅美國人接受他的無理要求。

二是他們認爲蔣介石是美國幫助中國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礙物。作爲中國的領袖，他個人的人格、個性和品質，都遭到美方嚴重質疑。不同的人把他形容爲無知、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舊式軍人、對西方現代軍事科學的優越性一竅不通。最糟糕的是說他完全不能了解中國亟須改革它的軍隊。至於人品方面，蔣介石被看成是一個裝腔作勢的冒牌貨，眼光如豆，思想僵硬，只知追求個人和黨羽的私利，而不顧國家公益[8]。如果蔣介石果然是這麼一個品質低下的人，而史迪威只用「花生米」這個字眼去形容他，或許反映的是史迪威的寬宏大量，而不是他的刻薄無禮。

可是這些觀感究竟是否準確？如果很難用簡單的二分法去評估一個人，那是否可以問：究竟有幾分準確，又有幾分不準確？本節的目的就是要對這兩個觀點進行更縝密的檢查。

## 一、中國是否無意繼續抗日？

如本書第二章所述，馬格魯德將軍是第一位聲稱中國不是可靠盟邦的美國軍官。他是在想抓權而又被蔣介石嚴詞拒絕幾天後作出這樣的判斷，其個人動機不無可疑。雖然史迪威也不齒馬格魯德的爲人，但是他也還是採取同樣態度，指責中國不但有一個不積極作戰的詭計，而且還以和日本講和要脅美國。

當然，假如蔣介石真有意願接受日本和平條件，他大可不必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作此動作。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中日兩國之間已經有很多和平試探，有的來自日本人，有的來自中國人，蔣介石既曾被西方國家施壓去和日本妥協，也曾被國內團體要求去和日本協商停止抵抗。假如他當時確有意願接受日本的和平條件，汪精衛就不會和他決裂。汪精衛已經成立了僞政權，而中國在珍珠港事變後又突然得到三個強大的西方盟邦，美國軍官再說蔣介石可能找日本單獨媾和，在常理上就很難說得通

8 史迪威對蔣介石個人品質和性格的即興式描述和分析，散見本書各章，但是他最早而且最完整的分析，請參考：Stilwell memo to Henry Stimson, June 27,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ile 21.

了。美國軍人的這套說法，與其說是對中國的作爲有精闢理解，不如說是反映了他們自己對中國人的無知，或是心態扭曲。不幸的是，不少史學著作多年來一直流傳一種看法：這些中國人聲稱自己處境危急的警訊乃是虛聲恫嚇，或根本是蔣介石炮製的陰謀詭計，用以威脅美國，妄圖把自己的弱點轉換成討價還價的籌碼。這個說法在史學界翻騰了幾十年，隔不多時就被抬出來重新發揮一番，至今仍被有些人視爲頗有見地。但是沒有人認真正視一個方法論上的基本問題，那就是：怎麼才能證明這個論點符合史實？提出這些論點的人從來說不清楚的是，除非蔣介石神智不清楚，否則他何以會擺出自己要從美國這輛駛向勝利的強大戰車上跳下來的姿態，去威脅美國？假如他把威脅付諸實施的話，除了讓中國粉身碎骨萬劫不復之外，還能得到什麼好處？也沒有人說清楚，歷史的證據究竟何在？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領袖確實擔心對日抗戰會瓦解。在1942年後的數年中，中國領袖曾經憂心忡忡，認爲美援若不及時到來，中國的抗戰或將面臨崩潰。當日本空軍無情濫炸而中國政府毫無能力保護人民時，當中國軍隊在緬甸慘遭敗北而失去最後的對外聯絡時，或是當中國經濟情況面臨無可抑制的惡化時，中國領袖的確萬分擔心無法控制國內局面。如本書多次提到，一方面，蔣介石在日記以及和其他領袖的私人（宋美齡、宋子文）密電來往中，屢次透露內心深刻的憂慮，認爲中國可能會崩潰。中國領袖在和某些美國官員溝通時，也有時表達同樣的憂心。另一方面，他一直有抗戰到底的決心，珍珠港事變剛發生，就堅持同盟國應該承諾絕對不和日本單獨媾和。因此，與其說蔣介石想過背叛同盟國而與日本單獨媾和，還不如說蔣介石最擔心同盟國和日本達成秘密交易而拋棄中國。

事實上，他面臨可能和美國決裂時（1944年8-10月），表現出來的決心是恢復到珍珠港事變前單獨作戰局勢，而不是試圖和日本單獨談和。因此，某些美國人（包括戰時官員和戰後學者）所特別鍾愛的這種虛聲恫嚇的理論，完全得不到史料證據的支持，只是他們自己特殊心態的反映，是他們懶於求證但是又膽敢大發議論的表現。這些議論並不代表他們對中國領袖心態有更獨到正確的了解。歸根結柢，美國人對蔣介石可能暗地與日本講和，或是以講和姿態威脅美國的說法，無論當時或是現在，都沒有提出可信的證據。但是對史迪威和某些心態相同的美國軍人而言，他們對中國的言行和判斷都是受一個假設所主導：中國人有一天可能背叛同盟國。一旦有了這層擔心，美國進行真正利益交換的意願就會受到嚴重干擾，因爲他們害怕美國的援助到頭來會全盤落空。

## 二、蔣介石個人品質是中國軍事改革最大的阻力？

第二個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因素，是對蔣介石個人品質的了解和判斷。史迪威的了解和判斷不僅成爲他個人行動的準繩，也影響到美國政府對中國事務的了解和判斷。本書各章曾多次提到，美國政府人士對蔣介石個人品質和行事作風的負面描述。而對史迪威個人而言，改善中國局勢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更換或是謀殺蔣介石。這裡我們想從蔣介石的日記來了解和判斷他本人。蔣介石留下的日記前後長達五十餘年，對他的思想、感情、行事動機和處事方法，提供了極爲豐富的資料，再加上其他有關資料，可以幫助學者檢查，多年來在美國軍方以及學術界流傳的，有關蔣介石的觀感和解釋。

### (一)蔣介石的教育背景及對軍事改革的態度

史迪威批評蔣介石個人品質的文字甚多，流傳也廣，早已被學術著作大量採用。這些著作基本上接受了史迪威的說法，認爲史迪威本人是第一位倡議中國軍隊必須改革的美國軍人，也是第一位熱心推動加強中國軍隊訓練和增進中國軍隊裝備的美國軍人。在史迪威眼裡，蔣介石是他實現這一個主張最大的阻礙。原因是，蔣介石缺乏足夠智慧和專業素養；既不了解西方軍事科學的重要性，也不了解中國利益繫於擁有一支裝備精良和訓練有素的現代化軍隊。這兩個論點，都值得我們重新釐清。

本書第二章中曾經提到，我們並不清楚史迪威對蔣介石觀感的來源。他們兩人在1942年前基本上並無來往。然而史迪威充滿自信，敢於很快作出一系列的推理和判斷，認爲蔣介石在知識和教育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進而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爲美國的對華政策作出決定。史迪威以居高臨下的態度看待蔣介石，認爲蔣介石大部分的軍事意見都是淺薄、可笑，而且無知。史迪威在與蔣介石的交往中，不自主地流露出自己智慧和教育上的優越感，以致蔣介石抱怨史迪威把他當成不懂事的小孩來教訓。

如果我們對蔣介石和史迪威兩個人的心智活動作一番比較，就會對史迪威在這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自信感到驚訝。從史迪威1942年以前的個人資料裡，看不出他在軍事專業範圍外，還念過什麼書。雖然他在中國生活多年，但是他的個人檔案沒有曾經對中國歷史、文學、藝術、哲學或其他領域發生興趣的跡象。細查他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日記和雜記後，我們只發現他不愧軍人本色，除了和本身職務有關的文件外，幾乎沒有閱讀的興趣。他唯一提到念過的非軍事性書籍，是在錫蘭度假時(1944年8月)看

的，而那些書盡是打發時間的消遣作品。相比之下，真正讓史迪威感到愉快的是，花大量時間看一大堆品味可疑的電影，和不分晝夜地沉迷於玩紙牌(cribbage)。作爲一位職業軍人，史迪威喜歡這樣的生活，是他個人的選擇，因爲他本來就沒有必要在專業範圍之外試圖把自己裝扮成飽學之士。但是當他對別人智力和教育程度評頭論足大言不慚時，就令人不得不好奇他自己的文化修養到底有多麼深厚了。

蔣介石的心智活動恰巧和史迪威形成鮮明對比。蔣介石對於自我教育從來認真。他一生勤讀政治、歷史和哲學書籍。和許多他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他對於「學問」有一種崇敬感。雖然稱不上是有創意的思想家，但是他從年輕時就開始研讀中國典籍，包括宋、元、明、清各代的「學案」。令一般人想不到的是，他的閱讀書單也包括重要的西方學術著作，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乃至基德(Benjamin Kidd)[9]等人的作品。他另一個習慣是，邀請著名學者和他談話或是作學術講解，題目不拘，古代和現代的歐洲史、美國史和重要的西方哲學思想，都曾有專家爲他上課，上下古今，涉獵頗廣。

他在變成孫中山的追隨者之前，曾經有過一段荒唐生活。成爲孫中山的重要軍事幕僚後，生活變得非常簡樸，甚至呆板無趣，不抽煙，不喝酒，態度嚴肅，缺少社交技巧等等。他最喜歡打發時間的方式就是讀書。因此即使在抗戰最艱苦的年歲裡，每天也必定保留一段時間讀書。他的日記經常記著從書中抄下的格言語錄，或是自己的讀書心得。他讀書的動機並非自娛，而是依照傳統思維模式自修和追求自我完善。雖然我們或許可以挑剔他讀書方法太像一位勤奮用功的大學生，而不像國家元首，但是要把他形容成一個教育水平低下的粗人，著實還需要無視於目前存在的大量證據，因爲現有的資料顯示，蔣介石在非軍事領域所接受的教育，或許要比史迪威深厚得多。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蔣介石在日記中曾經寫道，從政治舞臺退休後，最大的願望是從事教育工作。他所心儀的楷模是中國歷史上的「儒將」，文武雙全，例如曾國藩。而他不斷教誨黃埔學生和部屬的，也是要他們多讀書。

當然，軍事專業教育是兩人全部教育經驗中最重要的部分。史迪威的軍事教育來自美國最好的軍事學校系統，畢業於西點軍校和指參大學，專業素養足夠他在班寧堡(Fort Benning)步兵學校擔任教官。日後史迪威雖然贏得傑出訓練專家和優秀戰術專家的聲名，但是即使是他最忠實的朋友和知音的馬歇爾將軍，也從來沒有推崇他是一流的戰略家或是參謀人才。

---

9 Benjamin Kidd(1858-1916)，英國社會學家，著有*Principl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和*Social Evolution*等書。後者並被譯成中文(1899)。

與史迪威相比，蔣介石的正式軍事教育確實不夠，還沒進保定軍校受正式教育，就去日本上振武學校，剛受完士官學校的入伍訓練，就又回中國參加革命，沒有正式在士官學校讀書。但是他民國初年流亡日本期間，曾經親身經歷現代化軍事教育的感染。他所以被孫中山選爲黃埔軍校創辦人和校長，主要原因是孫中山當時追隨者中，沒有比他更優秀的軍事人才，既有爲革命獻身決心，又熟悉現代西方軍事科學。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工作，和史迪威在班寧堡的工作性質基本相同，都是訓練初級軍官。兩者之間當然也有所不同，史迪威是美國傳統深厚的軍事學校中的教官，基本上遵循學校制定的課程表和教材行事，而蔣介石則是中國一個新軍事教育機構的創建人，必須親自物色各式各樣優秀人才作爲教官，包括曾經留學國外的軍事人才在內。他締造的新軍在1920-1930年代迅速成爲中國最好的軍隊。誠然，蔣介石得到的軍事教育和史迪威相比，仍然有相當差距，但是從蔣介石早期的軍事履歷裡，很難找到充分資料證明蔣介石缺乏基礎知識，缺乏領會訓練工作重要性的能力，或是對於建立新軍缺乏經驗。

在1920年代的中國，蔣介石不但是最具改革思想的軍人，也可能是少數中國軍事領袖中，最信服西方軍事科學和技術的一位。假如我們閱讀蔣介石幾十年有關軍事問題的演說和文稿，就可以發現，他對傳統中國軍事優點只強調「武德」，即勇敢、忠誠和獻身精神等。但只要涉及訓練、裝備、組織、紀律、戰略和戰術，他都全心全意要向西方學習。假如史迪威當初沒有錯估蔣介石的智商，則他和美國軍方大可以察覺到一個有趣而矛盾的現象，那就是：一方面，蔣介石曾經表露出有高度改革熱情，而另一方面他卻無法和美國人進行全面的合作。假如美國人去追究這個矛盾時，他們或許就會進一步思考應該採用何種方法，才能增加自己成功的機率，而能夠想出更好的方法，讓史迪威醉心的利益交換原則得以有效落實。

### (二)蔣介石與外國軍事顧問合作的能力

依照史迪威和軍部看法，蔣介石所以未能與美國合作改革中國軍隊，除了他對現代軍事科學茫然無知外，就是因爲他不能夠和美國軍官建立良好工作關係。這其實就是指責蔣介石心胸狹小，目光短淺，排外情緒嚴重。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後，部分美國人士立即引用這本書來證明他具有仇外心結。美國人這種看法可能導致他們得到幾種結論：既然蔣介石無知和自私，阻擾美國人幫助中國建立新軍，那麼把蔣介石手中的指揮權奪來交由美國軍人行使，或是另外找一位有現代西方思想的領袖取代蔣介石，情形應該可以大爲改善。

美國人這個推論的基礎其實是不正確的。只要回顧蔣介石的一生事業，就不難發現，他在開始進入軍界以後，不但推崇西方軍事理論，而且大量招攬受過西方軍事教育的人才，借鏡西方先進國家的建軍模式，並聘用外國軍事專家來華服務。蔣介石迥異於同時代中國其他軍事領袖的地方是，他對西方軍事科學知識和實踐的佩服程度遠超過他們[10]。南京時代(1928-1937)，他派人在世界市場物色各類西方軍事專家，幫助中國軍隊現代化，經過多次的試探和失望，最後選中了德國顧問協助工作。由於他對德國軍事顧問和德國軍事科技的高度信賴，中國終於建立了一支現代化新軍，可以在抗戰初期有效抵抗日本侵略[11]。蔣介石和德國軍事顧問之間的關係可以顯示，他如何珍惜他們的服務，又對他們如何尊敬和產生深厚感情。

### 1. 蔣介石對德國顧問的器重

蔣介石尊重外國軍事顧問最好的證明，就是他在世界人才市場上全力訪求最優秀的軍事專家，並付給他們遠遠超過中國領袖們自己的正常薪俸。德國顧問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被公認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建立新的德國軍隊的最重要人物，其地位等於是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時代(1920-1926)實際上的陸軍總司令。塞克特在1932年4月受聘到中國服務時，每月薪水已達兩千美元[12]。他的繼任人是法根豪森將軍(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在德國軍隊中也屬於佼佼者。1927年已經擔任德國德勒斯登步兵學校(Head, Dresden Infantry School)校長，而此時史迪威仍只是一位低階的軍事教官而已。因此無論就建軍的豐富經驗、領導技術和官階資歷而言，蔣介石賞識過的優秀軍人，都遠非史迪威當時可以比擬。蔣介石重視軍事顧問遠超過政治顧問。拉鐵摩爾是美國總統直接推薦到中國服務的政治顧問，中國政府付給他的薪水就大大不如美國軍事顧問陳納德。

### 2. 蔣介石對德國顧問的信任和感情

蔣介石對德國顧問的高度尊敬，並沒有因爲中日戰爭爆發，或是德國政府的親日政策而改變[13]。他爲此還不得不承受來自兩個不同方面的壓力。一方面，德國政府親日政策導致中國民間反德國情緒日益高漲，迫使蔣介石不得不採取各種措施保護德國

10 陳濟康等，《蔣介石的洋顧問》(北京：華文出版社，1995)。

11 See: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hapter 7; also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12 Seeckt的原文出處是 Bundesarchiv-Militarchiv, Freiburg W02-44/5, 199. 此處引自：吳首天，〈德國軍事顧問與蔣介石政權〉，《民國檔案》，no. 11(1988年2月)，頁93。

13 John P. Fox, *Germany and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London, 1982), p. 244.

顧問，使他們安心工作[14]。另一方面，希特勒不斷向中國施壓，要求把顧問們送回德國，因此蔣介石也要保護德國顧問不受其本國政府脅迫[15]。即使希特勒政府威脅他，若不送回德國顧問，將與中國斷交，蔣介石也不爲所動[16]。

中國政府其他官員也和蔣介石同樣尊重德國顧問。他們和顧問發展出親密友誼，稱讚他們對中國的貢獻[17]。蔣介石和中國政府官員對德國顧問的真摯感情也受到了回報。當希特勒威脅與中國絕交時，許多顧問不想離開中國，便與中國政府合謀，以各種辦法拖延離華時間[18]。蔣介石最後所以向德國屈服，是因爲希特勒提出警告，凡不立即返回德國者以叛國罪論處，並罪及他們在德國的家屬[19]。希特勒政府之所以如此壓迫中國，一部分固然出於其親日政策的必要，但同樣重要的是，它需要這一群優秀的德國軍人回國服務。如果有些美國軍人來華服務時，所持的心態是自以爲他們是來施捨啓蒙的話，那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即使是在大戰結束後，蔣介石對德國顧問的處境依然感到牽掛。在德國顧問中，法根豪森將軍無疑和蔣介石最爲親近。1951年國民黨政府已經敗退到臺灣，而且處境風雨飄搖，但蔣介石仍然指令外交部，去了解法根豪森在德國戰敗後的遭遇。當他聽到法根豪森因爲曾任德國駐比利時占領軍司令官，而被判12年徒刑但已被提前假釋時，他馬上指令外交部向法根豪森致意，並送錢紓解他的經濟困境[20]。

總的來說，蔣介石和德國顧問們的關係，有幾點可以作爲我們評價中美軍事合作關係的參考。

首先，蔣介石在軍事方面獨當一面後，除大量而有系統地引進外國顧問，並委託他們主持建軍工作外，也保送多批優秀軍官或是軍校學生到西方國家學習。由於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國民政府軍事發展的特殊性，因此可以看出它對陸海空軍各軍種處理方式各有不同。大致說來，陸軍軍官自黃埔和陸軍官校畢業後，便加入德國顧問的訓練計畫，其工作成績優越者，隨即在班、排、連、營、團、師、軍的崗位上提升，以

14 徐永昌將軍日記，1938年5月21日。

15 王世杰日記，1938年5月29日。

16 同上，1938年6月21、23、29日。徐永昌將軍日記，1938年6月25日。

17 徐永昌將軍日記，1938年5月27日。

18 王世杰日記，1938年6月21日。徐永昌將軍日記，1938年5月25日。

19 王世杰日記，1938年6月29日。徐永昌將軍日記，1938年6月27日，7月2、4日。Also see: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hapter 8.

20 《總統府檔》，055/0994。卷宗名稱是「法肯豪森建議我擴張軍備」，1937年2月1日，共17頁。其中也包括多件1950年代外交部有關此案的報告與文件，經手人有金問泗與葉公超等官員。

戰功決定升遷速度，少有機會派往國外受訓。但是偶爾也有例外(如廖耀湘、邱清泉、黃維、孫元良、皮宗敢、張鎮、賴名湯)。但是幾乎所有的新軍種的建立，蔣介石均提拔留學的軍官去主持。這包括陸軍的機械化部隊(如徐庭瑤、蔣緯國)、海軍(如桂永清、馬紀壯、梁序昭、黎玉璽、宋長志)和空軍(如毛邦初、周至柔、王叔銘、徐煥昇、司徒福、衣復恩)等。此外，國民政府還重用了一批並不是自己送出國外留學，但是表現傑出的軍事人才(如孫立人、王賡、蔡文治)。

因此，如果有人想要把蔣介石形容成舊式軍人，對現代軍事知識和科技一竅不通，又不知善用外國軍事專家，這除了說明此人對蔣介石的軍人生涯完全陌生外，還能說明此人對中國近代史一竅不通。這樣的心態只能妨礙我們探究，爲什麼美國政府不能實現它在中國想要推行的軍事改革方案的真正原因，特別是這些方案看起來完全合情合理。

第二，儘管中國和德國政府間的關係不斷惡化，中國領袖依然打從心底保持對德國顧問個人的信任和崇敬。中國人所以有這些感情，是因爲看重德國軍人的專業素養、忠誠、勤奮和盡忠職守。其實，在蔣介石一生中，也大量任用了許多蘇聯軍事顧問，包括加倫元帥和崔可夫將軍。儘管中蘇兩國政府間的關係後來變得十分惡劣，他對他們的感情依然不變。到後來，他甚至延聘了少數日本軍人作顧問。總而言之，仇外情緒(xenophobia)在蔣介石的建軍努力中，從未占有一席地位。

第三，隨著時間和經驗的累積，中國人也逐漸掌握了鑒別外國專家的基本能力。他們早期曾從一些歐洲國家雇用了一些所謂專家，花了不少冤枉錢，也對他們產生過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後來他們從美國聘請到陳納德和飛虎隊飛行員。認爲他們是最好的專業人員，因此，便以他們爲標竿評價其他美國軍官。關於飛虎隊的聘用過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1940年到1941年初，正是中國大後方遭受日本嚴重轟炸的時候。即便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中國和陳納德商量美國志願軍(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來華服務時，依然堅持把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以協定方式明白列出，並特別強調，志願軍必須服從中國政府指揮[21]。可是一旦陳納德作出優異成績後，蔣介石又幾乎立即把整個中國空軍的建設委託給陳納德全權處理。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對美國飛行員的薪俸和生活待遇，都遠遠超過中國政府的首長們。

### 3. 蔣介石信託德國顧問的實質

德國顧問塞克特將軍剛到中國不久，便已經忍不住驚訝地告訴另一位德國顧問說：「蔣介石委員長託付給我的權力，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之外。」[22]然而法根豪森將

21　蔣介石致宋子文電，1941年1月27日，《蔣總統籌筆拓影本》，4450.01-042，#14805。

22　Seeckt的原文出處是 Bundesarchiv-Militarchiv, Freiburg W02-44/5, 199. 此處引自：吳首

軍的經歷更能顯出，蔣介石如何願意把重大責任託付給外國顧問。法根豪森的日常活動，包括不斷接受中國各階層文武官員的諮商，所討論的問題包羅萬象，包括技術問題、參謀作業、野外演習、對戰鬥力評估、訓練、武器測試、建立兵工廠，甚至修築鐵路、通信系統和民間工業生產設備等等[23]。至於其他顧問，除少數幾位被蔣介石留在總部外，一律被分派到野戰單位。他們所負擔的任務，不但包括中國軍隊面臨的全部戰略和戰術問題，也參加中國準備對日作戰的高度機密計畫。德國顧問有權直接和下層指揮官發生接觸，其身分就如同是蔣介石的親近幕僚一般[24]。

但是最關緊要的是，德國顧問在中國軍隊中的具體工作和產生的影響。限於篇幅，此處只能討論幾點和後來中美軍事合作關係有借鏡作用的事務。

第一，抗戰前夕和抗戰初期，德國(和蘇聯)顧問被授予廣泛職權。他們參與訓練、組織、調度、戰術、戰略和各種軍種活動(砲兵、騎兵、步兵、空軍，等等)，範圍之廣比大部分中國指揮官能過問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就目前資料顯示，這些外國顧問幾乎沒有被排除在中國軍隊的任何一項活動之外。由於大部分顧問都被派到作戰部隊，他們有權參加機密會議，擬訂作戰計畫，甚至參加戰場的實際工作。

第二，外國顧問工作認真負責。他們針對中國軍隊提出大量建議和批評，內容坦率，不避尖銳，絕不隱晦，必要時指名道姓(包括高級軍官在內)，但是總是提出具體改革方法。他們所提出的報告清楚顯示，他們作過具體調查，熟知事實，提出客觀分析，從不冷嘲熱諷，而是謹守分寸盡忠職守。他們所參與的工作範圍，和後來的美軍顧問大致相似。但是他們搜集的事實和提出的具體建議，在專業水平上說，經常超過史迪威時代的美國軍官。理由非常簡單，德國顧問深入中國軍隊的基層，而且工作勤奮[25]。而史迪威和其下屬的作風，則是粗枝大葉，亂發議論。

(續)

天，〈德國軍事顧問與蔣介石政權〉，《民國檔案》，no. 11(1988年2月)，頁93。

23 「代總顧問法肯豪森將軍工作週報」，1937年1月12日至4月10日。《總統府檔》，055/0746。

24 「法肯豪森建議我擴充軍備案」，1937年2月1日，共17頁。原文為德文，共12頁，包括24個建議事項。又見：「法肯豪森縷陳騎兵編制之芻議」，1937年5月21日，共7頁。均在《總統府檔》，055/0994。

25 但是有兩個問題，並沒有包括在德國顧問的抱怨之中，而後來卻在中美同盟關係中變成重要問題。一個是中國的徵兵制度中存在的大量的不公平和無效能的事例，另一個是軍隊各級長官的貪污現象。在德國顧問在華服務期間，這兩個問題並不存在，原因是當時蔣介石的軍隊壯丁來自國民政府控制地區(長江下游省份)，而中央軍是以德國軍隊為模式，基本上與社會和經濟分隔，是作戰部隊，而不是衛戍部隊。經過時間的發展，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環境的本質產生巨大改變，導致這兩個問題後來變得非常嚴重。

第三，德國顧問的報告和建議，一貫受到蔣介石的讚賞。儘管批評尖銳，蔣介石在許多報告的空白處，親筆批示「照辦」、「速辦」、「通令各部辦理」，或是類如「第六項必須先行實行」和「應先抄送前方各高級司令部與參加滬戰之砲兵團營連長」的批示。即使顧問批評時用語咄咄逼人，蔣介石依然加以重視，他會寫道：「此意見甚對，應修正詞句以命令通令各總司令以下各級官長切實遵照，但其詞句應加修正。」在德國顧問的意見或是詞句委實過於刺傷中國人自尊心時，蔣介石也會批示：「此件印刷時不可注明爲德國顧問意見，即以軍委會名義總評可也。」[26]事實上，德國顧問的許多批評和所提改正方式，都比史迪威和美國軍官更嚴峻。然而，一旦蔣介石接受了他們的誠意和善意，他們的意見幾乎從來沒有被拒絕過，更不曾令他憤怒過[27]。

## 三、中國政府與外國專家間的合作態度問題

### (一)德國顧問的表現

應該記得的是，來自蔣介石個人的尊重和接受，只不過是外國專家能夠在中國作出成就的一半理由，另一半理由是他們與中國人共事的態度與精神。用不著多說，任何人際關係，如果其中雙方都能以禮待人，以誠處事，那麼合作的空間將會擴大，衝突將會減少。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和德國顧問的相處經驗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德國顧問絕非唯恭唯謹的僱員而已。他們在專業事務上有強烈主見，從來不怕向蔣介石坦白表達。但是他們表達時，絕不心存輕侮，更不會顯示傲慢或是嘲弄，甚或自鳴得意。不管是作爲一個成熟的個人還是一位職業軍人，他們都謹守本分。不論是公開場合或是私下，他們從來沒有對中方官員表現不敬。在他們長期和中國人來往的日子裡，沒有一個德國顧問曾經用過具有嘲弄性的綽號加諸中國人身上。

在德國人(和蘇聯人)跟中國人交往過程中，中國人也從來沒有指控他們種族歧視。在本書參考文獻中，沒有跡象顯示，中國人在跟德國和蘇聯兩個國家的軍事顧問交往時，曾懷疑對方懷有白人自大心理，或是有過侮辱中國人的行爲。因此，在這段合作的歷史記錄中，中國方面沒有把民族主義當成是一個話題來討論，更沒有一股怒氣需要宣洩。

---

26 「法肯豪森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至卅一日間上海方面作戰經驗」，1937年9月7日，共7頁。又見：「法肯豪森對目前之情況意見」，1937年10月12日，共4頁。又見：「法肯豪森上海正面作戰經驗第三次報告」，1937年10月(無日)，共5頁。又見：「法肯豪森陳淞滬線撤退之著眼點及防禦設施等意見」，1937年11月9日，共5頁。以上均在《總統府檔》，055/0994，「法肯豪森建議我擴充軍備」。

27 居里與蔣介石談話記錄，1942年7月22日，《戰時外交》(一)，頁635-643。

中國人在和這些外國軍事顧問交往時就事論事，即便中國和德國(與蘇聯)政府之間有嚴重衝突，或跟顧問有意見上的歧異，但是雙方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個人和專業關係。當一個強大的白人國家和一個弱小卻又是民族主義高漲的非白人國家打交道時，這一點值得特別謹慎。應該記得，日本的宣傳工作最初能在亞洲取得成果，正是因爲它們善於利用亞洲人複雜的反殖民心理，打中了白人國家的要害，以致當日軍對白人俘虜作出慘無人道的暴行時，還能得到當地人的歡欣鼓舞。

其次，外國顧問謹守分寸，從不涉足中國內政。在現有的資料中，看不出有外國軍事顧問曾試圖打入中國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的跡象。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謹守專業本分，與民間社會保持一定距離。除了工作單位外，他們很少和跟平民社會打交道[28]。更不會心醉手癢地投入中國的「宮廷政治」。因此蔣介石1942年1月和美國軍部談起他理想的聯軍參謀長人選時(「至參謀長人選，不必熟悉東方舊情者，只要其有品學與熱心者可也」)，他心中的模範軍人肯定是法根豪森將軍和他的德國顧問，而他心中的負面人物，卻正是馬格魯德將軍之類自吹自擂的「中國通」。

## (二)戰時美軍顧問

### 1. 史迪威個人作風問題

以上關於蔣介石和德國顧問關係的簡短敘述，目的是提醒我們，不可把他和史迪威等美國軍人之間發生的摩擦，輕易歸罪於他的仇外心理。作出這種推想的人，既不願努力去了解對方行爲的緣由，又想推卸本身的責任，把事情簡單化，一切都是對方的錯。比起中德軍事合作關係和中蘇軍事合作關係來，中美軍事合作關係的基礎理應該更加穩固。作爲盟邦，中美兩國本應該發展出更好的互動關係才對。在中國人心目中，美國不但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國家，而且歷史上也比任何其他國家對中國更爲友善。能夠和這樣一個國家結盟，中國領袖們當初可說是喜出望外，在心理上願意盡量配合，也毫無保留地以美國馬首是瞻，更心儀羅斯福爲中國人民的友人與世界「和平救星」。中國從前和德國(或蘇聯)政府之間充滿矛盾，都能和他們的顧問合作愉快，美國是軍事盟邦，目標一致，美國顧問應該更容易同心協力合作。

不幸事與願違。令人不解的是，美國派到中國的最高階將軍，似乎對中國以前與外國顧問合作的經驗，或者全然無知，或者不屑一顧，一切我行我素。更令人不解的是，史迪威早先在中國作過武官(1930年代)，他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應該是了解中國和德國及蘇聯的軍事合作關係。然而在史迪威的個人檔案中，很少有資料顯示，他

28 即使是蘇聯軍事顧問，基本上也避免和中共保持秘密關係。

關注過蔣介石在那個年代建軍的努力和具體措施。這種情形確實令人難以理解。因爲早在1941年9月馬格魯德代表團首次來華時，宋子文已經要中國政府向馬格魯德詳細介紹德國顧問的工作情形。內容包括德國顧問團的組織和成員的優良素質，並向馬格魯德展示德國提供的精良武器。目的是希望美國能夠達到德國顧問團素養的標準，並以更快的方式向中國提供更多更好的協助[29]。或許正如居里第二次訪華時所透露，如果馬格魯德來華的動機只是爲了自己的宦途，而不是誠心幫助中國，則他的玩忽職守也就無足爲怪了。

然而對史迪威和他手下的美國軍官而言，不管其他國家的軍人在中國曾經作出過什麼成績，都沒有參考價值。他們還是要用自己的方法做事，而且一切從頭開始。

即使純粹從直感層次上說，也不難提出幾個原因，來解釋爲什麼有些美國軍人領袖讓自己在中國不受歡迎。史迪威的口無遮攔輕侮中國人的作風，在中美兩國官場已是人盡皆知。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來，圍繞在史迪威旁邊打轉的人，是他們交往過的外國人之中最狂妄和最缺乏同情心的一群，只是喜歡發號施令，卻沒有足夠的文化修養，讓他們對中國人以禮相待，也沒有足夠的心願向中國提供善意的協助。更糟糕的是，這些美國人還要自吹自擂，宣稱他們盡心盡意幫助中國。然而從中國人看來，美國人之所以這麼做，只是讓他們的軍官，可以把他們侮辱中國人的事做得更理直氣壯而已。

美國有一句通俗老話說，一個強國跟弱國打交道時，應該是在鐵拳外面戴上一副絲絨手套。這樣既可以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厲害，又不必惡形惡狀撕破對方顏面。史迪威似乎完全忽略這句老話的真諦。更形象地說，史迪威的做法像是有一雙實質軟弱的手，外面卻戴上了一副滿布鋼刺的手套。形象固然嚇人，但是由於軍部捨不得在中國投入大量資源，因此史迪威手中其實並沒有太多可以引誘中國合作的實質貨品，因此沒有鐵拳。在中國人眼中，史迪威是一個吝於施捨而卻又希望中國不斷感恩戴德的人。而史迪威想要別人聽從意見時，懂得運用的唯一法寶就是先把痛苦加諸對方之身，打碎對方的自尊和自信心。這種做法就變成中美同盟關係中的一個重大干擾，逼迫雙方政府耗費大量精力，修補原本不必發生的裂痕。史迪威的處事方法，簡單的說，是勇於「威迫」而拙於「利誘」。

史迪威的個人作風無疑也因人而異。他並不是完全缺乏素養的粗漢。如前文提到，他不時會詩興大發，雖然內容多是尖酸刻薄，但卻深獲新聞界的歡心。他的「心直口快」或是說話不經過大腦，也爲他贏得「不含糊」的美譽。他對待妻子和馬歇爾

29 Soong cable to CKS, September 2, 1941, Soong Personal Papers, Box 60-1.

將軍，是一個完全有君子風度的人，甚或可以說異常柔順。他在上司面前（羅斯福、史汀生、邱吉爾）會變得張口結舌，乃至詞不達意，連自己堅決信奉的簡單道理也說不清楚（1943年5月、12月），給對方留下不良印象，讓他自己在事後也懊惱不已。當他和英國軍人打交道時，偶爾會語出尖酸，多半時候則漠然處之，殊少跟英國人拌嘴，大概因爲他心裡有數，自己使用英文的技能絕非英國人對手。即便如此低調，他還是招惹英國人討厭，必欲除之而後快。

唯有和中國人相處時，史迪威才變得意氣飛揚，粗暴無禮，不但言詞尖酸刻薄，並且必極盡侮辱之能事而後快。他這樣做也不問對象是誰，無論是何應欽、宋子文或是蔣介石，都逃不過他的尖嘴利舌。史迪威歷來有精通中文的美譽，這一點其實不乏自吹自擂之嫌，因爲他雖然曾經嘲笑莊穆將軍不懂中文，因此無法與中國人有效地溝通，但是他自己與中國人開會，實際上一律使用英文，再經過翻譯，因此占盡語言優勢，不僅變得能說善道，而且可以肆意宣洩。他在極少情況下，在會談中使用過中文發過言，事後便得意不已，在日記裡特別標出，宛似一大成就。他在對士兵演講鼓勵士氣時，可以用簡短中文致詞，但經常是由他人事先準備好中文稿，逐字標明英文注音符號（Wade-Giles），然後他臨場照本宣科。

一個突出的現象是，史迪威的這種粗暴言詞常被譽爲說話和做事「不含糊」（no-nonsense），也成爲他部下所競相模仿的樣板，以致不管是哪個層次的美國軍官，凡和中國官員交往，都勇於以同樣的作風對待後者，前文提到的竇恩和菲利斯將軍就是最好例子。這種做法對美國的國家利益絕非福音。在最低程度上，它很難使同盟關係變得和諧有效。美國軍部如果能及早發現這個問題，就應該把這一類的軍人留在國內，不要把和盟友交往的重擔強加在他們身上。馬歇爾事後的悔恨已經於事無補。只有魏德邁很及時地看到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而在他大幅辭退史迪威的幹部後，中美同盟關係才得以走回正常發展的道路。

### 2.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

民族主義情結是貫穿戰時中美同盟關係中的一根主要感情線，對我們深入了解這個關係中許多重要的發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必須詳加考察。有趣的是，美國政府官員和許多學者很少從這個角度切入，或許他們以爲中國民族主義只是針對日本，和美國無關。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中國在參加同盟國之前，已在洶湧澎湃的民族主義感情狂潮推動下，與絕對強大的日本進行了53個月的抗爭，參加同盟國後又繼續進行了44個月的民族主義抗爭。在後面的44個月，中國除了要戰勝日本之外，還要和盟邦進行另一場民族主義「鬥爭」。

本來同盟國之間，有合作，有摩擦，是正常現象。同盟關係建立之初，蔣介石只是對英國的背信、棄義、蒙蔽、欺詐有強烈譴責。但是在最近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卻讓我們發現，他形容與英美盟邦的關係時，不斷使用「失望、憤怒、侮辱、屈辱、凌辱、歧視、輕視、爭執、衝突、欺騙、欺詐、脅迫、出賣、背信、壓力、決裂、斷交」等極度強烈感情化的字眼。稍晚，蔣介石批評英美政府行爲時，甚至使用「流氓、惡霸、痞子」等字眼，認爲它們適用於德國和日本，也同樣適用於美國和英國，甚至連「帝國主義」一詞也一體適用。此類語言在他的私人感情領域裡不斷湧現，正確反映蔣介石對他個人尊嚴、民族意識和種族平等的高度敏銳，也反映了他心目中盟邦的行爲。這類字眼從1941年12月一直用到1944年10月史迪威離開中國後才突然消失。

純從同盟國關係的效率上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同盟國都能夠把全副精力用在解決技術性問題和促進合作等事項上。最不值的則是雙方把大部分精力虛耗在感情層次上的爭執。不幸，這正是戰時中美關係的真實寫照。這種感情層次上的困擾，在英美關係中甚少存在，在美蘇關係中也少見。唯有在中美關係中卻是一條主軸，也是兩國在技術和政治層次上進行合作的最大障礙。這種巨大的浪費，可說是太平洋戰爭期間，中美同盟關係史上最大的不幸。究竟美方的何種行爲，激起了中方如此強烈的反應？

以歷史後見之明不難看出，史迪威和軍部的某些領袖，對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觀念強度一直不加以重視。正因爲如此，他們才會毫不在意，而且反覆在感情上刺傷蔣介石和屬下中國政府官員，而這些刺傷在實質政策上毫無意義，並不能增加美國的國家利益。毋庸置疑，中美兩國之間的確存在許多實質上的歧見，包括美國不願意向中國提供更多援助，或是派遣美國軍隊赴中國戰區作戰，以及中國軍隊的戰鬥能力大大低於美國的期待等等。但是設若美國在與中國交涉過程中，能夠使用符合外交禮儀的語言，和採取不具冒犯性的動作，那麼所能夠造成的傷害可以大大減少。任何一個具有普通外交能力而又感情平穩的成年人，都應該能夠達到這個要求，而不必犧牲美國的真正利益。然而美國軍方似乎掌握了一種特別技能，那就是在傷口上撒鹽，跟蔣介石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時候，一大把一大把鹽硬往他們的傷口上撒。

美國軍方的這種奇特行爲，若進入更深的心理層次探究，也許並不難理解。史迪威作爲美國軍方駐華的最高長官，已經說服他自己和他的上司，蔣介石和宋子文這類人最缺乏的就是邏輯思考能力，只懂得權力語言。史迪威同時也一貫高估美國對中國施壓的能力，可以透過對中國領袖大叫大嚷和頤指氣使，甚或故意侮辱，達到把中國領袖從道德沉淪和心智混沌的狀態中搖醒過來的目的。打從抵達中國戰區開始，史迪

威就背負著自己文化和心理的包袱，裡面既有當代美國人對有色人種的種族態度，又有他自己早年在華北生活的親身體驗。不難想像，有過多年在華北租界生活的經驗，史迪威早已習慣於接受身邊一群出身寒微的當地人的奉承。這些中國人爲了討生活，習慣性地對他們外國主人畢恭畢敬和低聲下氣。即使是當時北京政府和北洋軍人，儘管他們肆無忌憚地欺壓中國人民，但是在面對「洋大人」時，也盡量謙卑有禮，甚至曲意討好。在這樣的環境裡，略諳中文的外國人立即被譽爲「精通」中文，對中國事務略知一二立即被恭維是「中國通」。再加上在這個小圈子裡的外國人互相吹捧，更覺得以自己來自現代化社會的科技文化優勢，對於中國這個落後(**也必定淺薄**)的國家，無需多費工夫就可瞭如指掌，從而也把中國人「摸熟看透」。在他們多年來和北洋政府及部分地方軍人交往的經驗中，只要西方人提高嗓門，租界裡的中國人必定彎下背脊骨。史迪威養成了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習慣後，一旦發現重慶的中國官員居然膽敢拂逆他的旨意，自然憤恨不已。而蔣介石在眾多官員面前對他的指責，更是違反他在華的全部生活經驗，必須爭取回報。史迪威把中國領袖當作劣等和膚淺的人看待(**其實經常看錯**)，只是讓他在和他們交往的過程中，產生許多原本大可避免的困難而已。在這方面，史迪威所犯的最大誤判，就是忘記了中國的政府官員儘管萬分無能，但是他們正在民族主義的鼓舞下，不顧一切(**也是不自量力**)地和日本人死纏活鬥。

史迪威工作進展困難的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對自己在中國職權的認知和界定。史迪威完全不了解中國人當初邀請他來中國的原因，他只知道他願意來中國，就是美國幫助中國的慷慨表現，因此中國人應該時時心存感激。在他剛上任的頭幾個月，他已經多次抱怨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激表示的次數不夠多，說感謝話的聲音不夠大，熱忱不夠充分。最重要的是，他開始要中國人對他言聽計從，或是給他處理中國戰區事務的自由裁量權，包括行政權或指揮權，而不要任何中國人插手其間去干擾他。

史迪威這種心態間接說明，爲什麼他會爲蔣介石有自己的主見而感到不耐，而且還會理直氣壯地抱怨中國將領不能充分執行他的命令。史迪威自以爲「他的」計畫都是一心一意想要促進中國利益，而這些計畫比任何中國人自己擬出的計畫都好，本應當得到中國人衷心支持才對，不料中國人反而到處掣肘，拂逆他的好意。這種情況讓史迪威感到沮喪，也感到憤怒，所以要冷嘲熱諷，甚至厲聲指斥，給中國人一點顏色看看。當然，「他的部隊」(**X和Y軍**)也絕對不許中國人插手干涉，或是移作他用。

史迪威這種觀點，完全違背了中國人當初要求美國軍官到中國服務的初衷。蔣介石儘管在私下對中國人的落伍和無能感到痛心無比，並且不斷疾言厲色地加以指斥，連對他最忠誠部屬的缺點，指責起來也毫不留情，但是他並不想請一位外國太上皇來

對中國人發號施令。他請美國高級軍官來，只不過是希望他能夠作一個善於維持盟邦關係的「聯絡人」。蔣介石儘管高度讚賞某些外國顧問(特別是德國顧問)的素質，也倚重他們的意見，甚至託付他們直接管理部隊，但是他也始終堅持，外國顧問必須在中國政府指揮下服務。作爲國家領袖，他不可能一方面堅決抵制日本人把中國置於其掌控的企圖，讓中國人民承受重大犧牲，另一方面又把掌控權雙手呈給一個自稱爲中國真正盟友的國家。汪精衛不是說，唯有日本才是中國最貼心的朋友和伙伴，所以他接受日本的提議在南京另外建立一個國民政府嗎？

歷史的悲劇是，史迪威和許多美國軍事領袖，完全缺乏理解這個簡單道理的能力。因此，不論蔣介石如何大聲抱怨西方同盟國歧視和排擠中國，他們都當成耳邊風，不聞不問。他們堅信，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扮演領導者角色，幫助中國人，而不是正視中國的現實環境，再經由促進協調和合作，使中國對同盟關係作出更大貢獻。換言之，美國軍人帶著優勢的文化和體制來指導協助中國人，不是來適應中國環境的。要作出改變的是中國人自己。

令人難解的是，蔣介石在當年中國諸多領袖中，是始終堅持一定要把抗戰進行到底的一位。然而許多美國軍人沒有認真重視蔣介石這份民族主義者的資歷。顯然，幾乎沒有一位美國軍人，曾經認真研究過蔣介石的個人背景、思維方式和政治作爲，或是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複雜性。他們自信，依循自己的專業觀點給中國畫出一條路線圖，之後就不再需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對照檢驗，了解究竟準不準確或準確到什麼程度。史迪威是這種心態在中國的典型化身，而馬歇爾則是他在美國的衷心贊助人。

不幸的是，有些軍部領袖依然以爲他們可以繼續歧視中國，也依然指望中國會對他們衷心感激與俯首順從。很可能在他們的潛意識中以爲，一個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者和熱誠的愛國者，一定先要努力把國家的事辦好，才能證明他有資格贏得別人的尊敬。假如一個人既軟弱又無能，就不配作一個民族主義者，最多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幌子，隱藏自己的無能和貪欲而已。這種人充其量只能自取其辱。特別是在英語世界裡，有一句經常被引用的名言，「唯有無賴才把愛國主義作爲自己最後的庇護所」(“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Samuel Johnson)。換言之，口頭上的民族主義或是愛國主義都是騙局，無需加以重視。不幸的是，在現實世界裡，這句聽起來行之四海皆準的名言，其實有相當程度的時、空、地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民族主義剛萌芽的廣大地區裡，低落的工作效能和高昂的民族主義情操，往往在同一群人身上出現。當時的東南亞和南亞如此，稍後的中亞和北非依然如此。因此，美國軍部在處理中國事務上，也不免犯上和日本軍人同樣的錯誤。當然，有一個重要的差別，

美國已經是中國的盟友了，所以更能讓親者痛。

所以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中國領袖的才能和工作效率。客觀來說，中國在這兩方面顯然有眾多嚴重缺失，而且能夠從美國的協助中獲得極大益處。問題的關鍵是，蔣介石和他的同事是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者，而這一點偏偏是所有美國領袖掉以輕心的，唯一的例外或許是羅斯福總統本人。事實上，假如美國軍方花過一點工夫去閱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或是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就會心裡有數，他們是在和哪一種中國人打交道了。如果不觸犯中國領袖的民族主義神經，中國領袖會對外來幫助非常感激的，但是一旦他們懷疑外國的動機是想指使或是脅迫中國，他們背脊上的毛就會豎起來。中美兩國在1942年1月到1944年10月間的同盟關係，有許多的案例說明，兩國明明不需要陷入泥淖，卻硬著頭皮一定要往裡面跳。

毫無疑問，蔣介石作爲一個普通人來說，可謂缺點重重。作爲一個政治領袖來說，也有嚴重的局限性。隨著他日記的公開，學者可以在這兩方面作出有原創性的分析。但是不爭的事實是，他依然是20世紀中國貨真價實的民族主義者。要讓他接受美國並不想幫助中國這一事實，雖然殘酷但並不困難。因爲作爲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無法讓自己向美國哀求施捨。這種情緒在前文已經詳細討論。與此問題密切關聯的是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的表現。美國軍方的看法來自史迪威報告，一直認爲蔣介石的計謀是避免作戰，保全實力。但是如前文所述，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時，蔣介石已經要求遠征軍顧及中國的榮譽，全力保衛曼德勒。他在臘戌和高級將領會面時，還特別訓示：「我軍此次在國外作戰可勝不可敗，故在未作戰之前，應十分謹慎偵查敵情，十分明瞭，一經接戰則不計一切犧牲以期必勝……決定作戰以後則應期必勝，否則縱全部犧牲亦所不惜，以保我國軍之信譽及對外之信仰。」[30]第二次緬甸戰爭時，他對遠征軍作同樣指示。他1944年4月底告訴衛立煌說：「此次渡江出擊之勝負，不僅關乎我國軍之榮辱，且爲我國抗戰全局成敗之所繫，務希各級將領，竭智盡忠，達成使命……」[31]蔣介石的心情其實很單純，那就是中國軍隊在盟邦之前切不可讓人看不起。正因爲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因此只要感到個人或國家尊嚴遭受踐踏，或是中國由於種族膚色原因受人歧視，都會有強烈反應。與此相關而並沒有引起學界注意的另一個例子，發生在1944年9月份。羅斯福當時致電蔣介石稱，麥克阿瑟將軍在太平洋需要五萬民工協助後勤和建築工作，徵詢中國政府是否可以提供。中國當時亟需外匯，又有豐厚人力

30 蔣介石在臘戌對高級將領們訓話，1942年3月3日，《革命文獻拓影》，第19冊，頁2-42。

31 蔣介石對衛立煌指令，1944年4月25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6冊，頁166-170。對其他將領類似指令及詳細作戰指示，見：頁171-175。

資源，當然可以提供。然而蔣介石立即憤怒地予以拒絕[32]。他的這個反應乍看之下似乎頗爲令人不解，但是顯然他的感覺是和歷史痛苦記憶分不開(華工在美國修鐵路，在歐洲挖戰壕)，認爲美國這個要求的本身就是對中國人的侮辱。不幸，史迪威從1942年中期以來，所作所爲就一再讓蔣介石感到個人或國家尊嚴遭受踐踏，史迪威有高高在上的種族優越感。

## 四、造成中美衝突的其他原因

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個性的衝突，固然嚴重阻礙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但是並不足以解釋蔣介石對史迪威的軍事改革意見的冷淡。其實史迪威的許多建議跟德國顧問雷同，蔣介石對德國建議欣然接受，爲什麼對史迪威建議那麼抗拒？顯然，我們必須另找更深刻的理由。

依照美國軍方認知，蔣介石的反應有兩個理由。第一，由於珍珠港事變的發生，蔣介石失去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熱情。第二，蔣介石對外國人插足他的軍隊深懷疑懼，不能容忍任何外國人削弱他的軍權。這種分析是否正確，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 (一)珍珠港事變之後，蔣介石是否放棄了對軍事改革的信念？

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幾乎所有相關中方資料都顯示，蔣介石對建立一個現代化、制度化、紀律良好、裝備精良，而又能征善戰的軍隊的追求，珍珠港事變之前如此，珍珠港事變之後依然沒有改變[33]。事實上，上海戰役剛結束時，蔣介石就著手軍隊改革工作。在一次三百多位高級將領出席的軍事會議上(1938年1月)，蔣介石坦白承認國軍在上海南京戰役的慘敗，最主要原因不是武器落後或是士兵作戰不力，而是高級軍官貪生怕死，缺乏專業素養所致。他指示高級將領立即改善人事制度，善用手中資源，到基層去和官兵共甘苦，並且必須放棄過去的錯誤觀念，以爲集結了大批部隊固守一點就能保障自身安全[34]。

1939年，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領袖開始關注徵兵制度的弊端，包括制度不公平和虐待壯丁。經過多次警告無效後，他們公開而嚴厲地譴責日益顯著的弊端，表決通過一系列提案(1939-41)，指出壯丁的營養不良和健康不佳，運送過程慘無人道，徵兵手續

32　羅斯福致蔣介石電，1944年9月11日，《戰時外交》(三)，頁309；蔣介石日記，1944年9月12日。

33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輯》，第36冊。多處談到1920年代整軍計畫及措施。

34　翁文灝日記，1938年1月21、22日。

充滿貪污腐敗，逃亡數字驚人等等，並要求立即改正[35]。珍珠港事變後不久，國民黨黨代表大會(1942年12月)再度譴責這些缺失，並要求改正[36]。用不著說，這些議題所以能夠列入黨代表大會議程，是因爲蔣介石授意。不久之後，他又多次以手令方式對各軍事單位重申同樣立場。

政府官員的貪污，也遭到蔣介石抨擊。1941年夏天，有一個重要貪污案牽涉了一些空軍軍官，從緬甸私帶奢侈品經由香港進入中國內地。案情明確後，蔣介石立即命令對犯罪者給予嚴重處分[37]。珍珠港事變後，蔣介石對貪污案件的態度變得愈加嚴峻。不但要求嚴懲犯罪官員，而且要沒收家產，槍斃主犯[38]。因此，蔣介石的缺點，並不在於他對政府和軍隊的貪污無能現象缺乏了解(這是史迪威的看法)，或是無意改正。他的問題是缺乏足夠領導才能和組織力量，無法提高辦事效率。任何人只要略微瀏覽蔣介石數量極其龐大的個人檔案，都會吃驚地發現，他在戰爭期間親筆寫了那麼多手諭和指令，卻依然不能改正弊端。這些手諭和指令的內容包含極廣，有關於中國內政、軍事和社會工作的各種缺失，外交關係的處理不當，對貪污腐敗無能官員的處置，對日本空襲受害者救濟不足。有時甚至瑣碎到重慶市的垃圾管理，對拖車牲口的虐待，街道上乞丐的管理，政府標語和商業廣告的用詞不當，馬車夫應該保持馬匹清潔和營養，並隨地撿起馬糞，不一而足。

蔣介石需要寫這許許多多親筆便條，也正好說明他個性上的一個趨勢，想把政府施政的所有缺失加以改正，而且事必躬親。同時也暴露了國民政府行政上的重大弱點，不能掌握一個有效的組織，服從他的命令，把事情辦好。進一步說，就是蔣介石缺乏能力建立組織和制度，向下授權，下級職有所司，分層負責，執行上級命令。結果是，事無鉅細皆需躬親過問，乃至親手處理。無日不在爲國辛勞，不斷指責屬下的缺失，嚴令要求改正，而收到的效果卻是少得可憐。當蔣介石目睹貪污、腐敗、無能和不公平現象時，絕對不缺少關懷、憐憫和厭憎之情，而是時常令他「髮指」。但是他缺少的是嚴格控制各階層政府和軍隊的力量，督促它們執行命令，善盡自己分內的職責[39]。蔣介石需要寫這麼多手令改正這麼多缺點，本身就證明，政府各部門都不

35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六中全會決議，1939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微卷第354卷，頁2292-2324。中國國民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八中全會決議，1941年5月，《國民政府》，微卷第355卷，頁0009-0070。

36 《國民政府》，微卷第355卷，頁0422-0434。

37 「蔣公手令」，1941年8月19日親筆手令。《總統府檔》，055/1950-1，文件第16號。

38 翁文灝日記，1942年6月3日。

39 「蔣公親筆手令」，《總統府檔》，055/1949，內含多件蔣介石親筆手令。

能發揮職守內應有的功能。當然，國民政府的行政體系本來就是新舊時代的混合體，僅僅是處理作戰、徵兵徵糧、維護社會治安、興辦教育、救濟難民、疏散百姓、醫療傷患、重建戰火破壞的城鎮等迫切事務，就已經大大超過其負荷能力了。簡言之，蔣介石不是昏君，更非暴君，和希特勒、史達林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他缺乏「治國」的雄才大略，縱有高度的爲善意願，卻缺乏爲善的能力。以致讓自己累得筋疲力盡，而弊病依然如故。但是偏偏在當時中國的領袖群中，他抗日的決心又最堅定，手中的軍隊又最齊全。這是中國當時的政治現實，美國盟邦如果有智慧可以看出其中道理並善加運用，就可能從同盟關係中作出更大的成果。但是史迪威偏偏缺乏這種智慧。

再就軍事而言，蔣介石一貫追求的就是一支強大軍隊，他的外交政策也以此爲目標。南京時代(1928-1937)，他的雄心是建立30個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精銳師，並且使中國的國防工業、交通系統、飛機工廠、化學工廠等等，逐步達到現代化程度[40]。1937年冬季南京失陷後，蔣介石立即請求蘇聯幫助中國裝備訓練20個步兵師。但是1939年冬季攻勢全盤失敗，終於使蔣介石了解，他過去兩年整改軍隊的努力，完全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重新點燃了蔣介石的熱情，讓他期望美國這個新盟友提供比德國和蘇聯更多的裝備和訓練。這也說明，爲什麼中國政府很早就請求美國援助建立30個師。有一個歷史細節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史迪威並非30個師計畫的創議人，他也不知道這個計畫的來歷，但是承認中國政府的出發點是要建立一支攻擊性部隊[41]。等到情況更爲有利時，蔣介石和魏德邁密切配合，把原來的數字增加到90個或是120個師。1942-45年期間，蔣介石指示屬下，爲軍隊改革草擬各種計畫，舉辦各種會議。在這幾年的日記裡，他不止一次感歎，處理黨政兩方面事務力不從心，並希望能夠交由別人主持。但是對於軍隊整改訓練，他一直認爲當仁不讓，必須親自推動。

或許最能說明蔣介石對中國弊病的態度和改革願望的行動是他在1944年3月31日的一件手令。當時一號作戰尚未開始，史迪威奪權事件亦未發生，因此來自美國的壓力並不大。但是顯然有一位譯名叫作「格爾德」的外國人(*原名待考*)對於中國黨政軍的弊病提出了批評。當蔣介石讀完該文之後感受極深，向陳布雷親筆寫了一個手令，全文如下：「此格爾德論文應作爲我國黨軍各同志反省檢討最寶貴之材料，應由中央黨部、行政院、軍委會分發其所屬各級機關，由其各級主管者召集小組會

40 See: William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chapter 7. Also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41 Stilwell, AMMISCA in Chongking, September 9, 1942. Box 15, Folder 176. For an American account of the content of the 30 division plan, see: "30 Divisional Plan", Box 9, File 99. Both in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議，切實檢討，並擬定如何能徹底革除其所說之弊病，逐條作一對案，上下一致，共同奮勉，以湔雪此未開化民族，與中國戴有假面具無以掩飾其內心之腐敗與欺詐等之諷刺。尤以其一，中國軍隊管理與指揮不良，二，裝備使用之不適當，人員運用之不經濟，以致浪費，以及三，在下者之營私舞弊，在上者之懦弱無能等之批評，如何乃能革除此恥辱？凡我有志氣之同志，皆應以此爲他山之石，朝夕警惕自勉，努力改正，爲國家爲革命掙氣雪恥。否則閱此澹然置之，則世間再無有廉恥之事矣。中正。三月卅一日。」[42]（按：標點符號為作者所加。）

有了以上背景的了解，可以想像，1942年6月史迪威在重慶談到中國軍隊的缺點和改革的必要性時，其所持態度和所用語氣，似乎把蔣介石當成是一輩子不曾聽過如此新穎的道理，需要他這位美國軍官予以開導，蔣介石當時的感受想必是啼笑皆非。他發現史迪威對中國軍隊缺點的批評，和德國顧問甚至和中國人自我批評基本相同。假如史迪威在赴華之前作過些許準備工夫，或是他到中國之後，在重慶多停留些時間去虛心觀察，他就會發現，蔣介石最需要的不是史迪威給他上啓蒙課，把指出中國軍隊缺點講成是自己的慧眼獨具，而是需要史迪威提出具體解決方法。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國人還自鳴得意以爲替中國人發掘到問題，而是蔣介石對他們的高明見解不能領會，這就未免可笑。美國人不願深究，蔣介石爲什麼沒有能力實行那些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法，卻以爲已經盡力幫助中國，奇怪之至。

## （二）蔣介石是否擔心美國的軍事操縱？

在某些美國軍人心目中，蔣介石打內心抵制外國軍事顧問。這和美國人想從他手中拿到中國軍隊指揮權而遭遇抗拒一事是有關聯的。如同第二章所述，美國從同盟關係建立一開始，就計畫從中國人手中取得軍隊指揮權。這後來成爲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甚或是唯一重要目標。但這也是造成中美同盟關係不斷摩擦的導火線，1944年9-10月幾乎導致同盟關係全面破裂。理由是美國軍方一開始就想把他們自己所熟悉的制度化方式移植到中國，完全不管這種方式是否符合中國的政治和軍事現實。

至於爲什麼幾乎全部美國領袖都以爲，中國人需要美國軍官作他們的指揮官一事，根源大概是美國人對中國人長期以來先入爲主的文化和種族觀念。中國儘管名義上已經是獨立國家，但是在美國人眼裡，中國人還是和菲律賓人差不多，到底都是亞洲人，需要美國領導，而且中國人也將會樂意（或馴服地）接受美國命令。當然居里說得最露骨，一般美國民眾都把美國與中國看成是父子關係。在這種主流心態宰制下，美國人領導，

42 總統府，055/2153，「蔣委員長手令」。

中國人服從，誠屬天經地義。

可惜美國人忘記了一件大事：中國這樣的國家，儘管工作效率普遍低落、政府無能、官吏貪腐、內戰連連、民生凋弊，而且社會失序，但是民族主義的種子卻已播下數代之久。中國不是菲律賓。美國把菲律賓人民從西班牙暴政下解放出來，代之以美國式的開明殖民政府，使其對美國人的領導既感恩又服從。但是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早在19世紀末期已經萌芽。民族主義不但是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基礎，和國民黨整個政治奮鬥的凝聚力及訴求點，也是中國在過去半世紀所有重要民間運動的原動力。假如國民政府領袖願意忍受某種程度的外國統治，他們當初就大可不必抵抗日本了。

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領袖對中國現代史的無知也著實驚人。很少有美國軍事領袖能夠設身處地想一想，在標榜抵禦外侮的對日抗戰中，蔣介石把軍隊指揮權拱手讓給外國軍官行使，他將如何保護自己不受汪精衛等人的嘲弄和侮辱。史迪威不但要求的指揮權範圍涵蓋一切，也充滿政治色彩。史迪威堅持取得一切和指揮權有關的具體表徵，包括頭銜、官印和其他各種官方標誌。在形式上昭告世界，中國軍隊從此以後將由美國人當家作主。這一切如果成爲事實，蔣介石可能比汪精衛更會被指責爲「賣國」。美國人這個要求，大概是他們在太平洋戰爭中所犯的最大政治錯誤。

多數美國領袖把指揮權的表相和實質混爲一談，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兩者之間在中國特定環境下的天壤之別。蔣介石儘管堅決拒絕以正式方式交出指揮權，但是很可能願意把實質的指揮權交給外國軍人行使。事實上在此之前，蔣介石已經讓德國和蘇聯軍事顧問，非正式地或是在幕後行使相當程度的指揮權了。美國堅持把一個美國軍官安置在中國軍隊頭頂上發號施令，循名責實，反而受到蔣介石的懷疑和抵制，結果阻礙了中國軍隊的改革。

如果我們從時間上作一個簡單的回顧，或許更能凸顯一個事實。美國政府要求指揮權最大的官方理由，是基於中國軍隊在一號作戰第一期(河南)的潰敗，認爲唯一對付危機的辦法是由美國軍人主持作戰。而這個潰敗發生的時間，正是史迪威完全漠視中國戰局的時候。他遠離中國戰場，對蔣介石的召喚不予理睬，然後在7月份以戰局危急作爲口實，要求指揮權。如果此時美國政府謹守盟邦立場，不把注意力放在趁機奪權，而放在誠心協助作戰的話，那麼對於第二期(湖南)的防守可能產生重大幫助，因爲方先覺的第10軍正在艱苦阻擋敵人攻勢，而且成績斐然。如果湖南守軍能夠及時得到陸軍和空軍支援的話，也或許日軍銳利攻勢就可以有效地阻截。而從1944年7月開始，直至史迪威10月底離華之日爲止，他的談判策略卻正是以擴大華軍的敗績，作爲其振振有詞獲取指揮權的籌碼。第三期作戰(廣西)也正是史迪威奪權進入緊鑼密鼓階段。這種

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做法，一直要等到魏德邁接任之後才被美國政府徹底放棄。

美國政府另外一個假設是，史迪威有足夠的能力可以逾越蔣介石和他的「重慶嘍囉們」，直接在中國軍隊中樹立威信。他們把中國軍隊對他們的服從，看成是中國人打心底信服美國軍人的權威和領導才能。事實上，美國軍方人員所以能夠對中國軍隊發號施令，而且得到服從，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中國政府指示軍人一定要遵照史迪威的命令行事。假如中國軍隊和將領們對重慶政府不服從，也不對最高領袖效忠，史迪威僅靠一小群美國軍官，根本無法指揮得動中國的將領。因此，如果有人以爲史迪威可以撇開蔣介石，而直接贏得中國軍人的服從，那真是荒唐透頂的妄想。但是史迪威的確就是這麼想的，他一再堅持要有總司令的官銜，以爲只要手中握著總司令的印章，就可以在中國指揮千軍萬馬。有趣的是，偏偏就是這種想法，讓史迪威自己在1944年9月向中國提出掌控中國軍隊全權的要求。

簡言之，在1928-38年間，蔣介石雖然從未任命一位德國軍官作爲正式指揮官，但是實際上，時常容許德國顧問行使比中國指揮官更大的指揮權。在美國人中間，最好的例子就是陳納德。陳納德沒有指揮官的名義，但對中國空軍的掌握權，遠遠超過任何中國空軍將領。魏德邁也一樣，沒有中國指揮官的頭銜，其部下卻常常得到蔣介石主動的實質授權，讓魏德邁大感驚奇（第12章），就是因爲蔣信賴的緣故。完全可以想像，蔣介石拒絕向史迪威交出指揮權，並非因爲他是美國人，而是因爲對他沒有信心。

有趣的是，有些著作引用第二次緬甸戰爭爲例，證明它符合由美國提供領導而由中國提供人力的安排。如果了解事實的真相，他們就不敢這樣主張了。一些著作中大量報導美國軍官對中國軍隊缺點的批評，但是它們卻很少得知，中國軍官同時也對美國軍官表現的無能，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指責。然而每當這些軍官們向蔣介石報告美國軍官們的缺點時，蔣介石一貫的回應卻是告誡他們，只可稱讚盟國軍人的長處，切不可批評他們的短處。蔣介石勉勵中國軍人勤勉、慎重有度和謙虛自持，切不可對盟國軍人心存不敬，更不可表露不敬態度[43]。因此，即使在中國軍人接受美國軍官指揮的大環境下，中國軍官對美國指揮仍有怨言，有時甚至相當嚴重，但是一律被中國政府壓制。可以想像的是，如果這些軍隊對中央政府或是蔣介石的權威並不尊重，那麼他們的行動就不只限於抱怨了。

最後還有一點或許應該在此回歸歷史原貌。不少著作把第二次緬甸戰爭的功績歸於史迪威，這實在是誇大其詞。這個問題從時間上就可以一目了然。戰爭的初期（1944年1-4月），史迪威憑險冒進，幾乎把自己陷於絕境，以致不得不向蔣介石告急求援。5

43 蔣介石對廖耀湘師長之回應，1944年3月30日。《革命文獻拓影》，第26冊，頁155。

月開始，雲南遠征軍進入戰場，立即扭轉局勢。8月開始，史迪威赴錫蘭休假，9月到重慶奪權，10月底鎩羽返美。大致算來，在整個第二次緬甸戰爭前後15個月的艱苦戰鬥中，他真正指揮緬甸戰爭走向勝利的時間應該不會超過三個月，而還只是初期而已，剩下來漫長的戰鬥是由別人負責。把第二次緬甸戰爭看成是史迪威的戰爭成績，非僅嚴重失實，而且極不公平地掩蓋了許多別人的重大貢獻，這當然包括中國遠征軍的官兵們。

## 肆、中國的政治軍事現實與蔣介石軍事改革的限度

### 一、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

如果想要推行利益交換原則，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雙方都能向對方提供彼此所渴望的事物。因爲如果有一方根本沒有掌握該項事物，則無論對方如何威迫利誘，都無法達到目的。在本書所討論的範圍內，毫無疑問，美國擁有中國所想要的一切事物或資源。粗略估計，只要美國把援華物資提升到美國租借法案物資的百分之五(5%)，就可能超過中國政府吸收和消化這些物資的極限。換言之，決定美國能否參加交換活動的是美國的「意願」，而非其「能力」。

相對而言，中國能否滿足美國交換要求的決定因素是它的「能力」，而非「意願」。原因是雙方的意願其實非常相符：美國想要的事情也一直是蔣介石本人所想要的，那就是認真執行軍隊改革，提高戰鬥力。但是蔣介石想要的目標和他的「能力」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距。換言之，軍事改革過程可能遭到的困難，遠非蔣介石靠獨自力量或是意志所能克服。在這個意義上，蔣介石所以對史迪威的改革建議缺乏積極回應，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蔣介石的意願，而在中國的政治軍事環境，這也正是史迪威及軍部所不予理睬的因素。這些因素是由中國內部的政治軍事大環境所決定，進而嚴重限制蔣介石改革的可能性。史迪威對於蔣介石不滿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受自己分析能力的局限，只知把焦點凝聚在蔣介石個人的特性或是缺點，而不知從宏觀角度和結構層次上，去探索更深層的原因。他不知道中國自從1937年戰敗以來，其內部政軍環境已經產生了驚天動地的改變。這麼說來，造成史迪威不滿的導因，並不僅限於他們兩人之間的個性衝突而已，也有史迪威本人欠缺政治智慧的致命傷在內。

要了解這些驚天動地的變化到底是什麼，必須回到本書「前言」的論述。中日戰爭爆發之前，蔣介石可以相當自由地採用德國模式建立新軍。再以這個新軍保障其他領域的多項建設工程和各種改革試驗(行政、經濟、財政政策、交通通訊系統，以及大規模的民間和國防工業建設等等)。國民政府對長江下游魚米之鄉的控制，使它有充分的

財源、足夠的壯丁和地理上的安全，可以同時實行各種計畫，而不必擔心地方實力派軍人的阻擾。儘管地方實力派軍人肯定不樂意看到南京國民政府日益壯大，但是他們泰半無能爲力。南京政府有能力規定軍隊指揮官不得干涉民政事務，必須全心全意訓練軍隊。南京政府也可以自由地從事外交關係，而德國也極願配合。只要中國政府付得起價錢，德國非常願意提供新式武器和工業設備。那個年代給南京政府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實施蔣介石的軍事理想。而他也善用了這些條件。然而一旦國民政府被日軍趕出根據地而退到內地後，情形立即全面改觀。對於這個背景的了解，可以幫助美國運用最有效的辦法，誘使蔣介石繼續追求建立強大軍隊的理想。同樣，如果對這個背景缺乏了解，就會使美國的努力誤入歧途，甚至註定失敗。

美國對華政策的假設有一個基本矛盾，一方面它把中國人當成是落後人民，需要美國人的開導才能進步。另一方面它又把中國當成是符合現代定義的統一國家，而這個假設與中國現實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或許更恰當的說，中國其實是一群半自主地方政權的混成體。地方政權和重慶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各有不同，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地理距離、個人關係、地方文化和歷史背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最能夠衡量一個人擁有權力多大的標尺，不是官職名稱而是手裡擁有槍支的數量。當蔣介石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和中華民國委員長的身分，坐在重慶軍事委員會的辦公室時，他在國際上看似一位有模有樣的現代國家元首。但是他自己心裡非常清楚，這只是表相而已。因爲在中國的政治軍事大環境裡，他只不過是眾多權力集團中的一分子，而不能凌駕所有權力集團之上。

在國內現實的限制下，蔣介石必須盤算實施軍事改革的勝算和風險各有多少。地方實力派軍人控制下的政府機構，當然會把它們主子的利益放在重慶政府之上，遵守各省或是地區領袖的意旨收稅，收到稅金首先放進地方軍人的銀庫，剩餘之數才被送往重慶的「國庫」。同樣，最好的壯丁一定先留下來補充地方部隊，剩下的才會送交中央。這些情況說明，爲什麼中央政府規定的徵兵徵稅徵糧等任務從來無法如期完成。同時，官員貪污腐化的程度，也遠較1937年以前在國民政府控制區更嚴重。令人並不感到驚訝的是，蔣介石和史迪威互動時，蔣介石一再因爲無法兌現對壯丁數字的承諾而感到異常尷尬，但是他自己知道已經達到他政府權力的極限了。但是在史迪威看來，這些兌現不了的承諾正是蔣介石蓄意不合作的劣跡。在史迪威的分析架構裡，蔣介石不合作的原因要嘛是他麻木不仁，要嘛是他存心破壞，而蔣介石愈是想掩飾自己的政治無權無能，美國政府就愈是相信他是陰險奸詐。換言之，一旦美國人採用了一個錯誤的理論框架去觀察和解釋眼前表相，他們就會推演出錯誤的結論，進而制定錯誤的對

策。這一切都可以條理井然，自圓其說。

當然，地方實力派軍人不合作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更嚴重的是他們很可能積極反對軍事改革。在史迪威的心中，他不但相信他不必對中國需要軍事改革的道理多費口舌，同時相信自己已經把實施改革的方法都準備完善，只待付諸實施即可。史迪威改革方案的目標涵蓋了大部分中國軍隊，內容也廣爲人知，許多著作都曾大量加以引用。這些方案包括應該善待壯丁和士兵、改進他們的生活品質，根絕軍官的貪污(吃空缺和從事商業行為，甚至投機倒把和包庇煙賭)，嚴懲懦怯和獎勵勇敢，裁撤無能軍官的職務，任命和提拔稱職的軍官。在更高層次上，中國軍隊必須大量縮編、精簡大而無當的體制、取消有名無實的軍隊番號、裁撤戰鬥力薄弱的軍隊，把戰鬥力略高的軍隊整併成一個小而精的國防軍，成爲所謂國家新軍的核心。與此同時，所有經過改編的軍隊，必須接受嚴格訓練，提高戰鬥力，並在新武器一旦運抵中國時，立即進行換裝和補充，隨之投入戰鬥。

顯而易見，史迪威這些改革方案大都來自美國陸軍的標準運作程式，其效果早已由美國經驗充分證明。美國軍官不但認爲它們的正確性毋庸置疑，並認爲中國人也應該了解其中道理。因此，當蔣介石對這些看起來合情合理的改革方案，似乎並不欣然接受而立即交付執行時，史迪威當即的反應就是，美國必須動用手中籌碼強迫蔣介石執行。美國政府的對策是由美國人直接控制指揮中國軍隊。無論如何，史迪威完全相信，中國軍隊所以不能改進戰鬥力，主要責任應該由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承擔。根據史迪威再三敦促華盛頓上司所應該遵行的利益交換政策方針，它的實際內容就是由美國政府施壓，強迫蔣介石接受，或是把指揮權從他的手中奪走，甚或把他秘密處決掉。

不幸，史迪威的軍隊改革建議，基本上忽略了中國國內的局勢。由於史迪威的目標是以美軍模式改造中國軍隊，而他相信最有效的辦法，是經由蔣介石正式以公布命令的方式開始實行改革。根據這個做法，凡是不合作的軍官將予革職，凡是不當的行爲將予懲處。更有進者，史迪威雖然熟知許多中國軍隊嚴重短缺武器，但是認爲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採取一個更簡單合理而又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把全國品質良好的武器集中起來，再重新分配給戰鬥力高的部隊。這樣中國就可以有足夠的各類武器和日軍作戰，無需依賴外援。曾經擔任過多年美國駐華武官的史迪威，對於中國地方實力派軍人對武器的看法，竟然無知到如此地步，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他應該知道，地方軍人所以能夠控制地盤，主要就是靠手中的武裝。若要他們把武器交出來由中央重新分配，不管分配的方法如何公正，都等於是要他們去進行政治自殺。套一句中國的老話，史迪威無異是與虎謀皮。

用不著說，史迪威這種直截了當的軍事改革方案，令蔣介石左右爲難。顯然，他沒有能力對全中國四、五百萬軍隊一視同仁，同時推行改革方案。合情合理的做法，是先選一部分軍隊作爲改革先驅，然後逐步推廣到其他部隊。但是這麼做，首先要考慮政治因素。可是根據史迪威的邏輯，在抗日作戰中表現最旺盛戰鬥意志和戰鬥能力的部隊，當然應該享有優先被選拔的機會，而戰鬥力低落的部隊則勢將受到忽視。原則看似很簡單，但實際執行時問題就紛至沓來。蔣介石嫡系部隊一般說來戰功顯著，因此可能自認爲最有資格優先接受訓練和裝備。大部分地方軍人則可能認爲，自己部隊從來沒有開出省境外迎戰日軍，而被排除在優先名單之外。還有不少其他部隊因爲在前線表現無能而落選。落選的部隊，未來一定缺錢、缺武器、缺乏重視，最後可能被淘汰解散。在這樣考慮下，沒有被選中的實力派部隊一定會猜疑蔣介石，故意把改革好處留給自己的嫡系部隊。反過來說，如果地方軍人的部隊被選爲改革對象，他們又會擔心會失去對這些部隊的控制權。因爲歸根結柢，軍隊改革的大趨勢，本來就是爲了要建立一個屬於國家的軍隊，打破地方割據色彩。而這正是和地方勢力的現實絕對相衝突的。

國民政府在1928年，曾經作過一次全國性軍事改組的嘗試，結果慘遭失敗。原因是當時各個軍事派系之間存在嚴重的互相猜忌。史迪威的改革建議，在美國的政治體制和環境裡幾乎可以保證成功，因爲美國是一個高度團結而又制度化的國家，將領們並不擁有部隊的所有權，他們只是在特定的條件下(**職稱、任期**)擁有使用和指揮權。法律的權威不在個人，而在職位。然而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國，肯定不是這樣的國家。如果軍事領袖們之間缺乏互信，那麼無論選擇哪一個部隊進行換裝和整訓，都可能被某些人認爲是公平合理建立國家軍隊的方式，又被另外某些人認爲其中詭計多端，目的只是消除異己。前者樂意積極配合，後者誓死抗拒抵制。史迪威軍事改革方案在戰時中國所面臨的困難，其實和美國軍事整頓一般可能遭遇的情況完全不同，反而是更和國際上裁軍運動遭遇的困難有相似之處。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的裁軍運動，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限制核武器談判過程中，美國都遭遇過和蔣介石同樣的困境。以史迪威曾經在中國服務的背景，他應該了解，除非蔣介石可以得到美國最強力而可靠的支持，不然他絕對不願意或是不敢去碰這個難題。因爲在1942-1944年期間，蔣介石嫡系軍隊和地方實力派武力比較起來，已經遠遠不如1928年北伐成功時期。事實上，有相當部分名爲政府軍而實際是地方軍的部隊，已經投靠汪精衛政權，或是在暗地裡和日本人達成互不侵犯的諒解。在如此不利的情況下，蔣介石有足夠的理由擔憂，美國提出的軍隊改革方案，只會造成比1928年更不可收拾的局面。

## 二、蘭伽訓練基地的優異成果

鑒於以上分析，印度蘭伽訓練基地作出來的輝煌成果，就值得我們特別重視，並且對它的意義給予慎重的思考，因爲它經常被提出來作爲史迪威軍事改革成功最有力的證據。蘭伽經驗使一些人相信，史迪威已經研發出一套對中國軍隊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只要蔣介石將其推廣到全中國，那麼一支中國的新軍就可以建立起來。不幸的是，這個結論並不合理。

爲了提高分析的深度起見，我們可將蘭伽經驗分爲兩個部分來思考。一是蘭伽計畫本身的內容，一是蘭伽可否推廣到中國其他地區。

談到蘭伽經驗的內容，史迪威毫無疑問作出了成績，證明他訓練方法的優越性。在他不斷努力下，美國的訓練方法、管理制度、武器補充，都使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大幅提升，實現了史迪威最初的承諾。但是應該注意，蘭伽經驗是在特定條件下成功的例子，不能證明同樣的方法施之於中國國內時會產生同樣效果。事實上，得到的效果恐怕恰好相反。

人們一般容易忽略另外一個現象，那就是，蘭伽訓練也對蔣介石對軍事改革的態度，提供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見證。與其說蘭伽經驗充分暴露了蔣介石和史迪威對軍事改革極端相反的立場，不如說它充分證明他們兩人對軍事改革高度一致的立場。如同在本書第三章所說，即使是在第一次緬甸戰爭尚未結束而中國軍隊仍在戰場苦鬥時，蔣介石就已經同意讓美國軍官們協助訓練中國軍隊（十萬人）。史迪威對蔣介石的抱怨是在這一次緬甸戰爭失敗之後才開始。我們需要注意的是，蔣介石那時不是反對訓練軍隊，而是不願意把十萬人的命運委託給一個無法信任的人。然而，正如第七章（貳-四）所述，蔣介石與同僚一旦看到史迪威的成績（其實最初只是看到照片和電影紀錄片而已），就立即極口讚揚，而且主動要求增加受訓人數。等到他們（包括何應欽在內）有機會親赴蘭伽現場視察時，更是眾口一聲地讚賞不已，無一人提出任何保留意見，無絲毫牴觸情緒。而中國人這種熱烈的情緒，最有力地說明了中國政府官員對軍事改革的正面態度，也是美國人最需要善加運用，去推廣軍事改革方案的要素。但是特別引人注意而且也讓人震驚的是，史迪威對中國人的熱情表現卻自有一套獨到的見解。在他看來，蔣介石接受蘭伽訓練只是兩個理由；一是因爲他無法把這些中國軍隊運回國內，所以只好聽從美國人的安排；二是把他們留在印度可以防止英國人抽走美國援華物資[44]。換言之，史迪威完全沒有看出更深層的原因。這就讓他平白失去在中國產生影響力的絕

44 Stilwell memo to Currie, August 1, 1942.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好機會。

其實，中國政府這種正面態度說來並不奇怪，因爲蘭伽經驗對於中國政府而言，並非破天荒的首開眼界。中國人從前和德國顧問合作時，就曾經一度目睹類似的成就，只是現在是由美國人支持，耗費時間更短，武器更新穎，得到的成果更大而已。蔣介石從來沒有動搖過對軍事科技的信心，而蘭伽經驗肯定讓他重新恢復對史迪威作爲一個「練兵之將」的信心。至於他在戰場作爲一個「帶兵之將」則仍然是另外一碼事。史迪威對蔣介石對蘭伽成就的熱情表現，只看出後者在現場的表現，而沒有因此引起深思，實在是史迪威的損失。正因如此，史迪威才不覺得需要修正他對蔣介石的評價，仍然堅持後者對改革的愚昧和抗拒。

既然中方反應如此熱烈，蘭伽模式是否可以推廣至中國全國？我們應該體會到，在蘭伽經驗的例子裡，蔣介石面臨的選擇非常簡單，而且沒有政治困難，他可以立即給予充分合作。在蘭伽基地的X部隊各師，全是蔣介石最精良的忠誠部隊，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戰敗時撤退到印度，再以空運方式把中國壯丁送到印度補充缺額。他可以挑選參加訓練的全部部隊，因爲訓練和裝備等工作，都在地方實力派軍人看不到也無法管轄的範圍以外進行，所以並未引起他們的疑懼。蔣介石很高興與美國人合作，因爲他了解美國領導和監督的價值，同時也知道忠誠部隊是直接受惠者。換言之，在蘭伽訓練基地工作的美國人，是幫助他訓練和裝備他的忠誠部隊，而這正是他多年來的夙願，而又是在中國國內政治環境下所做不成的事。至於地方實力派軍人，他們多半對遠在印度進行的改革並不知情。何況即使知道，也無能爲力，更或許慶幸自己部隊沒有被派往外國。因爲萬一不幸被選上，最可能的結果就是部隊從此脫離自己掌控，前途難卜。換言之，蘭伽的整改是在一個和中國內政絕緣的環境下造成的。

## 三、雲南省遠征軍的改革努力

就實際而言，蘭伽經驗與1930年代德國顧問爲蔣介石政府練兵的模式有高度相似之處。但是，美國練兵和改革模式一旦被推廣到在雲南省的Y部隊，事情立即變得複雜。

首先，它是中國境內組成的一支大部隊。國內任何一支部隊被挑選參加訓練，或是被排除在訓練計畫之外，都馬上會有明顯、立即而長遠的含義，因爲這牽涉到各軍事派系之間勢力的消長。第二，稍爲機靈的地方軍人領袖，對接受美軍訓練和裝備能夠得到的好處，都看得比較明白，心中各有盤算。第三，史迪威軍事改革的目的是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國家化的軍隊」，但是地方軍人的第一個反應是，如果自己部隊接受

訓練，會不會徹底中央化？他們手頭還能繼續有效控制多少武力？他們又將如何控制自己的地盤？史迪威只想加強中國的國軍，卻不可避免地帶來中央和地方勢力之間矛盾的激化，甚至造成衝突。因爲沒有一個訓練計畫可以把好處均攤到各個實力派手中，何況均攤是否公平也見仁見智。最後，如上文所說，當重慶政府需要圈定一大批部隊接受訓練時，馬上遭遇困難，找不到足夠兵源，因爲壯丁的來源受地方實力派軍人控制。

這些因素使蔣介石挑選Y部隊的步調看來緩慢。不難理解，蔣介石當然希望從親信部隊和抗日有功部隊中挑選進行改革的對象。但是這樣做肯定會引起地方勢力的疑懼，認爲這是蔣介石企圖壯大嫡系部隊，進而獨霸中國的先聲。爲此，蔣介石不得不小心翼翼，而美國人得到的印象則是他裹足不前，根本不想改革軍隊。這些微妙的政治和心理因素說明，爲什麼蔣介石這一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以軍事改革出名的軍人，過去曾經雄心勃勃要爲中國建立30個現代化陸軍師，但是在執行Y部隊訓練工作時，反而因爲進度緩慢態度猶疑而被史迪威嚴厲抨擊，把他看成是軍隊改革的絆腳石。令人注意的是，在史迪威大量地抨擊中國軍事缺點的論述中，他從來沒有表現出絲毫能力去體會蔣介石的政治困境。相反地，蔣介石的行動緩慢只是加深史迪威的信念，認爲蔣介石或者是一個對現代軍事科學渾然無知的舊式軍人，乃至是軍事白癡，或者是打從心底懦弱無能，不想和日本人作戰，又或者是奸猾無恥，蓄意作壁上觀，等待美國人替他打敗日本。就這樣，史迪威始終沒跳出他爲自己設計的迷魂陣，也把他華盛頓的上司們引入歧途。

## 四、在中國其他地區的軍事改革工作

X和Y部隊的訓練成果，證明史迪威麾下軍官是優秀的訓練專家，但是並不證明這兩個例子可以完全適用於中國內地的其他軍隊。正好相反，任何把這兩個例子推廣到其他中國軍隊的企圖，都可能引起嚴重動盪不安。比如說，假如蔣介石要按照史迪威的改革方案，解散一部分地方軍人的部隊，很可能就會激發地區性的武裝衝突了。在這改革計畫還沒有取得任何成效之前，重慶政府可能在那些地區被驅逐出境。然而爲了安撫地方軍人而把他們的部隊列入訓練計畫，下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好處」公平分配，讓所有的實力派皆大歡喜。還有一個可能是，一旦這些地方部隊獲得武器裝備並完成訓練，突然表示不願意被納入一個全國性的指揮系統時，這又將如何處理？一個完全可以想像的情況是，部分地方實力派軍人既願意得到武器又願意接受訓練，但就是不願意自己的部隊被納入國家化的過程，更不願執行和日本人作戰的任務。鑒於史迪威軍事改革方案的總目標，是爲中國建立一支善戰之軍，那麼地方軍人的盤算

就可能有以下幾種情況。他們之中可能有部分領袖非常樂意由美國人幫助訓練和裝備部隊，然後轉型爲國家化部隊，積極參加對日作戰。他們之中也有爲保持對地方部隊的控制權，寧可放棄訓練和裝備的好處，不冒任何風險，寧可置身事外，繼續在自己的地盤上對人民進行壓榨，以維繫其政治生命。總的來說，凡是企圖保持地方武裝的派系，都不願看到別人的部隊參加改革計畫，因爲這樣就會威脅到他們本身未來的生存。在這些複雜心情和政治盤算運作下，軍事改革遠遠不是技術層次的問題而已，它其實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而史迪威對於這些問題從來未置一詞，更可能茫然無知。當他果然不幸遭遇困難時，最好的方法就是責怪蔣介石交出的指揮權不夠徹底，或是他指使部下陽奉陰違，進行破壞。總之責任切不可由美方負擔。

事實上，在整個國民政府統治的時代裡，中國的政治軍事情況極爲複雜，而且充滿了高度不穩定性，以致任何解決方法都會產生風險。因此在蔣介石等人的心目中，風險必須是控制在可以承擔的範圍內，而得益也必須大過風險，這才能鼓勵他們採取必要的行動。美國在1941-1945年間想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制度化和國家化的軍隊，動機無疑是出自崇高理想，也和蔣介石多年來的願望密切契合。只是實現目標的方法充滿危險。美國政府既未能體察蔣介石個人的軍事觀點和現代化取向，又不願耐心了解中國國內政治軍事環境的特色。它只會把美國制度化的特色生吞活剝地搬到中國政治環境裡來。不知道在20世紀前半段的中國歷史，其實就是一部制度崩潰和重建史，舊制度既沒有徹底消滅，新制度更沒有穩定建成。史迪威要以國家權威和總司令名義下達措詞嚴厲的指示，命令部屬確實服從改革的要求，和把他們較好的武器交出來讓中央政府重新分配，這些想法只能令人感到啼笑皆非。難怪蔣介石無法接受。

在中美同盟關係中，蔣介石自有他的悲劇，那就是他既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制服地方實力派軍人，又沒有足夠的政治智慧建立新而有效的制度，尤其沒有足夠的勇氣向美國盟邦坦白承認他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弱勢。當然，在和日本這樣一個超級強國作戰的過程中，他更沒有能力和膽量嘗試一個極端的改革方案，而這些方案肯定會激起某些地方軍人強烈的反擊。蔣介石處於兩難之間，一方面，假如他認真推行改革，一旦傷害到和地方軍系在抗日戰爭中脆弱的伙伴關係時，則他們可能翻臉，甚至改投汪精衛敵營。另一方面，美國盟友對他的國內處境毫不同情，只是一味強迫他積極實行改革。結果是，蔣介石在美國人眼中表現的，是苟且拖延，毫無積極作爲。而他也無法向美國人說清楚，他在現有狀況下根本沒有能力從事這些改革工作。他害怕一旦作出這樣的坦白，他多年辛苦塑造起來的國家元首的虛象就會被拆穿，原來他宣稱是抗戰中國唯一而且貨真價實的全國性領袖，其實根本是虛有其表而已。

反過來說，史迪威也有他的悲劇。那就是，他只知道責怪蔣介石屬於「個人」的缺點，把它們看成是阻礙他（史迪威）改革宏圖的主因，但是沒有智力看出那些在中國大環境內部屬於「結構」性的因素。或許最經典的例子就是他建議如何處理龍雲。從1942年開始他就主張除去龍雲，而他提出的方法簡單到近乎神奇。他認爲，蔣介石只需要以增加雲南的安全作爲藉口，把大量忠貞部隊進駐雲南，然後以保護龍雲的人身安全爲理由，將後者遣送出境，就可將其權力基礎連根拔起[45]。基於他對處理中國事務的這份信心，難怪史迪威進而相信只要蔣介石接受他的軍事改革方案，先將中國的300個師解散一半，集中全國優良步兵砲兵武器重新分發給作戰有功的部隊，開革貪腐無能的指揮官，提升優秀軍官，先後訓練好兩批30個師（共60個師），中國的地方勢力團體就可以全部消滅[46]。有了這麼好的改革方案，而蔣介石居然不採納，除了是他極端愚蠢之外，只可能是喪心病狂。

相比之下，蔣介石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因爲他如果一旦得到外力的奧援，就可能敢於對內部動手改革。而史迪威的困難則是難以克服的，因爲其導因是他本人的政治智慧不足以擔當中國戰區的大任，他沒有發揮出自己手中的王牌，以致改革計畫完全背離中國現實，走錯了大方向。

正如第十二章中所論述，魏德邁的經驗可以促使我們對中美關係的處理方式進行另外一種思考。這個經驗有幾個特點。第一，魏德邁個人全然沒有想要抓指揮權的野心。這立刻使蔣介石大爲安心。第二，他並未把一些先入爲主的個人觀點強加於中國人身上，而是和中國人合作找到共同點。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和中國人共同協商，爲軍隊改革挑選合適部隊，接受美軍裝備和訓練。這也消除了蔣介石的擔憂，他不會失去對這些部隊的掌控。第三，他向中國政府提供了具體的好處，使蔣介石感覺值得爲改革承擔風險。在此之前，史迪威要求中國先承擔風險，由他決定如何進行改革，然後在將來某一個不能確定的時候，再由他決定中國是否能得到美國獎賞。現在，魏德邁可以把美國的獎賞和中國實行改革的進度連結起來。換句話說，中國改革速度愈快，幅度愈大，那麼美國物資的援助量就來得愈多愈快。從蔣介石的觀點看來，既然改革必定會招惹地方實力派軍人抗議或甚至挑釁，但是只要獎賞數量足夠誘人，風險就變成值得。他願意合作，因爲能夠期望建立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史迪威只是在口頭上不斷地叫嚷利益交換原則，但是對其精髓內涵無法領受，而魏德邁則是在不露聲色之中，以細膩巧妙手法將其付諸實行。正因爲美國在1945年提

45 Stilwell memo for Currie, August 1, 1942, 5 pages. Currie Personal Papers, Box 5.

46 Stilwell, "Program for China", September 29, 1943.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5, File 13.

出獎賞的證據，愈來愈讓蔣介石感到安心和值得，以致他居然改採主動地提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反過來爭取美國支持。這真是同盟關係的巨大改變。

值得一提的是，蔣介石在大陸時代一直未能解決中央和地方軍人之間的矛盾，在其敗退出大陸後不久，卻由毛澤東完成了國家政治和軍事統一的局面。毛澤東的方法既非國民黨北伐完成後的政治收買和息事寧人，也非美國人模糊願望的地方利益協調與擴大地方團體的政治參與。他的方法是讓這些地方勢力團體從中國政治舞臺上徹底消失。共產黨的方法有幾個重點：首先是經由統戰工作引導他們在內戰中倒戈，然後予以改編和解除武裝。要不然就是在戰場上將之擊敗，並在擊潰他們時窮追猛打務求徹底殲滅。最後對於殘餘分子，以大鎮壓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手段使其滅亡或判刑入獄。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名言，「槍桿子裡出政權」。在共產黨領導的政權之下，絕不能允許他人手中握槍。這樣就使這些盤踞中國將近一個世紀的地方武裝實力派，從此在中國政壇上連根拔除，也把中國近代史上飽受困擾的一個政權和軍權之間的大矛盾徹底解決了。不知後來的美國軍方領袖們，在看了這段歷史之後，曾否產生過一些反思。

## 第三部　中美戰時軍事合作關係的總結

對於本書所關注的這段歷史而言，中美兩國對於戰時軍事合作關係，最大的指望是能夠盡快打敗日本。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中國政府必須進行某些改造和革新，雖然最具體的短程目標是建立強大軍隊，但無可避免地會波及政治和經濟領域。經由這些改造和革新，兩國更可能達到一個長期的共同目標，那就是維持戰後國際局勢的和平穩定和有序發展。美國擁有充足資源去實現這些目標，但是卻未能把目標變成事實。原因如何，值得深思。

從宏觀分析的角度著眼，中美關係可以在三個層次上來檢討：政策理論層次、實踐運作層次和人爲因素的層次。以下將分別申論之。

### 壹、美國政策理論上的困難

史迪威作爲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策劃人和執行人，他的根本問題在於思路不清，言行不一，看起來似乎頭頭是道地提倡利益交換原則，其實他並不真正了解它的內涵，更拿不出一套合理而有效的辦法，把這個原則和中國的政治與軍事現實結合起

來。假如美國的確想要追求中國軍隊的改革和現代化，它的最佳途徑是幫助蔣介石在政治上挺起腰桿，而不是削弱他已經相當薄弱的權力基礎。蔣介石需要從美國得到的保證是：1. 他不會因爲國內勢力反對改革而遭到滅頂之災；2. 他能夠得到的回報將會超過他所付出的代價。只有中國承擔的風險在能夠接受的範圍之內時，他才敢放心大膽和美國合作，把軍事改革工作堅持下去。

不幸的是，由於史迪威在這方面認識不足，他錯誤高估了他手中的籌碼。無論是史迪威或是美國其他領袖，都沒有興趣去設法給蔣介石足夠的勇氣，克服預期來自國內的阻力。設若史迪威當時能夠把注意力，從抱怨蔣介石個人品質惡劣的焦點，轉移到去分析蔣介石政治能量局限性的現實問題，那麼這個新視野很可能就會幫助美國政府去探索其他途徑，依照利益交換原則的邏輯辦事，讓它發揮出最大的功能。

順著利益交換這個思路追索，美國政府首先能夠做的就是在實際上投入更多資源，去加大它交換（討價還價）的籌碼，而不是讓這些資源看在中國人眼中都是不能充飢的畫餅，或者是讓史迪威連綿不斷的威脅恐嚇，聽在中國人耳裡只是雷聲大而雨點小。換言之，美國政府願意撥出的資源和利益（租借法案物資），和他們在中國想要達到的目標之間，必須均衡對稱，這樣才有交換的誘因。假如美國政府決策者連增加援助的些微努力都不願作出的話，那他們就無需在中國戰區追求任何宏大目標。不幸的是，中國政府對美國手中擁有巨大戰爭資源並非全然不知，美國政府自己更是心中有數。這裡舉幾個簡單數字再次說明這點。美國從珍珠港事變開始到對日戰爭勝利爲止，軍火生產總數大概是：30萬架飛機、10萬輛裝甲車、240萬輛軍用卡車、330萬支步槍、260萬支機關槍和410億發子彈；中國1943年希望得到500架飛機時，美國當年飛機產量是85,898架[47]。反觀，從1942年7月到1944年10月，正是史迪威主持駝峰運輸的全部過程。在這28個月中，經過駝峰自印度運往中國的物資總量爲247,156噸。其中大約百分之八十供給駐華美軍使用，百分之二十交付中國使用。以在雲南待命的Y部隊爲例，它在1944年開入緬甸戰場之前一共只得到14,452噸美援物資。這說明這支待命的遠征軍在開入緬甸戰場之前並沒有得到大批美軍配備。反而是在美國政府試圖逼迫中國政府參加緬甸戰爭時，它成爲最方便的施壓對象。因此在1944年3月份，美國對Y部隊只提供了414噸空運物資作爲對中國政府的懲罰[48]。

---

47 Norman Polmar &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pp. 880-881.

48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6, Folder 24；also: "Historical Section, Headquarters, USAF in CBI, APO 885",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 Sec. 2:VIC.

從珍珠港事變開始一直到1944年，美國對自己無法運送大量物資進入中國的一貫解釋是，運輸機不敷分配。這真是莫名其妙的邏輯。照理，運輸機本身就是租借法案物資的一部分，運輸量不夠，導因就是運輸工具不足。再說，駝峰運輸機的性質和運軍火到英國和蘇聯的船隻基本相同。船隻在海上遭受德國潛水艇攻擊造成的傷亡損失，遠遠超過駝峰空運風險，爲何不因此而減少海上運輸船隻，卻以損失太大爲理由，拒絕增加駝峰運輸機的數目呢？其實說穿了，真正的理由並不是物資不足，而是美國人早就作出不多送物資援助中國的決定。所以中國在1942-43兩年，每年獲得租借法案物資的數量，各占當年美國輸出總數的千分之四(0.4%)[49]。史迪威和美國軍部以如此微小數量的援助作爲籌碼，而想在中國戰區大展宏圖，甚至奪取全部軍隊指揮權，要不是對利益交換原則的意義完全缺乏理解，就是悲劇性地缺乏自知之明。

然而美國政府即使加大了投資，還是需要讓中國人相信，只有後者採取了某些具體改革行動作爲回應時，才能得到美國援助。利益交換的成功與否繫於兩個國家彼此間有無互信，而且可以在付出和回報之間求得平衡，彼此都接受交易的公平合理性。換言之，假如兩個國家可以取得共識，讓一方回報(獎賞)的支出速度和另一方交出成果的速度或是程度成正比，那麼利益交換就有望得以順利展開。否則，一切均屬空想空談。

## 貳、政策運作的困難

不幸，美國政府在史迪威服務中國戰區的年代，並沒有遵循上述路線走。史迪威對租借法案物資的分配反而只能叫中國政府不知所從。在中國政府的體驗中，他們對租借法案物資的些微要求屢遭拒絕，已經批准的物資又屢遭延誤，答應撥送給中國的物資更屢被取消或被別的戰區中途攔截奪走。這一切行爲都讓美國援華物資來源變得零碎而不可靠。史迪威似乎偏愛這種擠牙膏的援助方式，因爲他可以避免作出承諾，免得捆綁住自己手腳。另一方面，又可以替自己的行動保持高度彈性，讓蔣介石捉摸不定，因而必須不斷請求美國施捨。在他看來，這是提高談判本錢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手中握有的王牌，能夠幫助他根據利益交換原則和中國人打交道。

實際效果恰巧相反。蔣介石因而堅信美國一直忽視中國，即使中國努力達成美國政府的要求，也仍然不知道會得到何種回報。不管中國對美援物資的要求是什麼，費

49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p. 350, Appendix II on p. 441.

盡九牛二虎之力去爭取，還可能只是得到其中一小部分。其結果是既讓中國吃不飽，也讓中國餓不死，但是卻足夠苟延殘喘，繼續對日抗戰。美國政府採用這種零碎方式提供援助，或許自以爲得計，但是同時也剝奪了自己的機會，讓中國政府沒有從事廣泛和長程規劃的動機和膽量。本書舉的大量例子，都和同盟國之間應該建立互信和公平交易的原則相迕。這些實例，包括美國拒絕中國對於步兵武器、大砲、裝甲車、戰鬥機等等的要求，把已經對中國承諾的轟炸機和運輸機轉送其他戰場，以及對於第二次緬甸戰爭屢次食言而肥和矇混欺騙。更能加深中國人印象的是，一方面美國軍部推諉責任，把援助不足歸罪於史迪威沒有及時送呈要求援助的物資清單，而另一方面史迪威卻又趾高氣揚地向蔣介石宣告，他沒有義務替中國政府催促軍部發送物資。這些舉動只能摧毀中國人對利益交換的信心。假如美國政府能夠把中國具體要求，全部納入一個合理的長程交換政策，並避免破壞承諾，那麼中美之間的合作關係或許會大有改善。可是，歷史的演變恰好相反，它們都變成中美兩國間的衝突點，使雙方的關係不斷惡化。

依照常理而言，美國政府如果想要遵循利益交換原則處理中美同盟關係，必須作出努力去了解中國政治和軍事的實際情況。切不可大而化之，自以爲是。不然，美國政府無法充分利用手中豐富資源，鼓勵中國人去依照美國人的意願行事，只能作出許多文不對題的舉動。當然，美國人也必須懂得採取靈活而巧妙的手段去執行政策。不然，他們的頤指氣使，只能逼友爲敵。

然而史迪威首先在認知上犯了嚴重錯誤。在他看來，中國問題的癥結是蔣介石無所作爲，而其動機是他對軍事科學一無所知，可能還有更深層的不可告人的陰謀。若非如此，蔣介石對自己的利益怎會漠不關心？又怎會和美國政府的看法如此相悖？有趣的是，史迪威目光凝聚地一心只去審視一棵樹(**蔣介石**)而且還看錯了，卻忘記了整個中國的樹林(**政治軍事的大環境**)。雖然史迪威完全知道，有不少地方實力派軍人已經倒向日本及汪精衛陣營，或是與國民政府貌合神離，他卻從來沒有嚴肅考慮過，改革將會遭到國內軍人派系消極抵制或是積極反抗的可能性，並爲此提出對策。相對而言，蔣介石的日記則充滿了對這些可能性的恐懼。他多次提醒自己，中國最大的危機不是被日本打敗，而是被自己內部各個政治軍事群體撕裂。他誓言要盡一切努力避免讓這種局面出現。

除了上述現象外，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也是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因素。

有一位學者評論史迪威撤職事件時說道：「史迪威的召回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其導因基於一種假定，那就是鑒於中國的依賴性和消極性，因此美國必須把自

己的解決方法，加在中國人的身上。馬歇爾應該負擔的責任是開始了這種努力，羅斯福的責任是授權屬下去付諸實行，而史迪威的責任是同意這種做法並且予以推動。在深一層而言，矛盾並不僅是兩個人（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的不和，而且是兩種目標的不一致。」[50]說來好像史迪威、馬歇爾和羅斯福三位一體，都同意美國政府必須主動去克服蔣介石的依賴和消極。史迪威奉行上司意志而最後不免去職，這只是兩個國家目標的不同而已，他沒有絲毫責任。

依照本書所引資料，這個歷史判斷有嚴重問題，那就是把羅斯福、馬歇爾和史迪威都攪混在一起，隱晦了美國對華決策最可議的問題，那就是它的精神分裂症狀。如本書各章所述，塑造美國政府對中國認識的最重要訊息來源，是史迪威呈交給馬歇爾的報告。史迪威帶著個人獨特心態前往中國，剖析中國局勢，由於他是馬歇爾唯一的消息來源，很容易就把自己對人對事的報導和分析放進馬歇爾腦袋裡。

馬歇爾過分依賴史迪威作爲他的訊息唯一來源，當然只能從史迪威的眼睛去看中國事務，因此看得到的就是史迪威想要他看到的。即使史迪威本人的消息和分析大錯特錯，馬歇爾也不知道錯在哪裡。比如說，馬歇爾唸了居里報告（居里1942年7-8月間訪華之後），得知蔣介石對史迪威強烈不滿，因此馬歇爾要求史迪威予以回應。史迪威的回信中卻堅稱蔣介石完全了解緬甸戰場上發生的情況，因此不至於怪罪於他這個指揮官。史迪威繼續稱：如果蔣介石有任何其他感覺，那都是因爲宋子文挑撥離間所引起。結論是請馬歇爾完全放心[51]。史迪威的這個說法完全偏離事實，可是馬歇爾信之無疑，不再追究，使他自己失去了一個機會去了解事態的嚴重性。再說1944年9-10月間發生有關指揮權的危機，史迪威告訴馬歇爾說，蔣介石原先已經答應把指揮權交出，隨後反悔，原因是宋子文擠進了權力圈，把其他親信都趕走了[52]。正如第十一章所述，史迪威的說法是天方夜譚，與事實完全不相符合。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馬歇爾所以對史迪威的報告照單全收，一方面是他對老朋友深信不疑，一方面是他全球性的任務過於繁重，對中國問題無暇顧及。即便是史迪威指揮權危機達到高潮的時候，他還必須留在法國前線（10月5-16日）[53]。由此可見他的工作負擔之重。馬歇爾既沒有其他熟悉中國事務的專家可以輔佐，又沒有意願加大自己對中國事務的關注。因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一切有關中國戰區的事務信託給史迪威，由其酌量處

50 Tuchman, p. 642.

51 Marshall cable to Stilwell, September 1, 1942; Stilwell cable to Marshall, September 4, 1942. Stilwell Personal Papers, Box 1, Item 35.

52 Message from Stilwell to Marshall, September 29, 1944, in Xerox File 1115, Item 5750, MFA.

53 Tuchman, p. 640.

置。就這樣，史迪威成了替馬歇爾定性中國問題，找出解決問題途徑的唯一親信。換言之，馬歇爾不但依賴史迪威的眼睛看中國，也大量引用史迪威的文字(常常是大段大段地引用)形容中國局勢，採納史迪威的建議，並轉送給參謀長聯席會和總統作爲美國制訂政策的素材。從史迪威的電報，一直到總統發送給蔣介石的電報，脈絡歷歷可循。羅斯福的文稿是馬歇爾擬的，而馬歇爾的文稿又是摘自史迪威電報，甚至用語都經常一模一樣。

說到羅斯福本人，他的工作擔子當然比馬歇爾更繁重，每天面臨的問題應該超過常人所能處理。在如此重壓下，他以爲可以把來自參謀長聯席會的建議，一律當作是他們深思熟慮的成果，這也是一件容易理解的事。不幸的是，本書的敘述證明，羅斯福這種假設絕非一貫正確。羅斯福本人對中國事務也不時掉以輕心，會發出相互矛盾的電報，或是出爾反爾，而不覺察它們對中國可能造成的影響。

實際的情況是，羅斯福對美國對華政策只能偶爾與聞，另一方面，軍部卻迫不及待想把所有對華政策攬在自己掌控之中。軍部的幾個關鍵人物——部長史汀生、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以及駐華美軍代表史迪威——打從珍珠港事變開始就表現一個心態：所有與中國戰爭有關的事務應該都由他們說了算數。在那個年代，他們幾位幾乎不屑和國務院商量美國的對華政策。雖然對羅斯福總統行政權威的合法性並無異議，但是對羅斯福的實際行動則經常感到不耐，把這些行動看成是干涉，或是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的表現(馬歇爾語)。羅斯福是美國總統，本應該主宰美國對華政策，實際上則是太阿倒持，權柄下移。

在這一方面，馬歇爾和史汀生兩人對羅斯福中國政策的感受，特別有參考價值，何況這兩人正是美國政府中支持史迪威最力的兩位領袖。

馬歇爾在戰時沒有對羅斯福的中國政策多作評論，但是戰後的回憶倒是相當坦誠。從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堅決相信中國在羅斯福的心目中占有特別地位。用馬歇爾自己的話說：「總統對待中國的態度和英國人以及邱吉爾大不相同……總統下了決心要不計一切代價地去幫助中國。」[54] 事實上，馬歇爾認爲美國總統之所以數度否決史迪威關於中國事務的建議，甚至一度建議史迪威辭去中國戰區的職務，命令自己(馬歇爾)爲他另外安排工作[55]，理由都是羅斯福對蔣介石更友好。爲了這個原因，馬歇爾不願意和總統爭論中國問題。

---

54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October 29, 1956,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p. 604.

55 Matl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pp. 372-373.

和馬歇爾相比，史汀生就更顯得缺乏寬容了。他認爲美國總統根本缺乏足夠的判斷力去欣賞史迪威的成就，也根本缺乏足夠的鑒別力去分辨真話和謊言，同時卻依靠了一些品行不當人選替他收集情報。關於總統是否缺乏判斷力不能體會史迪威工作重要性這一點，史汀生認爲，羅斯福根本無法懂得史迪威採取某種戰術和政治立場的道理所在，又缺乏自知之明，總想把控制權獨攬己手，「光靠一個人的能力，根本無法顧到這麼多的事務，而羅斯福最後終於死在這種嘗試之中。」史汀生特別感到生氣的是，居然有人(**特別是美國人**)在華盛頓陰謀動搖史迪威的地位，而這些陰謀家也居然在羅斯福身上產生了影響。史汀生還相信，大部分陰謀人士都是陳納德的支持者。當然他的想法並非事實，只是他心中疑神疑鬼而已。

史汀生對羅斯福喜愛的個人外交作風和其效果，本來就非常反感。不幸，他更認定這位美國總統的個人代表通常頭腦簡單，被蔣介石身邊的人玩弄於股掌之上，以致對史迪威不滿，而且和史迪威的反對者一鼻孔出氣。至於其他到重慶訪問的美國官員，史汀生也認爲只能使事情變糟糕，因爲他們或者出於無知，或者出於揣摩，提供消息時完全不能公平而誠實。史汀生的最後判決非常乾脆，美國總統不應該插足美國的對華政策，對華政策應該託付給史汀生－馬歇爾－史迪威這個團隊去操心。美國總統最後放棄了對史迪威的支持，結果他們合乎理性的政策也就跟著失去了實現的機會[56]。

根據美國政治制度的設計，國家一切事務的決定權和責任，最後本都應該是由總統掌握和承擔。不幸這個制度設計並沒有反映在美國對華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美國對華政策只在出了大紕漏時才引起總統關注。從這個意義來看，史迪威的召回只是一個不健全決策程序下的必然結果而已。這個決策程序的特色是它把正常程序完全顛倒過來。史迪威通常是政策的原始設計人，幹勁十足到處鼓動。馬歇爾言聽計從，更運用自身威望和權勢爲史迪威撐腰。羅斯福則是一個粗心大意的領袖，批准了不少考慮欠周的行動，更縱容部下對他的決策陽奉陰違。但是在緊要關頭時，他卻還能夠頭腦清醒，斷然煞車，避免中美關係走向完全破裂。

廣義來說，中美關係最終遭遇的結局並不出人意表。我們應該記得，就是在史迪威任命之初，美國軍方和政府考慮史迪威和莊穆將軍的優劣長短時，其實已經作出一個根本性的決定。莊穆要美國政府必須事先仔細思考，到底預備對中國作出何種承諾，而史迪威對美國政府沒有提出任何具體要求，只是要到中國去，鞭策中國領袖努力依照美國意志辦事。換言之，由美國人來主導中國的戰爭。他這種幹勁，在1942-1944

56 Stimson and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p. 535-530.

年間，對美國領袖確實有無比的誘惑力和感染性。

## 叁、個人因素的重要性

中美同盟關係本來就是雙邊關係，但是由於雙方國力差距過分懸殊，所以中國對於美國政策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可謂微乎其微，而美國對於中國的影響力卻是巨大無比。就美國戰時對華政策而言，其遭受挫折的根源不是物資匱乏，而是所用非人，當事人缺乏政治智慧。所有在美國指揮系統中扮演過重要角色的人，從總統到軍部領袖，再到史迪威，都對這個結局的產生負有責任，而其中尤以史迪威爲關鍵人物。

美國軍方對中國態度，可以從一個跡象來觀察，馬歇爾將軍視察過許多戰區，但從未視察過中國和緬甸戰區。那些到過重慶的其他美國將領，例如阿諾德、惠勒、塞末維爾，最多只在重慶停留2-3天，行色匆匆，也從來不到中國前線考察，或和中國戰鬥部隊指揮官會談。他們的行爲顯示，寧可閱讀史迪威的書面報告，也不願親身視察現場。更奇怪的是，史迪威本人身爲中國戰區聯軍參謀長，除了西南部少數城市之外（如成都、昆明等），也沒有時間視察廣大的中國戰場。部分原因是他泰半時間不在中國，主要原因是他或許認爲他對中國軍事已經瞭如指掌，無需浪費時間去進行實地考察。假如史迪威當年沒有每周甚至每日向馬歇爾作報告的話，軍部官員大概也會感到心滿意足，因爲這樣就讓他們可以對中國事務不聞不問。史迪威報告得這麼勤快，正好讓軍部領袖誤以爲他們對中國戰區情況已有充分掌握，毋庸擔心。純粹從制度面來說，美國戰時對華政策過分依賴單一的消息來源（史迪威）和單一的傳遞管道（馬歇爾），不能不說是嚴重缺失。

問題癥結是，美國政府把史迪威當作單槍匹馬就可以解決中國困難的美國牛仔。也正是因爲幸虧有了這麼一個人，才讓美國可以把人力物力投注到世界其他更有價值的戰場上去。既然史迪威是美國陸軍中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問題專家，而美國政府又本來就無意向中國戰區投注大量資源，因此美國政府感到必須竭盡所能去支持他的工作。只有讓他留在中國，才能使美國軍方可以無限期忽視中國戰區。要想懷疑他的判斷力或是把他調離中國，不免會直接危害到美國和中國的同盟關係的本質。

有了以上這層認識，那麼史汀生部長形容史迪威在中國的任務，是「在整個戰爭期間中賦予任何美國人的最艱辛的使命」的說法，就具有特殊的含義了[57]。在這裡，

57 Tuchman, p. 647.

「艱辛使命」指的不是美國在華軍事工作的規模之大或是性質之複雜。正好相反，美國在華的軍事活動規模非常微小。「艱辛使命」真正的含義是，美國期望以最少量的資源投入中國，但是同時指望得到極大量的回收，而史迪威的重要性，正是向美國政府提供了實現這兩個性質相反期望的可能性，條件是美國領袖們必須支持他對蔣介石施壓。換句話說，從太平洋戰爭一開始，美國軍方對中國戰場的看法，就不是打算貢獻人力物力和中國合作，而是經由史迪威孤身隻影到中國運籌帷幄，指導中國領袖們進行作戰。萬一中國領袖們不願順從的話，對付秘訣也不是增加援助，而是增加壓力和減少援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戰區在美國軍方人士心目中的邊沿地位，反而擴大了史迪威個人的重要性。

史迪威在已經被美國政府的基本政策限制住之餘，他本身又聚集了多種嚴重缺點，把中美關係弄得幾乎分道揚鑣。而最糟糕的是，他對自己的弱點毫不自覺，甚至在別人(馬歇爾)善意指出時，還當成是耳邊風，我行我素。他自以爲非常「了解中國」，但是在他身後留下的大量個人檔案中，很少資料顯示他對中國政治的了解程度，能夠超越市井傳言的格調。但是他忍不住誘惑，偏要往中國政治漩渦裡鑽。其結果是經常出錯，對和他打交道的中國人的背景和動機缺乏判斷力。他又對自己感到無比信心，以爲自己具有高超的智力、深邃的洞察力、敏銳的觀察力，和龐大的權力及影響力，以致他總是認爲自己能夠看穿中國官員不自量力在他面前耍弄的拙劣伎倆。此外，他對小道消息情有獨鍾。事實上卻缺乏能力分辨對方所說，究竟屬於不負責任的閒言碎語，還是繪影繪聲的誇大謠傳，是蓄意的謊報和設下的圈套，還是真有所本。這個習慣讓他依賴傳聞描繪中國實況，而所謂實況又和真正實況大有差別。他喜歡任意評論，對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何應欽和其他中國官員，在不同時間作出的評論互相矛盾。他所掌握的有關中國政治和領袖們的「內幕」資料，質量上顯得相當單薄。然而他卻依然據以作出衝動的決定。所有這些個人品質和習性聚集在一身時，史迪威成爲美國想了解中國局勢最糟糕的管道和闡敘者。最後，也是最令人不解的是，他對中國各地區實力派領袖(比如龍雲)之間的政治關係，和鉤心鬥角的複雜性幾乎全無了解，然而他卻信心滿滿，認爲可以期望他們合作，推行他意圖加諸於他們部隊的改革計畫。如果這些地方實力派膽敢不服從命令，他可以把他們一一開革。這真是一個難以置信而又荒謬無比的想法。

假如當初史迪威只是被美國政府任命到中國戰區，去做他能力所及的事情，比如說軍隊的訓練工作，而把其他需要運用政治智慧的工作交給具有能力的人去做，他對戰時中美軍事合作關係可能會作出令人激賞的成績。無論如何，在他之前，德國和蘇聯的軍事顧問已經樹立了良好榜樣，與史迪威同時期的陳納德，對建立中國空軍作出

了舉世讚賞的成就，而魏德邁在史迪威離職之後，也爲中國陸軍改革作出了貢獻。他們全都努力置身於中國政治之外，也因此在軍事領域內作出了醒目的成就。

從一個更深的意義來說，史迪威不但和蔣介石的性格不合，也和許多其他人的性格不合，從而變成是中美戰時同盟關係衝突惡化的最基本原因，這實在是悲劇。應該記得，史迪威1944年10月被蔣介石趕出中國之前，已經被英國人趕出了東南亞戰區，其實從1942年6月到1943年10月，蔣介石就一直想把他趕出中國，只是沒有下決心而已。1930年代史迪威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他和同事間關係普遍惡劣。甚至更早他在美國班寧堡陸軍步兵學校(Fort Benning, Georgia)擔任教官的時候，該校校長也在他服務的四年中(1929-1933)三度請求上級將其開革[58]。這些記錄前後一貫，實在令人難以忽視。

如前文提到過，他一生中只對兩個人顯示絕對仁慈、寬厚和尊重。一個是他妻子，另一個是他「親愛的上司」馬歇爾將軍。史迪威的妻子對他景仰和忠貞，終生不渝。然而馬歇爾對史迪威的評價則有另外一面。無論職業上或是私人關係上，馬歇爾都說得上是史迪威的深知，因此馬歇爾對他的總評價應該比任何其他人更中肯和寬厚。的確，馬歇爾對史迪威的許多優秀品質，諸如忠心耿耿、工作勤奮、高超的練兵技巧等等，從來不吝稱讚之詞。他也認爲史迪威是一位勇將，如果讓他指揮一個美國軍團(corps)，或至少一個軍(army)，肯定可以勝任[59]。但是把這樣一個才能只足以練兵和打仗的職業軍官送到中國戰場，要他同時處理極爲複雜的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工作，可說是識人不明，用人不當，只能造成悲劇性的結局。

整體看來，中美戰時同盟關係總共延續了44個月，其中史迪威在中國戰區任職共32個月，但是最初的四個月(1942年3-6月)的發展卻決定了此後關係的基調和互動形式，其他28個月只是不斷重複上演而已。後來的摩擦點和這最初四個月的具體內容固然不同，但那只是形勢發展產生出來的結果而已。基本上，史迪威和蔣介石之間相互指責和冤冤相報的互動模式，一旦定型之後，只是變得愈來愈僵硬和無可挽回。

他們之間的個性衝突很快成爲中美關係的主旋律。雙方對於對方的智慧、專業能力、人格和品德，都失去尊敬感和信任感。然而蔣介石依舊堅持，不要讓羅斯福爲史迪威撤職的事感覺難堪。而軍部(特別是馬歇爾)又千方百計地向羅斯福灌輸一個信念，以爲史迪威是保護美國在華利益和中國利益的唯一人選。結果是，蔣介石和史迪威如

58 Interview with Marshall, on October 29, 1956, Bland,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 , pp. 605-606.

59 Matloff,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 pp. 372-373.

同兩個水火不能相容的人被放在一間籠子裡，摩擦一日數起，終於導致新的危機。只有到了這個危險時刻，羅斯福才開始擔心，並作出即興式的個人干預。然而即使是羅斯福，也只能降低當前的緊張形勢，而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史迪威仍然待在自己的位置上。經過了一段時日，當羅斯福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務時，另一輪新摩擦又重新萌芽進而惡化。在這個周而復始的過程中，中國和美國兩國的真正利益都受到不必要的扭曲，它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變得是災難重重。

史學界裡一直流行一個觀點，那就是，1944年9-10月間的指揮權危機，是對於實現中美兩國爲追求共同國家利益，所採取政策的一個嚴重挑戰，而史迪威的革職，標誌著這個明智政策的最終失敗。正如讀者們所熟知，本書所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其實我們應該記得，如果在1942-1944年中美盟邦之間發生無止境衝突時，史迪威能夠及早離開，可能會給兩個盟邦帶來新的契機。至少它們無需再耗費如此多的精力，從事爭論和報復對方的行爲。更好的設想，則可以讓兩國政府致力於做好同盟關係原本就應該做的事，發掘新機會，擴大合作面。依據本書資料顯示，魏德邁將軍在其任內終於讓他和蔣介石的工作關係達到正常化，雙方並非乳水交融，但卻實事求是，有付出也有回收。但此時距離日本投降只有九個月，兩國試圖締造一個新的軍事合作關係已經來日無多。史迪威和魏德邁的對比清楚說明，美國陸軍並非缺乏人才，反而是人才濟濟。但不幸的是，領袖們心目中的「專才」可能是「庸才」，而「通才」反而可能是「英才」。這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個人品質。雖然不少學術著作時常遵循傳統觀念，認爲應該突出政策和政府行爲的重要性，而淡化個人行爲的影響力，但是在戰時中美同盟關係中，人的因素肯定產生了決定性後果。

## 肆、中國的失敗與成就

再從中國而言，它未能爲打敗日本作出更大的貢獻，這一事實說明它作爲盟邦的價值相當有限。但是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領袖領導中國人民，靠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苦撐了八年抗戰，其成就的確值得大書特書。因爲如果沒有這種苦撐而向日本屈服，則中國在戰後和會中將毫無地位，甚至聽任列強宰割，可能在五十乃至一百年時間內不能恢復平等地位。然而正是因爲中國堅持抗戰，使得它從19世紀中葉以來所受的國恥一筆洗刷乾淨。中國的疆土基本上恢復到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前的版圖。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人民重新拾起喪失多年的信心，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產生更強烈的認同感，也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產生了新的期待。這一切在中國走向一個民族國家的過

程裡，都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但是中國政府在戰時同時暴露了嚴重的缺點。他們在處理政府組織和效能的事務上，在維持軍隊紀律和作戰能力的工作上，懲治貪官污吏的努力上，和團結動員社會各階層力量的方法上，都表現出高度無策略和無能力。雖然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自己的缺點非常坦誠，特別是針對黨務和政府工作部分，他承認自己既無能力親自駕馭，又不能知人善任，授權給有能力的人分層負責。雖然他不斷抱怨中國缺乏人才，但是他依然必須承擔一個領袖必須承擔的責任，無可旁貸。

歸根結柢，中國內部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能指望美國代勞，後者既沒有這個能力，也不欠中國人這份恩情。抗日戰爭開始前，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積弱，是百年來(甚至數百年來)全體中國人自己累積下來的惡果，跟美國無關。抗戰開始，戰爭重擔很快遠遠超過當時號稱中央政府的機制所能負荷的程度，蔣介石能堅持抗戰的立場，使國家民族逃過滅亡浩劫，其成就值得肯定。但在此同時，他和國民政府其他領袖，對於政治和軍事的改革始終拿不出妥善辦法，所以也必須爲戰時和戰後所發生的一切災難負責，包括他們自己1949年在大陸的潰敗。當然，即使是蔣介石本人，也只是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產物。這個國家的特色，是民風閉塞，教育落後，經濟蕭條，政治不團結，科技不發達，財政混亂，和軍事上四分五裂。當一個領袖面對這樣一個內憂外患多方交迫的局面時，他確實需要更大更多的智慧、果斷力，和策略，才有扭轉乾坤的希望。

在這樣一個背景深處，還有一個心理因素和一個戰略選擇，它既讓中國能夠承受日本無情的打擊而不崩潰，又讓中國喪失對日本主動作出更積極反擊的能力。像本章的第一部分所說的，儘管所有權威觀察家一致認爲，中國絕對無法承受日本的殘暴打擊，中國還是千辛萬苦維持抗日前後達八年之久。它採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期望能夠「撐」到世界大變。從美國角度來看，珍珠港事變應該給中國足夠的鼓舞，更加努力發揮攻擊精神。但是從中國角度來看，基本的內政和外交處境，並未因爲珍珠港事變而獲得根本性改善。名義上它加入了同盟國，實際上沒有獲得足夠幫助。國家的肌體並未因爲獲得盟邦養分而恢復功能，而第一次緬甸戰爭的失敗反倒使國家元氣更受挫傷。中國受到美國物資接濟，要等到1943年下半年才約略恢復到緬甸戰敗前非常有限的數量。而在這段漫長時間裡，「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的一個負面心理後果，是讓中國領袖習慣於被動、自保和「得過且過」。要想克服這種心理上因循苟且的惰性，最好的方法是有外來刺激，尤其是大量外援的湧入，和盟邦對中國戰爭提出高標準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激勵中國領袖們放棄苟安心態，奮發圖強，重新拾回鬥志，

換言之，從只求「撐」的消極心態，轉換爲力圖「有所作爲」的積極心態。這仍然不是說美國有幫助中國的義務，也不是說中國必須等待美國支援抵達後才能從事內部改革。但是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得到外力的支援，改革的動力將可能大幅提高，成功率也可能大幅增加。換言之，美國在戰時曾經有過一個經由幫助中國而幫助自己的機會窗口，前提是它必須善用自身的資源。這就是利益交換政策基本精神之所在。然而，美國並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從宏觀上看中國對同盟關係的立場，除了戰勝日本之外，也還曾經有過三個願望。首先，在種族層次上，希望能夠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享受公平待遇，一舉消除百餘年來民族所受的屈辱。但是從本書第一章開始，這個希望幾乎立即破滅。中國政府儘管多次努力，仍然無法改善情況。事實上，同盟關係才剛滿半年，蔣介石就已經作出極悲觀的結論。他說：「英美對亞洲有色人種觀念，根本不易改變，非我國獨立奮鬥至百年之後，決難平等。」[60] 1943年廢除不平等條約，在國際法理上解除了加諸中國的桎梏，的確是一大進步，但是民族關係在「骨子裡」的不平等，依然沒有得到實質改善。

其次，在處理國與國關係層次上，中國領袖心理上期望同盟國用「公道正義」對待彼此。但是結果同樣令他們失望。蔣介石對國際關係陰暗面的了解似乎一分爲二。他對日本、納粹德國和蘇聯(甚至英國)的邪惡，似乎很有見地，也很務實，但是對美國的信念則過於天真。實際上就中國而言，中美同盟關係仍然擺不脫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句老話，那就是，外交是國力的延伸。中國既沒有足夠的國力，外交上任人擺布當然就無足爲奇。戰時中美同盟關係是一個超級強國和超級弱國之間的伙伴關係。在這樣一個極端不對稱的雙邊關係中，縱然超級強國政策的品質未必優良，但是它擁有的政策彈性度肯定遠大於超級弱國。即使超級強國的政策發生嚴重偏差，承擔惡果的一方仍然是超級弱國，而非超級強國本身。這就是國際政治冷酷的事實。

最後，說到政策執行層次上的援助關係，則更是一面倒。中國政府在戰時從沒有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對美外交理論，也沒有一套深思熟慮的執行方針。由於本身所處的極端劣勢，它只能任由美國行使外交主動權，然後隨機應變，見招拆招。這一點從蔣介石的日記和蔣介石與宋子文之間的電文來往可以清楚看出。美國擁有中國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品，無論是財政資源、國際政治資源或是軍事資源。但是只要美國打定主意不願釋放這些資源，中國政府就完全無能爲力。在1942-1944前後三年中，中國政府沒有其他外援的指望，爲了維持抗戰，不得不再三請求美國提供某些最基本程度的物

60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18日。

資援助。然而面對史迪威和美國軍部的漠然或跡近凌辱，蔣介石退而走到另一個極端，對美國採取「無所求」的對應態度，以致中國戰區所獲得的美國租借法案物資援助，是同盟國各戰區中最少的一個。不但和英國、蘇聯(歐洲戰場和北非戰場)無法相比，甚至還落在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和印度之後。在中國政府早已下定決心絕不考慮和日本單獨媾和的前提下，由於資源極度匱乏，中國在戰時喪失了一個有所作爲的轉機，美國也放棄了可以影響中國未來大局發展的機會。雙方在戰後都很快地承受了沉重的代價。有趣的是，中美兩國對於援助一事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某些美國人(特別是史迪威)認爲中國人應該對美國的慷慨援手表達無盡的感激，因爲這都是美國單方面向中國人施惠。而中國人則認爲，他們受到涓滴之恩之後作出了湧泉相報，但是還是受到侮辱，這完全不是盟友相處之道。

本書各章的敘述充分顯示，美國擁有一切優越條件可以把中美同盟關係帶上一條良性合作的道路。其未能達成目標，簡約言之，有兩個突出因素：在政策層次上，它缺乏清晰的理論依據，「利益交換」概念模糊不清，領袖們經常異想天開，不肯虛心勤奮地去務實求知，乃至自作聰明，還自以爲是。再加上種族優越感作祟，吝於作出合理的投資。在執行層次上，它用人失當，導致作風粗糙，無端樹敵，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反而責怪他人不肯聽話。在短期內，美國挾其無限的國力優勢，的確可以暫時遂行其意志，贏得戰爭勝利。但是從其長遠國家利益而言，它在太平洋戰爭中處理和中國關係的痕跡，在它戰後處理與廣大亞非拉丁美洲新興國家的關係上，依然不斷重複出現，缺乏反省和自我改善的能力，這恐怕才是所謂的「美國的失敗」的根源所在。由於中美兩國今後數十年甚至數百年，都將爲共同生存而尋求合作之道，太平洋戰爭期間的這一段軍事合作關係處理的得失，或許也可以爲未來兩國人民提供一些啓示。在這個意義上，本書的目的就是幫助讀者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重新檢討中美關係。

就中國而言，蔣介石對於西方盟邦的欺壓凌辱的確是痛心疾首，忍辱負重。他也曾信誓旦旦，認爲中國改變國際地位的唯一途徑是自立自救，贏得國際尊重。這個認識當然正確，但是在整個抗戰時期，他始終沒有摸索出一條在內政上自立自救之路。這也的確是他一生政治生涯裡最大的悲劇。持平而論，蔣介石在內政上的表現遠遠稱不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治國領袖，因爲他縱有求好的意念，但是嚴重缺乏組織能力和統治手段。但是他領導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又的確是絞盡腦汁，千辛萬苦，表現了超乎常人的剛毅。而在處理盟邦事務上，他又表現出逆來順受，委曲求全的顧全大局精神。因此，儘管中國政府領袖們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處於如此嚴重的弱勢和遭遇到如此多的阻礙和挫折，他們在爭取民族生存的事業上，還是通過中美同盟合作關係，而取得了極

爲可觀的成果。至於民族在獲得生存權之後，是否能夠繼續提升素質，贏取世人由衷的敬重，也或許正如蔣介石所言，中國還需要在全民覺醒的基礎上，經過百年時間，數代人民的努力，才能達到自尊自強的成果。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方寧，《孫立人將軍與緬戰》(香港：鏡報文化，1987)。
《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王世杰日記。
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曹清貴譯，《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1931-1945》(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
《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資料選輯(1840-1949)》(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中國軍魂——孫立人將軍永思錄》(臺北：學生書局，1992)。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198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1981-1988)。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1978)。
———，《王寵惠先生文集》(臺北：1981)。
———，《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臺北：2000)。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1984)。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第四輯。
中華民國國史館(新北市新店)館藏：
《蔣總統籌筆拓影本》。
《革命文獻拓影》。
《特交文卷》。

《特交文電》。
《特交檔案》。
《領袖家書》。
《蔣總統事略稿》。
《困勉記》。
《民國檔案》（期刊）。
沈克勤，《孫立人傳》（臺北：學生書店，1998）。
《抗日戰爭研究》（期刊）。
《抗戰中的徵兵問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香港：三聯書店，1988）。
李珍，《緬北關東血戰記：廖耀湘將軍殉國紀念》（臺北：五洲，1979）。
吳國楨，《吳國楨傳》（臺北：自由日報，1995）。
吳湘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1963-1964）。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臺北：綜合月刊社，1974）。
———，《民國人物列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
吳景平，《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何福祥，《野人山餘生記》（臺中：聯邦書局，1984）。
何鳳山，《外交生涯四十年》（香港：中文大學，1990）。
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55）。
———，《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臺北：文星書店，1962）。
———，《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82）。
———，《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85）。
余偉雄，《王寵惠與近代中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林蔚，「緬甸戰役報告書，1942年」（國民政府軍令部戰史會檔案(廿五)5103），（又載於《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三輯，第41冊）。
邵毓麟，《勝利前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服部卓四郎著，軍事譯粹社譯，《大東亞戰爭全史》（臺北：軍事譯粹社，1978）。
唐德剛，《胡適雜憶》（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
馬寅初，《抗戰與經濟》（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孫克剛，《緬甸蕩寇志》（上海：時代，1946）。
———，《孫立人將軍緬甸作戰實錄》（臺北：學生書店，1993）。
徐永昌將軍日記。

徐康明，《中緬印戰場抗日戰爭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
翁文灝日記。
梁敬錞，《開羅會議與中國》（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2）。
———，《開羅會議與中國》（香港：亞洲出版有限公司，1962）。
———，《史迪威事件》（增訂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
郭恒鈺等編，《德國外交檔案：1928-1938年之中德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張治中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
張其昀，《開羅會議紀實》（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陳　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述》（南京：國防部，1946）。
———，《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
陳濟康等編，《蔣介石的洋顧問》（北京：華文出版社，1994）。
陶文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對外關係》（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5）。
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臺北，1962-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爭》（臺北，1985- ）。
———，《抗日戰史（緬北及滇西之作戰）》（臺北，1981）。
———，《緬北及滇西之作戰》（1981）。
———，《桂柳作戰》（1981）。
———，《滇緬路之作戰》（1982）。
———，《豫中會戰》（1982）。
———，《長衡會戰》（1982）。
———，《湘西會戰》（1982）。
———，《桂南會戰》（1982）。
———，《中美軍事合作抗日紀要》（臺北，1985）。
———，《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記錄》（臺北，1999）。
黃自進主編，《蔣中正先生留日學習實錄》（臺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1）。
傅寶真，《德籍軍事顧問與抗戰前的中德合作及對軍事的貢獻》（臺北：台灣民生，1998）。
楊天石，《抗戰與戰後中國》（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尋求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
———，《尋求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
董霖，《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臺北：1978）。
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

鄭洞國，《我的戎馬生涯——鄭洞國回憶錄》（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
蔣介石日記。
蔣廷黻英文口述，謝鍾璉譯，《蔣廷黻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
遲景德，《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臺北縣：國史館，1987）。
劉紹唐，《民國大事日誌》（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3）。
熊式輝，《海桑集》。
錢穆，《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
戴廣德，《我們怎樣打進緬甸：隨孫立人將軍遠征紀實》（貴陽：貴陽中央日報，1945）。
韓啓桐編，《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印）（國史館，外交部檔，172-1/0834）（又載於《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三輯，第41冊）。
薛慶煜，《鷹揚國威：跟隨孫立人將軍緬甸抗日親歷記》（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北京：中華書局，1987）。

## 英文部分

Allen, Louis, *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1945*（London: Phoenix, 1998）.

Bagby, Wesley M., *The Eagle-Dragon Alliance: Ame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World War II*（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2）.

Baldwin, Hanson W., *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50）.

Barrett, David D.,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Belden, Jack, *Retreat with Stilwell*（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3. Reprinted by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Bland, Larry I., *George C.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 Pogue*（Lexington, Virginia: George C. Marshall Research Foundation, 1991）.

Blinn, John Morton, *From the Morgenthau Dairie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59）.

Buhite, Russell D., *Patrick J. Hurl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Callahan, Raymond., *Burma 1942-1945*（New Jersey: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79）.

Chang, Chi-yun（張其昀）, *Record of the Cairo Conference*（Taibei: China Culture Publishing Foundation, 1953）.

Chennault, Claire Lee, *Way of a Fighter*（New York: G. P. Putman & Sons, 1949）.

--------, *General Chennault on American Policy in China during World War II*(Washington: G.P.O).

Ch'i, Hsi-sheng(齊錫生),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Cohen, Warren I.,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 John Wiley, 1971).

--------, *America's Response in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urchill, Winston S., *The Second World War*(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7).

Chudodav, Iu. V., *Soviet Volunteers in China, 1925-1945*(Moscow: Progress Publishing Co., 1980).

Craven, Wesley Frank and James Lea Cate, eds., *The Army Air Forces in World War II*, vol. 7, *Services Around the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Cray, Ed., *General of the Army: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 and Statesman*(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0).

Dobson, Alan P., *US Wartime Aid to Britain, 1940-1946*(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Dorn, Frank,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NY: Thomas Y. Corwell Co., 1971).

Eastman, Lloyd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ldridge, Fred, *Wrath in Burma: The Uncensored Story of General Stilwell*(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 Co., 1946).

Ellis, John, *World War II—A Statistical Survey*(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Elsey, George M., *Roosevelt and China, the White House Story—The President and U.S. Aid to China, 1944*(Wilton Michael Glazier, 1979).

Ethell, Jeff and Don Downie, *Flying the Hump*(U.S.: Motor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nd Wholesalers, 1995).

Fairbank, John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Fairbank, John 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Feis, Herbert, *The China Tang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Ford, David, *Flying Tigers: Claire Chennault and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Garthoff, Raymond C., 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New York: Frederick Praeger Press, 1966).

Garver, John W., *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acy of Chinese Nationalist*(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eiferman, Ronald Ian, "The Cairo Conference: A Turning Point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Ph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0).

Hodgson, Godfrey, *The Colonel: The Life and Wars of Henry Stimson, 1867-1950*(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0).

Hogan, David W., *India-Burma: the U.S. Army Campaigns of World War II*(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uperintendent of Documents, 1992).

Hull, Cordell, *The Memorie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 the McMillan Co., 1948), 2 vols.

James, Larry, *Ambassador Clarence E. Gauss & U. 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1-1944* (Georgia, 1971).

Kennan, George F.,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1900-19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Lauren, Paul Gordon, *The China Hands' Legacy: Ethics and Diplomacy*(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Leahy, William D., *I Was There*(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50).

Liu Xiaoyuan,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Lohbeck, Don, *Patrick J. Hurley*(Chicago: Henry Regenery, Co., 1956).

MacKinnon, Stephen R.,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Marshall's Opinion on the Round Table Conference about China*(IPR hearings P 1693, P-1551-1682).

Matloff, Mauric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 1943-1944*(Washington: GPO, 1959).

Morgenthau, Henry, *Morgenthau Diary (China)*, 2 vols.(United States 89th Congress, 1st Session,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Da Capo Press, New

York, 1974).

Newell, Clayton R., *Burma, 1942*(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94).

Parrish, Thomas D., *Roosevelt and Marshall: Partners in Politics and War*(New York: W. Morrow, 1989).

Payne, Robert, *The Marshall Story*(NJ: Prentice Hall, 1953).

Pogue, Forrest C., *George C. Marshall: Organizer of Victory*(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3).

---------, *George C. Marshall*(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7).

Polmar, Norman and Thomas B. Allen, *World War II: America at War, 1941-1945*(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n.d.)

Renzi, William A., & Mark D. Roehrs, *Never Look Back: A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New York: M. E. Sharpe, 1991).

Romanus, Charles F. &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6).

---------, *Time Runs Out in CBI*(Washington: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Roosevelt, Elliot, *As He Saw It*(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46).

---------, *The FDR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New York: Duel, Sloane, & Pearce, 1948).

Rosinger, Lawrance X., *China's Crisis, 1945*(New York: Alfred A. Knoff, 1945).

---------, *China Wartime Politics, 1937-194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Schaller, 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Schrijvers, Peter, *The GI War Against Japa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Schultz, Duane, *The Maverick War: Chennault and the Flying Tiger*(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Scott, Robert Lee, *Flying Tiger, Chennault of China*(Carder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0).

Service, John S.,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II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edited by Joseph W. Esherick)(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 *The Amerasia Papers: Som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Sherwood, Robert E.,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New York: Harper and Bros., 1948).

---------, *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L. Hopkins*(1949), 2 vols.

Sih, Paul K. T.(薛光前), ed.,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ville, NY: Expositi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Slim, William J., *Defeat Into Victory* (NT: McKay, 1961).

Smith, Robert, "Alone in China: Patrick J. Hurley's attempt to unify China, 1944-194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66).

Spence, Jonathan,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9).

Stettiniss, Edward R., *Lend Lease – Weapon for Victory*(New York: The McMillian Co., 1944).

Stimson, Henry L.,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 War*(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8).

Stoler, Mark A., *George C. Marshall: Soldier-Statesman of the American Century*(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Taylor, Jay,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Tong Te-kong(唐德剛) & Li Tsung-jen(李宗仁),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79).

Tsou, Tang(鄒讜),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0-1950*(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Tuchman, Barbara W.,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7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6).

---------,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194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Utley, Jonathan G.,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Knoxvi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van Tuyll, Hubert P., *Feeding the Bear: American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Van de Ven, Hans J.,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London: Routledge, 2003).
Webster, Donovan, *The Burma Road*(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2003).
Wedemeyer, Albert C., *Wedemeyer Reports*(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58).
White, Theodore H., *Thunder Out of China*(1946).
--------, ed., *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1948).
Woollcombe, Robert, *The Campaigns of Wavell, 1939-1943*(London: Cassell & Co, 1959).
Young, Arthur N.,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Zhukov, Georgii K., *The Memoirs of Marshall Zhukov*(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71).

# 人名事件地名對照表

## 人名及事件

**A**

Acheson, Dean=艾奇遜，美國國務院官員

Alexander, Harold=亞歷山大將軍，英國駐印軍司令官

Alsop, Joseph W.=艾索普，著名記者，陳納德幕僚

ANAKIM=安那金，收復全緬作戰計畫代號

ARCADIA=英美兩國在華盛頓會議，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

ARGONAUT=雅爾達會議代號，1945年2月4-11日

Arnold, Henry A.=安諾德將軍，美國陸軍航空司令

Arnstein, Daniel G.=安斯丹，美國財政部官員

Auchinleck, Claude John Eyre=奧欽勒克將軍，英國駐印軍司令官

**B**

Bissell, Clayton L.=畢賽爾將軍，美國駐印度空軍司令官

Boatner, Haydon L.=波特勒將軍，史迪威部屬

Brereton, Lewis H.=白賴德將軍，美國空軍中將

Brett, George H.=勃蘭德、白來頓，美國陸軍航空隊中將

Brooke, Field Marshall Sir Alan F.=布魯克元帥，英國陸軍參謀總長

BUCCANEER=安達曼群島攻擊計畫代號

**C**

CAPITAL=攻擊緬北計畫代號，1944

Carbonado, Operation=魏德邁攻擊廣州灣計畫代號(1945年夏季)

Carlson, Evans F.=卡爾遜， 美國軍官

CASABLANCA=卡薩布蘭加會議代號，1943年1月15-23日

CHAMPION=東南亞戰區1943年12月在緬甸作戰計畫

CDS(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中國國防供應公司

Chennault, Claire L.=陳納德將軍，美國空

軍將領

Cheves, Gilbert X.=謝飛斯將軍，美國陸軍將領

Chindits=英國駐印軍特種部隊，長距離滲透作戰，號稱一個師，實際約一個旅

Chuikov, Vassily I.=崔可夫將軍，蘇聯將領

Churchill, Winston S.=邱吉爾，英國首相

Clagett, Henry B.=克萊格將軍，美國空軍將領

CNAC(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中國航空公司

Cunningham, Alan G.=康寧漢元帥，英國將領

Currie, Lauchlin B.=居里，羅斯福總統助理

**D**

Davies, John P.=戴維斯，美國國務院官員，史迪威屬下

Day Star=日星號輪船

Dennys, Lancelot E.=戴尼斯將軍，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

Dill, John G.=迪爾元帥，英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

Dixie Mission=美國陸軍派駐延安觀察組

Doolittle(James H.) Raid=杜立特，美國空軍軍官

Dorn, Frank=竇恩將軍，史迪威部屬

Drum, Hugh A.=莊穆將軍，美國陸軍將領

**E**

Eden, Robert Anthony=艾登，英國外相

EUREKA=德黑蘭會議代號，1943年11月28至12月1日

**F**

Fairbank, John K.=費正清，美國駐華大使館官員

Falkenhausen, Alexander von=法根豪森將軍，德國軍事顧問

Ferris, Benjamin G.=菲利斯將軍，史迪威部屬

Foch, Ferdinand=福熙元帥，法國陸軍將領

**G**

Galahad=美軍在緬甸戰區突擊隊代號

Gallen, Vasily K. Bleucher=加倫將軍，蘇聯軍官

Gandhi, M. K.=甘地，印度獨立運動領袖

Gauss, Clarence E.=高斯，美國駐華大使

Grimsdale, Gordon E.=格立斯但爾將軍，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

Gruber, William R.=克羅柏、格魯勃將軍，美國陸軍將領，史迪威部屬

**H**

Handy, Thomas T.=漢德將軍，美國軍部官員

Hearn, Thomas G=赫恩、希恩將軍，史迪威部屬

Hitler, Adolf=希特勒，德國元首

Hopkins, Harry L.=霍普金斯、霍布金、賀浦金斯，羅斯福總統顧問

Hornbeck, Stanley K.=項貝克、賀恩貝克，

美國國務院官員

Hull, Cordell=赫爾，美國國務卿

Hurley, Patrick J.=赫爾利，羅斯福總統特使

**I**

Ichigo=一號作戰

Ismay, Hastings=伊斯麥將軍，英國首相軍事參謀長

**J/K/L**

Kerr, Archibald Clark=卡爾，英國駐華大使

King, Ernest=金氏上將，美國海軍將領

Krueger, Walter=美國陸軍將領，第六軍軍長

Lattimore, Owen=拉鐵摩爾，蔣介石美籍政治顧問

Leahy, William D.=李海上將，美國海軍將領，羅斯福總統參謀長

Lentaigne, Walter David Alexander=英國駐印軍第三師司令官

Luieslykes=露依思琳克思號輪船

**M**

MacArthur, Douglas=麥克阿瑟將軍，美國陸軍上將

Magruder, John=馬格魯德將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

Marshall, George C.=馬歇爾將軍，美國陸軍參謀長

McCloy, John J.=麥克洛，美國軍部副部長

McClure, Robert B.=麥克魯爾將軍，魏德邁部屬

McNarney, Joseph T.=麥拉里將軍，美國陸軍副參謀長

Merrill's (Frank D.) Marauders (Unit Galahad)=「梅瑞爾的打劫者」，美國在緬甸戰區長距離作戰部隊指揮官

Morgenthau, Henry, Jr.=摩根韜，美國財政部長

Mountbatten, Louis=蒙巴頓元帥，東南亞戰區總司令

**N**

Naiden, Earl L.=奈登將軍，美國駐印空軍司令官

Nelson, Donald M.=納爾遜，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

Nimitz, Chester=尼米茲將軍，美國海軍上將

**O**

OCTAGON=魁北克會議代號，1944年9月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美國情報單位

**P**

Patch, Alexander McCarrell=美國陸軍將領，第7軍軍長

Prince of Wales=威爾斯親王號，英國戰艦

**Q/R**

QUADRANT=魁北克會議代號，1943年8月

RAVENOUS=收復緬北作戰計畫代號

Repulse=卻敵號，英國戰艦
Roosevelt, Franklin D.=羅斯福，美國總統

**S**

Seeckt, Hans von=塞克特將軍，德國軍事顧問
SEXTANT=開羅會議代號，1943年11-12月
Seymour, Sir Horace=薛穆，英國駐華大使
Simpson, William H.=辛普孫將軍，美國第9軍軍長
Slim, William J.=英國駐印軍將領
Somervell, Brehon B.=塞末維爾將軍，美國陸軍後勤司令
Somerville, James=蘇馬維爾將軍，英國印度洋東方艦隊司令
Stalin, Joseph V.=史達林，蘇聯元首
Stilwell, Joseph W.=史迪威、史蒂華、史蒂威、史梯威將軍，美國駐華最高軍事代表
Stimson, Henry=史汀生，美國軍部部長
Stratemeyer, George E.=史特萊曼爾、斯特斯曼，美國空軍將領
Sultan, Daniel I.=索爾登將軍，美國陸軍將領，主持緬甸作戰

**T**

TARZAN=從印度向緬甸南北部同時作戰計畫代號
Timberman, Thomas S.=丁勃曼，美國軍部官員
TRIDENT=華盛頓會議代號，1943年5月
Tulsa=托爾賽號輪船

**U/V/W/X/Y/Z**

Wainwright, Jonathan M.=魏萊特將軍，美國陸軍駐菲律賓司令官
Wallace, Henry A.=華萊士，美國副總統
Wavell, Archibald P.=衛佛爾將軍，英國駐印軍司令官
Wedemeyer, Albert C.=魏德邁將軍，美國陸軍，史迪威繼任人
Welles, Benjamin Sumner=威爾斯，美國副國務卿
Wheeler, Raymod A.=惠勒、韋洛將軍，美國陸軍將領
de Wiart, Andrian Carton=魏亞特將軍，邱吉爾駐華個人軍事代表
Winant, John G.=美國駐英國大使
Wingate, Orde C.=溫格提，英軍在緬甸戰場將領

# 地名

**A**

Akyab=阿恰布／阿卡布
Anakan Hills=阿拉堪山地
Assam=阿薩姆

**B**

Bengal=孟加拉
Benning(Fort, GA)=班寧堡
Bhamo=八莫

**C**

Cairo=開羅
Calcutta=加爾各答
Casablanca=卡薩布蘭加
Chin Mountain=欽山
Chindwin =更的宛河
Chittagong=吉塔港／吉大港
Coxima =可喜瑪／科伊馬

**D/E/F/G**

Guadalcanal=瓜地卡尼爾

**H/I**

Hukwang Valley=胡康河谷
Imphal=印普哈／英法爾

**J/K**

Kandy=坎底
Kasa=卡薩
Kelewa=卡勒瓦／加里哇
Khartum=卡東
Kra Isthumus=克拉地峽

**L**

Lashio=臘戌
Leavenworth=萊文渥斯
Ledo=列多／雷多
Loikaw=羅依考／壘固
Loilem=雷列姆

**M**

Magwe=馬格威／馬魏／馬圭
Manipur=馬尼坡
Marshall Islands=馬紹爾群島
Maymyo=眉苗
Meiktila=密特拉
Mogaung=夢拱
Mong Yawng=猛揚
Moulmein=毛淡棉
Myitkyina=密支那

**N**

Nanpa=南帕
New Guinea=新幾內亞
New Britain=新不列顛

**O/P**

Pegu=庇古
Prome=普羅姆／普羅美
Pyawbwe=瓢背

Pyinmana=彬馬那／平滿納

**Q/R**

Raheng=拉漢
Ramgarh=蘭伽／蘭木加

**S**

Sadya=薩地亞
Saipan=塞班島
Shingbwiyang=新平洋
Shwebbo=士威坡
Sittaung R.=西湯河／舒坦
Suifu=敘府

**T**

Tarawa=塔拉瓦
Taro=太洛
Taunggyi=棠吉／東枝
Tehran=德黑蘭
Touches=圖且
Toungoo=同古／東瓜

**U/V/W/X/Y/Z**

Yenangyaung=仁安羌／仁安羌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中美建立軍事同盟關係徹底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因爲它不但是中國在整個歷史上第一次和西方強國締結實質性的政治軍事合作關係，而且它在抗日戰爭的最後四年中使中國從一個在生死邊沿掙扎的次殖民地國家躍升爲世界四強之一。

這個巨變如何產生？其過程有何特色？中美兩國處理同盟關係的基本態度有何不同？它們之間的互動行爲對於同盟關係的效率產生何種影響？

針對這些重要問題，本書的目的是在以大量中英文原始資料爲依據，全面性檢驗過去歷史論著的正確性，進而提出與傳統史學迥然不同的敘述，分析和詮釋，促請讀者對這一段重要歷史進行嶄新的思考。

GPN 1010000838
ISBN 978-986-03-1769-5
00700
9 789860 317695
建議分類：近現代史、戰爭、軍事